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大全

主编 / [英] 阿诺德·托因比

1939年3月
的世界



你们接受他给你们发布的进军令；你们却从未为自己作好充分的作战计划：在你们听说事情已经发生或者实际上正在发生之前，你们又未预见到会发生任何事情。以前你们或许还可以安然无事；现在已经大祸临头，你们再也混不下去了。——雅典人啊——在我看来，好象有一位众神之神因我们城邦的政策而感到羞愧，才叫腓力有这样大的侵略胃口。因为，如果腓力安分守己，守住已经抢得的地盘，而不是又去扩张，那么，我想你们中间会有一些人满足于现状的，而这种满足于现状会使我们的人民被置为可耻的、懦怯的和丢尽体面的。现在，由于他老是企图攫取新的地盘，贪得无厌，他也许会把你们都挑逗起来，尽管事实上你们并没有置道德意图于不顾。

德摩斯梯尼：《斥腓力的第一次演说》，第 41—42 页

本卷规划

作为《国际事务概览》丛中战时（1939—1945年）历史的导言，本卷旨在将1939年3月呈现在虎视眈眈的侵略国眼中的国际图景的概貌和特征作一粗略的描述。

选择1939年3月作为目前这次纵览全球的日期，乃是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1939年3月14日夜间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一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其正式开始则是同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1939年3月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研究国际事务者从这个转折点环顾四周，是会得到教益的。但如仅限于此。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则纵然有此有利的立足点，也仍然会产生错觉。因为，从较长远的前景来看，选定任何一个标志着战争爆发的准确日期这样方便的做法似乎是必要的，但却会人为地歪曲历史真相。实际上，世界是逐步地滑进第二次大战的，这一可悲的过程绵延了足足十年以上。这个终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慢性折磨过程，实际上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满洲的战争行为，而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才达到顶点；因为，这场战争截至这一天止，当时的七大强国虽已有六个成为交战国，但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被卷入之前，还没有，成为一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大战。

本卷拟论述1939年3月的世界概况，将分为篇幅不等的如下三编。首先按政治角度而后按经济角度所考察的当时的国际局势，构成了本卷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的内容。第三编是简短的结论，总结了当时不稳固的和已在动摇中的均势以及作为这种形势的表征的意识形态论战。

政治概览（第一编）又按侵略国立场所划分的地理路线再分成几章。首先论述一些世界大国，它们的利益和领地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落进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范围。英国、美国和苏联确实都是因为遭受侵略，迫不得已才终于参战的。当它们起而应战时，英国自治领全都决定同英国共命运，只有一个除外，同时，若干泛美联盟的拉丁美洲成员国也表现了同美国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意志。但在1939年3月，这些国家还没有一个处于第一线；而且、甚至在战火已在远东燃烧了八年之久又复在欧洲点燃之后，这两个国际冲突的战场在美国参战以前也还没有彼此连成一片。在1939年3月的国际角逐场上，仍然还是两服务不相涉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旋涡——一个是日本制造的，一个是德国制造的——本卷将用各别两章分述其经过。在每一章里，对于正处于遭受袭击危险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将按其危险程度由轻而重次第加以叙述，先从位于区域性侵略者行动范围外缘的国家开始，然后再谈那些发现自己已处于侵略者（心理上的、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火力射程内的国家，每一章结束时则分别描述侵略国自己的情况。

经济概览（第二编）集中论述各大国。这一编毋庸象论述政治全貌那样从世界地图上去——细分章节，便可绘出一幅明晰的画面。这个方法较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国又一国地去逐个观察，似乎更能提供一个既清楚而又有立体感的图象。

阿诺德·托因比
1951年3月

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著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脚注中详细注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著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式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1995年4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第一编 政治概览

第一章 世界大国

第一节 西半球

阿诺德·托因比

（一）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美国公众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

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那个时候，世界上最感觉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地区是西半球，而西半球最高枕无忧的国家之一便是美国，当时，美国仍旧保持着相对的安全，但实际上这种安全已远非美国大多数公民所想象的那么真实了。美国全国上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在 1940 年夏天。那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已将全部欧洲大陆资源掌握在手中的第三帝国，在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毫无准备的美国之间，整个欧洲只有英国还站在火线上进行战斗。

可是，在 1939 年的春天，美国人民还没有看清楚，由于人类技术在征服空间和时间方面新近加速取得的进展，从地缘政治上说，大西洋这时正在急剧缩小到只有从前英吉利海峡那么宽，而西边的非洲凸出部分和东边的巴西凸出部分之间的达喀尔海峡，也缩小到只有多佛海峡那么大的距离了。但那时美国人的感情和政策还依然受着往事的支配，虽然这些事情与美国这时实际所处的国际情势已经有一部分或全部不相关涉了。

过去最强大的影响也许是这一事实：美国活着一代的百分之九以上的百种居民，以及全部美国白人的祖先（最早也不过上溯到十代或十二代），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机，毅然离开了欧洲先人的故土，横渡大西洋，为的是要在美洲这一边开始一种新生活，摆脱欧洲遗传下来的不愉快环境。此种在个人家庭背景方面的划时代的新起 2 点，是所有美国人共有的一种经历或传统，不论其欧洲原籍为何地，亦不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踏上美洲海岸是在何年何月。一种寻求“福地”的希望是吸引他们到美洲来的磁石，这块“福地”有汪洋大海同他们业已设法逃离的欧洲“旷野”相隔绝；一般说来，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已充分实现了，而且还有过之。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步开发和逐个海岸的开发，它所藏自然资源之丰富业已获得证实，并超出了第一批移民和早期拓荒者的梦想。与此同时，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看来也实现了它的政治目的，成功地开拓、发展和享受这份新发现的财富而不受“旧世界”权力政治的干扰。美国脱离英国而取得独立，接着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南、北美洲各地的政权又告消失，以及美国的实力稳步增长，终于能同欧洲一些最大的强国平起平坐，这些显然是构成华盛顿不卷入欧洲纷争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几个相继阶段。这段历史使美国人更加懂得的是国家的福利和特权，而不是国家的力量和责任，因而他们在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认为是自己所挣得的权利即对一种特别有利的局面的控制毕竟还靠不住时，就感到十分恼火了。在此种激怒之下，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强烈否认这一说法，即美国的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世俗的世界历史长河发生了某种深刻变化的结果。因此，他们不愿意把这一不受欢迎的经历视为一个他们无力驱除的持久事实的证据，或者视为提出了一个必须在长期政策上作出某种急剧改变才能应付的持续挑战。威尔逊总统首先赞同作出此种改变，倡议建

1940 年美国人口总数为一亿三千一百六十六万九千二百七十五人，其中外国出生的有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八人。

“福地”及“旷野”均引自《旧约·申命记》第 8 章第 1、2 节及第 9 章第 28 节；“福地”在《旧约·申命记》中译作“所应许之地”。——译者

同上

立国际联盟，却遭到了国人的否定，他们不愿意美国成为一个多半是由美国的灵感促成的国际新机构的成员国。他们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认识到，作出这一决定，他们并不能因此斩断欧洲自1914年就突如其来地投在他们周围的那络新的乱麻，与此相反，倒是注定了他们的国家要在不到二十年后的又一场更加可怕的全面战争中担当起一个主要的角色。

当时许多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果真会有此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却深信他们参加的那一场他们才摆脱不久的大战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和不明智的，导致参战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是真的而且是唯一的——无疑是出于公愤。两次大战期间在美国舆论讲坛上讨论的各种原因中，德国军国主义在那个交错益密的世界所起的明显影响并不怎样突出——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德国是战败国，一时还无足轻重，部分也可能是由于承认了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无异于背弃了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所急于要造成的那种情况。持有此类见解的美国人坚称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威尔逊总统的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欧洲（指协约国，主要指英国）的外交手腕——美国人历来认为在斗智方面美国一向处于劣势，以及美国制造商和银行家的不爱国的自私自利，他们投机取巧地支援并资助协约国，通过院外活动，诱使政府参战，以确保他们的债务人赢得胜利，从而保全他们的私人财富。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经过这么一番改编所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国人民是因受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防止不再重演这一页可悲的历史的措施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的。

欧洲战胜国的战后政策又使美国大失所望，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决心。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为了瓜分战利品，既不征得美国同意，也确实没有正式通知美国，便互相订立秘密条约，战后又不废弃这些所订的条款；它们不肯裁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偿还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尽管它们确实偿还了所欠美国私人金融家的债款）。

战事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外交事务方面的最近历史⁴及其未来的政策展开了这一辩论，而且接着又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激烈冲突。一个到头来证明确实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却被转化到国内事务的角度上去了，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没有怎样动摇美国人民不忧外患的传统安全感；也没有怎样约束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传统倾向性，即他们处理外交事务——如果还是外交的话——只是作为国内方面的一种过时而复杂的政治游戏的得分多少而已。当时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与国会多数派的共和党人之间的个人争吵，是参议院拒绝批准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的直接原因。在这场争吵的背后，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长期对抗，其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缺乏对分别授予两者的权力进行协调的规定。在1939年，此种生命力较之个人生命更长并且不受个人特性支配的“制约与平衡”的宪法结构，是在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已在进行不宣之战以及在纳粹德国与英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参议院就旨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法问题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所主要考虑的依据之一。1939年，国会决心通过在华盛顿的立法机构尽可能确保美国不再卷入战争，虽然在这个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下，

见《国际事务概览，1938年》（*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8），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1年版，i. 575580（此后引用时简称《概览，××年》）。

见《概览，1938年》，i.642—650。

他们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不希望采取可能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的副作用的行动。但在参议员的心目中，又深怕因急于要制订某种法令——即使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而制订——而增强总统的特权，从而扩大他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范围，以致背离这些目标，造成混乱。

外交事务冲击国内政治的另一点是—些“归化的”美国人集团所具有的感情上的关涉。他们抚今追昔，在逍遥自在的距离以外，对他们的原籍国家以及故土乡亲的命运都不胜系念。其中有的集团握有大量选票，这对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党却是关系重大的。他们支持一些欧洲国家的事业，但并不会积极支持到赞成由美国代它们去积极干预，因为那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作为半美国化 5 的美籍人士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确是同他们的倾向相违背的。但他们确曾有力地促进了故国的事业，并为此而反对任何主张站在他们故国的欧洲敌人方面进行干预，因而在警惕地捍卫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方面起到了颇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最前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这时已失去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影响。爱尔兰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出现了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它实质上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的合法愿望；德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部分原因是由于时间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的同化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中间最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吵吵嚷嚷的代表纳粹思想的少数派。这些人由于大事宣传而自趋失败。另一方面，过去主要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担当的那种往英国狮子脸上抹黑的角色，这时已开始由一部分犹太裔美国人接了过去，这一类角色在美国政界中是不大会有空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危机不断增长的十年中，美国国内事务还因第三种情况而中断了它的外交政策：1929 年秋的“华尔街大跌价”使美国人民陷于国内经济危机，千百万美国公民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和愁苦之中，无暇他顾。在不景气尚未开始消除之前，罗斯福政府为战胜不景气而以“新政”名义所采取的措施便成了国内激烈政治论争的主题——所采取的措施与若干西欧国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所经历的相比拟，也无异于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正值国际事务战场上发生有关国家命运的严重事件时，美国人民却全神贯注于有争议的国内问题上。但这似乎也不足为怪，因为回想到 1936—1939 年这几个严峻的年头，那时法国人民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更为危险，可是他们也同样全神贯注于那场赞成或反对人民阵线的国内施政纲领的斗争。1939 年 3 月，美国国内政治对国际领域产生的另一点影响，是人们预期罗斯福政府将于 1940 年任期届满，下届政府——不论是微弱多数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引往一个新的航向。如果我们看不到美国人作过的其他考虑所产生的影响，那末，如前所述，美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外交事务所抱的态度似乎是自私的、肤浅的，甚至是轻率的。而那些其他考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比起我们业已论述的，

这一点以后将在 1936—1949 年的各卷《概览》中进一步阐述。

爱尔兰共和国建立于 1937 年，但在 1949 年才正式宣布。——译者

见《概览，1931 年》，第 43—44 页和第 199—200 页。

见《概览，1933 年》，第 16—35 页。

见下文，原著第 171—178 页。

在道义上却是比较令人钦佩的，尽管在政治上不是那么现实。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一样，能把现实的利己主义同真诚的理想主义给成一种混杂的动机，这在迷惑不解的外国观察家看来，如果确实不是伪善，那也必然是幼稚。种种激励着孤立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义者一翼的动机——旨在“不抱偏见”——如果只有被迫而全部公开才能体现为行动，那是不会取得其确已取得的进展的。一种真正理想主义的舆论气候给它们提供了不公开宣布的机会。一般说来，那是由和平主义运动制造的，其中不仅有具有自由思潮的自由派（这一派人数虽少，其影响在比例上却很大），而且，总的说来，还集中了具有保守思想的教会势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们在 1939—1941 年间显得特别积极。

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在美国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进行着，以便取得有关国际事务的更多消息，并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友好相处，后来又重整军备，这就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严肃认真的意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采取那么大量的坚持不懈的措施，来促使自己对本国边界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取得并保持密切和准确的了解。美国人民那时正在埋头于国际事务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学的各个系和各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为民众提供在家讨论和听取消息的遍布于各地的组织，而且还（在 1929 年经济开始衰退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出国旅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在国外关键地点派驻报纸和电台记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众者。这些记者在国内公众中拥有广泛的热心的读者和听众。——这虽不是有计划的，却是为将来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准备，而且在美国对领土较狭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国的政策上同时也采取了重要的新方针。

（二）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转变

凡是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任何侵犯，美国将予以抵抗，这是美国门罗主义向欧洲各大国发出的警告。门罗主义是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事先并没有同受惠国协商；这不是西半球各独立国家之间所作的集体安排，既非为了它们要对付欧洲大国而谋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各自安全。门罗主义于1823年12月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为了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方兴未艾，而且从门罗主义宣布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一百一十六年间，这种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却并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斗争，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占有大查科而进行的1932—1935年战争，说得更确切一些，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三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门罗主义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在美国，可能有人会说——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么说的——除非华盛顿政府断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国际警察身分，为维持并恢复秩序而负起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大国不得因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国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时或遭受干涉的就不是墨西哥了，还有不少地峡和岛屿共和国。自1893年至1927年美国对拉丁美洲邻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被美国的评论界轻蔑地说成是“金元外交”，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由于美国公民的私人利益而对加勒比海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事件要比为了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进行干涉的情况多得多。美国的拉美政策的新转变始于1927年，那时及此后即开始有意放弃以干涉为后盾的金元外交，转而采取了一种新的“睦邻政策”。1939年3月15日前夕，即在1938年12月9日至27日的利马会议上，这一睦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迅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高潮，这在本丛书其他各卷均有论述。政策的新转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就使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的气氛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断然放弃代表美国公民在拉美国家的私人利益的武装干涉，甚至

见《概览，1930年》，第421—436页；《概览，1933年》，第393—438页；以及《概览，1936年》，第837—872页。

人们可能认为，美国于1902年把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促成拉丁美洲一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美国在1826—1846年之间以墨西哥为牺牲品所进行的侵略的一种将功补过。可是，就拉丁美洲国家的评价而言，美国的这一功绩到了1913年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了，那一年它解放了巴拿马，又促成了拉丁美洲另一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但巴拿马却不是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解成的，而是脱离了当时已经存在的拉丁美洲共和国哥伦比亚。

见《概览，1927年》，第4编；《概览，1930年》，第5编(i)；《概览，1933年》，第318页以下；《概览，1936年》，第806页，第808页；《概览，1938年》，i-658—689。

连外交压力也放弃，这就迫使美国商业的投资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蒙受严重损失，未来的利润也势必蒙受令人失望的削减。拉美各国政府使美国商业利益蒙受损害的若干措施是粗暴的、专断的，而且在美国舆论看来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能够为推行其睦邻政策而付出此项代价，没有遇到来自国内方面的重大反对。在一个惯于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商界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此种民族诚意的重大迹象，毫无疑问，主要应归功于拉美方面由于美国政策的新转变而作出的又迅速又热情的反应。金元外交对阿根廷的伤害并不大，但它一向爱把自己看作是拉丁美洲的首要国家，所以对美国可能还是忿忿不平。在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美国对他们的根本触犯乃是双方在力量和土地面积方面的悬殊。相形之下，阿根廷和巴拿马都成了侏儒，而北美巨人长长身影的一端则投射在拉普拉塔的河面上。然而，大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旧恨最难消除的墨西哥在内，这时全都深信，美国对它们所作的新表示是诚挚的，握住当前伸向它们的这只有力的手，对于它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见《概览，1936年》，第808—809页。

（三）德国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盟主地位的挑战

理想主义与开明的利己主义是美国推行睦邻政策的主要动力。大家都觉得一心推行强权政治是非美国式的；从扩大的视野说来，激起拉丁美洲人心底里的恶感的金元外交被认为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的，尽管也许并没有旧政策的受害者要把憎恨转变为有效的行动的前景。在美国政策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上的趋向变化以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已开始自觉地感到，当前自然呈现的是一种需要协调和合作的新意图。这时是在 1933 年，当时德国步意大利后尘，在政治上也转了向，接着是在 1936 年，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又通力合作结成柏林罗马轴心，于是一个新的阴影——这一次是来自欧洲的即将到来的侵略的阴影——投射到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洲的土地上。自神圣同盟国家企图通过各自的武装干涉，不成熟地阴谋恢复西班牙政府对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帝国的起义移住民的统治（当时被英国制止了，这当然使美国满意并感到欣慰）迄今，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拉丁美洲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威胁。

1939 年春天，纳粹德国手里握着好几张硬牌，时机一到，就要同美国玩一场权力竞赛，以便执拉丁美洲之牛耳。

第一张牌是经济上的，德国已经在玩了。尽管加勒 10 比海周围的热带和亚热带拉美国家的剩余产品多半正是美国所缺少的，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温带和亚温带国家的剩余产品却多半只能用来补充美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不足，因而在美国就找不到太大的市场。可是，这些产品在西欧的主要工业国家却有着天然的市场。英国和德国的港口离巴西和阿根廷的港口较之离美国的港口并不远；加之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同国内食品生产不相平衡，它们只有在工业生产的制成品方面才远远超过国内的需要，而美国则不同，它的国内食品生产也同工业制成品一样，都远远多于国内市场需求量。因此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就有优先的机会同南美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展开大量的交换。而由于首先有权向英国市场提供食品的是英国的各自治领——这原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后来成了 1932 年渥太华协定的财政条款，——因此德国在向拉丁美洲进行贸易的竞争上，就有了优先于英国和美国的内在的有利条件，姑不说它在拉美也象它在东欧那样，凭纳粹手法以易货为基础，在政府间进行双边贸易而取得直接与暂时的胜利。

但是，不论是德国的策略手段也好，或者是它没有预先承担为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食品提供市场的义务也好，都还不足以说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的南美贸易成功地赶上英国的原因。德国商业神通广大

见《概览，1933 年》，第 111—134 页。

见《概览，1936 年》，第 3 编（vii）。

石油在加勒比海国家的出口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委内瑞拉的石油当然只是补充美国石油之不足，而不是美国的缺货。但由于美国石油储藏量即将枯竭，加之美国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巨大消费不断增加，这就确保了委内瑞拉油田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巴西的咖啡，但拥有咖啡的巴西人不如拥有石油的委内瑞拉人那么走运。美国对石油的需求显然是无限的，但美国人民对咖啡的需求量却不能增加，因而巴西人须为其巨大的咖啡产量另找市场。

见《概览，1932 年》，第 27—34 页。

的一个重要的而不是完全合法的原因，是德国商人愿意在南美城市定居（而且不只是在各共和国的首府定居），娶南美女子为妻，逐步建立自己的商行，生活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国家。英国商人则相反，除极个别外，他们居住在南美不过是临时性的，有些还可能多少有点儿苛求与傲慢的行商。至少在这一方面，英国人干得不如他们的德国竞争者出色，不是没有理由的。下一节的数字表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结束时，德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销售量已超过英国，与此同时，它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量却比英国少。这又说明，那时在这一领域里，英国人的事业心与魄力都不如德国人。

德国同拉丁美洲的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因英国的封锁而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到了1938年，德国却供应了拉丁美洲进口额的百分之十六点二。与此相比，美国在那一年的供应量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九，英国是百分之十一点七。同年，德国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为拉美出口额的百分之十点五，美国是百分之三十点二，英国是百分之十六点八。德国对巴西和智利的贸易突进取得的成功最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此种地位到了1936年便被德国取代了。上述数字表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从英国手里取得的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最高地位，正在受到德国的决定性挑战。尽管美国由于它的一切经济活动规模宏大，具有由积累而成的固有的有利条件，它在拉丁美洲同德国的经济竞争中却受到阻挠。这便是，美国国内的农产品生产者要为自己保留国内市场，而制成品生产者则要使拉丁美洲能以农产品来支付他们希望卖给它的制成品，两者之间便发生了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德国虽然也有，但不象美国那样尖锐。

德国掌握的第二张牌是它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人口中有重要的德国成分。这张牌在炮制了柏林—罗马轴心并扩大为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同盟以后而力量更强了，这是就其侵略性的伙伴关系在拉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因为在上述三个拉美国家的前两者的人口中，有着不少意大利人的后裔，而在巴西则有不容忽视的日本人的后裔，此外在太平洋沿岸的几个拉美国家中也有此种情况。在轴心国所策动的国旗随着贸易而飘扬的计划中，这些“归化的”拉美人无疑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但是德国商业渗透的策略在拉美和东欧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很快便开始自行消失，正如对方同样快地看到它在历史的第二页中就必然会遇到种种不利，所以，同样也正由于德国策略的富于侵略性，它在拉美和美国的政治渗透也势必招致自身的失败。

拉美各共和国自最初实现独立以来，其中大多数国12家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内没有实行过民主治理（除纸上谈论以外），它们却有自己的那一套政治倾向，象美国的一样，同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的极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宪政期以前的散漫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组织严密的宪政期以后的集体主义。历史上与此相似的是同时代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十六世纪它们自己的征服者的狂飙思潮，以及中世纪宗派间的世仇，浸淫而成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邦国家的不时杀伐的独裁统治。一种土生土长的拉丁美洲独裁制，不同于由一个领袖训练成一党阵容的法西斯—纳粹式的政治组织，1938年5月热图利奥·瓦

加斯总统同巴西法西斯党员之间的一场冲突就说明了这道鸿沟。这一夭折的巴西极权主义运动有人怀疑是在柏林的指示下由巴西籍的德国人煽动起来的。确实，有些在拉丁美洲入了当地国籍的德国人也具有纳粹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德国移民比在美国的更容易脱离大众而以优秀民族自居。不过在那些为着要保持德意志国粹而苦心维持独立的德语学校和社团的德国人中，大部分仍然还是他们各自定居的拉美国家的忠实公民。另有大部分则驯服地同化了，这强烈地表现在天主教徒的德国移民中，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宗教上的阻力使他们同自己的拉美同胞分开；这也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移民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将一种拉丁系语换成另一种拉丁系语并不困难。至于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不是单纯的天主教徒，便是熟谙世事的法国派自由思想家，后者对拉丁美洲本地的知识分子也颇有影响。

见《概览，1938年》，i.672。

这里指将意大利语换成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译者

(四) 南美的地缘政治地位

因此,尽管轴心国在拉丁美洲有几张硬牌,一向玩得也颇成功,但在1939年已有迹象表明,它们可能开始要输了。不但是经济竞赛要输,政治竞赛也要输。然而此种挫折完全可以凭出奇制胜而挽回败局。1933年在德国本土,希特勒就在人心有利于他的高水位开始退潮的时刻,突然赤裸裸地凭借必要数量的暴力袭击而达到了他的目的。由于这个原因,在拉丁美洲,正如在欧洲一样,13是不可能不考虑军备和战略的,而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来,南美自“凸出部,以南的地区,是西半球的、因而也是美国的致命弱点所在。

在一张按麦卡托投影法画的地图上,一个不懂航海的人看来,西半球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它自成一体,同世界的其他地方不相联接。但在1939年的一名飞行员看来,或者甚至可以说,在1500年的葡萄牙轻快帆船队中的一位舵工看来,地图上的地理分布情况便是另一个样子了。当时葡萄牙的一支轻快帆船队,在试图绕过非洲西边的凸出部前往印度途中,偶尔驶入巴西东边的凸出部,于无意中发现了南美。在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来,巴拿马地峡不是蜂腰,连脐带也不是,而只是政治地理方面的一项奇迹,它给人以一种假象,好象两个大岛是一个整体——一个与西非的一端隔海相望,另一个则与世界唯一大陆的东北亚的一端望衡对宇,每个岛屿都与自己相对的大陆一角又联接得那么近,至少同相隔加勒比海的其他美洲岛屿一样近。

前面已经说过,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东南海岸,其海路距英国和德国的港口是同距美国的港口同样近的。时至1939年,南美和两欧之间除这一条海上商业航线外,又开辟了一条经由达喀尔的空中商业航线;民用航空既已畅通,继之而来的将是军用制空权,德国人已在为下一步铺平道路。他们在拉丁美洲本土雄心勃勃地开辟并成功地经营着几条空中航线。与此同时,北美同亚洲的联系则是行驶汽轮的航线,从旧金山和温哥华驶往横滨和上海。比起西班牙大帆船第一回开辟的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驶往菲律宾时马尼拉那涤太平洋运输线来,这是一条较短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使用“纽带”加强了这一条海上航线,因为“‘纽带’虽轻如大气,却坚若铁链”,它沿着落基山脉东麓的一系列新机场,从大陆美国飞越不列颠哥伦比亚,进入阿拉斯加,再继续往前,然后跨越西伯利亚上空而进入苏联的心脏地区。当笔者撰写本文时,即1951年,通过此种空中焊接方法,把北美之岛与旧世界大陆结成一体,其前景看来还大有发展。当北极上空为航空技术所征服时(看来是要被征服的),北美会发现自己在该大陆欧亚一边立即要接触的,不只是阿拉斯加几乎触及西伯利亚的那一块地方,而是由此向东,直达遥对北角的格陵兰东海岸;沿着一条几乎长达三千英里的空中边界线,美国、加拿大和丹麦所属的领土,都会和苏联的极北领土相接壤。在撰写本文时,因技术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在美国虽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但在1939年,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许都会把这些后果认作只是疯狂的德国理论家异想天开的梦想,没有严肃的事实依据,因而不予理睬。在此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就要做说服工作,劝导他的同胞接受自己和他的负责的

见《概览,1933年》,第139—152页;以及《概览,1938年》,第1卷,第2编(ii)。

埃德蒙·伯克:《论关于同美国的和解》,1775年(EdmundBurke:SpeechonConciliationWithAmerica,1775)。

海陆军顾问已经显然看到的严酷事实，并据此有所行动。

（五）美国的西半球防卫计划

罗斯福总统于 1939 年 1 月 4 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 1 月 12 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加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二十年之前退不相同了。

15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涣散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请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法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美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见《概览，1938 年》，i.649—651；较后一卷《概览，1939—1946 年》也将谈到这个问题。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 1938 年 4 月 18 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加拿大虽不是泛美组织 16 的成员，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而祝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承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 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 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日本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 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日本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 1946 年 7 月 4 日取得完全独立。美国于 1939 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前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日本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主要动机却 17 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 1939 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 1941—1945 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胜利地成功了。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

见《概览，1938 年》，i.634—635。

人数很少、政治上又十分无力的中国人血统和日本人血统的少数民族除外。

见《概览，1938 年》，i.624—625。

见下文，原著第 103 页。

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1939年，美国海军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为踏脚石的岛屿大事扩充其设施。海军在关岛除改善其海军设施外，还有巩固其防务的计划，因而同国会发生冲突。关岛属美国所有，四周环抱的岛屿从前都是德国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以来，这些岛屿都置于日本委任统治之下。众所周知，长期来日本一直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它既违反委任统治条款，又与1922年2月6日五国华盛顿条约第十九条相抵触。该条约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遂使美国从此得以放手对日本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美国人虽则厌恶日本人，憎恨他们侵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的唯利是图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喂饱日本战争机器的主要物资供应者），但这时对日本的一味忍让又再度表现出来，1937年12月“班乃”号事件的严峻考验对此提供了证明。就关岛而论，海军的防御工事不得不推迟执行，因为在有舆论支持的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凡是对日本挑衅并与美国为保卫孤立而重新武装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计划，国会显然都不愿予以考虑。

见《概览，1938年》，i.625—626。

见《概览，1920—1923年》，附录v（1—3）。

见《概览，1936年》，第110页。

华盛顿政府于1938年秘密地向制造商施加压力，从而制止了向日本供应飞机。这一步骤于1939年1月公开时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但其他主要物资如石油和废铁等的供应从未中断。

见《概览，1937年》，i.278，312—317。

见《概览，1938年》，i.626。

（六）美国对英法的态度

如果建议在一个属美国所有的太平洋岛上设防而会引起此种反对，那末，在一个较之关岛或菲律宾距离那个危险大陆更近的大西洋岛上美国应有的政策又将如何，这一问题将会引起大得多的风暴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美国在那儿没有承担法律或道义上的责任。

英国虽不能（也未曾）要求美国给它政治支持的权利，美国却有着一种普遍的固执的看法，认为美国如果敢于走出闭关自守的西半球，它就会有不知不觉被英国利用的危险，因为机敏的英国外交会使它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帮它去保存英帝国，或者为英国的利益效劳。在美国人的心理上，一想到要扮演这种角色，那是最厌恶的了。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就是利用这头怪物才驱使群众紧紧地跟着他们走。为英国利益服务既叫人恼火，置美国利益于不顾又未免冒险，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正尖锐地出现在德国和它的日、意伙伴的侵略取得可怕的进展的时候，而且又是在一个由于当代应用科学的发达而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里，这就不能不使美国对自身的安全严重关切，同时也使英国的地位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要是整个旧世界，连同其所有工业、海、陆、空资源统统落入极权主义国家的三角联盟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仍然可以作为一条足以护卫美国的宽大护城河吗？或者，除非把它的第一道防线设在英吉利海峡，或者甚至摆在马奇诺防线并确保英国和法国的独立和民主能存在下去为己任，美国就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抵挡住来自东方的进攻吗？

或者，只要这两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保卫它们自己和它们的爱好和平的欧洲邻邦，从而 19 附带地——不管愿意不愿意——给美国提供安全而根本无须美国自己采取任何行动吗？

“值得为英国而战吗？”在 1939 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使美国人心中恼火。孤立主义者历来不喜欢卷入欧洲纠纷，理想主义者则一向讨厌“英帝因主义”。此时，又正值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奉行取媚于侵略者而牺牲中国、埃塞俄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两班牙共和国的绥靖政策，他们的厌恶遂因不满和蔑视而更增强了。美国人对英法在慕尼黑搞外交投降的谴责确是出于真诚，尽管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那一份善意却是恶意。大多数美国人当时都没有想到，1920 年美国的不参加国联盟约，乃是英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重整旗鼓的德国而显得软弱无力的一个最大原因。他们没有认识到，由于美国对国联远而避之，它就在两个明显的方面削弱了西欧民主国家抵抗侵略的力量：一是美国不给予支持，这种支持本来会使力量对比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侵略者根本就不敢萌生侵略的思想；二是英法即使想到要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下奋起抵抗侵略者的任何打算，却由于捉摸不准中立的美国是否容许它们充分利用海上封锁——这是它们残缺不全的武器库中的最好武器——以对付共同敌人，因而感到左右为难。诚然，后来美国

这是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载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1939 年 2 月 15 日。可对照埃利奥特·詹韦：“美国人和新太平洋”，《亚洲》（Eliot Janeway）：

“The Americans and the New Pacific”，Asia），1939 年 2 月号。

见《概览，1938 年》，i.600—606。

通过禁止美国船只驶入作战区域的法案后，英法便摆脱了上述困境。但即使如此，国会为保卫美国中立而坚持的这一法案，正如罗斯福总统在上引的讲话中和其他场合所指出的，在运用时可能会有利于侵略者。如果在美国人看来，抵抗侵略应该是英法的压倒一切的责任，而不应该把一种想象中的由绥靖而来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上，那末，英国或法国的对美国批评的答辩者就会提出反问：抵抗侵略难道不同样是美国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同样是凌驾于美国自己所想象的由孤立而来的利益之上的责任吗？同一道德法则必然适用于两半球的同一人类；因此，如果因近邻才选拔英法作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而 20 应首先与德国交锋，那么根据同样选拔原则，就该首先派遣美国前去援华抗日了。英国人在 1939 年觉得不合情理的是，一个并不积极的美国的公民们，竟然批评英国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上对日本的容忍，而英国这时在欧洲却不得不认真考虑德国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前景。

再者，如果美国批评的矛头是针对英法统治阶级，指控那些寡头政治集团“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致危害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独立，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只是为了要把他们那已经摇摇欲坠的阶级财富、特权和享受再维持若干年或若干个月，那就不妨予以反驳：他们确实不顾一切所力图保存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美国和西欧推崇为民主政治、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这类事物，而在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却贬之谓财阀民主统治和资本主义等，它们对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的说法并无二致。美国的统治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它自己的情况也需要它牺牲享受，而这正是它谴责它的英法同类为了要赎买享受而不惜花费那么不光彩的代价，竟把一个弱小的民主国家付与虎狼。英国人一想到这些，就对美国的批评十分反感，因为这种批评丝毫也没有减轻业已深入美国人心中的对张伯伦政策的不信任感。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人如今正在犯着出卖集体安全事业的罪行，而这又正是英国指责美国人过去所犯的。再在考验来到时看一看英国的实际行动，过去它对美国孤立主义的责难现在就开始显得虚伪了。于是在某些美国人心中便产生了怀疑，认为英国过去真正感到痛惜的恐怕并不是美国拒绝支持国联——现在看来，英国人自己对国联也是漠不关心的——而是美国不肯把为英国利益效劳作为自己的任务罢了！

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误解与气恼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希特勒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是会估计到的。

这将在以后的《概览，1939 年—1946 年》一卷中论述。

见《概览，1936 年》序言的脚注。

第二节 英联邦

阿诺德·托因比

（一）英联邦的战略地位

英联邦有两处同西半球连结在一起，这就是隶属于联合王国的加拿大和加勒比海领地。它们都不包括在泛美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约之内，尽管它们位于美洲地理区域之内。这两条纽带都很重要，因为在 1939 年，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中的第二号强国，而加勒比海的英国领地则处于战略地位，扼制着从旧世界通达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口。象泛美组织国家一样，英联邦的成员国在面临德国进攻的危险程度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过这两个国家集团在地缘政治分布上的这种一般相似之处，却不象两个差别那样显著。这两个差别都对英联邦不利。首先，英联邦的梯形阵势要深得多，从德国火力圈外缘的美洲，一直延伸到处于德国进攻性武器近距离射程之内的前沿阵地，而那些进攻性武器目前又正在成倍地迅速增加。其次，在英联邦成员国中处于此种最危险地位的是联合王国——主要成员国，它的命运决定它的全体属地和伙伴的前途，而在西半球，美国较之巴西或加拿大距离德国的危险地点多少要远一些。事实上，西半球两个最缺少掩蔽的国家之一的加拿大，在英联邦中却是掩蔽得最好的国家，这是有鉴于联合王国位于它和德国之间，而强大无比的美国又与之并肩而立，不论是在太平洋之滨，或是在大西洋阵线。以上所述是英联邦与西半球之间在 1939 年的相对不安全程度上的对比，若把英联邦当前战略地位的屠弱与溯自近半个世纪来的强大实力作一更为鲜明的对比，则其间的悬殊就更加明显。自 1805 年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获胜以来的一百年中，英国占有断然无疑的海军力量的优势，足可压倒欧洲海上强国的任何可能联合起来 22 的力量：自 1814 年迄十九世纪末，英国从未设想其前景会是面对一个在唯一侵略同的军事霸权统一之下的大陆。由于除英国自己外，十九世纪大陆欧洲的四五个互相猜忌的大国便是那时世界上仅有的强国了，因此当时英国用以环绕欧洲及其中东属地的海军力量包围圈，从北海和北大西洋通过地中海而达印度洋，实质上不仅为英国本土提供了万无一失的安全，而且还保障了英帝国的世界各地。然而此种令人羡慕的事态只是一些幸运情况偶尔结合的成果，因而不能寄以持久的希望；所以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英帝国的一时安全就在几方面遭到严重的损害。

首先，现代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备上的应用已使两种新武器发挥作用，那就是潜艇和飞机。这在英国同一个大洲强国进行的任何实力较量中，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英国的岛国安全地位和海面舰只优势这两项长处。潜艇对英国的威胁已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会看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其次，为侵略目的而用暴力结合起来的大陆威胁——因拿破仑覆灭而一度匿迹的一场恶梦——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而复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实力，那时已需团结全世界其余国家的共同力量才能制止它征服世界的野心。到了 1939 年，德国处在一个同普鲁士传统相形之下几乎显得是人道的政权统治之下，却更象凶神恶煞似地决心要干一场新的侵略行径了。

第三，欧洲大陆——不论它是否仍然注定是群雄角逐的场地或是由一个具有超级力量的强国独放光芒的所在——已不再是世界上除英伦三岛外唯一存在着列强的地方了。当十九世纪尚未告终时，美国和日本都已各自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这部分要感谢英国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自动提供的保护。此种保

护作为保卫英国利益的副产品，囊括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反对除英帝国本身而外的一切潜在侵略者。那两个在环绕大陆欧洲的英国海军包围圈以外的新兴强国，却在后方挑起了英帝国十九世纪的防务。

英国政策对这一新挑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同这两个新兴海洋强国确保友好关系。1939年，这仍然是英国的对美政策。然而英联邦和日本之间任何真诚和持续的友好前景却被一笔勾销了。这首先是由于美国以及英联邦太平洋沿岸的自治领对日本日益感到恐惧和敌视，这一态度对1921—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的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由于日本在1931年发动的以中国为牺牲品的侵略行径到1939年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对这样公然破坏自己庄严保证的国联盟约的日本，英联邦的成员国是不能给予正式支持的——因为对所有英联邦成员国来说，国联盟约和凯洛格公约仍然是它们明文宣布的公开政策的基础，也是它们为数可观的公民团体的个人理想。

确实，当日本在1931年证实了所有对它的意图的最坏预感都没错之后，澳大利亚的舆论和政府政策几经摇摆，终于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几乎是好战的态度转变为颇有绥靖味的态度了。这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现象之所以产生，一种解释是由于当那只令人担心已久的日本虎向着与澳大利亚所处地区相反的方向猛扑过去的时候，澳大利亚——至少是在某些部分人中间——觉得如释重负。澳大利亚小心翼翼地惟恐日本在中国不能匿其所欲，此种转移日本向澳大利亚进攻的矛头的希望不但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短视的。因为当时日本主子所想的，一旦大陆冒险得手，则随时都会有继此而起的进一步冒险，如果不得手，则为掩盖其失败而会向其他方向进攻。众所周知，日本海军对陆军自1931年以来所享有的活动范围颇为妒忌，毫无疑问，它早在渴望着要有它自己去征服的天地了。

看来似乎是，此种来自日本新兴力量的危险，可以由反日秤盘上的新兴力量更强大的美国砝码去抵消而有余。然而那时美国政策完全是一个未确定因素，这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中不能不考虑到，所以就不免有些左右为难了。因为如前所述，美国人的感情被撕裂为两半，一方面憎恶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决心不卷入战争，不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即使这场火的纵火犯是日本人。

就1939年的情况而言，在环绕欧洲的英国海军力量24包围圈之外，还存在着属于大西洋沿岸六个大陆欧洲国家的海外帝国，这预示着十九世纪英帝国的安全将被打开第三个缺口。

在英国海上势力鼎盛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它努力约束自己别对夺回的利益再贪得无厌，以免自己的幸运地位招人嫉妒。它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那是在1778—1783年的调整力量对比中，所有其他国家都一致坚决地攻击它，因为二十年前的力量对比对它是大有利了。于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者和条件中，它把在战争中从法国本身，或从临时并入法帝国或从属于法帝国的国家手里夺得的殖民地都分别归还原主。此后，它也无意阻挠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同它自己一起瓜分非洲。处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

见《概览，1920—1923年》，第452—455页，第484—499页。

见《概览，1931年》，第430页，第438页。

见下文，原著第119—120页。

见上文，原著第17—19页。

大陆欧洲各国的这些海外领地对英国海上力量来说，确是抵押品而并不构成对英国安全的威胁。不过，如果拥有这些领地的大陆国家再度落入某一侵略性的大陆强国的影响、支配或统治之下，这些领地的重要性就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这些非英国的海外帝国如果全部归于怀有侵略意图的一国控制之下，那就会提供一个象英帝国自己那样实现统治世界的有希望的基础。

例如，荷属东印度和比属刚果作为主要产品的来源，其重要性一如英属马来亚。的确，1939年比属刚果在生产放射性原料方面已占据首位，在分裂原子的问题获得解决后，其重要性更增加了。加之，在当时世界上三个主要殖民地区——东南亚（包括岛屿和大陆）、赤道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陆欧洲殖民国家的领地和英帝国紧挨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些战略要地，并不亚于英国海上力量所控制的。直布罗陀如今面对的是比它还大的一片西属摩洛哥；马耳他面对的是地理地位比它更优越的意属班泰雷利亚岛和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的法国的非洲海军基地比塞大；英国的盟国埃及面对的是意大利在利比亚和东非的领地；亚了面对的是法属的港口吉布提；英属马来亚面对的是荷属苏门答腊和爪哇；一度主要是由英国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面对的是仍然由法国人治理的上海法租界；德班面对的是葡属港口洛伦索—马贵斯；弗里敦面对的是法国海空军基地达喀尔。西印度群 25 岛的岛屿有英属的，也有法属的和荷属的。在前往北美的东北通道上，丹麦联邦的海外领土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从侧翼包围了不列颠群岛，并给欧洲大陆和拉布拉多半岛之间提供了踏脚石。在前往苏联的西北通道上，有绕过挪威的芬马克郡并将摩尔曼斯克港同英帝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的常年不冻的航道，它的两边都是挪威的领土，那是因为 1920 年缔结了一项多边条约，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现在是在挪威的旗帜飘扬之下了。德国纳粹统治者在策划把西北两边的大陆邻国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下时，无疑是会考虑到此项条约的。

英联邦战略地位恶化之影响广泛，于此可见一斑。联合王国在十九世纪所处的情况，正好象一个牧羊姑娘，凭着自己的本领或幸运，居然能把从前侵扰她牧场的全部狼群驱进了只有一个入口的羊圈。只要她充分地武装自己，守卫在出口处——她的地理位置恰好处于这样一个有利地位——她就能单枪匹马地确保全体羊群的安全，不论她的羊群怎样扩大或繁殖，也不论她的羊群怎样漫山遍野地远走各处。在 1939 年，联合王国实际上仍然还是单枪匹马，因为那些依附于它而仍非自治的海外领土，都自然而然地继续仰仗它去保护它们；至于各个自治领，按宪法虽应由自己负起保卫各自领土安全的责任，

关于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见下文，原著第 88—94 页。

在 1935—1936 年的国联同意大利的实力较量中，英国海军曾要求使用法国在比塞大的海军设施，当时获允准（见《概览，1935 年》，ii.259—270）。

见《概览，1926 年》，第 362—372 页。

虽然英国最近新撰的“国家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这一名词没有正式用来称呼丹麦王国的自治领，但冰岛和丹麦当时在宪法上的关系同英联邦的海外自治领和联合王国在宪法上的关系并无多大不同。见下文，原着第 157 页，

见下文，原著第 158 页注（即本书第 255 页注——译者）。条约文本见英国外交部：《斯匹次卑尔根地位之调整及授挪威以主权的协议……1920 年 2 月 9 日于巴黎》（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Treaty regulating the Status of Spitsbergen and conferring the Sovereignty on Norway.. Paris, February 9, 1920），敕令第 2092 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4 年版）。

但它们都迄未开始摆脱一百年来的老习惯，也都仍然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地而且将来也还是，完全应由皇家海军保护。各自治领在 1939 年对其自身的防卫以及对整个英联邦的防卫所作的贡献，与它们当时的财富和人口的比重——就其同联合王国的资源相比而言——还是远远不相称的。然而，这时保卫英联邦的任务已经是需要动用英联邦大家所有的全部资源的任务。在大陆欧洲的狼圈内部，被圈禁的狼群中那头最大最凶的狼又一次显示出要主宰其同伙的迹象了。它一心想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冲 26 向出口处。那头德国狼正用利爪在挖羊圈的向着东南和南方的墙脚。在狼圈外面的大地上，这时牧羊姑娘心神不安地侧首望去，可以看到两头庞然大物的身影隐隐呈现在海面上的地平线上——其中一头扑倒了一只失去牧人的迷途羔羊，已经可以看出那是一头狼；另外一头虽然显得和善一些，但体积非常巨大，行动又非常古怪。此外，日本的掠夺成性，中国的命运以及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又都是联合王国的重重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英联邦这个几乎仍然是单枪匹马的西欧看守人，除非依旧能在三个相隔很远的据点同时施展其力量，就再也不能指望它在必要时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了。联合王国又应该集中其力量保卫哪一个场所呢？

为了防备德国可能横渡多佛海峡向它进攻，就象在拿破仑时代那样，凭武力或欺骗统一整个大陆，并在一个黠武者统率下再一次发动一场潜在的战争，那么它是否应在国内养精蓄锐呢？联合王国本身既然是一个尚未减轻负担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保卫者，它就难以不忽视自己的国内防务而又不损害全世界它的依附者与伙伴。但是它能忽视中东的防务吗？诚然，从德国去中东，陆路确是只能取道苏联，此外别无他途，但把“亚洲”和“非洲”同“欧洲”分隔开来的两处水域，却是可以跳越的。两处狭道之一便是比多佛海峡窄得多的黑海海峡，还不曾听说有什么侵略者被这两处海道堵塞过甚或阻拦过。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屏障，并不比纽约哈得孙河宽阔。许多“第二罗马”的居民每天晚上在“亚洲”过夜而白天在“欧洲”工作，正象他们同时代的美国人经常来往于泽西区和曼哈顿之间而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另一个狭窄的地点是位于西西里岛和非洲之间的地中海腰部；此处海面在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相形之下，虽然要比英吉利海峡显得宽一些，并且比多佛海峡则要宽得多，即使在最狭窄处也是如此，但在当时的政治和战略条件下，德国部队要跨过这一处海面是比较容易的——紧接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距离西西里最近的非洲土地突尼斯，虽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而不是在意大利人之手，然而班泰雷利亚岛的主人翁却是意大利，该岛全部位于航道上，比马耳他更具有海上控制的战略地位。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在非洲大陆拥有利比亚这个宽广的浮 27 码头，西西里就是通往那里的踏脚石，从那里出击，一支由德意轴心的德国伙伴武装和率领的远征军便可进攻法属北非和埃及。如果德军——不论是绕道黑海海峡抄近路，或是较远地横渡中部地中海而长驱直入——一旦到达尼罗河流域、苏伊士运河或波斯南部油田，他们不仅就会夺去英国海军燃料的主要来源，使它无法动弹，而且还会把英帝国的尾部同它的身躯和头部分割开来。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教授们过分乐观的心目中，这头英国狮子在 1939 年仿佛已退化成了一只吐火兽了。狮子的

见下文，原著第 128—129 页。

吐火兽为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的怪兽。——译者

头虽然还是涨得满脸通红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怒视着大陆——又一次在第三帝国霸权统治下进行政治统一的大陆——而狮子的巨大身躯难道不是已经可悲地变成了一只瘦骨嶙峋的马耳他山羊了吗？它的钢鞭似的大尾巴，难道不是已变成一条拖在中国龙后面的长尾巴，绕着犬牙交错的亚洲南海岸，有气无力地从苏伊士一直拖到香港吗？这头老态龙钟的吐火兽（正如德国人可能会认为的一种杂种）马上就要成为德国利剑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了，特别是德国若用甜言蜜语成功地诱使它的日本小伙计来个得心应手的外科手术，割断这头老朽的巨兽已经无法保卫的尾巴，这不是确实无疑的吗？德国关于一帆风顺地进攻英帝国的乐观看法，部分地也许可以同联合王国政府专业顾问们对防务前景的某种自满情绪相匹敌。这些专业顾问虽然承认在日本进攻时可能要暂时放弃香港，但他们制订了坚守新加坡的计划。他们显然没有预见到日本一旦开始进攻，日本海军就会乘势到达安达曼群岛，日本陆军则进入曼尼普尔。也许在1939年，他们更远远没有想到会在海峡群岛见到德国驻军。但英国专业人员的预测比德国人的估计还是稍稍准确一些。因为，甚至在法国陷落与日本参战以后，英国一时损失的领土也还是少得出乎意外。德国从西班牙28领土对准直布罗陀的攻城炮从未发射过；马耳他既未挨过轰炸，更未因粮断而投降；没有德国兵或意大利兵看到尼罗河，也没有日本兵来到过布拉马普特拉河，除非是战俘；一支意大利部队侵扰过英属索马里兰，但英国很快进行了报复，占领了意大利的全部北非属地。不列颠群岛、英属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英属西非、南非联邦和加拿大自治领都未遭到入侵。

此种侥幸看起来简直近乎奇迹。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给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总教训却是非常严肃的一课。战争进程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二十世纪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英联邦单靠自己的努力而无外援。那就很可能保卫整个联邦，更不必说单靠联合王国的努力了。1939—1945年虽然和1914—1918年一样，各自治领让德国的指望落了空，因为它们全都斗志昂扬地团结起来支持联合王国——这次只有爱尔兰例外，南非却又一次并非例外——然而要不是美国给养终于开始源源不断供应的话，那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受到侵略军围攻而被恣意蹂躏的大约会更接近于六分之五而不是六分之一个英帝国。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尽管有着那支“被遗忘的”英国陆军在热带丛林战几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奋勇卓绝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作者于1947年写这一节初稿时的猜测是，在希特勒及其同谋者秘密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地缘政治的估计曾使德国侵略心理乐不可支。后为里宾特洛甫于1938年1月12日发表的备忘录所证实，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年，辑自德国外交部档案》（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fromthe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联合出版〔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年版，D辑，i.163—164（以下简称《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

见《概览，1938年》，i.355—356。

早在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同他的军事指挥官开会时，至少他已看出了英国的这一弱点。见会议记录（霍斯巴赫备忘录），1937年11月10日，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07—408（386—PS）；英文文见《德国外交文件》，D辑，i.33；《国际事务文件，1939—1946年》（DocumentsonInternationalAffairs1939—46），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年版（以下简称《文件》），i.19—20；参阅《阴谋与侵略》，iii.299—300。

但这头狮子为赢得太平洋战争而承担的那一份责任，如果不是由美国的阔肩膀挑起的话，那便不能成功地守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缅甸、马来亚以及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的所属岛屿也就收复不了。当时甚至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帝国不得不与之作战的侵略国集团，恰使英帝国处于最易受攻击的地位而别无其他选择，此种体会的教训便是：除非把自己处于一种联合的或集体安全的结构中，以便将来设若发生战争时不仅足以有效地克敌制胜，而且连最强大的潜在侵略者也不敢对之挑战，否则帝国没有幸存的希望。我们最 29 多只能说，英联邦成员国在这方面发现自己同世界其他国家是坐在一条船上，也许苏联和美国不在内。还可以说，联合王国的实力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削弱了，这一影响同时却增加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力。这两个国家在此以前主要是农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大大地推动了它们的工业化进程。

在撰写本文时，英帝国最后的靠山是在美国庇护下的西方国家自卫联盟，这一联盟是临时凑合的，以代替联合国组织旨在提供的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

（二）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态度和政策

十九世纪的局势发生了这些不利变化，不仅给整个英联邦带来了问题，而且给它的每一个自治的成员带来了问题。已经完全自治的成员在 1939 年有六个：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引证的成员系按由小到大的不安全程度为序）。另有两个东方国家——印度和缅甸——业已获准最后可得自治领地位，所以它们虽然尚未取得这一地位，但均已朝此目标迈进。在上述八国的每一个国家中，当地在惊人的国际事件压力下展开的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态度和政策，将成为构成国际历史的要素。

根据一种并非没有争议的宪法理论，英联邦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因为凡英联邦臣民都得效忠于一个共同的国王。根据这一观点，凡与英王交战的国家——不论是因该国政府向英王宣战，或是因英王执行任何一个完全自治的自治领的大臣们依宪法提出的建议而由他本人向之宣战，英联邦全体成员国电部与该国处于交战状态。但实际上，只有联合王国由于其在联邦中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它在世界上所处的易受攻击的地位，才可能将它的伙伴们引进交战状态，因而实际问题是，如果再度出现 1914 年出现过的那种局面，各个伙伴国将采取怎样的方针。它们可能会超越于宪法规定的义务之上，根据王权不可分的论点，义不容辞地投身于联合王国一边而积极参战；或者把自己局限在“消极参战”的范围内；或者，它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即便是消极参战也要承担的义务（例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扣留敌侨、没收敌船及其他财产），害怕因之而冒敌方报复的风险，它们就可能提出一种王权可分的理论，坚持说任何行动不是它们干的，也不是针对它们的，所以不能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宣布保持中立，而其代价则是遭受另一种危险，即如果它们的伙伴成员国认为这种行为等于公然否认盟约义务——不论这种义务可能被认为是什，总之是联邦各成员国赖以彼此联系在一起纽带——那末它们同联邦伙伴成员国存在的联系就会中断。

联邦成员国共同承担的法律义务因而是有争议的，其可能的结果也不清楚，而且每一个完全自治的成员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要全力去应付。各国的情况都非常独特。因为，这八个国家虽然基于共同的政治忠诚联系在一起，但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都完全不同。联合王国和爱尔兰是古老的欧洲社会，印度和缅甸是更加古老的亚洲社会，其他四个则是晚近欧洲人移居海外的产物。联合王国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爱尔兰则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加拿大有半数信天主教，澳大利亚有四分之一信天主教，而印度和缅甸是非基督教占压倒优势。缅甸以小乘佛教徒占优势，而英属印度几乎包括了世界上为数极多的印度教徒的全部（除荷属印度的巴厘人外），但它又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致使英属印度在人数上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印度教国家，又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在南非联邦，赤道非洲血统的黑种移民在人数上约以五比二的比例超过了欧洲血统的白种移民，而黑非洲的其余部分则全都挤在它的北部边界，并为南非联邦繁

见下文，原著第 65 页以下和第 72—76 页。

根据 1936 年人口普查，南非白人总数为二百万零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班图人为六百五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九人，其他人种（未具体划分）为九十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二人。班图人比条顿人到达更晚一些。原先的居民——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既非黑种人，亦非白种人，而是黄种人。

荣富裕所倚靠的矿山提供了劳动力，因而它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相形之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只好算儿戏。

联邦中的不同民族当初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历史情况极不相同——这同 1939 年的政治局势很有关系——所以它们目前对待这些既成事实的态度也很不一致。苏格兰是出于自愿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英王国³¹结成政治联盟的。此种关系又终于扩大到一度是犷悍的操盖尔语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温文庄重的讲英语的苏格兰低地人。几个幸存的由印度人自理的印度邦，在同印度的英政府谈判结成的保护关系条约中，也同样有某些自由，只是实际上不很平等。英国入侵者征服新西兰的毛利人，倒没有留下不幸的后遗症，政治上的宿怨或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都没有，不过英国和毛利人的几场恶战距离 1939 年还不到一百年。与此同时的但打得更凶的英国—锡克战争，结局也几乎是同样圆满的。另一方面，英国进行的其他征服——不论是近代或古代——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直到 1939 年还在积极起作用。1902 年征服两个南非荷兰人共和国、1885 年征服上缅甸王国、在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征服当时还是野蛮部落的爱尔兰，这些，既没有为英国侵略行为受害者的后裔所忘怀，也没有为他们所宽恕。在孟加拉以及在后来取得的、成为英国治理下的印度的那些邦，随着一代新人的成长，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也开始表现了类似的情绪，不过稍迟而已。这一代人，对于自奥朗则布皇帝去世直到英国统治全面确立期间折磨着印度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有任何感性知识，甚至也没有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说过。印度穆斯林教徒的祖先曾经对英国人感恩戴德，因为是英国入主印度才使他们免遭印度教徒的复仇之祸，但在 1939 年，他们却更感到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是由穆斯林统治的。而印度教徒的祖先也同样是由于英国入主印度才免遭马拉塔教友把他们从穆斯林统治下接过去的厄运。但到了 1939 年，印度教徒却只知道要不是当时英国不合时宜地插手干涉，那个摇摇欲坠的穆斯林统治很可能便是由一个印度教徒的统治来继承。至于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倒不象荷裔南非人那样对他们的英国征服者怀恨在心。他们承认并感到联合王国政府在征服结束伊始便表现的宽大。联合王国政府当时保证他们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并实施法国法律。可是，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同他们操英语的同胞享有完全平等的自治权，但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这两部分加拿大人之间一直存在³²着隔阂。在 1939 年，法裔加拿大人象荷裔南非人、南爱尔兰人、缅甸人和印度人一样，仍然流露出一种被征服者的后裔的情绪，抱着典型的病态心理，一心只贯注于他们自己教区里的政治，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已使他们那点小天地里的家业濒于危险。

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于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国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为过去被武力强迫才加入英联邦的历史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后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欧洲移民成立的成员国中，则也产生了迷恋过去的感情——这在美国和温

莫卧儿帝国末期统治者（1658—1707 年）。——译者

英国议会于 1774 年通过的魁北克法令，规定使用法国民法，并保证罗马天主教会信仰自由。这种信仰自由原已在 1763 年 2 月 10 日的巴黎条约获得允许。

责任自治政府制是 1838 年草拟的德拉姆报告（Durham Report）中建议的，并在埃尔金勋爵任总督期间（1847—1854 年）实施。

的南美“ABC”共和国也同样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国家里对创业的先驱者往往会产生此种感情。操英语的和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是这样，操英语的和操荷兰语的南非人也是这样，都强烈地希望由他们自己去培育他们的那些嫩芽初绽的花园。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更为强烈，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更大程度上暴露于日本旭日的骄阳照射之下。新西兰的处境尽管同样不安，它却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并主张通过国联这个机构有效地贯彻集体安全原则。至于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尽管他们以自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豪，并因此而在西半球占有特殊地位，但他们却和他们在美国的北美洲邻人们一样，倾向于认为自己当然有权利保持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巨大自由权。至于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如要取得与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无需害怕来自亚洲的侵略威胁，那就谈不上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只能说是遥远的愿望，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劳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会适可而止，不至于欲壑难填。在此同时，某些印度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所抱的希望则与此相反。他们惶惶然既同情于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同人，也赞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亚洲同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证明为它向统治亚洲各族人民的欧洲主人进攻的前奏，那末这次侵略是可以宽恕的。这些头脑发热而又目光短浅的印度和缅甸爱国者看不清日本给予的“解放”到头来很可能竟是亡国的同义语，而对中国作为惩处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为奖赏而施之于他们。

当然还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说服力的同样考虑也在发生作用。特别是在爱尔兰和南非，有一股强大的思潮（也影响着联合王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不公正地强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强制命令”）于战败国的，因此，前战败国为解脱此种束缚而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非，此种思潮使他们认为，如果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那就有必要把它说成是不容争辩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国家。1936年3月，当德国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时，如果联合王国愿意的话，它本有可能在没有各自自治领合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是，一旦德国全力重整军备——特别是英国最易遭受袭击的空军装备——联合王国如无各自自治领的支持，就难以向德国挑战了；这便促使联合王国在制订政策方面，要认真考虑各自自治领对纳粹撕毁1919—1920年条约的态度。众所周知，各自自治领的态度在1937年英帝国会议的讨论中已都明白表现。联合王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加拿大所坚持的态度，它认为英联邦不该再次参加战争，除非是为了更甚于英联邦利益的事业（“利益”二字是传统的狭义用法）。1937年1月25日，麦肯齐·金在渥太华下院声明说，加拿大“不一定仅仅因为我们是英帝国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卷入英帝国其他部分可能参加的任何战争”；这一声明主要说明加拿大舆论对此是满意的，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因为用麦肯齐·金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为“反对恶势力”而战的任何战争，加拿大人才参加。

指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译者

见上文，原著第1—7页，第18—20页。

见下文，原著第119—123页。

关于潘迪特·尼赫鲁的观点，见下文，原著第69—70页。

见《概览，1936年》，第4编(i)。

《泰晤士报》，1937年1月27日。

（三）联合王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1939年普遍存在于海外自治领、印度和缅甸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态度和政策具有一种共同的作用，即对联合王国为集体安全事业而坚决反对侵略并甘冒战争风险的一切打算起了抑制作用。联合王国内部有一些为自己打算的政治集团，它们总是倾向于绥靖而不想反对侵略者。它们在自治领的类似思潮中正好找到了一种可喜的理³⁴由，用罗斯福总统的善于表达的话来说，便是“义不容辞”地把迫切而棘手的外交政策问题交给合伙人约金斯，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则是为了要保持英联邦团结一致。

也许在有一点上——而且是主要的一点——1939年联合王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是非常真心诚意地团结一致的，不但联合王国的人民彼此之间是这样，而且各个自治领、美国以及从法国、瑞士、低地国家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的西北欧大陆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也都是这样。此时各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社会上业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事，而被看作是与文明生活不相容的野蛮行为。在一个依然为战神恶梦所侵扰的时代，西欧人民同具有六千年之久的军国主义传统断绝，这正是自俾斯麦一代人以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制造者所估计到的情形。如果他们自己能在这一关键性的转变时刻，成功地保持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人军国主义化，并使其余的德国人照他们的模式军国主义化，那么德国西方诸邻国的过早的博爱化还能不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德国掌握吗？

西欧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样，面对的是德国人的此种估计，还有折磨人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限度问题。假定——一个未经证实的假定——和平总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代价购得的话，为了保持和平，所应准备付出的代价的限度（如果还有限度的话）又应如何规定？为了避免战争的野蛮罪恶，他们是否应该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领土，而只有到了要将邻居送入狼口之际，才加以限制呢？此种行为的准则固然有着威尔逊式的高风，但也是空前的堂吉诃德式的。或者，他们——即使是其中签署和批准国联盟约的那些人——是否应该遵守众所公认的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的马基雅弗里箴言：不论约束个人的道德法规是什么，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总不是它的兄弟国家的守护人？

象坎宁那样，恢复“各国自顾自而让上帝照顾我们大家”那种良好的老规矩岂不惬意。然而这句好听话不也正是“魔鬼抓最后落伍者”的国会辞令么？而且，如果这个魔鬼被这样玩世不恭地请来，发现了那最后一名孤立无援的落伍者可以作为他的捕食物，难道他就不会恶作剧地照样再抓那个倒数第二名吗？用具体的现代语来说，设若联合王国乖乖地靠边站，看着它的大陆欧洲邻³⁵邦——以及它们的海外领地和附属国——走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道路，这时它才发现，那些侵略国家已经有了新的优越的战略地位，因而已经有了扼杀英联邦本土的手段，那时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当一个人决定牺牲自己的重大利益，而不愿为了保卫这些利益而放弃那种不是他所习惯的利他主义时，现实主义依然是现实主义呢，还是现实主义已经躲躲闪闪地变成了迂腐的自杀方式？佛罗伦萨的大师会对这个心理学和伦理学上的非常微妙的道理作出什么样的裁定呢？

1939年3月15日前夕，联合王国的人民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陷入了又深

又严重的分裂。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打进了第一个楔子以来，此种全国性的分裂一直在逐步扩大。争吵并不限于政治，还涉及到道德观。自 1898—1902 年南非战争时发生了“亲布尔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吵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国内生活中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与这一次的争吵相比拟。在南非战争时的争吵中，也和这次一样，一派自以为是地指责对方在政治上是愚蠢，在道德上也是卑鄙，而蒙受此种刻毒诽谤的另一方，愤怨之余，在自己内心里却未能十分了然地感觉到这种丑恶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然而，1939 年和 1899 年相比，在指控的内容上却有一个令人感到辛辣的不同之处，这使人对世事可以看得更明白。1899 年的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理由是非正义的，因而蒙受耻辱，腥他们却反唇相讥，嘲笑亲布尔人的非难者是不爱国的和平主义者，而 1939 年的绥靖者正是那些帝国主义者的不折不扣的后嗣，却为着不愿兴正义之师而蒙受耻辱。他们也同样反唇相讥，骂鼓吹集体安全者为好斗的战争贩子。

在 1939 年的这次分裂中，双方都有着未解决的矛盾和同床异梦者。在原来是威尔逊阵营的一方，仍然有不少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思想也还弄不大清楚，虽然自 1931 年以来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讲不出，他们究竟首先是国联的拥护者呢，或首先还是和平主义者。在这方面，只有一小部分人迄今才表现了清醒有力的头脑，他们或者为推行集体安全运动而把他们的和平主义连根拔出并予以屏弃，或则为保全他们的和平主义不受侵犯而不再效忠于集体安全。相反地，在原来是保守阵营的一方，也相应涌现出了一批意志 36 坚强、目光锐利的少数派，他们下决心脱离头脑糊涂的多数人，或为爱国主义而牺牲绥靖，或为绥靖而牺牲爱国主义。那批头脑糊涂的多数人却还是拒不相信“爱国”和“绥靖”这两匹好马再也不能象样地搭配在一辆车上驱使了。威尔逊阵营中坚决选择集体安全的人和保守阵营里坚决选择绥靖的人所显示的也许是最清醒的远见，但勇于表现道义的奖牌还应归于象安东尼·艾登那样一位保守党人，因为他辞去了外交大臣一职，冒着个人和党的关系破裂的风险，一心一意献身于集体安全事业。光荣也应归于一位酷似威尔逊的赫特伍德·艾伦勋爵，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张伯伦，同样一心一意地献身于和平主义。至于两个阵营中的那些迷迷糊糊和摇来摆去的大多数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的简短的断语是：“但你……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³⁶这一章如不分别谈一谈保守阵营主张绥靖的核心人物的观点和威尔逊阵营拥护集体安全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那还不能说完整的篇章。这两项任务对本文作者来说，后者还容易谈，因为只须说出自己的观点就行了，但是前者却比较难了，尤其是因为保守的绥靖者同他们的主张和平主义的同盟者和他们的主张干涉的反对者都有所不同，他们拘谨地不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因此，本文作者深恐在论述张伯伦及其同事方面，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或出于可能的偏颇，无意间遂难免有不够公允之处。

促使约翰牛一时转而信奉绥靖的经历、感情和动机无疑是复杂的。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是联合王国的前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发生了变化。从修道院解体的时代到 1914 年战争爆发，这个阶级一

关于促使英国政策改变的 3 月 15 日事件的说明，以及对当时英国舆论的分析，均见下面一卷《概览，1939—1946 年》。

见《概览，1938 年》，i.129—137。

直绵延不断地享有不断增加的财富和权力；它一向以热心公益的精神而自豪，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超乎寻常地洒热血、出钱财，高标准地效忠于公职，而它得到的报酬却是被署为“资本家”、“军国主义者”这一类不光彩的名称，还被刻成“毕林普上校”这样的漫画式人物而被嘲笑（这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以致它的威信扫地，由工党阵营新崛起的政治反对派又幸灾乐祸地向它发出事前警告，说要通过选举把它撵下台去，然后通过征税使它难以生存。这个前统治阶级象其他英国人民一样，³⁷急于要竭尽全力去避免又一次大战，因为这次大战会和上次一样，不仅对联合王国的统治阶级将是一场大灾难，对整个英国和全世界也都是这样。但是，这个阶级在它的光荣史册上又写下了最美好的一个篇章。这便是它在两次大战之间为恢复 1914 年以前的生活方式而进行顽强斗争之后，当它终于确信绥靖与热心公益再也不能并行不悖的时候，它就听凭自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

如果由我保存的本能是指导一切的本能，那末，只要希特勒肯让英国无产阶级保持他们自己的收入和特权，英国无产阶级就会让希特勒去占有整个世界了。可是，英国无产阶级明知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却还是准备牺牲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不容许那个恶魔得逞。这能说是自私吗？还没有见过整个阶级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而自杀哩。——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加上首相的内阁同僚以及议会和选民中拥护他的人给予这一政策的支持——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它是一种人所共有并值得称道的道义上的判断同一种对严重事态估计错误的结合。张伯伦明显地——而且显然是真诚地——害怕战争，认为战争本身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在这一点上，他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不但代表着联合王国和英联邦的各海外自治领的绝大多数人民，而且也代表着德、意、日疆界以外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甚至代表着三大侵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可以设想，如果举行一次自由投票，不是问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问投票者是要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投入战争呢，抑或是让他们避免这场苦难，那末，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投票赞成维持和平的。但张伯伦对希特勒政策作出估计的依据就大可商榷了。他不愿相信离英国诸岛只有几小时飞行距离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竟然会有这么一种和他张伯伦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以致决定要为战争而发动一场战争。加之，他从表面价值上去看待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虚伪声明，说什么他的领土要求仅限于确保在对德国有利的地方实施民族自决原则，这个民族自决原则在 1919—1920 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的实施只有利于战胜国，而没有公正地同样实施于会有利于战败国的地方。即便假定——张伯伦就是这样假定的——希特勒的野心仅限于为德国取得某些至少在德国人看来也许是早该实行³⁸的公正措施，张伯伦也还是不愿意相信在这有限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是不能按常识以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的。伯明翰的两个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消除障碍而作成他们两家商号之间的买卖，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白厅的劳工部里对私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某项争端进行排解，但是这种方式不能用之于希特勒。

诚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态度和意图所抱的这种见解，是关系到他的政

³⁷“毕林普上校”是漫画中人物，意为反动家伙、老顽固。——译者

³⁸《概览，1938 年》第 2 卷导言（第 3—9 页）对这一点作了更充分的讨论。

府和他的国家的存亡，乃至世界的命运的，但他之受到责难并不是因为在判断上犯了错误，尽管十二年之后，在作者撰写本章的时候，缴获的德国官方文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个判断错误确实是异乎寻常的。但是直到 1939 年 3 月 14—15 日的夜间，关于希特勒政策的底细，还是谁也没有摸透。张伯伦在这一点上的过错（而且肯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是，在象这样一个公开的问题上，尽管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其中包括那个后来被证明是真理的不祥的答案——在战前的那些危急的年代里已在举国上下积极展开讨论，他却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合口味的悲观见解故意视而不见，尽管坚持并且颇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见解的人是在外交事务上的阅历与见识都远过于首相本人的那些英国政治家，以及在宪法上有优先权提请首相注意对外政策问题的官方顾问们。

张伯伦不仅无视和否决了这样有份量的不同意见，而且还凭着自认为是超级决断的个人信念去冒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风险。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中还牵涉有两位主要当事人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斯福和艾登。1939 年 2 月 21 日，艾登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提到他同张伯伦在一个与意大利无关的“极端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决定”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这个决定属于什么性质并没有透露；但是到了这一年的 5 月，一家纽约报纸刊载了美国驻伦敦记者约瑟夫·德里斯科尔的一篇文章，说张伯伦和艾登曾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致。6 月 20 日，张伯伦在议会里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和艾登发生争执的消息，只是过了很久以后，事实真相才为大众所知晓。其事如下：

1938 年 1 月 12 日，艾登正在法国，伦敦收到了罗斯福的一份电报。罗斯福就邀请某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共同探讨国际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的一项建议，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罗斯福暗示，如果，但只有如果该建 39 议得到英国政府“热诚赞同和全力支持”，他才会接着采取他设想中的下一个步骤，那就是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艾登还没有回到伦敦，张伯伦就发了一封回电给罗斯福，建议推迟所提出的行动，因为它可能影响英国政府正在为同德、意达成一项协议所作的努力。张伯伦特别提到，他准备对意大利的占领埃塞俄比亚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作为一项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罗斯福鉴于英国政府有举行直接谈判的打算，于是在 1 月 17 日的一封信中同意推迟行动，但借此对所说承认征服埃塞俄比亚一节表示严重关切。

此时，艾登已于 1 月 15 日回到伦敦，听到了张伯伦照会的措词，感到非常不安。他运用他的影响在内阁会议上促成向华盛顿再度发电。在 1 月 21 日的电报中，对罗斯福总统的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尽管对建议的步骤有所怀疑），并比较详细地阐明英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态度。然而，这些电报中比较热诚的调子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罗斯福所要求的“全力支持”显然不能指望从英国政府得到了。

这一事件 没有（在那个时候也显然不能）作为艾登提出辞职的原因来公

关于这篇文章所披露的有关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以及关于下院会议记录，从而引出德里斯科尔根据同张伯伦的谈话而写出这篇文章的事实，见《概览，1938 年》，ii.113—114。

这里所作的叙述系根据萨姆纳·韦尔斯：《决定的时刻》（SnmnerWelles：TheTimeforDecision），纽约，哈珀公司，1944 年版，第 66—69 页，以及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winstonS·Chnrchill:TheSecondWorldWar），第 1 卷，伦敦，卡斯尔，1948 年版，第 196—199 页；波士顿，

诸于众。但这一事件使艾登深信他和张伯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已无法继续留在张伯伦政府里了。当时的英国首相事先同自己的外交大臣磋商，便断然拒绝美国总统的一项重大提议，这实际上是将他对其利益负有最高责任的这个国家的命运——40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及其余人类的命运——押在他个人自以为是地作出的对希特勒的真正品格和意图的胡乱猜测上。除非能够绝对肯定希特勒是一个真正善良而信实可靠的人，才能证明当时处于张伯伦地位的那位英国政治家对美国总统的这一“重大步骤”泼上“一盆冷水”是有理由的，这盆“冷水”有效地使罗斯福引导全体美国人民追随他的行动陷于停顿，因为他们对当时国际现实如同张伯伦本人一样茫无所知，而追随罗斯福奉行的政策便会在国际天平上把具有美国巨大潜力的决定性砝码投入和平的一边。张伯伦方面要是作出赞同的答复，就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卷入欧洲事务，不论是多么尝试性的”。后来公布的德国会议详细记录表明，希特勒早在 193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前夕已经作出了决定，也就是罗斯福的建议送达张伯伦之手的两个月之前，这证明了丘吉尔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必须把这一回拒绝——因为它确是拒绝——认作是丧失除战争外拯救世界免于暴政统治的最后一线希望。”

如果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目的的理解是无可辩驳地正确的话——而不是象一向所遭到的猛烈抨击并终于彼揭露出来的事实真相驳斥得体无完肤那样——那末，在这一前提下，他为自己的政策作有力的辩护无疑是可以提供考虑的。首先，希特勒所说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境外毗连地区操德语并具有德意志感情的人民在政治上并入第三帝国，如果始终设想希特勒的目的确在于此，而且仅止于此，只是为了这一目的的缘故，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进一步的无耻目的的踏脚石，那末，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看来，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而且，希特勒接着采取的步骤是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这虽然已经明显违犯了各项条约义务，并已（即使根据最宽容的判断）构成破坏世界和平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但也还有情有可原之处，其理由是：德国由于长期和痛苦的经验，发现自己无法通过任何守法的、安全的或文明的常规取得在它看来明明是公平的待遇。同样地，在世界裁军会议注定要失败这一点已经明确以后，还要坚持德国应继续处于解除武装状态，这似乎也是不合理的。而且，还有在这些事件上的强烈论争，即反对为维护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而执行国联盟约所施加的制裁。在英 41 联邦本身就有以史未资将军和洛西恩勋爵这样的著名人物为代表的思想派别，他们在这个有争议的问

霍顿·米夫林。韦尔斯谈到，罗斯福原来考虑在 193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信件，提出拟由美国邀请某些国家政府为达成一项世界性协议而共同起草若干尝试性建议，建议拟规定指导国际活动的基本原则，并提出限制和裁减军备、促进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以及人道主义的战争等方法，韦尔斯还说，总统的此项计划遭到他的某些最亲密的顾问的激烈反对。他们劝告总统首先要获得这样的保证，即英国政府或法国政府不认为此项建议“同它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或业已确定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罗斯福于 1938 年 1 月向英国政府试探他的计划时便是按这一劝告行事的。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6。

韦尔斯：《决定的时刻》，第 66 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98。

见《概览，1938 年》，ii.5。

见“英帝国与世界和平”，1930 年 1 月 28 日史未资将至在查塔姆大厦的讲话，《国际事务》

题上认为集体安全结构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例如，已很清楚，现代战争的影响趋向于不可估量地扩大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悬殊，不管小国加在一起数量上多得怎样可怕，而集体安全这一结构单靠它们还是难以运转的，而且这些小国必然胆小怕事，不敢采取主动去反对强大的侵略者，因此事实上制止侵略战争的担子实质上必然要落到日益减少的几个大国身上。而在世界诸大国中，德、意、日和美国已无庸考虑，而苏联又是联合王国中持保守意见的人所怀疑的一个未知数。因此，在英国保守党人看来，什么都得靠英法两国，这就是说，两国必须步调一致，或者说，如果其中一国退缩不前，另一国务必跟着照办，因为它们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力承担一项在当时的国际力量集结的形势下即便是两国共同努力也可能是难以胜任的任务。即便是一位热情而忠诚地支持国联的人，他也可能感到，由于其成员国在 1935—1936 年未能将维护国联盟约以反对意大利的努力坚持到胜利，国联已被扼死了，而张伯伦本人是曾经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块试金石的，这从他本人在 1935 年 12 月 9 日和 1936 年 6 月 10 日之间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中可以看出，12 月 9 日，他和保守党内阁里的同僚一起劝说塞繆尔·霍尔爵士辞职，而在 6 月 10 日，他却嘲笑主张继续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意见是“极度的疯狂”。

人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埃塞俄比亚事件的考验证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管理国际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体制这时已经不能正常行使了。这时存在着真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张伯伦奉行的政策也自有其坚定的立场，即在那三个侵略国如今都已与国联断绝关系之时，他决定不再迂腐地拘泥于凡事必经国联的做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劝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坐到谈判桌上来，向他们说清楚，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会谈方式达成一项和平交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诚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欧国家之间在国联范围之外举行圆桌谈判、就事论事，虽则显然有其价值，但这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不能通过给欧洲政治家们的一次会议贴上个非日内瓦的标签，便能烟消云散的。英法在会议桌上将与之对抗的仍然是同一帮咄咄逼人的敌手，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打不出几张硬牌的。

国联已告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作为实施盟约的后盾，即或有之，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使用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用经营银行业的原则来实施集体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银行业务中，负债超过资产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差额，那是正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预计债权人不会都在同时提出偿付要求。国联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没有人把它的义务全部承担起来；如果说，由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才看出了国联存在这个弱点，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闭眼不看同样的原则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场没有掩饰的实力政治游戏这一事实。前日内瓦时代耍旧外交的人从不允许他们自己——或彼此——忘记（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倒过来说）“外交”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行为”，他们进行会谈时心中总是明白，作为最后一着，决定的因素不是公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从业人员要做成一笔交易的共同愿望，而是军备——其中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发明原子弹以前）是强国枪炮的结盟。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0 年 3 月, ix, 141—153。

关于纳粹认为张伯伦方面没有维持实力均势的意向，见《概览，1938 年》，ii.13—14, 21。

对张伯伦政策的中肯的批评不是他为现实政治而牺牲了他人的理想，而是他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实政治。尽管到 1939 年 3 月 15 日为止，张伯伦政策的反对者可能还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企图统治全世界，但在张伯伦方面，也同样不能证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即希特勒只抱着有限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而又不会对第三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对英国本身抱有居心叵测的阴谋，首相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以前也许根本就见不及此，看来他 1939 年 3 月 17 日讲话的某几段已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有气派的国家里，一位前日内瓦时代的政治家也会认为他有责任接受在军事实力方面进行竞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三个侵略国家长期来一直在向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手提出的。但是张伯伦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角逐场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应付竞赛的。他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迟迟不在自己方面重整军备，而让希特勒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攻占一个又一个阵地——时而奥地利，时而苏台德区——这些也许不过是本该属于德国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样是对汪服欧洲和世界的一次进军的决定性战略要地。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国家已处于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内部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 1940 年 6 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后对英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 1939 年 3 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象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报复，那末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 1940 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国会被德国的武装力量压垮这一点，张伯伦似乎并不怎样担心，他在其任期内始终固执地低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因为，他本人从不

当然，德国的这一系列行动开始于 1936 年 3 月 7 日的派兵重占莱茵兰，英法对这头一步的默认，就使它们在道义上更难于对德国接着而来的行动采取坚定的反对立场；但在莱茵兰事变的时候，张伯伦虽然已是当时英国政府的一名重要成员，可还没有当上首相。

《概览，1938 年》，第 3 卷第 5 编对此将有所论述。

全力进行重新武装英国，却又在 1938 年 9 月 22—23 日戈德斯贝格会议以后考虑可能要同德国打仗，对德国越过布拉格再向前推进拼命进行阻挠——1939 年 3 月 30 日他给波兰一项英国的保证，并于 1940 年 4 月 5 日，即“假战争”的最后几天，公开发表意见，说德国已经“失掉了机会”。

毫无疑问，英国国内党派政治的舌剑唇枪——也象不愉快的绥靖时期一样，用上了英国罕见的刻毒语言——是使一项经不起风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维持下去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保守党的伙伴们，从他们方面说，他们是被他们的反对者的那种可恼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是卑劣的古怪行为粗暴地搞得分了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在鼓动进一步裁减联合王国的军备的人，今天竟然骂他们不愿意打仗，指控他们卑鄙地牺牲了英国的和集体的利益，这该是何等荒谬啊！以前反对将新加坡基地建造完成，这时却又要求使用英国海军对日本进行制裁，这又是什么逻辑？国联的支持者们当真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设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什么吗？这些抱着近代世俗信仰的信徒们难道真会从写成国联盟约文本的断简残篇中看到魔术般的护符，可以用来代替充分的军备和使用它们的充分决心了吗？单纯从逻辑上讲，那似乎是，保守党人在这一点上的论据是最充分的，但是对人而不对事的话，他们是没有充分理由去反驳相反的论点的。因为自从 1918 年 12 月 14 日劳合·乔治的“卡其服选举”以来，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除去三年外，都是由保守党政府执政的，所以，把英国军备保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水平的权力和责任，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实际上都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他们所遇到的来自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阻挠，至多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词句罢了。反对派施之于保守党绥靖者的这些气恼和轻蔑，当 45 然要导致加倍回敬。这些自命的“委任医生”真的心地如此狭窄、眼光如此短浅，竟会不觉得和看不到集体安全事业乃是这一代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共同事业，而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把所有次要的事业都从属于它吗？即使他们的行动缺乏想象力，以为自己只是英国利益的受托管理人，他们真的如此愚蠢，竟觉察不到，在当前的世界上，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复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因此保卫英国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难道不就是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入共同事业去赢得集体安全的真正成功吗？把自己打扮成大家拥戴的国联的斗士去参加竞选，并赢得了 1935 年 11 月的大选，然后又在 1935—1936 年埃塞俄比亚危机时抛弃国联，这难道不卑鄙吗？为了赢得选举，曾信誓旦旦地骗取选票，一旦选票到手，便无情地扯毁竞选保证，当初就存心不良，于此暴露无遗，这不是无耻又是什么？一到最后关头，保守党绥靖者就变得极其害怕战争，他们还有资格要求什么道义上的称许吗？他们是否确实已经变成了真心诚意的和平主义者，抑或他们是在暗地里——象他们法国的一路货色那样——忖度着，法西斯国家是对所有国家的富有阶级宣誓效忠的特别警察么？难道他们上当受骗，误以为必须在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国家之间作出选

见《概览，1938 年》，ii.416—419。

这一点将在以后的一卷《概览，1939—1946 年》中论述。

《概览，1929 年》，第 59—60 页。

在十九世纪克里米亚战争之前，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宣称沙皇已武断地宣布土耳其为病人，并自封为医生。此处自命“委任医生”或本此。——译者

关于这一插曲，见《概览，1935 年》，ii.54—56，65—67。

择？而在这一错误的信念之下，他们是否作出了这种缺德的决定而把他们的阶级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联合王国这两派人的互相责难无疑都是颇欠公正的。实际上是可悲地重复玩弄着英国的典型把戏：未必就是家丑，却当众宣扬；实非断了翅膀的公鸡，却耷拉着翅膀示弱。在 1939 年，就象在 1914 年“克拉事件”的时候一样，不凑巧和出乎意外的、然而是必然的结果，诱使固执刚愎又贪得无厌的愚蠢的德国人相信——而且是基于这一信念启衅的——英国公鸡不想打仗。保守党人不是赞成搞军备吗？其条件是决不使用这些军备；而干涉主义者不是赞成使用军备吗？其条件却是决不提供军备。同室操戈、自行分裂到如此荒谬地步，还能设想有侥幸图存的机会么？当然，德国人一生犯下两次同样的错误是无可宽恕的，但在他们的无理申辩中有一点却是最动听 46 的，那便是说英国人擅长害人艺术，他们是以假象骗人上当的老手。

第三节 苏联爱德华·克兰克肖

（一）苏联政府和英法政府相互间的态度

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夕，苏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主要之处在于：苏俄领袖们确信这事必然会发生。而且他们还认定，这一依然未经宣布的行动终将只是一系列侵略行动之一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侵略者尚未出现，那也有制造一个的必要。这就是说，苏联政府自从在战争中上台以来，就一直在期待着战争，并准备着战争。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扩大，所需要的只是给头号侵略者安上一个名字罢了。这也是早就安好了的。为首的侵略者是德国。不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面有一点还不清楚，那就是英法会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德国，或是一旦在德国进攻苏联本土时，是否还能利用英法来帮忙推迟一下这个不祥日子的到来。

几乎可以肯定，苏联政府在希特勒调动他的作战部队行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要断定英法政府究竟是对制止纳粹德国较感兴趣，还是对摧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较感兴趣；因为后来的事态表明，苏联领导人甚至在那时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作出集体意见。斯大林本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非比寻常地肯把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在内。他很可能曾经认为仍然有希望把英法拴住，以便至少可以把希特勒的速度放慢。斯大林的地位看来虽然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种惟我独尊的独裁还有所距离，但他的发言在独裁的集体中是最有力量的。此种独裁集体颇为独特，是苏俄对行政实践的一种特殊贡献。——1939年3月，对英法的最终意图捉摸不定的，决非只有俄国人；德国人对此也同样摸不清楚。事实上，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新近的行动（特别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没有知照主要有关方面之一的苏联），即便是从不抱偏见的观察家看来，对它们的真正动机也颇费猜详。人们满有理由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对于挫败希特勒的眼前目标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他们感兴趣的倒是以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同希特勒达成某种工作协议——不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也是为了将苏联排除在欧洲俱乐部之外。不用多大的想象力便能把这一假定再推进一步，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可能在一场业经策划的德国对俄国的攻击中至少保证中立，而作为报答，希特勒将不染指西欧。俄国人可不是无偏见的观察家：即便西方大国没有表现出尊重纳粹德国的迹象在尊重布尔什维克俄国之上，苏联领导人——在他们自己运用马克思辩证法的自我教育下，并死抱住缘由列宁传授的马克思道德观的偏见——也会十分相信西方有这种倾向。然而西方大国却表现了不少此种迹象；的确，它们的行为，尤其是英国的行为，自1917年以来就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的教条式猜疑没有错，那就是推翻共产主义，因而也就是推翻共产主义的俄国，长期来这一直是西方大国一心想干的一件主要事情，而且将来也永远是如此。德国人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猜疑，便竭力加以利用。

从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希特勒总比斯大林较能博得一个英国政府的欢心吧？尤其是张伯伦政府。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问一下，倒并非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要把1939年3月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从空间上和时间上

俄国人的这一论点是在弗拉基米尔·波将金编的《外交史》（Vladimir Potemkin: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中提出来的。该书由辛尼娅·潘菲洛娃和米契尔·埃里斯托夫自俄文本译成法文，巴黎，梅迪西出版社。1946—1947年版，见iii.675, 685。

作一如实的透视。这里先不谈作为俄国人居住地的苏俄，在 1939 年那时内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益地提醒自己，从外部看来它是个什么样子。由于苏联在三年后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英勇卓绝，西方早先对苏俄的看法先是模糊了，然后便遗忘了——忘记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同西方各优良贤明政府的民主观念直接相反的面貌暴露无遗的时候，以及在重新制订的苏联对外政策被看出其动机是无比自私、其方式方法又赤裸裸地蛮不讲理的 48 时候，这些现象却都被当作新发现而愕然凝视。

事实上，这不过是再一次发现罢了。西欧各国的人民和政府 在 1949 年须得再一次认识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某些事情，其实在 1939 年都是知道的。比方说，他们在 1939 年就知道，这个政权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种或彼种奴役制基础之上的；他们又知道，在这块辽阔的苏联国土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仅仅不久前这种不满就受到一场恐怖的惩罚，毁灭了无数的最能干的军人和官员；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它要向各地资产阶级社会宣战；他们虽然也许怀疑斯大林政权实际上是否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他们又知道这个政权仍然是以马克思历史观为指导的，他们得考虑它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保持并鼓励共产国际。这些都是当时在道义、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事实，在张伯伦看来，这些事实使苏联作为一个未来的盟邦是不受欢迎的、不可靠的、可能还是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当然也知道这些事实：他特别注意使用奴役制于国内这一事实；其他事实则为他处理清算欧洲问题提供了条件。

当然，张伯伦政府的态度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鲜明和清楚。上述事实 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只是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凶暴的革命者，就抓住这些事实，燃起了一股不合理的深恶痛恨的怒火。张伯伦政府从来也没有反躬自问，当代俄国的各种邪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过去行为，而一项比较和解的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动摇克里姆林宫的教条式的猜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道。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保守党领袖们在一个不会卷入任何风险的时代，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实验去寻求这些答案，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失职。事实就是那样，他们不但没有尝试恢复友好关系的实践；他们的许多行动而且还确实是冒犯了俄国的新政权。即使英国的干涉以及其后的对苏冷落和联合抵制不曾引起苏联对英国的敌视，那末在俄国人看来，这些至少证实了他们的敌视是合情合理的。加之，无可否认的是，苏联政府是在一大片废墟的国土上艰苦地进行复兴和工业化工作的，他们的极度紧张由于缺乏同英国和西方的正常经济关系而又增加百倍。来自此种极度紧张的就是各种恐怖——突然袭击式的农民集体化、同“异端分子”的残酷斗争、大清洗，以及同这一切密切有关的强制劳动的推行。如果需要，最后所确认的信条，也来自此种极度紧张，即共产主义的俄国同其余的世界是根本敌对的。

前面已经说过，确实无法断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国把苏俄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忘却，无保留地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斯大林的统治究竟会温和多少。无法说：不断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会使俄国的领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学说而相信他们已毋须害怕再有来自西方的干涉。无法说：如果英法按照一项为期颇短的政策行事，认真对待李维诺夫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世界的命运是否会 是另一个样子，俄国是否会相信确实可以建立正常的国际关

系。其所以无从说起，乃是因为这一切都从未有人尝试过。不管是好是坏，却从来没有给俄国一个机会，让它抛弃教条主义的镣铐；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铐得更紧了。西方大国所干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协定为尤甚——都向俄国人证实了他们对前途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

因此，在 1938 年，苏联领导人就相当肯定地认为张伯伦会和希特勒缔结某种条约：那年秋天张伯伦果真这样干了，这就生动地证实了俄国领导人的预见，他们就更加用这种观点看待整个局势了。但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以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联政府显然还没有最后地、一致地接受这种观点。在希特勒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英国政府对待这一横暴行动所持的态度可以通过一些（不是本草涉及范围的）事件看清以前——克里姆林宫似乎还抱有某些希望，以为英国的自身利益会起作用，或者也许是英国的左派会起作用，尽管为时较晚，亦终会根据俄国人自己已在极力主张的路线同意搞集体安全。无论如何，在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李维诺夫还在主管外交人民委员部，六个星期以后，到 5 月 3 日莫洛托夫接任时他才离职。尽管缺乏真凭实据，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个日子必须被看作是英苏关系的转折点。李维诺夫主张集体安全，而且看来在探求集体安全一事上他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放手处置的权力。人们只能假定，只要他不下台，克里姆林宫的某些分子就不会放弃制止希特勒的希望。这就是 3 月 15 日前夕的情势。

（二）苏联的政府机构

50 根据 1936 年 12 月 5 日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最高苏维埃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在它休会期间通过的法令经其批准即成为法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它负责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现行法律、颁布法令，并有权撤销全联盟人民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后均称部长会议）同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它任命武装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有权宣战和宣布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它有权批准和废除苏联缔结的国际条约，任免苏联驻外外交代表。但最高执行和行政管理机关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则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

苏维埃国家的宪法徒有其表（连表面的民主也不完全），真正的独裁权力是由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掌握的。根据党章，“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事实上，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 1934 年，八大召开于 1939 年）。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还指导中央苏维埃和各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党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

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中的这三个权力最大的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

政治局决定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决定苏联的政策，51 因为党决定的政策是交给人民委员会去执行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但一般是十二名左右。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据有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职务，同时各人分别负责几个次要的部。因此，他们就是以这种职位去执行他们在自己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的政策的。有几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这个最强大的机构的核心，在 1939 年的时候是同 1934 年一样的。它的统治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委员会施行的暴政，斯大林在这些专制统治者中最有权势，但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斯大林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独裁者，不能凭自己的直感行事，这一点在苏联的公开政策中是有所反映的，所以才有必要描述一下苏联如何进行内部

斯大林在提出该宪法草案时曾经说过：“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对抗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归根到底是给有势力的人享受的民主，是给有财产的少数人享受的民主。相反地，民主在苏联却是给所有的人享受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不是苏联新宪法草案，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莫斯科新闻》（MoscowNews），1936 年 12 月 2 日。

组织局和监察委员会都是处理党内事务的机构，只是其方式不同。

书记处的成员是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马林可夫和斯大林。

1939 年 3 月那时的政治局成员有：J·V·斯大林（共产党总书记）、L·M·卡冈诺维奇（交通人民委员）、V·M·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K·E·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M·T·加里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A·A·安德烈耶夫（监察委员会主席）、A·A·日丹诺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A·I·米高扬（外贸人民委员）和 N·S·赫鲁晓夫。L·P·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和 N·M·什维尔尼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既非政治局委员又非中央委员的人民委员会委日相当于英国的常务次官；象李维诺夫那样的人民委员虽是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官职是重要的，权力却不大。

治理。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写出一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二十年秘史，有一件事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即每一项看来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决定，背后却都花费了大量的唇舌。我们现在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最高集体的表情严肃的成员们，为了要对各加盟国代表们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得出正确的解释，而那些国家则是他们未曾见过的，那里的社会体制也是他们不理解的，他们耐着性子力争做到，还求助于他们的非宗教的《圣经》，乃至通宵地晓晓不休。

（三）政治局的内部斗争

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11 月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主要目标：拯救俄国和拯救世界。最初，拯救俄国是从属于拯救世界的。但重点确实很快便改变了。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比列宁本人预料的更快、更全面、更持久得多。其次，新政权受到了同俄国“白军”结成联盟的西方大国从外部的猛烈进攻。第三，俄国境外的共产党人遭到惨败。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很早的阶段，就迫使新生苏维埃国家采取守势了，而且使它还要继续采取守势。为此目的，就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内设计出一整套新战略。广义地说，在那时以前，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直是 52 无产可共的人们永远采取攻势的路线。突然间，世界上一支最成功和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发现自己也有了许多要谨防丢失的东西了；被遗弃者第一次跟大地有了利害关系，犹如富农一样；有了需要保卫的基地，又象皇帝一样。这个基地当时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进攻。

即便在西方大国停止试图从正面进攻以推翻俄国新政权之后，它们也仍然力图困死俄国。可是，如果俄国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复兴并实现工业化，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取得西方大国的帮助。要把亡命之徒的不负责任的寻衅同可敬的社会成员的谨慎和清醒协调一致，这也许就构成了长期斗争。长期斗争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成了人们可以在苏俄内外政策中经常看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成了苏俄的许多叫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内在原因。这些令人难解之处是不容易用俄国人的心理、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解释得清楚的。

这场斗争的最初结果是在列宁于 1924 年 1 月逝世后几个月内便爆发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争吵（这是出于个人原因迟早总要爆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分裂。1930 年底，斯大林在抛弃了李可夫和布哈林以后任命莫洛托夫为主席，作为一个团结的中央委员会的指定代言人，这时的报刊和党的记录才对调和两个极端派的斗争情况有所透露。这两个极端之一是煽动世界革命而放弃苏联的复兴和发展。另一则是放弃世界革命而强化苏联的力量。但从 1931 年起，这场斗争再也不公开进行了。斗争转入地下，而且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从第一种也是比较明显的意义上说，凡是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驱使在他们自己一伙人之间施展阴谋诡计，因而再也不能站出来说话了。从第二种也是更为有趣得多的意义上说，政府内部——实际上是政治局内部——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是用“一致”的伪装掩盖世人耳目的，从中唯一可以窥见苏联领导人心思的便是他们政策不断在走着“之”字形的路线。

人们通常都认为，托洛茨基主张世界革命，斯大林则 53 主张社会主义首

1924 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透露了党内的斗争。数月之后，他被迫辞去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但被授予一个次要的部长级职位。1925 年 12 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发动攻击，由于绝大多数人拥护斯大林而被击败了。1927 年，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被撤除政府职务，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还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概览，1927 年》，第 253—264 页）。

布哈林于 1928 年 11 月被驱逐出政治局，李可夫于 1930 年 12 月被驱逐出政治局。莫洛托夫继李可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先在一国建成。但这是最会导致误解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凡是布尔什维克都是主张世界革命的，而且他们都懂得必须把苏联办成一家营业发达的商行。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争吵仅仅是这场冲突的一个次要方面，真正的冲突是侧重点问题。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常要重复发生。每一位党中央委员每天都会有新的思想斗争。这是一条九头蛇，一个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大难题。分裂、争吵、阴谋，已经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不是为了目的问题造成的，而是为了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因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分手而告结束，也没有因执政的政府于1931年转入长期的秘密会议而告结束。这些争吵、分裂、阴谋继续发生着。这是必然会继续发生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关乎一个进退两难的僵局。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和世界革命、保卫并巩固基地和渗入敌方阵营，都从来就不是互相排斥的两码事。绝对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容易决定遵循哪一种方针了。事实上，他们的出难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他们被迫同时奉行两种方针，当他们试图平衡天天出现的不协调的时候，在侧重点问题上便发生了争吵。斯大林之所以占有优越地位，首先在于他的性格既有极度灵活性的一面，又有极度坚定性的一面，这是两种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品质，而当时俄国局势最需要的正是这两种兼而有之的品质。单有坚定性是不够的，所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垮台了。单有灵活性也不够，所以季可夫和加米涅夫也垮台了。而斯大林保全了，他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帮子人，这些人较之任何老布尔什维克（除列宁是唯一例外）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理想中的政治人物。但这场起初对外暴露的公开对抗斗争仍然在紧闭着的门背后继续着。在组成苏联政府的十几个人中，时而是这位，时而是那位成了这些冲突意见的代言人，例如对农民应该抚慰呢还是要高压这样一些国内事务，又使冲突意见复杂化了，出此这场斗争在1939年5月3日以前还是苏联政策幕后的具有爆炸性的火药。这就是说，它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还在起作用。

(四) 1924年斯大林面临的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直到政治局放弃谋求集体安全的那一刻之前，它希望的是什么，它又为什么抱这样的希望；为了求得答案，我们就得看一下在苏联政策的两个极端所涉及的问题，并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又怎样影响着苏联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德国时所处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的最初日子是一个少数派政党，人民对它怀疑，实际上帮助实现三月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全都憎恨它；到了俄国群众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外国的干涉并赢得了内战胜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才比较稳固了，并有契卡和新红军对它严加守护。尽管如此，它展望前景是够凄凉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为之献身拯救的是一片疮痍的国土，其主要特征是民生凋蔽、经济崩溃。因此，如果列宁的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中央政府，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得让人民休养生息，并恢复某种经济运转。列宁，这位新时代的人物，立即而且是闹剧性地发现，在他和他自己指定的终生事业之间有着一个日形重大的长期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新俄罗斯国家十五世纪从鞑靼人手里获得解放以来就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即在一块由一个中心难以有效控制的过于广大过于原始的土地上，怎样设置一个中央政府。而那里的居民又顽固又散漫，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便无他法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一句话，那就是怎样在不利于建立国家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国家。而且，列宁的任务较之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更加艰巨，因为他得把他那个奇怪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工具。这正是他的信仰的本质所要求的。

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愿列宁在天之灵安息，我们但愿连列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情况的全部含义），他决定暂时让农民安静地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然后首先争取俄国境内工商业家的合作，其次争取外部世界各国政府的合作，以便通过贸易、工业企业和贷款等形式从他们那里取得物资援助。因此就产生了新经济政策，这件事使许多真诚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痛心疾首，也使他们的全世界敌人过早地高兴了一阵。从国内说，全局形势的关键在于农民的态度。农民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刚刚摆脱了农奴状态，因饥荒和战争而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对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取决于他们）之所以感兴趣，只是由于他们认为革命意味着结束战争并把土地分配给他们。他们支持列宁，因为列宁答应把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他并且遵守诺言；可是列宁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却让出了一大片俄国的粮仓，至于让农民取得土地这件事，他也完全知道，要不了多久他还得把土地归并给国家。由于打败了德国，俄国在乌克兰的地仇已得到改善；但和约在原来沙皇之鹰翱翔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芬兰，因而把俄国人多少世纪来含辛茹苦、耐心等待而求得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又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大片操俄语的地区又让给了波兰人。这些西部土地在俄国人看来是苏联不可分割的国土，因此收复这部分土地不能说是他们对外政策的一项，倒可以说是他们保卫基地方案的组成部分。由波兰人拥有这些土地，意味着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敌对继续处于恶化状态，并成为波兰人对希特勒

又见下文，原著第416—419页。

德国采取暧昧态度的主要原因，不然的话，波兰人可以无所顾虑地用冷静的头脑处理对德问题而不至于三心二意了。因此，波兰和俄国于 1921 年 3 月 18 日签订的里加条约很可能让希特勒获得了人们当时还梦想不到的特殊利益。这一条约的不幸后果成了希特勒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凭着这张王牌，他施展花招的自由就大大增加，而且一直施展到 1939 年 3 月 15 日，从而导致反纳粹国家陷于毁灭性的混乱，它们企图拼凑一个有效的联合不但为时已晚，而且徒成笑柄。当希特勒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最终打出这张王牌时，险些儿让他赢得了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苏联政府非但谈不上收复失地，而且显然正在陷入困境，连他们已拥有的都难以保全。在高加索和仍由苏联保留的乌克兰部分都在闹脱离主义运动，然而全联盟的恢复恰恰首先有赖于巴库油田以及苏联乌克兰的领土与矿产。农民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土地。

可以想象，这对任何政府都是难以对付的，哪怕它的基础非常稳固。然而作为救命稻草，布尔什维克还要以传播全世界革命为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此事由季诺维也夫专门负责。他和一切部门的优秀首脑一样，把他主管部门的事务——即共产国际——凌驾于一切其他考虑之上。他寄最大希望于德国，其时德国仍处于战败带来的第一阵冲击的苦海中，显得蕴藏着许多在卡尔·马克思看来是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大体说来，这就是列宁假使不在 1924 年去世就得由他解决的局面。斯大体出于他自己最清楚的理由，竭力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这么一来赢得的却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给他以应得的感激，而是敌视。斯大林根据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的说法，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宣称他的认识是，在未来的一个无限时期内，俄国所需要的是又一个伊凡雷帝，又一个彼得大帝。即使在苏联，要建成能使人信服的自命的社会主义，也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于是新经济政策仍在执行，要到 1928 年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才废除。与此同时，无论从意识形态或实践观点出发，当务之急是产生一个无产阶级。

那个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所不可缺少的伴当 当时在俄国尚不存在 因此就无法“专政”。加之，没有它，俄国就实现不了工业化，也就不能同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进行不可避免战争。为了产生这样一个具有双重目的的无产阶级，就得使数以百万计的不识字的农民离开土地，教他们识字并使用机器。为了养活这一批人，其余的农民就得生产出按人口平均计算更多的食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用现代耕作法来取代古老的带状耕作。这意味着机械化和集体化。而这又意味着事实上要向农民宣战——也就是说，向那些多少革命志士为之受苦捐躯的俄国被压迫民众宣战。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预见到有此必要，是无法知道的。只能肯定他说，列宁预见到的是一个大概的轮廓；面对这个问题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比较详细一些。斯大林这时主要关心的是要把比较年轻的人集结在他的周围。这些年轻人能够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准备按照他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开除了李可夫和布哈林这两个怀有人道主义心肠的人以后，那时当

见《概览，1920—1923 年》，第 243—244 页。

见《概览，1924 年》，第 172—175 页。

伴当系指无产阶级。——译者

政的政府于 1931 年便同人民对立了，让新任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作为他们的公众代言人，也就是当一种潜在的人质或替罪羊。此后八年，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为的是要把农民变成技工，并在崭新的重工业基础上建立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为此，几乎牺牲了一切。

(五) 五年计划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利润动机这幽灵被允许再度在苏联的街头踟蹰，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又不存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 1928 年，其任务是“恢复被战争和革命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并沿着不断提高工业化程度的路线进行重建工作”。⁵⁷ 农业集体化开始于 1929 年。到了 1930 年春天，俄国的欧洲部分已有百分之五十的耕地合并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制。

第二个五年计划制订于 1932 年，并规定了 1933—1937 年期间的定额。这一时期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发展也很迅速，其中特别注重军备工业的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要把国民消费水平提高一倍。”⁵⁸ 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于 1938 年，旨在调整新经济的各种力量使之为社会服务。这些新经济力量是：新的集体化农业和拥有改善了的运输设施（公路、铁路、运河）的新工业组织以及遍布全国、特别是远离边境危险地区的新工厂。用莫洛托夫在 1939 年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所作的报告的话来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是“提高国民经济、文化和大众福利的宏伟计划”。⁵⁹ 同前两个计划一样，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口号是“赶和超”（即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成就）。俄国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按人口计算的产量对比

产 品	单 位	苏 联	美 国	德 国	英 国
电 力	千瓦	215	1,160	735	608
生 铁	公斤	86	292	234	183
钢	公斤	105	397	201	279
煤	公斤	757	3,429	3,313	5,165
水 泥	公斤	32	156	173	154
棉 布	平方米	16	58	60
鞋 类	双	1	2.6	1.1	2.2

但五年计划的具体效果要比当时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愿意承认的规模大得多。

人们将会看到，虽然到 1937 年目标尚未完全达到，但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俄国的经济生产也许还不是高效率的，但至少是有成效的；而且在四年之后就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就要（在美国和英国的重大帮助之下）装备并供应最大的军队投入战场。

五年计划的总产量

		1932 年		
		计 划	实际完成	完成的百分比
全部工业	10 亿卢布	43.2	43.3	100.2
煤	100 万吨	75.0	64.0	85.3
石油和天然气	100 万吨	21.7	22.3	102.9
电 流	10 亿千瓦	22.0	13.4	60.9
生 铁	100 万吨	10.0	6.2	62.0
棉 布	100 万米	4,700	2,720	57.9
		1937 年		
全部工业	10 亿卢布	102.7	95.5	92.9
煤	1000 万吨	152.5	127.1	83.3
石油和天然气	100 万吨	47.5	30.5	79.0
电 流	10 亿千瓦	38.0	36.4	95.8
生 铁	100 万吨	18.0	14.5	80.5
棉 布	100 万米	6,250	3,450	35.2

这种全国性的巨大努力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它同时也是一个为战争作准备的庞大的重整军备方案。苏联政府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于 1933 年上台执政以后。这种努力出之于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是出之于苏维埃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堪称明智的指挥，而那是用可怕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武器武装的；早期还有一批重要的外国专家（主要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协助其事，它是由一支庞大的、形形色色的、不熟练的劳动大军贯彻的，对他们半付酬、半强迫、食宿都极差。据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俄国的钢城”——工作过几年的一位美国人约顿·斯科特说：

这就是 1933 年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二十五万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富农、外国人、鞑靼人、判了刑的破坏分子和一大批蓝眼睛的俄国农民，在荒芜的乌拉尔大平原中部建立着欧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金钱象流水似的哗啦哗啦地花，人们挨冻、受饿仍乞苦，但建设工作却不顾个人死活地往前赶，历史上很少有过象这样无与伦比的群众英雄主义。——再引一段斯科特的话：

工业单位的董事和经理通常都是党员。党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党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主动力和干劲的源泉。党有时也出差错，而且往往由于它搞了不必要的阴谋和搜寻异端而弄出乱子来，但总的说来，如果没有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不会建设得那样快或那样好的。——

NKVD 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后称 MVD 即内务部。政治保安警察即该部的一个部门。它原是一个特设部门，即 GPU“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或 O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更早的时候，也就是在内战时期，这一特设部门称为 Cheka“契卡”（特设委员会简称）。在沙皇时代即存在过这种类似机构，那时叫 OKhrana（警备队）。

大部分外国专家已于 1936 年和 1937 年离开苏联

（六）苏联国内问题同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以后的十年期间，这场对人民的战争发生了列宁肯定没有预见到而斯大林可能也没有预见到的转折。它开始于放逐富农，其时恰恰是人口稀少地区——或者甚至可以说自由人不愿意居住的地区——的基本建设企业迫切需要不熟练劳动力的时候。于是只好使用被放逐者：五年计划极端需要干粗活的劳动力。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找到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于是便从已够悲惨但远未大规模肇端的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劳役营中产生了庞大的强迫劳动制度，而且广为流行，很快就成了苏联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被放逐者愈多，使用强迫劳动力的地区愈广；使用强迫劳动力的地区愈广，对被放逐者的需要就愈大——首先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然后是内务部，都懂得怎样来满足此种需要。除这一制度外，还有各种叠床架屋的批准手续以限制普通自由工人的流动（俄国人为了谋求较好的生活环境是多么不愿意定居在一地）。所以到了伟大的新无产阶级产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专政的时候，它的摄政者，亦即政治局，即便有这样的愿望，却还是不能把位子让给它。在“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血红的旗帜招展之下，伟大的防卫基地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建立这个基地所要保卫的理想，却被埋葬在钢筋水泥之下了。

新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一点是比较不在乎的，并不象人们可能设想的那样。比起参加和完成十月革命的较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来，他们在思想上更接近马克思和列宁的精神。他们业已走上了有进无退的道路，对俄国、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他们自己说来，唯一的希望就是不顾一切并尽可能快地拼命去干。凡抱着人道主义原则而同所选定的这条道路相冲突的人，只有离开了事。新独裁政权面临的课题是，怎样保持步伐一致而又不引起人民普遍的消极反抗，并在机械化农业的基础上以工业经济取代业已消失的口粮经济，所有各种手段和目标都得服从于这一崇高目的——不借任何代价避免踟蹰不前的现象（踟蹰不前会导致涣散而趋于无政府状态）。从个人角度说，问题甚至更为简单：只要在一台需要铁腕就能掌握的机器旁不停地操作着就是。连看一下和想一下的时间都会放慢速度。但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知道他们在走向何方，或者他们认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在乘着历史的浪潮前进，历史却不是人类的尊重者。他们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中学到了一种危险的、对正常人性的蔑视，此种蔑视又因他们掌握了绝对权力而增强了；其结果之一便是使他们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而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所揭橥的目的的欺诈性和专一性则又估计过高。与此同时，这种结果又有助于他们对纳粹的了解，因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正视纳粹威胁，那是由于他们对纳粹动机有着客观理解，同样也由于这一事实，即他们自己也熟谙独裁政权和极权主义的各种问题。

眼前的政策虽由于俄国传统的神秘色彩而暧昧不明，由于俄国传统的笨拙而被歪曲，又由于俄国传统的密码式信号而使人迷惑不解，其实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用马克斯·贝洛夫的话来说，当前俄国的政策就是：

谋求同有助于苏联经济建设的国家进行友好交往；防止出现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结成的反苏大集团，扩大同苏联邻国所达成的安全体系，以增强阻止发生新干涉战争的力量。 —

这一政策是和残酷地推行国家工业化运动齐头并进的。工业化运动不只是为了要提高俄国国内的生活水平，也是为了要给共产主义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基地，到一定时候，苏联领导人将在这个基地上主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解体工作。但一般认为，此种解体并不是由苏联方面的直接行动促成的，而是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未来经济衰退、战争和当地革命运动的结果。由于此种战争而削弱战争中所使用的军队，这显然是有利于苏联的，因为共产国际可以作为多样化的第五纵队而存在。苏联对外政策所包含的主要矛盾十分明显的是，而且不止一次的是，既需要同各国建立并维持友好交往，又需要同时致力于破坏各该国政府的主权以及它们协调一致的反共倾向。

共产国际自己对德国共产党人的错误领导促成了希特勒政权的绝对性和长期性，又因华盛顿国务院决心要创立自由世界市场而获得了证实，苏共政治局只是在看到这一点以后，才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目标专一并压倒一切的鲜明路线，而且从纳粹主义中它又懂得了怎样去履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方面的预言，即求助于国联，把它作为搞垮希特勒政权的工具。这并不是说政治局对国联本身怀有什么信心。在这以前，它一直抱着暗自得意而又十分恼火的复杂心情注视着国联面对一个到那时为止最直接影响到苏联的威胁——日本的威胁——而无能为力。然而国联至少提供了一个集会地点，政治局可以披着最冠冕堂皇的外衣，在那里针对英法的自我利益慷慨陈词。不管李维诺夫对集体安全有怎样的想法，对较侍现实主义的政治局委员来说，即使严守自己的原来立场，也仍然只能有一个想法：推迟将把苏联卷入的任何战争，哪怕是稍稍推迟也好，只要等它强大得足以从中取利（且不说在战争中求得生存），并且要确保在战争终于到来时（一定会到来的），整个欧洲将乱作一团而四分五裂，苏联则不致遭受重大破坏。

1933年，当李维诺夫将一份计划草案提交日内瓦裁军会议而把集体安全的主张推向第一个高潮时，苏联刚刚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远东方面，它对日本继续实行绥靖，同时一有机会便炫示自己在那里日益增长的力量。在西方，它仍然对外敞开，竭力劝说其他国家同它一起抑制希特勒。1935年，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互助条约（当然没有同波兰签订）。有迹象表明，苏联终于正在成为一支需要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接着，在1936年，俄国发生了举国震荡的大清洗。政治局企图通过大清洗使自己的地位最后巩固下来，并保证全国高层领导在思想⁶²上和行动上绝对一致。清洗持续到1938年，把李维诺夫早先为使西方相信苏联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努力大半化为乌有。因此，当李维诺夫于1938年3月企图召开一次将德、日、意排除在外的大国会议时，他的努力徒劳了。慕尼黑协定便是在六个月以后签订的。希特勒已到达了他将于翌年3月15日以之为起点而向前推进的所在了。

有关苏联于1934年9月加入国联的情况，见《概览，1934年》，第391—404页。

见《概览，1933年》，第180—181页，第234页，第246页，第278—279页。

见《概览，1935年》，i.79—82。

见《概览，1936年》，第376—378页；《概览，1937年》，i.11—22。

见《概览，1938年》，ii.68注。

（七）红军状况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建设重工业和一支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多年来一直是将俄国人民的当前福利作为牺牲的。一旦完成之后，这一宏伟而艰巨的工程确将成为一台规模惊人的战争机器。但是它并未完成，事态的发展证明，甚至到了 1941 年它也没有最后完成。红军与德军截然不同，它依靠士兵大众远过于依靠干部。它不是一套精密的机器，不会一台又一台各自充分地、无故障始终地发挥作用，最后也不会连成一套高度衔接的强大的超级机器，其强度又不能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合力量更大。它是同苏联的整体结构相一致的，是根据一个高度集中的有机整体观念建立的。它还由于俄国未能协调生产而蒙受不利，这就是说，装备几乎接近齐全的师，往往因全军缺乏一个小小配件而动弹不得。

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军官的情况。苏联长期来缺乏各种领导人材，各级军职几乎都找不到适合的人选，而恰恰当希特勒初显身手的时候，全苏联正慑服在政治保安局的大清洗威力之下，崩溃几隐约可见，因为被清洗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军官达十分之一以上。直到那时，俄国国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想法，以为俄国人在新红军的组织方面是可以引以自豪的。可是，这支新红军突然被摧残得四分五裂，一些年轻、聪颖、富有进取心的指挥官被大量消灭。至于这些清洗背后所有的纠纷，这里就毋需论述，作为本文的目的，只要认识这一点就够了，即此种骇人听闻的疯狂自戕行为并不是轻率决定的，而且政治局对指定执行其旨意的最驯服组织是否绝对服从其意志产生怀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总，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红军正在于船坞里为准备一次大规模战争进行检修。

此外，最有能力对抗德国指挥官的红军指挥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则已经不在部队里了。图哈切夫斯 63 基本人不在。接替他们位置的是一些重新服役的超龄军官——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以及一批老式兵团的指挥官，他们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确，只是到了 1942 年，老同志被清洗掉了，从现代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新一代指挥官才得崭露头角。

到了 1939 年 3 月，这台军事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大部分，才算千辛万苦地制造出来了，但最后的装配尚未完成，仍然还有缺口要弥补。跳伞表演尽管给人的印象颇深，俄国人却几乎没有自己的战略空军，只有一支极不象样的战术空军。他们还是老一套，把所有的金钱和精力统统花费在大炮上。他们有世界上最可怕的大炮。但是希特勒无意打一场大炮战。俄国人也致力于制造坦克，那种型号的坦克又坚实又庞大，但速度很慢。俄国人没有经过高度机动化训练的步兵为其坦克的后盾，单凭这一点，他们就无法以古德利安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坦克，这是显然的。机动化运输几乎可以说没有——确实是这样，要到好些年以后美国租借法案开始实行时才有机动化运输。这一切都意味着红军的进度很慢。莫斯科统帅部很可能对德军计划的作战速度有很好的理性估计。但无疑也可以这样说，兵团司令员至少要有一年的战地过硬经验，从实践和理论的区别中，才能懂得一似可说是确信——德

古德利安 (Heinz Guderian) 是德国将领，率领德国装甲部队进入奥地利 (1938 年)、波兰 (1939 年)、法国 (1940 年)，1944 年 8 月任东战场最高统帅，1945 年 5 月被盟军俘获。——译者

国装甲师的行动到底有多快，尤其是伪装成防空部队的携有重型反坦克炮的后续步兵的行动到底有多快。

（八）希特勒对苏联政策的理解

对于苏联军事机器的状况，希特勒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都了解得更清楚。他除了可以从苏联的外部表现对其内部状况作出推断外，还有许多确凿的事实可作依据。德国人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甚至也不同于捷克人，长期以来就有许多机会从内部观察苏联的战争潜力：主张修订凡尔赛条约的国家的军事参谋们在很早时期就相聚一堂了。德国人对发展苏联潜力提供的帮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特别是他们帮助训练并装备了红军。他们知道，红军迟早会成为令人担忧的力量，但是这个时候尚未到来。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希特勒在 1939 年 3 月看到了俄国的那些弱点的，只是到了当年冬季的芬兰战争时这些弱点才首次暴露于世，后来在 1941 年德国入侵时又一次暴露。

凡此一切，都使希特勒在策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不难找到答案。这些问题是：俄国人既然如此被故意地冷落，竟还要劝说英法发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联合宣言，其真实用意何在？苏联在受到英法冷遇之后，是否准备单独作战？如果眼下不会，那末什么时候它才会？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它才会单独作战？

希特勒一定盘算过，苏联是不会进行一场不能从波兰手里收复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战争的。但波兰是法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同捷克斯洛伐克也被认为是该体系的一部分是一样的，而除此之外，波兰又是德国的潜在敌人。如果苏联同法国结盟（更不用说同英国结盟），它能希望从波兰手里捞到什么呢？那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局面，充满了各种纠纷的种子。俄国和西欧强国结成同盟是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同德国打仗，那便是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同另一个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国家打仗，而其争斗的目的却是为了保持俄国所全力反对的一般既成现状。总之，波兰会为了支持捷克人而同正在觊觎其某些土地的所谓盟邦的俄国一起打仗吗？甚至波兰会允许俄国人自由假道它的领土吗？这些就是俄国人在投入战斗以前所必须要加以考虑的问题。

而且，在 1939 年 3 月那个时候，即使俄国确也想采取反希特勒的统一立场，是否可以设想法国和俄国，更不用说同英国了，会在事实上走到一起而及时地采取一致行动呢？可是得记住，希特勒从这时起就会小心翼翼地设法抢先一步，使他的潜在敌手们老是在那儿讨论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防止已发生过的事情再度发生。这就是说，除非希特勒另作考虑，或者西欧强国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时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了，那样的机会已在慕尼黑被抛弃了。而且，即使俄国人确实受到目睹纳粹在布拉格出现的刺激，感到有必要采取即使是为时已晚的行动，然而正是纳粹已在布拉格这一事实这时已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因素。红军如果不涌进波兰，它在强行穿过喀尔巴阡山的途中，就会失去机动作战的自由，等到他们能够采取行动的时候，希特勒已把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当大的部分抓到手里了，而要穿过波兰调度兵力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波兰人的疯狂反对。里加条约的结果为他们保留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种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叫纳粹高兴的混乱局面，英法彷徨地在一旁莫知所措，希特勒则可以从其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第二章 日本及其侵略范围

第一节 印度和锡兰 H·V·霍德森

（一）印度

1939年初，印度专心埋头于国内事务。此种内向特性的根源埋藏甚深。印度是个次大陆，面积一百五十多万平方英里，人口将近四亿，四周有高山大海的坚固边疆，其自然环境把印度人民的思想引向了注意内部。印度人大多数信奉印度教，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宗教，它体现一种严格的内部通婚的社会制度，不吸收教外人士，也不接受教外思想。古老的不跨越“黑水”的禁令，以及处身国外时在饮食上和行动上都难以按宗教戒律和规定办理，这就使得许多较高等级出身的印度教徒不能出国旅行。但是印度政治思想的内向性，伊斯兰教徒几乎同样有之。印度穆斯林中间经常存在着泛穆斯林倾向，同他们的信仰一致的宗教社团从西北非一直伸展到东南亚。印度的穆斯林领袖经常为维护其他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兄弟般利益讲话，1939年，他们尤其为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提出抗议。但自1914—1918年战后为恢复哈里发王权的“基拉法”运动瓦解以来，此种国际伊斯兰精神在决定印度伊斯兰思想的倾向方面只是次要的了。确实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此种精神之所以被提倡，与其说是因深有感受而发自内心，还不如说是因为要用以作为打击英国统治的棍子。

印度政治上的内向性和自我中心主义事实上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历史上，在英国统治这一时期以前，印度不存在一般的民主传统；在莫卧儿人统治下，一如在其先前的印度教徒统治下，以及在随着莫卧儿政权的削弱而发展起来的由印度教徒接管的诸邦统治下，治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专门职业。在英国统治下，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他们并不感到自己对国家有责任，所以对国家在其国际活动历程中的命运，也同样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官方政策视外交和国防为英国统治者的专职或特权，因此当然不会鼓励印度人民产生国际责任感。甚至在印度人日益掌管国内事务的时候，在印度成为66国联的一名正式成员国并在世界事务中表面上取得了负责的全权国家的地位的时候，仍然如此。此种对待政府的消极态度，对于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就能维持住外国统治是多么有价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叫人痛心地突出出来了。其时印度即将有遭受侵入的危险，但各阶级印度人的共同反应却是有政府在保护他们，这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需要他们去协助政府来保卫自己的事情。

但是，人们不分贵贱都开始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人在移交手中的政府权力时应该把它交给谁。其中有许多人对此甚至兴奋到了狂热的地步。印度政界把这个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对其他都视而不见，这是促使印度抱自我中心态度的主要原因，甚至当周围的世界开始在崩溃时也是如此。英国人和印度人都意识到，移交权力的最后阶段即将到来。威斯敏斯特议会经过长期审议以后，曾于1935年通过“印度政府法”。该法规定将在印度各省建立完全责任代议制政府，委托给省督的只有几项专门的保留权力。在各省之上，设有全印联邦议会及联邦政府，在其主管范围内也享有充分职责和自由，但后者不仅要受总督保留权力的约束，而且还因国防和外交事务保留在英国人手里而受到限制。

见《概览，1925年》，i.62—63页。

见上文，原著第29—32页。

1937年初，整个英属印度举行了省立法机构的选举。选举权比1919年制宪法案规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扩大到识字水平以下。在各省众议院的选举中，印度国大党在一千五百八十五个议席中赢得七百一十一席，在十一个省的五个省里国大党独力赢得多数；在另两个省里，国大党在具有同样政治色彩的较小组织帮助下亦可望组成多数；在第八个省即阿萨姆，虽然国大党所得席位不及三分之一，但它是该邦的最大党派，故首先有权组织政府。只是在孟加拉、旁遮普和信德，首先组织政府的权利输给了别的党派。意味深长的是，所有这些省都是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的省。除了西北边境省以外，国大党只赢得很少几个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西北边境省的政局完全被一位亲国大党的帕坦人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所控制。穆斯林联盟是最大的穆斯林政党，但从1937年的选举中看，它还是一个少数民众的少数派，它在任何一个省里都未能单独组织政府。

国大党对这次省议会的竞选是“绝不同‘印度政府67法’合作，而是跟它斗，设法废除它”。所以国大党的竞选获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大党党员是否接受该法规定的公职呢？权力欲战胜了放弃职务的论据。虽然部长级的职位起初是被拒绝的，除非是按照省督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任命，但经过几个月争论之后，国大党党员终于在十一个省的七个省组成了政府。国大党过去鼓吹的重点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独立，印度各方人士和各行各业必须团结一致，这时它便根据自己竞选胜利的情况来使用这一信条了。它否认穆斯林联盟或其他任何组织有权代表穆斯林；如穆斯林联盟或其他政党不承认国大党有权就重大问题代表全印度发言，它便拒绝同它们在省政府合作；它并且在当时的党主席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精心策动下，掀起了一个要使成百万穆斯林转而归顺国大党的运动。

穆斯林的反应非常强烈，致使这一反应在此后两年多的印度政治历史中成了支配一切的因素，而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已给印度政治造成了完全新的格局。国大党在政治领域中的无可争辩的至上地位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场争取势力均衡的斗争。要求独立本是支持战争的代价。如果由一个团结的印度提出来，那将是非常难以抗拒的，无奈由于独立引来了内部势力之争，这就削弱了独立要求的力量和效果。

对国大党政策的最初反应是穆斯林的各级人士加强了团结。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的穆斯林总理劝说他们的穆斯林支持者参加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第一次把自己组织成为对群众具有号召力的全国性政党。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不但成了穆斯林联盟的杰出领袖，而且也是一般自信心极强的穆斯林的杰出领袖。1938年，他要求承认穆斯林联盟为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唯一组织，致使国大党和该联盟之间谋求和解的谈判破裂。据称各省国大党政府或其所属机关，都有冒犯穆斯林的事件，其中包括国大党的个别党员或官员，穆斯林联盟公布了这些言之凿凿的报道，使意见分歧又进一步炽热化。大多数对政治稍稍关心的穆斯林都愈来愈认为，国大党本质上是个体印度教徒的组织，因此对穆斯林来说，为防止印度教徒的统治而进行的战斗至少必须同为结束英国人统治而进行的战斗置于同等地位。

68 作为此种双重斗争的必然结果，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到了1939年便转入一个新的方向。这年3月，联盟工作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以真纳为主席的小

组委员会，研究确保穆斯林在印度独立后的地位的方案。那些注意事态发展的人愈来愈起劲地谈到当时几乎还未为一般公众所知道的一种概念，即巴基斯坦。自 1930 年以来，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间就流行着一些要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设想；1933 年，已将它命名为巴基斯坦（Pakistan）或巴克斯坦（Pakstan）。随着此种概念的扎根，范围也就扩大，到后来凡是所有穆斯林占多数或由穆斯林管理的印度地区都被包括在内。但穆斯林联盟并未表态，一些较为负责的穆斯林领导人迄 1939 年为止所考虑的，仍然是在一个松散的印度联邦结构内建立一个穆斯林单位，而不是建立一个穆斯林民族的主权国家。

可是在 1939 年 9 月，该联盟的工作委员会宣告，穆斯林印度绝对反对任何“建立联邦的目标”，因为这种联邦

势必在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伪装下造成一个占多数的教派的统治。这样的政体同这个国家的多民族的精神完全不相适合，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并未构成一个民族国家。这就为联盟于 1940 年 3 月在拉合尔召开的全会所作的关系重大的决定铺平了道路，当时全会决定：任何制宪计划均属无效，除非它所体现的原则是，把穆斯林占多数的各地区均组合成为“独立邦”。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两个党代表着英属印度的绝大多数选民。到了 1939 年，它们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全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促进 1935 年制宪法案中有关建立联邦这一部分的实现。在国大党看来，这一部分体现了“帝国主义”；在穆斯林联盟看来，这一部分意味着印度教徒的多数，而且可能便是国大党的多数，它是统一的印度的核心。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要是有个联邦，那对于实现印度的团结和稳定应是有莫大好处的。但如果在 1936 年或 1937 年建立联邦，它究竟能否起作用仍是一个颇费揣测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许多大邦出于各自利害关系而拒绝加入联邦，这就使建立联邦在法律上行不通。结果是，印度依然由根据 1919 年蒙塔古—切姆斯福德宪法建立起来的一个核心进行治理，只不过由 1935 年的法案对 1919 年宪法稍作修改罢了。这就把全部执行权力交给了总督的执行委员会，而未作任何保留，不过总督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否决其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1941 年以后，在印度人拥有该委员会的多数席位的时候，这种组织结构便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了；而在 1939 年，该委员会的多数还是由既是官员又是英国人的人士组成的。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并非仅有的两个政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亦非仅有的宗教人士。还有其他政治团体，其中一个自由党，它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号召力，但缺乏民众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先前较狭小的选举权体制下残留的组织。有一个印度教的教派政党即印度摩诃萨波，在英属印度的若干小块地区颇有势力。“不可接触者”，或在册种姓的组织也不止一个，但在政治上都无足轻重。社会主义集团在国大党内部和外部都有。有势力的共产党没有出现，不过共产主义者或接近共产主义的个别人物，对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派系和其他若干左翼集团是有影响的。

当然，还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活跃、能够代表全国同胞说话的印度人。应征入伍的印度军队的社会等级依然一如其传统。商人是不愿意因民族大义而

这一国名来源于新国家拟包括的各地区的首字母：旁遮普（Pun-jab）、阿富汗（Afghanistan，即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后来又把它和一个乌尔都词“pak”（意为纯洁）联在一起。

使自己的买卖不去适应新前景的。人民群众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业，对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办公厅所进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印度各政党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决定其对日益迫近战争问题的态度的。国大党多年来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应该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它把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贴上这么个标签。1939年3月，国大党主席与国际事务主要权威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国大党的年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一项决议，宣称“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它自己掌握对外政策，以便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潘迪特·尼赫鲁当时的著作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两斯国家等同起来时是有所踌躇的。但这并未动摇他的结论，一般说来，也并未动摇国大党的结论，即印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应帮助英国。这一结论同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的估计是有关系的，其根据是绝对信任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一个世纪来印度就是依靠这支力量的保护而未遭世界战争的灾祸。潘迪特·尼赫鲁于1938年1月写道：

谁会侵略印度呢？任何欧洲国家是不大可能进行如此鲁莽的冒险的，因为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害怕它的欧洲70邻国。苏维埃俄国肯定不会，它是不会侵略别国的。……而日本，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垮，美国、苏联和英国也确实都被制伏，这时才谈得上真正地入侵印度。这又谈何容易。

在战争全面深入，日本业已侵入印度东北部以后，潘迪特·尼赫鲁（1944年夏天）追怀往事，写下了战前形势：

世界形势看来是在走向大规模冲突，欧洲国家集团是以英法为首，苏联则联合了若干东方国家。美国对这两个集团都保持距离。……印度舆论则不可避免地站在苏俄和东方国家一边。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已普遍赞同共产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受到热烈的欢呼，被视为这是印度的自由行将实现、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即将消灭的征兆。我们对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西亚国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深感关注。新加坡之变成巨大的海军基地，锡兰的亭可马里海港之兴建，看来都是为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普遍准备的组成部分，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虽然是尼赫鲁个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大党知识界的代表性意见，而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党。许多国大党党员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冲突抱着更消极的态度，他们采纳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义。甘地这时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贫穷，对这类事情是毫不关心的，除了自身经历外，对世界大事实一无所知，甚至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对国际事务也远不如对印度国内问题那么重视。

很能说明国大党态度的特点的是，它强烈反对帝国议会于1939年4月提出的一项修正1935年宪法的法案，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政府得按该法案将其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置于诸省之上。此项措施被认为对印度在大战时的防

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统一，1937—1940年文集》〔（Ja-waharlalNehru:TheUnityofIndia, CollectedWritings1937—40），伦敦，林赛·德拉蒙德公司，1948年版〕和《印度的发现》〔（TheDiscoveryofIndia），纽约，约翰·戴公司，1946年版〕，第424页。

务是必要的（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却认为无法容忍，因为这将使“各省政府不由自主地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39年春天和夏天，印71度部队被派往亚丁、新加坡和埃及，国大党对此也抗议说这是“违背印度人民公开宣布的意志”，尽管认真研究过这类事务的人都懂得，印度的防务只有在印度洋周围地区方能支持住，而不能株守在自己的海岸上。这次出兵海外导致全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号召中央立法议会的国大党议员拒绝出席下届全会，并警告各省国大党政府“不得帮助英国政府的备战工作”。

穆斯林联盟的正式态度比较克制。迟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员会才宣布，“决定世界大战爆发时穆斯林的态度尚属为时过早”。此种审慎态度似是出于几种动机。由于联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来源于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国大党，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尽管在印度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原则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调子唱得低于国大党的——其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投入他们等待着的真正战斗。幸而联盟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没有象国大党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约束。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预先显示了他后来高度成功的领导策略，他认识到联盟“最高指挥部”同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这两省很可能在战事爆发时支持中央政府——之间的分裂对联盟的团结和实力是致命伤，并且认识到从策略上考虑，有利的方针是利用国大党可能犯下的错误和可能出现的分裂。所以穆斯林联盟对战争的正式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又一个确实的例子，说明了印度政界对即将面临的世界大灾难的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内问题而反映出来的。

（二）锡 兰

锡兰在走向自治的时候所面临的社区问题和印度很不相同，而且幸运的是，程度要温和得多。锡兰人口约七百万，其中僧伽罗人占三分之二左右。僧伽罗人大多数信仰佛教，但也有少数信仰基督教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泰米尔人（为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人信基督教）一百五十万，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古代入侵者的后裔，其余三分之二是新近来自印度南部的移民，大部分是临时性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有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马拉亚兰人、“摩尔人”（阿林伯商人的后裔）和“自治市的自由民”（荷兰人的后裔）。

早先宪法中规定的社区选举根据 1931 年新宪法已予废止，代之以地区代表制，成年人均有选举权。1931 年宪法和通常一样，也是以提出报告作为制定宪法依据的委员会主席多诺莫尔伯爵的名字命名的。虽然政府是由一个以总督任主席并有七名锡兰人任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领导，但行政责任分给若干官员和国务会议的七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每个委员会自选其主席，当选主席即为各该部部长。

多诺莫尔宪法成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攻击目标——来自大体上说是要求完全自治并废除委员会制的多数派和要求社区代表制的少数派。1938 年 11 月，总督安德鲁·考尔德科特爵士应殖民大臣之请就锡兰的宪法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份报告。他认为，社区登记和社区选举区的要求应予抵制，应以内阁制政体代替原设委员会的方案。战争爆发时制宪争议正发展到这一阶段。宣传鼓动是温和的，除几个小团体外，都没有超过在下一阶段给予锡兰以“自治领地位”的要求，甚至可能同意附带一些限制条件。

一个特殊困难是由于锡兰有那么多的印度种植园工人而产生的。锡兰当地人希望将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除非他们永久全家定居锡兰。而这些在种植园劳动的印度人则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在权利的一切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锡兰政府和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于 1939 年已经到了严重地步。

第二节 缅甸

F·S·V·唐尼森

自从 1886 年以来，缅甸全境均为英属印度所统治，按印度的模式治理。缅甸与其说是被并入英帝国，毋宁说是被并入印度帝国。在当地任职的英国官员寥寥无几，他们带来了印度部队和印度僚属，缅甸人经常要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些印度人，加以国门敞开，后来印度移民大批拥入，致使在同日本交战的前几年，印度人已在缅甸总人口一千七百万中占有一百万。

缅甸的孤立状态打破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二、三十年中，大米种植迅速扩大，直到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扩大种植 73 的资金多半由印度人提供，因此到了对日作战前，缅甸的许多稻田已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转入印度地主之手。许多印度劳动力也都用于谷物的种植。大米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柚木出口增加了，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也得到了开发，但是从事于这些工业的虽然大部分是缅甸人，资本和经营管理却几乎全在外国人手里。

由于废黜了王室，世袭地方官或部落酋长也被一批多半是由缅甸人构成的职业文官所取代，缅甸古老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于是出现了一种由缅甸政府官员组成的新贵族，他们在英国人办的中学和大学里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英国人和英国思想，往往同英国官员还有着私人友谊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知识阶层中那些未能跻身于新贵之列的人多半趋向律师界，并由此进入新的政治生活，那是随着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发展而形成的。此种人往往带着受压抑的情绪开始其生涯，接着便发现，发泄牢骚并把一切委过于英国人，乃是最容易博得公众支持的捷径。

僧侣阶层表面上还是变化不大，但僧侣们内心并不满意，而且纪律松弛。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缩小了，他们的教育职能移交给职业教师了，英国还放弃（在不干涉宗教事务的幌子下）对纪律的管理，先前这本是缅甸国王的一项特权。这一阶层有愈来愈多的人对政治发生兴趣，他们通常利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政客并反对政府。

印度势力在缅甸国民经济中的扩展，是同印度人渗入缅甸大部分主要服务行业分不开的。在日本发动战争以前，缅甸的码头劳动力、港口管理、铁路交通、内河运输、邮政电信、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除护士外）、大部分零售业以及占相当比例的警察人员，好多年来几乎完全依靠印度人。

在英国人统治下，缅甸经济财富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缅甸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一想到外国的经营管理和外国的资本赚走了巨额利润，一想到国家所依靠的是印度的劳动力，这种好处就很容易被遗忘了。一种多少带有忿恨情绪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它既刺激了英国人在第 74 对印政策中所承诺的逐步移交政权，而也受对印移交政权的刺激。此种民族主义包含着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印度情绪的高涨，所以在对英关系上几乎无忠诚可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民大众就曾要求印缅分治，理由是两国间的社会和宗教情况悬殊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尽管群众情绪在最后时刻曾有变化，深怕分治可能意味着在走向独立方面缅甸会落后于印度，但缅甸确实还是在 1937 年 4 月 1 日脱离了印度，并由英国政府作出保证，分治绝不会有损于它的政治前途。

新宪法尽可能遵循与此同时授予印度的宪法的路线。总督由英政府任命，但除两类职责外，他务须按他的部长们的意见行事。部长必须拥有议会多数的支持，而议会是由范围非常广泛的选举产生的。例外职责之一是有关国防、货币、对外事务等重要事项，各部部长绝对无权就此类事项向总督提出建议。另一类赋予总督的职责主要是保护某些少数民族和若干政府行政部门，关于这些，各部部长有权向总督提出建议，但他如果认为所提建议同他的特殊职责相抵触，他有权不予接受。事实上，总督深怕陷于宪法危机，一般是不愿漠视部长们的建议的。被称为特区的山区也不属于部长们的管辖范围。新缅甸的最终政治权力被危险地分割了，即使不发生战争，在种种压力下的这个宪法是不大可能长期存在的。

在分治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许多新老政党都参加了竞选。它们在政策上没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它们在要求早日提高给予缅甸的自治程度方面，倒非常团结一致。但它们的真正兴趣在于研究如何在政党之间进行纵横捭阖，从而分得最大最多的官职，人数不多的欧洲人集团对任何一个能够保持秩序、奉行明智稳健的金融政策而又不歧视少数民族的政府，都乐于支持。

值得较多注意的是德钦党或“我缅人党”，该党与未来的发展关系较大。德钦运动始于1930年前后。该党带有共产主义倾向，强烈反英，以通过革命实现独立为其宗旨。其领导成员主要是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年轻大学生。该党在第一次大选中遭到了意外的失败。它在向一个较老的党派搞了短短一阵逗引以后，又干上它熟悉的75那一套：潜入地下进行反政府宣传和和产业工人中进行鼓动。但时至1940年，它的活动已不可忽视了。于是该党遭到取缔，一些领导人也被捕入狱，当时该党的总书记昂山和某些其他领导人免遭逮捕，潜往日本。日本的蓬勃发展以及“亚洲人的亚洲”那一套宣传，还有日本一再成功地侮慢西方大国，这都使日本成为对年轻的缅甸民族主义分子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不久之后，又有三十名“我缅人党”党员潜往日本。当日本于1941—1942年入侵缅甸的时候，这批年轻人便随同归国，集结了一支缅甸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来反对英国。但是，如果说他们亲日，则又错了；他们是亲缅的，他们帮助日本，为的是可以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

1936年，即缅甸从印度分治生效之前不久，缅甸根据新宪法举行了第一次选举。选举结束后由“贫民党”领袖巴莫博士组阁，他建立的是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它在欧洲人集团的帮助下，在1937年和1938年整整两年期间占有内阁的多数。1939年，巴莫政府就倒台了，原因是欧洲人集团不满意内阁对1938年缅甸人—穆斯林骚乱的处置措施，对德钦党接着煽动的产业工人的动乱也不满，所以撤销了它对巴莫政府的支持。巴莫政府以及其后两届政府的口号是“自由”和“缅甸化”，但是巴莫博士一直感到自己的实力不足，时时受到他所依赖的欧洲人集团的掣肘。由吴布领导的新的联合内阁执政了一个短暂时期也垮台了，部分原因是它太乐意支持英国人作战，部分原因是耍阴谋的结果。于是又组成了另一个联合内阁，领导人是“爱国党”领袖吴苏，其人热情奔放，才能出众。他的政策的基调是要求完全独立，并以此为共同作战的代价。吴苏不久便开始感到自己在新宪法之下的力量了，他建立起一支私人军队，并在树立独裁政权道路上顺利前进，这时他访问英国，亲自去坚决要求立即给予自治领地位。他在英国并未如愿，因而首途日本，以便看看在那儿能否有所收获。但正当他在赴日途中，战争爆发了，他于是

折回缅甸，英国政府因他同新的敌人勾结即予以逮捕并扣押。吴苏的位置改由吴包吞接任。当日本发动的战争显然迫在眉睫时，缅甸内阁已放弃了乘英国之危而从中渔利的打算，虽说为时过晚，但确是老老实实地企图调动缅甸舆论团结在盟国的事业一边。

当缅甸还是印度的一个省份的时候，它是靠印军保卫的。但印度军队向来只照顾西北方，所以缅甸在军事上仍是一泓死水。在同印度分治以后，一支独立的缅甸军队才着手创建，但死水是流不快的，国家资源有限，离英国陆军部（分治以后这支新军是划归英国陆军部管辖的）又远，加之该部对缅甸的建军也无兴趣，这一切都限制了缅甸军队的建设速度。至于同日本作战，直到最后还认为是始料所不及的。人们认为，这场未必会有的战争即便爆发，在日本攻下固若金汤的新加坡之前，决不可能入侵缅甸。据说日本无力攻克新加坡，至少是无力迅速占有它。如果日本在未取得新加坡的时候竟然企图入侵缅甸，那末，据说高山密林便是天然的防御工事，而缅甸的小小军队就足以承担此项保卫工作。因此，很少或竟没有为战争作准备，更谈不上为日后在缅甸展开的那种作战规模的战争作准备了。但是，即便当局比较敏锐地觉察到了行将发生的事情，鉴于当时英国的力量要应付中东和其他各地的许多要求，是否还有余力抽出来用之于缅甸，这也很成问题。缅甸的毫无准备只是英国不作战争准备的总帐之一而已。

第三节 东南亚

维克托·珀塞尔

（一）暹罗

至今（1951年）仍在统治泰国的曼谷王朝的开国君主于1782年登上暹罗王位，此后一百五十年间几乎是久享升平，专制统治一般也还算仁慈。在国王朱拉隆功（1868—1910年）统治时期，有了一些进步措施，使暹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放弃了古老的封建制度，设立了文官制度，废除了奴隶制，修改了司法制度，并停止执行包税制。许多暹罗人前往国外留学，其中包括王室子弟。在国王朱拉隆功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下，改革继续进行，不过步伐有所放慢。但君主政体终究是一种专制主义，这类政权通常存在种种弊端，宠臣擅权即是其一。在瓦其拉乌国王（即拉玛六世，1910—1925年）统治期间，宠用亲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引起曾在国外留学的低级官员的不满。巴恰提波国王（1925—1935年）在经济萧条时7期大批裁减文职人员，更加深了他们的不满。这群官员联合了一批对专横独断的亲王们不满的陆军军官于1932年6月24日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

由于时代的趋势和外国政治理论对归国留学生的影响，政变后成立的政权具有民主色彩。但这次革命不是民众运动的结果，而是在那个又能干又坚定的銮巴立玛努他领导下的一群自称为“民党”的人指挥的。銮巴立玛努他是一位在巴黎受过教育的年轻律师。政变没有流血，也不曾引起什么大骚乱。巴恰提波国王接受了临时宪法。同年12月，临时宪法为一部持久性宪法所代替。立法权、预算控制权以及宪法解释权均赋予国民议会，后者由四年一度的国民普选组成，凡年满二十三岁、具有一定教育程度和其他必备条件者均得为候选人。但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议员暂定百分之五十。国王在宪法上仍为一国之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元首和佛教的保卫者。他甚至可以不经内阁同意就解散国民议会。他拥有对国民议会的否决权，但国民议会得以第二次投票使国王的否决失效。所余行政权力统归国务院掌握。国务院具有内阁和枢密院双重职能。1932年6月28日，“民党”的国民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当即任命披耶玛诺巴功（披耶玛诺）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政见分歧几乎接着就发生，因经济萧条而产生的社会骚动又更加深了分歧。企图在军官和高级官员中组织民族主义政党的计划又导致国务院的分裂，温和派的首领是披耶玛诺，一些进步分子则以銮巴立为首。披耶玛诺谴责銮巴立的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土地国有化和社会保险——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计划。保守势力集结在披耶玛诺周围，他便继续发动进攻，促使国王颁布了一项御旨，勒令国民议会休会，直到新的选举能进行为止。接着又通过了宣传共产主义为犯罪行为法律，规定判处十年监禁和罚款。銮巴立实际上被放逐，领了一笔年金“上法国去继续学习”。

在当时占上风的人心趋向下，如果要使政变成功，那就必须要同进步思想结合起来。披耶玛诺想防止此种政变的危险，宣布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在经济委员会指导下进行资源调查，由政府管理或参加公用事业，将无主土地分配给失业者。披耶玛诺这样做是企图暗中夺去銮巴立的声势。披耶玛诺的一个积极成就就是建立了比较有效的选举机器。但是他的政府却愈来愈不得人心。它对国民议会采取独裁的态度，对新闻自由横加干涉。与此同时，军队日益引人注目，革命前的旧政权官吏又被任命为文官。

銮巴立玛努他（LuangPradistManudharm）有时亦写成 LuangPradit。他的原名是乃比里·帕依荣（NaiPridiPanomyong）

大家害怕暹罗可能会退步到恢复不太强暴的独裁制，这就为第二次政变铺平了道路。披耶玛诺的笨拙策略又使自己脱离了那些在解散了的国民议会中的军官们，他们是帮助他创建新政权的，而且是他的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支持者。1933年夏，披那拍凤带着几名水兵和几辆装甲车一枪不发就占领了当时政府所在地王宫。銮巴立本属众望所归，这次政变就不可避免地终于把他召回暹罗，尽管保守分子对此忧心忡忡。銮巴立在离国六个月之后于9月间返抵暹罗，受到由法律系学生和劳工组成的代表团的热烈欢迎。虽然他没有在政府里立即获得职位，但人们认为经济政策的变革已迫在眉睫。在銮巴立归国两个星期以后，前国防部长、国王的堂兄弟波翁德亲王利用保守分子对增加税收和恢复土地国有化方案的恐惧心理，领导了一次保皇主义者的叛乱。经过四天战斗，叛乱被政府军粉碎了。巴恰提波国王有支持这次倒运的叛乱之嫌，旋即出国，此事终于导致他在1935年3月退位。这次叛乱之被镇压还标志着贵族作为一支统治力量的告终，并为树立中产阶级的统治打通了道路。

在此种叛乱和阴谋起伏不定的局面中，民主政体很难获得力量。加之，国民议会还有半数议员是指定的，选民对选举则漠不关心，政府又不允许在国民议会议员中有党派组织，这都不利于议会。尽管如此，国民议会的力量还是在缓慢地增强着，这多半是由于国务院的领导人因争夺权力而削弱了的结果。在披那拍凤的机智领导下，以銮巴立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和銮披汶领导的军人集团之间的龃龉消泯了。銮巴立虽则在原则上决不让步，但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军国主义者之间所可能迁就的限度内，他还是同銮披汶达成了妥协。他当了一个短时期的外交部长，后来在披耶拍凤引退以后，又在銮披汶政府里任财政部长，威望大增。随着走向民主政治方面的进步，民族主义也日益壮大。这导致1939年春天政府大搞排外立法。报刊上也充满了排外的叫嚷。这种对外国人又怕又恨的情绪在1938年年中讨论劳工法案、国家预算和航运法案时就已经表现出来，当时国民议会就有人要求新法规务须排除外国人的利益。政府发言人驳斥了这一类要求，指出外国的技能和资本对泰国的发展暂时还不可缺少。但是排外运动也有其国内的原因，这就是对为数众多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泰国华人感到恐惧。

对华人不满的情绪可以说还是从不久前的1911年开始的。那时以前，种族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摩擦。但1911年的新税法要华人缴纳同暹罗人一样金额的人头税，华人便起来反对，并罢工示威。商店一律罢市，营业全部停顿。暹罗人第一次认识到华人掌握着他们的国家的经济机器，这才大吃一惊。在其他各行各业中，华人垄断了碾米厂和大米的出口贸易。华人还担任着许多基本职务，如职员、店主、仆役等。他们把赚到的钱大部分转送到中国去。1914年以前，他们还娶暹罗妇女为妻，但从1914年以后，他们一般都把中国妇女带来暹罗（不用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接着，由于

当时退位一事的实际情况是因为废除了执行死罪必需由国王签署的规定，这就剥夺了他的赦免权。他在侄子阿南塔·玛希敦伦（当时还是个在瑞士上学的孩子）继承了他的王位。阿南塔·玛希敦伦王子1946年6月9日在曼谷王宫内被暗杀。

銮披汶颂堪的名字拼法很不一致，披汶(Pibul)有时拼成Pibun或Bipul,颂堪(Songgram)又拼为Songkram,等等。他的原名是NaiBlaekSrianong。

也就是把原缴一点五铢的税款改为七铢。一铢约值英币一先令九便士(英文前称“铢”为ticai,现为baht)。

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国政府推行教育运动，通过以华族语言（国语）教育为媒介一劳永逸地把海外华侨同中国拴在一起。暹罗政府为反击使华人在暹罗人中间成为一个不可分化的整体的企图，便坚持在暹罗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泰语初等教育。1939年达成妥协，华人学校既教汉语，也教泰语。但要取代华人在这个国家中的中间商的地地位的企 80 图，则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泰人不重视商业，而且也缺乏经商的特殊禀赋。

在 1939 年初，暹罗华人有五十二万五千人来自中国，另有华暹混血儿二百万人，移民法对他们的人数增加迄未作有效的限制。暹罗政府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在暹罗派驻外交和领事代表，其原因可以归之于它害怕这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有中心组织。

在暹罗的最南端聚居着大约五十万马来人，形成了一块无法同化的地方。南方的马来诸省在十八世纪中曾多次起义，这些省或许还会这么干的。

暹罗同英国的外交往来历史悠久，1909 年的曼谷条约使两国关系达到了顶点。根据这一条约，在暹罗的英国国民被置于暹罗“国际法庭”的管辖之下，而暹罗则将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四个马来邦的宗主权转让给英国。差不多与此同时，暹罗和马来诸邦之间谈妥了一笔铁路贷款，用来发展暹罗同它的南邻之间的铁路交通。由于这四个邦都是马来人的邦，所以在 1939 年还看不出暹罗有何收复领土的想法。英国从 1909 年开始逐步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这一过程完成于 1937 年签订英暹通商航海条约。这是暹罗和强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英国在暹罗的对外贸易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占首位，即占暹罗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日本则占百分之十一点六。英国资本在该国占有的利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暹罗的金融也同伦敦货币市场联系在一起——全部公债在伦敦发行，偿债基金存放在伦敦各家银行或投资于英镑债券。最后，暹罗简直一贯地依附于英镑集团。

暹罗同法国的关系时亲时疏，但 1925 年 2 月 14 日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标志着至少是外交上长期友好时期的开端。1932 年的政变没有立即改变这种气氛，但到了 1937 年，由于印度支那对日本渗入暹罗和暹罗执行新的重新武装计划感到害怕，友好关系受到了威胁。西贡的法文报纸《大公报》问道：“暹罗新的立宪政府 8 妄想通过吞并寮国和柬埔寨的一部分来重建其过去时代的巨大王国，这是在重温其古代帝王的迷梦吗？”反过来，印度支那实行重新武装的计划也使暹罗人感到惊恐，尽管它在实行方面远不及暹罗的计划有效。由于暹罗人通知废除 1925 年条约，遂于 1937 年 12 月缔结新约，治外法权和对暹罗关税自主权的种种限制终于全予取消。1939 年春天，双方都伸出了橄榄枝，但丝毫掩饰不了彼此的疑惧。不过，暹罗人收复领土的想法只是稍稍显现，并不曾有要求归还失土的暗示。__暹罗同日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虽然两国的外交路线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但自 1904—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暹罗很自然地意识到远东的政治均势在发生变化，在此后的年月里暹罗政治家又进一步注意到日本的上升力量和它所宣称的抱

关于迄 1925—1926 年为止的八年来的移民数字，见《概览，1926 年》，第 467 页。

见《概览，1929 年》，第 410 页。

关于结束外国在暹罗的治外特权的叙述，见同上书，第 405—417 页。

《大公报》（L'Impartial），1937 年 2 月 8 日。

负，而这种抱负迟早将导致日本同西方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察到英法的力量日益削弱。暹罗观察家过去要注意的只有两颗政治星座，不日便会有三颗了，而且这颗新星座至少也会同原有的两颗同样明亮地闪耀在远东的天空。但是当 1933 年因日本侵略满洲 而投票对它进行谴责时，暹罗弃权不参加，这也许是为了要维护它的中立，然而日本人的无限感谢，却使它大为窘迫。根据接着出现的事态发展，有些观察家发觉暹罗在后来几年中有着“倾向日本”的趋势，而且据说在暹罗政府中还存在着一个颇具影响的日本集团。但此种说法后来也并无证据可资佐证，实际情况似乎是，暹罗虽然害怕日本，但也并不偏爱日本。当我们观察暹罗在 1939 年头几个月的局势时，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完全为一种好斗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控制。82 銮披汶颂堪已代披耶拍凤出任总理，领导着一个军人占优势的政府，銮巴立已任财政部长。有迹象表明，銮巴立终将获准实行他的经济方案。当时还有流产了的巴恰提波国王阴谋复位的消息。但是没有迹象足以说明暹罗将在三年内同日本共命运。

暹罗增加军备的订货单是受这一事实的影响，即它的财政情况只容许它向最便宜的市场去购买，所以它虽然从日本和意大利买了驱逐舰，但它的购货单上也有美国飞机，而英国是决不会得不到订货单的。1939 年春，暹罗对外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它急于盼望避免卷入强国之间的任何冲突。法国的陷落和珍珠港事件这时还是遥远的后来的事情。其时暹罗全力忙于国内事务——开发经济资源，使自己适应于进行社会改革和结构改革，并学会象一个现代国家那样地前进。

见《概览，1933 年》，第 509 页。

暹罗战前预算开支的订货大约是每年一千万英镑，和伦敦郡议会的同期预算大致相等。

大米是暹罗的主要食品，也是它最有价值的出口品。它最重要的矿产是锡（1938 年定额为一万八千五百吨）。1937 年它的橡胶出口值为二千四百万铢左右。这个国家在财政上是殷实的。

（二）法属印度支那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南部一大片地区的推进，建成了一个人为的政治单位——法属印度支那。1858年，法国人建立了交趾支那殖民地，接着将柬埔寨（1863年）、东京和安南（1873—1885年）、老挝（1884—1893年）和广州湾（1899年）相继划入他们的保护范围内。到了1899年，这些领土便合并在一起置于印度支那总督的管辖之下。法属印度支那的面积总计为二十八万六千平方英里，1938年的人口是二千三百零三万。法国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倾向是保护贸易。那时法国的重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工业家害怕生产过剩，他们需要新的市场。1892年的法律所体现的观念是，殖民地产品以供应母国原料或非竞争性的产品为限。根据同一法律，印度支那被宣布为“同化”领地。根据规定，母国产品进入殖民地可以免税，而其他国家的产品则须课以在法国征收的同样关税。一般说来，印度支那的产品亦可以免税输入法国。但对该项法律所作的解释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驱使法国立法者的乃是保护法国工业的愿望。起初对印度支那当地人使用的许多中国货和日本货的课税还不算重，但后来的税额便提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设了许多开发印度支那的商业公司，私人资本自由流入该殖民地。1928年颁布了新的关税法，据此印度支那得定期调整其税额以满足殖民地的需要。凡当地工商业等团体提出的要求均被认为是得到政府默契的，除非母国政府在很短时间内作出相反的决定。

然而结果是，1928年的新税法导致实施甚至更为苛刻的保护主义措施。印度支那的欧洲人各界提出的要求超过了法国国内所提出的要求。对外国商品规定的新税率甚至比法国规定的税率还要高，结果使这个国家愈益陷入孤立状态，原先能够进口的许多中国货和日本货都无法进口了。

新关税法实施时，正值世界大萧条开始，这对改革是不幸的。萧条会在世界上造成以一国或帝国为基础的极端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这种趋势是对保护主义政策的鼓励，这就有把法帝国的经济变成封闭经济的危险。特别是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试图把印度支那同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分隔是一个错误。印度支那工农业产品的性质以及当地人的需要和习俗都有必要使这些产品享有进入东方市场的便利。这些意见日益被人们理解，因此在后来颁行的法律以及同外国签订的条约中逐渐承认了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法国人一向非常尊重他们自己的文化和风俗，很难使他们相信把这些东西塞给大异其趣而又身处远方的其他人民对蒙其恩赐的接受者竟是一无好处的。他们承认平等，不象英国人那样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倾向于种族隔离，但也只能对真正按高卢模式完全同化了的法国同胞才以平等相待。十九世纪晚期，法国舆论对法国殖民地的政治同化和文化同化大为赞扬，但即便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此担忧，大声疾呼地发出警告，指出当地民族的文化不论有何缺点，毕竟颇能适合他们的需要，如果企图加以摧毁，则非但徒劳，而且还是非正义的。舆论开始有了转变，但转变得很慢，随着舆论的逐渐转变，政策也作了修改。

还有一种信念同样也在慢慢地产生，即当地人民应当共同管理国家。不过到了1909年，法国国民议会才在一项议事日程上宣布：“逐步地和明智地

在法律上，印度支那只有交趾支那部分才是殖民地，其他各省都是保护领地。

1938年，印度支那的外国投资总额是三亿八千四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为法国人所有。

为当地人参与公众事务的咨询工作作准备是适当的”。当地人代表已同法国人代表一起坐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议会厅里了。1928年成立的经济与金融业大理事会也有当地人代表参加在内。在其他印度支那国家也成立了完全由当地人代表组成的议会。与此同时，安南人在思想上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反应是根据他们的本能和逻辑推理作出的。（应当记住：安南受中国影响达二千年之久；而柬埔寨和老挝继承的是印度的传统。）自从法国渗入安南以来，对于法国的政治和文化推进，一开始便存在着抗拒的意志。由于法国将印度支那置于“自负一切支付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安南财政负担，以及由于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和后来的中国革命所唤起的亚洲的觉醒，激励了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安南的阴谋和暴力行动几乎就成了每日常有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安南怨声载道。他们主要抱怨的是：印度支那所给予法国和法国企业的支援并不是互利的，法国没有给予安南人以机会，使之获得为掌握他们自己命运所必需的培养和经验。

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印度支那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还局限于那些安南人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视柬埔寨人和老挝人为理所当然的从属民族。但民族主义运动85分成几派，各派之间几乎互不合作。它们在厌恶法国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不能达成一个共同的纲领。在老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和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和，相互之间极不友善。加之，作为民族主义政治之特征而几乎通常都有的侵吞党的基金以及其他营私舞弊行为，也完全无助于提高民族主义运动的声誉。

某些民族主义政党立志按民主路线进行改革而不主张同法国断然决裂。范琼的东京党和裴光韶的立宪党就是如此。革命分子曾经于1926年成立过另一个党——越南革命同盟，其组成成分为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两部分人后来日益互不相容。广东人的力量开始占优势。到了1929年，该党已丧失了势力和影响，当共产主义者在这一年从该党分裂出去的时候，它就寿终正寝了。

一个比较有生气而且寿命较长的组织是安南国民党（越南国民党）。这是一个东京人的组织，党员很少（大约只有一千五百人），是按照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的模式建立的。它着重号召青年，从一开始便是一个恐怖组织。它向学生、雇工和军队散发宣传品，并致力于取得女权运动者的支持。它企图同暹罗的类似组织通力合作未果，但却于1930年同中国国民党的广东和云南支部建立了联系。1929年1月，它图谋行刺总督帕基埃未遂，一个月之后却杀害了劳工招募局局长巴让。警方在案发后的调查中才发现，这个迄未为人知道的政党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员是政府工作人员。

国民党发觉警方搜捕甚急，就决定提前实行紧急行动方案，结果便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安沛发生了兵变；在河内，炸弹扔到了军需处；永保县的副县长被暗杀。但是法国当局的行动（包括派飞机袭击该党的领袖们，但炸死了二百名无辜村民），却取得了成功。据报道，1933年该党已不成其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了。

安南共产党成立于1925年，缔造者是阮爱国。该党的纲领以实现安南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统治下86的要独立为第一步，第二步实现安南同

阮爱国 1942年再度出现时叫胡志明，是民族主义领袖。他这个假名大约是在1932年取的。

苏联合并。阮爱国受过莫斯科的训练，在广州和鲍罗廷 共过事。1927 年，中国国民党清洗共产党人。阮爱国不得不随同鲍罗廷飞往俄国。阮爱国在俄国接受了在印度支那建立共产党的任务。广东当局答应给予方便，许可他们在广州设立组织，条件是他的追随者必须将活动限制在攻击法帝国主义范围内。阮爱国的一个大问题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保守的”共产主义者之间调和分歧，后者于 1929 年分裂出去自成一党。莫斯科的影响（至少在这个阶段）是一个决定性的约束因素；它不赞成搞恐怖主义，而且主张同民族主义运动合作。无论在殖民地或法国，当局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厉镇压都招致猛烈的抨击。1936 年人良阵线在法国执政时，对这些运动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事实证明也只是昙花一现。活动不久便又被迫转入地下。在印度支那的两个监狱里有着成千上万遭受折磨的人，由于骇人听闻的不卫生和非法的待遇，受到了法国和具他各地批评者的谴责。

老挝是最后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组成部分的一大片地区。这曾导致同暹罗的冲突，因为暹罗往往对所有操泰族方言的国家都声称拥有宗主权。法国在外交上曾于 1868 年承认暹罗对柬埔寨的吴哥和马德望两省拥有主权 这就促使暹罗人得寸进尺地沿着湄南河流域侵占土地。英国人偏向于支持暹罗人的要求。法国对老挝的保护关系是在 1893 年 10 月 3 日签订法暹条约时才建立的。根据这一条约，暹罗放弃对湄公河左岸的所有主权要求。在条约的实施问题上，几乎立即发生了摩擦。于是重开谈判，1902 年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法国得到的是对边界作了细微的修改，作为回报，法国在暹罗的治外法权受到了限制。接着，1904 年又订立了一项条约，暹罗放弃了它对老挝的巴萨和位于湄公河右岸属于琅勃拉邦王国的那一部分领土仍然拥有的全部主权。此后又根据 1907 年的条约，暹罗将柬埔寨的马德望、退粒和诗梳枫三地区割让给法国。这一条约的结果，一方面是法国得到了领土，另一方面则是暹罗在外交上有所收获，因为它为了清除在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主权，是情愿作出牺牲的。1925 年 2 月的退法条约标志着法国在暹罗的司法权的结束，并在大体上平等的基础上在印度支那和暹罗 87 的边界建立了一个新体制 特别是在毗连边境的所在地规定为非军事区。从 1907 年起，法暹关系看来已逐步得到改善，尽管有安南民族主义者在暹罗进行活动。

比日本在军事上战胜俄国和人们由此对印度支那安全所感到的惊恐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战胜俄国对安南青年产生的间接影响。日本成为黄种人领袖，开取代中国的亚洲文化盟主地位（据说安南人在稻田里种上日本荷花以庆祝日本在对马的胜利）。然而，安南民族主义逐渐认识到，日本不承认中国人、印度人和安南人同日本人是平等的，正如同安南人之不承认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同安南人是平等的一样。因此，俄国和中国又取代了日本而成为安南人的英雄崇拜的对象。

印度支那同日本的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好的。在商业方面，日本一直都是从印度支那购买的多，销售的少，但大萧条显示了日本工业和出口贸易已取得惊人的发展。日元贬值和印度支那的大米和煤的对日输出的削减使印度支那实业家深切认识到同日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是值得的，而迄今为止法国人一直回避签订这种条约。于是便在 1932 年 5 月在巴黎签订了一项临时条约。

法国人看出，日本是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的敌对的颠覆分子的伙伴。与此同时，他们还看到日本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利益也是一个威胁。1938年在印度支那的日本人总共大约只有四百人，大凡一个国家里另一外国的国民较少，本应有助于同那个国家发生好感。但在1939年，事实上成了通往中国南部的重要门户的海防—昆明铁路（为法国人所拥有），却由于中日战争的缘故而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主题。加之，中国和印度支那的一系列商业和移民协定——其中一部分是在1930年达成的，但直到1935年才最后生效——是日本和印度支那产生摩擦的根源，因为根据这些协定的条款，中国得随意通过东京运送军火，免缴过境税。1937年，中国港口被封锁，使得经由海防—昆明和河内—谅山铁路运送的中国军用88品日益增多。1938年，日本和法国达成了协议，边境只对1937年7月以前订有合同的货物开放。在有些情况下禁运有所变通，但1938年在日本多次抗议后，印度支那当局切断了一切经由云南铁路的对华运输。然后，为了加强这个胜利成果，日本人于1939年2月宣告占领海南岛，因而封锁了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作为回击，法国于3月20日为中国战争物资重新开放云南铁路。

1939年4月1日，日本不顾法国曾就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一事发出警告并建议仲裁，占领了大约地处西贡和北婆罗洲正中间的这些岛屿。此后，法国人才迟迟地开始加强印度支那的防务。在此以前，法国人由于国内保守党的阻挠而未能采取这一方针。后者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因此惧怕中国人甚于惧怕日本人。

（三）马来亚

在 1939 年，马来亚对全世界来说，大体上只意味着三件东西——橡胶、锡和新加坡基地。实际上它比这重要得多。它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事业心在一片丛林中开辟出来的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它是中国人、印度人和马来西亚人三大人种的汇合之所；它是统治多民族社会的独特的实验场所。总之，马来亚对亚洲的政治和世界战略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促使马来亚日臻繁荣的两大主要行业是锡和橡胶。锡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行业，其产量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有了巨大发展。橡胶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企业从巴西带来了种子创建的，然后为满足新发明的汽车的需要而大为扩展。

为了给上述行业谋求劳动力，就需要从国外输入劳工，因为马来人满足于种植自己的小农田或椰子，往往不愿意去锡矿或橡胶园劳动。中国人和印度南方的人就来到了马来亚，人数愈来愈多，到 1938 年，华人已和马来人一样多（各为二百余万人），印度人大约有七十万。

工资是低的（1939 年初，橡胶工业的计日工资一般为五十到七十马来亚分，相当于一先令两便士到一先令五便士），但已足以吸引移民劳动力。此种移民的大量涌入迟早势必引起纠纷。到马来亚来的印度人多半是泰米 89 尔人，他们在橡胶园劳动，并没有被认为是当地人的生计的一种威胁。但华人精力过人，而且富于创业精神，那就又当别论了。华人在锡矿工作的有好多万，在橡胶园劳动的少一些，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表现了惊人的才能，他们自己也当上了商人和经纪人。马来人在经济上愈来愈受到华人的排挤，要不是受到“马来土地保留法”的保护，就会有大量土地落到勤劳的移民手里。不过，华人主要的雄心壮志是赚钱，赚了钱就尽快回国，愿意把行政管理让给英国人去办。据说华人只要挤牛奶，至于这条牛抓在谁手里，他们是无所谓的。

尽管马来人忧心忡忡，尽管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在自己的出生地被视为异乡人而心怀愤懑，这两个种族之间——实际上是在各个种族之间——的关系在英国统治之下还是和谐的。在战前数十年间根本没有听说过马来人和华人的冲突。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紧接着的几个月中发生的双方冲突，是日本唆使马来人排华政策的直接结果。这次冲突中死者数十人，殃及妇孺，成了当时动乱的一大特写要闻。

1939 年，马来人还没有政党，也没有什么政治觉悟；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是输入的，不是本国的，它所联系的只是印度的民族主义。随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已很活跃，它鼓励中国移民和马来亚出生的华人都要自认是他们祖先的国家的后裔，而不是他们居住的国家的后裔。中国的国籍法是按照子女国籍决定于父母国籍的原则，而不是按子女国籍决定于他的出生地的原则。由此产生的趋势是造成一个国中之国，主权内的主权，结果是马来诸邦的政府不愿批准国民党在马来亚建立组织。经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正式抗议后，才于 1931 年达成妥协，凡在马来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均被认为是合法的，但仍禁止在马来亚设立国民党支部。尽管如此，国民党仍在积极活动，而且是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背后的主要力量，在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该会给中国汇去巨款。国民党还提倡抵制日货。自 90 称为抗敌后援会的华人青年鼓动者企图以直接行动强迫推行此种抵制，例如

在有经营日货之嫌的商人的货物上涂柏油。但抗敌后援会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后者仇恨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国民党一致的。

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洗共产党人以后，两党结怨甚深，互为仇敌，不过在1930年以前马来亚共产党还不甚重要。但自1930年以后，马来亚共产党的影响愈来愈大，特别是通过它操纵的所谓总工会，那是一个自己任命的组织，其活动多半是通过恫吓。一些大规模的罢工就有总工会在后面支持。马来亚共产党几乎是清一色的华人。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但他们所执行的只是华人领导人的命令罢了。

由于人口的成分庞杂和华人与印度人的流动性，马来亚的民主制度发展很慢。各政治单位的种族殊异性质也妨碍了马来亚融合成为一个单位。1896年，马来诸邦中有四个邦（霹靂、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在英国宗主权之下结成联邦。1909年，曼谷条约把暹罗对北部四个邦——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的宗主权交给了英国。原来希望这北部四个邦和柔佛会加入联邦，但联邦倾向于合并，合并后各并入单位的主权就将随之丧失，因而阻碍了其他几个邦加入联邦。因此，英国人就决定实施一个把行政权分散的方案，把大部分控制权交还各邦。但仍保留联邦机构，负责照管原有四邦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务。到了1939年，已经可以看出咨询权力的集中化并不管用了，各邦趋向于彼此设立关卡。

由新加坡（它包括印度洋上圣诞岛和科科斯-基林群岛，为的是管理方便）、檳榔嶼（包括威斯利省）、马六甲和拉布安组成的海峡殖民地设有一个立法会议，由十三名官方议员和十三名非官方议员及总督组成，由总督任主席，他投的一票是决定性的。非官方议员中十一名由总督指定——五名欧洲人、三名华人、一名英属印度人、一名马来人及一名欧亚人——余下两名是欧洲人议员，由选举产生，一名由新加坡商会选举产生，另一名由檳榔嶼商会选举产生。马来联邦的联邦会议（成立于1909年）在采取了分掌行政权的政策以后，由十六名官方成员（包括高级专员）和十二名指定的非官方成员组成。在非官方成员中，有马来人四名、欧洲人五名、华人两名、印度人一名。在联邦和属邦中有几个邦务会议里也有欧洲人和华人的代表，通常还有印度人的代表（霹靂、雪兰莪和森美兰的邦务会议就都有两名华人代表和一名印度人代表）。

这些立法机关旨在谋求代表性，但绝非是民主性。在这样一个成分复杂、人口流动不定的国家怎样去实施公民权确是一个大问题。在政府办的学校或政府补助的学校里教的是官方语言，即英语，那里学费便宜；马来诸邦中教马来语的初等教育一律免费；较大的橡胶种植园实施泰米尔语教育，也是免费的；华人办的教育是在华文学校里教授国语，也由政府拨款补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很重视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则有设在新加坡的莱佛尔学院和国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

马来业的惊人繁荣在1930—1932年贸易萧条期间遭受了挫折，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一筐（或者更确切地说92是两筐）里的不妥当变得显而易见。除了锡和橡胶，马来亚的重要产品只有椰干和风梨。早先也曾想限制橡胶的产景，但并没有完全成功，英国企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这时便同荷兰人和法国人接近，经过长期磋商以后，国际橡胶管理协定终于在1934年6月生效。

见《概览，1930年》，第473—477页。

这一计划成功地限制了生产国的输出量，并借助于贸易的普遍回升，提高了橡胶价格，使经营得法的种植园赚到了可观的利润。同样，锡工业也得到了国际锡业委员会的保护，通过建立缓冲储存和其他办法，该委员会能使锡的价格稳定在每吨二百到二百三十英镑之间。海峡殖民地的贸易是建立在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则上的。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突如其来地加剧了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特别是在纺织品方面竞争更烈，由此而造成的局面使海峡殖民地不得不为英国贸易的利益修改这一政策。显然，如果不对日本的输入加以限制的话，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会实际垄断马来亚的贸易市场。荷属东印度也出现了同样情况。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把他们的竞争者抛在后面，乃是由于日元对马来亚和荷兰货币的贬值，又由于日本工厂工资低以及有效率的管理和新式的设备。日本人拒绝接受任何合理的妥协，于是殖民国家所面临的只能是保护自己的贸易，否则便是实际上被逐出市场，而那里的繁荣多半确是它们造成的。自从1932年以来，马来亚享有适度的帝国优惠，但优惠程度不够大，对日本的竞争起不了明显的作用。

然而由于兰开夏的利益并不直接等于新加坡商人的利益，纺织品(限额)条例在立法机关里遇到了非官方议员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4年利用官方议员的投票才得通过。根据这一条例，日本输入马来亚的纺织品进口额被限制在1927年到1931年的平均水平，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实行这一条例的结果是，日本在输入马来亚的纺织品进口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由1933年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一下降到1938年的百分之十八点六，联合王国则由1933年的十七点七上升到1938年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对于一个购买力很低的社会来说，日本货无疑很受欢迎。限制日货进口也许满有理由被认为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然而华人都在抵制日货，马来人和印度人对此问题则保持缄默。

1935年输入马来亚的制成品总值为二亿四千七百万马元，其中从联合王国输入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从其他英帝国国家输入的占百分之十三点六，从日本输入的只占百分之三点六。

在战前时期，日本铁的进口总额中有三分之一来自马来亚。日本人在丁加奴和柔佛设有铁矿。1937年马来亚出口铁矿石一百一十六万六千三百吨，1933年出口一百五十八万零九百吨，几乎全部输往日本。在丁加奴邦。从这些矿出产的铁矿石课取的税收占其公共工程和社会服务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二。日本人还经营铝土矿和一个低品位的锰矿。

1938年的马来亚日本侨民社区很小(不列七千人)，一点也不突出。日侨大多数是经纪人——商人、店主、小客栈老板、摄影师、理发师、男按摩师、女按摩师——但也有一些渔民。他们彬彬有礼、循规守法，虽然仔细研究过他们的人往往会发现他们的神态颇有可疑之处，还有一种并非罕见的几乎不加掩饰的傲慢气概。警方十分清楚，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事间谍活动的。

马来亚的防务被看作首先是联合王国政府的责任，马来亚的职责主要是在费用方面作出财政贡献。1921年英帝国会议就已批准了在新加坡建设海军基地的决定。1923年开始兴建，但在拉姆赛·麦克唐纳第一届政府期间停下来了；1925年又继续兴建。1929年在第二届工党政府执政时又曾一度停建，

见《概览，1935年》，351—361。

一马元价值固定为英币二先令四便士。

基地实际上是在 1938 年才竣工，花费了大约二千万英镑。正式启用是在 1939 年 2 月 14 日。在两次大战期间，马来亚为英国防务贡献了一千二百多万英镑。柔佛的苏丹于 1935 年曾赠送五十万英镑供兴建基地之用。马来亚虽在金钱上对防务贡献可观，可是它在 1939 年还没有为战争进行人力上的组织。新加坡有一支由正规军组成的小小警备部队，霹雳的太平驻扎有一个印度营。后者预定最后由 1932 年招募的马来团接替，不过该团还在训练之中。1938 年曾给这个大约有七百余人的 94 马来团增添了一小队工兵。柔佛陆军大约有四百人。除了警备部队外，主要是依靠志愿军，其中有海军和空军，但兵力总共只有几千人。志愿兵多半是英国人和马来人，不过在海峡殖民地也有几个华人连队。1939 年 2 月，给马来亚任命了一名国防部长及一名负责防空的空袭警报局局长。当时所考虑的是，一旦发生战争，马来亚的作用就是提供原料，并充当“金元武库”，以便购买英镑集团以外的国家的战争物资。当时没有想到马来亚居然也会直接卷入战争，尽管在今天看来那是不可避免的。法国的陷落是展望前景时未曾显现的——即便是模模糊糊的显现也罢——大灾难。虽说也曾认识到，新加坡对日本来说在战略上是一件诱人的战利品，但又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必须从海上进行正面攻击才能攫取它，至于从陆路进行背后偷袭，在 1939 年看来，却是完全不会有的事。

见赫克托·拜沃特（Hector Bywater）文《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38 年 12 月 23 日。又见《概览，1929 年》，第 59 页。

英国船“马来亚”号于 1939 年还在使用，那是马来联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赠给英帝中政府的一份礼物。1939 年 6 月在新加坡曾召开英法防务会议。

(四) 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

1939年春,日本人正在企图建立中日一满经济共荣圈。但要使拟议中的经济共荣圈真正有力量,就得把一大片热带地区囊括进去。日本人完全懂得这一点,荷兰人也并非没有觉察到,因为他们正好拥有这样一块明摆着的热带地区——一个占有七十三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大帝国,从东到西跨越的幅度比美国的整个阔度还宽,并有人口约六千六百万。荷属印度在荷兰人统治下已达三个世纪,是非常富饶的。它给全世界提供了大约百分之三十一的椰干、百分之十七的锡、百分之三十三的橡胶、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西沙尔麻和百分之二十九的棕搁油,此外还供应大量的茶叶、蔗糖和咖啡,连同占世界产量百分之八十五的胡椒以及实际上是世界所需要的全部的奎宁。外国资本在该国的投资(大部分是荷兰资本)估计在十亿美元到十五亿美元之间。

荷属印度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就奉行了迅速民主化的政策。建立于1916年而于1918年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国民议会”就是给印度尼西亚人在公共事务中以应有地位的一个步骤。“国民议会”至少应由三十九名议员组成,其中半数(十名印度尼西亚人,九名其他人)由间接选举产生。“国民议会”起初只是供咨询的,后来才被赋予共同立法的权力。从1929年起,它又有了立法动议权(尽管很少使用),还有修正权和请愿权。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机构的会议记录中也可可见一斑。

荷兰人历来有意地采取维持土著社会秩序的政策,但正如弗尼瓦尔在1939年指出的,重心已经转移了——这个制度是从上面悬吊下来的,而不是稳因地立足于其基础之上了。外来的压力导致土地公有制,打乱了土著的土地保有和长期占有的思想,毁坏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纽带。廉价的进口品破坏了土著的经济制度,限制了土著工艺的范围;在消极地默认欧洲优势的三百年间,本地文化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于是,时机一到,就以民族主义的形式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上的狂热病,它想要排除损害国家命脉的祸患。民族主义的领袖们眩惑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试图抄袭西方的事物,以为其中存在著力量的奥秘,但他们作出的贡献却是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同印度和菲律宾比较,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发轫较晚。其原因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私人企业以前,土著社会相对说来没有受到干扰,除爪哇和摩鹿加群岛以外,其他各岛直到1900年以后才被有效地占领,荷兰人对一些印度尼西亚人灌输西方教育的工作又开展得很慢。然而印度尼西亚从本世纪初以来的经济发 96 展却吸引了一大批荷裔欧洲人来到这个群岛,其中有官员和非官员,他们比在英国殖民地上的一般欧洲人的地位低,然而这些人却带来了自己的政治。欧洲人的榜样在鼓舞民族主义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大,但同时也是一种弱点的根源,因为这种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往往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

见《概览,1926年》,第446页。

根据1922年经修订的荷兰宪法和1925年的东印度国家条例的规定,除由宪法或依法迄今仍得由荷兰国王保留的特种职责外,总督得行使其行政权力,但以前总督在评议会中行使的有关荷属印度一切内政方面的立法权力则移交给总督和“国民议会”。然而海牙的议会仍保留有关荷属印度的直接立法权力,以及批准预算和废除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旧称——译者)通过的法令的权力,即便这些法令只涉及内部事务。见《概览,1926年》,第446—447页。

即马鲁古群岛。——译者

群众脱离。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则是在 1910 年才第一次出现的，那时才提出了本地人的独立经济计划，特别是要脱离华人经纪人。印度尼西亚人于 1908 年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名为“至善社”，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民众教育，虽然后来逐渐增强了政治性。然而不久又有了第二个团体，“伊斯兰教联盟”，比“至善社”更有名气。“伊斯兰教联盟”是在 1910 年当中爪哇的腊染法工业不景气时成立的，它给民族主义运动输入了宗教成分。起初这个团体的纲领是温和的，只是为印度尼西亚争取在荷兰帝国范围内的自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表现的精神便激进起来了。欧洲人和荷裔欧亚混血儿（荷裔欧亚混血儿于 1914 年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激进分子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中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自欧洲归国的印度尼西亚学生组织的那些“读书会”也不断地对民族主义运动施加愈来愈大的影响。

“国民议会”只要一开会，就成了慷慨陈词、大肆抨击政府的讲坛。有一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激进派集团，其中不仅包括“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和“英素琳特党”（一个欧亚混血儿组成的政党），还有“东印度社会民主党”。在 1920—1927 年间，共产主义开始对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共产党人并于 1926 年 11 月和 1927 年 1 月起来暴动，但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正如阿姆里·范登博施所说的：“既然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那么对发生的事情所作的最好解释也许是：各自为着自己的目的，不是共产主义利用民族主义，便是民族主义利用共产主义。”对共产党人暴动的镇压终止了民族主义运动寻求和希望外国援助的意图。

在欧战爆发前几年，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极为错综复杂。具有不同目的和方法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并于 1928 年组成一个联盟。由于其成员在追求的目标 97 方面存在着某些根本性分歧，该联盟的活动并不协调一致。印度的民族主义对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颇大，印尼民族主义运动采纳了印度的“国产”方案来加强经济战线，“国产”也就是在国内制造迄今一直是输入的商品。1936 年，民族主义者成功地使“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荷兰政府召开帝国会议，以便起草一项给印度尼西亚以在荷兰帝国范围内自治的计划。

荷兰人对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祖国俱乐部”成立于 1929 年，旨在维护欧洲居民的利益并保证帝国不受侵害。但当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米塞于 1935 年来到荷属印度的时候，支持者却寥寥无几，这个运动到 1937 年就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消失了。与此同时，荷兰居民中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便自己组织起来，对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持同情态度。此时另一个由欧洲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共同成立的团体则鼓吹联邦结构，认为这是促使帝国各部分相互团结的最佳方法。当时在印度尼西亚人自己中间的一些保守团体，都主张加强各土邦苏丹的权力，有一个运动则主张摩鹿加群岛在荷兰政治结构内实行自治。

1939 年春天，命中注定要在 1942—1945 年战后获得巨大声望的三位民

E.S.德克莱克：《荷属东印度历史》（E.S.DeKlerck:HistoryoftheNetherlandsIndies），鹿特丹，布鲁塞，1938 年版，ii500—501。

见《概览，1926 年》，第 445—456 页。

阿姆里·范登博施：《荷属东印度》（AmryVandenbosch：TheDutchEastIndies），第 3 版（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4 年版）。第 320 页。

族主义领袖还都在拘禁中。苏加诺（生于1901年）于1933年被捕，原来拘禁在弗洛勒斯，1937年被转移到苏门答腊的明古鲁。沙利尔（生于1909年）和穆罕默德·哈达被拘禁在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之间的班达奈拉岛。

在1929年至1939年这十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欧亚混血儿日益倾向于印度尼西亚。他们大约有二十万人，私营商店的店员和政府办公室的低级职员被认为是他们的世袭职位。这些印（尼）欧人没有土地权，备受社会地位低下之苦，所以日益倾向于同情民族主义者。其他混血儿也是这样，尤其是印（尼）华人和印（尼）阿（拉伯）人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工会运动已经迅速壮大起来，不用说，它是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共产党人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为了争夺工会运动的控制权斗争了好多年，但政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对骚乱的镇压，实际上使共产主义不再成为一支公开力量了。

除了民族主义运动外，荷属印度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国内问题，就是华人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国际方面。散居在东印度群岛的华人计有一百二十五万。这些华人和在其他地方的华人一样，是这个国家里的经纪人以及锡矿和种植园的劳工。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海外侨胞愈来愈积极地关心，而且不分“新客”（即来自中国的移民）和“侨生”〔即印（尼）华人〕，都一视同仁，根据中国的子女国籍取决于父母国籍的原则，他们统统都是中国公民。这种情况本身就已经是够麻烦的了，但1937年中日战事的再度爆发，又带来了新的困难。中国政府立即号召海外华侨提供财政援助。荷属印度政府虽然允许推销和认购中国公债，但不准采取群众行动或宣传。华人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至于同日本的关系，日本在贸易萧条时期对荷属印度的商业渗透已成现实，当时日元的贬值和荷兰人的继续依附于金弗罗林均有助于日本商业的渗透。1933年，日本在荷属印度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已达百分之三十二，而日本购买的荷属印度产品只占其总额的百分之五。于是政府采取行动，强制规定限额，这才为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挽回了不少市场。然而对那些只买得起日本廉价商品的本地人来说，当然是不会没有损失的。

荷兰人对日本驶入荷属印度各岛之间的海域进行贸易的商船日益增多，也很担忧。为讨论这一问题，原定于1935年在神户召开航运会议，由于日本坚持以日语为会议官方语言而破裂，致使荷兰同日本之间产生了摩擦。不过翌年还是达成了一项两国间划分航运业务的协议。1939年前的两三年，即1937年3月，在日本众议院发生了一件在荷日关系上突出的事件，当时民政党的樱井兵五郎说，荷属新几内亚是不发达地区，他问日本政府可否考虑同荷兰政府展开谈判，以便取得该领土的永久99租借权，作为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手段。日本首相林銑十郎将军回答说，此事将予以审慎考虑，但又接着说，日本对荷属印度没有领土野心。1937年，日本外务省的吉田丹一郎访问了荷属印度，显然是想消除荷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1936年的日德反共公约

1930年荷属印度有二十四万二千欧洲人和在法律地位上与欧洲人相同的人（后者包括欧亚人、七千日本人和将近九千本地人）。见范登博施，前引书，第7页，

见《概览，1926年》，第464—465页。

同上书，第404页。

有着将荷属印度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到那时为止，日本的“南进政策”还只是传说，但日本于1939年4月1日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占领就突然使这一政策具有现实性了。此举使日本更靠近荷属印度。并降低了香港和印度支那法国海军基地的价值。美国不久前又决定了以1946年为菲律宾的独立时期，这也使荷兰人感到关切。

尽管已有种种不祥的征兆，荷兰政府在1939年还是没有准备同别的国家结成联盟来保护荷兰的领土。荷兰曾于1935年强烈支持对意大利的制裁，但制裁失败后，它便退回到奉行自己的严格孤立和中立的老政策。1939年夏天将在新加坡举行的法英防务会议，虽然把荷属印度的安全列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荷兰首相却认为，最好还是向公众和世界作出保证，荷兰将不派代表出席会议，因为那是不符合荷兰的绝对中立和孤立的政策的。

总之，荷属印度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内是有种种理由为其未来担忧的。国土处于完全孤立状态，就现代军备而论，又是毫无防卫。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也丝毫没有把握能指望印度尼西亚人会在荷兰领导下团结起来反抗入侵者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见下文，原著第100页。

见《概览，1935年》，ii.81，188，276，472—473。

荷属印度国防部的开支已从1929年的大约七千六百万弗罗林削减到1933年的五千万弗罗林。从那时以后，荷属印度的防务拨款逐步又有所增加，1940年拟给陆军和海军拨款一亿二千六百万弗罗林（范登博施，前引书，第349—350页）。

（五）菲律宾

1934年3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菲律宾应于据新宪法组成的政府任职期100满十年后的7月4日获得独立。因此，来自群岛各地的二百多名菲律宾人民代表于1934年7月在马尼拉集会制订了一部宪法，经美国总统于1935年3月24日批准，并由菲律宾人民于1935年5月14日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于是1935年11月15日成立了菲律宾联邦，参议员奎松任第一届总统，前美国总督则改任高级专员。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对菲律宾输往美国的出口品实行渐进课税制，联邦成立后的最初五年内按美国标准税率的百分之五课税，嗣后每年递增百分之五，至标准税率的百分之二十五为止。与此同时，美国移民法适用于菲律宾人，在取得独立以前每年限额为五十名，独立以后对亚洲人的排外条款亦适用于对菲律宾人，一如适用于对其他禁移区的居民。1934年的法案通过以后，关于独立的日期应当提前抑或推迟，立刻就有许多争论，但最后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11月28日批准了菲律宾事务筹备委员会（由菲律宾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的报告，确定1946年7月4日为菲律宾独立日期，并订出了对菲律宾经济优惠制的条款，使优惠制可以继续实行到1961年为止。不妨指出，美国的糖、烟草、油脂等等的生产者认为结束美菲之间的自由贸易对他们有利，而美国的工会则担心菲律宾的移民会同他们竞争。所以给这个国家以独立，乃是典型的美国理想主义和美国商人的利己主义的奇怪的结果。

就1934年法案的关税条款而论，有必要说明的是：自1909年以来，由于两国间确立了自由贸易，菲律宾群岛的经济实际上是依附于美同经济的。原先早已不顾菲律宾人民的抗议而这样做了。菲律宾人民曾通过其议会的代表提出抗议，指出自由贸易对菲律宾人民的经济利益将来会造成严重损害，并将妨碍独立的实现。如所预101见，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使菲律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变成了美国的附庸。

在美国统治的四十年间，菲律宾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到1939年春天，这一片十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地区（几乎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面积一般大）已有一千六百万人。有人认为，这片土地能养活三倍于当时所拥有的人口。教育、卫生和公共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贸易总额从1899年的三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1938年的将近二亿五千万美元。但在这一时期美国贸易从占总额的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贸易的模式按照殖民地发展的模式进行，这在东南亚各地区是司空见惯的。输往美国的是农业原料和农产品，而来自美国的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品。菲律宾人完全仰赖于进入美国市场的自由贸易了。

美国战前在菲律宾的投资规模是不能同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他们各自的亚洲殖民地的投资相比拟的，因为在1935年美国投资只有二亿五千八百万美元，或占菲律宾群岛外国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投资总额小，标志着工业化水平的低。菲律宾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在1937年，一千八百六十万公顷可耕地只耕种了四百二十六万公顷。据说糖已生产过剩，但马尼拉麻和椰干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可能有利可图，西沙尔麻和烟草可能也是如此。

见《概览，1933年》，第571页：该法案文本见《文件，1934年》，第429—442页。

见《概览，1933年》，第567页。

据当时财政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估计，1939年菲律宾人的每人每年收入为四十美元。菲律宾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天四十五美分，农业工人的现金收入为每天二十五美分左右。由于菲律宾经济依附于高价的美国商品，因此实际收入还是非常低的，即便已逐步有所提高。

在乡村地区，到处都有不时爆发的不安定现象，这是不健康的土地制度的一种经常性症候。大批农业工人受雇于私人或教会拥有的种植园，他们陷于不能自拔的债务或一贫如洗的困境中。地主或其代理人实际上取走了全部收益。政府也曾企图缓和这种局面，但又没有收购这些地产的大量资金，而且为非律宾人提供的新的生活方 102 式也往往非其所好。比较稳妥的改善方案还是把人口稠密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棉兰老的未开垦地区去，这已在小规模地进行了。

为了改善工业工人的境遇，与奎松总统的名字分不开的一项促进社会正义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并通过了若干法律，同时政府还在 1938 年租用了布埃纳·维斯塔大种植园，把它改变为进行合作试验的实验场所。

华人（1939 年为十一万七千人，而 1918 年是四万四千人）控制了菲律宾的零售商业，凭着他们擅长于仓储经营和市场交易，还包括分配大米的垄断权和他们的信用网，他们就能够对千百万菲律宾人施加压力；后者的许多生活必需品早自西班牙统治以来便一向仰赖于华人。尽管美国对华人实施了排外法，他们的人数还是通过非法移入而一直在增加。菲律宾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抱的同情，因对在非律宾的华人的行为感到不满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抵销了。在达沃，1939 年有一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社区，共有一万八千人（在菲律宾的日本人共有二万九千），占有六万公顷土地，从事大麻种植和椰子业。日本人蚕食菲律宾群岛的渔业已到了惊人程度，以致大众群起要求绳之以法，以免这一主要食品供应被日本人垄断。日本渔民同菲律宾当局发生的摩擦是常见的事，但以 1934 年的事件最为严重。当时一艘日本渔轮“排云丸”上的水手，把一名登上该轮的菲律宾保安队的巡逻兵扔进海里。日本拒绝引渡罪犯，也不肯真正赔偿损失。

在 1934 年到 1938 年这一时期，日本输入非律宾的商品以价值计算平均为一千三百万美元（约占非律宾进口品总值的百分之二），而非律宾对日本的输出平均为七百三十五万美元。这个数目不大，但到菲美“自由”贸易结束时，情况就会不同了。日本人用来向菲律宾人灌输其思想的方法同他们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并无多大不同。菲律宾人——记者、教师、议员、商人——的代表团在日本受到款待，而类似的日本代表团又进行回访。著名的菲律宾 103 律师和商人同菲律宾的日本企业有着联系。菲律宾群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颇活跃的团体，其成员来势不凡地展开活动，企图加速菲律宾倒向日本而取代菲律宾同美国的现有关系的日子的到来。许多菲律宾青年在学习日语，其中至少有一名青年进了帝国军事大学。这些活动给那些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谋划的人士增添了忧虑。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早在 1908 年就曾说过，菲律宾在战略意义上是“我们唯一致命的弱点”。日本在战前年代中的日益增加的威胁，在菲律宾的重要团体中已引起了互相矛盾的说法，即争论抑制日本是否可能和是否有此必

见 J·R·海登：《菲律宾：对国家发展的研究》（J.R.Hayden：The Philippines：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纽约，麦克米伦，1942 年版，第 717 页。

要。一个思想流派认为，菲律宾如果独立，便可避免卷入即将发生的危机。这场意见分歧的结果是陷入了绝望的僵局，这就使菲律宾群岛不能作充分的军事准备。泰丁斯—麦克达非法案有一项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在菲律宾独立一旦告成之时，应于切实可行的最早日子，同外国谋求谈判，以缔结一项菲律宾群岛永久中立化的条约”。鉴于菲律宾群岛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个“切实可行的日子”到1939年的春天尚未到来，这便不足为奇了。

然而，菲律宾政府并非一事不为。第一届国民会议于1935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案。奎松总统对此表示支持时说明，“一俟美国撤走其善意的保护时”，此项计划必然会产生其成果。他说，开始和完成防御结构的发展只有十年时间了。

国防法案规定建立一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陆军：一种是大约一万人的正规军（包括兵力有七千人的菲律宾保安队），另一种是每年扩编约四万人的后备队（后备队均须集中训练五个半月）。到1937年底，已办了两属为期半年的训练班，受训者共计三万六千六百零一人，并都已编入后备部队。1938年接受训练的后备队员又有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七名。

防御计划要求建立一支拥有小鱼雷快艇的外海巡逻队，作为菲律宾陆军的辅助。麦克阿瑟将军曾说，只要有一支小小舰队，配备的船员对海岸线的每一寸土地又都了如指掌，就能迫使敌对部队不敢贸然逼近，或则只能小股骚扰。计划也打算建立一支同近海巡逻队协作的陆军104航空队。原来防御计划所要求的是到1946年将训练一百名飞行员。

在1939年春天，菲律宾政府的眼睛紧紧盯住不放的是1946年7月4日这个日子，因此防务的状况也确如其他各种事情一样。至于考验的时刻远在那个日子以前就到来了，整个世界问题要比那个日子几乎提前一年就决定了，这确是也许除巫婆外谁都没有预见到的了。

第四节 中国

阿诺德·托因比

（一）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及其胜败之可能性

当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欧洲事件在上一章以希特勒占领布拉格而揭开的时候，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又困难又危险，正如在以前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过的困境完全一样。它不仅在这时处于交战状态，而且是从 1931 年以来就处于交战状态，更何况自 1911 年以来它就一直在经历着一场国内大动乱。这场大动乱不仅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1939 年所见到的中国是深陷绝境了，不仅被夺走了它的传统立足点，而且内部也分裂了。

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在 1931 年 9 月 18—19 日发动的，当初进攻的范围只限于满洲的东北四省和上海；但在 1937 年 7 月 7—8 日晚上，中日之间的不宣而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侵略者把作战范围扩大到了长城以内中国的心脏地区，并把他们的作战目标从夺取满洲这一有限目标扩大为无比巨大的冒险企图，要推翻中国国民政府和在中国西北部的共产党政权，从而置全中国于日本统治之下。

到了 1939 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华东的主要人口中心和交通线，南面已达中国内陆中心而为长江与汉水汇合之处的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武汉三镇是在 1938 年 10 月 25—26 日陷落的；由海路派 105 遣的另一支日本远征军于同年 10 月 21 日占领广州；而在此时已颇为广阔的军事行动区的相对一端，日本人的魔爪早在 1937 年已向西北伸进了山西，并由此而进入了内蒙古西部。在日本人自己看来，他们迄今取得的成就也许并无理由庆幸。他们占领的地方纵然已延伸得那么遥远，但也不过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网络，在他们的战线后方，还有大片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孤立的领土。日本人实际占领的地区只占中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而中国国民政府则于 1937 年 12 月就已经从南京撤退到汉口，1938 年秋天又一次逃避入侵者，作了第二次撤退，这一次跑得更远，到了长江上游的重庆。这个新的中国临时首都位于长江三峡之西，处在崇山峻岭环护的四川大盆地中。四川是中国的一个省，居民五千万，要是在欧洲规模的角逐场上，它是颇有资格进入强国之列的。假如日本人决心要到这个西部堡垒中去追索中国国民政府，或是要深入到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沿海之间的那一大片山区，他们就得穿越比中国当时拥有的已是十分稀少的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终点更远的地区，就得在不通车辆的险恶小径上前进。

但是在中国人方面所面临的前景，却是暗淡的和险恶的。可以说他们是孤立无援地在同敌人搏斗，而敌人作战的工业和技术装备又都是西方现代式的，比中国的优越得不可比拟，所以当冲突开始时他们听拥有的若干铁路、工厂和具有现代设备的港口此刻都丧失给了这个敌人。诚然，他们还留有空间可以换取时间。中国还没有全部落到入侵者手中，还不象十三世纪蒙古人

见《概览，1931 年》，第 420—472 页；《概览，1932 年》，第 432—515 页；《概览，1933 年》，第 478—484 页。

见《概览，1937 年》，i.180—240。

《概览，1938 年》，i.513。

同上书，i.515—516。

见《概览，1938 年》，i.505，513，517。

和十七世纪满人的征服中国那样。但是从长远看，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的威胁却比过去历次被征服加在一起更为可怕。

满人象早先一批又一批的许多入侵的蛮人一样，在他们入关以前就已经半汉化了，而且远在公元 1911 年平淡无奇地逊位以前，他们实际上已被完全同化了。至于蒙古人，在所有入侵中国的蛮人中，独有他们不受同化。他们虽然颇有远见地从西部国土上选拔了一批穆斯林和基 106 督教部队与行政官吏来增援他们单薄的人力，但他们的征服至多也没有超过八十七年，便被干净彻底地逐出了中国。就实现迄今尚未完成的征服中国这一伟业而论，要不受上述的任何一种惩罚，即既不要被慢慢地同化，也不要被很快地逐出，那么日本人所处的地位比较他们的任何先驱者都好。在国民意志和团结方面，日本人至少比得上蒙古人，在对中国人的相对人数而言，他们的人数也远不象蒙古人或满人那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区别甚至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在 1939 年，中国和日本（不包括朝鲜）单纯在人口数字上的差异，可能至多是四或五与一之比而有利于中国，但中国在人数上仍然占有的优势却被日本所享有的技术优势抵销了（即便不能说是超越了中国的人数优势），这应归功于早在中国之先，日本就开始刻苦钻研以掌握西方的工业生产和机械化战争的技术了。

因此，日本人如果在尚未占领的华西和华南能成功地控制哪怕是少数几个关键的据点，他们才会有希望迫使中国人处于永远屈从于他们的地位，因为这样方能阻止中国人进一步掌握西方的技术，使他们只能按有利于日本的路线或由日本指定的方式进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日本人就成功地使用这种方法把朝鲜人变成了为日本人劈柴挑水的苦工；尽管朝鲜是一个较弱较小的国家，日本人何能还想把自己在朝鲜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范围内重演一次。

中国在此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还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因为危及它生存的日本威胁到来时正值它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而它又成为其中最不幸的。

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自成为一个世界，其邻邦都是顺从的纳贡国和驯服的夷族，谁也不敢同它争锋；但自英国的武器突然一下子结束了这一页历史以来，迄 1939 年为止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 1839—1842 年中英战争以后，中国从长期的政治隔离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并被迫进入了其触须遍及全球各地的西方社会的国际角逐场。中国已不再是运转自如的宇宙之毅了，它这时发现自己是在一批民族国家的落后群中，相互的关系是“以实玛利”式的，在这种陌生而又乱糟糟的生存竞争中。它也就逃不了一般弱者和无经验者通常会遇到的那种痛苦命运了。

在西方历史的较早篇章中，一个处于象中国那种地位的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避免其没有国防 10 的危险；这多少是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力量较强的国家自发进行着势力的平衡。十九世纪中，土耳其帝国就曾靠着更强国家的武力所起的此种作用才得避免被瓜分，凭它自己的行动是怎样也抵抗不住人家的。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在国际事务日程表上的下一件大事一时看来似乎是要瓜分中国了，而强国的均势确实又在这一次拯救了中国，使它在政治上免于被消灭。俄国、德国和法国在 1894 年曾通力合作去阻止日本摘取中日之战的胜利果实，英国在 1898 年则制止了俄国加害于中

国的蚕食，因为俄国要向中国租借一块在威海卫的海军基地，该处正面对当时俄国才获得的旅顺港。中国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危机，其代价却是听凭当时强国之中的保护者和进犯者各自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啃去一块。按照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之后由美国斡旋而达成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俄国和日本的铁路沿线地区以外，管理满洲的权力已归还给中国。但在 1914 年打开的国际史的新篇章中，中国再也得不到它前此二十年从势力均衡中所得到的那种即便是最低限度的保护了。

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舞台，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全神贯注于大战，这就给日本一个加害于中国的新的侵略机会。贝尔福和休斯的灵巧的外交手腕也没有能在 1921—1922 年华盛顿会议上把日本抓住时机所攫取的成果全部榨尽。此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也曾想以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在法律上取代势力均衡，但当日本于 1931 年再度进攻中国时，终于证实这一企图既未能保护中国，也无法为它蒙受的损害提供补偿。

于是，时至 1937 年，当时日本的侵略范围已从满洲扩大到整个中国，它有着比七年前强硬得多的理由想放手大干一场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自信的一个理由，即日本在 1930—1933 年击败了国联其他成员国而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第二个理由是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终于在德国上台了，这就把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注意力再从远东转向了欧洲。第三个理由是美国的公众感情对美国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后悔不已，此种情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是相当普遍的，这对日本说来乃是天赐良机，因为只要这种情绪长此存在，就有希望约束强大的美国，使它不采取援华反日的有效行动，而这个强国又正是中国的朋友，而且这时并没有因卷入欧洲的任何纠纷而动弹不得。

在此种国际形势下，就得看中国是否能够争取到时间来拯救它自己，看来即便赢得时间，也不能指望它会有任何盟友了。如果让中国和日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去一决雌雄，那么两者之中又是谁能坚持得更久呢？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因素或许在于中国保持统一战线的成败。中国上一回的屈服于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胜，可能一半是由于中国敌手的威力，一半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分裂。十七世纪时，一次汉人反抗明土朝的起义给满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机，而给满人提供第二次决定性机会的，则是一位驻守战略要地的中国将军不愿归顺北京的汉人篡位者而作出了为满人入关敞开大门的决定。还有，在 1917—1918 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思想反动的中国军政派系竟愿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以换取日本的财政援助。可怕的外敌当前时的此种不团结，已在 1644 年证明是对中国的致命打击，在 1918 年又证明对中国是不幸的，在 1939 年将再一次危害中国的前程。在当前的情况下，问题本身将不外乎以两种疑问方式的出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吗？国民党能否把自己队伍中的内奸的叛卖行为约束在一定限度内，使自己依然还可以维护一个有代表性的合法的全国政府的称号？

《概览，1920—1923 年》，第 456—471 页。

见《概览，1931 年》，第 472—505 页；《概览》，1932 年》，第 515—586 页；《概览，1933 年》，第 484—518 页。

见《概览，1938 年》，i.575—582。

（二）国共关系再度紧张以及汪精卫背叛国民党

国共统一战线是在 1937 年内建立的，这可能是日本在那年夏季扩大作战范围的原因之一，但相反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度发动侵略，则肯定促成了中国这两派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统一战线是中国的政治家风度的杰出成就。它使 1927 年以来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内战暂时停止，它使两个政权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成果，过去这两个政权既要互相厮打，又要对日本作战。然而它毕竟主要是在日本军事压力下才结合起来的，不稳定的联盟，因为两党对统一战线是一对各怀鬼胎的伙伴，在它们的心底深处，国民党是否真会放弃无条件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又是否会放弃实质上的保持独立，不再继续在他们控制的中国领土以外争取追随者以加害于国民党，这都是令人怀疑的。但在 1939 年春季，对中国来说，国共联盟的分裂危险，不如新近成为事实的国民党知名政客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事那么严重，因为他在党组织和国民政府内担任过好几种最高职位。

汪精卫的背叛，部分是由于他同蒋介石主席的个人对抗，部分则由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意见不同，在这方而汪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党内这一派的首领。看来，汪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感到绝望，他和他的追随者已认为，立即按日本人的条件向日本投降，比之把一场在他们看来结局肯定并无二致的斗争拖延下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可以少一些。他们对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并不如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那么重视，那个集团在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逝世以后很快就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可能又想到日本乃是国内外共产主义公认的敌人。汪精卫本人至少有勇气去干自己所深信的事情。1938 年 12 月 22 日日本政府公布同中国媾和的条件，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从重庆取道印度支那而到达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就在那里同日本当局合作。汪在这一公然叛国行动中并未携带他从前的追随者同行，但就日本人所抱的目的而言，他可以抵得上成千上万人的号召力。一般说来，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足以充当一名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权的头子，以对抗在重庆的流亡政府。1939 年 3 月，汪精卫已在同日本人谈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两个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权加以合并，由他出任主席。

见《概览，1937 年》，i.154—160。

见《概览，1938 年》，i.497。

同上书，i.518；《概览，1937 年》，i.251，255。

（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人队伍中的这两条政治裂痕——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条在国民党内部——乃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征兆，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斗甚至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便是中国种种苦难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填补因崩溃而产生的真空的两剂对立的灵丹妙药。

国民党在理论上的想法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学过生活，同时又要掌握并采纳当代西方自然科学，运用于各项经济活动。这是当年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1866—1925年）拟定的，后在1943年以蒋介石主席的名义刊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又一次提出。孙逸仙象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一样，已经觉察到，凡是非工业化国家，如果决心要以强行军步伐迎头赶上主要工业国，那就必须要求国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至少在这个阶段，发挥较之其他国家所发挥的大得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家发展和控制关键性工业，并由国家监督经济领域中其他部门的私人企业。孙逸仙并不是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鼓舞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同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采取的路线如出一辙。

然而，孙逸仙在其最后的生涯中却确实受到俄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俄国共产党使者鲍罗廷的怂恿下，于1924年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出版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人民的三原则”）的书。该书两个明显特点之一是有着敌视西方列强的调子，因为那时“不平等条约”仍然束缚着中国，另一特点是想在共产主义和孙逸仙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之间谋求一致。

《三民主义》虽则是仓卒成书，其缺点表现在未予澄清的含糊和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它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著作中所获得并保留的地位，正如《法理概要》在查士丁尼的《罗马法111典》中所获得的地位一样。它成了党的课本、信条和口号三位一体的一部教义大全。正由于此书有着难以洗涤的共产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人方面便抓住《三民主义》不放。1927年国共分裂

以后，他们便自称是孙逸仙的这一主要著作的唯一正统的阐扬者和实践者，并谴责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所确立的原则。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于1939年10月所阐明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民主义》为当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提供了眼前的最低纲领；但一待时机成熟，接着实施的便将是最高纲领，以扩大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通过阶级差别的消灭而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响亮地宣告，他们的思想和最终目的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的革命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他们说到做到，在他们的军队里和他们统治的平民中间有力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与

见《概览，1926年》，第283—284页。

见《概览，1925年》，ii.315—316。

见《概览，1928年》，第413—419页。

见《概览，1927年》，第334页以下。关于保证忠于孙逸仙三原则的1937年9月22日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见《概览，1937年》，i.159—160。

此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其固有文化遗产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悠久，即便如今已濒于毁灭，但其精神力量仍未可忽视，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不甘心听任国民党独此一家地标榜：它在保存国粹的最优秀部分，并兼采近代异邦的最新变革。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在一篇批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扬的国民党学说的文章中，认为有必要反击一种反共论调，即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受了外国学说的蛊惑，他们“瞧不起自己同胞，屈从外国人”。发言人在高举党的正统共产主义旗帜之后，描述了这样一条路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并决定政策，然后依靠自己的人民求得解放”。发言人甚至坚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固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孙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国。“反动派要取消进步传统而保存其落后部分，我们则恰恰相反。”

112 我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理论转向实践，便会看到这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它们所争论的各点呈现出另一幅景象。从他们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比他们自称的更多的中国色彩，而国民党信仰孔子的迹象却并不怎样突出。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致全力于两个当前目标，即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使农民摆脱当地农村债主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种行动看来是真诚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显然是他们能在自己建立其统治的乡村地区获得当地农民大力支持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对他们恐惧和怀恨的原因。至于国民党，自其创立者孙逸仙于 1925 年逝世后，接着到 1928 年间在国民党旗帜下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价则是国民党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乡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为数虽不多而已颇有势力的中国房地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学会了西方的买卖花招。这些善于算计的在最后时刻改变信仰的人就这样巧妙地掩盖了——却未能一举扑灭——孙逸仙本人所强烈向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孙的理想依然活跃在忠诚的少数派中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把他们的抱负作为国民党的正统思想，那些如今已占优势的保守主义分子则认为只要在口头上玩些花招便能挫败他们。国民党自由思想余烬的堡垒就是那位先知自己的家庭——这时是以宋氏一家为中心，先知本人和继承其领袖职位的蒋介石都娶了宋家闺秀。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孙逸仙的遗孀，当时由于对他们的那仿英雄的正式继任人的作为一再感到失望而终于被迫倾向莫斯科，但孙逸仙夫人的妹妹蒋介石夫人，则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主体破裂，便运用她的全部影响促使国民党尽可能沿着自由主义的航道行驶。然而，宋家的自由主义之不象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共产 13 主义之不象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或许还更为不象。这种变了质的现代西方思想，在道德规范方面肯定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中国儒家的教导。国民党的尊孔，与其说是

当然，俄国也是这样，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初期也曾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

见《概览，1928 年》，第 279—290 页。正如摩西和穆罕默德一样，孙逸仙也没有能活到目睹他的信徒们的胜利，他们的胜利不免使先知自己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个人小成就相形见绌了。

可比较希腊—罗马社会的富有阶级在罗马帝国正式改宗后占领基督教教堂的情况。

见《概览，1927 年》，第 385 页；《概览，1930 年》，第 339 页。

指曾任首相的英国自由党领袖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 年)。——译者

遵循，还不如说是破坏——这个爱新奇的羽毛未丰的政党专喜兄弟阅墙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是中国旧政权的规章制度所严加防范的。

（四）中国传统

虽然近在本世纪初旧政权还在活动，但到了 1939 年，它就象埃及法老和古罗马恺撒政权一样寿终正寝了。在其鼎盛时期，它也很好地适应了一个文明社会的需要，因为那时它尚未同西方接触，因而还没有迫使自己经历工业革命的必要。它的主要制度是职业文官体制，经过竞争性的考试，从一批具有必要教育程度的士子中录取官员。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虽然很高，但应考人员的范围颇广，所以能被录取而当官的人才也很可观。促使这些文官同心协作的是一种团结精神和一种当官的传统行为准则，以及千百年累积起来的大家都以此为依据的那一套“老经验”。他们统治的秘方在于避免管得过多。象在罗马帝国初期略带共和色彩的帝政那样，听任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派驻各省的代表拥有北京授与的广泛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只要他们缴纳应交的赋税，在应付紧急事务方面不会束手无策。但除经常发生的水灾、饥馑和民变这三大灾祸外，也很少出现其他方面的事变。

此种配合良好的治政手段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是可以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的，但在中国忽然进入西方世界的社会机体，因而处于所引起的又新又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难以产生往常的结果，于是这种手段也就不再被人信任了。因此，1911 年的革命把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第二世纪的体制扫除了。结果是，在人心动荡的 1939 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恶浪中搏斗，连一条支持他们先人浮沉在较平静的水面上的救生带也不可。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中国的任何政府所面临的都必然是令人棘手的艰巨的行政工作。历史上的危急事件并不因为处 114 理这类事件的传统手段已被抛弃而不再重演；如今由于战争以及由于同西方的交往而导致在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而更加重了这类危急事件的严重性。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是，灌输给长期来迄今还在受苦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外国事物都是他们所不满意的，而这些又都是西方灌输者称之为“神圣的”。正在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希望却偏偏在中国升起了，此种介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愈来愈扩大的鸿沟，即便是最能干的政权也难以跨越。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比起它们所取代的古老政权来，却显得又粗鲁又拙劣。尽管它们彼此仇恨，它们都是自封为一党专政的翻版。当时在进行西方化不得法的其他国家里，以及在政治上比较落后的西方国家自己，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中国，也象在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此种政体也许可以设想为在它们所处的情况下的，一的切实可行的体制，但肯定是不适合于一个正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需要的。

在这种令人忧心忡忡、苦思焦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任何尚未因追求西方技术而完全丢弃中国文史研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还是能够提供鼓舞的。一位中国的文人学士可以思考：在比它自己的纪元年轻得多的一个纪元的第一千九百四十年，中国人民的人数已比在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的以前任何一个日子都更多了，中国的领土也更广大了；自从同以色列和希腊的诞生属于同时代的中国历史的黎明以来，中国——不象那两个天赋独厚但已垮掉的现代西方的先驱者——不仅能够设法生存下来，而且正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致使它在 1939 年成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人口最多和年岁最大的一个。尽管当前有着种种苦难,一个研究其人民历史的中国学者很可以充满信心他说,不论西方及其作用会发生怎样情况,“中华王国”将继续留在地图上。

第五节 日本

阿诺德·托因比

（一）西方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 1939 年是七大强国之一，它是在八十七年前才进入这一强国之林的。那时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凡是非西方的社会都处于又困难又危险的境地，到那时为止，惟有日本和俄国依然还能控制局势，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所难以做到的。日本用同世界各地隔绝的办法以应付此种西方的冲击问题大约有二百五十年之后，便在 1853—1854 年间改变了这一政策。当时并不希望而又无法抗拒的由柏利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了日本，这说明闭关主义是不顶用了，并说明了西方人那时所达到的熟练的技术水平，如果日本不把他们这一行的最新诀窍学到手，而且要学得快学得精，那末它将发现自己会再度听命于西方。

在日本历史的这一卓越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访问过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对于日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象本文作者在 1929 年那样取道印度和中国前往日本的话，其所得印象当更为强烈。但是，这第一个印象马上就被第二个印象所压倒。第二个印象也同样强烈：日本人取得物质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许是高到吓人程度的心理代价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论男女，亦不论属何阶级，看来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象背着千斤重担。就内心舒但而论，他们的境遇也许还不如一个吃不饱、穿不暖、栖身破屋的中国苦力或印度农民生活得那么愉快。

（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

这些令人不堪折磨的个人忧虑的终极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不同于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却是和它同时发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岛的人口是三千一百万；到1939年已经增加到近七千三百万左右；而在1935—1940年间，仍以百分之五点半的净增率继续增长。这五年期间的增长百分比是惊人的，即便还不及1925—1930年那五年的高峰数字百分之七点九那么惊人。

这样大的人口压力是日本的严酷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梦魇。在早先的时代，日本人民向北扩张，挤走该群岛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从而为它不断增长的人口找到出路。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之交建立德川政权以前的四百年间，由于有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愈来愈大的内战，他们的人口才没有增长；在德川政权的和平时期，他们通过其他的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人口；这种人为地把人口保持在116不增不减状态曾经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础，是德川政权要把日本生活冻结二百五十年之久的企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便说这种企图只是取得了局部的而且是逐步减小的成功。明治维新总在用同样彻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过程来取代彻底控制下的闭夫制度，新时代的政治家们在追求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们未能保持住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先前对出生人数的抑制，由于文化变迁的潜移默化而随着从前习惯的废弃而消除，一个新的抑制——即对死亡人数的抑制——却由于现代西方卫生学成功地传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长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这一社会不幸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便变得那么缠扰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们的治国之才迄今尚能设法保持的那种审时度势的主动自由，大有被剥夺以去之势。

人口按这样的幅度增长，对于处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严重的难题；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情况更有几个特别不顺遂的特点。日本的天赋自然资源不论拿何种类型的经济来说都嫌贫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不宜于放牧；矿产之贫乏又绝不亚于意大利。

自然地理的这些无情事实给它的食品生产和它利用本国资源无论为轻工业或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生产都设下了严格的、狭窄的界限。因此，新体制下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额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过剩的人口，或者通过提高生产率，做到以日本制成品去购买外国食品和原料，为国内多余人口谋生计，从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这两种理论上说来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的前一种，在1939年事实上已无法考虑了。

在日本本土及其祖先留传的各岛中，有铜、若干劣质的煤、一些铁矿和少量石油。在1939年，日本可以自由支配的蕴藏量最富、最容易开采的煤矿和铁矿是在它的傀儡国家满洲国——特别是在南满。

（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人口问题的尝试失败

本来，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他们坚持奉行那个最后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闭关政策竟达两百多年之久。十七世纪初，日本人曾经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当时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术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他们进行着横渡大洋的远程航行，他们有着象英国人和那些属于英国人后裔的人民一样的机会去发现并殖民于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但到了1854年，这种机会已经错过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个办法，即发展其产品供出口的制造业，也已证明是靠不住的。

当日本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进入西方经济生活圈子的时候，当时的西方化世界仍然处于国际贸易的比较自由的时期，市场也仍在扩大，因而日本还能够找到一条虽属平常但仍有利可图的生存之道，它制造消费品供应那些经济上落后、买不起西欧和北美工业所制高级产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于美国在内战以后以及德国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实行保护性高关税而开始的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夺来的市场已经以与当初夺取时的同样速度失去了；又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大跌价”而降临世界的“经济暴风雪”摧毁了日本国际贸易，并把日本政治命运的控制权从信奉“曼彻斯特学派”政治经济原理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们的纲领是要用刀劈开“戈尔迪之结”。美国生丝大跌价对日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在前此十年中美国对日本生丝的消费量不断增加，使日本农民因卖得好价钱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艰难的生活挣扎中勉强糊口而已。日本农业人口是日本的主要兵源，不但日本的一般士兵，而且连下级军官也都来自农民。这些下级军官（他们来自当俄国大清洗时称之为富农的那个阶级）同他们指挥的士兵关系密切，后者感到他们的官长理解并赞同农民的观点，因而愿意跟着他们走。所以1929年及以后几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几乎是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打击（不过，当然完全是无意的），而且还加强了他们所深信的想法，即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只有通过对外征服才得解决，此外别无他法。

随着生丝危机而来的，是英联邦成员国1932年渥太华会议对日本的影响。虽然渥太华协定没有直接对日本贸易造成很大程度的损害，但这些协定揭开了联合王国财政政策中的一场革命，把英国的非自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卷了进去，结果是把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巨大自由进口市场变成了封闭区。英联邦各国人民在这一封闭区内通过一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组成的精心设计的体系继续享有特权——同区外人对比——的经济地位。英联邦及英帝国就这样自觉自愿地变成了后来日本人委婉地称之为“共荣圈”的一种组织——日本为着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后来不惜以日本的武力也把一种类似封闭经济的体系强加于其他东亚国家。就这点而言，渥太华协定对日本以及对其他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见《概览，1931年》，第197页以下。

见《概览，1931年》，第400页注。

见《概览，1932年》，第27—34页。

(四) 军国主义的复活

如果已没有气候宜人的空旷大地留待日本去殖民，如果在国际贸易基础上有利于建立工业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又必须听命于非日本所能控制的干扰力量的摆布，那末日本就再也无路可走了（重新掌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论证的），因而日本只能为它自己征服一块领土，为它提供必要数量的必要原料和市场，而且不管日本的共荣圈范围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还是能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剥削。

此种思想在此重大关头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因为日本人对它早已心领神会。决心投入战争和进行征服不是什么新政策。在整个十八世纪，王政复古运动的支持者们一贯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同这一国内政治革命纲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象吉田松阴等一些导师们所提出的政策，1868年实现王政复古的那一批氏族武士领袖也都是吉田培育的。吉田还亲自规定了日本扩张的方向；王政复古以后，只是为了谨慎行事，而且准备也还不119足，所以日本尚能克制。日本的许多主要人物想立即侵入亚洲；他们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引起了一场内战（1877年的土族的叛乱），为的是要就是否应当发动战争作出决定。如今，对于日本的这个新的“富农”军人阶级来说，正如同对于旧时代的武士军人阶级来说一样，这一尚未正式出笼的对外征服政策，还不仅是一剂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丹。在经济方面，日本虽然受到了1929年以及其后几年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景气的沉重打击，但其所受打击的程度还不及英国和其他国家那么沉重，而这些国家都终于克服困难，根本没有梦想到要象日本人那样求助于军事侵略。当时英国的人口问题和食品问题都比日本严重。日本成功地保全了它的农业，并把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用国内生产的粮食养活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日本在对外贸易的支付方面也一直能维持到1936年，那年它既要在国内扩大重工业以推动军备生产，同时又要要在满洲搞五年计划，因而犯了力不胜任的错误。在军人阶级心中所作的决定性考虑，并不是从经济或人口方面出发，而是从社会和政治方面出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的后来几年中，日本在亚洲大陆军事冒险的惨败，给日本军人阶级在国内的威望以沉重打击，这次失败是记载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录上的，是英语国家在外交上击败日本的一大胜利。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只要幣原男爵对世界其余国家所玩弄的“睦邻”政策取得优势，日本军人就感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日益衰退。如果幣原体制继续在经济上带来利益而又不需要作出军事牺牲，从而继续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日本军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日本军人阶级无疑也和其余人类一样遭受到1929年经济暴风雪带来的困苦，可是他们不能不欢迎这场刮到他们膝头上来的暴风雪，因为这是一个恢复他们自己那时业已深受损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意外机会。

日本从镰仓幕府以后，政治实权由将军掌握，天皇受将军控制，所谓王政复古，指将政权交还天皇。——译者

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以前反对幕府、拥护王权的思想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都是他的学生。——译者

关于1931—1938年期间日本的经济政策，见《概览，1938年》，i.96—101和531—544。

《概览，1920—1923年》，第456—471页。

（五）1939年3月日本的地位和前景

到了1939年春天，从日本终于采取它的军国主义者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了七个半年头了；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新领导们似乎已经用成果证明了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了。日本违犯国联盟约并对抗西方世界的舆论，已经用武力从中国手里夺走了整个满洲。那里有着丰富的煤、铁储藏，那里有着广阔的可耕地，居住着亟需消费品的中国勤劳农民。而且，自1937年夏季以来，日本进而又占领了中国关内东北部的的主要交通线和都市及工业中心。还有，为了进行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一如日本人口那样，正在起劲地扩大——日本业已在国内建立起它迄今缺乏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重工业系统。从表面上看，1939年春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较之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卓越；可是在表层下面，在那场暴风雪突然发作或一切已成定局以前，就有充分根据可知早在十年前就因日本人脸上露出皱纹而显出其身体欠佳了。

到了1939年，凡是有点眼光的人都已看清，日本在大陆上的军事冒险并不能按计划进行。满洲确有财富，而且日本这时已把它抓到手里了，但满洲的财富大部分是潜在的，不是现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满洲经济情况很象一百年前的密西西比流域。要是在其巨大的潜在资源方面投入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创业资金，它是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十九世纪的美国拓荒者，能从当时繁荣的欧洲筹得必要数量的贷款——而且筹款容易，这就使他们能以闪电式的速度赢得了美国西部。但是却没有外国投资者愿意资助满洲的日本征服者；这一笔必不可少的资金支出必须仰赖于日本自己的资源，而日本的资源则又捉襟见肘时，这就决定了收益的迟迟其来。到了1939年，日本既要在国内建立重工业，又要为满洲国的主要设备提供资金，还要在一条日益扩大的战线上进行没完没了的侵华战争，这三方面的重大压力开始使日本疲于奔命了。这不是一个使用其过剩劳动力的富有成效的办法，甚至连一个解决人口问题的笨办法也说不上；因为它在中国战线上的重大伤亡固然意外地减少了自己的人口，但比之它每年因各种原因而出生多于死亡的过剩人口，战场上伤亡造成的人口减少只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血而已。

掌握“内幕消息”的日本观察家也不能自我安慰地指望：如果日本能够坚持到它完成满洲国的开发和对中国的征服，那它就会达到在一个受它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标。如果劈开这个“戈尔迪之结”所需要的兵器仍然是那把古旧的刀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心里乐滋滋，因为作为刀剑匠，除了大马士革人，他们是举世无双的。然而，在一个西方化的世界里，劈开结子的武器却是工作母机，这方面日本就不知所措了。它在学会西方技术本领方面固然在过去的八十五年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但是它的擅长西方式冶金的专家，就象它的这一行业的原材料一样，仍然少得可怜。这是一个瓶颈，堵塞着它整个新的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地限制了工作母机制造业，而其他一切冶金加工都有赖于工作母机的制造业。1939年，日本仍然不得不从国外——主要从美国——购买几乎所有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

见《概览，1937年》，i.180—225；《概览，1938年》，i.504—531。

见下文，原著第446—452页。

日本确实还从它的侵略事业的同谋德国那里取得一些此种必不可少的装备；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它还

器，以应付它正在强行迅速扩大的机械工业各部门的需要。它在为实现机械工业的独立而培养必要数量的掌握必要技术的技术专家方面所要花的时间，比它把满洲的铁矿石开采量增加到可以不用进口外国“废钢铁”，从而实现原料自给自足所要花的时间还要长。

因此，日本沿着如此危险的政治道路所迫切追求的经济自给自足，在1939年还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一些外国在1929年以后突然对日本关闭了它们的市场，致使它的轻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同样有力量可以使日本在目前为征服足以自给的经济领域的事业受到挫折，它们能够断绝它的幼稚时期的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日本目前所蓄意策动的对外侵略政策，已使若干大国产生一个新的动机，想要在日本业已摇晃的车轮上塞进一恨煞车棒了。在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期间，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曾经那么沉重地打击过日本，当时那样做在意图上尚未怀有敌意，但却没有考虑到会对他人产生的后果，而到了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这种同样不顾后果的做法对日本却仍然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早期，外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曾经对日本封闭了它们的市场；1939年，它们开始切断了对日本的供应，那是因为它们要为即将在欧洲爆发22的战争作准备，它们为供自己使用而建立起重工业的军事利益，这时已日渐超过了它们从对日贸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日本的新侵略行径那时又激起了民主的工业国家另一个动机，即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从长远看，尽管这另一个动机也可以部分地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利己主义，但它却是部分地更加利他的，因此也就更加不容轻视。特别在美国和英国，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侵略者应当受到抑制，受害者应当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便当时的侵略从狭义上讲，并没有直接威胁到英语国家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一词在习惯上是作狭义解释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逐渐感到，按照范围更广、看法更清楚的解释，热爱民主的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正是他们的原则所规定的这个政策，因为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自由地遵循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一个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仍然可以逍遥法外的世界里，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没有继续存在可能的。

日本的侵略行为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心里所激起的不满和忧虑还没有以任何积极的政治行动表现出来，日本人还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使自己相信，他们在这方面不用害怕。那时英国毕竟要以全力忙于应付欧洲爆发新战争的威胁，美国又似乎无意以牺牲它自己所钟爱的孤立去促进一个能保障民主安全的世界的实现。然而，对劫数难逃的日本人说来，凶事的初步预兆已经隐约可见了。虽然还没有第三方公开帮助中国人抵抗他们的日本侵略者，日军仅仅由于中国土地之广大、地势之艰险就已经前进不得了。这个阶段出现军事上的僵持是使日本人感到沮丧的，因为征服和统治中国乃是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下自给自足的东亚共荣圈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如果日本在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英国和苏联忙于欧洲事务而造成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尚远远未能达到它在中国的目标而处于“阻滞”状态中，那末，它的前途又何堪设想？即使在那位写判决书的天使笔下添上“诺门坎”一词，或祸不单行

得依靠这个或那个外国来源，这倒不是一个不良的来源。它本可以在住后的日子里更大量地以满洲的大豆从德国手里换取它在这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后英国对德国的封锁，阻止了此项贸易的发展。

地在 1939 年 8 月又宣告达成苏德交易以及在 1939 年 7 月美国政府宣告废除现行的日美商务 123 条约以前，仅就 1939 年 3 月日本在中国所处的那种军事形势而言，就足以使日本人感到万分沮丧了。

日本人的政治信念之荒谬更使他们当时面临的处境具有讽刺性。对一个冷酷的外国观察家说来，从物力的统计数字上估计一下日本的侵略力量，就可以知道，即便是它想用全力把整个东亚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当前计划，看来也完全是难以实现的事。然而，一个虔诚的爱国的日本人如果不把当天的议事日程视为日本的非办不可的一部分事务，而竟容许他自己产生什么别的想法，那他就犯了“思想危险”的罪。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日本人当时有责任相信，日本的终极使命就是征服全世界。日本不是众神之乡吗？在它中间不是有着一位永远体现在在位天皇身上的当今之神么？这种自作自受的政治迷信就象一扇磨盘一样挂在日本人的脖子上。无论在日本或日本以外，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在 1939 年春天梦想到，在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日本的命运乃由神定的神话——曾经幸免于柏利准将的显灵——竟毁于美国的一颗原子弹。

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

第一节 中东

乔治·E·柯克

（一）中东在地缘政治上的历史作用

1939年，中东虽然在幅员上相当英国诸岛的三十三倍还多一些，但其人口却不到英国诸岛的两倍。该地区的大部分是人口稀少的半沙漠，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有限的几个地区。然而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却是和它的低密度的人口以及这一点所代表的不发达经济完全不相称的。

中东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最早文明的中心，它在当时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方编年史上的“中世纪”，那时它的水平才开始下降，军事和政治部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时开始赶上前来西欧仍需要中东作为它的中转站，以便取得远东的昂贵难得的产品，它们无论在数量上或品种上都多于中东所能供应的。中东作为贸易中心的作用由于十字军东征而加强了，可是在公元1500年发现了驶往印度的较为畅通的好望角航路以后，其重要性便大大地降低了；中东在经济上因而成了一泓死水，其古老的土著文化看来也已到了衰朽阶段。

然而好动的两欧人是不会完全置中东于不顾的。从他们在印度洋的商业统治权处于萌芽时期开始，就在为贸易而探索驶入波斯湾和红海的航道；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地中海同利凡特海岸的贸易联系；而到了17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用信使从阿勒颇到巴格达传递快件，并且在实地尝试跨越苏伊士地峡的一条陆路捷径，因为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要有五个月的航程，而这条路则可以缩短一半时间。一个世代以后，拿破仑入侵埃及及并与波斯勾搭，是为推翻在印度的新的英帝国而作的准备；在拿破仑最终失败后，英国为确保其印度领地以防范欧洲国家的觊觎，曾设法使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生存下去，以便作为插在印度和欧洲之间的缓冲物。一般说来，此项政策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是成功的，尽管英国曾被迫于预过这奥斯曼“缓冲区”外围的薄弱地点，因为那儿是那么弱小，或则竟成了一无掩护的地方，以致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渗入；所以英国便通过自己的“保护”或直接管辖这一类坚强的补缀措施，以加强这些薄弱地点——埃及、阿拉伯南部、波斯湾。但到了1900年，奥斯曼帝国已被置于英国的最新敌手——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拆散了奥斯曼帝国，由自己取得了对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这些阿拉伯领土是“肥沃新月”的双臂，跨越了自地中海到波斯湾的数千里捷径，而且还包括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北方陆地入口，又由于埃及和亚丁被英国占领，所以也早已包括了西面和南面的通道。利凡特沿海地区在过去三百年间同法国的关系（主要是文化性质的）比同任何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更密切。所以法国要求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归还给它也是很自然的了，英国对此是同意唯恐不及的，因为法国的力量已不足以对英国在整个中东的霸权提出挑战了。

一般参阅 H.S.德顿：“阿拉伯中东和现代世界”（H.S.Deighton：“The Arab Middle East and the Modern World”），《国际事务》，1946年10月，xxii.511—520。波斯和阿富汗是插在印度和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类似的但不甚重要的缓冲区；英国为了加强阿富汗摇摇欲坠的独立和防止俄国势力渗入阿富汗，曾在十九世纪进行了两场战争。

A.H.胡拉尼：《叙利亚和黎巴嫩》（A.H.Hourani：Syria and Lebanon），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6年版，第146—157页。

（二）民族主义对帝国权力的挑战

在 1918 年以后，对此种英法帝国利益结成一体的第一次挑战来自中东自己内部的上层少数派。构成埃及和“肥沃新月”人口绝大多数的并成为其经济基础的是农业耕作者，他们几乎没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影响，正如过去大约两千年来曾相继统治过他们领土的外国征服者未曾影响他们一样；但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城市却是一个有产者上层阶级的安家之处，这些人过去对在中东起作用的不进入的外来文化是敏感的。这个阶级自西方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蛰伏状态，这是伊斯兰文明自我撤退的结果，也是由此而使中东相对说来隔绝于西欧活动的激流之外的结果。然而，这种蛰伏状态并不意味着这个统治阶级的内在的心智能力有任何根本的退化；它对十九世纪大为增强的西方影响的冲击作出了反应，那就是为时已晚地开始进入外在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又通过西方教育吸收了诸如“国家”这样的自由主义概念——将它置于拟议的同一文化、同一语言或同一种族特征的基础上——并据以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此种民族主义运动当然要同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奥斯曼帝国是靠军事起家的，但它象较早先的穆斯林军事王朝一样，是从伊斯兰教的人人皆兄弟的理论中得出了它建立帝国的依据的，而它是伊斯兰教的神命保护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最终推翻奥斯曼帝国运动中确实起到了他们的作用——一种次要的作用；但他们同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亚洲诸省的英国和法国托管政权在观念上有着更大得多的根本性冲突。这些政权既是异邦人，又是异教徒；而且它们带来的新的影响很可能妨害有产者上层少数派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落后的奥斯曼政府却不曾妨害过他们。在当地的上层少数派看来，这些欧洲政府为了要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在利凡特诸国偏袒当地的基督教徒，在埃及偏袒欧洲人或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伊拉克偏袒无家可归的亚述人，甚至还鼓励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些都对它们自己不利）。这些国家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以及公共卫生等具体事务方面，从欧洲人的行政设施中获益颇多，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上层少数派感到宽慰，他们对政治独立失望了，因为（他们认为）确保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最佳办法便是保持“现状”，或则至多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并有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才得加以变革，而当前迅猛变化的影响所及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而且势将促使城市工人觉醒，最终还有受剥削的农民，他们将进而组织起来提出经济要求，那就必然会侵害工人和农民的传统主子的利益了。

参看 A.J.托因比；《历史研究》（A.J.Toynbee: Study of History），第 4 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9 年版），第 5—6 页。（此后简称“托因比：《研究》”。）

中东各国农业方面的雇农百分比在 1934—1935 年的估计如下（艾尔弗雷德·邦内：《中东的经济发展》（Alfred Bonné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修订本（伦敦，基根·保罗、特伦奇、特罗勃纳，1945 年版），第 51 页]：百分比土耳其 82 伊拉克 81 外约旦 80 叙利亚 77 埃及 71 塞浦路斯 59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57 犹太人 19“土地所有权是建立在一个复杂而古老的制度的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类似封建制度，但是，除少数例外，那些对大面积土地拥有绝对或世袭所

参见 H.A.R.吉布：《伊斯兰教》（H.A.R.Gibb: Mohammedanis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 年版，第 144—146 页。

（三）妥协的尝试

在 1919 年到 1939 年期间，埃及和肥沃新月的政治历史上占显著地位的是，上层和中产阶级（后者由于教育的普及人数愈来愈多，其重要性亦与日俱增）为摆脱英法控制而结成民族主义联盟所作的努力。在从未建立起欧洲直接统治的土耳其共和国和波斯，类似的运动是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并排斥大约自 1850 年以来便盘踞在那里的强大的欧洲经济利益集团。英国在埃及和伊拉克很快就体验到的是，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阶级少数派能把不问政治的群众多么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唤醒他们反抗外国统治，所以英国便分别放弃了对这两国的保护和委任、128 统治，并把相互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1922 年、1924 年、1930 年、1936 年）。诚然，这些条约仍然是不平等的，但至少已承认了两国的主权和自治，这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也确实具体收获；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些条约是走向完全独立的目标的过程中可以暂时接受的折衷方案，不过也仅限于此。法国怀着重重疑虑，在它同利凡特诸国的关系中还是走同样的路，它推迟批准同叙利亚的第一个条约（1936 年），尽管 1938—1939 年险象环生的世界局势授它以推迟的口实。在那些由于奥斯曼帝国被瓜分而在亚洲出现的国家中，只有巴勒斯坦因为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突的特殊问题，仍然处于欧洲的直接统治下。

这两个欧洲大国在作出这些政治让步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设法成功地保住了它们在该地区的基本利益。中东对英法来说仍很重要，因为它是一条通往远东的商业和战略交通线。英国军队必须据有象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以及用于空中交通的利达和波斯湾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据点，这一点已可放心了。曾经有人怀疑英国在故时能否保持这些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畅通，并有针对性地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曾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而“好望角派”战略家则主张依靠那条虽则较长但不那么 129 易遭侵害的好望角航线。但他们的论据遭到批驳：

放弃地中海作为英国通往东方的主要路线这个问题不能仅凭它是用作为一条水道来解决的。把它无条件地交给外国去控制，对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将产生令人极度灰心丧志的影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埃及被入侵……巴勒斯坦被占领，同时会使英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心目中的威信扫地以尽。

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意大利在 1936 年巩固了它的非洲帝国，这给英国在地中海的帝国战略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虽然这个新因素的确切含义当时还看不清楚。一方面，以地中海和东非为基地的意大利军队能使东地中海和红海成为反对意大利的国家的特别危险的航路；但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以中东为基地的军队的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意大利同它的帝国之间的交通，况且意大利又极度缺乏进行战争的一切必要资源。

这类必要的资源之一是石油，中东本身就很丰富。中东油田的开发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其规模也还不能同美洲开发的油田相匹敌。1937 年，英国从中东油田得到的石油只占英国消费量的百分之二十二；但中东油田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当时正在小心经营的生产量，却在于业已逐渐探明而尚未开采的巨大蕴藏量，对比之下，美洲和俄国的储藏量则正在逐渐减少。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者美国，也已开始（在 1933 年）买进阿拉伯油田作为立足点，其

成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成为十分重大。且不谈是否愿意的问题，中东国家自己在技术上是决无能力勘探、开采和提炼这些石油资源的，因此，石油资源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理由，说明了外来的大 130 国为什么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对大量油田的发现并不感到严重不安，他们对此往往还抱着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够西方化的了，所以不至于反对进一步的西方化影响（只要不导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工联主义的传播这一类麻烦）。而且，资本发展的成本可以取之于石油公司上缴的巨额“石油产地使用费”，这一事实可以为主权国家的外表（文官薪俸、官僚机构、驻外外交代表、武装部队、公共建筑）的浩大费用列入正常预算提供资金，并且还有剩余可以用于象公共卫生和初等教育这一类不那么壮观的事项。新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已通过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个人的权力，摘到了当官的果实，他们心满意足，

在观点上很快便趋向保守。由文官和专业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这些人意识到他们国民生活的短处，急着想通过认真而切实的努力加以改善；但是他们没有有效的组织，其程度甚至还远不如世界其他各地的同类组织，因而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四) 不妥协者以及他们之被轴心国利用

政治上的“温和主义者”准备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监护着他们国家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作出策略上的妥协，而“极端主义者”则只接受完全的和即刻的独立，这两者之间的分歧从上层少数派的“拥护者”一直扩大到下面较131低级的中产阶级知识份了阶层的“追随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发达，部分是由于中东向往于被纳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轨道而产生的实际需要，但也还有第二位的原因，即出于提高国家威望和效法先进的考虑。但对于如何将青年的学习同一些向他们开放的在经济和社会上可以做的事情相联系，却不够注意；结果是——在埃及尤其是如此——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批过剩的年轻“阿凡提”，这些人无一技之长，什么商业或高级职业都干不了，回头去干他们父亲干的那种比较平凡的活儿吧，又因受过一些教育而显得不相称。在巴勒斯坦，英国向犹太复国主义所作的承诺使阿拉伯上层少数派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那位民族领袖（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对这一阶层几乎具有无上的影响。然而在中东的其他国家，上层少数派已从暂时默认同英法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而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当英法豢养的宠儿们感恩戴德地继续其同主子的寄生关系时，另一些被摈弃在此种恩泽之外或坚持政治原则而不愿同“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便脱离他们而转入颠覆性的半地下组织（部分是由于这些人被取消了按宪法应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部分则由于这些人生来爱施阴谋诡计），并集结于某个领袖的周围，在这些支持者看来，这位领袖是令人感动的，而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他只是个狂热者。

就德意两国政府而言，它们在充分利用中东极端主义运动方面的行动绝不缓慢，它们气味相投，是由于它们都同样反对英法，都同样崇拜“一个领袖”的原则。某些阿拉伯极端主义领袖曾在德国受过部分教育；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37年的中东之行可以使一个受到他庇护的地方领袖身价百

此种在政治上划分为“极端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同托因比所阐明的在文化上可分为“狂热的反对派”和“盲目的支持者”是截然不同的（见《文明在考验中》（*Civilization on Trial*）一书的“伊斯兰教、西方以及未来”，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87—212页]；参阅《概览，1925年》，i.6—7。例如，“狂热的反对派”瓦哈比运动的领袖伊本·沙特自从他为自己取得了阿拉伯的君权以后就在国际政治方面变成一位“温和主义者”；同样地，塞努西首领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一位国际上的“温和主义者”，因为他希望因此获得君权。另一方面，在“肥沃新月”各国和埃及，有不胜枚举的文化上的“盲目的支持者”变成了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不论是为了提高个人的地位，或为着追求他们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的某种政治原则，他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获得权力。

原文是“effendis”音译为“阿凡提”，意为“先生”、“阁下”，过去是阿拉伯人对外国人的称呼。——译者

一方面，“这样说也许不会不确切，即埃及的人口密度——相对于资源总额而言——高于联合王国八倍”，而另一方面，“埃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比联合王国高十一倍”。K·A·H·默里：“中东的某些区域性经济问题”（K.A.H.Murray：‘Some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国际事务》，1947年1月号，xxlii.13；A·S·埃班：“中东的某些社会和文化问题”（A.S.Eban：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of the Middle East），同上，1947年7月号，xxiii.370—371。

见《概览，1934年》，第100—109页；《概览，1936年》，第720页注；《概览，1937年》，i.568—571；《概览，1938年》，i.415—416，445，458注。

倍；据说，轴心国的津贴给寒枪的团体布置了漂亮的俱乐部会客室，就这样为无所归属的青年提供了参加这些团体的物质上的动机。__对极端主义青年运动的此种鼓励，只是自 1935 年以来德意在中东所发动的反对英法的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是一个较小的方面。广泛和耗资巨大的宣传是通过接受津贴的通讯社、广播、电影和教育机构进行的。随着沙赫特的 1936 年访问之后，德国在发展互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往往以高于世界市场颇多的价格购买农产品，然后以德国军械和工业品作为交换。到了 1937 年，这两大强国集团已在为控制中东而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斗争，即使是那些最迫切希望自己的领域不受欧洲势力干扰的穆斯林统治者，也不能漠不关心地超然于局外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和也门的伊玛目都派代表参加了 1939 年初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在 1933 年便同美国石油界订立了开发其东海岸油田的契约，孤做得多的伊玛目叶海亚则同英国、意大利、苏联和日本等迥不相同的国家都订了各种条约。

参阅塞思·阿塞年：“中东的战时宣传”，《中东杂志》(Seth Arsenian：“Wartime Propaganda in the Middle East”，*Middle East Journal*)，1948 年 10 月号，ii.419—421；内维尔·巴伯：“向阿拉伯世界广播”(Nevill Barbour：“Broadcasting to the Arab World”)，同上，1951 年冬季号，v.58—59，63。齐亚诺记录了巴里电台的阿拉伯语反英广播使他如何偶然为一位黎巴嫩主教的兄弟找到一个时事评论员的工作。加里佐·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Galeazzo Ciano：1937—1938 *Diario*)，以下称为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波洛尼亚，卡佩利，1948 年版，1938 年 1 月 24 日日记。

见《概览，1936 年》，第 526—533 页；《概览，1937 年》，i.465—495，《概览，1938 年》，i.43—69。在 1938—1939 年，土耳其和波斯同德国的贸易分别占它们各自的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五和百分之三十一。德国同埃及的贸易则仅久于英国而占第二位。

见《概览，1933 年》i.446。

（五）结成区域性联盟的尝试

强国活动的增强促使中东国家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试图在它们自身之间结成一个共同阵线，以免逐个地成为它们所不能左右的敌对政策的毫无希望的牺牲品。¹³³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在接着成立的各国间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争端，要不是英国施加影响从中斡旋，这些争端是会导致许多次小型战争的。土耳其共和国同伊拉克有着边界争端，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强行调整了它同叙利亚的边界。波斯一直都在为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界争吵。沙特阿拉伯事实上一直在同它的邻国也门打仗，而伊本·沙特同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又有着二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和边界争端，后者现在是哈希米家族的首脑，这一家族曾在奥斯曼政权下正式统治麦加，并自那时以来一直为外约旦和伊拉克提供统治者。尽管埃及同阿拉伯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但它们的关系向来都是不亲密的。埃及的政治家们一直专心致志于为自己摆脱外国控制而作努力，国王福阿德则指望同欧洲而不是同阿拉伯亚洲促进文化联系。只是由于在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移民浪潮高涨，日益威胁着穆斯林在巴勒斯坦的地位，这才促使阿拉伯统治者凑合在一起；首先是1936年试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进行调解，而后又比较正式地在1939年举行圆桌会议。虽说此种联合是由于中东内部存在着危险的结果，但1937年由土耳其、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缔结的萨达巴德公约则是企图通过相互保证以防某个外国危及它们的生存，因为这一时期大国的纷争正有增无已，国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又告失败。土耳其既是1934年巴尔干小协约的成员，又同俄国有着友好和中立的条约关系，那些条约可以上溯到1921年，所以它作为东欧和中东之间的一座桥梁的特殊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见《概览，1925年》，i.471—531；《概览，1936年》，第767—783页；《概览，1938年》，i.479—492。

见《概览，1936年》，第793—803页。

见《概览，1936年》，第783—793页。

关于圆桌会议，见《概览，1938年》，i.440—458。1931年在耶路撒冷还召开过一个非官方的泛阿拉伯代表大会（见《概览，1934年》，第99—109页），1937年在（叙利亚）布卢丹也开过（见《概览，1937年》，i.552—553。又见胡拉尼：《叙利亚和黎巴嫩》，第114—115页）。在操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看来，1918年以后在中东划定的各条边界线怎样说也不过是人为的，且不谈这些边界线在政治上是多么可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种障碍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显贵家族的成员曾一起在伊斯坦布尔或欧洲学习，其中有许多人还互通婚。

见《概览，1936年》，第793—803页；又见弗朗西斯科·卡塔路西奥：“萨达巴德公约”，《意大利述评》（Francesco Cataluccio：‘IipattodiSa-dabad’，Rassegna Italiana），1940年4月号，第247页。

见《概览，1934年》，第523—530页。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70—373页。

（六）内部不稳定造成的障碍

面对 1939 年威胁世界的危险，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是无助于这些国家的稳定的。虽然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已于 1938 年 11 月 10 日逝世）的独裁统治下享有政府的延续性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同他堪称匹敌的波斯的礼萨·沙赫·巴列维的业绩，则因他日益醉心于个人的聚敛致富而大为逊色。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国君和他指定的地方长官亲自管理人民，没有官僚机构插手其间，事实上大臣们都只是他们主子的奴仆。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行使的权力也并不小，因为他只接受英国驻扎官的意见。非阿拉伯的北方日益趋向西方化专政，阿拉伯半岛则还存在着传统的家族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埃及和“肥沃新月”诸国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模拟的议会政治。利凡特各国的政府受法国高级专员的权力严格限制，因此这些政府的作为不能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另一方面，埃及和伊拉克自被承认为主权国家后，英国的影响已是间接的了；不过在实际上，只要有武装力量作后盾，两国的政府还是可以由英国的代表建立或废除的，这正如后来战时历史所表明的；此种不寻常和不合法（就正常外交关系的条款而言）地行使权力，自英国于 1930 年和 1936 年分别签订条约承认了伊拉克和埃及的主权以来尚未出现过。福阿德国王和费萨尔国王在引导他们的幼年议会方面，都充分利用了各自的宪法所授予他们的权力。如果说他们的行为（按照西方标准）还不能说都是严格地符合于宪法的，那末总的说来他们的影响还是有益的。因为两国议会政体的弱点在他们生前已经很明显，迫身后一旦把各自的王位传给两位年轻的王子法鲁克和加齐后，这些弱点就更暴露无遗了。埃及的议会生命掌握在华夫脱党手中，自英国的保护关系于 1922 年被最广泛的政治阵线的行动击垮后，该党就以主要政党的面貌出现，尽管一再发生党员脱党的事情。事实上，它是唯一称得上有效的全国性政治机器的政党，所以它自称代表着埃及的“老百姓”，而在正常情况下它也确实获得了这些人的选票。相形之下，其他政党都是一些围绕着某个上层显要人物而组成的局部性团体，它们代表的是特权阶层的利益，在人民中间没 135 有基础。不幸的是，华夫脱党的第二任领导人穆斯塔法·纳哈斯同国王的君权发生了冲突，使他受到追求个人独裁的指责。在 1936—1937 年任期内华夫脱党领导的政府只是把此种不和带给了新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并激起华夫脱党队伍内部一次重大的分裂，还导致街头的政治帮派殴斗，贤明政府的主要职责却都被忽视了。伊拉克的议会局势甚至令人更不满意，比埃及的还要权障得多。政党从未脱离胚胎状态，在 1932 年伊拉克独立时“作为民族团结的

阿瑟·C·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Arthur C. Millspaugh: *Americans in Persia*），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46 年版，第 3 章；但参阅 A·C·爱德华兹文，他于 1948~1949 年在波斯游览了九个月之后写道：“有趣的是发现，……已故国王的声望……不仅得到了支持当前立宪政权的知识阶层的承认，甚至还提高了。因为礼萨国王的成就之显赫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的暴政所引起的仇恨却正在被忘却。他今天在波斯被认为是自那位近乎传奇式的国王阿巴斯一世以来最伟大的国王。这位国王最近被授予尊敬的‘大帝’称号”。《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1949 年 9 月号，v.393--394。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英国和埃及，1914—1936 年》（*Great Britain and Egypt 1914—1936*），情报部文件第 19 号（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36 年版）；菲利普·格雷夫斯：“埃及危机史话”，《十九世纪》（Philip Graves: ‘*The Story of the Egyptian Crisis*’, *Nineteenth Century*），1938 年 3 月号，第 297 号。

一个姿态”也被抛弃了。因此政府便被勇于私斗的敌对派别和若干地主与商人不断重新组合的寡头政治集团所统治。每一届通过操纵选举而上台的政府都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了议会，这样又使通过宪法以推翻政府的唯一手段——投不信任票——行不通了。自 1933 年费萨尔国王去世后，借助于非宪法手段迫使内阁辞职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强大的部落和军队便不断地应召而来扭转危局。1936 年军事政变以后，对立的军官集团在炮制政府更迭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鲁莽的军阀式的民族主义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正在起着干扰的影响。

参阅马吉德·赫杜里：《独立的伊拉克：1932 年后的伊拉克政治研究》（Majid Khadduri :Independent Iraq , a Study in Iraqi Politics Since 1932），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 年版，第 71—137 页。

（七）经济问题

中东经济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衰落时期下降到了农业和手工业几乎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只有利凡特的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还同欧洲有着商品交换。十九世纪由于加强了同欧洲的接触，贸易有了巨额扩大，特别是中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尼罗河流域采用了单一种植棉花的农业经营方式。在正常年景种植棉花是有利可图的。但国际商品交换设或中断，埃及的一千六百万人口（1937年的数字）的粮食供应便将得不到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方还有周期性的歉收和分配失当，部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普遍落后（巴勒斯坦犹太区除外，那里是欧洲式的工业和集约农业的结合）都容易造成主食品的短缺，而粮食耕种者和商人的贪婪又人为地加深了短缺的严重性。此种情况在正常时期的自我调节大致是以加重穷人的苦难为代价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叙利亚，当时是在奥斯曼军政府的统治下，曾遭受到严重饥荒。因此，在任何未来战争中，凡是利用中东为基地的国家极可能会遇到类以的困境。

参阅 H.A.R.吉布和哈罗德·鲍恩：《伊斯兰社会和西方》（H.A.R.GibbandHaroldBowen：IslamicSocietyandtheWest），第1卷，“十八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第1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0年版），第258—271页，第295—296页，第307—308页。

（八）特殊的巴勒斯坦问题

一个生气勃勃的犹太人社区在巴勒斯坦的成长，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了可怕的经济挑战，也给英国委任统治提出了政治难题。这些巴勒斯坦犹太人主要是新近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移民，他们占巴勒斯坦1939年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至少是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的产物：向往已久的返回“希望之乡”的宗教愿望；希望逃避在东欧受到的迫害，那里多数民族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自1880年以来对犹太人的迫害加重了，同样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影响了若干犹太思想家，唤起了他们要建立一个由自己治理的犹太人国家的愿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多少有点轻率地作了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其后果沉重地落到了英国行政官员身上，整整折磨了他们一个世代。贝尔福宣言——“……在……历史的浪漫主义阶段作出了庄严的保证，在那儿……居高临下地作鸟瞰，一切障碍物都显得渺小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英国人以及美国的浪漫主义和政客手腕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分割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原始草案，只字不提当时占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操137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英国政府修改了这份原始草案，给阿拉伯人的基本权利提供某些保障。浪漫主义“有点象想象力被滥用之后成了脏物一般”，骤然失去了光泽，因为性急的自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最高权利并以欧洲“文化”而自命不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20—1923年之间四次遭到了阿拉伯人

犹太人人数的增加从1922年的八万四千人增加到1938年年终的四十一万一千人。从1919年到1998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属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国国籍 [英国殖民部：《关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管理工作报告，1998年》(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alestine and Transjordan, 1938)，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9年版，第231页；巴勒斯坦政府移民部：《年度报告，1938年》(Annual Report, 1938)，耶路撒冷，政府印刷局，1939年版，第70页)。

例如《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1882年版)的作者利昂·平斯克，尤其是在1896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 Dreyfus)的影响下写了《犹太国》(Der Judenstaat)的西奥多·赫齐尔。”犹太主义向来是民族主义、尚礼主义、弥赛亚主义和醉心上帝的特种混合物……”，对这种断言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多少人认为是适当的，了解这一点是饶有兴趣的；见一位评论家的文章，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Zionist Review)，1951年1月19日，第20页。

正如阿瑟·凯斯特勒(Althur Koestler)所说，在一个文件中“一个国家给第二个国家庄严地许诺了第三个国家的国土”，《诺言和履行》(Promise and Fulfilment)，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第4页。

“如果没有那桩关于民族家园的荒唐事，巴勒斯坦本来会是一个易于统治而又宜于居住的国家。对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救世主来临的灵感。对英国当局来说，它却只是一件糟透的讨厌东西。”同上书，第10页。

参阅同上书，第20页。

文本见钱姆·韦茨曼：《考验与错误》(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纽约，哈珀兄弟，1949年版，第203页。

凯斯特勒，前引文。

“犹太人……也许倾向于轻视在智力上不如自己造诣深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并不憎恨阿拉伯人。如果阿拉伯人出版一些学术期刊、开办几个美术馆和组织一个交响乐团，犹太人肯定会爱上这些东西”。《犹太复国主义评论》，耶路撒冷通讯员，1947年10月10日，第5页；参阅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方向》(Sir 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伦敦，尼科尔森和沃森，1943年版，第360—369页。

的暴力对付。由于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贝尔福宣言作为委任统治基础，所以委任统治国的移民政策对他们便无从施加任何宪法上的影响了。英国几次派去的专门调查委员会都承认阿拉伯人的某些愤懑是有道理的，于是又演变而成为一套给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重承诺”，英国政府对他们必须“实施一视同仁的措施”，但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都不愿妥协，公平处理的一切努力又遭到失败。纳粹迫害开始后，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于1936年以叛乱反击移民浪潮，并且取得了毗邻阿拉伯国家的同情和某种支援。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于1937年提出的分治计划，是英国谋求妥协的一次新尝试，但既未能满足犹太人的欲望，又激起阿拉伯人的一次规模更严重的叛乱。因此，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处于慕尼黑阴影下的英国政府正在作最后的努力，企图使这两部分人妥协；英国遭到拒绝后，迫于国际局势的危急，便据现状处理这一问题，它向阿拉伯世界作了抚慰性的让步，以便为自己赢得喘息的时间。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满腔怒火，显然还不至于同迫害他们的纳粹去合作，而阿拉伯世界的敌对行为（虽然从纯军事意义上说是不起作用的）却直接对英国在中东极端重要的地位会构成极可怕的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非犹太人支持者并不满足于谴责1939年白皮书是一次“巴勒斯坦慕尼黑”，后来还毫无顾忌地断言决不能以“权宜之计”而给予任何宽恕。但是，由于他们摆脱不掉他们的鼠目寸光，因而固执地不肯去考虑一下，如果没有白皮书政策，阿拉伯人的政治鼓动、罢工、破坏活动等等会在多大程度上干扰英国于1940—1942年在中东所作的战争努力，而结果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干扰通往苏联的波斯供应线——而对民族家园，对犹太人世界以及对全体人类，最终的后果又会怎样。

拉姆赛·麦克唐纳首相于1930年4月3日在国会的讲话（下院辩论，第5辑，第237卷，第1466栏）。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了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同等权利这个想法，认为这是“反对全体犹太人民的”，因为“从语气的含意来看，是乘机排除了巴勒斯坦同犹太人世界之间的关系”。韦茨曼：前引书，第325页。

在1922年12月31日到1936年12月31日之间，犹太人人口据估计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八，其中百分之七十六点二是由于移民入境，只有百分之八点六是由于自然增长。巴勒斯坦政府统计部：《人口动态统计表，1922—1925年》（Vital Statistics, 1922—25），耶路撒冷，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1页*和第84页*。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毗连的阿拉伯国家的“干涉”提出的抗议，是同他们声称巴勒斯坦是“全体犹太人”的利害之所系的论点突出地自相矛盾的。见韦茨曼：前引文。

见《概览，1938年》，i.414—479。

1939年任商务大臣后任殖民大臣的奥利弗·斯坦利，对人们曾经怀有的希望的态度模棱两可，这种希望以为由于发表了白皮书的结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怒气可能会逐渐消除，和解或许会开始”；可将他在1946年7月31日的发言（下院辩论，第5辑，第426卷，第981栏）同他在1947年2月25日的发言（同上，第433卷，第1924栏）作一对照。

第二节 西班牙和葡萄牙

马丁·怀特

（一）民族主义的西班牙

1939年3月德国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西班牙内战正好结束。巴塞罗那于1月26日落入民族主义者手中，德国人于3月15日进入布拉格，民族主义者于1939年3月28日攻克马德里。“在三百年无所事事之后，”齐亚诺写道，“西班牙从此又成了一个活跃而有生气的因素了。”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表达主观愿望的夸大其辞的说法，实际是，西班牙作为一个弱小国家渡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现在的政府抱着扩张主义野心，想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角色罢了。

西班牙内战结束了“1898一代人”的时代——这是一个为复兴西班牙及其欧洲社会的地位而展开在智力上和道德上都颇深刻的辩论的时期，那时正紧接着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并丧失了古老的西班牙帝国的最后残余之后。西班牙作家安赫尔·甘尼维特在1897年曾经说过：直布罗陀之丧失虽将永远令人伤心，但西班牙也只好默认了；因为英国作为一个纯海洋国家，对别国的自由权毕竟不如大陆国家那么危险，而且它如今既感满足又采取守势，在国际秩序中它同象西班牙这样一个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西班牙的民族主义运动，象意大利的法西斯革命和德国的纳粹革命一样，野心重萌，又提出了对外要求。自1815年以来，西班牙的虚弱，正是英法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新成立的西班牙政府却要摆脱此种被奴役状态了。弗朗哥在他胜利的前夕说，西班牙控制着地中海的锁钥，今后地中海事务没有西班牙参加就解决不了。但是不让外国干涉和不愿在国际上孤立是同扩张的愿望分不开的。弗朗哥在开始造反时就宣称，他是来完成光复西班牙帝国旧山河的使命的。长枪党纲领的第三点宣告：“我们决心建立帝国，我们肯定地说，西班牙的全部历史都意味着它应当是一个帝国。我们要求西班牙在欧洲占有杰出的地位。”随着民族主义政府的胜利，西班牙决心建立帝国，完成它的帝国的和天主教的使命，这已成了经常宣传的主题。在长枪党党员和军队中间有一个主战派；新政府打算在情况许可时就亮出领土扩张政策。苏涅尔1939年6月访问意大利时对齐亚诺说：西班牙打算收复直布罗陀，因为只要英国的国旗还在那里飘扬，西班牙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和主权完整的国家，也打算在摩洛哥扩大领土，以便清算一下同法国的帐。

见《概览，1938年》，i.277，306。弗朗哥举行马德里入城式是在5月19日。

加里亚佐·齐亚诺：《日记，1939年（—1943年）》，两卷集，第4版（米兰，里苏利，1947年版），1939年2月22日。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的英译本一卷集《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于1947年出版，伦敦，海涅曼公司。以下简称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

1938年12月31日对曼努埃尔·阿斯纳尔的谈话。《领袖言论》（PalabrasdelCandilo），巴塞罗那，信仰出版社，由长枪党全国代表团负责出版，1939年版，第312页。参阅卡米洛·巴西亚·特雷列斯：《西班牙国际政策要点》（CamiloBerciaTrelles：PuntosCardinalsde laPoliticainternacionalespanola），巴塞罗那，信仰出版社，1939年版，第474~476页。

长枪党二十六点纲领的官方译文，转载于阿瑟·F·洛夫德：《世界大战在西班牙》（ArthurF.Loveday：WorldWarinSpain），伦敦，默里，1939年版，附录iii，第184页。另有一种译文见艾伦·蔡斯：《长枪党：轴心国在美洲的秘密军队》（AllanChase：Falange：theAxisSecretArmyinAmericas），纽约，普特南，1943年版，第14页。

见皮尔斯：《西班牙黯然失色》，第98~100页。

西班牙民族主义的野心不只限于觊觎地中海，它的帝国的和天主教的使命是指向过去它在新世界和太平洋建立的并统治了二百年之久的旧帝国版图。自从西属美洲国家同西班牙一起举行了庆祝美洲发现四百周年大会以来，“伊比利亚—美洲文化统一体”一直吸引着知识分子和学者，一直是一些研究所和会议的讨论题目，泛西班牙主义便是“1898一代人”探讨的观点之一。“西班牙文明”这个词是在内战前按“基督教信仰”的模式铸造的，为的是要把西班牙语系的民族统统包括进去，并表明其特性。这个词的第一义是保守的、文化上的：指的是西班牙及其子女国家的思想是受同一天主教、同一民族主义和同一权力主义的精神的感动而产生的，并一致否认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美国佬的实利主义。但领土收复主义则绝不停留在书面范围内。“西班牙文明第一主义”象“德意志精神”和“古罗马精神”一样，是一种观念，其政治价值在于它的内容和目的的适应性。要是西班牙能够取代法国而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智力领导，或许甚至取代美国而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领导，它就不仅会在精神上挽回这些国家，而且还能加强它自己的国际地位；长枪党作家们希望，西班牙在非洲的扩张可以得到同美洲的大西班牙集团结成的一条政治、经济和文化阵线的支持。“关于‘西班牙—美洲国家’，”长枪党纲领第三点说：“我们的目标将置于文化、经济利益和权力的统一上。因为西班牙占有作为西班牙世界精神摇篮的地位，西班牙要求在一切共同事业中居于优先卓越的地位。”然而，在佛朗哥取得胜利的时刻，“西班牙文明”在民族主义者宣传领域外却还是乌有之物，只有国外的长枪党在拉丁美洲作为纳粹第五纵队的一支辅助力量所起的一些模糊而难以捉摸的影响。但当民族主义政府终于在整个西班牙国土建立起权力的时候，它的对外野心受到了物力枯竭和政局不稳的限制。这个国家的经济凋敝。苏涅尔1939年6月对齐亚诺说：西班牙的资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些地区发生了饥馑。他说西班牙需要有一两年或三年的恢复时期，才能加入轴心国方面作战。过了一个月，佛朗哥对齐亚诺说：至少需要有五年的和平，又说，许多观察家认为这还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层硬壳里面，西班牙还是象在内战开始时那样四分五裂。无产阶级和大部分农民仍旧对新政权抱着敌对态度，只是还没有爆发出来。加泰罗尼亚和三巴斯克省受到撤销自治的处分。政府对被击败的共和主义者实行的报复，成为一场对赤色分子的非宗教性的扑灭旁门左道。民族主义运动本身陷入了深深的分裂。长枪党党员自己就成了一伙激进分子和“新贵”，不久就几乎要把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从政府和党的权力地位上撵走了。君主主义者心怀不满。军队瞧不起长枪党。商人反对长枪党激进分子空谈理论的经济政策。教会对政府同纳粹交往怀有疑虑。政府被私人 and 各部门间的旧恨宿仇搞得四分五裂，很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

见1939年7月19日齐亚诺同佛朗哥在圣塞瓦斯蒂安的谈话（加里亚佐·齐亚诺：《欧洲面临灾难》（Galeazzo Ciano: 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蒙戴多里，1948年版，第440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主编并由斯图尔特·伍德翻译成英文的《齐亚诺外交文件》（Ciano's Diplomatic Papers），伦敦，奥德姆斯出版社，1948年版，第291页。该著作及英译本以下简称“齐亚诺：《欧洲》”和“英译本”。1939年8月12日齐亚诺在上萨尔斯堡以西班牙需要恢复元气为理由，徒劳地企图劝阻希特勒不要立即发动战争。见希特勒同齐亚诺谈话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49(1871—PS)；译文载《文件，1939—1946年》，i.178；参阅《阴谋与侵略》，iv.515，viii，523。

快便陷入贪污和无能的泥淖。佛朗哥象历史上的古典独裁者，不象当代的施恩者和示范者，他是靠军权取得政权的，如果他在这新的和陌生的领域内还表现了他的天才的话，那末也许就是他对这些政客和将军们的竞争采用了平衡办法，调整了他们的对抗作用，并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但从积极方面讲，国内建设倒也是优先于对外冒险的。政府引以自豪的是国家统一和社会改革的计划：佛朗哥“希望——用墨索里尼的惯用语来说——到人民那里去”。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各自忙于糊口生活，搞黑市活动，使自己能防止或适应长枪党的新花样，伺机复仇或躲避报复。一个共同的唯一愿望就是不要再有战斗了。 —

齐亚诺同佛朗哥在圣塞瓦斯蒂安的谈话，1939年7月19日。齐亚诺：《欧洲》，第443页；英译本，第293页。

（二）葡萄牙和西班牙

佛朗哥的胜利把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放到了一条外交链条的中间，一边连着德国和意大利，另一边连着英国。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事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造成一种奇怪的感情一致：佛朗哥紧紧依靠轴心国；葡萄牙的政策在传统上则以联英为基础。

西班牙和葡萄牙有着互相敌视的传统，一如 1707 年结成联盟以前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样，较弱的一国总感到自己的独立受到威胁，较强的一国则又周期性地要回到那种因自然地理的整体性而应完成政治上统一的倾向。历史上唯一的西班牙—葡萄牙联盟是由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于 1580 年实现的，在 1640—1668 年的分离战争中解体。此后，最初在十四世纪缔结的古老的英葡联 143 盟有了新的意义。对英国来说，葡萄牙是对付西班牙的海上缓冲国和桥头堡，正如低地国家在英国对付法国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对葡萄牙来说，同英国结盟乃是它的独立的保证。历次拿破仑战争便为此种联盟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典型的例证；拿破仑战争也曾使葡萄牙的土地被他国侵占，因为在 1801 年的西葡战争中，西班牙人夺走了葡萄牙的边界城镇奥利文萨，尽管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中明文规定，西班牙却没有将它归还给葡萄牙。在十九世纪，伊比利亚统一的理想再度以新的形式复活，也象在西班牙一样，成了葡萄牙详加探讨的题目；右翼致力于王朝联盟的想法，左翼则倾向于共和联邦；而同英国结盟则仍然是葡萄牙独立的最大支持。

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只有在彼此有着类似政权时它们的相互信任才有保证，而部分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政治上的摇摆往往不是同步的。民族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胜利，创造了自 1910 年葡萄牙君主制度被推翻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和谐局面。葡萄牙推翻君主制度以后便成了一个带有蛊惑性的共和国，西班牙则依旧是个保守的君主国。1926 年，葡萄牙军人革命开创了独裁主义的“新国家”，政治上向右摆，但五年之后，西班牙君主制度崩溃，继起的是一个具有左倾的、伊比利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西班牙内战一开始，葡萄牙政府就支持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反共和天主教的事业。这标志着意识形态的考虑压倒传统的政治考虑，因为，虽然西班牙共和派的胜利也许带来了建立一个伊比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危险，但长枪党的宣传也鼓吹这个半岛的统一。萨拉查也许曾希望在同佛朗哥的关系上能得到他的优待和厚待，这种地位是墨索里尼在同希特勒关系中一度得到过的。但是一当西班牙民族主义者赢得了内战胜利，这种角色安排就或许要上下易位了。佛朗哥在那胜利的时刻（1939 年 3 月 18 日）同葡萄牙签订了友好和不侵犯条约。表面上，此举是巩固了这两个政权的团结；葡萄牙政府还可能希望，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重申保证的措施。但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就在下一个月撤销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自治权，对一个正处在庆祝反对西班牙奴役的民族起义三百周年前夕的国家来说，这不能说是两班牙民族主义者的伊比利亚政策中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吧。

（三）西班牙和轴心国

佛朗哥的造反多半是靠意大利和德国站在他这一方面进行了干预才取得胜利的，因此，随着他的胜利而来的是国际上关于西班牙的主要问题已成为今后它依靠轴心国的程度问题了。西班牙自己对待两个轴心国就有着不同的态度。齐亚诺于1939年7月会见佛朗哥时提到，虽然西班牙人赞成罗马—柏林轴心，但他们急于要“强调对待意大利和德国的感情显然不同”。这方面有两个主要原因。德国颇有可能成为更强大、更不可靠的盟友，对西班牙独立的威胁也更大。而且出于天主教感情，对国家社会主义有着内在的敌意，那种感情也许是西班牙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各种动力最强的一种。西班牙的僧侣统治集团曾强烈支持造反事业，但一朝胜利给它恢复了特权，梵蒂冈的比较审慎的政策就很可能占上风了。甚至象苏涅尔这样的长枪党狂热者对纳粹分子也怀有天主教偏见，尽管他后来在西班牙政治中成了他们的鼓吹者。

轴心国自己对西班牙的政策在其规模和深度方面也各有差别（事实可能是，它们原来希望西班牙发动一次军事政变和进行一些巷战，而不是打三年内战，但一旦承担了义务，也就无法往后退了）。意大利把佛朗哥的事业看成是它自己的重大利益所在：德国则只是把它从属于自己的更广大的目标。意大利曾派去步兵并在海上起了较 145 大的作用：德国则派去了空军和特种部队。意大利人为西班牙内战所花的钱可能要比德国人多，意大利的干预又是自始至终大事炫耀的。

对德国说来，西班牙内战起初似乎主要是意—法—英对抗的新篇章。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同他的指挥官们举行的会议上说，德国的利益不在于佛朗哥取得全面胜利，而在于延长这场内战，鼓励它扩大为一场意、法、英之间的冲突，使德国可以趁机解决捷克和奥地利问题。看来促使德国帮助佛朗

关于法国人鉴于西班牙可能同轴心国结盟而在战略上感到的焦虑，见《概览，1937年》，ii.148—150，188—189。

齐亚诺：《欧洲》，第440页；英译本，第291页。

“佛朗哥和他的顾问们知道，这个国家所处的地位还不能参战。他们同时又害怕德国，对意大利则非常友好”，1940年6月11日塞缪尔·霍尔爵士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函：〔坦普尔伍德勋爵：《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官》（Lord Templewood：Ambassador on Special Mission），伦敦，科林斯，1946年版，第34页）。

见《概览，1937年》，ii.218—221。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9日。

在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慕尼黑时，德国人宣称在西班牙内战上花的钱完全同意大利人一样多〔（1937年9月）墨索里尼和比洛·施万特第三次会见记录，载《德国外交部秘密文件集》

（Documents Secret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Allemagne），有马德琳和米歇尔·埃里斯托夫译自俄文版的法译本，以下简称《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巴黎，保罗·杜邦，1947年版，第3卷（西班牙），第3号，第22—23页〕。一个月以后，1937年11月6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同里宾特洛甫谈话时说，意大利在西班牙花了四十五亿里拉，而根据戈林的说法，德国花了大约三十五亿（齐亚诺：《欧洲》，第221页；英译本，第144页）。有关西班牙最终欠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债务的总的估计数字，见托马斯·J·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Thomas J. Hamilton：Appeasement's Child），纽约，诺夫，1943年版，第140页；查尔斯·福尔茨：《西班牙的化装舞会》（Charles Foltz：The Masquerade in Spain），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48年版，第140页。

1937年11月10日霍斯巴赫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11—412（386—pS）；《德国外

哥的，主要不是希望他取得胜利，而是想使德军在技术上取得战争经验，并在心理上使大家有一个框框，承认希特勒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保卫者，从而达到其反民主国家的政治战的目的。但德国在西班牙还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德国和民族主义者于1937年7月16日签订的商务条约有一项秘密议定书，规定德国在西班牙的经济重建中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开发矿产和原料方面进行合作，德国人很快就开始得到了它需要的东西。不久之后，一个法西斯西班牙在战略上的好处就值得认真考虑了。1938年8月，德国空军情报局正在计划使用德国在西班牙的德国神鹰军团轰炸波尔多和马赛，如果法国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投入战争的话。1939年3月27日，胜利的佛朗哥正式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3月31日，佛朗哥同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如果一方进入战争，另一方应保持最善意的中立；条约又表达了双方增强经济关系的愿望，并附有秘密协议，规定双方进行海军合作以及德国控制西班牙警察、报刊和宣传的一项措施。但希特勒总觉得同西班牙人打交道是令人厌倦的和不可靠的，一直到1940年下半年夺取直布罗陀和封锁地中海成为当务之急时，他还持有这种看法。他认为西班牙在战略上只是一个配角，所以德国的西班牙政策仍然是实验性的，对它期望不高。意大利早在1936年11月28日便同西班牙民族主义者订立了秘密条约，保证支持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维护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完整和在西班牙重建秩序。条约还规定两国在西地中海合作，并彼此保证在另一方进入战争或遭到制裁时严守中立。佛朗哥的胜利对墨索里尼有两大好处。民族主义的西班牙将会成为一个反法的盟国；墨索里尼本已打算在巴利阿里群岛尽可能长期地保持一个海空军基地，以切断法国同北非的海上交通。但他还打算利用西班牙来实现他的“进军海洋”的计划；意大利和西班牙将瓜分北非，意大

交政策文件》，D辑，i.36—37；《文件，1939—1946年》，i.23；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03。

见《概览，1937年》，ii.193—194；菲斯：《西班牙史话》，第22页注。

德国空军总参谋部情报局1938年8月25日关于“扩大的绿色行动”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390（375—PS）；《阴谋与侵略》，iii.287〕。1939年5月，里宾特洛甫认为，西班牙人在比利牛斯山一带牵制几个法国师是有用处的（见1939年5月6—7日齐亚诺如里宾特洛甫在米兰的谈话，载齐亚诺：《欧洲》，第430—431页；英译本，第285页；《文件，1939—1946年》，i.166）。

《概览，1938年》，i.360。

菲斯：《西班牙史话》，第19页，第22页。该约直到1939年11月29日才获批准。《西班牙政府》中没有公布这一条约的原因不详。

“关于西班牙，德国根据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深知如不达成十分具体详细的协议，要同西班牙人办事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总之，他（希特勒）不相信西班牙对于‘给’扣‘取’有同样热烈的意愿。……在经济上，德国给了西班牙好多亿。他（元首）采取的立场是，战争期间不妨把这笔债务的偿还问题搁一搁，但在佛朗哥胜利后，总还得再提出来。每当德国人要求偿还西班牙在内战期间欠下的这笔四亿债务时，西班牙人对此总说成是把经济上的考虑同理想上的考虑纠缠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所以西班牙人在德国人看来，简直就象犹太人，犹太人是想把人类最神圣的东西也拿来作买卖的。”见1940年9月28日希特勒同齐亚诺会见记录，载《西班牙政府》，第17页，第18—19页。

条约文本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1号；《文件，1939—1946年》，i.5-7。

1937年11月6日墨索里尼同里宾特洛甫在罗马的谈话（齐亚诺：《欧洲》，第222页；英译本，第144—145页）。但结果意大利和德国的部队于1939年5月和6月全部自西班牙领土撤走，不过意大利人留下了他们的大部分重型武器。《概览，1938年》，i.356—360。

利分据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占有摩洛哥和直布罗陀，给意大利以通过摩洛哥到达大西洋的永久过境便利。墨索里尼盼望着西班牙内战一胜利就同佛朗哥结成联盟。法西斯政府催促德 147 国人同西班牙缔结条约，但是齐亚诺感到担心，认为如果打算公布该条约，则首先应宣布业已存在 1936 年的意两条约，“不然的话，人们会说意大利在西班牙打仗，而德国从中取利”。

这两个轴心国暗地里互相猜忌，但墨索里尼对德国在西班牙占优势并不那么害怕，他怕的是德国在巴尔干占优势，西班牙战争的结束正是他自己并吞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条件。意大利人想要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又要西班牙同罗马的关系比西班牙同柏林的关系更亲密；要是意大利在轴心国中间成了不可或缺的调停人。成了轴心国跟着它转的枢轴，那就会加强意大利在轴心国中的地位了。墨索里尼引以自傲的是，佛朗哥给他发来的文电的口气活象下属呈给上司的报告，所以在 1939 年初以齐亚诺的依然乐观的眼光看来，西班牙的胜利只会刻上墨索里尼的名字，在埃布罗河、巴塞罗那和马拉加，一个新的罗马地中海帝国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39 年 6 月 14 日；参阅莱昂纳多·西蒙尼（笔名）：《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1939—1943 年》（Teonardo Simoni, psend：Berlino, Ambasciatad'Italia 1939—1943），罗马米格里亚雷西，1946 年版，第 140 页，第 142 页。见下文，原著第 191—193 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39 年 1 月 8 日。苏涅尔于 6 月访问意大利时，双方同意：“这个联盟事实上我们已在考虑中；就目前来说，签订草约还不够成熟”，同上书，1939 年 6 月 5 日。

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39 年 1 月 27 日和 2 月 8 日。齐亚诺考虑把他自己在 1939 年夏天对西班牙的访问放在戈林的访问之前进行，他认为这一点对意大利的威望来说是重要的。同上书，1939 年 4 月 21 日。

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39 年 3 月 3 日。

在 1939 年 6 月苏涅尔访问意大利期间，齐亚诺进行干预，缓和了苏涅尔同德国驻罗马大使的关系。同上书，1939 年 6 月 10 日和 14 日。

同上书，1939 年 1 月 8 日。从墨索里尼一再劝说佛朗哥不要恢复君主政体一事可以看到，他是想影响西班牙事务的。同上书，1939 年 3 月 5 日、3 月 11 日、6 月 5 日；齐亚诺：《欧洲》，第 442 页；英译本，第 292 页。

(四) 葡萄牙帝国和两班牙帝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在插手反对它的宿敌和掠夺者的问题是软弱无力的，是意见分歧的，所以仍然保持中立。然而葡萄牙却因同英国结盟而被拉入大国的争斗中。在 1930 年，西班牙由于内战的破坏，甚至比 1914 年时更虚弱，但是它却怀着扩张领土的希望想投入那场即将发生的大国冲突。然而，葡萄牙则打算保持中立。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对一场全面战争的反应的这种变化，标志着它们脱离了以英国为中枢的世界秩序体系，这个体系此时正在崩溃，日渐成为新的革新国家的活动范围。

这一摇摆不仅反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欧洲国家的利益，而且还更多地反映了它们的海外帝国的地位。这两个是首先发现大洋彼岸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然后它们瓜分了那个世界。葡萄牙统治了南大西洋和印度洋，西班牙统治了北大西洋、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但是这 148 两个帝国的气质相反，命运亦迥异。葡萄牙帝国属于海洋性。正是由于葡萄牙在印度洋建立了海军优势，它就在那里遇上了（非洲东海岸一带除外）稳定的和人口稠密地区的文化，即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那是它无法征服或破坏的。因此，葡萄牙帝国仍然只能是一系列诸如霍尔木兹和果阿、马六甲和澳门等桥头堡、要塞和贸易站组成的体系。与此相反，西班牙帝国基本上是大陆性的。

它是建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文明废墟之上的，那是西方在其扩张过程中所遇到的两个最屠弱的非西方文明，即阿基台克文明和印加文明。西班牙殖民者在那里统治着一群土著人民，他们的总督辖区和“高等法院”在适当时候便能转变为独立的政府；在这方面，葡萄牙帝国除一个巴西可以作为例子外，就再也举不出类似的事例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帝国都因它们的后继者争霸欧洲时的破坏而深受损害。两个帝国都参加了十九世纪对非洲的瓜分。但由于它们之间有上述的不同情况，阶以到了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帝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过去一个半世纪所取得的沿非洲西海岸的几块无足轻重的领 149 土。而卡摩因斯所歌颂的葡萄牙制海权的残骸，从亚速尔群岛一直伸展到马来群岛和中国海，虽然肌肉已经被剔得精光，但骨骸的架子尚可辨识出来。在 1939 年，葡萄牙有一个帝国要拯救，西班牙则有一个帝国要光复。

甚至在西班牙已不再是一个强国以后，英国仍然认为有必要控制大西洋，这样葡萄牙的独立才会在英国的保护下得以保持。但在欧洲以外，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利益在十九世纪还是象在十六世纪那样发生冲突。葡萄牙人想穿过现在的罗得西亚把安哥拉同莫桑比克连接起来，这个想法同英国人想把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领土连成一长片的愿望有抵触，由此招致英国人于 1890 年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不但是葡萄牙的扩张计划，而且甚至是保持葡萄牙海外领地的完整，也得以英国的利益放在全世界殖民势力的天平上加以权衡。在 1898 年，英国同德国订立了秘密协定，把葡萄牙的殖民地划分为两个

见埃德加·普雷斯蒂奇：“英葡联盟”，载《皇家历史协会学报》（1934 年），xvii.95—97。

见 R.I.洛弗尔：《争夺南非的斗争，1875—1899 年：对经济帝国主义的研究》（R.I.Lovell：The Struggle for South Africa, 1875—1899: a Study in Economic Imperialism），纽约，麦克米伦，1934 年版，第 216—218 页。

势力范围，作为可能瓜分的前奏。1899年英国重申古老的条约，其中包括对葡萄牙殖民领地的保证，这既不能维护英国政策的先后一致，也没有减轻葡萄牙人的忧虑。推翻葡萄牙君主政体的1910年革命削弱了葡萄牙的国际地位，德国的压力再度出现；在1912年和1914年之间，英德重开谈判，讨论预期的瓜分葡萄牙帝国的150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葡萄牙解除了这些危险，它被拉去站在它的传统保护者一边而卷入了那场冲突。

葡萄牙得到的报酬是德国战争赔款的百分之零点七五，并收复1894年被德国夺走的莫桑比克北面的基永加三角地。但它从协约国胜利中得到的真正好处是把德国从非洲赶走了。同莫桑比克北面交接的德属东非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同安哥拉南面毗连的德属西南非洲则成了南非的委任统治地。葡萄牙帝国就这样解除了压在它身上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最危险的压力，同英国联盟一事也就相应地不那么紧迫了。与此同时，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即如果联盟不体现共同利益，也就不会有多大的心思去保持这种联盟了。在萨拉查领导下的葡萄牙民族复兴时期，一种反对依赖外国的反应很自然地产生了，这又恰好发生在那个外国的国际地位下降的时候。萨拉查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以及对类似德国和意大利缔结的那种不干涉协定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篇脱离英国的独立宣言。——尽管如此，葡萄牙同轴心国是没有共同利益的。如果说，它支持佛朗哥是因为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和独裁的国家，那末同样地，它作为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和作为一个弱小的殖民国家，又必然会害怕纳粹德国崛起。德国在非洲确实已不再有立足点了，但有可能的是，同英国达成某种殖民地安排就会让德国又回到那里去——某种在没有葡萄牙充分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涉及葡萄牙利益的安排，也就是类似于1914年以前英德谈判的那种做法。此种担心在德国夺取布拉格的时候已经逐渐减少，可是在西班牙内战结束时，在佛朗哥对轴心国的依靠中又出现了一些暧昧不明和招致不安的情况。如果葡萄牙政府还不能确切知道，至少它会猜疑西班牙民族主义者认为“把葡萄牙逐出英国势力范围之外，对西班牙的政策和对151轴心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葡萄牙一面同取得胜利的佛朗哥签订

古奇和坦珀利，第1卷，第90—92号。

古奇和坦珀利，第1卷，第118号，以及编者注（第93—95页）。又见第8卷，第62章，以及哈罗德·坦珀利和莉莲·M·彭森（编）：《从庇特（1792年）到索尔兹伯里（1902年）的英国政策的基础》

[Harold Temperley and Lillian M. Penson (edd.) *Foundations of British Policy from Pitt (1792) to Salisbury (1902)*], 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第512—516页。

古奇和坦珀利，第10卷，第2编，第95章。阿瑟·尼科尔森爵士把这些谈判描写成“在我整个外交经历中所看到的最令人齿冷心疑的勾当”。哈罗德·尼科尔森：《阿瑟·尼科尔森爵士（从男爵），卡诺克勋爵（第一）》（Horold Nicolson: *Sir Anthon Nicolson, Bart., First Lord Carnock*），伦敦，康斯特布尔，1930年版，第393页。参阅《概览，1929年》，第277—278页；《概览，1937年》，ii.203—204。

见H.w.v.坦法珀编：《巴黎和会史》（*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ed. H.w.v. Temperley），下文简称《和会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0年版，ii.243—244。

葡萄牙并未漠视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内在意义。见《概览，1935年》，ii, 80, 86, 190。

关于英国向德国建议在刚果盆地条约规定的地区建立一新殖民地政权，见下文，原著第164—165页。

齐亚诺记苏涅尔的话：《日记（1939—1943年）》，1939年6月5日。“尽管这事可能难办，他打算朝这个方面去努力，并要求我们合作。”

友好条约，一面却又关注于谨慎地强调它原有的纽带。1939年3月，葡萄牙正在开始执行既要同西班牙建立新的友好关系、又要同英国保持古老的联盟这样一个困难的平衡政策。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它始终将维持这一政策，它是同两个互相争斗的联盟都保持了条约关系的唯一小国。

第三节 瑞士、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马丁·怀特

瑞士、三个低地国家和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939年是西欧特别典型的中立国。除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受到德国的侵犯外，它们都幸免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也曾是个中立国家，但上述这些国家和西班牙有所不同，那是由于它们全部成功地保持议会民主，它们的对外政策又都有爱好和平和国际主义的特征，考虑威望和争夺权力的成分在它们的政策中所占的比重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少。它们同当代大国以及象西班牙那样怨天尤人的前大国之所以分道扬镳，并非因为它们无知，也不是因为它们在政治中缺乏经验。这些小国之中的四国，即瑞士、荷兰、丹麦（挪威和冰岛当时同丹麦联合）和瑞典，在早几个世纪的近代史上曾处于接近大国的地位。比利时和卢森堡无论是作为西班牙帝国的组成部分，或作为奥地利帝国的组成部分，或分别作为独立国家，它们在每一次全面战争中都是北方的斗鸡场。如果说这八个国家显得要置身于国际权力斗争之外，而试图把它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理性的和合作的原则之上，那末在不小程度上，也只是因为它们具有强者受挫折、弱者被掠夺的历史经历而已。

在1939年的世界上，它们在两个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和共同的利益。它们都是楔在强国侧翼之间而又岌岌可危的缓冲国，它们没有能力自卫。其中一半国家在欧洲以外又有着广大的领地，这些领地也是它们无法各自独立保护的。它们维持独立的传统政策便是中立政策：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采取了另一种政策，所根据的希望是它们当前独立所依赖的卖力均势可以永久保持不变，并发展成为一种集体安全体系。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随着国联的盛衰，便成了它们的外交史的主题。

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大公国。

在地理学上说，斯堪的纳维亚一词指的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里也用来包括冰岛，因为冰岛通过政治纽带和丹麦联合在一起，但不包括芬兰，它将列入东欧国家。见下文，原著第206页以下。

值得政治科学家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君主立宪国家只有瑞士是联邦共和国。丹麦和冰岛则共有一个君主。

就“大国”一词用之于论及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初步国际体系而言，瑞士邦联自在1474—1477年的战争中击败勃艮第起，一直到1515年的马里尼安诺之役被法国人击败，它也曾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大国。联合省（荷兰——译者）从它们于1609年结束时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取得胜利之时起，一直到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被它的过分强大的伙伴英国拖得筋疲力尽而黯然失色为止，也一直是一个大国，虽然在这一时期内由于1672年法国的入侵，它的力量一直在衰退。丹麦从它于1535年吕贝克大捷——这场战争摧毁了汉萨同盟的制海权，让丹麦控制了波罗的海——直到1626年卢特利之役它败于天主教联盟，以及继而在1629年签订吕贝克和约退出了三十年战争为止，也一直是一个大国。瑞典从它于1630年插手三十年战争直到1699—1721年北方大战中被俄国打败为止，也曾经是一个大国。

（一）得到保证的中立：瑞士、比利时、卢森堡

瑞士和低地国家是在九世纪崛起的分隔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的罗退尔中央王国的远房后裔，并以此种或彼种方式成为介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欧洲政治地理上 153 的永久性特征。在十五世纪的一个短时期内，这块当时是瑞士邦联和勃艮第领地所在的中央地带，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比被它分隔开的那两个国家强大。勃艮第国首先瓦解，多半是由于它同瑞士冲突的结果，而瑞士作为强国，自己也不过继续存在了四十年。此后它就沦为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西班牙政权之间的缓冲国。后来它提出了中立政策，那是在 1672—1713 年全面战争开始则作为一项原则宣布的，因为在 1674 年，瑞士邦联宣告它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立国家，不介入任何一方。自那时以来，瑞士的中立只在 1792—1815 年全面战争期间遭到法国和同盟国家双方的严重侵犯。瑞士的中立和它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是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大国的保证，一个小国的中立便第一次成为欧洲公法的组成部分。瑞士的中立经历了十九世纪各次国际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得到凡尔赛和约的再一次肯定。虽然国联的所在地就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城，瑞士又是国联的一个成员国，但它的特殊地位还是得到 1920 年国联理事会的一项决议承认，使瑞士免去根据按国联盟约必须参加的军事行动。

瑞士和比利时都是缓冲国，但瑞士是一道屏障，比利时则是一条走廊。瑞士是欧洲的山区要塞，很少受到外国军队的侵犯；比利时则是每次战争的主要战场。瑞士从历史进入近代之初便是一个独立国家：比利时则是一个遥远的帝国的边远省份，先属西班牙帝国，后又属奥地利帝国。瑞士的中立是瑞士政策的一条传统原则，这个中立在几个世纪以后得到了大国的承认。比利时的中立则是在它于 1831 年建国之时由大国强加于一个非自愿的小国的。这个中立最后得到了 1839 年三个伦敦条约的保证。但当初被痛恨而看作是侵犯主权、后来也并不认为是有利而完全接受的此种中立地位，被德国 1914 年的入侵破坏了，并被凡尔赛和约默默地取消了。比利时是除丹麦外唯一的一个从德国土地上取得领土的西方小国，它得到了欧本-马尔梅迪。比利时同其他小国一样，这时用参加国联的办法以谋求另一种形式的安全；但是它和它们不同的是，它是莱茵兰的一个占领国，因此需要把自己的政策同法国协调，所以在 1920 年签订了一项范围不大的军事协定。比利时相当于昔日

见托因比：《研究》，i.37—39；iii.349 注。“比利时得到保证的中立和瑞士得到保证的中立，同样都会使人本能地想起它们是九世纪时称作罗退尔王国的。“残余”或“复活”——很难说应该用哪一个说法好。E.A.弗里曼：《欧洲的历史地理》（E.A.Freeman：TheHistoricalGeographyofEurope），J.B.伯里编的第 3 版（伦敦，朗曼，格林，1912 年版），第 304 页；参阅第 290—292 页。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莱茵兰非军事化，便是此种欧洲政治均势持续性特征的最近表现（1939 年）。

勃艮第之成为欧洲强国是通过 1384 年同佛兰德的王朝联盟。1419 年订立的英国—勃艮第联盟使它能在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掌握了英法之间的天平，从此一直到 1476 年在格兰德逊和莫拉特被瑞士打败和 1477 年又在南希被同瑞士结成联盟的洛林公爵打败为止，这一段时期是勃艮第国家全盛时期。瑞士国家的全盛时期是它从战胜勃艮第起一直到 1515 年在马里尼亚诺被法国人打败为止。

见埃德加·邦儒尔：《瑞士中立史》（EdgarBonjour：Geschichteder.SchweizerischenNentritatit），巴塞尔，黑尔宾和利希滕哈恩，1946 年版；M·霍廷格节译的英文本：《瑞士的中立：它的历史和含义》（M·Hottinger:SwissNeutrality：itsHistoryandMeaning），伦敦，埃伦和昂温，1946 年版。

的地位，直到 1925 年签订了洛迪诺条约才实现，那时由英、法、意、德各国保证了它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边界。(11)

卢森堡是这些小国中第三个得到国际保证的国家。它同比利时和荷兰一样，曾是勃良第遗产的一部分，(12)并同比利时各省一起从西班牙人手里传给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1815 年卢森堡立为大公国，以便加入德意志邦联，但由于荷王兼任大公又同荷兰连在一起。卢森堡人同比利时人一样深恨荷兰人的统治，1830 年同比利时人一道举行起义，希望并入新的比利时国家。可是大国把卢森堡瓜分给了比利时和大公——即荷兰国王。1842 年卢森堡加入普鲁士关税同盟。1866 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并解散德意志邦联时，卢森堡大公国便成了普法之间争夺控制权的对象，并由此而使普鲁士和法国几乎要以兵戎相见。然而，1867 年的伦敦条约规定卢森堡为在大国集体保证下的一个永久中立国家；(13)但仍保留了同德国的 155 关税同盟。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德意志邦联的要塞的城市，当其政权隆盛和工业发达时，作为一个现代交通的 2015. 中心，它的重要性也就更大了。卢森堡大公国因而在 1914 年比德国入侵比利时更早两天就遭到德国侵略，并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着。

但卢森堡与比利时不同，它不具备交战国的资格，因而被拒绝在和会上占有席位。法国和比利时都想兼并它；卢森堡人则希望继续独立和中立。凡尔赛和约废除了卢森堡同德国的关税同盟，1922 年卢森堡和比利时结成关税同盟。但在政治上还未完全解决。对卢森堡说来，也同对比利时说来一样，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承认了这个中立制度的告终，不论协约国作出怎样的安排来替代这个中立制度，德国都得照办；但是并没有作出这种安排，因而卢森堡宣称 1867 年的条约仍然有效。卢森堡于 1920 年加入国联，但它提出，它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的地位，可以豁免按国际盟约承担军事义务，此项请求遭到了拒绝。1926 年卢森堡要求参加洛迦诺公约，但英国认为给这个大公国作出保证不是英国所十分感兴趣的。因此，卢森堡退而根据仍然存在的 1867 年条约，要求承认其中立，英国则认为卢森堡参加国联时中立已告结束。当 1935 年对意大利施行制裁时，卢森堡同瑞士一样仍根据这一中立政策行事。1935—1936 年，国联未能制止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德国又重新武装莱茵兰而破坏了洛迦诺体系，这就搬掉了瑞士、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战后政策赖以建立的基础，迫使它们回到了传统的中立地位。德国的重新崛起对比利时的威胁特别大。比利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已经一度使它成了德国侵略的牺牲品；它从 1919 年的肢解德国中得到过领土方面的好处；而瓦隆人和佛兰芒人之间的分裂使它具有类似双重民族国家的性质，这一分裂山许看来对德国的宣传和渗透特别有利。从德国人的观点看来，也许不幸的是，尽管手头有着具有条顿气质和亲德感情的佛兰芒民族主义这样一件分裂比利时国家的最好工具，但在比利时发迹的最显要和最成功的法西斯首领德格雷尔在血统上却是一个法国人，而他的保皇党几乎得到瓦隆人中产阶级下层的全力支持。然而比利时人还是深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1936 年他们来了个政策大转变，企图逆转那种 1914 年的事态发展，并想恢复得到保证的地位。此事所

关于保皇党运动在 1936 年最猖獗的情况，见《概览，1936 年》，第 36—37 页。

见同上书，第 351—360 页。1920 年同法国缔结的军事协定在协约国对莱茵兰的占领于 1929 年结束时早已废弃了。

取得的成功只是英国和法国都于 1937 年宣布它们认为比利时已解除了按洛迦诺条约承担的义务，但英法自己对比利时的保证仍然对英法具有约束力；德国则针锋相对地以另一种比较含糊的措词保证比利时的不可侵犯。1939 年的比利时就是在这样一条不安稳的三脚凳上维持平衡的。这个国家总的说来是抱住中立不放的，是把中立当作它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防止侵略的保障了。比利时政府懂得，唯一要担心的侵略来自德国，因而它对英法的保证给予相应的重视。但利奥波德国王及其幕僚特别强调不要触犯德国而危及中立的愿望，使比利时不能同英法举行参谋人员的谈判，而这种谈判对它的军事防御来说却是有其必要的。至于卢森堡，它在 1936 年就寻求同比利时缔结防御协定，1937 年它再次要求英法给予保证，但都遭到拒绝。

瑞士的处境比较幸运。它的中立地位一直是欧洲公法的组成部分，从未有过间断；它的中立是得到国联承认的；而当国联垮台后，只需要把它的中立重新规定一下就行了。1938 年 5 月，讨论在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的国联理事会和大会会议也认可了瑞士此后 157 不参加任何制裁的意向，这实际上给瑞士解除了国联盟约的义务，承认它回到它先前存在的永久中立的地位。1938 年德国并吞奥地利似乎给瑞士带来了特别大的危险，因为德国并吞奥地利后使瑞士三面受到轴心国的包围（比利时和卢森堡不是这样）。但它在地理上是一个平地拔起的山区，险隘雄关成了它真正的安全所在；单是这一点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捍卫了它的中立，在 1939 年新的危险处境中，可能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相形之下，比利时和卢森堡却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欧洲战争，几乎没有避免遭受侵略的希望，它们中一个得到了大国的重新保证，另一个并无所得，只有自言自语而没有得到别人支持的 1867 年的中立；不过中立的保证后来再次被证明是同 1914 年时一样不值一文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国家地位之不同，并没有免除它们遭受被倾覆的相同命运。

见《概览，1937 年》，i.346—368。

见《概览，1936 年》，第 354 页注。

《概览，1938 年》，i.152；邦儒尔：《瑞士的中立》，第 118 页。

1939 年对希特勒的计划看来并没有规定要入侵瑞士，虽然他说过瑞士会顽强地保卫它的中立，但他在谈到低地国家时也说过这种话的。见 1939 年 8 月 12 日希特勒同齐业诺会谈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x.42（1871—PS）；《阴谋与侵略》，iv.509〕；又见，希特勒于 1939 年 8 月 22 日对他的总司令们的讲话〔《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42（798—PS）；《阴谋与侵略》，iii.585〕。参阅 1939 年 8 月 31 日关于进行战争的第 1 号命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57（126—C）；《阴谋与侵略》，vi.935〕。这三个文本又见《文件，1939—1946 年》，i.172，443 和 499。

（二）没有保证的中立：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象低地国家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团结的传统。丹麦、瑞典和挪威（冰岛当时是挪威的属地）这三个王国从1397年到1520年一直结成卡尔玛联合。丹麦和挪威直到1814年还保持着联合，这一年作为维也纳会议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挪威才被转让给瑞典，但冰岛则和丹麦结合在一起。挪威直到1905年才退出同瑞典的联合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冰岛迫至1918年才获得类似于英国自治领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但仍拥丹麦王为元首而同丹麦相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象荷兰一样历来奉行中立政策，这一政策从未写入欧洲158公法，而在于它们拒绝参加大国联盟。这些国家自1815年以来迄未参与大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们坚持了中立。然而它们也并非没有从那次大变动中得到好处。这次大变动摧毁了它们最害怕的两个大国。低地国家和丹麦生活在德国的阴影之下达五十年之久；瑞典生活在俄国的阴影之下达二百年之久；而在1919年，德国和俄国都同样筋疲力尽，一蹶不振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竟然从它们没有出力的一场胜利中得到了领土上的好处。在和平协议中，大国把斯匹次卑尔根给了挪威，并在1920年经公民投票决定把北石勒苏益格归还给丹麦。相形之下，瑞典则未能从新独立的芬兰手里收回它在1809年连同芬兰一起割让给俄国的阿兰群岛。但是瑞典所处的地位不同于挪威，挪威是一个大西洋国家，瑞典也不同于丹麦，丹麦两面临海。只有瑞典全然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并全然面对着东方；那两个国家只有一个德国问题，瑞典还有一个俄国问题。因此，瑞典现在既然有了一个姊妹国家芬兰插在它自己和它的宿敌之间，而波罗的海现在又再也不受任何强国的控制，其周围都是一些从俄帝国的崩溃中

有关卡尔玛联合的历史意义，见托因比：《研究》，ii.175—176。冰岛从930年到1263年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263年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开拓者宣誓效忠挪威国王。

见克拉特威尔：《和平变化》，第91—95页；《概览，1920—1923年》，第232—233页。

冰岛在1918年取得独立的时候发表了永久中立的宣言，因此从未参加国联；但是该项宣言是单方面发表的，在国际法上不具有法律效力（奥本海姆：《国际法》，i.218注；克拉特威尔：《和平变化》，第184页）。在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曾保证瑞典和挪威的领土完整，1907年，英、德、法、俄曾保证新独立的挪威的领土完整（古奇和坦珀利，第8卷，第63章）。但这些保证并没有强加中立于人，而且挪威已在1922年通告废除1907年的条约（《概览，1920—1923年》，第231—232页）。

自1815年以来，这些国家卷入欧洲战争的只有一个国家：丹麦，它参加了1864年反对普奥的战争，结果丧失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但荷兰象十九世纪时的英国那样，避免在欧洲进行冒险，却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获得了补偿，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873年到1909年旷日持久的亚齐战争中征服了北苏门答腊。

《和会史》里没有谈到斯匹次卑尔根问题的解决。有关挪威人向和会陈说的理由，见戴维·亨特·米勒：《我在巴黎和会上的日记》（DavidHun-terMiller:MyDiaryattheConferenceofParis），私人印刷，1924—1926年版，xvii.479—483；参阅詹姆斯·T·肖特威尔：《在巴黎和会上》（JamesT.Shotwell:AttheParisPeaceConference），纽约，麦克米伦，1937年版，第181页注。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的主权是通过1920年的一项条约得到承认的（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0页；《概览，1924年》，第258页，第462页；《概览，1925年》，ii.226）。苏联在1924年承认挪威时斯匹次卑尔根的主权，并于1935年自愿加入1920年条约。见《北欧人》（Norseman），1947年3—4月号合刊，第83—90页。

见《和会史》，第2卷，第4章，第1编。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4—238页。

建立起来的爱好和平的小国，它也就从这一好处中得到慰藉，在很大程度上消释了它未能收回阿兰群岛所感到的失望了。

除冰岛外，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成了国联的创始成员国，是集体安全和裁军两项孪生政策的最诚挚的支持者。在世界各国中，唯有丹麦在二十世纪二十 159 年代的内政方面所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把它的小小武装部队缩编为一支警察力量；在世界各国中也只有冰岛，既没有海陆军，也没有防御工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着相互商讨和合作的习惯，仿佛与英联邦类似；两者之间有一点确实很相似，英帝国于 1932 年召开了渥太华会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在 1930 年召开了奥斯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根据奥斯陆公约，六国同意未经事先协商不提高相互之间的关税。

但由于这个集团相互之间的贸易只占它们对外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因此公约的经济意义不大；而随着在德国纳粹革命以后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奥斯陆国家”的存在只不过反映了它们业已觉悟到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彼此合作的好处，而事实上这些共同面临的危险已使得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合作了。在国联垮台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历来就来曾有得到保证的中立，也就谈不上想要恢复中立。它们采取了解除对意大利制裁的共同政策，直到最后都不愿意放弃集体安全的希望；它们力图恢复奥斯陆公约；但除此而外，它们便别无他法而唯有重新武装一途了。可是，荷兰重新规定了它在国联盟约下承担的义务，于 1937 年宣称它根据该盟约第十六条将不允许他国部队通过它的领土，理由是这会不可避免地将它卷入敌对行动中去。它希望因此取得类似瑞士自 1920 年以来在国联同意下享有的那种地位。它还带头劝说奥斯陆国家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当 1937 年希特勒表示愿意保证荷兰和比利时的完整和中立时，荷兰人回答说，他们的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是大家承认的公理，不能作为国际协议的题目。同瑞士和比利时有保证的中立政策形成对照，荷兰人主张的是另一种没有保证的中立政策。

荷兰的政策在寻求中立方面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更为积极，因为如果德国同西欧大国之间的一场新的冲突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 160 亚国家在易受袭击的程度上是不同的。荷兰是首当其冲的，而且有种理由可以预料得到，在另一场全面战争中它又要充当 1572 年和 1672 年以及 1793 年的角色，而非 1914 年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概览，1920—1923 年》，第 229—230 页。芬兰于 1924 年在外交上加入斯堪的纳维亚集团（《概览，1924 年》，第 461 页）。进一步的情况见下文，原著第 246 页。

见托因比：《和会后的世界》，第 37 页；《概览，1920—1923 年》，第 281 页；《概览，1935 年》，ii.79—81。

见《概览，1924 年》，第 73—77 页；《概览，1929 年》，第 32 页注。

见《概览，1931 年》，第 154 页注；《概览，1932 年》，第 38 页。1932 年芬兰加入了这六个国家的合作。

见《概览，1935 年》，ii.472—474。

见《概览，1937 年》，i.96—99。

见《概览，1936 年》，第 121 页，其中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

见《概览，1937 年》，i.349 注。

见《概览，1938 年》，i.145—146。

见《概览，1937 年》，i.353。

德国的战略是要求入侵比利时以包抄法国的左翼，而要把比利时同作为一个整体的低地国家区分开来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个“马斯特里赫特地区”，该地区是荷兰的领土，向南几乎延伸到列日，把比利时和德国的边境距离缩短了一半，否则比利时和德国就会有一条共同边界了。荷兰的中立所依赖的从来不是荷兰军队的实力，而是德国的这样一种算计，即，还是让荷兰留作“我们可以呼吸的最后一个气孔”为好。可是，1939年低地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却已有了变化。自从1919年以来，比利时沿它的东部边界或即沿毗连德国的边界大大加强了防御，成为法德边境马奇诺防线的延伸。因此，和1914年一样，德国就只有入侵比利时，以便抄法国的左翼，因此德国在一场同法国发生的新冲突中，可以预计，它会被迫入侵荷兰去抄比利时的左翼的。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荷兰人不能不考虑到的。假如德国人的政策只是在东方发动一场征服战争，同时对西方大国打一场遏制性战争，那就可能出现和1914年正好相反的局面，德国的战略可能不去侵犯比利时，却进攻并占领荷兰，以便沿荷兰海岸建立针对英国的海空军基地。但事实上德国的战争计划并没有将这两个国家加以区分，德国人设想它们会成为一个战区。勃洛姆堡1937年6月24日的命令就用过这样的假设：这两个国家的中立会受到法国和英国的侵犯。到了1938年8月，德国空军极力主张：低地国家“在德国手里对英法进行空战会有非同一般的好处”。希特勒在1939年5月23日的军事会议上宣称必须强行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中立宣言务必不予理睬”。丹麦是受到德国1933年以后提出的修订条约论威161胁的首批国家之一，问题涉及北石勒苏益格，德国谴责凡尔赛和约对基尔运河的统治形式也影响了丹麦的利益。在荷兰，米塞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1935年和1937年之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小小成功；而成为卖国贼通称的那个挪威吉斯林，在挪威议会固然没有为他的党争得哪怕一个席位，但他在1939年却同罗森贝格结成密切关系。丹麦和挪威由于处在大国之间的战略地位，其易遭攻击的程度绝不比荷兰小。这两个国家都在北海的一侧，隔海正对着英国，从现代海空战略角度来看，它们可以恢复彼此历史上的政治联合；而且，从一个受到包围的大陆德国的观点看来，挪威是一条往北远达设得兰群岛海峡

这话是毛奇在1912年12月一个备忘录中说的；见C.R.M.F.克拉特威尔：《大战史，1914—1918年》（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34年版，第8页。

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744（175—C）；英译文载《文件，1939—1946年》，i.13；参阅《阴谋与侵略》，vi.1011；参阅1938年6月2日德国空军计划研究报告，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viii.415（150—R）；《阴谋与侵略》，viii.270。

德国空军总参谋部情报局1938年8月25日关于“扩大的绿色行动”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391（375—PS）；《阴谋与侵略》，iii.287—288。

见《概览，1933年》，第171—173页；《概览，1936年》，第43页和注。

见《概览，1937年》，i.376。

见巴塞洛缪·兰德希尔编：《荷兰》（Bartholomew Landheer, ed.: The Netherland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3年版，第129—130页。米塞的运动，象德格雷尔的运动一样，在1936年其势力也盛极一时。

见1940年6月15日罗森贝格关于在挪威采取行动的政治准备情况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26—27（004—PS）；《阴谋与侵略》，iii.20。

的海岸线,在特隆也姆和纳尔维克提供了便于进入不设防的大西洋和不冻的海港。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德国的政策虽然看来是宁愿维持斯堪的纳维亚的中立,但明摆着的又是,一旦战争开始,占领那么值得弄到手的丹麦和挪威基地,无论对德国或英国来说,总比接受这两个国家的中立或把它们丢给敌人是一个更稳妥的办法。对比之下,瑞典从自己对邻国所暴露的地理位置上倒可以有几分获利的希望;因为,如果德法之间的战争是穿过低地国家而进行,如果德英之间的战争是跨越丹麦和挪威的国土而沿着北海海岸展开,德俄之间的战争则可能遵循历史老路沿波罗的海南岸而横跨波兰和三个大陆上的波罗的海国家的疆域,那末,瑞典就可以成为一个固定不动的缓冲国,成为旋转不停的北部世界的静止中心。至于冰岛,自1918年独立以来,它的幸运在所有国家之上,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国际关系;所以只有最敏锐的洞察力才能预见到它在1939年已处于一场战略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使它的中立失去其价值,并使它的地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暴露得最突出,成为大陆之间的一件抵押品,成为不仅是旧时代巨人英国和德国争夺的目标,而且也是未来巨人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竞相争夺的目标。——

原文是 Trondhjem, 即 Trondbeim (特隆赫姆) 的旧称。——译者

见1939年10月9日邓尼茨关于挪威基地的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xxxiv.159—161(005—C); 《阴谋与侵略》, vi.815—816〕和1943年11月7日约德尔在慕尼黑的演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xxxvii.636(172—L); 《阴谋与侵略》, vii.924—925〕。1940年希特勒之占领丹麦和挪威,同拿破仑1807年通过枫白露条约迫使丹麦—挪威王国加入大陆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但拿破仑的主要动机是经济的,希特勒的主要动机则是战略的。

见1939年8月12日希特勒同齐亚诺会谈记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xxix.42(1871—PS); 英译文见《文件, 1936—1946年》, i.173; 参阅《阴谋与侵略》, iv.509〕和1940年6月15日罗森贝格关于在挪威采取行动的政治准备情况的报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xxv.28—29(004—PS); 《阴谋与侵略》, iii.22。希特勒在1939年12月16日和18日对吉斯林说,他宁愿斯堪的纳维亚中立〕。参阅海军作战日记摘录, 1939年10月3日挪威基地调查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xxxiv.422—425(122—C); 《阴谋与侵略》, vi.928〕和前一脚注提到的资料来源。

见《概览, 1936年》, 第533页。瑞典对德国的重要性不在于战略地位,而在于它是一个铁矿和镍矿的来源,因而保护这个来源后来便成了占领丹麦和挪威的缘由之一;见1940年3月1日“威悉演习方案”指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xxxiv.729—732(174—C); 《阴谋与侵略》, vi.1003—1005〕和1943年11月7日约德尔在慕尼黑的演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xxxvii.366(172—L); 《阴谋与侵略》, vii.924〕。

（三）海外帝国

这些小国对于它们成为其组成部分的西欧社会的依赖，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它们的殖民领地的脆弱性方面。凡是它们之中有着面向大洋的海岸的国家，诸如丹麦、挪威、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等，都曾参加西方文明的全面扩张，正如兰克把它们比作是在一个身上起呼吸作用那样。冰岛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它自己就是黑暗时代斯堪的纳维亚文明扩张的产物，那时西方文明尚未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只有瑞士和卢森堡因为是内陆国家才未曾参与这一运动。到了1939年，瑞典已经放弃了它的海163外领地。但丹麦对北美的大岛屿格陵兰仍然拥有主权。荷兰也仍然拥有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西起库拉索岛，东迄新几内亚。这个帝国是荷兰在十七世纪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得的，它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不曾因英国的侵蚀而受到削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代人期间并获得了扩大和巩固。比利时由于在十九世纪后期参加了非洲的瓜分，因而拥有一个巨大的非洲帝国。挪威作为独立国家是最年轻的一个，但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同样的西方扩张倾向，它在北极和南极取得了几个未被占用的岛屿，而且在希特勒进入布拉格和接着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变为德国的保护领地之前仅仅几个星期，还兼并了南极大陆的一大片比大德国本身还大许多倍的地方。——西欧小国同西欧大国的海外领地在政治地理方面互相依存的程度，甚至要比这些国家在欧洲大陆上的本土还要密切一些。西欧小国的殖民帝国全都是它们的母国无法保卫的。荷兰在东印度的领地，象葡萄牙的领地一样，对英国是无法防范的，荷兰的政策就是以这一前提为根据。比属刚果三面受英法领土的包围，理所当然地要同它们搞好关系。挪威对南极的所有权是在英国同意下发展的。而荷属东印度，象丹麦的格陵兰一样，只有博得美国的欢心才保得住。

这些海外帝国不仅是同它们的母国一样脆弱，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比母国更有价值。对于要想征服它们的母国的征服者说来，这些海外领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的战略地位，而不在于它们的财富或工业，但荷属印度和比属刚果在世界的战略原料和粮食的生产国中占有很高地位，它们本身就是大家贪图的有价值的目标。殖民小国的处境必然要比殖民大国更困难、更危险。它们在世界上的份量同它们所拥有的领地不成比例，这注定了它们得挨揍。1939年3月15日，德国还在忙着破坏欧洲的凡尔赛和约，便已经把它的殖

利奥波德·冯·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494—1514年》（Leo-poldvonRanke：HistoryoftheLatinandTeutonicNations，1494—1514），G·R·丹尼斯修订的英译本，伦敦，贝尔，1909年版，第19页。

见托因比：《研究》，ii.291—292，354—360。

见上文，原著第24—25页。

见上文，原著第148页，第149页和注

这两处广大的葡萄牙非洲殖民地和比属刚果不同，它们有广阔的边境靠着海洋。安哥拉的大陆边境有一半同南非和英国的领地接壤，另一半和比属刚果接壤。莫桑比克的大陆边境全部和南非及英国的领土毗连。

乡间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AdolfHitler：MeinKampf），两卷集第1卷，第305—306页（慕尼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年版），第152—153页；《我的奋斗》英文版（詹姆斯·墨菲译），两卷集第1卷（伦敦，赫斯特和布莱克特，1939年版），第127页。原文本和英译本以下简称《我的奋斗》和“墨菲译本”。

民地要求别具深心地伴随着它的欧洲政策一起进行了。而且，正象它在欧洲的目标已不再是恢复 1914 年边界 那种保守要求了，所以也就很清楚，当它把注意力转向海外的时候，它是不会简单地满足于恢复过去的殖民地的。意大利对欧洲以外的野心由于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而暂时得到满足，日本暂时还全神贯注于征服中国，但这都仅是促使征服者更逼近在非洲和东亚的无法防御的欧洲帝国的步骤而已。这些殖民小国懂得，它们的帝国是得到西方大国的默许才得以保持的；而且它们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关于葡萄牙帝国的那些协定，因此，它们很可能想知道：那种把满洲丢给日本、把埃塞俄比亚丢给意大利、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丢给德国的政策，是否可能会导致企图牺牲较小的殖民地帝国以满足德国的殖民地要求。

当时谣传，哈利法克斯于 1937 年 11 月访问希特勒对讨论过涉及这些小国的一项英德殖民地解决方案，斯巴克于是宣布，比利时将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卫 165 比属刚果。有关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虽然哈利法克斯在那次访问时只是一般地谈到了殖民地问题，但三个月以后，亨德森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份出自英国政府的关于该问题的书面建议，这份书面建议是对英国的盟友法国人而尤其是对比利时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保密的。该建议主张在大致相当于刚果盆地条约的协定区的一块非洲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制度。每个国家在那里仍然主要是管理它自己的领土，尽管要同意某些促进文明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又将是一次对殖民地的重新分配，德国将再一次置非洲土地于其主权之下。不清楚的是，英国政府的心目中是否单单是以委任统治形式把坦噶尼喀归还德国，或者说，其他国家的领土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希特勒的回答是，他要的是归还德国从前的殖民地。而不是一个复杂的

参阅《概览，1937 年》，i.33，326，340。

“1914 年的疆界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是毫无意义的”（《我的奋斗》，第 738 页；墨菲译本，第 530 页；分别参阅该两书的第 736 页和第 529 页）。见下文，原著第 335 页。

见上文，原著第 149—150 页。

《概览，1937 年》，i.368 注。参阅埃里希·科尔特：《空想与现实》（Erich Kordt：Wahn und Wirklichkeit），第 2 版（斯图加特，德意志联盟出版社，1948 年版），第 90—91 页，作者把亨德森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建议说成是在 1937 年秋天提出的。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辑，i.55 以下。

同上书，第 240—249 页；苏联外交部：《德国外交部档案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和材料》（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8 年版，第 1 卷，第 3 号（该文集以下简称《德国外交部档案文件》，苏联出版）。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辑，i.242—243，246。协定上的刚果盆地是地理上的盆地的扩大，是 1885 年 2 月 26 日柏林总协定第 1 条第（2）和第（3）款规定下来的，它在大西洋一面延伸到南纬 2 度 30 分和安哥拉的洛热河河口之间，在印度洋一面延伸至北纬 5 度和赞比西河河口之间〔《英国与外国国家文件》（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 Lxxvi.9 参阅 S.E.克劳《柏林西非会议，1884—1885 年》（S.E.Crowe：The Berlin West African Conference，1884—1885），伦敦，朗曼，格林，1942 年版，第 108 页以下。亨德森在他同希特勒的谈话中具体提到印度洋一面的边界。协定上的刚果盆地包括比属刚果，英国属地乌干达、肯尼亚、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英国委任统治地（从前是德国的委任统治地）坦噶尼喀、半个濒临印度洋的索马里兰和半个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以及法属赤道非洲、埃塞俄比亚和葡属安哥拉的部分边缘部分。

国际制度；他不想把别国卷进去，而比利时和葡萄牙会同意吗？”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宣称，他相信葡萄牙和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和意大利，到头来是会在这项解决方案中合作的。”德国在一个星期以后征服了奥地利，英国的建议看来在德国征服奥地利以后便没有进行了。西方的中立国只能期望，英国由于传统上对非洲和印度洋势力均衡的破坏比中欧发生此类事情更为敏感，它此后会在其政策中承认，大的海外帝国是交互地依靠于较小帝国的安全的。 —

第四节 法国

D·R·吉利

（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和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和破坏对 1939 年 3 月法国人民前景的影响 较之对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大。法国的出生人数自 1880 年就开始下降，这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开始得早，不过下降的趋势比起后来其他国家的情况要缓慢一些，这意味着法国在 1914—1918 年的战争中征募的士兵来自比德国和英国士兵小一些的家庭。在 1911 年的法国人口中，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人（即在战争中蒙受最大损失的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在英国人口中则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在德国人口中则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据计算，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命损失为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人，占法国服役年龄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二，德国损失了一百八十五万五千人，占百分之十五点五，英国损失了七十四万四千人，占百分之八点八。

但是即便是这些数字也还不能充分说明战争对法国人口的影响。在四年战争中，法国平民生活受到的破坏远远超过它的邻国，法国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因此从 1911 年到 1921 年的十年中，法国平民和军人的死亡总数超过同一时期的出生人数竟达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人。1915—1919 年期间的出生率下降在二十年后表现为育龄妇女的减少；因此，在 1921—1930 年这十年中（在这十年中的一段时间，法国的出生率高于英国）出生人数虽然比死亡人数多七十一万四千人，但在 1931—1940 年这十年中的死亡人数却又超过出生人数十二万五千人。正当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政策需要法国采取一项果敢而在作战中可能要损失大量生命的政策时，法国出生人数却从 1932 年的七十二万二千人减少到 1938 年的六十一万二千人，其后由于采取了一些战战兢兢的初步的鼓励生育 167 并制止堕胎的立法步骤，1939 年的出生人数才略有回升（六十一万三千人）。在 1936—1940 年期间，武装部队每年吸收入伍（也就是吸收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的年轻人从平均每年二十四万人剧降至每年才不过十二万人，致使法国不得不在 1935 年把服役的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加强法国的军队，而是为了要保持其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生命损失所造成的影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还是十分深刻，那末物质损失所留下的影响也正是这样，只是惊人的程度稍稍不如罢了。多年来一片重新建设的景象叫人鼓舞而不是沮丧。可是当 1938 年人们庄严地庆祝兰斯大教堂修复工程完成的时候，却又正是在德奥合并和慕尼黑危机之间，人们不禁要问，这种重建工程是否会终于徒劳呢。

关于人口统计数据，曾使用下列著作：米歇尔·休伯等：《法国的人口》（Michel Huber and others：Lapopulation de la France），巴黎，阿歇特，1937 年版；夏尔·里斯特和盖坦·皮鲁：《从战前的法国到今天的法国》（Charles Rist and Gaetan Piron：De la France d'avant guerre à la France d'aujourd'hui），巴黎，西里书店，1939 年版；阿尔弗雷德·索维：《财富和人口》〔（Alfred Sauvy：Richesse et Population），巴黎，帕约，1943 年版〕和《幸福和人口》〔（Bein-étreet Population），巴黎，法国社会出版社，1945 年版〕；罗贝尔·德勃雷和阿尔弗雷德·索维：《法国的法国人》（Robert Debre and Alfred Sauvy：Des Français pour la France），巴黎，加义马尔，1946 年版。

在市中心，仍然有一些街区没有重建，只有兰斯的第二个教堂圣雷米教堂的中殿重新换上了屋顶。

（二）法国对人口问题的态度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命损失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正是那些秉性卓越、朝气蓬勃，因而是处于战斗最前列的年轻人的大量伤亡。的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表明，年轻一代同前辈一样素质的人有限，在政治生活中还不能完全取代年长的一辈。如果法国的精神气氛有利于培养有胆略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此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许就不值得那么注意了。领导人不只是先天的，也是要通过培养的。然而正是此种精神气氛受到了影响，一方面是对四年半来的巨大努力所作出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人口结构的重心偏向于老年人一边。在 1914 年以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法国人口中也只占数量上极其微弱的优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连这一点优势也消失了。

此种现象并不妨碍在文学艺术上出现灿烂的成就，但是它却妨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上它损害了自力更生的力量，它使法国不愿意冒险，而法国打算同德国东面和东南面的弱小国家结盟来保证自己安全的政策势必是有风险的。

法国人对自己人口问题的态度就是此种静上的精神 168 状态的例证。法国的年轻人因物以稀为贵而更加是宝贝了，在世界上法兰西民族的躯体不再占有象以前那样大的空间了，法国为了取得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是太昂贵了（因此感到法国的盟国都成了它的债务人），为争取另一次胜利再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将是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这种想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整二十年里构成了法国人的思想和心理反应的基础。可是，人口问题却很少得到正视，除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争取实行明智的人口政策的运动总是被人们当作一种使人发笑的怪主意。

关于人口问题，有一种说法在群众中间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那就是芒让将军的说法，他宣称法国的人口不止四千万而是一亿，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好的北非部队和黑人部队就是未来的大法国的先驱。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引起了自满情绪，而且后来将会看到，这种说法甚至也没有进而形成它所意味的那种法国殖民政策。

在 1939 年以前，法国从未认真考虑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无论是婴儿或壮年人的高死亡率问题抨击得也不够。

在移民入境方面，也没有一贯的政策。法国 1939 年的人口略多于 1911 年法国和阿尔萨斯—洛林人口的总和，这是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法国。单是 1921 至 1930 年的十年期间就有一百八十一万一千名外国人定居法国。按 1931 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外国人有二百七十一万五千人，而在 1911 年只有一百一十六万人。外国人的人数在 1936 年降为二百一十九万八千人，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取得了法国国籍。可以看到，大量外国人的流入也不过是弥补了 1914 至 1918 年期间的损失。

在繁荣时期，移民流入是得到鼓励的，但普遍的看法是，移居是移民的特权。在 1934 年萧条时期，为了所谓关心更多的法国人就业，确实曾经作出努力，要把那些在法国定居多年并已经在法国成家的矿工赶回本国去。因此

只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政治和社会问题才开始取代美学和个人道德问题的地位。

而激起了抗议，首先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终于开始唤起公众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旨在同化移民或防止移民形成严密的群众组织——例如靠近其本国边界的意大利人——的政策，这又激起排外情绪。此种情绪不无其合理因素，因为只要法国对这种倾向提不出对策，法国南部的大片土地确有沦为其邻国的殖民地的危险。意大利的领事对意大利的移民便行使了相当于法国当局所行使的控制权；意大利出生的妇女被劝使回到她们的本国去分娩，以免法国认为这些孩子是法国人，然而这些孩子的上学费用却要在法国的税收项下拨付。一旦发生战争，法国的农民要上前线而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却会留在农场上，此种想法又为法国和平主义提供了另一个主题。

（三）经济状况

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国对外来移民的需要，必然也就不会认识到这些外来移民可以为法国作出的贡献。法国和它的海外领地都具有进行经济扩展的条件，要是有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帮助，法国会取得比它在两次大战之间取得的成就大得多的经济扩展。

法国当时已经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成为接受欧洲其余国家未使用劳动力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缺乏那种热烈的劲头，法国本来应该步美国的后尘而高速扩展的，而法国之所以缺乏热烈的劲头正是由于它的年龄结构。法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农业产量没有下降，却有一百三十万农业劳动者，包括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转入其他职业。在法国历史上，按照法国统计学家分类的城镇人口（有两千以上居民的市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不一定是农业）人口。1936年，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四，后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可是制造业远非主要的受益者。商业和运输，自由职业，公共事业的发展都超过工业发展的幅度。但在工业部门中，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确实是在排挤纺织和衣着工业的条件下取得扩展的。从1913年到1929年，钢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从四百八十七万吨增加到九百七十万吨，达到繁荣时期的最高产量。与此同时，法国同它的海外领地之间的贸易，在法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11—1913年的百分之十点一六增加到1934—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则从百分之十三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九。

可是，乡村的稳定，极受珍视的城乡之间的平衡，却限制了新的动力的发展。除了印度支那以外，殖民地的工业都没有什么发展。法国本应为它的海外领地的发展感到万分满意与自豪，但由于缺乏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海外领地的发展却经常引起反对的意见。连法属西非的香蕉生产也引起担心，害怕它会影响到法国国内水果的销路。在丰产的年份，对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酒和谷物的进口要设置障碍，而从理论上说阿尔及利亚应是法国的一部分。殖民地的产品很少有免税的。甚至印度支那的工业也引起一些人的不安。由于对北非工业的发展设置了实际的障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940年对是否要把政府和尽可能多的军队转移至北非需要作出决定时，提出的一条重要的争辩论据是：在马格里布不仅不可能补充到一枪一弹，甚至连一家能够生产衬衣、靴鞋和钮扣的工厂也没有。

如果当时法国的人口不断增长，它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了。如果它的经济迅速扩展，它就更有理由发展它的海外领地的经济。其实法国引以自豪的国内人口的平衡不仅阻碍它产生权力，而且使它失去追求权力的欲望。由于法国在1914—1918年几年里为共同事业作出了莫大的努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因而它更珍惜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而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有其逻辑的结果，那就是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使法国殖民者最优秀的才能也无法发挥。重商主义是一种计划形式，然而在法国却不为计划提供必要的情报，因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法国的统计资料最不完备，这一事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至关重要的。法国本身仍然是一个小城镇占优势的国家，小城镇的活力在衰退，它的投票权却没有减少。小

商店和手工业者得到国家的虚伪保护，而过去一直支持地方活力和创业性的地方大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早期就被巴黎一些银行并吞掉了，那次危机在 1930 年就开始被人感到了。马克·布洛赫在回顾法国 1940 年夏未失败的原因时写道：“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这里被征服的正是我们如此眷恋的小城镇，它的浪费时间，它的短视的政治争吵，它对一切已知事物的偏好和它对一切新奇事物的猜疑。”——正是这一部分法国人阻止法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它强大的金融力量，效法美国和比利时的榜样，自动实行货币贬值，从而几乎可以无痛苦地终止危机，并避免 1936—1937 年的那种尖锐的社会冲突，而那时却正是需要它积蓄力量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时刻。保罗·雷诺把 1936 年的选举说成是法郎含金量被规定为六十五点五毫克的结果，这种说法并不荒唐。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一度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肮脏的唯物主义”，同时发表的议论又好象他认为法郎的黄金平价和每一个法国青年的道德完整是一致的，他迟至 1944 年还写出并在 1947 年发表下列的论点：

（货币贬值）这一味药对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许是最好的，英国的繁荣基本上是以交易及其附带的（金融、保险、航运）的利益为基础的，对法国这样的国家却是毒药，法国是一个天然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只有消费者收入的稳定才能保证生产者的正常报酬。——

(四) 政界的右翼和左翼

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上，此种坚持稳定不变的经济政策，就象一味强调安全而不改弦更张的外交政策一模一样，两者都是自取失败的政策。此种经济政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保守阶级的精神士气方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国的保守派曾掌握政府的全部权力：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4年，以国民联盟的形式执政；第二次是1926年至1932年，在左翼力量于1925年至1926年的金融危机中分裂后执政；其后，在左翼力量发生同样的分裂后，又在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38年至1940年执政。英国的鲍德温时期在英国大部地区尚能维持令人满意的、至少是差强人意和社会宁静的繁荣，法国唯一能与鲍德温时期相比的年代是从1926年至1929年。其后几年的标志是，法国的保守力量未能找到解决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办法，这样就必然引起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这种失败的后果是在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一再实行没有成效的货币贬值之后才完全暴露的，可是人民阵线的错误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前任政府的错误。为了抚慰1929年被粉碎了的希望，抚慰中产阶级保守派被损害了的自信心，一切责任都被推到领导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莱翁·勃鲁姆身上，许多法国人对他的痛恨简直达到了极点。然而，这并不能恢复已失去的自信心，却大大地加剧了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阵线的困难。

172 经济和金融是在一位来自法国中产阶级的杰出首领保罗·雷诺的领导中得到恢复的，他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3月任财政部长，但对业已铸成的精神祸害未能予以消除。保罗·雷诺多年来是一位法国政治的预言家，他不断地指出他的同僚们在财政、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上的各种错误。在1936年的选举中，他几乎被击败，他以强调别人所犯的错误洋洋自得，却并未使他赢得人们的爱戴。作为旷野里的呼声，他在智力上的地位是同温斯顿·丘吉尔相似的，只是他关心的事情更多一些，但他没有象丘吉尔的那种长期担任部长的资历，没有作为一位领袖的相同条件，也没有相同的实际行动的经验。凡是被他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又没有那份从他们那里取得谅解的才能。因此，他的胜利丝毫不能恢复他为其利益服务的那些人的士气，也不能消除他们的憎恨。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阴影笼罩下，经济和金融的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在普恩加赉领导下曾一度恢复的那种健康的民族活力的意识，一度恢复的这种意识在九年困难期间又消失了，当时也曾尝试过四、五种不同而又都是未能奏效的政策。

在左翼方面，失望情绪在1939年3月也占主导地位。在1924年、1932年和1936年，激进党和社会党三次联合起来在选举中获胜，第三次还把共产党包括在内。可是这一联合在面临经济和财政问题时三次分裂(1926年、1934年和1938年)。历次联合都纯粹是以政治的和主要系否定性的目标为基础，因此联合的一再失败也就不难预料了。分歧来自两党首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但两党对此都无突出表现。顽固的教条主义激情已成为它们的阻力，它们对自己的学说都是忠诚不渝的。1938年的失望更使人难受，因为1936年所抱的希望比往日更大。星期五的黄昏，一对青年夫妇骑上双座自行车并在拖斗里带着孩子上城外去度假，这已成为一个和平世界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新希望的象征。这一希望与同时期“向西班牙送大炮”的最响亮的口号，其含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到1939年3月，长长的周末已经消失，共和的西班牙

牙也不复存在，已不能向它送大炮了。在二十年期间，左翼所实现的希望跟右翼一样少。

作为法国政界的右翼和左翼均告失败的结果（它们失败最惨时正值英国人民生活多年来欣欣向荣之际，只有长期失业的领域除外），双方的极端派便纷纷活动，不仅在国家体制之外另找希望，并且还效法其他国家的先例而与之相勾结。

在极右方面，法兰西行动同盟已经从君主专制主义¹⁷³转入法西斯主义，从依靠自身力量的民族主义转入在外国庇护下的排外主义。由于它依靠的是日益衰退的传统，这是一种不可能有重大发展的运动。它的领袖夏尔·莫拉斯致力于恶毒攻击，甚至不惜煽动凶杀，莱翁·勃鲁姆在1935年几乎因之

丧生。¹⁷⁴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的追随者人数要远远超过法兰西行动同盟，一部分原因是它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些可以避免个人主义的手段，那种个人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情况下业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通过组织其中有些人至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如果火十字团能有一批有政治远见和能力的领袖，它也许会形成对共和国的严重威胁；但是，也许是由于它在结构上有缺陷，或是由于组成火十字团的各社会团体对现代问题缺乏了解，又或是由于在它的领导人中多少有些顾忌，又没有胜任的能力，所以火十字团终于对任何人都没有形成威胁。在1934年2月6日的动乱中，火十字团只是工具而不是领导，这场动乱大概是由法兰西行动同盟策划的，而且肯定是由它组织的，杜梅尔格总统则竟成了这场动乱的政治偶像。

尽管这样，火十字团在法国历史上还是有重大影响的。虽然德拉罗克上校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比老约克公爵的军事策略更有实效，但是他的组织所起的恐吓作用，导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1934年2月6日动乱后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同年8月，两党订立了联合行动协定；次年，火十字团的行动又促使左翼激进社会党在由于动乱而下台的总理达拉第的率领下，全党加入人民阵线。最后，虽然火十字团的许多成员以后在战争中证明他们是勇敢的爱国者，但是追随这个主要是反议会制（尽管也起缓和作用）的运动的数十万人后来却成了贝当元帅反议会制政府的坚强支持者。在本书所述及的这一段时期，德拉罗克种种努力的主要效果，便是为共产党人在1936年取得重大成功准备了条件。

怀着发动一场政变的愿望而加入火十字团的那些最坚决的人物在1935年和1936年纷纷退出火十字团而去加入由被开除的共产党领导人雅克·多里奥新创立的法国人民党。与此同时，法兰西行动同盟的极端分子则被174小的恐怖主义组织所吸收，即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通称“蒙面党”，由德隆克尔领导，并得到弗朗歇·德斯佩雷元帅的支持。多里奥的运动是更为公开的法西斯，同法兰西行动同盟的对立也更为人所共知。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是一个专门搞阴谋活动的组织，它把炸弹放在可以嫁祸于共产党人的地方；1937年6月按照罗马的指示在法国暗杀罗塞利兄弟的凶手大概就是由

关于极右翼的政治联盟，见《概览，1935年》，ii.36—38。

见《概览，1934年》，第387页；《概览，1935年》，ii.36。

这件谋杀案的罪责在十二年以后仍未断定。1944年，当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安富索、埃马纽埃尔上校和纳瓦耳少校曾为此案受审。安富索被缺席判处死刑，其他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10月在佩鲁贾对此案重新审判，安富索被宣告无罪，对埃马纽埃尔和纳瓦耳的判决是“指控的罪行未经证实”。《观察家

这个组织提供的。促成这些运动的动机不一定是非爱国主义的，足以证明的事实是：1940年以后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就有来自这些组织的队伍。弗朗歇·德斯佩雷从1940年法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后的态度和更倾向于共和的贝当正好相反。在消沉和沮丧的气氛中，这些极端分子至少都各自作出了反应，但他们之所以要证实自己的学派，主要还是为了进行积极的勾结。“蒙面党”人带回到法国政治圈子来的不仅是煽动使用暴力，而且还精心策划犯罪活动，他们应为此承担极不光彩的责任。

在极左方面，共产党人将近二十年来都在建设一种运动，其组织比极右方面的任何运动更为严密，更有理论训练，基础也更为广泛。诚然，火十字团有一个时期改组为法兰西社会党，其党员人数曾超过共产党，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共产党也曾有过它的衰落和失败时期，但它从未失去恢复和复兴的能力，它驱逐了党内的异端分子，党的实力从未受到严重损失。它终于证明自己在受迫害的情况下是有生存能力的，即使是在1939年以前，它已经显示出惊人的运用策略的能力，在团结群众的战术方面有运用诡辩术的能力。

法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其国际基础的，它是法国最激烈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大声疾呼的继承者，它鄙视马赛曲，它使用“普恩加赉等于战争”这类的口号。可是，它在1936年竞选活动中，却贴出了在凯旋门上高唱马赛进行曲浮雕复制品的宣传画，它要求的是一个“自由、强大、幸福的法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所表现的肯定是一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一旦它对马克思作了足够灵活性的解释，摆脱外国化的专门术语，形成令人回忆雅各宾时代的、生气勃勃的法国人自己的风格，它觉得披上一件民族主义的外衣并无多大困难，这与法国工人阶级的深邃本能是完全协调的。此种转变主要或许应该归功于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两人的杰作，他们在1935年的一次历史性的记者招待会上尽力说服175法国和国外的报界，说法国共产党既不赞成采取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也不受法国以外的势力的控制。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致力于法国福利的忠诚是同任何其他法国人完全一样的，这诚然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但至少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说，他们是把法国的民族事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胜利视为一体的。斯大林通过同意发表支持1935年5月2日法苏条约的正式俄法声明，其中专门谈到他赞同法国致力于重整军备，这样他就（应一位法国外长之请）含蓄地承认他在法国是有影响的。但当纳粹的威胁正在使苏联政府和法国舆论都感到不安的时刻，当火十字团的不断示威使整个法国左翼都感到恐慌的时刻，共产党人便有了一个说服左翼其他党派的机会，使它们相信在国内和国外政治上，可以组成一个恢复旧世界的力量平衡的新世界。对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它终于能达成那种选举联盟，如果没有那种联盟，照法国的单一议席选区制和多党政治制度，任何政治集团所能得到的议席都是肯定不够的。

本来似乎应该看得清楚的事情，后来却并没有看得那么清楚，即共产党

报》，1949年10月16日。

1935年5月15日，在斯大林、莫洛托夫、李维诺夫同赖伐尔为详细确定5月2日条约的含义举行会谈之后，发表了一个公报，其确切的措词是：“斯大林先生理解并完全赞同法国所采取的使其武装部队保持在安全所需要的水平上的国防政策”（《泰晤士报》，1935年5月16日；《时报》，5月17日）。

人所抱的民族团结的动机，可能在一接到通知的刹那间就变成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在他们的追随者看来，他们新近在民族美德方面所赢得的证明却依然是无懈可击的。

在此期间，共产党取得了多方面的好处。作为取得胜利的选举联盟的成员，它增加了它的议席，可是它拒绝参加政府，而在事实上扮演了一个更象是在野党而不象是执政党的角色。它不用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可以为自己树立这样的声誉：它是人民阵线联盟中唯一忠于过去向选民作出承诺的成员。特别是，它可以加强它在工会中的地位，以准备夺取今后的胜利。实际上，它既可以利用法国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对立的深刻的社会裂痕，又可以同它的全国社团在一起利用群众的民族主义精神而垄断法国的革命传统。

在这方面，共产党和工会运动的独特的关系对于它是很有好处的。法国老的工会运动传统坚持工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工会的任务与政治职责是不相容的。这就是法国总工会的理论，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时，共产党的工会活动分子就从总工会分裂出去，组成了单一总工会。1936年3月，总工会和单一总工会合并时，从理论上说，法国总工会的论点取得了优势，但不能真正设想共产党工会运动的习惯和个人联系就会消失，即便共产党人中间有这样的意图也不可能。当昂布鲁瓦兹·克鲁瓦扎担任了众议员而又不顾别人的抗议继续担任冶金工会总书记时，内部破坏者的面目就看得很清楚了。

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随着未经锻炼的工人涌入工会和罢工热情的高涨而增加，及至新的会员逐渐退出，对罢工的信心也慢慢地消失，共产党的影响便随之下降。但是在法国总工会内部有了共产党人以后，他们就可能经常对总工会老会员的权威提出疑问。尤为重要的是，共产党人保持了一个来源，可以从工人阶级中稳步地吸收人员去充实党的较高级干部队伍。至于社会党则几乎不再有这样的来源了，它尊重总工会的老原则，它和工会没有组织联系。它的领导人，如果不是出身于中产阶级，通常也是工人的儿子，是靠奖学金培养成才的。

共产党声称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而且是现实的代表，这种说法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巴黎地区，与此相应，它不仅以民族主义为掩护来向工人宣传阶级斗争的学说，并通过它对中上层阶级的影响，加强了自1848年开始的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阶级的疏远。对资产阶级中的那些强硬分子来说，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借口，说他们从来都是把工会运动当作必须与之战斗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还认为他们的阶级就代表全民族。在1935年5月的市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人在大城市取得的胜利就立即影响到中产阶级对同年5月2日签订的法苏条约的看法，并损害了最初由巴尔图（1934年10月9日被暗杀）发动的运动，即主张法国的外交政策不必考虑苏联的国内的政治体制，正如不必考虑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一样。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难以分别对待的论点至少也是可以讨论的。

177 最出色的为慕尼黑辩护的文章是蒂埃里·莫尔尼埃写的那一篇，虽然刊

见《概览，1934年》，第550页。

关于巴尔图的东欧互助公约计划，见《概览，1934年》，第347—351页；《概览，1935年》，第1卷，第1编（iv）。

载该文的只是一份销路很小的《战斗》杂志，当时却引起了不少的评论。这篇文章之所以更值得注意，乃是由于它的作者终于承认对希特勒有加以阻拦的必要，并且在法国被占领时期，他摒弃了他先前的导师夏尔·莫拉斯所主张的政策。作者在1938年11月写道，任何战争的结局都只能是法国的失败。因为战争的胜利者要么是德国，要么就是苏联。他心中所想的无疑就是说，德国的胜利意味着外国对法国的公开统治，而苏联的胜利则意味着间接的外国统治，其统治方法是通过法国国内的一个少数派，以工会作为工具来控制工业，又以一个政党为手段来控制国家。

共产党在1936—1939年的实力还有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正当国内所有其他政党都分为和平主义者和主张对抗纳粹者两个营垒时，只有共产党人是统一的，不过他们不是统一于和平主义或和平主义者所谓的“好战主义”，他们是统一于不惜冒任何风险保卫和支持苏联的政策。从当时来说，甚至从1934年开始，这一政策就意味着与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结成统一战线，只是并不含有如莱翁·勃鲁姆等人所认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意义，即要反对德国首先必须同英国联合。1938年10月5日，除了一个右翼众议员凯里利斯以外，只有共产党人在慕尼黑问题上投票反对政府。社会党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团结，在表决时弃权。因此，“好战主义者”认为借重共产党的帮助，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进行战争是理所当然的。很少人曾考虑到，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是可能改变其态度的，正如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共产党在宣战以后几个星期内就变成一个主张和平的党，从而使那些过去四年来习惯于把社会解放事业和反抗希特勒看成是一件事的人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

因此，在1939年3月，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些传统政党还在为表面上已于二十年前结束了的巨大民族牺牲付出代价，无论是右翼或左翼，都由于一再遭到失败而深感沮丧，它们之一再失败则又由于在思想上无力更新。右翼和左翼都有一些新颖和基本上是年青的团体，对外国左右两极的吸引力作出了反应；它们似乎是不可调和地相 178 对立的，然而又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1914年颇为自信的法国的政党之间的尖锐分裂并没有背上和外国结合的包袱。

和1948年出现的同名的报纸无夫。

可是乔治·博内〔博内：《从华盛顿到凯道赛》（Georges Bonnet：De Washington au Quai d'Orsay），以后简称博内：《从华盛顿》，日内瓦，布尔坎，飞马出版社，1946年版，第298页〕说，当时在者会里投票反对政府的七十五个议员中，七十人是共产党人，两人“无所属政党”。

（五）法兰西帝国

在述及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和外交政策问题之前，必须先谈一谈法国事务的另一面，这方面的事情在战争 179 期间是至关重要的。上面已经谈到过，法国舆论越来越重视法国的海外帝国及其也在增长的贸易；同时又谈到过，一方面是殖民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法国本土的人口固定不变，几乎仍然可以维持粮食自给，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关于法国与其海外帝国的关系，以及政治解放应走的道路，法国仍然保留着与英国根本不同的观点。在法国人心目中，这种关系就体现在各殖民地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议会两院中的代表权（的确，这种代表权的授于是不郑重的和不现实的）。很少人注意到，自己具有非常发达的文化的一些人，如北非的穆斯林和安南人，在法国议会中却没有他们的代表。殖民地被认为是法国的外省，最终将被兼并到 180 一个广袤更大的国家中去，正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讲德语的阿尔萨斯、讲意大利语的科西嘉和讲凯尔特语的布列塔尼被兼并一样。至于什么时候兼并和如何兼并这类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过。对海外领土是按高度集权制统治的，并不鼓励它们发展自治的政治生活。殖民地议员分属于法国本土的各政党。在法国的政治历史上，并没有自然产生自治领概念的根据。听候巴黎指示的习惯是根据“单一而不可分的法国”的原则培育起来的。虽然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奇怪的是，在政治和制宪方面却很少变化。因此就没有准备会有那种局势，即需要海外领土作出与本国中央政府相反的独立判断的局势。不过一项新发展却被证明是颇具始料所不及的重要性。法国从法属西印度的黑人后裔中征募了一批殖民官员，派往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任职，其中一位埃布埃先生一直做到乍得省的省督。如果法国的政策要向纳粹德国看齐，这显然同他们这些人的地位是不相容的，而且他们是了解这一点的。

（六）国防

虽然法国将军的退休年龄定为六十八岁，但是在 1924 年达到退休年龄的却是一位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对法国军事政策最有影响的人物。此人就是贝当元帅。从法定意义上说来，他是可以不退休的，因为法国元帅没有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过他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尽管霞飞、福煦和普恩加费对他的局限性都作过严格的鉴定。虽然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都很清楚，胜利最终应归功于采取攻势的精神，如果没有一位首先从攻势方面着想的将军，如果没有准备勇往直前拼杀的军队，1918 年夏季的机会就会丧失，也许是致命的，可是法国人民却忘不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时发动的攻势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一个回到家里的普通士兵，记忆到的是陷在泥淖中或挂在铁丝网上的死去的千千万万伙伴，他们很难认识到，凡尔登是因索姆河之役而得保全的。死者的家属对此就更难认识了。一个将军命令士兵出击所犯的 error 总比他命令士兵守在战壕里所犯的另一种 error 更明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几个月中，法国的伤亡最重，所受的打击最大，当时在运用攻势理论方面所犯的 error 181 误也最明显。贝当不仅是一位和攻势理论关系最少的法国将军，而且以坚定的人道主义制止了 1917 年的兵变，并且平息了士兵的怨恨。保罗·瓦莱里有一次是代表法国群众讲话的，他在欢迎贝当取得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席位时宣称，贝当具有最高的天才，能够看到他的大部分同事所看不到的真理——炮火能杀人。法国群众下的断语是，一位福煦式的将领可能赢得胜利，但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毁掉民族。贝当的特别健康和长寿不仅使他的影响得以延长到他的晚年——在他那种高龄也只有最非凡的天赋才能使他的思想充分接受新见解——而且还使他成为弗朗歇·德斯佩雷以外的唯一尚存的胜利的代表。弗朗歇·德斯佩雷是在遥远的前线赢得胜利的，其政治态度也使他远不及他的对手那样可以为共和派所接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每一个男子服兵役的期限有着延长至三年的趋势，防御论所得到的另一支持就来自法国人想扭转这一趋势的可以理解的愿望。这种支持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因为在服兵役期限正要减成一年的 1929 年，那时国家处在最繁荣时期，而全国人力的使用却已接近极限。军方的意见是反对缩短服兵役期限（实际上大部分新兵的期限是十个月）的，因为缩减后确实难以继续占有莱茵区。它同逐渐增长的经济萧条结合在一起，将会减少赞成接纳移民的压力。因此，既要在战斗中保全人的生命，又要缩短每个公民服兵役的期限，这两种联在一起的愿望得到了一位年逾古稀而又具有保守和防御本能的老军人的支持，这便使本属有关进攻性战略而设想的马奇诺防线变成了既没有赢得战争的手段也没有此种计划的借口。大家都相信在这条防线后面的法国是安全的；所以，为什么要对德国进行干预呢？为什么要到欧洲另一端去寻求盟国呢？为什么要军队中整整服役一年呢？在

贝当也是法国最高司令部中为数不多的步兵军官之一。

规定缩短军事训练期限的法律于 1928 年 3 月 31 日颁布，自 1930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概览，1929 年》，第 31 页注）。

1932年让·普雷沃已经告诫他的《战后法国史》的读者，“信任甲冑”可能再次给法国带来在克雷西和阿让库尔曾带来过的灾难。

减少征募现役军人的数目使职业军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种情况本来预期可以促进以夏尔·戴高乐上校为其杰出代表的那种军事理论的，他的理论赞成建立一支高度机械化和装甲的打击力量。但是有些因素阻挠了这种想法。在左翼政党中，占领阵地的依然是饶勒斯的瑞士式民兵思想。戴高乐的理论似乎为建立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军事阶层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工人阶级中，仍有极其强烈的反军国主义存在着。现役军人没有投票权。在人民阵线的集会上，直到1936年他们获胜执政为止，他们所唱的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就是向第十七团士兵致敬的歌，这个团的士兵在1907年种植葡萄的南方发生动乱期间被派去维持秩序时叛变了。

不只是左翼对共和国和军队之间在德雷福斯一案中的冲突记得很清楚。一般职业军官也因此在任何问题上力图避免同政府或公众舆论发生冲突。戴高乐于1932年在他的《剑刃》一书中赞扬了以纳尔逊为典型代表的在一定情况下抗拒命令的功绩，但此种看法并未为军界所广泛赞同。在1914年以前因将领们的辞职而确曾促使人们对军事准备方面的缺陷严加注意，但此等事已不再重演。戴高乐自己的智力活动经历，其效果并非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马克·布洛赫说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知识界的弱点之一是大学教师对“好学生”的偏爱，顾名思义好学生也就是不同老师唱反调的驯服学生。正如他所指出的，不仅在大学中是这样，在军队中也是这样。

按新方针改组军队也受到经济危机的阻挠，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的头几年中，历届法国政府一直设法用通货紧缩和精简节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需要改革军备的军事理论是不容易被正在设法削减开支以平衡预算的政府所接受的。因此在法国政府于1934年4月17日声明停止裁军谈判，并宣称法国今后将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确保其安全后，却将其军备拨款从六亿法郎削减到四亿法郎。1934年（七十八岁高龄）任陆军部长的贝当表现出完全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为满足军队的需要而运用他的巨大权力。在继贝当之后担任陆军部长183的莫兰将军任内，1935年拨款增至八亿法郎，最后又为1935年和1936年补充拨款十八亿八千五百万法郎。

然而直等到勃鲁姆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以花费挽救经济萧条的主张，1936年9月7日才拨出一百四十亿法郎，此后又增加到三百一十亿法郎。但除了起步必然缓慢外，这些贷款的使用在初期又受到劳工冲突和严格执行四十小时工作周的牵制（四十小时工作周就需要铁道增加职工七万人）。当保罗·雷诺于1938年11月接管财政经济事务以后，前面讲过的活力解放才给重整军备以推动力。但即便有了那些拨款，军队的财政还是处于如此拮据的困境，

巴黎，里德尔，1932年版，第888页。

夏尔·戴高乐：《建立职业军队》（Charles de Gaulle：Vers l'armée professionnelle），巴黎，贝尔热-勒弗罗，1934年版。

巴黎，贝尔热-勒弗罗，1932年版。

《奇特的失败》，第131—144页。

见《概览，1935年》，i.27—28。

保罗·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Paul Reynaud：La France sauve l'Europe），巴黎，弗拉马里翁，1947年版，i.339；《概览，1936年》，第148页。

以致必须节约其他基本开支,所以在 1938 年 9 月慕尼黑危机时应征入伍的士兵发现连军靴都没有,许多人只得穿着普通便鞋去参加他们的部队,此种经历对下一年的士气起了很不幸的影响。

最后,有待解决的军事问题的性质需要有使用三军的整体协调思想,换言之,就是要有一个国防总参谋部。虽然早自 1932 年起就创设了国防部长这样一个头衔,而且任职这个部的部长经常使用这一头衔,同陆军部长经常使用他的头衔一样;从 1938 年年初起,甘末林将军虽然已取得了国防总参谋长的头衔,但国防组织从未实际存在过。这对空军特别不幸,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一直在衰退,虽然最后在 1929 年取得了与其他两个军种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独立的空军部,但除了英勇的传统外,它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理论或传统。在 1939 年 3 月以前的五年中,在各个部长任内,先后有过三个完全不同的计划,到 1939 年,政府和总参谋部,象他们在历次危机中一样,都认识到法国空军脆弱得可怜。另一方面,海军却也许是法国所曾有过的最强大的海军,不过使用这样一支海军,它的基地必须要有充分的保卫,或则法国的抵抗中心必须转移到海外去,但情况又并非如此。

1939 年 3 月,法国舆论充其量只是作了防御战的打算。它由于害怕遭受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伤亡而苦恼着。它由于一些人越来越怀疑法国军队的效能,另一些人又从贝当和魏刚所宣扬的法国军队无与伦比的说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对马奇诺防线寄予幻想,以为这条防线从瑞士一直延伸到海边,可是实际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时国境和法国边界接壤处为止。正当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笼罩天空时,贝当却在一篇长长的序文中向公众推荐肖维诺将军的《入侵还有可能吗?》一书,该书声称修建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速度将被证明较之它们的被炸毁更迅速。

军队的理论是以 1936 年 8 月 12 日刊行的《大部队战术运用操典》一书为依据的,该书是由乔治将军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它代替了山贝当编写的 1921 年版的《操典》。1936 年的《操典》断言:

负责编写本操典的委员会并不低估(自 1921 年以来)在战斗和运输手段领域取得的进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属于技术性质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地改变它的前驱者在战术领域所确定的主要规则。因此它认识到,在胜利之后不久由刚刚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的杰出将领所客观地确立的理论体系应该继续成为我国大部队战术运用的根本法则。

这段文字在暴露自满情绪的同时大概也泄漏了同样程度的沮丧的忧虑心情。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知道,他们最早必须到 1940 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飞机大概还要迟一些,要有经过训练而能使用这些军备的军队,那就更要推迟一些时间了。他们知道法国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军队尚未得到在德国一旦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时便能按计划迅速进军低地国家所必需的装备。

有时人们认为丘吉尔当时毫无疑问是同意关于法军实力的这些看法的[由于他后来的言论,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265)中说道:“德军在 1938 年或 1939 年是没有能力战败法国人的”],但应该指出,他在 1936 年 3 月说(同上书,163),“法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时,前面是加了修饰语的:“在今天的今天,大概在 1937 年的部分时间,法国军队……”等等。

巴黎,贝尔热-勒弗罗,1939 年版。

（七）对外关系

让·吉罗杜在 1939 年回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 1815 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1871 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是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 185 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久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象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 1934 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 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又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发生此种两极分化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疲惫、沮丧和在国内事务上的分裂等现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国军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义的增长也是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年的迭遭挫折和暧昧不明。当法英美三角同盟流产后，法国在深感失望之余发现英国的战后情绪是不可能结合成欧洲和平组织的，无论是按日内瓦议定书的方针（左翼的理想）或按大 186 陆联盟的方针（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其结果就缔结了折衷的洛迦诺公约， 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德国，这在三十年代业已日趋明显。

见上文，原著第 174—178 页。

《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存放上帝约法的圣柜。——译者

见《概览，1924 年》，第 2—16 页。

《概览，1924 年》，第 16—64 页；《概览，1925 年》，ii.2—10。

当法国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些新国家或大为扩大了的国家们的紧密关系都已在松懈时，洛迦诺公约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还有其他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渴望安全并非出于俨然以领导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态度。法国的稳定和自足的经济，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资本或市场吸引力上都不能为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农民国家提供它们需要从一个大国获得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推动力。这里产生的问题和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相类似。最后，法国在其盟国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并不是象很多法国人所想象的那种性质了，当它的失效被发现后，便激起一阵辛酸和失望。不仅有关国家的讲法语或读法文的这一阶级正处在社会和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就是法国的文学艺术，从任何国家大多数居民的观点看来，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成了世界上最高深莫测的事物了。在波兰、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德国商业兜销员，没有必要去和他们的法国同行相比，即便同法国的讲师及外交官相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较高的发展水平，就可以作为更易理解和更为恰切的楷模。——唤起法国舆论注意法国的东方联盟已在削弱的第一个具体事实是 1934 年 1 月的德国—波兰条约。不过法国已为它自己放弃早先的立场作出了先例，因为它已在 1933 年参加了墨索里尼提议的四国公约。

失去的阵地可以收复这一点从巴尔图出访小协约国的各个首都时所受到的接待中已经表明了。但巴尔图被谋杀所造成的局势，不但对法国的盟国，而且对法国的舆论，都带来了最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他的继任者是赖伐尔，从理论上说赖伐尔是在推行其前任的政策，但在事实上，他却在竭尽全力地通过与德国达成谅解而谋求另一条途径，从 187 而勾销他的前任的政策。直率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从此开始便很快地失去其有价值的意义了，它们也就随着乔治·博内向他的选民们所作的解释（即法国从未背弃捷克斯洛伐克）而成为泡影了。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法国的盟国都不再知道法国的立场究竟如何。直到大故实际爆发为止，除勃鲁姆政府外，历届法国政府都以此种令人泄气的暧昧态度为其特征。但在法国人看来，英国的暧昧行动同法国的行动完全一样，英国居然能在 1935 年 6 月 18 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从而宽恕了三个月前德国公开破坏凡尔赛和约的一切军事条款的行动，而且使法国外交为促使斯特雷扎协定成为现实所作的努力全归无效。——在此刻，既有法英联盟与法国力图在德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有第一个目标与必须防止德国在法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相似的矛盾。首先，法国右翼所得出的信念是，英国要求制裁意大利，是硬要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给法国加上一个敌人。两年以后，法国的左翼又觉得英国坚持不干预西班牙内战，既是强使法国蒙受道义上的耻辱，又是在比利牛斯山给法国安上一个敌人。——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发生过德国重新武装莱茵

《概览，1934 年》，第 386—387 页；《概览，1935 年》，i.60—61。

见《概览，1934 年》，第 207—221 页。

同上书，第 347—349 页；《概览，1935 年》，i.60—66。

见《概览，1995 年》，i.72—85。

同上书，第 178—193 页。

同上书，第 140—142 页。

见《概览，1936 年》，ii.212—239，271—279。

兰一事，法国未能进行干预，英国也未支持法国进行干预。因为这一事件是法国批准法苏条约而引起的，英国不作出反应就成为英国拒绝支持法国在欧洲大陆寻求盟国的又一例证。但在这一事件中，法国自己的“坚决拒绝”对它所产生的反作用却有着最严重的后果。法国失去了由它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后机会，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在几个星期后即将举行选举。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民主的不真实性没有比这一回暴露得更彻底了。在法国批准了同位于德国东面最强大的国家结盟的条约以后，法国就失去了为任何东欧盟国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法国事实上只剩下一个盟国，而这个盟国自己也承认，一旦战争爆发，它不可能象 1914—1918 年的战争那样，在头三个月中当法国伤亡最惨重时就提供那么多的军队。

在此后剩余的和平时间里，对于法国再一次要堵住德军第一次冲击的想法，就象一剂毒药在法国人心中翻 188 腾。在意大利危机中，英国人看来也不了解，如果制裁引起了战争，那末在英国人可以从容不迫地征调其军队的同时，法国却非动员其全部壮丁了不可了。无需德国人从旁说明，法国人自己也会想到，英国是要等到法国剩下最后一个人时才作战。这种想法不幸而又轻易地掩盖了法国自己的衰败，所以当奥地利被吞并和苏台德区德国人根据萨瓦和尼斯的类似情况提出要求时，法国便以尽瘁于道义为借口而采取无所行动的惯例了。在 1938 年 9 月的阴暗日子里，伦敦人正在公园里挖防空壕，巴黎人则在应征入伍时甚至连军用靴都不够分配。弗朗丹在 1936 年德国兵团开进莱茵兰时还主张采取行动，这时他却在街头海报上宣称战争是罪恶的愚蠢行为了。二十年的外交，二十年的政治，二十年的一群又一群年龄相仿的青年服兵役，却并未得到在战场上牺牲了一百三十二万法国人生命应换取的果实。从慕尼黑回来心惊胆颤的达拉第驶经拉斐特大街时，居然受到群众的夹道欢呼，这件事并不真正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倒是当法国获悉德军已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后几乎无动于衷，大部分法国人还要慢慢地、不慌不忙地面对他们的当前问题呢。

见《概览，1936 年》，第 3 编 (i)。

同上书，第 252—256 页。

见《概览，1938 年》，第 1 卷，第 2 编 (ii)。

见《概览，1936 年》，第 283 页，第 287—288 页，第 294—295 页，第 297 页，第 299 页。

见《概览，1938 年》，ii.436。

见《概览，1938 年》，第 451 页。

第五节 意大利
凯瑟琳·达夫

（一）1939年意大利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

1927年5月26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的演说中说道：“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我们将处于我将称之为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那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将使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并看到我们的权利将终于被承认。”他所预言的关键时刻业已来临，但是那时在欧洲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声音却并非来自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27年可能确曾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中德国会复兴，法国将衰落，足以使他能同那些得到“满足”的国家做成一笔扎实的交易，并确保意大利在欧洲四强的均势中至少能同法国并驾齐驱。但是当时他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卑微的和不可靠的模仿者，甚至连接受一张他的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也不配；从他目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发迹以来，他就一直有着这样复杂的心情。

墨索里尼为意大利所要配备的充分军备、工业能量、原料、粮食、财政储备，或是为奋勇投入这场全球范围的并由纳粹规定其步调的强权政治角逐而须具备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这些方面，他都没有取得成功。帝国的扩张，甚至是捍卫法西斯思想，在整个意大利都不是产生英雄事业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原因。许多因建立意大利帝国并取得反制裁胜利而深感自豪的意大利人，这时对追求经济独立政策以及在西班牙两年半不宣而战的极度紧张也正在感觉到，并且不安地意识到意大利是与德国人拴在一起走向战争，而远在纳粹革命尚未发生以前，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就不曾有过好感。

另一方面，施加经济制裁对意大利人民的影响，怎样估计也很难说是过高的。墨索里尼利用巧妙的宣传成功地说服了大批意大利人，使他们相信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提供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是巨大的。意大利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仅始自法西斯政权时期，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这就使意大利人看不到真相，即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已成了一项激起海外真正义愤的罪行，也使他们看不到国际联盟体现的那种集体安全观念，对许多非意大利人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联被认为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堡垒。意大利人轻易地作出结论，认为制裁只不过是强权政治角逐中的一个步骤，从而不自觉地牺牲了自己；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天真设想，就使意大利团结起来支持墨索里尼，其团结的程度是意大利以外的人无法认识的，正如意大利国内的人也从来认识不到在外国人眼中的意大利侵略是多么丑恶一样。为此，意大利人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怨恨，尽管肯定是没有根据的。这股怨气延长到缔结了1937和1938年英意协定以后很久还未消除，甚至在1943年以后的一般对英国友好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还流露出来。与此同时，未能施加断然的制裁措施大概也加强了墨索里尼的信念，认为西方国家是软弱可欺和意见分歧的。对普通的意大利人来说，心理上的影响较之经济上的重要得多，这种持久的憎恨有助于使接受轴心国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此项政策与意大利人的感情是多么格格不入，连墨索里尼自己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踌躇才采取这一政策的。

《概览，1927年》，第120—121页。

见马里奥·多诺斯蒂（笔名）：《墨索里尼和欧洲》（Mario Donosti, pseud-Mussoliniel'Europa），罗马，莱奥纳尔多，1945年版，第80页。

见《概览，1938年》，i.91—96。

此外，法西斯主义仍然有着热烈拥护它的人，很多意大利人也从中取得了既得利益。政府能够依赖一般群众的默认，防止形成任何有效的反对派，而法西斯党内的上层分子对外交政策的批评也往往只是逐渐流于发牢骚而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和他的臣民一样，不喜欢德国；但自他让君主制受制于法西斯主义后所保留的那一点儿权力使他对墨索里尼起不了什么影响，墨索里尼憎恨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同他竞争最高权力的对手。对轴心国政策提出的最有力挑战来自天主教会，1939年1月，法西斯政府曾预期因梵蒂冈反对他们的反犹太人法规，将会发生一次大危机。

即便反对意大利和德国联盟的人还不够强大，不足以阻止法西斯意大利作为一个侵略国参加战争，意大利由于其经济劣势，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进行战争，它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也是渺茫的。墨索里尼的权力正在衰落，他的专制方法，他只注意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他部下的素质窳劣，这些都组不成一个有远见和有效率的政府，也训练不成一代能统治国家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接班人。法西斯“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以腐化、愚蠢和不负责任而闻名的，不过才能和胆识在意大利并未消失，因为几年以后的抵抗运动即将有所表现。

这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将在本书其他章节讨论。至于大肆宣扬的十六年来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成的庞大军事阵容，虽不能说完全是虚张声势，但它的缺点已引起了罗马的不安。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在不如预期的未来那样严酷的条件下，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作战经验，付出的代价却是厌战情绪和物资及财政储备的大量消耗。此外，从1936年起，墨索里尼已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三军改组的重整军备的计划，要经过两三年以后才能达到下一个战备的高峰，而且，在鼓励意大利人以进攻精神、运动战和杜埃将军的空军密集战理论为思想方法的同时，又提醒他们，消耗战是和法西斯经济的“铁律”相抵触的。墨索里尼本人似乎认为，在与法国单独进行的战争中，任何一方的防御工事都会阻止在阿尔卑斯山边界或在北非进行决定性的战斗，而即便是对付吉布提，法国的增援也会使进攻更难以进行，虽然不是不可能。他预计在空中和在海上，意大利军队都会证明可与法军柏匹敌或者胜过法军，但这样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除非战争蔓延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或全世界。他实在并不认为此刻是进行法意战争的理想时间，更不是进行全面战争的理想时刻，虽然在他与法国的关系中，他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但他似乎是把战争视为可能发生而不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1942年底以前他不要打仗，他希望到了那年年底，意大利的炮兵已全部更新，还有八艘现代化的新战舰可以交付使用，潜艇也比已有的多一倍，平定下来的和足以自给的埃塞俄比亚可以有一支五十万人的本地军队，为意大利本土争取的自给自足的计划也已完成了一半，1942年的展览会将充实意大利的外汇储备，并将有尽可能多的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被遣送回国。

这一喘息时间还可以用来向法国勒索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于殖民地方面

见下文，原著第398页以下。

参阅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i.439。

为进行比较，也许应该补充一点：甘末林也曾计划在阿尔卑斯山和北非战线上同时进攻意大利人，但他担心法国尚未准备就绪，也许只有在北非他还可以这样子。M·G·甘末林：《服役》（M.G.Gamelin：Servir），巴黎，普隆，1946年版，i.134。

的让步，怂恿对立国家的任何分裂倾向，例如，鼓动少数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反犹太主义与和平主义，甚至包括墨索里尼长期来在西班牙圣战中所反对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与希特勒不同，似乎并不认为这时轴心国的实力已经可以说到达了顶峰，进攻一定要在这时发动，或者根本不必进攻。

见 1939 年 5 月 30 日墨索里尼致希特勒的“卡瓦莱罗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56—159 (2818—PS)；摘录译文载《文件，1939—1946 年》i.170；参阅《阴谋与侵略》，v.453—455。又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89 年 1 月 8 日。

（二）墨索里尼的领土野心

到 1939 年初，1927 年所预言的“关键性”年代已过去了一半以上，首先导致意大利在 1935 年与法国签订协定——至少可以明确他说，它对意大利的价值不大，因为协定要它在突尼斯问题上让步，所以也未被批准，接着便是一个埃塞俄比亚帝国，这个帝国也还有待于抚慰，更不用说有利可图了。墨索里尼的野心却远不止此。正如 1937 年奥古斯都展览会所展示的那样，意大利是一个充满活力而有中兴希望的“贫乏”国家，它要建立一个地中海、非洲和亚洲帝国，旨在恢复罗马帝国遗下的事业。按照当时的情况，地中海远非它的帝国，而是囚禁它的监狱；科西嘉、马耳他、突尼斯和塞浦路斯组成了这所监狱的铁窗，直布罗陀和苏伊士则守卫了监狱的大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都随时打算完成包围它的锁链。下了决心的意大利首先要摧毁监狱上的铁窗，然后“向大洋进军”，因为没有自由进入大洋的通道，意大利就只能被看成是半独立的国家；意大利可能通过苏丹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联在一起，从而向印度洋推进，或则通过法属北非向大西洋推进。

不论向哪一方推进，意大利都必然面临法国和英国的反对。它对英国还没有正式制定什么要求，在当时齐亚诺的《日记》中或在他 1939 年 1 月 2 日给里宾特洛甫的信中也都没有提到这类要求，但据了解，这种要求可能包括割让马耳他，直布罗陀的非军事化和国际化，或将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以及对苏丹实行共管。例如齐亚诺于 1938 年 11 月 30 日在众议院的演说中和 1939 年 4 月 18 日法西斯议会对国王演讲词的答复中都出现了帝国均等的论点。当时墨索里尼主要关心的事似乎是，不论轴心国向什么方向扩张，英国人究竟有多大能力和决心进行抵抗，而特别关注的是英法团结的增强或削弱。

在欧洲大陆上，阿尔巴尼亚是可以作为当前唯一的目标领土。意大利对中东和地中海东岸各国的计划也暂未公开。墨索里尼在 1937 年曾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不过自从缔结了 1938 年 4 月的英意协定以后，巴里广播电台已降低了反英宣传的调子。1938 年和 1939 年发生的几件小事表明，法西斯政府准备在埃及的意大利侨民中组织一支反英第五纵队，它欢迎法鲁克国王探询这类问题，即如果埃及宣布中立而引起英国直接或间接干预，轴心国是否会支持他；法西斯政府还力图减轻伊拉克的疑虑，因为它深

见《概览，1935 年》，i.91—118。

见朱塞佩·博塔伊：《二十天和一天（1948 年 7 月 24 日）》[Gius-seppe Bottai: Vent'annie un giorno (24 luglio 1943)]，米兰，加尔扎尼，1949 年版，第 129 页，第 127 页。

见齐亚诺：《欧洲》，第 392—394 页；英译本，第 258—259 页；参阅《文件，1939—1946 年》i.150。

见马克斯韦尔·H·H·麦卡特尼：《孤家寡人》(Maxwell H. H. Macartney: One Man Alone)，伦敦，查托和温达斯，1944 年版，第 10 页。

《意大利日报》，1938 年 12 月 1 日，1939 年 4 月 19 日。

见门罗：《地中海的政治地位》，第 4 章。

《概览，1936 年》，第 17 页注。

《概览，1938 年》，i.137—143；协定全文见《文件，1938 年》，i.141 以后。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1938 年 1 月 3 日。

见同上书，1939 年 2 月 23 日。

怕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会破坏地中海伊斯兰社区的连贯性。 —

这时法西斯的要求和敌意正在集中于法国。这方 193 面又一次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些要求作出正式说明。但墨索里尼于 1938 年 11 月 8 日和 1939 年 1 月 8 日曾私下两次就这些要求向齐亚诺作了概要的说明；1938 年 11 月 30 日他还首次在法西斯大会上作了撮述，然后他又特别郑重地在 1939 年 2 月 4 日立下一篇题为“向大洋进军”的政治遗嘱。他的目标可以归结如下：“科西嘉：自治，独立，合并；突尼斯：为意大利人制定特殊法规，突尼斯王组织自治政府，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吉布提：辟为自由港并建筑铁路，行政上为共管殖民地，割让给意大利；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占有行政管理上的大部分权力。”墨索里尼故意不提萨瓦，因为它不在阿尔卑斯范围内，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都不属于意大利；他也不提尼斯，因为取得尼斯不过意味着对边界线的小小修正，而且是割让一个这时已完全法国化了的的城市。另一方面，科西嘉尽管有法国人的渗透，却决不能放弃，因为有战略上以及地理、历史、种族和语言上的各种原因。对吉布提的领土要求的解决可能性最大，部分原因是英国不用担心地中海的现状会有什么变化。法西斯政府认为，突尼斯的法规，吉布提的海港和铁路，以及苏伊士运河问题都可能通过谈判解决，但任何其他进一步的问题，都需要用迥不相同的方法才得解决，而且还必须等待事态的发展。 —

雷诺的回忆录（《法国拯救了欧洲》，i.178—179）的字里行间可以隐约看出法国和意大利对争端的态度。雷诺于 1936 年 10 月访问罗马时曾警告齐亚诺说，对欧洲各处的法国敌人给予鼓励是不明智的，因为法国军队是意大利独立的保障。如果法国消失了，意大利的独立还保得住吗？齐亚诺大概为这种优越感的假说激怒了，当时他回答说，法国当然会永远存在嘛，让雷诺去推测，他是不会反对看到法国的力量有所削弱的（关于意大利对法国人的真实或臆测的轻视态度的敏感性，见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Gaetano Salvemini: Mussolini diplomate），巴黎，格拉塞，1932 年版，第 77—78 页。）意大利另一个动机可从一位意大利将军的答语中说明，当驻罗马的一位外交官用与雷诺相似的论据来同他打交道时，他回答说：“是啊……可是能到手的利益太逗人了！”（雷诺，前引书）

墨索里尼也想过对突尼斯实行共管〔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1938 年 11 月 8 日〕。

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39 年 1 月 8 日。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1938 年 11 月 8 日和 30 日；《日记（1939—1943 年）》，1939 年 1 月 8 日。在 11 月间，墨索里尼也曾对尼斯提出要求。

（三）墨索里尼的欧洲政策及其同西方大国的关系

墨索里尼要把他所梦想的海外帝国同维护意大利那种根据不足的要求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即意大利在与德国以及英法的关系上应处于欧洲大国的地位，还有同样强烈的信念便是意大利决不甘心再当欧洲的“局外人”了。此外，尽管他叫嚷要修改和约，希望扩大意大利帝国并打破法国的霸权地位，却毫不减少他要保卫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的里雅斯特和勃伦纳边界现状的决心（他的同胞不管是否法西斯主义者都有同样的决心）。此时在英国和法国，人们仍然还抱着希望，日益增长的第三帝国的可怕实力或能对他起一些抑制作用，使他不把自己的命运同纳粹不可改变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尽管他享有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盛名而当之无愧，但他自己的政策听带来的后果和近年来发生的事件给他留下的行动自由却非常少了。

在他执政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总的说来，墨索里尼是叫得凶，咬得并不那么凶。一方面，如果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较新建立的大国领袖，凭白手起家当上的，所以是一副大叫大嚷的寻衅态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奉行一种非常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以前的政策，即通过精心的策划，充分运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区区有限的资本。他宣扬军国主义，要修改凡尔赛和约，继续同法国算旧帐，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树立他的政治影响，轰炸科孚岛，对南蒂罗尔强行意大利化，可是他也谋求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使意大利参加和平组织，例如洛迦诺条约，甚至还参加国际联盟。但这种表面上的温和当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顾虑，许多意大利人在其他方面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并不一致，但都会同意他对道义上的顾虑的藐视，他们不无讽刺意味地斥之为可笑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其所以可笑是因为这种顾虑并不是伪善。墨索里尼自己的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他会让任何有权的机会溜走，即在国际浑水中摸鱼，凡可以获得的任何不值一顾的小事物，他都要捞取，只要不致卷入一场一级规模的战争。

1933年的纳粹革命并不标志着意大利政策的转折点。法西斯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压力为意大利和德国的修好敞开了大门，纳粹党人在1930年取得选举中的局部胜利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释嫌修好便日益令人注意了。但意大利人起初却低估了第三帝国及其元首的力量与野心，纳粹对奥地利的图谋又使两国关系极度紫张。墨索里尼在1931年就同法国站在一起反对德奥关税同

见《概览，1927年》，第115—124页；《概览，1930年》，第16—22页。

见阿瑟·索尔特爵士著《政治上的个性》（Sir Arthur Salter: Personality in Politics）一书中关于墨索里尼的研究。伦敦，费伯，1947年版，第226—238页。

见哈罗德·尼科尔森著《外交》（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一书中关于意大利的方法的描述。伦敦，桑顿·巴特沃思，1939年版，第151—153页。

见《概览，1926年》，第146页，第156页以下；《概览，1927年》，第155—160页，第166页，第172页，第298页；《概览，1928年》，第147—161页。

见《概览，1920—1923年》，第348—358页。

见《概览，1927年》，第185—201页。

见《概览，1930年》，第16页，第21页，第95页，第123页，第125页，第128—130页；《概览，1932年》，第260页。

见《概览，1938年》，第198—202页；《概览，1934年》，第328—331页。

盟，通过 1934 年 3 月 17 日的罗马议定书又结成了“意—奥—匈三角联盟”。

当陶尔斐斯于 1934 年 7 月 25 日被暗杀以后，墨索里尼便派军前往勃伦纳山隘的边境；他几度联合英国和法国试图支持奥地利的独立并抑制德国的重整军备，例如 1934 年 2 月 17 日和 9 月 27 日的关于奥地利独立的声明，以及 1935 年 4 月 11 日至 14 日的斯特雷扎会议。可是，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他的“修改和约主义”或建立欧洲四强指导委员会的欲望，这两者的动机在当初意大利建议的 1933 年 6 月 7 日的四国公约中已经可以看到了。正是在这个要害上意大利和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意大利的发言人后来说，同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乃是 1935 年 1 月 7 日法意协定的不成文的补充，他甚至说，法西斯政府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还认为英法会宽容意大利的行动，以此作为取得意大利支持反对希特勒的代价；据说产生过一个误会，因为英国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在斯特雷扎会议上都没有明确地警告意大利。也很可能是 1935 年 6 月 18 日的英德海军协定导致墨索里尼得出了英法之间不团结的结论，并认为英国已觉察到德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这就促使他不去冒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风险，此后便又倒向了德国阵营。

196 从 1936 年到 1939 年之间，在整个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意大利也曾试图在它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作一些修补工作。墨索里尼曾缔结过 1937 年 1 月 2 日和 1938 年 4 月 16 日的英意协定，但在 1938 年 4 月同法国开始的谈判几乎马上就破裂了，因为几涉及西班牙或按英意妥协方式同法国联合的任何协定他概不接受。他由于听到战争物资正在通过法国流向共和西班牙的报道而大为震怒，1938 年 5 月 14 日他在热那亚演说时竟宣称法国和意大利是站在“敌对阵营中”的。法国和英国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英意协定也于 1938 年 11 月 16 日开始生效，然而以此作为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前奏的希望并未实现。事实上，墨索里尼当时就告诉过齐亚诺，

见《概览，1981 年》，第 3 编 A。

见《概览，1934 年》，第 487—507 页；议定书全文见《文件，1933 年》，第 396—398 页。

见《概览，1934 年》，第 474 页以下。

见同上书，第 442—448 页，第 454—455 页，第 484—487 页。

见《概览，1935 年》，i.156—161。

据报道，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会议时曾对希特勒说，如果国联实行石油制裁，他在一个星期内就将被迫从埃塞俄比亚撤军。保罗·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跑龙套演员，1923—1945 年》（Paul Schmidt：Statistaufdiplo-matischerBuhne，1923—45），波恩，阿瑟瑙姆出版社，1949 年版，第 342—343 页，第 416 页。

见《概览，1935 年》，i.106，108—109，109—110 注；博塔伊：《二十年》，第 124—125 页；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1938 年 12 月 24 日；1939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快讯报》盖达的文章；索尔特：《政治上的个性》，第 236—237 页；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德国和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事业”，《国际政治研究杂志》（MassimoMagistrati：‘LaGermaniael’impre-saitalianadiEtiopia’，RivistadiStudiPoliticiInternazionali），1950 年 10 月至 12 月号，第 563—606 页。

见《概览，1935 年》，i.178—193。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1938 年 5 月 11 日和 30 日；齐亚诺：《欧洲》，第 326—327 页，337 页；英译本，第 211—212 页，第 217—218 页。

《概览，1938 年》，i.155。

见同上书，i.158—163。

交换批准书丝毫不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欧洲，其政策的基础依然是德意轴心；在地中海，它与英国人的合作尽可能继续维持，但法国仍然被排除在外，而且这时还正是意大利要向法国提出要求的时候。仅仅两个星期以后，此项政策便由齐亚诺在法西斯议会上的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接着就是随之而来的听众的大叫大嚷。 —

见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1月16日。

(四) 罗马—柏林轴心：意大利的希望和忧虑

与此同时，纳粹对意大利的追求却取得了大不相同的结果。齐亚诺于1936年10月访问德国是友好姿态到达顶峰的时期，当时签订了一份秘密议定书，双方就一些当前问题协调政策，还有便是墨索里尼在11月1日提到轴心国的米兰演说。在恢复友好关系的早期阶段，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在推动轴心政策方面较之后来在此项政策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时又抑制它要卖力得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事前它还同日本谈过中立和协商公约。同年12月，意大利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希特勒于1938年5月回访意大利，并提出军事互助条约，当时墨索里尼尚不愿意接受。秘密经济议定书是在1937年5月14日和12月18日签订的，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处开始向德国提供情报。然而两国虽在若干问题上协调了它们的政策，特别是在西班牙战争问题上，但在不少其他问题上却还是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对抗和相互捣鬼。两国政府都曾为另一方的鲁莽行动而感到震惊。诚然，一些其他国家注意德意关系的人们往往容易时而夸大两国伙伴关系的自觉自愿的团结，时而又夸大其关系的不稳定性。

在公开场合，两国不断地大肆宣扬轴心国的团结，在纳粹和法西斯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他们则都利用下列论据，即如果德意不保持团结，西方国家便可将它们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只要有最微小的暗示，说德国有可能向英国或法国靠拢，便足以使法西斯政府复萌陷于孤立的恐惧；他们还要苦心说服纳粹领导人别走那条路，他们更富于戏剧性的一着就是把他们在伦敦秘

见《概览，1936年》，第575—583页；《概览，1937年》，i.28—55，324—346；又见伊丽莎白·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Elizabeth Wiske-mann：The Rome-Berlin Axi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

这份议定书的存在是齐亚诺和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在1936年10月21日谈话中透露出来的。齐亚诺：《欧洲》，第87—92页；英译本，第52—55页。

见《概览，1936年》，第582页。

据内维尔·亨德森爵士的《似水流年》〔（Sir Nevile Handerson，Water under the Bridges），伦敦，霍德和斯托顿，1945年版，第188页〕说：阿托利科常说，意大利当德国的得力的第二把手也比当有名无实的英—法—意同盟的无能的第三把手要强。

见《概览，1937年》，i.43—44，46以下，301以下，336。

在《概览，1939—1948年》的一卷中将谈到。

《概览，1987年》，i.35—36。

第二项议定书的文本，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142—146。

1945年审判时，当时曾任意大利军事情报机关首长的罗阿塔将军，曾为此提供证据（见1945年1月5日意大利报纸）。

如希特勒和齐亚诺于1936年10月24日的谈话（齐亚诺：《欧洲》，第93页；英译本，第56页；参阅《文件，1939—1946年》，i.1）。

见齐亚诺：《欧洲》，第186—189页；英译本，第122—124页，关于1937年6月的提议，即由牛赖特访问伦敦的建议；另有德国驻罗马大使哈塞尔于1937年12月31日给柏林的报告，其中陈述意大利获知牛赖特访晤法国外长（在他赴东欧途经柏林时）这一消息后的反应。《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161—162和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7年12月5日。

密搞到的英国官方文件的副本在 1936 年 10 月作为墨索里尼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他们还劝德国别接受以殖民地和便于取得原料的通路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欧洲各大国协作的方案也许对墨索里尼尚未失去吸引力，但从现有的文件看，他并未为实现此种协作作过任何真正的努力。

希特勒在他尚未当政以前，很早就“对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这位伟大人物怀有深刻的敬意”，他还表示他深信这位伟人既然是那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和国际 198 新闻界的死敌，他就必然会对“全世界犹太人”抱有与希特勒相同的感情，因为犹太人正是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国际新闻界三大罪恶的幕后推动力。希特勒相信，在德国扩张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盟友的最巧妙方法，就是从其利益迫使它们暂时和德国走同一道路的那些国家中去挑选，不必问它们是否是被称为德国的传统“友邦”或“敌人”，也不必问下一个国际同盟又会是怎样的阵线。希特勒决定以意大利为英国以外的德国唯一可能的同盟者，甚至设想组成一个德—英—意三国同盟。在 1933 年秋末裁军会议的危机期间，他已经在期望意大利能在他和西方国家之间作调停者，因为“如果德国一旦被宣判为完全无能的国家”，那么意大利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也将宣告结束；但是据报道，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中，他没有决定站在英国一边而是站到意大利那一边去了，为此他颇感遗憾，因为他并非不知道意大利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弱点，以及意大利人对德意轴心缺乏热情。他仍然钦佩墨索里尼，可他懂得，如果墨索里尼遭到什么意外，意大利的忠诚是不可信赖的。在德国更为普遍的感觉则是，不管有没有墨索里尼，意大利对同盟的忠诚都是可疑的，人们纷纷传说一家夜总会的歌唱家的一段故事，这位歌唱家宣布流行的华尔兹舞曲“你不可能不变心”可以改作意大利的国歌。

墨索里尼方面则极力想使德国人找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指责他会重演 1915 年的意大利“叛变”。他决心要证明法西斯意大利已“不再是杂烩的意大利了，不再是与民主国家勾勾搭搭的意大利了”。另一方面，他却从来不钦佩希特勒。1934 年他们在威尼斯会见以后，他说希特勒是一个低能儿，他还对巴多里奥说，跟一个没完没了地谈论奥地利和发动欧洲战争的人共事

见齐亚诺：《欧洲》，第 78 页注 和第 94 页，英译本，第 46 页注 和第 56 页。

见墨索里尼于 1936 年 9 月 23 日和汉斯·弗朗克的谈话，以及于 1937 年 1 月 23 日和戈林的谈话（同上书，第 75 页，第 79 页，第 129 页和英译本，第 44 页，第 47 页，第 82 页）。

《我的奋斗》，第 774 页，墨菲译本，第 544 页。

同上书，第 721 页，墨菲译本，第 519 页。

同上书，第 698 页，第 720 页，第 755 页，墨菲译本，第 505 页，第 518 页，第 541 页。

见《概览，1938 年》，第 291—317 页。

《阴谋与侵略》，v，576（2907—PS）。

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告诉阿托利科，他就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墨索里尼，所以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谈判。多诺斯蒂：《墨索里尼》，第 132 页。

这是希特勒于 1939 年 8 月 22 日对德军将领说的他对波兰作战的理由之一。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38（798—PS），译载《文件，1939—1946 年》，i.443；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1。

齐亚诺：《日记（1937—1938 年）》，1987 年 11 月 16 日；参阅同上书，1937 年 11 月 7 日，1938 年 7 月 17 日。

是不会有好处的。在戎装辉煌的法西斯行列中，希特勒在那种场合就显得相当寒酸了，可是到了1937年9月，这一回可要轮到他的政权来显示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奇迹了。在德奥合并以前的最后几个月内，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奥政策必然暗示墨索里尼最近见到并记在心头的纳粹实力。迟至1937年5月3日在他和牛赖特的谈话中，他还表示希望，尽管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当然不可能推行反德政策，但1936年7月11日的协定“仍可准予在强大德国的庇护下”保持独立；但是他在11月6日又对里宾特洛甫说，他打算听凭事态自然发展。他可没有料到纳粹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他还是相信纳粹在9月间的诺言，即德国在进行干涉之前会预先通知他，并维持奥地利的表面独立现状。至于希特勒的下一个侵略对象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于1938年5月告诉德国人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途与意大利政府毫不相干。意大利政府既不阻挠也不积极支持德国的计划。希特勒也从未预料到意大利会表示什么反对，然而事实上至少在当时，英意协定确实阻止了希特勒在1937年11月讨论过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机会之一——即意大利应该把英国和法国一起拖入西班牙战争。可是希特勒自己1938年5月30日的“绿色作战200行动”指令仍然指望意大利“明确地站在我们一边”以便对法国起抑制作用。在1938年8月25日的一项德国空军指令中，也把意大利列为一旦发生战争时的友好中立者，可是在9月危机中，墨索里尼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作出的与德国团结一致的声明中（尽管他很少采取什么行动，使意大利能在突然接到要求时履行诺言），都大大超出了中立的界限，因此他很

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i.179。

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225—227，517—518，533，537（第316号），542，570—572（第348—350号），582—683，585，591（第373号），612。

见《概览，1936年》，第450—456页。

齐亚诺：《欧洲》，第176页；英译本，第116页；参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419。关于墨索里尼在9月这一段时期内转向不干预的情况，见同上书，第458—459页，第463—464页，和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2月24日。

里宾特洛甫在1937年11月6日重申了这个保证。

见齐亚诺于1938年5月26日致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的声明。《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345—846。

见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关于希特勒访问罗马结果的1938年5月12日备忘录。同上书，i.1110。

见1937年11月10日关于1937年11月5日总理府会议的“霍斯巴赫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02—413（386—PS）；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29—39；《文件，1939—1946》，i.16—35；参阅《阴谋与侵略》，iii.295—305。希特勒的副官施蒙德所写的关于1938年4月“元首的若干看法”的笔记说明，希特勒在去意大利以前曾想与墨索里尼达成谅解，作为德国支持意大利在非洲的要求的交换条件，但当时德国外交部起草的文件（《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1097，1104，1110），强调意大利正进入巩固时期，因此并不迫切需要轴心国的支持，结果用来作为德国善意表示的并不是非洲，而是南蒂罗尔。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36（388—PS，第11项），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359；《文件，1939—1946年》，i.31；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17。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382（375—PS）；《阴谋与侵略》，iii.281。

见E.L.伍德沃德和罗汉·巴特勒编：《1919—1939年英国外交政策文件》（E.L.WoodwardandRohanButler，ed.：DocumentsonBritishForeignPolicy），第3辑，（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9年版），ii.600（第1186号），以下简称《英国外交政策文件》。又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670，804—805，881—882，977，993，以及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1938年9月25日。

有理由要感谢慕尼黑会议给他一个逃避此种危险处境的机会，甚至可以在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作为令人满意的调解人的身份出现。__从那时起，意大利与德意轴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1938年7月首次作为政策实施的歧视犹太人的范围扩大了。10月间，墨索里尼还不愿对接受德国关于缔结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同盟的建议表态，可是到了1939年元旦，他已作出意大利应该加入这个三国条约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将在1月底签订。西方民主国家在纳粹革命前充分建立的力量对他的侵略野心曾有所遏抑，但在1938—1939年间，这些国家恢复实力和主动权的任何迹象都只会激起他同德国结盟的欲望，其目的并非出于自卫（他自己也承认无此必要），而是要“改变世界地图”。__迄今为止，墨索里尼自己的要求范围已形成他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况且，在这场墨索里尼此时已认为是无可避免的战争中，意大利又怎能期望自己成为西方国家的盟邦而同它们共处呢？而且，即便法西斯主义有力量改变均势，使之不利于纳粹主义，这难道不又是自取灭亡吗？

按新近的状况来看，德国是可下的最有希望的赌注，如果德国取得胜利，方便之处是可以给意大利以新征服来的领土，作为它提供协助的代价，而又不需牺牲德国的任何既得利益。意大利的人力和通过对地中海的控制以及它的实力来威胁法国同北非的交通线，这些都是它可以作出的贡献，而且最近的结盟建议是纳粹方面提出来的。墨索里尼认为，即便不缔结同盟，德意轴心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可以促使修改英国对意大利的政策，而且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它都是意大利后方的不可缺少的屏障。此外他在1938年10月还从里宾特洛甫那里获知，首先，为答谢意大利对德国提供的两项友好保证，下一阶段轴心国政策的受益者将由意大利轮到，在此期间“我们的全部精力”可用于“对付西方民主国家”；其次，希特勒对轴心国政策的时间安排抱着实用主义观点，他虽然认为轴心国准备立即作战，但并不盼望在三四年内爆发战争，因为德国的重整军备还要花三四年才得全部完成。__可是法西斯政府也并非不知道这一事实，即德国正在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强悍而又占支配地位的伙伴。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承认德国兼并奥地利的真诚和持久的感激成为意大利同德国打交道的少数资本之一，然而意大利人民为轴心国实力对比的转变深感震惊和困惑，墨索里尼对此却无更好的办法安慰他们，他所能说的只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与其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还不如让它在同意的情况下发生”。1938年10月，他在法西斯党全国委员会上就意德关系问题再向大家保证说，德国除意大利外还有十一个国家与它有共同的边界，同意大利友好是符合德国的利益的，他还说，泛德意志主义是一个严格的种族概念，这才是首要的。例如，希特勒在慕尼黑曾对英国人说，他连一个捷克人也不要，即使按体重付给他同样重的黄金他也不要。德国和意大利各有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这一点是他所再三强调的。纳粹领导人曾一再向法西斯政府保证，地中海是命定的意大利海，阿尔卑斯山则是意大利的不可侵犯的北部边界，尽管涉及牺牲南蒂罗尔

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跑龙套演员》，第382页。

门罗：《地中海的政治地位》，第289页。

木尼托·墨索里尼：《文章和演说》（Benito Mussolini：Scritti e discorsi），第11卷（米兰，赫普利，1938年版），第226页。

见菲利普·焦利：《我们是如何对待大悲剧的》，罗马，法罗出版社，1945年版，第76页。

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墨索里尼自己也对里宾特洛甫说过，集中全力于地中海和海外殖民地已使西西里成为帝国的地理中心了。__然而，即便意大利人相信纳粹德国会信守它的诺言，或至少更倾向于向东和向西扩张，而不是向南，德国的这些保证也还留下了很大一块有争议的土地，这一地区介于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喀尔巴呀山和黑海之间，长期来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对这块地区很感兴趣，而这时德国正在这里建文它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制裁取消以后，德国的竞争已经阻碍了意大利恢复它同东南欧的贸易，而一个把多瑙河国家和巴尔干国家都纳入自己独占轨道的大德意志就可以穿过巴尔干诸国直达意大利的地中海，更令人震惊的是，还可以穿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而到达亚得里亚海。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法西斯政府和意大利舆论极为忧虑的问题。匈牙利还只构成意大利防区的外围部分，可是只要一想起“卐字旗出现在亚得里亚海上”，便会令人感到无法容忍了。__

见《概览，1937年》，i.459—465；《概览，1938年》，i.43—69。

（五）意大利奉行再保险政策的尝试

1938年9月，墨索里尼视察了威尼西亚朱利亚，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他反复强调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良好关系以及在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忠诚，这也许是意义深长的。象过去一样，他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寻求卫星国，虽然他已不再能公开推动这些国家反对德国，却希望组成一个与德意轴心相联系而更紧密地依靠罗马而不是柏林的集团。正如齐亚诺1939年1月从南斯拉夫回来时所说的那样：四千五百万意大利人、一千六百万南斯拉夫人、一千一百万匈牙利人和三千二百万波兰人齐心协力，肯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有人暗示，意大利从中斡旋可以有助于在德国和较小卫星国之间建立和谐关系。

早在1934年底，意大利就在法国鼓励下采取第一个友好表示，谋求与南斯拉夫和解，1937年3月25日的条约则巩固了这一和解。在奥地利消失后，意大利与匈牙利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法西斯政府打算调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关系，建成一个“罗马—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三角同盟”，他们还希望在以后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组成一个三角同盟。意大利倾向于阻止匈牙利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在外喀尔巴汗鲁森尼亚有共同的边界的想法，这又使意大利的政策和德国发生冲突。意大利人希望与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可能还有波兰，达成谅解，从而为意大利提供粮食和原料。可是在1938年，贸易却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阻挠：货币的困难，意大利自给自足政策所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东南欧的工业化以及德国的竞争。

与此同时，意大利一直在助长南斯拉夫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猜疑，它还鼓励南斯拉夫，可能还有保加利亚，向波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发展。它支持南斯拉夫对萨洛尼卡的要求，这是为了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优势地位和对阿尔巴尼亚的兼并而给予的补偿。可是，尽管南斯拉夫在这个阶段扮演的是盟国的角色，克罗地亚恐怖主义领袖帕韦利奇仍留在意大利，表面上虽然受到某种形式的遏制，但后来在1939年春季却表明法西斯政府的政策是多么容易来上一个大转变。一旦这个政府不再信任南斯拉夫政府对德意轴心的态度，他们就会立刻开始和克罗地亚人阴谋勾结。在西地中海，墨索里尼计划在德意轴心体制内达到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谅解。他打算支持国民军，一直支持到共和军被彻底击败，这样便可以阻挠任何调停或折衷的和平建议。一旦西班牙内战结束，他不想把军队留在西班牙，但他已把弗朗哥将军算作是一个可靠的“部属”，还打算在同法国交战时和西班牙结成同盟，以便意大利可以使用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海军基地和意大利自己在那里建筑的三个飞机

焦利，前引书，第115页。

见《概览，1934年》，第537—577页；《概览，1937年》，i.465以下。

又见《概览，1938年》，第2卷，第7章，第5节和第3卷，第1编，第5节。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9年）》，1939年1月8日

《日记（1937—1938年）》，1938年11月24日；又见1937年9月26日和12月6—7日、1938年6月17日和1939年1月的意南会谈。齐亚诺：《欧洲》，第158页，第233页，第330—331页，第411页；英译本，第102—103页，第152页，第214页，第271页。

场。1936年11月28日缔结的秘密条约已禁止双方同敌对的第三方结盟或达成协议，并禁止由第三方使用任何一方的领土或领水对另一方进行作战活动。如果一方卷入冲突或集体制裁，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提供贸易和运输的便利。条约还规定有关互助和经济事务上合作的政策应协调一致，特别是在西地中海，政策尤应相互协调。就这一时期来说，德国和意大利在吸引西班牙加入轴心阵营这一边是有其共同利益的，因为可以立即用它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可是（除意大利试图在轴心阵营内部谋求再保险外）种种冲突之处也许就会在以后发生，特别是在摩洛哥。

同上书，1939年1月8日，3月5日；齐亚诺：《欧洲》，第222页；英译本，第144—145页。

条约全文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3卷（西班牙），第1号；转载《文件，1939—1946年》，i.5—7。

（六）墨索里尼其人

尽管轴心政策会给意大利带来种种危险和屈辱，墨索里尼还是不顾一切地终于采纳了，这与他那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又工心计又好冲动而又丧尽道德的个性是相符合的。诚然，他确实是一个最不易被纳粹主义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狂热效忠所能驱使的人。对他说来，人类和理想都只有在为他自己的目的效劳或予以阻挠时才是重要的。他自己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从事的职业和他作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所执行的政策之间，是经常差别悬殊的。可是，尽管他是一个那么十足的政治上的投机兵痞，掠夺成性而又不择手段，但他懂得自己的资源有限，随时准备根据其利益的需要而改变其政策。他的这一面的性格却又往往为无法抑制的幻想和野心、深仇大恨和十分幼稚的虚荣心所淹没。墨索里尼曾对他的一个传记作者说：“迄今为止我做了些什么呢？……这个国家必须要有秩序。然后我才能有所作为。然后我才能成为一个人物。……我梦寐以求的是要在历史上留下一头有利爪的雄狮那样的我的印象！”他的早期斗争生活使他对教会、国王和中产阶级怀有深刻的敌意，他一生有着一种“被禁闭的恐怖”感，这也许是在监狱中得到或加重的。意大利在1919—1920年和约中所受到的待遇使他对法国人终身怀恨，他也为在科孚事件中未能取得全部胜利而深恨希腊人。他所渴望的速度与行动可以用一句法西斯格言来说明：“停止者必失败”；他自己驾驶汽车和飞机的情况也都能说明这一点。真正形成墨索里尼性格的许多特点，对非意大利人心中一位伟大民族领袖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却是意大利人看惯的，他们认为——更难以原谅的是他们还接受——他是一位典型的罗马尼阿的居民。

他肆意夸耀自己是为喜爱而喜爱暴力的；如果他的追随者比他更喜爱暴力，他便恰如其分地迎合他们而不是同他们对抗。他在和个别对手争辩时，如果没有占上风的把握，他倒也并不总是一味鲁莽从事，但是他很喜欢欺侮一些弱小国家的代表。当他面对广大的听众时，他的自信心便会扩大，尽管在他认为掌声尚不够多的时候也会沉着脸儿离开，但一阵热烈的掌声也会给他一种对舆论的虚假概念（虽则他是群众宣传的专家）。

在他的一生经历中，不论他的情绪如何变化，有一些特点是经常不变的，他始终蔑视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他始终乐于运用从贬义上说的马基雅弗里式的政治和外交方法，他始终怀有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望。他和大部分法西斯统治集团的人不同，他并不怎样看重财富；他对自己的家庭有真诚的感情，他的政权在公共工程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是不应抹杀的。但是支配他的主要情绪不是要促进意大利人民的社会福利，而是要为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法西斯主义》（GiuseppePrezzolini：Fas-cism），伦敦，梅休因，1926年版，第61—62页。又见D·A·宾奇：《法西斯意大利的教会和国家》（D.A.Binchy：ChurchandStateinFascistItal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1年版，第100页以下；墨索里尼的前合作者和后来的政敌切萨雷·罗西在1925年2月11日发表的备忘录，转引自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法西斯独裁制》（theFascistDictatorship），伦敦，凯普，1928年版，第412页。

关于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者时期，见高登斯·梅加罗：《成长中的墨索里尼》（GandensMegaro，MussoliniintheMaking），伦敦，艾伦和昂温，1938年版。Empire），新版修订本（伦敦，麦克米伦，1904年版），第409页注

一个神化了的意大利赢得光荣，即按这个词的最愚昧无知的传统意义来理解的光荣，而这个神化了的意大利，在他的思想上，又是和一个神化了的本尼托·墨索里尼、新罗马帝国的领袖、政治家、军人和运动员、八百万士兵和一支蔽天盖日的空军的统帅、庞廷沼泽的开垦者和里拉的保卫者合为一体的。对墨索里尼来说，意大利人不过是实现意大利及其领袖的更大成就的工具而已，这个工具他（至少在他晚年）越来越恼怒地发现是不合适了。

可是，墨索里尼一心要向全世界显示的这个光辉人物，要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也只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微不足道的新闻记者；他在发生世界危机的一个时期内把自己树立为各大国中的最弱国家的独裁者，一旦他失去好运、活力或政治上的机智，他就会以他爬上台的相同速度摔下来。他已经开始担心他党内的某一个同志会取代他。十六年大权在握的生活增强了他的自大狂和不稳定性，损害了他的判断能力和主动精神。由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行政官员，在整个政府机构和重整军备问题都需要彻底研究处理的时候，他却全神贯注于例行公事，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军乐队长的指挥棍问题。

他转向德意轴心的理由之一是，他象落入陷阱还抓住诱饵不放的狒狒那么顽固，放不下他的帝国迷梦。他 206 希望给意大利人以民族国家的声誉和分享掠夺的果实以换取他们对他的威信的支持，并因此而抢在党内极端分子的前面先下手。与西方国家和解只是一块最不合口味的劣质馅饼，同疏远德国的危险相比，对意大利是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的。德国正是意大利领袖最害怕和最着迷的国家。相反，他要特别引以自豪地施展外交手法，希望能使意大利站在轴心之内较之站在其外更安全。他之所以在 1915 年极力要求意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一个中立的意大利必然会遭到战胜的任何一方的敌视；他还想到要利用战争作为促进国家复兴的一个手段。所以在 1939 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现实主义”和他与西方国家的宿怨、恐惧和野心、“物力论”的信条以及倒向阻力最小方面的日益增强的倾向，究竟会把他引向何处。

第六节 东欧

马丁·怀特

1939年的东欧是由一些小国组成的，它们介于德国与意大利为一方和俄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地带，是德国东侧的一个缓冲地区，正如瑞士、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是德国西侧和北侧的缓冲地区一样。从北方的巴伦支海到南方的爱琴海分布着一系列国家，它们的面积虽大小不同，但同它们西边和东边的大国相比，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在1939年3月初共有十四个东欧国家。一年以前还是十五个，但奥地利在来自西侧的压力下消失了，由于同样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3月15日也解体，只留下一个其主权值得怀疑的继承国斯洛伐克。²⁰⁸这说明缓冲地区的意义是不够明确的，可能在建立它时是作为一道屏障或一堵遏制墙，但由于政治上的沉淀，很容易由权力的分水岭一变而成为一片低洼地，听任来自任何一边的洪水淹没。

这一地带的小国就是过去的帝国浪潮退汛后所出现的。它是东欧的新面貌。1914年还没有这样一条地带，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当时还不存在。在喀尔巴阡山以北只有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大帝国并驾齐驱；在多瑙河下游和巴尔干半岛也只剩一小簇小国（六个）在其北面的俄国与奥匈帝国和其南面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组成了一个缓冲地区。再早一百年，在1815年和会的时候，这些国家也都尚未存在，从芬兰湾到克里特岛的全部东欧地区都是由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瓜分的。在这四个军事帝国中，只有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故都和重心是在东欧。对于普鲁士和俄罗斯来说，东欧只是为其扩张提供便利的边区。回顾历史，必须自1815年再向前追溯半个世纪，才能在喀尔巴阡山以北看到一个纯粹的东欧国家，即古波兰王国，当时它尚未为滚滚向前的大国浪潮所淹没。在波兰被普鲁士和俄国瓜分（1772—1795年）以前，有着一个历史悠久和光辉的波兰，它自己也曾一度是一个大国，曾粉碎条顿骑士团，曾联合立陶宛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曾入侵俄国并占领莫斯科，最后才把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输给了另一个大国瑞典。

所以东欧这一带的国家都是1815年以后才出现的，其中一半甚至迟至1918年才出现。以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为前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欧洲空前规模的政治重新组合。奥斯曼、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四个帝国崩溃了。在东欧出现了七个新主权国家。

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过去从来不是独立国家。通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名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到1918年它的独立仍未确立，它的边界还有待确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在长期消失以后重新取得独立国家的地位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则正在扩大中，以期完成只有一个世纪历史的民族自决。奥地利和匈牙利都由于同样的进程被迫从帝国降为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匈牙利还在恢复民族的独立生存；保加利亚则以割让领土作为战败的代价。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终于全部毁灭；当作为奥斯曼帝国残余的西亚部分也告解体，另行建立了民族国家土耳其时，于是这种局面便进一步巩固了。在这些重新恢复或者新建立的国家之中，寿命最短的要数乌克兰，它是从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一个独立国家，是立战争（1821

—1829 年) 导致由 1832 年的伦敦条约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这是奥斯曼帝国最早的继承国。

在德国东线胜利的掩护下存在了不到一年，然后又为俄罗斯国并吞，成为苏联的一员——在不到一代时间内，大部分东欧其他继承国所走的或追随的都循着这一条道路。(11)

（一）民族冲突

1918年以前欧洲领土的变革通常总是通过吞并或212合并减少国家的数目而增加国家的面积，民族主义的突出胜利，如皮埃蒙特的统一意大利和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也会有此种效果。突然间从无到有，一下子建立六个新的小国家，是史无前例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承认瑞士邦联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而独立，承认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从而建立了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可是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久已确立的事实。1878年的柏林条约也建立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同时又为建立第三个主权国家保加利亚奠定了基础，这是东欧的分裂在1918年达到高潮以前的最重要阶段；但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各自的独立尚未得到承认之前都已经是欣欣向荣的自治公国，这同1918年的任何一个新国家都是不相同的，可能芬兰是例外。在1918年纷纷成立的国家中与此最相近似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被取消后德意志诸国所取得的合法独立。但这也只是在法律上认可其独立，其实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以来它们早已拥有此种独立了。此外，通过莱茵邦联的创建和扩大，这也无非是驱使这些国家同法国进入新的更严密的依附关系的部分进程而已。这些小国才摆脱了一个保守的大国，却又立刻被卷进了一个革命的大国更严厉的保护之下。二十世纪的东欧所经历的进程也是一样的，不过历时三十年。因为这时清理场地的工作要比十九世纪初的西欧进行得更彻底。东欧的继承国家之所以尚能生存，都是由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即所有邻近的大国都已消灭或已大为削弱，而且也只有在德国和俄国尚未能恢复其不可避免的优势时，它们才得以维持独立。

如果这就是建立继承国家的条件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理论，即认为共同的语言就能表明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又有权组成一个单独的独立国家。1918年东欧的重组是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大胜利，它也为其限度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当西欧以语言为原则的民族主义信条传播到东欧时，在东欧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党派尚未经受在西欧业已产生民族主义信条的213那种历史发展和训练。坚定的民族性是成长缓慢和条件优越的产物。可是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哪怕是很小的边缘部分，它是由部分被同化了的分子组成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归附其他民族；与此相反，以西欧的瑞士和比利时的历史为证，语言各不相同的分子可以组成一个在政治上清一色的民族。但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语 莱茵邦联最初的成员有十六个德意志国家；二十六个国家最初没有在内；见阿尔贝·索雷尔：《欧洲和法国革命》（Albert Sorel :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vii. 52—59。通过1806年7月17日的莱茵邦联文书，十六个签字国脱离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当即宣布他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8月6日法兰西斯二世放弃皇帝称号。最后所有的德意志国家，除奥地利、普鲁士、黑森-卡塞尔和不伦瑞克以外，都加入了莱茵邦联。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James Bryce : The Holy Roman Empire），言原则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将国家分裂为各个组合成分，它们或者分立，或者再进行不同的组合。

就西欧历史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民族的种种原因而言，东欧历史对形成稳定的民族恰恰是不利的。西欧地处欧洲半岛的边缘，有东欧为其屏障和绝缘

体，而东欧在历史上则不断遭受来自东方的入侵以及来自西方的对此种入侵的反击。因为东欧横亘于欧洲半岛的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上；波罗的海的海岸是从莱茵河三角洲延伸至西伯利亚的大平原的一部分，乌拉尔山脉也并未怎样阻隔其间；多瑙河流域尽管部分由喀尔巴阡山为其屏藩，却是穿过中亚细亚和准噶尔门一直延伸到蒙古的大平原的终点。移民接连沿着这些道路进入，打乱而又丰富了地中海和欧洲的文明。在基督教世界存在之日，西欧没有受到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冲击，因为有着东欧在首当其冲，而鞑靼人的入侵却左右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正如土耳其人的入侵左右了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一样。在此时期内，东欧也承受了来自西方较强大的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这种侵入比来自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要缓慢一些，但渗透得更深。波兰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德国向东方的扩张又决定了波兰人自己、波罗的海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历史；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芬兰人、波罗的海民族和早期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喀尔巴阡山把东欧分为两个地区：北面是波罗的海盆地，南面是多瑙河流域及其巴尔干延伸部分。两个地区之内各有其分支地区，但两个地区之间还是有一个总区别的，在喀尔巴阡山以南，有天然边界，可以为民族社 214 区提供模式，在波罗的海地区却没有天然边界。在这无甚差别的平原上成长的国家——条顿骑士团、立陶宛、波兰、瑞典帝国、普鲁士——其版图的变动性极大，除其殖民者可以扎根或其军队可以驻扎的地方这条界线外，别无边界可按。1920 年波兰—苏俄之战反复多变，开始时毕苏斯基的军队深入到基辅，然后红军反击，一直打到华沙城下，接着波兰军队又反攻，最后停留在里加线上，这道线后来就成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 1939 年，这一史实只不过是上述原则的最近例证而已，它最引人注目地反驳了 1939 年的新解决方案据以为基础的民族原则。

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则有天然边界和地区性单位。波希米亚在其四面环山的地形下是自成一体的，不过摩拉维亚通过下奥地利在东南方留下了一个缺口。背靠喀尔巴阡山的弯曲部分而南向萨瓦河的大匈牙利是一个地区性单位，和背靠大西洋而面向莱茵河的法国相类似。特兰西瓦尼亚由于自然条件，可以成为比瑞士更为美好的胜地，它在十七世纪就是作为这样的胜地的；罗马尼亚的各个公国象位于多瑙河口的另外一些低地国家一样；希腊这个地

“西欧的文明是拜占庭帝国顽强维持生存的意志的副产品，这句话并不夸张。”诺曼·贝恩斯在贝恩斯和莫斯编的《拜占庭》一书中的话，第 xxxi 页。

《和会史》，vi.274—278，318—322。这次波兰—俄国交锋在历史上的伟大先例是毁灭了旧波兰王国的百年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伊凡雷帝发动的 1558—1583 年的立窝尼亚战争使他到达波罗的海海滨；于是波兰在“莫斯科动乱时期（1603—1613 年）”企图征服俄罗斯，波兰于 1610—1612 年占领莫斯科是当时的高潮；最后俄国又再一次向西推进，根据 1667 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首次兼并波兰领土，成为瓜分波兰的先声。

“如果匈牙利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是由本族国王统治国家，它满可以象法国一样完全解决它的民族问题”〔C.A.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者……1919—1937 年》（C.A.Macartney：Hungary and her Successors...1919—1937）。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7 年版，第 35 页；参阅第 487 页〕。

中海半岛是第二个意大利。但是所有这些地区性单位都没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民族集团。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中，三分之二是捷克人，三分之一是德意志人；大匈牙利的人口中，只有一半是马扎尔人；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人口是罗马尼亚人，三分之一是马扎尔人，其余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诸公国所容纳的罗马尼亚族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不但有少数民族，而且还有分支民族，这是潜在的民族，1919年把这些分支民族包括在较大的民族国家内，或分别成立为各别的国家，这都是产生政治麻烦的根源。奥地利人对德意志人的关系是如此，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按照许多波兰人的看法，立陶宛人对波兰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布在多瑙河以南—215带（从黑海海岸一直到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南方斯拉夫人，也是一系列相互合并的分支民族，他们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1919年以后才确立的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就是把剩余的南方斯拉夫人包括在内而扩大的，这两个国家表明了主要的语言分界线。然而同非斯拉夫的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混合在一起的南方斯拉夫人所定居的马其顿，却仍然是一块精神上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所以它成为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之间有争议的地区。这是因为这块土地的大部分分别由南斯拉夫和希腊占有，保加利亚又根据历史对它提出主权要求，阿尔巴尼亚的理由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的三分之一居住在那里；其他国家对马其顿这个省也经常感兴趣，要把它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南方斯拉夫人重新组合的可能性遂成为经常提出巴尔干联邦计划的主要起因。然而在马其顿，较之在巴尔干半岛的任何地方可以看得更清楚，民族的分类与人民生活无关，“马其顿农民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说自己是土耳其人，有时又说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连农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最大的一个分支民族的范例是由涉及大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或卢西尼亚人提供的。位于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乌克兰在政治上与马其顿极为相似，但是它更大、更具有危险性。它是一个被淹没的民族，在政治上可见的部分是构成苏联的第二个大共和国，但是它的范围一直向西延伸到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各国的边界以外，包括寇松线以东的波兰的三分之二，包括波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分水岭一直延伸到斯洛伐克本身北部边沿和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尾部部分）的多瑙河，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省相互贯穿。可是，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几乎也和南方斯拉夫人的一样，分为许多不同层次。东加里西亚接受西方影响最

《和会史》，iv.245—248，270；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者》，第94—110页。

《和会史》，vi.278—279；w.F.雷德韦、J.H.彭森、哈勒克基、R.迪博斯基编：《剑桥波兰史》（w.F.Reddaway, J.H.Pen-son, Halecki, R.Dybosk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第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第522—524页；沃尔特·科拉尔茨：《东欧的神话和现实》（Walter Kolarz: Myths and Realities in Eastern Europe），伦敦，德拉蒙德，1946年版，第108—110页。立陶宛的语言与波兰的完全不同，波兰与立陶宛结成联邦或兼并立陶宛的理由是以波兰被瓜分前的波兰—立陶宛联盟的传统为基础。

阿尔巴尼亚人口有一百万不到一些，在边界外南斯拉夫的马其顿部分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接近五十万人。

深，是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中心，过去奥匈帝国为增加俄罗斯的困难曾鼓动这个运动。沃尔海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农民则是亲俄罗斯的。

“即便如此，在波兰和俄国的边境上仍有不少农民的民族性是不十分明确的，他们称自己为‘本地人’。”至于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那些人，他们是非民族主义的，而且部分地为马扎尔人所同化，他们对卢西尼亚人是否被认同为乌克兰人是满不在意的，而不象东加里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乌克兰人被认同为大俄罗斯人要感到愤慨那样。卢西尼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唯一听任巴黎和会支配的东欧民族，所以被认为在政治上太落后，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因而必须置于他国监护之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因此就被分配给捷克斯洛伐克，各大国又同意波兰攫取东加里西亚并默许它牺牲苏俄。波兰没有履行它对东加里西亚给予自治的义务：捷克斯洛伐克也以某种理由而推迟履行它给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自治地位的义务。

从八世纪到十四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向东扩张在东欧造成了一个按语言划分民族的社会阶层结构。它们之中有分布颇广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有些地方有着波兰贵族或马扎尔贵族，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当地的农民不同。因而就有许多大城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它们所在地的四周农村全然不同。但泽是一个腹地由波兰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美美尔是一个内地由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维尔纳是立陶宛和波兰争夺的地方，因为在郊区是立陶宛人占多数，在市区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真正的争论是在两个非西方的（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也是在两个劣等的）民族之间展开的，因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加在一起在市区还没有犹太人多，在郊区则没有白俄罗斯人多。东加里西亚的首府利沃夫，一度称为伦贝格，给波兰以最充分的理由对这个省提出要求，因为它是位于乌克兰大海中的一个波兰岛屿。另一方面，在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内，城市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农村则基本上是波兰人。的里雅斯特是一个意大利港口，腹地则住着斯洛文尼亚人，阜姆也是一个意大利港口，其内地居民则是克罗地亚人，这两个港口是亚得里亚海的但泽和美美尔。同样的原则也可以据以说明多瑙河上的大都会维也纳。维也纳从未在当地产生一个奥地利资产阶级，可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却形成了一个以犹太人占优势的资产阶级。以上这些城市如果不根本改变其社会结构就无法纳入民族国家的体制。正如古希腊时代的城市一样，它们唯一合适的政治环境便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由于争议双方各有相等的说服力或说服力都不足的民族理由据以提出要求，这就成了它们处于

《和会史》，vi.283注。

见《概览，1920—1923年》，第255页注，以及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新闻部编的《波罗的海国家》（TheBalticStat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8年版，第89页注。可是立陶宛对维尔纳的要求主要还是以历史原因为依据，因为维尔纳直到1569年卢布林联盟时一直是立陶宛的首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土耳其为腹地的希腊港口士麦那在数字测验上未能符合这一模式，虽然那里的希腊人除人数方面外在其他方面都比土耳其人占优势。见A·J·托因比：《西方在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TheWesternQuestioninGreeceandTurkey），伦敦，康斯特布尔，1922年版，第133—134页。这是在土耳其人于1919—1922年的安纳托利亚战争中把希腊人赶走之前的情况。

见弗朗兹·博克瑙：《奥地利及其以后》（FranzBorkenau：AustriaandAfter），伦敦，费伯，1938年版，第98—102页。

国际最尖锐冲突中的原因。在东欧城市中，维也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它的国际性由于几百年来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而得到保证。在这个城市中产生了一种比国际战争更有腐蚀性和更有毒害的社会冲突——反犹太主义。希特勒在这里从舍纳雷尔和卢埃格尔那里学到了反犹太主义，他把它带到柏林而使反犹太主义终于成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个民族的乡区可以同另一民族的首府结成多民族的混合体，还能产生与其所支持的民族血统不相同的民族领袖。有些大人物出身于他们所主宰的社会以外的地方，例如拿破仑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这种社会不正常现象在东欧是有很多例子的。基马尔·阿塔图克属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血统，而毕苏斯基则属于立陶宛血统。匈牙利的总理贡伯士“是属于德意志血统，他曾想证明自己出身于匈牙利贵族门第而未成功，以致引起了人们的讪笑”。他的继承人伊姆雷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匈牙利的一个立法纲领，但不得不在1939年2月提出辞职，因为有证据证明，他的曾祖父就是犹太人。218 斯洛伐克的领袖图卡多年来在斯洛伐克人民党中是仅次于党的创建者赫林卡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变节的匈牙利人，在快到中年时才学会说斯洛伐克语。

铁卫团的创立者、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宣传者、浪漫主义的科德里亚努原来属于乌克兰和德意志血统，他的真正的姓却是齐林斯基。和他的情况极为相似的匈牙利的萨拉希，乃是匈牙利纳粹党的领袖和马扎尔人种族纯洁论维护者，可是他本人就混杂着亚美尼亚、斯洛伐克和德意志血统。那个维也纳贫民和“波希米亚下士”平步青云地高升到掌握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权力，也只是作为一个出身于边疆居民或异国人士而成为民族领袖的东欧最杰出的例子罢了，而且毫不过分，也绝非奚落。不过还有较民族分界线更古老和更深刻的划分。因为在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向来是西方基督教和拜占庭、俄罗斯两个东方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历史分界线。在这里，除了政治上的分界线以外，还横亘着一条天主教和新教在其一边而东正教在其另一边的分界线。这条文化和宗教分界线所穿过的大致是四个波罗的海国

关于阿塔图克和出生于克里特岛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维尼齐罗斯的相似之处，见《概览，1930年》，第167页。对此，有一位评论家说：“测验奥斯曼土耳其民族的是语言和文化，不是严格的种族。他们并不认为阿塔图克是‘边缘民族’，正如我们不认为劳埃德·乔治，博纳·劳和拉姆齐·麦克唐纳是‘边缘民族’一样”。

H·塞顿-沃森：《东欧》，第193页。

见伊丽莎白·威斯克曼：《不宣而战》（UndeekredWar），伦敦，康斯特布尔，1939年版，第22页。

见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55页；《概览，1937年》，i.424。

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6页。

这是在纳粹革命之前，兴登堡对希特勒的称呼，见J·w·惠勒-贝内特：《兴登堡：木制巨人》

（J.W.wreeler-Bennet：Hindenburg：theWOODenTltan），伦敦，麦克米伦，1936年版，第407页。

这条分界线在东方有一些无法划定的突出部分，即东仪天主教会或希腊天主教会，这些教会又与罗马教廷重新统一，但仍保留拜占庭的礼拜仪式。它们是反基任教改革运动的胜利看。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卢西尼亚的天主教会和罗马尼亚的天主教会，前者是在1596年的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产生的，它是作为波兰天主教会侵入波兰东正教地区的帝日主义工具，后者是在1698年的阿尔巴尤利亚宗教会议上产生的，是为哈布斯堡王朝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同样目的服务的（关于后者，见R·w·塞顿-沃森：《罗马尼亚民族史》

（AHistoryoftheRoumania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124—125页）。这些教会不久便限于附属

家的东部边境线或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线；它 219 沿着寇松线把波兰一分为二，这条边界线也只有寇松线这一部分才是国际权力机关划定的；它把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分隔开来；它又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然后它通过南斯拉夫北部，形成一条弧形线把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分开，又随着萨瓦河线向西前进，再折向南面顺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直伸向杜布罗夫尼克。

这条边界线是潜在的民族界线，也是宗教界线，因为在东欧这两条线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波兰和南斯拉夫就是按这条线而分裂的。波兰在 1939 年的主要内部弱点就是因为它要越过这条线而进行自我扩张，它害怕来自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南斯拉夫的虚弱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条线是一系列南方斯拉夫民族的两条主要区分线之一。一方面是作为天主教西方部分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另一方面是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 1939 年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语言分界线相比，其真实性和持久性似乎并无多大不同，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结成一个统一国家是有其内在可能性的，正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可以结成一个统一国家一样。

的民族，同波兰化的天主教的统治阶级威马扎尔化的卡尔文教派的统治阶级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如同东正教会自己一样，它们也真正反映了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民族的情况，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独立实现以后，它们的作用也就相应地削弱了。在 1939 年 3 月，卢西尼亚和波兰所属的加里西亚的东仪天主教会大约有四百万教徒，罗马尼亚的东仪天主教徒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东欧其他地区的东仪天主教会的信徒人数甚少。见唐纳德·阿特沃特：《东方的天主教会》（DoasldAttwater：TheCatholieEasternChurOlles），修订版（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布鲁斯，1937 年版），第 279—282 页，统计摘要。

根据人种学原则，寇松线是波兰东部最低限度的边界线，1919 年 12 月 8 日和会最高会议授权波兰设立永久管理机构。见《和会史》，vi.275，322；《概览，1920—1923 年》，第 251 页；S.科诺瓦洛夫：《俄罗斯—波兰关系》（S.KonovalovtRusso-polishRelations），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5 年版，第 34 页和附录 3、4；L.B.纳米埃尔：《面向东方》（Fao-ingEast），伦敦，哈密什·汉密尔顿，1947 年版，第 109—113 页。将近一半面积的波兰国土（十五万平方英里中的六万四千平方英里）和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千三百万人中的一千零五十万人）是处于寇松线和波兰最后于 1921 年赢得的里加条约的边界线之间。

（二）社会冲突

东欧的民族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对立，国家之间的纵的方面的斗争往往和阶级之间的横的方面的斗争交错在一起。东欧的主要社会特征是没有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太弱小。这是因为一千多年来的入侵、战争和土耳其帝国压制一切生机的统治推迟了商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西欧的发达是怎样以阻碍东欧的成长为其代价而取得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段灾难性的历史不仅阻碍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成长，它也毁灭了全部贵族阶级和统治阶级；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统治阶级一般就是民族传统和历史意识的传递者，那末毁灭了统治阶级也就有可能将奥匈帝国的各民族分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了。

在这方面，东欧的民族可分为四类。（1）欣欣向荣的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发展趋势被第十四世纪土耳其的征服打断了，这就摧毁了它们的贵族统治和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巴尔干民族于十九世纪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复兴运动反过来又摧毁了土耳其的官僚和贵族阶级，留下一些完全是由农民组成的国家，它们只有一个第一代的统治阶级。其中有两个是例外。希腊人从未成为一个无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不久就成为他们的征服者的不可缺少的人，并确立了一种特权地位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行政管理和经营商业的阶层。独立的希腊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传统，是一个航运和商业国家，易于取得海上权力；因此，尽管它是当年东方基督教世界核心的希腊帝国的后裔，在感情上它却是土耳其继承国家中最亲近西方的。再有一个便是罗马尼亚，它已产生了一个有部分希腊血统的地主阶级，他们与犹太人以及开发油田的外221 国企业界结成联盟。（2）东欧中部既包括东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北屏障，也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层，这里的决定性的事态发展不是土耳其的征服，而是两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入侵。这次入侵使罗马尼亚诸公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口减少；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者曾把德国移民召进来弥补损失。与此同时，一些劫后余生的卢西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已波兰化或马扎尔化了。（3）捷克的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两地的情况特殊。它们和波兰、匈牙利不同，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入侵并没有到达它们的国土。它们完全被德国手工艺人与商贩所拓殖和开发；它们维持了高度发展的民族独立，直到他们在1526年选出一个哈布斯堡的国王。它们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企图拒绝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因而招致了被战败、被征服和民族覆灭。一个德意志化和天主教化的进程消灭了波希米亚的当地贵族阶级，正如土耳其的征服摧毁了巴尔干当地的贵族阶级那样，接着捷克人也加入了无历史的民族之列。（4）波罗的海地区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殖民领域，那个地区信奉异教的野蛮人在芬兰的是被瑞典人征服的，在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的是被条顿骑士团征服的。在那些国家里，当地的农民都是在一个外国统治阶级管辖之下。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由于和波兰联合才维持了它的独立，其代价则是迅速地波兰化，此种模式以后又再次出现。

然而长期积累的民族斗争和民族伤害致使东欧多少世纪以来分裂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同样也给它们大家以较之西欧民族更尖锐和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德意志人不会忘记1410年败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坦伦堡之战，1914年8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终于在同一战场上战胜了俄国军队而报仇

雪耻了。马扎尔人一心想湔雪莫哈奇之耻，即东方的“弗洛登”，匈牙利的国王和骑士都是在那儿遭到土耳其人残杀的，并以此作为他们保卫基督教世界的部分传奇。无历史的民族的农民，即便在民族沦亡时期，也保持了他们的历史传统。塞尔维亚人有一组诗歌，记述他们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战败的经过；捷克人的文学传统虽然在白山战役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实际上已经消失，可是波希米亚的农奴们在1775年起义反对他们的德国农奴主时却高唱胡斯党人的歌曲。正如西欧唯一有着类似经历的民族爱尔兰人一样，这些民族之所以能重获自由，乃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冤屈和光荣一直活在他们的心头。历史是他们的政治实质，他们的全部政治都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

这就象一个人驾车沿着南丘陵疾驰，然后拐弯转离大路，沿着小道驶抵苏林顿、华盛顿和斯特宁的草原，在那里他会看到一些房屋，里面住着与理查二世的悲剧有关的人，他们才脱下他们的丧服，但哀哭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东欧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主张同各自政府的目标接近的程度，同西欧相比要大得多；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历史的权利要求和对历史的回忆支配，如果要在西欧找一个类似例子，除非是英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旨在收复吉延和诺曼底。特里亚农条约后被割去了土地的匈牙利丝毫不愿放弃圣斯蒂芬王家的历史权利；为特里亚农条约所扩大的罗马尼亚是由达西亚神话支持的，波兰共和国念念不忘的是亚盖隆王国，保加利亚萦绕于心头的是阿森帝国和更早一些的西蒙君主和塞缪尔君主的帝国，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但不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所怀念的是斯提芬·杜尚帝国；阿尔巴尼亚人为自己当前的虚弱所提出的慰藉，则是声称自己是“原始的、土生土长的巴尔干民族”，对他们说来，斯拉夫人只不过是刚来不久的移民，不但斯堪德培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且连埃皮鲁斯的皮洛士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东欧民族中唯一没有自己背上伟大的过去这种历史包袱的民族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但甚至在芬兰人中间也还有一些人梦想要有一个包括全部东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在内的大芬兰。从中世纪开始，东欧的中产阶级就由德意志人充实，不过后来还有犹太人补充。

坦伦堡“是斯拉夫海洋中的一个德国岛屿，可是在这个岛上却有着—块神圣的土地，那里的一个民族是以剑作为道义价值的象征的。而且这块土地是纪念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复仇的，他们湔雪了五个世纪以前条顿骑士团遭到惨败的耻辱。有人也许会想，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一切关于战败的回忆都会消失了。1914年的但伦堡胜利说明了这种回忆只是‘休眠’而已。爱国歌曲和军队进行曲使东部边境在感情上和历史上的号召力都不会泯灭”。伊恩·F·D·莫罗：《德国—波兰边界的和平解决》，（Jan F. D. Morrill：The Peace Settlement in the German-Polish Border Land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6年版，第217页。

参阅佐尔坦·格列维奇的文章，载《匈牙利和文明》，乔治·卢卡奇编（La Hongrie et la civilisation，edited by Georges Lukacs），巴黎，复兴书局，1929年版，第66页。关于导致莫哈奇败绩的匈牙利统治阶级的骄傲自大和失策，以及处于从属地位的克罗地亚人对此的反应，见R·W·塞顿-沃森：《南方斯拉夫人问题和哈布斯堡王朝》（The Southern Slav Question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伦敦，康斯特布尔，1911年版，第19页和注。和坦伦堡一样，莫哈奇的败绩也因为帝国于1687年在同一地点击溃土耳其的伟大胜利而得到湔雪。

R·J·克纳：《十八世纪的波希米亚》（R·J·Kerner，Bohem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麦克米伦，1932年版，第279页。

布雷斯福德：《马其顿》，第271—272页。参阅鲁宾逊：《阿尔巴尼亚走向自由之路》，第11—12页。

在 1939 年 3 月，犹太人仍然还是东欧的主要民族，大约从 1800 年以后一直是如此；“犹太人被迫流亡”这一章现在即将结束。他们首先是在十四世纪由卡西米尔大帝指定在波兰定居的；到了十九世纪，背后有俄国政府的迫害在驱使他们，前面有新兴的自由社会和发展商业的机会在吸引他们，于是大批犹太人移居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他们便把特别是马扎尔人自己不愿执行的中产阶级任务接了过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恰好与德意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大国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注定是发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的对象，掠夺犹太人已成了国际都感兴趣的事了，德国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缺乏一个确立了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便决定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史，而缺乏资产阶级文明则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史。除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以外，各国既没有立宪政体的社会基础，也不存在立宪政体的道德传统，只有在匈牙利有议会体制的传统，但这种体制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了为西方所欢迎的国际礼让的继承国。它们有着不能取消的民族自决的凭证，它们又宣称是民主共和国和君主立宪国家，由于有马萨里克和维尼齐罗斯这样的人物挡住了视线，人们很容易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好象东欧是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养成所。到了 1939 年 3 月，东欧除芬兰或许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所有国家的议会政体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独裁政权所取代。在当时，也许 224 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些继承国家注定要在一场大动乱中诞生，这场大动乱摧毁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立宪政府，东欧只是未能取得半个西欧所未能保持的政体罢了。马其顿恐怖主义组织在保加利亚的统治，1930 年波兰对东加里西亚的残暴镇压，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掠夺和失政，这些不仅都符合上土耳其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传统，而且预示了一种政体，它在一个独立的间隔期后很快就要再次从外部强加给东欧，同时还反映了为外部干预创造必要条件的内部冲突。从波兰到巴尔干各国，在农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都有一道鸿沟，下层充满怨恨和往往是真正的痛苦，上层则使用警察压制，又残暴又腐败。东欧处于革命前夕状态，它的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按照邻近两个革命大国之间的对抗意志而向两极发展。统治阶级终将是容易受到德国的反革命宣传影响的，他们却又早已在害怕群众容易受到俄国的革命宣传影响，并且加以夸大，无意中也就助长了这种感受性。

一个农民为蒙受不公正待遇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送上军事法庭，不时遭到拷打，并 225 被判处监禁，或在军事管制下强迫劳动……。一个不愿让自己的女儿被宪兵强奸，或不愿让自己的财产被宪兵掠夺的农民必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东欧每个国家的地平线上，在压力或冲击下，几乎都会出现分裂。

东欧是一个农业地区，东欧民族也是自觉的农民民族。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一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人口是过剩的，东欧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就象西欧工业就业不足的情形一样。这是自 1919 年以来扩大工业化的又一原因。但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民族主义原则。继承国的建立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起分裂了。两大经济单元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被夺去了欧洲边境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省份；另一个单元奥匈帝国，本是多瑙河流域中部联成一体的统一夫税区，这时却分

裂为五个各有关税壁垒的独立经济单元。对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也曾作过微弱的努力，但未取得成果：世界经济萧条又加强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趋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不自然地发展农业，农业国家则不自然地发展工业。其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市场。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 1939 年 3 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统一体的情况是不明确的，大体上它所起的经济作用是落后的，帝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是低标准的。“所听到的关于 1918 年以后这一君主国的自然经济统一体的情况比以前的多得多。”（C·A·麦卡特尼：《多瑙河流域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Danube Basin），剑桥大学出版社，1942 年版，第 78 页）。经济上民族主义的弊病导致为过去哈布斯堡帝国辩护的争论，弗雷德里克·赫茨 [见《多瑙河国家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Danubian States），伦敦，高兰兹，1947 年版] 说继承国的国民收入减少了。而科林·克拉克的见解则与此相反 [见《经济进展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伦敦，麦克米伦，1940 年版，第 127—128 页]。

（三）凡尔赛解决方案

在 1918 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这个体制是从 1918 年而不是从 1919 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 1939 年 3 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

1939 年 3 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 1919 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来说，它具有巨大的解放运动的性质。1918 年象伟大的先例 1789 年和 1848 年一样，给人带来了革命告成、新时代开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来临之感。这种自我陶醉的气氛也许就是巴黎和会所处的最主要的政治环境，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尤其是这样，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纳粹德国勃兴，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联盟节”引向“恐怖时期”和“法兰西帝国”以及从拉马丁、巴枯宁、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仑、巴赫和加官尔的辩证法，同样也适用于从以马萨里克为其最光辉代表人

严格说来，“凡尔赛解决方案”一词用之于东欧是不合适的，因为 1919 年 6 月 28 日的凡尔赛和约只限于德国，只是在限定德国的东部边界时才影响东欧。协约国给东欧新体制以法律形式所根据的条约是：1919 年 9 月 10 日与奥地利签订的圣日耳曼昂莱条约，1919 年 11 月 27 日与保加利亚签订的塞纳河畔纳伊条约，1920 年 6 月 4 日与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以及 1923 年 7 月 24 日与土耳其签订的洛桑条约（取代 1920 年 8 月 10 日的塞夫勒条约）。凡尔赛和约刊载于《和会史》，iii.100 以下。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的条约刊载于同上书，v.170 以下。保加利亚的条约刊载于同上书，v.305 以下。同土耳其签订的两个条约并未载入《和会史》，分别见《条约汇编》第 11 号（1920 年），《1920 年 8 月 10 日在塞夫勒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敕令第 964 号，以及《条约汇编》第 16 号（1923 年），《1923 年 7 月 24 日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及其他文件》，敕令第 1929 号。

L.B. 纳米埃尔：“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和会史》，第 4 卷，第 1 章，第 9 编）对奥地利的这一过程作了最精辟的简短叙述，尤见第 90 页，第 113 页。

“因为昔日的土耳其已不再存在，它的继承者对帝国不感兴趣，俄罗斯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哈布斯堡王朝已经覆灭；凡尔赛、特里亚农和圣日耳曼条约使弱小民族获得自由。自由对这些民族来说是令人欣喜若狂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象从长时间沉睡中醒来的青年人，在清晨敞开的窗前伸展自己的肢体”（韦斯特：《黑羊和灰鹰》，ii.494），参阅 T.E. 劳伦斯：“仿佛就在清晨，未来世界的清新感使我们陶醉”（《智慧的七根支柱》一书被删除的序言中语，转引自戴维，加尼特编：《T.E. 劳伦斯书信集》[（David Garnett, ed.: the Letter of T.E. Lawrence），伦敦，凯普，1938 年版，第 262 页]，以及 A.N. 劳伦斯编，T.E. 劳伦斯后来的改写本：《东方集会》[（Oriental Assembly），伦敦，威廉斯和诺盖特，1939 年版，第 142 页]）。在西伯利亚，春天来临得稍许早一些，大约在 1904 年：“革命一代的青年和工人运动的青年恰好相合。这是十八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时代。超过那

物的解放了的东欧引向 1939 年 3 月的东欧，这时主宰东欧的是业已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的一个东欧移民。

匈牙利和德国的和约修改论者在宣传上的又一成就便是把凡尔赛解决方案说成是可悲的历史颠倒，那些旧政权的失意者因和约而变成了新政权的得势人物。然而，东欧各国及其千百万人民因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得到的民族自由和实现的民族愿望却要比在外国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多得多。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和对和约感到满意的国家在数字上并不相等。“胜利”的国家有九个，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它们都是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崛起而取得独立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继承国），以及希腊。战败国是五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俄国。德国和俄国不同于东欧国家；它们属于大国—228 类，它们要求修改条约的方式是革命式的，也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和那种据说是因和约不公正而要求纠正者是毫不相干的。正确地讲，奥地利并不是一个要求修改条约的国家。它是一个缺乏生存意志的国家，因为它原来的愿望是与德国合并，但协约国不允许；奥地利也缺乏生存的手段，因为在早期，它只是仰赖国联贷款的人工呼吸才能维持生命的。从那时起，奥地利就没有什么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且它还从匈牙利手里取得了布尔根兰这一块土地，因此就颇为矛盾地把自己置于领土获得者之列。

在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两个主要国家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是它们对修改的主张不同。保加利亚不象匈牙利，它在 1918 年的败绩已是七年中的第二次战败，所以它的不满情绪不那么强烈，比较听天由命。而且，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又有特殊关系。斯坦博利斯基和维尔切夫的传统就是和南斯拉夫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南方斯拉夫联盟，为此保加利亚几乎成了 1934 年巴尔干公约的签字国。匈牙利则从来不存在加入小协约国的问题。匈牙利没有斯坦博利斯基，也没有维尔切夫。因为在战胜国和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之间的裂痕并不如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之间的老裂痕那样深。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最大的不满不在于和约解决办法对他们不公道，而在于和约剥夺了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此种老区别的势力还可以由东欧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地区，就民族领域而论，已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1919 年的解决方案大体上是颠倒了早先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卢西尼亚人，他们无论在 1919 年以前或以后，都是处于底层的民族”（麦卡特尼：《多瑙河流域的问题》，第 120 页；参阅第 151—152 页，第 108—109 页，以及托因比：《和会后的世界》，第 60—61 页）。

《概览，1920—1923 年》，第 933—334 页。第一次是在 1913 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败于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同它们之间的其他差别一样，它们要求修改和约的主张在性质上的不同是与以下事实有关的，即“保加利亚的社会结构在东欧是最平等的，匈牙利的社会结构则最不平等”。H·塞顿·沃森：《东欧》，第 130 页。

《概览，1934 年》，第 524—625 页。

关于“公道”词义的含糊不清，见《和会史》，iv.439—442。“令人吃惊的是，经常可以发现同一个民族主义的德国人一方面声称把东普鲁士从德意志帝国分割出去是根本不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说谁要是怀疑德意志—波希米亚的可行性简直是荒谬。”伊丽莎白·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关于历史上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省的斗争之研究》（Elizabeth Wis-Kermann：Czechs and Germans：

A Study of the Struggle in the Historic Provinces of Bohemia and Moravia），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38 年版，第 86 页，

一个国家波兰来说明，它集双重利益于一身，既是有历史的民族，又是一个战胜国。

有人批评凡尔赛解决方案说，它产生的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它产生的问题没法和它解决的问题在数量上相比，它们 229 属于不同的性质。1918 年的革命解放了大多数民族，正是这个伟大的、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成就产生了少数民族问题。自 1918 年以后实际上已取得胜利的东欧民族主义在形式上过于偏激，因此在自己内部也难以作原则上的自我纠正。阿克顿有一句名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的检验标准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享有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根据这种检验，总的说来，东欧新体制并未确定自由，它只是确定了多数民族的权利。阿克顿的另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明了并未确定自由而只是默认部分自由的经过：

民族权利的最大对立面是现代的民族理论。由于在理论上把民族和国家处于相等的地位，实际上却是把国境内所能有的其他民族降到从属地位。……各个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正如人们在社会年的结合一样，是文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东欧根据凡尔赛解决方案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正是民族主义向自己的对立面迅速转化的部分过程。因为牺牲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以维护多数民族的权利，必然会导致为维护一国最大民族的权利而牺牲所有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使东欧各族人民都屈从于八千万德意志人的意志。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宣称他连一个捷克人也不想统治，接着他却吞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因为它们都是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两者相隔才不过六个月，他就是这样在这条盘旋形的道路上最突然地拐过弯来的。——凡尔赛解决方案尽管是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但出于 230 战略和经济考虑，在细节方面却出现了许多修改。因为解决方案不仅是按照民族原则重新划定边界，而且还是作为一场大战的结果而以战胜者的决定强加于战败国。所以对民族原则所作的修改，完全是有利于战胜者的。分割大匈牙利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践踏了民族原则。保留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蔑视民族原则，尽管所持的理由是一个纯粹的捷克国家在经济上或战略上都是难以生存的。1938 年 9 月的慕尼黑协定便推翻了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建立了一个纯粹是捷克人的国家！六个月以后这个国家果然便解体并消逝了，这也许可以证明凡尔赛和会的明智吧。

战胜国的国境扩大了，一般说来，凡相近的同民族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此种最适合条件的扩张，只有吞并外国少数民族才能达到。战败国则相应地

“今天在奥地利帝国的继承国中间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并不少于帝国瓦解之前”（博克璠：《奥地利和以后》，第 89 页）。参阅 1920 年 5 月 6 日协约国致匈牙利的复信，见《和会史》，iv.422。

见“古代自由史”一文，载《自由史和其他论文》（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伦敦，麦克米伦，1907 年版，第 4 页。

1938 年 9 月 26 日他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说中说：“而且我还向他进一步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解决它的问题时，也就是说在捷克人同他们的其他少数民族达成协议时，和平地而不使用压迫手段达成协议时，我对捷克国家就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要求了。那便是向他提供的保证！我们不要捷克人！”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526；《文件，1938 年》，ii.259。

各少数民族在 1938 年的东欧各国总人口中的大致百分比如下：芬兰，十一；爱沙尼亚，十二；拉脱维亚，

被夺去了大量的国民，至于德国，尽管有些集团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希望加入德国，但并未获准。此种强迫分离更有理由施行于并不邻近的集团。东普鲁士和德国分开了，但其主权仍属于德国；德意志人的波希米亚飞地和奥地利分开了，主权改属捷克斯洛伐克；马扎尔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飞地和匈牙利分开了，主权改属罗马尼亚。对邻近的集团当然也实行强迫分离。不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加入德国；但泽和美美尔脱离东普鲁士；在斯洛伐克和伏伊伏那的马扎尔人占多数的地区都脱离匈牙利。被剪裁和宰割得最痛苦的国家是匈牙利，最非自然膨胀的国家则是波兰。

东普鲁士与德国分离首先是以民族为根据，因为介入其中的波兹南尼亚和波莫瑞两省以波兰人占多数，其次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要给波兰一个出海口。大家称之为“走廊”这个词又加强了此种安排的人为意味，因为是从德国的躯体上割去了一个省。大陆强国的传统和习惯，不可能使德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会把东普鲁士这块德国殖民地看成是一个岛屿，它和德国的分离并不比为自然条件所隔离的意大利和西西里或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和哥得兰岛的隔离更为不便。统一领土的要求一向是普鲁士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必然要持续不息，可以预料，当均势发生变化时，波兰走廊终将成为难以抵御来自两边洪涛的最无效的防波堤。当希特勒在 1939 年 3 月 23 日兼并美美尔时，他并不穿过波兰走廊，而是另走海路，在施维讷缪德登上“德意志”号，率领一支德国舰队启航，登陆时是在一艘鱼雷艇中。“据说在航途中他深感晕船之苦，因此加强了他决心要从波兰人手中夺取同东普鲁士衔接的陆上纽带”。东普鲁士自身就有两个邻近的同民族地区。但泽在 232 它的西端，位于维斯杜拉河口，它是一个古老的德国商业城镇，又是波兰历史上的出海口。美美尔在东普鲁士的东北角，位于涅曼河口，它是普鲁

二十三；立陶宛（美美尔除外），十六；波兰，三十一；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次被瓜分前（除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外）。三十三；匈牙利，十；罗马尼亚，二十五；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除外），十二；保加利亚，十；阿尔巴尼亚，可能为五；希腊，十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除有大量希腊少数民族的伊斯坦布尔外），无少数民族。

将近三分之一的匈牙利民族不在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匈牙利国境内，一百五十万人在罗马尼亚，七十五万人在捷克斯洛伐克，五十万人在南斯拉夫，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匈牙利境内只有匈牙利民族七百万人。纳伊条约规定的保加利亚，情形不那么突出，境内有五百二十五万保加利亚人，国界以外有五十万人，如果把保加利亚-马其顿人包括在内则有一百万人：在罗马尼亚有三十六万人；在南斯拉夫有七万纯保加利亚人和五十万保加利亚-马其顿人；在希腊有八万二千马其顿人。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国界以外，在南斯拉夫有五十万人，在希腊有一万九千人。土耳其人中有一千八百万在土耳其，五十余万人在保加利亚，十九万人在希腊。关于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见下文，原著第 392 页注，即本书第 556 页注。

——译者

参阅 L-B. 纳米埃尔：《1988—1939 年外交序曲》[（Diplomatic Prelude, 1938—1939），伦敦，麦克米伦，1948 年版，第 17 页注]。关于东普鲁士的殖民地性质，见《和会史》，ii.289—290，以及莫罗：《德国—波兰边界的和平解决》，第 223—225 页。

见《和会史》，ii.210，vi.255—256。纳粹政府早就准备发展东普鲁士作为军事基地（见 1934 年 9 月 29 日勃劳希契的备忘录：《阴谋与侵略》，vi.280—281（8585—PS）]，如果在进攻波兰以前兼并但泽，势必就要从东普鲁士实行兼并[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81—483（197—C）]；译载《文件》，1989—1946 年，i.97；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5—950]。

但泽在十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1808 年它被条顿骑士团占领，1861

士的一个小海港，但可以作为新国家立陶宛的唯一出海口。这两个城市，为了要在其德国的民族性和波兰与立陶宛各自对它们的经济要求之间取得妥协，所以都被给予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泽规定为国际联盟保护下的自由市，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缓冲国，保持但泽的此种地位就成了波兰政策的生命攸关之事。美尔在立陶宛主权下取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地位，此种地位同样也成了立陶宛的生命攸关之事，只是更不可能保持，因为立陶宛比波兰更小、更弱。

捷克斯洛伐克是战胜国中唯一的内陆国家，它没有任何直接的出海通道，不过在德国恢复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战略上也被迫处于类似的地位。正如波兰只有在假定德国和俄国不会联合起来反对它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有假定它不致孤立无援地遭到德国、波兰和匈牙利联合攻击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可是这些假定最后都未能实现。波兰由于它按凡尔赛和约获得了土地而招致德国的敌视，又由于它在1920年占领土地而招致俄国的敌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并吞了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而招致了德国的敌视，因为那些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瓦解时曾投票赞成与第三帝国合并，愿意继续成为“德意志—奥地利”的一部分；由于它在1919—1920年间从233波兰手中夺取了切欣而招致波兰的敌视；又由于划定它的南部边界线时严重损害了匈牙利的利益而招致匈牙利的敌视。波兰因有波莫瑞介于德国的两个部分之间，所以主要容易遭到来自德国的攻击，只有进行全面战争才能进行防御。捷克斯洛伐克主要也是容易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按照德国当时宣传的忧虑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坚强时，它的地位可以比作布尔什维克进行侵略的跳板，也可以比作法国轰炸机的基地；可是在它弱小时，它的波希米亚突出部分就被德国的奥地利和亚里西亚两翼紧紧地钳制住。

所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的重要部分，便是通过与友好国家建立领土连接以打破此种包围。捷克斯洛伐克曾希望有一条隔开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走廊，以便与南斯拉夫建立共同边界线，但巴黎和会否决了这个以民族原则服从战略原则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原来也想和俄国建立共同边界。这一愿望因波兰占领东加里西亚而落空，代之以里加条约所建立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同边界。然而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得到了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最初的

年它成为汉萨同盟的成员之一；1466年它被条顿骑士团根据托伦条约割让给波兰。从1466年以后，它是在波兰宗主权下的一个自由城市，直到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后被普鲁士取得为止。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由于普鲁士取得了一个“普鲁士走廊”，即连接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的西普鲁士，但泽便和波兰分开了，只是由于俄国对普鲁士的猜忌，但泽才能在1793年以前维持它那岌岌可危的分离地。1807年拿破仑根据提尔西特条约把但泽从普鲁士划分出来，在法国的保护下，恢复它的自由市地位。1814年普鲁士又把但泽夺回。1919年它又一次恢复自由市地位，置于国际联盟的保护下。见《和会史》，ii.291—293，366—367，383，391—392，vi.257—261；莫罗：《德国—波兰边界的和平解决》，第2章。

美尔是条顿骑士团在1252年建立的，先后是条顿骑士团以及普鲁士历代公国和王国的一部分，直到1919年。当时它被德国割让给协约国。但在1923年它又被立陶宛夺取，主权于1929年转给立陶宛，条件是美尔享有地方自治权。《和会史》，ii.290—291，366—367，391；vi.247—248；《概览，1920—1923年》，第256—261页；莫罗，前引书，第18章。

J.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6年》（J.F.C.Fuller：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5），伦敦，艾利和斯波蒂斯伍德，1948年版，第48页。

目的虽未实现，但它仍然是战略体系的核心。通过喀尔巴阡两侧的乌克兰领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把触角一直延伸到罗马尼亚。

[贝奈斯在 1933 年说] 促使我们产生与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合作的整个外交政策概念的是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这种合作使我们在法国和西欧各国看来已成为整个中欧政策中的一支力量。所以我们决不会允许我们与罗马尼亚的领土联系被切断。卢西尼亚是东欧的战略转盘。它作为小协约国的陆上桥梁，使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连接起来，这是它从 1919 年到 1938 年之间所起的作用；或者它可以使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和苏俄连接起来，这就是贝拉·库恩 1919 年企图占领它的原因；它也可以使保守的匈牙利和保守的波兰连接起来，这在 1939 年 3 月已实现了。如果它的乌克兰民族性导致它与苏维埃乌克兰联合起来的话，它就会使苏联的领土能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广大通道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连接起来，这条通道就是越过喀尔巴阡山通往多瑙河大平原的桥头堡。

（四）东欧的国际政治

东欧新体制是由凡尔赛解决方案确认并规定的，它几乎是以实验室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一种狭隘的地方观念的政治，一簇小国的活动，但它们的命运最后却是由外面的大国而不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

大战一旦粉碎了东欧各帝国，新国家便通过各自国民的意志和努力而成立了。但是它们又立即成为大国政策的对象，派定在比它们自己所能掌握的更大的计划中充当一名角色。最初的想法是要把它们作为扼制德国向东扩张的壁垒，以防止德国对俄国的占领和渗透，就象德国以 1917 年 3 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所完成的那样，而且还想以这些国家来抗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人。

东欧领土重新安排后要取得稳定的条件 [H·J·麦金德对于 1918 年的圣诞节写道]，就是应该分成三个国家体系而不是两个。在德国体系和俄国体系之间还非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阶梯不可。这些新国家自己的代表在战争期间寻求协约国的支持和承认时也提出过此种考虑。但是西方国家疑惧的主要对象已经从被降伏的德国转移到革命的俄国，于是作为“防疫线”的东欧国家防护层的新作用也就改为保卫中欧和西欧，以遏制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危险了。在 1920 年的波兰—俄国战争中（这场战争虽然是波兰挑起的），据信波兰是履行了这一任务的，当时法国派魏刚去搭救波兰，使它不致在华沙被击败。法国是关于新东欧双重性这一概念的主要设计者。法国有着在敌对的哈布斯堡或德国的后方寻求盟国的传统，这回已是最后阶段了。一度它曾以包围那一个单独的敌人之目的，因而它和其他大国结盟，如华洛瓦家族和路易十四同土耳其联盟，黎塞国同瑞典联盟，第三共和国同尼古拉二世联盟。现在它只能降格以求不稳定的卫星国来作为它的盟国了，其中波兰是主要盟国，与此同时，这些盟国的作用也具有双重性了；它们不再是包围一个大国，而是要把两个大国隔离开来，这两个大国历来又都是那些卫星国的主人，其中任何一个大国的潜在力量都比法国更强大。东欧的此种体制只有在德俄两国的力量衰萎时才得存在。随着德国和俄国的复兴，到了法国非常需要这些继承国时，这些国家的政治价值却下降了，法国就将被迫去寻求更实际的盟国，因而欧洲的均势又要回到大国的手中去了。

东欧政治所念念不忘的是：渴望在国际事务中的集体独立，憧憬在政治上的自我满足。小协约国的概念就是“由它们取得了自由的国家自己当家作主的一个中欧组织，不要任何大国的支配势力或控制”。这也是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协议的目标。人们总是幻想在东欧建立一支自主的第三势力，一个具有同大国相等的自卫力量的中立集团，但这个幻想从未实现。波兰的政策曾在接连几个阶段以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为目标，或是一个波罗的海的国家集团，或是一个扩展到多瑙河流域以波兰和罗马尼亚联盟为基础的集团。法国在东欧的政策实在是错误的，因为它所要求于它的盟国的作用到头来只有大

参阅马萨里克的战时备忘录，载 R·W·塞顿-沃森：《马萨里克在英国》，主要是第 130 页，第 193—196 页。

《和会史》，vi.318。参阅温斯顿·S·丘吉尔：《余波》（Winston Churchill, The Aftermath），伦敦，巴特沃思，1929 年版，第 13 章。

贝奈斯 1933 年 12 月 7 日在新扎姆基的演说。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国》，第 249 页。

国才能有此力量。然而一些小国合在一起的政治力量怎样也抵不上一个大国。所设想的那种紧张压力东欧集团是经受不住的。大国产生的离心力又太强大了，以致总有这个或那个小国把它与大国的关系放在它与它所想象的盟36国的关系之上。东欧国家表现集体独立的精神在历史上只有一次，那是在1912年，巴尔干联盟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公然对抗列强的一致行动。但是那一次的大胆的行动是由强有力的和侵略性的目的所推动的。凡尔赛体系在东欧的历史是一个缩影，国际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则是普遍的，都说明了主权国家不能长期为维护静止的国际秩序而进行有纪律的合作。

对东欧国家来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实际的独立。它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是在一种监护的状态下存在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在对待其少数民族问题上都被迫承担了国际义务，受国际联盟的监督。此种国际奴役制度只限于东欧各国。这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部分原因是它侵犯了新赢得的独立主权，特别是因为大国都不承担此种义务。这种少数民族制度被认为是各民族同化的阻力，而且怂恿各少数民族不忠诚，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使干涉合法化。所以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不断遭到东欧各国政府的破坏，国联行政院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就与国联权威的表现每况愈下而一同丧失。代表少数民族进行干预于是便成了德国的专利，而东欧国家所受到的专横与压迫之苦较之在国际联盟监督下所遭受的任何情况更甚。——东欧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大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在东欧内部，按民族原则组成的国家有一时期是颇有稳定希望的，因为大部分国家是满意的，其力量也足以抑制那些不满意的。所以要求修改和约的问题就不象战胜国之间的分歧那样重要了。因此，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内，波兰的胜利的帝国主义一直起着比匈牙利被挫败的帝国主义更大的干扰作用，而在1939年3月达于顶点时便沿着喀尔巴阡山脊实现了领土衔接。但是这些分歧只是在在大国利用下才发展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议都不是因内部原因而是由于外来影响才瓦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两个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并未彼此结成同盟，却充当了大国的盟国。匈牙利的和约修正论者同德国的和约修正论者结合在一起了，马扎尔人于是又恢复了他们在奥匈帝国时期所扮演的“柏林的忠顺前卫”那一类角色，但是保加利亚的和约修正论者却没有照样同匈牙利的结合在一起。就保加利亚而言，它先不受意大利的庇护，后又不愿当德国的随从，所以它的政策和结盟都只是限于对它的近邻。

东欧的制度说明了一种实力均势的全部特点。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组成了一道自然的缓冲地带。它们背靠俄国，面对大海，这就使它们既与德国为邻又与英国隔海相望。不过芬兰同时也是斯堪的纳维亚中立集团的前沿地区，由于它保留了瑞典的阿兰群岛，它在战略上就与斯堪的纳维亚集团联在一起了，又由于它取得了通往北冰洋的佩萨莫走廊，它把这个集团和俄国隔开了。——但自拉脱维亚以下的缓冲地带在政治上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带由双层国家组成，以后更扩大为三层国家，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三个国家位于多瑙河在德国的源头和它在黑海的出口之间。这个缓冲地

马萨里克：“独立的波希米亚”，1915年4月的秘密备忘录，载R·W·塞顿—沃森：《马萨里克在英国》，第130页。

在1939年3月以前的二十年间，英国和德国占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出口贸易的一半，进口贸易的四分之三。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波罗的海国家》，第125—127页，第164—167页。

带的另一端也是一个内海，在那里希腊和土耳其象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也有英国作为其邻国。但与波罗的海国家相比，它们的有利条件是它们不是大陆国家而是在半岛上的国家；它们与德国和俄国之间隔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土耳其与俄国的共同边界是以黑海和亚美尼亚山脉的自然屏障为标志的；而且英国在地中海是占优势的国家，在波罗的海却不是。

因此，构成东欧国际政治的因素是谋求或害怕领土的毗连，深恐自己被包围，希望同在可能成为敌人的邻 239 国后方的大国结成联盟。但上述的这些特征对每一种均势都是共同的。东欧政治的特点是由少数民族提供的。

少数民族有三种，第一种是边境的少数民族，他们愿意属于他们所喜欢的毗连国家，这些人就造成了他们要脱离他们目前所属国家的最大危险。捷克斯洛伐克便是个极罕见的例子，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界线上排列着一队又一队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第二种是散处在离他们精神上效忠的国家还有距离的各个飞地上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每一次国际危机中的潜在的第五纵队；在这类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人数方面以及利用他们的力量方面都是对德国有利的。第三种是各民族混居的地区，通常是在边境地区，他们的忠诚是有问题的。典型的例子是马其顿，但还有许多其他地区，例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间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多布罗加，罗马尼亚和俄国之间的比萨拉比亚。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造成了东欧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凶暴，这种情况在西欧是没有的，除非是爱尔兰自由邦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存在还决定了东欧战争的特点。东欧的战争既是横的战争又是纵的战争，既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又是国家内部的战争。由游击战升级成为内战可以延续很长时间，而两国政府之间并不宣战，因为国家可以不承认那些为其利益进行战争的非正规军和恐怖分子集团。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民族运动的兴起，这种战争已成为东欧特有的战争。“委员会”一词是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政治活动特有的形式，这个词很奇怪地移植到了东欧，成了代表东欧特有的政治活动的非正规军的名称“科米塔吉”（Comitadji）。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各帝国的解体，这种战争形式也扩展了，成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有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的自然斗争形式；也是西欧所谓“中欧 239 巴尔干化”的最具体的表现。

在 1919 年和 1920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整个东欧都陷入这种非正规战争的痛苦中。在慕尼黑会议到 1939 年 3 月之间，正处在瓦解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又出现了此种情况。在那个时期，正是德国人在自己东部边境那面的大好原野上利用这种斗争形式进行侵略而大获成功的时候，他们何曾想到在第

斯大林于 1986 年 3 月 1 日接见罗伊·霍华德的谈话中强调共同边界的重要性。“历史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蓄意要对任何其他一个国家作战，即使两国并不接壤，它也会谋求那种边界线，通过那儿可以到达它要入侵的那个国家的边界。通常侵略国是会找到这种边界的。它找到此种边界或是凭借武力，例如 1914 年德国为袭击法国而入侵比利时，或是‘借道’而找到此种边界，就象德国对拉脱维亚的行动，例如 1918 年德国通过拉脱维亚而突袭列宁格勒。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专门边界适合德国的目的 [指侵略苏俄]，但我想它会找到愿意借边界给它的人的”（《曼彻斯特卫报》，1936 年 3 月 5 日）。

见 L·B·纳米埃尔：《冲突》（Conflicts，伦敦，麦克米伦，1942 年版），第 14 页，关于“国际政治中的‘夹心体制’”。

见 H·塞顿-沃森：《东欧》，第 269—272 页。

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这种游击战方式变成了粉碎东欧帝国的主要手段，并使其支离破碎的部分转而效忠于敌对的东欧大国。

力量均势有其专门的平衡规律。洞悉此种平衡规律的本质就能提供预见，正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经常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冲突的分析所提出和展示的那种预见一样。早在 1925 年 2 月，在英国外交部的历史顾问所写的一个备忘录中就叙述了东欧力量均势的不断失调，如不阻止，势必导致另一次英德战争。

[J·w·黑德勒姆-莫利写道：] 为了我国的真正利益，必须防止德国与俄国重新结成同盟，德俄同盟无疑要靠进攻波兰来巩固。如果德国向东方突破，从那边开始取得新的领土和力量，将来就一定会向莱茵河流域施加压力，所以目前我们决不能无动于衷。……是否有人还想知道，如果波兰再度被瓜分，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被削弱、被支解以至实际上在欧洲地图上消失，其后果将是怎样？整个欧洲就会立即陷于混乱。欧洲大陆的领土安排就不再会有任何原则、意义或意识了。试想，例如在某种未必会有的情况下，奥地利加入德国了；德国利用波希米亚的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要求远在高山那一边的新边界，把卡尔斯巴德和比尔森全囊括在内，与此同时，和德国结盟的匈牙利人则收复了喀尔巴阡山的南坡，那时的情况又将会怎样呢？那简直是一场灾难，即便我们忽视这种情况而不去及时干预，将来我们也总会被迫去干预的，不过为时也许太晚了。

本章其余部分的目的是想追溯东欧凡尔赛体制固有的弱点是怎样造成的，这种弱点是早就被认识到的，却并未受到外来影响的支持或遏制。关于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关于苏台德区问题、慕尼黑会议、维也纳议定书和最后夺取布拉格的详细叙述，请参阅 1938 年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卷和第三卷。这里所要说的只是作为本卷主题的 1939 年 3 月的欧洲总危机：它如何从东欧的一套不稳定的权力结构中逐步产生，现在回顾起来，其中具有不可避免的虚假特征；还要说明那一套权力结构怎样受它自身的规律的支配，受领土收复主义和政治联盟的原则的支配，受少数民族问题和共同边界的重要性的支配，还要说明东欧国家各种结合的企图，从小协约国到波兰—罗马尼亚的中立集团计划，又怎样是注定要失败的；还有便是一些距离较远的西欧大国放弃其责任，于是东欧的命运就取决于其邻近的大国了，尤其是取决于德国和俄国。

（五）不利于苏俄的东欧划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东欧政治的主要内部主题是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的重要意义被外部的主题掩盖了，这个外部主题就是为东欧划定一条东部边界以防范俄国。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对欧洲的威胁要超过战败的德国：而且，从俄罗斯帝国正在解体的形势来看，布尔什维克俄国给邻近的国家提供了上好的攫取领土的机会，给西方各大国提供了上好的扩张势力的机会。

在继承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主要工具就是波兰。在 1918—1919 年间，波兰征服了东加里西亚，推翻了那里的乌克兰当局。当时和会最高会议批准它占领这块领土，条件是要给当地以自治权，然后又给予它二十五年的委任统治权，当波兰人拒绝了这两项想把他们置于国际义务之 241 下的建议后，最高理事会终于在 1923 年将东加里西亚的全部主权交给了波兰。1920 年，波兰违反了协约国安排给它的防御性任务，侵入了苏维埃乌克兰。在随之而起的战争中，波兰人先占领基辅，然后俄国人进行反击，几乎占领华沙，最后以签订 1921 年的里加条约告终，根据此项条约，波兰取得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大片领土，远远越出了寇松线，即 1919 年协约国在巴黎为它规定的临时东部边界线。

罗马尼亚已经由于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获取了领土上的利益。当同盟国于 1918 年 5 月将布加勒斯特条约强加于它时，它们容许罗马尼亚自由并吞比萨拉比亚，“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例子，一个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国家居然能以牺牲它的一个盟国为代价而扩张其领土。”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提出的民族主张是有根据的，不过由于它的残暴无能的治理，就居民的意愿而言，这种主张很快就失去其效力了。兼并比萨拉比亚是经过巴黎和会最高会议承认的；这成为阻碍罗马尼亚与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直到苏联于 1934 年加入国际联盟为止。波兰于 1919 年占领东加里西亚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与罗马尼亚建立共同边界，1921 年波兰和罗马尼亚组成了针对俄国的防卫联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这个联盟仍然是东欧外交方面的唯一持久未变的因素。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波罗的海国家，另一个是多瑙河流域和黑海国家，两国联合起来扼住欧洲的咽喉以防范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威胁。

罗马尼亚以南的东欧分界线的划定主要不在于东欧国家自身，而在于西

《和会史》，i.335—388，iv，84—85，95，103—105，135；vi.245—248，272—274，283 注；《概览，1920—1923 年》，第 282 页。照麦卡特尼说（《民族国家和少数民族》，第 199 页），这是“企图在欧洲实行委任统治原则的唯一例子”。但是，对意大利曾有给以委任统治阿尔巴尼亚的建议（见下文，原著第 250 页）。

R.w. 整顿·沃森：《罗马尼亚人的历史》，第 620 页；参阅《和会史》，iii.50；iv，220。

《和会史》，iv.139—140，228—229；《概览，1920—1923 年》，第 273—278 页。

《概览，1924 年》，第 263—265 页；《概览，1927 年》，第 297—300 页；《概览，1934 年》，第 378 页。罗马尼亚直到苏联被接纳进国际联盟，比萨拉比亚问题被心照不宣地搁置起来时才承认了苏联。同上书，第 392 页。

《和会史》，i.337；vi.269。

《概览，1920—1923 年》，第 271—272 页。条约于 1926 年续订，《概览，1926 年》，第 154 页。

方大国，西方大国的海上权力使它们同俄国形成了某种性质的共同边界。多瑙河三角洲和黑海海峡代表了它们在十九世纪扼制俄国向南发展的界线。多瑙河问题和黑海海峡问题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地理上也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东欧最大的河流多瑙河最终 242 的出口并不在苏利纳而在达达尼尔。多瑙河可能成为多瑙河地区两个大国争夺的对象，这两个大国一个是德国（从前是奥匈帝国），另一个是俄国；与此最密切有关的小国是罗马尼亚，它在北面从俄国手中恢复了比萨拉比亚，在南面从保加利亚那里收回了多布罗加，此后它就拥有整个多瑙河三角洲的主权。黑海海峡可能成为俄国和英国争夺的对象，俄国是黑海的主要强国，英国则是地中海的主要强国；与此最密切有关的小国是土耳其，它在全部近代史上拥有海峡两岸的主权。

奥匈帝国、沙俄和奥斯曼帝国于 1918 年的同时崩溃扩大了西方列强在多瑙河和黑海海峡的势力，如果用西方国家的话来说，就是使这些地区有实现空前高度国际化的可能。多瑙河流域的国际化最初是在 1856 年的巴黎会议上确定的，巴黎会议建立了一个由各大国和土耳其（1878 年以后加上罗马尼亚）管理多瑙河口的欧洲委员会，另外又建立了一个河岸国委员会，监督河口以上的整个河流。河岸国委员会遭到奥匈帝国的反对，不久就解散了；欧洲委员会证明是国际合作最成功的实验之一，它是一个随着罗马尼亚国家的独立而在俄罗斯、奥地利、奥斯曼三个帝国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欧洲组织。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又确认了欧洲委员会，那时它的权力已扩展至多瑙河下游的布勒伊拉：委员会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组成。有迹象显示还要建立一个从布勒伊拉到乌尔姆这一段多瑙河的新国际委员会，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沿岸国家组成；可是分配给“德意志沿岸国”两个代表，因为法国当时希望德国会分裂。这些条款都体现并制定在 1922 年的“多瑙河最后规定”内。非多瑙 243 河沿岸的大国就这样在多瑙河流域的统治中占了优势，此种情况遭到罗马尼亚日益增强的反对；几年后俄国和德国都要求参加欧洲委员会了。

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自 1840 年的伦敦协约以来就以国际协定为基础，它是力量均势的另一个标志。俄国在海峡的利害关系比其他国家更重要，而且因为俄国的海军实力总不如英国和法国，所以它平常的政策就是阻止外国舰队

参阅格里戈雷·加芬库：《东线战争序曲，自 1939 年 8 月 21 日莫斯科协定到 1941 年 6 月 22 日俄国之战》[*Preliminaire de la guerre real'Est del' accord de Moscou*, 21 août 1939, aux hostilités en Russie, 22 juin 1941 (弗里堡，埃格洛夫，1944 年版，第 84 页)。英译本译者：弗莱彻·艾伦，书名为《俄国战役序曲》(Fletcher Allen: *Prelude to the Russian Campaign*)，伦敦，马勒，1945 年版]。俄国曾两度通过占领南比萨拉比亚而拥有多瑙河的边界，一次是在 1812 年的俄土布加勒斯特条约到 1856 年的巴黎条约之间，另一次是在 1878 年的柏林条约到 1918 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间。

《和会史》，iv.12，414，433，449—450。

见《国际事务》，外交部史料处刊行的和约手册第 23 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0 年版），第 149 号 [乔治·凯肯比克：“国际河流” (Georges Kaackenbeeck: *International Rivers*)]，第 30—36 页。

凡尔赛和约第 346—347 条；《和会史》，ii.107—108；iv.274，435。对于易北河（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代表参加）和奥得河（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法国、丹麦和瑞典的代表参加）也建立了相似的国际委员会。

《概览，1920—1923 年》，第 328—332 页。

《概览，1925 年》，ii.165—166。

驶入黑海，而不是为自己的舰队谋求驶出黑海。而且黑海海峡的控制权涉及到土耳其的安全，其影响程度远在多瑙河控制权对多瑙河任何小国的影响之上。在 1918 年俄国和土耳其崩溃时，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落入英国和法国之手，它们利用此种权力，通过支持俄国南部的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对苏维埃政府进行直接干涉，又通过支持希腊的扩张主义目的，对土耳其进行间接干涉。威尔逊十四点的第十二点曾经声明：“达达尼尔海峡应在国际保证下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和贸易开放”；但在美国拒绝对黑海海峡实行委任统治时，海峡即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共同占领，这就意味着英国作为最大的海军国家占有优势和其他两个国家对它产生日益增长的猜忌。根据协约国 1920 年强加于土耳其的塞夫勒条约，东色雷斯（包括加利波利和马尔马拉海北岸的大部分）划归希腊，于是前土耳其欧洲部分拥有主权的土地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了。通过海峡完全自由的航道第一次确立了，一个相当于多瑙河欧洲委员会的管理海峡的海峡委员会也成立了；海峡两岸，不论是希腊所属或土耳其所属，都成为非军事区，在该区内只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才得驻军。塞夫勒条约从未获得批准，随着土耳其的基马尔复兴，这个条约就立即作废了。西方国家在海峡的优势所产生的反应便是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与苏维埃俄国于 1921 年在莫斯科签订盟约，盟约宣称海峡的自由，应由海峡和黑海沿岸国的会议制定的法规给予保证，也就是说要排除 244 西方国家，而让土耳其和俄国有主要发言权。土耳其人于 1922 年赶走了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入侵者，并把自己的军队推进到海峡非军事区并直达查纳克，这时法国和意大利都背弃了英国，塞夫勒解决方案的基础从此不复存在。1922 年的穆达尼亚停战协定所体现的是一种妥协，协约国承认东色雷斯应归还土耳其，土耳其则接受英国关于海峡自由的概念。在其后的洛桑会议上，西方国家和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最主要的了，土耳其则处于超然地位。西方国家要求海峡对一定数目的军舰开放，这样它们便可以进入黑海，代价是同样地允许俄国舰队进入地中海；俄国则要求海峡对所有军舰一律不得开放。土耳其愿意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东色雷斯交还土耳其，1923 年的洛桑条约包括载有下列条款的海峡公约：（1）确立商船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自由航行权；（2）和平时期所有军舰均得自由航行，但任何国家不得派遣较沿岸国最大舰队更大的舰队驶入黑海（这就是说，任何大于苏联舰队的一支单独舰队虽然不得通过海峡，但持有敌意的舰队合在一起还是可以通过）；（3）只有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才实行非军事化（不象塞夫勒条约那样把马尔马拉海岸也规定为非军事区）；（4）建立国际海峡委员会以监督有关军舰通航条款的履行；（5）对土耳其安全的保障是，允许它在战时作为交战国的一方得对敌国船只封闭海峡，由英、法、意、日共同保证海峡的自由通航和非军事区的安全。这个条约在西方国家的优势和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苏俄在提出抗议后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但不予批准。由于英国和土耳其在摩苏尔问题上，以及土耳其和伊拉克在边界线上利益冲突的结果，俄

《和会史》，vi.26—28。黑海海峡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显然是托因比在《民族和战争》一书第 7 卷第 375—378 页首次提出来的。

《和会史》，vi.64。

《概览，1920—1923 年》，第 370—372 页。

《和会史》，vi.38—39，104—106。

国和土耳其之间恢复了外交联系,并于 1925 年在巴黎签订了俄土友好中立条约。此后在东欧国家中,唯有土耳其,通过其战略地位的力量及其政策的明智和清醒,又凭它不偏向于任何一方的态度,能够成功地执行其独立路线,同时又与所有相邻的大国维持了还算不错的关系,其中对它最重要的大国是俄国和英国。 —

《概览, 1925 年》, i.525 ; ii.66.这个条约于 1929 年、1931 年(《概览, 1931 年》, 第 840—841 页)和 1935 年续订, 苏联政府于 1945 年废止该条约。

（六）法国的优势

协约国的大国确认并建立了东欧诸小国，把它们作为对付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屏障，对战败的德国则作为一种抗衡的势力。这一体制的核心是波兰。波兰由于其人口比东欧任何其他国家多一倍，又凭着它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是东欧主要大国的历史传统，这时希望跻身于大国之列了。

波兰的目的是要在波罗的海地区占优势。在一个短时间内，波罗的海出现了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状况，即在它的海岸上一个大国也没有。在 1914 年以前，那里的德国海军占优势，损害了第二个波罗的海大国俄国。这时俄国失去了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只剩下不到一百英里基本上冰封的海岸线，即位于芬兰湾尽头的列宁格勒。造成德国在波罗的海占优势的主要工具是基尔运河，凡尔赛和约规定，凡是与德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这条运河对它们一律开放，不过运河的主权继续属于德国，²⁴⁶ 也就是给它恢复优势以保证。

由于波罗的海自 1919 年到 1933 年没有一个活动力强的大国掌握维斯杜拉河的新波兰于是便可要求担任这一角色。1922 年 10 月，波兰乘战胜俄国的余威，从立陶宛夺取了维尔纳。正如波兰其他暴力行为一样，这一次也造成了许多仇恨。立陶宛因而拒绝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它们的共同边界十八年来一直处于封锁状态。立陶宛敌视波兰的传统相应地促成了它与苏俄外交上的亲善传统，里加条约又助长了这种亲善关系，因为根据该项条约，分隔立陶宛和俄国的那一片地带可以使波兰和拉脱维亚有了共同边界。立陶宛于 1923 年也藐视协约国，擅自攫取美美尔作为补偿，当时美美尔的地位一直未经确定。协约国只能承认立陶宛的这个既成事实，正如它们承认波兰的先例一样，它们把美美尔的主权给了立陶宛，条件是美美尔应成为自治区。²⁴⁷ 俄国边界线上的一连串国家从罗马尼亚和波兰起一直往北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这些国家象波兰一样，都有理由害怕俄国，因为它们是牺牲了俄国而赢得其独立的，甚至在它们的独立得到了苏联承认以后，它们同苏联的关系也一直没有好转。波兰似乎是它们的天然保护者和盟国，波兰的政策也旨在建立一个以它为盟主的波罗的海联盟；但是由于它与立陶宛的关系恶劣，以及它的侵略政策所引起的猜疑，以致这一目标未得实现。芬兰于 1924

见托因比：《民族和战争》，第 339 页，第 347—358 页。

凡尔赛和约第 380—386 条；《和会史》，ii.199—201；《概览，1920—1923 年》，第 233—234 页。根据凡尔赛和约（第 195 条），德国应拆除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的一切工事。“波罗的海前后曾为继续不断的许多主人效劳，但是德国人，即中世纪后期的德意志汉萨人和近代的德意志帝国，曾行使了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两个出海口之一的基尔运河只属于德国独家，另一个通过斯堪的纳维亚何道的出口实际上德国可以随意封闭。它的波罗的海海岸线，七十年来一直是从弗伦斯堡延伸到美美尔，只有自 1919 年至 1939 年，才被凡尔赛和约肢解成短距离的几小段。即在那时，它在波罗的海的十个港口仍然组成了一条任何其他国家所难与匹敌的银河系。” w·F·雷德韦：《波罗的海问题》（W.F.Reddaway：Problem of the Baltic），剑桥大学出版社，1940 年版，第 104 页。

《和会史》，vi.309；《概览，1920—1923 年》，第 250—256 页。

《概览，1934 年》，第 412—413 页。见下文，原著第 268—269 页。

《概览，1920—1923 年》，第 249 页；《概览，1927 年》，第 225—226 页；《概览，1934 年》，第 412 页。

《概览，1920—1923 年》，第 243—244 页。

年加入了斯堪的纳维亚集团，因为它在历史上一向与瑞典有联系，而处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气氛中，丧失了阿兰群岛还不是不可忍受的；1925年以后，波罗的海国家也把注意力转向于建立它们之间的三方集团了。

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联盟是波罗的海地区和多瑙河地区之间唯一的内部外交联系；喀尔巴阡山既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屏障。波兰的存在牵涉到它与德国和俄国的恶劣关系，它的侵略又导致它同俄国有了一条后者绝不会同意的共同边界，并使立陶宛成了它的仇敌，它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也很不好，不过两国有着压倒一切的共同防御德国的利害关系。两国争执的焦点是切欣，切欣是在1920年被两国瓜分的；波兰人觉得247捷克人利用了俄波战争中的波兰弱点而迫使波兰让步；而在和平时期捷克人是得不到这种让步的。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主要动乱中心是波兰，一个暂时取得胜利而又在侵犯其邻国的“历史上有名的民族”；在喀尔巴阡山以南的动乱根源是匈牙利，一个暂时失败而在谋求对其邻国提出修改和约主张以恢复其历史权利的历史上有名的民族。在1920—1921年间，奥匈帝国的三个主要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了小协约国，以防止匈牙利的修改和约要求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危险。小协约国十七年来仍然是东欧体制的外交骨骼。在这副骨骼上配上肌肉，同时在地多瑙河流域和波罗的海地区之间又为它提供对外联系的，则是法国联盟。法国和波兰于1921年签订了军事联盟，那是在魏刚将军完成了拯救波兰的使命使它免于在俄波战争中陷于军事崩溃之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24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以法国为一方、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为另一方的这两个联盟，以共同保证的条约方式载入了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但是洛迦诺公约已经削弱了凡尔赛和约的东欧体制，因为它对德国的西部边界（由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多边保证）和东部边界作了区别对待，英国拒绝保证东部边界，因而东部边界似乎是在并不那么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情况下被承认的。法国的联盟体制由于1926年的法国—罗马尼亚联盟和1927年的法国—南斯拉夫联盟而告完成。这一系列条约标志着把东欧作为一道政治屏障或壁垒的高峰。从此以后，它就不断受到意大利的侵蚀，不知不觉地为十年后的德国扩张准备了条件。

《概览，1920—1923年》，第241页；《概览，1924年》，第461页。见上文，原著第158页。关于阿兰群岛的争端，见《概览，1920—1923年》，第234—238页。

《和会史》，iv, 348—367，《概览，1920—1923年》，第210页，第299页；《概览，1924年》，第457—458页；《概览，1935年》，i.279—286。1925年稍有好转（《概览，1925年》，ii.247—250）。

《和会史》，iv.428, 436, 493—496；《概览，1920—1923年》，第287—303页。

《概览，1920—1923年》，第272—273页。

《概览，1924年》，第441页。

《概览，1925年》，ii.52, 55, 451—452。法国在慕尼黑规避并背弃的就是1924年和1925年的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条约（后者是洛迦诺公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概览，1926年》，第166页，第485—487页。

同上书，第156—157页；《概览，1927年》，第154—165页，第162—163页，第539—541页。

（七）意大利的优势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继承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的历史虽然是相似的，并使它们互相接近，但它们的情况不久便有了差异。苏俄被掠夺，被排斥，被猜疑，并且还被人害怕，因为它奉行的信条促使当年神圣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强了，而且它从未丧失它潜在的大国地位。民族主义的土耳其清理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赶走了入侵者，按照西方模式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小的民族国家。希腊力图乘土耳其削弱的机会攫取利益，正象波兰乘机从俄国那里攫取利益一样，从1919年到1922年之间它也曾有过短时期的向东方扩张的梦想。但安纳托利亚的沿海地区显然是一条它所不能逾越的寇松线。它又一次只能以执行巴尔干政策为限，它的外交政策只能再一次与它北方的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打交道。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反对保加利亚的修改和约主张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正如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反对匈牙利的修改和约主张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一样。但是也有某些不同之处。在保加利亚和它的战胜国之间是有纽带的，就匈牙利说来则没有；保加利亚的战胜者之间的分歧也比小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大一些，因此巴尔干协议一直到1934年才缔结。保加利亚和它的战胜国之间的纽带主要是它和南斯拉夫的纽带。斯坦博利斯基的政策是建立一个以南方斯拉夫民族的统一体为基础的巴尔干联邦，虽然在他尚未向这一目标迈进前就被赶下了台，但这一理想却仍然深深地铭刻在保加利亚人的心中。巴尔干漩涡的中心与其说是在保加利亚，还不如说是在马其顿，马其顿是一个迄未明确规定的地区，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界线都在这里会合，这里的利益冲突是三角形的冲突。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的马其顿提出了民族统一的要求，“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总部就设在保加利亚，尽管它本身就是这一组织的最大受害者。纳伊条约给保加利亚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失去了西色雷斯，所以它不断地向希腊提出要求，希望通过亚历山德罗波利斯或类似的港口而取得通往爱琴海的出口。但是南斯拉夫同样也对希腊提出南进的要求，要求取得萨洛尼卡而滨临爱琴海，这就是多年来两国关系搞不好的原因。但是，正象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取决于德国和俄国的正面压力或反面吸引力一样，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它们自身所能决定的。在1914年以前，巴尔干的政治是受奥匈帝国和俄国支配的。在1918年以后，俄国的势力一度消沉；但是随着奥匈帝国的消失，视奥匈帝国为宿敌的意大利立刻接过奥匈帝国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东南欧的支配势力和干扰因素。墨索里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欧洲政治中所表现的那一套浮夸和挑衅性的言行可以和从前威廉二世皇帝或拿破仑三世媲美，也可以作为阿尔卑斯山北面的那个更重要的独裁者即将登台表演的前奏。意

关于维尼齐罗斯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希腊”（原文如此）的梦想，见《和会史》，iv.452—453。“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创立于1896年，目的是为解放土耳其统治下的马其顿，所以要团结马其顿的各族人民以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保加利亚向南斯拉夫提出修改和约要求的主要工具，直到1934年它被维尔切夫取缔为止。它是一种欧洲典型的解放运动，后来堕落为恐怖组织。见J.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J.Swire：Bulgar-ianConspiracy），伦敦，黑尔，1939年版；H.塞顿-沃森：《东欧》，第247—251页，第312—316页；巴克：《马其顿》，第16页以下，第36—45页。

《概览，1927年》，第115页。

大利在东南欧的政策始终是有害的，因为它追求的那种机会主义的霸权计划是它自己的力量所难以实现的，一种与法国争夺威望的政策，其目的和效果只是使冲突激化，并促成新的仇恨。

象希腊一样，意大利也怀有以损害土耳其而在爱琴海扩张势力的目的。在 1911—1912 年的意大利—土耳其战争中，它占领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和罗得岛，初步实现了它的目的。它的保证是要在土耳其从利比亚全部撤走后它才撤出这些岛屿，所以它就能继续占领它们，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它造成了更进一步瓜分土耳其的机会。根据 1915 年的伦敦秘密条约，意大利将取得安纳托利亚的阿达利安部分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全部主权，尽管过去意大利曾一再否认它企图吞并希腊的岛屿。根据 1919 年的维尼齐罗斯—蒂托尼协定，意大利同意将多德卡尼斯群岛割让给希腊，并在英国割让塞浦路斯岛以后在罗得岛举行公民投票；这个协定应与塞夫勒条约同时生效，根据该项条约，意大利可以在安纳托利亚取得更大部分土地。但是随着土耳其的基马尔复兴，意大利占领安纳托利亚的美梦和希腊一样被粉碎了。它在 1922 年宣布，由于塞夫勒条约失效，维尼齐罗斯—蒂托尼协定也相应无效；根据 1923 年的洛桑条约，它终于取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主权，虽然在它的近东投机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收获，但也足够令它满意了，其代价则是造成 250 成土耳其和希腊的长期失和。

继承奥匈帝国的遗产是意大利政策的更迫近和更紧急的目标。它提出的收复领土方案是“特兰特和的里雅斯特”，实际上这是指勃伦纳边界线和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据 1915 年的伦敦秘密条约，意大利已取得了勃伦纳边界线，这一收获还以战略需要为理由而得到巴黎和会的确认；然而此举所意味的，不仅是收回意大利人的特兰提诺，而且还取得了纯属德意志人的南蒂罗尔或上阿迪杰，划定的边界线还把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置于意大利的军事处置下。下列情况也说明了奥地利的脆弱：尽管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对南蒂罗尔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实行了无情的非民族化政策，这是战前奥地利在特兰提诺的政策所无法比拟的，却并未造成两国关系的长期交恶，这在大小相差无几的国家间是罕见的，而且也并未妨碍奥地利之成为意大利的卫星国。

控制亚得里亚海包括两个不同目的，控制阿尔巴尼亚和控制伊斯特拉及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阿尔巴尼亚处于东欧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西欧和巴尔干之间的历史通道之一，又由于拥有发罗拉良港而控制了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奥特朗托海峡。阿尔巴尼亚的脱离敌国而独立对意大利是关系重大的，正如低地国家的独立对英国的关系重大一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于 1912 年宣布独立，当时为各大国所接受，认为这比塞尔维亚和

关于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利比亚问题的最初关系，见《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外交部史料处刊印的和平手册，第 11 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20 年版），第 64 号（《爱琴海北部和东部岛屿》），第 19—20 页；同一丛书第 20 卷，《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独立国家》，第 127 号（《意大利的利比亚》），第 22—26 页，以及附录。

《和会史》，第 6 卷，第 31 页注，第 37—38 页，第 117 页；《概览，1924 年》，第 470—471 页。原来和利比亚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多德卡尼斯群岛问题，在这一阶段又和朱巴兰问题纠缠在一起了。《概览，1924 年》，第 465—468 页。

《和会史》，iv.280—287。

《概览，1927 年》，第 186—201 页。

希腊瓜分它好，也因为那时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决定要建立一个阿尔巴尼亚缓冲国。1913年各大国又进而承认阿尔巴尼亚为主权公国，象比利时那样在大国保证下实行中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的这个中立地位并未得到确认，意大利的政策则迅速把这个缓冲国转变成为桥头堡。意大利于1914年11月占领发罗拉，根据1915年的伦敦秘密条约它是可以得到这个港口的，并把阿尔巴尼亚作为它的保护国。巴黎和会又提出由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实行委任统治，但意大利于1920年交还了委任统治权，主要是因为艾哈迈德·贝·索古在较小范围内成功地扮演了穆斯塔法·基马尔的角色，成为反对外国干涉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力量的领袖。根据1920年的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协定，意大利从阿尔巴尼亚撤军，只保留控制发罗拉湾的萨赞岛。同年，阿尔巴尼亚获准加入国际联盟，关于它的中立化问题则没有再提起。

阿尔巴尼亚的边界是在1921年确定的。与此同时，协约国各大国宣布，侵犯阿尔巴尼亚的边界或独立“均可构成对意大利战略安全的威胁”，如果阿尔巴尼亚由于其独立受到威胁而向国际联盟的行政院提出呼吁，各大国将“建议委托意大利恢复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边界”。意大利因此就等于收回了在事态紧急时对阿尔巴尼亚的委任统治权益。实地勘测阿尔巴尼亚边界线的工作直到1926年方才完成，在核定边界过程中，以意大利为一方与南斯拉夫和希腊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这就给法西斯政府第一次坚持意大利的权力和威信的机会。1923年，意大利利用一个参与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勘测工作的意大利将军被谋杀的事件，向希腊提出了最后通牒，继之以对科罕岛的轰击和占领，该岛是地中海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自1864年以来就已中立。这一暴力行为标志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首次国际表演，给希腊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持久难忘的印象。容忍波兰攫取维尔纳这时所得到的后果便是，一个大国首次蔑视国际新秩序和国际联盟。

按1915年的伦敦秘密条约，意大利基于战略理由将继承奥匈帝国，占有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半，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这样就使七十五万南斯拉夫人处于意大利的统治之下。这个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意大利强烈反对将塞尔维亚扩大成为一个亚得里亚海的南斯拉夫国家。意大利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打了折扣，把未解决的阜姆缓冲区问题作为待处理问题，由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于1920年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最终将阜姆建为自由市。德国用了二十一年时间才消灭了但泽自由市，而且付出了引起欧洲大战的代价；意大利却只用了四年时间就把阜姆自由市消灭了。这说明一个战败的德国和一个胜利的意大利、一个果敢的波兰和一

1918年7月29日阿尔巴尼亚国家根本法第3条（古奇和坦泼利，第9卷，第2编，第1186号；G.F.德马唐斯：《条约新编》（G.F.deMar-tens：Nouveaureueilgeneralde traites），第3辑，第9卷，莱比锡，T·韦彻，1988年版，第650页。大国已于1912年12月20日原则上同意阿尔巴尼亚自治（古奇和坦泼利，第9卷，第2编，第403号），阿尔巴尼亚问题的解决方案留待大国于1913年5月30日的伦敦条约第3条决定。德马唐斯，前引书，viii.16。

见J·斯怀尔：《阿尔巴尼亚王国的兴起》（Albania：theRiseofaKingdom），伦敦，威廉斯和诺盖特，1929年版，第322—324页。萨赞在英国于1864年将爱奥尼亚群岛割让给希腊而使科孚岛和帕克索岛处于中立地位时是附属于后两个岛屿的（见下文注，即本书第415页注。——译者）。1914年意大利敦促希腊将萨赞割让给阿尔巴尼亚。《英国和外国政府文件》，cvii.889。

个削弱了的南斯拉夫之间的实力的差别，也反映了1923年和1939年的欧洲大国群之间的形势不同。法西斯政府的初步成就之一就是接收邓南遮的遗产，将阜姆实际上并入意大利，南斯拉夫在1924年被迫同意对这块领土实行分治，意大利取得了主要利益。因此，由于和约的安排，意大利在东欧占有了重要阵地，使它能够推行一种积极进行干涉和制造分裂的政策，这是左右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一直到意大利被纳粹德国的势力压倒才失去其优势。当前的意大利只能向东采取行动〔墨索里尼于1924年在阜姆协定以后所说〕，事实是：我们的西边是一些业已定型的民族国家，对他们，除劳动力外，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供输出的。……所以可供意大利和平扩展的路线是在东方。意大利的政策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目标：扩大真正的保护关系，北是奥地利，东是阿尔巴尼亚：孤立并分裂南斯拉夫，它不仅是邻国，而且还是巴尔干国家中的最强大者，意大利要在北部煽起克罗地亚问题，在南部挑起马其顿问题；支持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从而反对南斯拉夫的盟国法国作为东欧的支配者。为谋求达到这些目标，意大利不仅玩弄外交手腕，而且还秘密地给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集团以津贴，又非法地违反和约偷运军火。1928年1月发生了森特·戈特哈德事件，其中也牵涉到意大利向匈牙利私运机关枪；1933年1月希尔滕贝格的奥地利军火工厂的社会党工人揭发了一起类似的私运步枪和机关枪事件，目的地或许不只是匈牙利，而且还有奥地利的祖国保卫团。意大利支持并资助马其顿的恐怖主义组织“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和克罗地亚的恐怖主义组织“乌斯塔沙”。1929年“乌斯塔沙”的领导人巴维利奇被迫从南斯拉夫逃亡，“乌斯塔沙”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结成了正式联盟，此后巴维利奇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意大利或匈牙利。法西斯意大利的国际革命政策于1934年以杀害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而达到最高潮。

意大利的急进政策首次是在1926年暴露的，当时墨索里尼拒绝了法国和南斯拉夫提出的由法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缔结三国条约以稳定巴尔干局势的建议。1926年11月，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一项友好与安全条约，英国驻地拉那公使认为该项条约与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是不相容的，因此引起

同上书，第442页。

“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隔着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两国都以民族为理由对部分马其顿提出了要求。罗马帝国为征服巴尔干半岛便一度取道于‘埃格纳蒂亚路’，那是从都拉斯到萨洛尼卡，穿过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领土”（H·塞顿·沃森：《东欧》，第367页）。意大利曾允许阿尔巴尼亚可与保加利亚有共同边界。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第214页。

《概览，1928年》，第161—167页；《概览，1983年》，第247页注；《概览，1934年》，第494页注。在乔治·塞尔德斯的《斗筲恺撒》〔（George Seldes：Sawdust Caesar），伦敦，巴克，1936年版，第264—267页〕和G·E·R·格迪的《陷落的城堡》〔（G.E.B.Gedye：Fallen Bastions），伦敦，高兰兹，1939年版，第74—76页〕两书中，对这些模糊不清的事件有所说明。

《概览，1984年》，第559页注；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主要是第49页，第169—170页，第223—224页；麦卡特尼：《匈牙利和它的继承国》，第374页。又见塞西尔·F·梅尔维尔：《巴尔干的骗局》（Cecil F. Melville：Balkan Racket），伦敦，贾罗兹，1942年版，第1章。

《概览，1927年》，第154页。

《概览，1927年》，第156页，第169—171页。关于英国公使事件，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371页；斯怀尔：《阿尔巴尼亚》，第473页；鲁宾逊：《阿尔巴尼亚走向自由之路》，第76—77页；参阅《概

了一场为时达一年的危机。1927年4月，意大利和匈牙利又签订了一项友好与仲裁条约。南斯拉夫便于1927年11月11日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友好与仲裁条约作为回报，这样法国与小协约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便告完成。意大利接着于1927年11月22日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防务联盟，这是意大利控制阿尔巴尼亚的军事和经济组织日益增强的公开表现。意大利于1928年又同土耳其和希腊签订了友好条约，它希望以此巩固它在东地中海的势力。对土耳其来说，这是对它于1925年同苏联签订的条约的再保险，同时也想防止意大利的扩张主义要求，对希腊来说，它可用于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以求解决萨洛尼卡争端。但是土耳其和希腊并未消除它们对意大利帝国主义疑虑，它们对安纳托利亚要求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科孚岛等往事也并未淡忘；当意大利努力促成的作为东地中海三角关系第三方面的希腊—土耳其和解终于在1930年实现时，事实证明的是，它并不是意大利策划中的工具，而是维持东欧现状的最持久保障。土耳其在1932年加入国际联盟，这是它作为一个保守国家的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在希腊和土耳其共同领导下，巴尔干的团结趋向这时取得了新的势头，也可以作为制止巴尔干国家在法国和意大利体系之间分崩离析的一种反应。建立非正式巴尔干会议的六个巴尔干国家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从1930年到1933年它们每年举行会议。它们未能达成任何持久的政治协议，因为保加利亚要求修改和约，拒绝签订任何涉及承认现状的一般巴尔干条约。走向巴尔干团结活动的唯一成果是1934年由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签订的巴尔干公约，四国相互保证其边界不受巴尔干国家的侵略，也不受巴尔干国家联合另一大国对缔约国的侵略。后一条款很快就揭示巴尔干国家的相互依赖并不能超越于它们各自对非巴尔干大国的依赖之上。土耳其对公约便有限制，它坚持它没有为罗马尼亚而同俄国作战的义务，因为有1925年的俄土条约；希腊也坚持它并无同任何大国作战的义务，所指的大国是意大利。公约对其他两个巴尔干国家的参加还是敞开大门的，但它们不参加。

览，1927年》，第173页。

同上书，第159页。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之间的相应协者并未庄严地载之于条约，而是于1930年由博里斯国王和一位意大利公主的联姻而告完成，《概览，1930年》，第156页注。

《概览，1927年》，第162—163页。

同上书，第163页，第182—183页。

《概览，1928年》，第168—161页。

《概览，1928年》，第158页。

同上书，第185页。

《概览，1925年》，i.526注；《概览，1934年》，第330页；《概览，1925年》，ii.83和注；《概览，1936年》，第601—602页。墨索里尼在1934年8月18日的演说中说：“意大利的历史目标是亚洲和非洲”。

《概览，1930年》，第157—168页。

《概览，1934年》，第216—220页。

见《概览，1930年》，第145—156页；《概览，1931年》，第324—340页；《概览，1934年》，第508—511页。

见《概览，1930年》，第526—527页。

同上书，第527—528页。土耳其人所预见到的可能情况是，在一场俄国同罗马尼亚的战争中，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的不参加已经损害了此项公约作为对抗大国的统一阵线的性质了。阿尔巴尼亚曾经表示过要加入的意向，因为它在 1931 年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意大利的羁绊，所以不再续订 1926 年的条约，但是到了 1934 年，意大利又恢复了对它的控制，足以禁止它参加这一公约。保加利亚的不参加使巴尔干协议出现了一种象小协约国 255 一样的纯然是反对修改和约论者的面貌，失去了它作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巴尔干联邦的性质，而把一个处于关键地位的持不同意见的国家丢下来作为大国的立足点。然而保加利亚的孤立又完全不象匈牙利那样彻底。它对南斯拉夫提出了最大的领土要求，但它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却又时坏时好，在 1933 年和 1934 年，后一种倾向竟然那么显著，致使希腊和土耳其都为之吃惊。巴尔干协商这一结构在 1934 年鼓励了由维尔切夫和格奥尔基耶夫发动的保加利亚政变，他们终于取缔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并加强了与南斯拉夫的联系。但博里斯于 1935 年又推翻了维尔切夫，这意味着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恢复友好的政策将由旁人完成，而且还涉及到其他方面。

从 1930 年到 1934 年，意大利在东欧的势力逐步到达全盛时期，与此同时，法国和意大利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却趋于暗淡与消沉，首先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然后是德国的复兴。这些原因产生的趋势便是多瑙河地区也和巴尔干半岛一样都在走向联合，只是不那么明显，也不那么成功。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是在多瑙河流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之间不断谋求新的经济合作，以接受当前存在的边界为基础，此种合作由于世界危机而显得更需要了。奥地利于 1931 年提出要同德国缔结关税同盟，以改善它的经济地位。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激烈反对，而且挫败了这一计划，其理由是关税同盟必然导致结成被禁止的政治联盟。意大利也加入了法捷的反对行列，这是法国和意大利在东欧利害关系上的首次趋向一致，在此后三年中，意大利便在确立自己对奥地利的控制权。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一个以塔迪厄为名的多瑙河国家关税优惠计划以取代奥—德关税同盟，这将加强法国在中欧的影响；但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反对下这一计划被破坏了。意大利与德国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法国势力在东欧扩张，它与法国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德国势力在东欧扩张。

1933 年 2 月，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两个星期后，各小 256 协约国签订了一个“组织公约”，根据这一公约，它们将原来的双边联盟条约续订为永久条约，建立了一个常设外长理事会来统一它们的外交政策。这是小协约国联合一致的高潮阶段。一个月以后，墨索里尼建议由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

可能被拉到俄国一边去，土耳其因此就将被迫同保加利亚和俄国作战。

《概览，1934 年》，第 523 页注 和第 535—536 页。

关于保加利亚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见《和会史》，iv，444—446；《概览，1934 年》，第 512 页。

同上书，第 513—516 页；参阅第 352—353 页；《概览，1936 年》，第 601 页。

《概览，1936 年》，第 531—532 页；H·塞顿-沃森：《东欧》，第 374 页。

《概览，1931 年》，第 36—38 页，第 297—323 页。

同上书，第 243 页注 和第 319—320 页。

《概览，1932 年》，第 22—23 页；《概览，1933 年》，第 205 页注 ；《概览，1934 年》，第 487—489 页。

《概览，1933 年》，第 203—205 页。

签订一项四强公约，这将以一个由大国组成的共同指导机构来正式替代法国在东欧的霸主地位，而法国在这个机构中处于少数地位，俄国则被排除在外。四强将促进和约的修改，并逐步承认德国、奥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军备上可以获得平等待遇。此项计划是意大利争取威望、修改和约以及与法国争霸的政策合乎逻辑的结果。它受到小协约国和波兰的强烈反对，法国人则成功地删去了计划的要害部分，所以最后于1933年6月签订的四强公约已失去其最初的特点而平淡无奇了。正如奥德关税同盟计划预示着德奥合并一样，四强公约也预示了慕尼黑协议。不过那时法国和它的盟国还有能力躲避它们所担心的威胁，而意大利却无力去改组并掌握“大国的一致”，象德国在五年后所作的那样，所以它只能退而求之于要求修改和约的东欧诸小国的联合了。

东欧结构在1934年发生了根本性动摇。1933年，陶尔斐斯为谋求避免德国纳粹革命的影响，便如法炮制，采取了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常用的步骤，暂时停止了奥地利议会政府的活动，奥地利独裁制的忠诚支持者是施塔伦贝格的祖国保卫团，这个组织接受意大利的津贴，是奥地利的亲意派，正如奥地利纳粹党是奥地利的亲德派一样，陶尔斐斯自己也谋求意大利的庇护。在1934年2月，通过短暂的内战，他镇压了社会民主党人，终于把奥地利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国家。他得到墨索里尼的支持和鼓励，后者对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很不满，因为他们揭发了希尔滕贝格的丑闻。一个月以后，奥地利便同意大利和匈牙利签订了罗马议定书，规定了在政策问题上的相互协商和经济上的合作。这是意大利对其多瑙河卫星国的政策获得成功，防止了组成一个反对德国的共同阵线。1934年7月，当纳粹党在奥地利发动暴动并杀害了陶尔斐斯时，意大利在意奥边界上部部署了四个师，宣称它要保卫奥地利的独立。这是两次大战之间意大利威力在东欧到达顶峰的时刻。此后由于它在非洲和西班牙浪费兵力，它的力量便趋向衰退，等不到四年，它就只能接受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

可是，法国和意大利争霸东欧还有最后一次的暴力行动。法国在1934年的政策集中在建立与意大利的和好关系以对抗德国，这就涉及解决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宿怨。南斯拉夫颇为恐惧地看到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控制加强，这是同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就形成了从三方面包围南斯拉夫的威胁，就象后来德国相继包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那样。南斯拉夫在1933年和1934年7月先后声明，如果意大利军队进入奥地利，南斯拉夫军队也将跟踪而入。法国想与意大利达成谅解的企图促使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也趋向冷淡。1934年10月，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乘

《概览，1933年》，第208—221页；参阅贝洛夫，i.90—91。

《概览，1934年》，第435—436页。

同上书，第456—467页。

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376页。

《概览，1984年》，第487—507页。

《概览，1933年》，第205页注。

同上书，第471—475页。

同上书，第341页，第475—476页，第556—557页和注。

船前往马赛会见法国外长巴尔图，就在那里遇刺了。他此行的目的也就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不管他此去是要告诫法国，在保卫奥地利的任何国际安排中南斯拉夫必须与法国、意大利享有同等权利，或是要把巴尔干公约的前景告知法国，或是与巴尔图计划的东欧公约有关。这次暗杀暴露了意大利的巴尔干政策的本质：这是意大利和匈牙利庇护克罗地亚恐怖主义者的果实，它是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领土上组织的，谋害后意大利又拒绝引渡帕韦利奇或将他交付审判，案件的曲折说明了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是统一行动，因为凶手本人就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一名保加利亚成员。法国关心的是要防止国际反响，深恐危及它自己、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和好关系。因此它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它别控诉意大利，又争取到使意大利不袒护其卫星国匈牙利作为交换条件，这样国联行政院才取得了一项妥协方案。 —

同上书，第 537—577 页。

《概览，1984 年》，第 538 页。

同上书，第 560—561 页。

见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第 33—34 页，第 291—292 页。“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接受训练并杀害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国王的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代表过去从未达到过的最高的恐怖主义专门技术水平”。

韦斯特：《黑羊和灰鹰》，i.365。

（八）德国的优势

东欧本来就又弱又分裂，经过十年的波兰帝国主义、意大利的干涉和马其顿的恐怖主义，东欧又进一步削弱和分裂，这就为德国的扩张准备了成熟的条件。纳粹革命对外所引起的波澜首先是干扰了波罗的海和多瑙河地区，德国自己就是这一地区的大国；然后又影响到巴尔干半岛，德国和巴尔干国家之间还隔着两层或三层中间国家。意大利一手倡导的国际革命恐怖主义传到了德国手中，就被使用得更坚定更有针对性了。法国本来为应付这一类事故在东欧设计的法国联盟体系立即遭到歪曲并很快被破坏。因为德国的复兴引起了一场外交革命，这场革命引进了苏俄以代替波兰作为西方国家抗衡德国的力量；于是波兰自己便解除了被包围的忧惧，罗马尼亚解除了来自俄国的压力，南斯拉夫解除了来自意大利的压力，小协约国的瓦解就这样开始了；最后促使意大利追随德国，东欧与西欧隔绝。

受到纳粹革命威胁最直接的国家是奥地利和波兰：奥地利是因为德奥合并乃是希特勒政策明白宣布的目标；波兰是因为德国从未默认其东部边境领土的丧失。但波罗的海的外交革命是颇不寻常的。对波兰来说，纳粹主义是一种颇为模糊的现象。它提供了一个分裂波兰敌人的机会，因为德国新政权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它废弃了曾为魏玛共和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德国与苏俄的谅解。纳粹主义对波兰表示友好，不仅在德国是这样，在纳粹党于1933年5月取得政治控制的但泽也是如此。而且，毕苏斯基对俄国的仇恨甚于对德国，他的不文明的波兰政权和德国纳粹政权的反动和反共等方面似乎有相似之处。在1933年3月，后来又在11月，毕苏斯基向法国建议对希特勒采取军事防范措施，法国没有接受。这条可供选择的路走不通，波兰就于1934年1月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十年互不侵犯条约，法国在东欧的体系首次出现了裂缝。波兰和德国恢复友好所造成的后果立即对波兰的邻国产生了影响。第一个后果是，波兰恢复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敌视，这就使波—德条约看来象是包括了波德之间的一项谅解，即两国对它们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收复领土要求是都感满意的。第二个后果是促使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进行合作。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早已因纳粹革命的威胁而恐慌，深怕德国可能对自己提出领土收复要求，所以于1934年2月17日，参照巴尔干公约和小协约国组织公约的形式，签订了一项防卫同盟条约。然而波—德条约更为独特的后果是对立陶宛的包围。在此之前，立陶宛因维尔纳与波兰结下了仇，又因美尔同德国记下了恨，这种双重政策只有在波兰自己的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即它既要戒备俄国的敌视，又要防止德国的挑衅时才有可能实行。波—

但贝洛夫在他的书中(i.140)写道：“法国的将军们和象亚历克西·莱热这样的职业外交官都认为法苏协定之可取，主要在于谋求摧毁苏联和德国之间任何可能的结合，并可加强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地位。他们并不认为红军是对法国及其盟国军事实力的重大补充。”

参阅《概览，1934年》，第341—342页。

见《我的奋斗》，第1页。

《概览，1933年》，第187页；《概览，1935年》，i.213—215。

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97页注和439页；贝洛夫，i.92注。

《概览，1930年》，i.288—298。

《概览，1934年》，第411页。

德条约是立陶宛的两个敌人的结合，使立陶宛所处的地位预示着 1939 年 8 月 23 日德—苏条约后波兰自己也将处于这种地位。这就促使立陶宛于 1934 年 9 月 12 日加入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条约。第三个后果是俄国参加反对修改和约阵营的倾向明确了，从而导致俄国于 1939 年 9 月 18 日被接纳为国际联盟成员。在此之前，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在法律上承认了苏联，只剩下一个南斯拉夫是东欧唯一尚未和俄国建立充分外交关系的国家。外交革命的最终结果是 1935 年 5 月 2 日苏俄与法国签订的互助条约和 1935 年 5 月 16 日苏俄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这些条约终于使苏俄置身于反对修改和约国家的行列。由于力量的这种重新组合，东欧政治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它不再是一道屏障，而成为 260 成为一个山谷，勉强由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横断的山脊。可是被法国视为它所谋求的堪与洛迦诺公约抗衡的东方条约的核心法—苏条约，却被德国宣布为与洛迦诺公约并不相容，而且被用作为德国 1936 年 3 月 7 日重新武装莱茵区的理由。接着便是可以预期的合乎逻辑的后果：法国的势力在东欧消失了，由德国的优势取而代之。这一变化过程并不只是由于大国间的关系改变而强加于东欧国家的。它们自己的积弱和错误加速了这一进程。在德国对它们确立政治控制之前，它们自己在经济上的弱点已足以使德国进行贸易攻势了。它们在政治上的错误是他们未能组成一条对抗德国的外交统一阵线。

世界经济危机暴露了东欧的法国体系的主要缺陷：这一体系是一种不以经济利益为其基础的外交安排。经济萧条将东欧国家推到毁灭的边缘，因为经常性的剩余农产品的处理问题激化了。它们的贸易大幅度下降。法国自己是一个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因而无力收购它们输出的农产品，法国也无力供应它们所需要的工业品。法国体系不能扩大成为与西欧结成一体的经济和政治总组合，因为英国采取的是渥太华协议规定的帝国保护政策，拒绝在东欧承担政治或经济义务。苏俄自身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之一，它的工业生产力也不能满足东欧进口的需要。它的经济利益是要与东欧竞争而不是与它相互补充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正在意大利开拓一个重要的市场，但在 1935 年它们牺牲了这个市场以支持对意大利实行的集体经济制裁，而又没有获得其他出路。于是德国便成了东欧必然的市场，也是东欧必然的工业品供应者了。西方国家虽然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但并未采取适当措施以消除此种厄运。德国对东欧的经济征服便于 1936 年在沙赫特指导下开始了。

德国对东欧国家的大部分土产品提出了无限制的需求，价格也大大超过世界市场的标准。它们之间的贸易额从世界危机期间的低潮迅速回升，经济

《概览，1934 年》，第 414—415 页。

同上书，第 888—404 页。俄国对波—德条约的反应很谨慎（见《概览，1935 年》，i.62—63，279，以及贝洛夫，i.140）。但不久以后，欧洲共产党人在广泛地并不加区分地泛论世界概貌时，就认为波—德条约是有其侵略目的的。参阅 R.帕姆·杜德：《世界政治，1918—1936 年》（R.PalmeDutt：WorldPolitics，1918—1936），伦敦，高兰兹，1986 年版，第 268—269 页，第 297—302 页。

《概览，1935 年》，i.79—81。

同上书，第 82 页。

《概览，1935 年》，ii.228，235—236，484；《概览，1936 年》，第 468 页；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 154—155 页。

《概览，1936 年》，第 526—533 页。

生活活跃了，就业情况改善了，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这些短时期的利益是巨大的，它们支配着每一个东欧政治人物的各种考虑。但经济复兴都指向德国，也为德国所左右。德国促进的贸易都是双边贸易，在经济上德国处于较强的地位。为了报答德国提供的市场，东欧国家被迫输入并非它们需要的物资，而是德国的设备能力可以生产的东欧国家需要的东西，于是非必需品便日益增多。为了报答德国的高价收购，它们被迫一再提高德国马克对它们各自货币的汇率，因而它们国内的物价也相应提高了，这就使它们更难于在德国以外另找其他经济合作的对象。东欧到处都是德国的商业和技术代表团，他们是控制政治和军事的先遣部队。

莱茵区的重新武装削弱了法国的联盟体系，这本是德国的目的，因为可以使法国无法越过不设防的并在经济上对德国至关重要的边境地区去侵入德国以援助其盟国了。法国再也不能用占领鲁尔那样的措施去充当东欧的警察了。此举的直接后果是拆散了波兰和德国的结合，使波兰的政策再一次转向法国。当德国进兵莱茵区的那一天，波兰政府重申关于信守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保证，宣称在发生战争时波兰将站在法国一边，而且决定采取和法国同样的军事措施。即便在那次危机中，法国的政策又怯懦又失败，波兰也没有明显地疏远它；波兰此后的政策还是要在法国人眼里维持它作为最初的东欧盟国的地位，较之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要在大国集团之间保持平衡，这本是一个较弱的大国适宜扮演的角色，意大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但波兰也想把无所偏倚的政策和充当德国爪牙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所以它继续利用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力量，敌视俄国，敌视小协约国，特别是敌视捷克斯洛伐克。262 从 1936 年到 1938 年，德国政策的重点是向东南欧扩张，波罗的海均势的改变暂时也还未使用暴力。1935 年 6 月 18 日英国和德国签订海军协定，英国听任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海军限制，使德国再一次控制波罗的海，并颇为自然地导致波罗的海沿岸重新设防。这一进程终于使德国于 1936 年 11 月 14 日恢复了对基尔运河的全部主权。对波兰的缓和政策扩大到对立陶宛，1936 年 8 月德国和立陶宛签订了一项综合性的商务条约。德国还以派遣战舰访问的形式扩大其影响，以坚定芬兰亲德的外交倾向。意大利在多瑙河地区的优势转给了德国这一变化很快就被

《概览，1937 年》，i.459—465。

《概览，1936 年》，第 10 页注，第 262 页，第 478 页注。

莱昂·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Léon Noel：L'Aggression allemande contre la Pologne），巴黎，弗拉马里翁，1946 年版，第 128—129 页]；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 440—442 页；J·W·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曲》（J.W. Wheeler-Bennett：Munich：Prologue to Trag-eddy），伦敦，麦克米伦，1948 年版，第 287 页。

《概览，1936 年》，第 393—401 页。“波兰的新政策是要保持波兰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所以要摇摆在其他欧洲国家之间以适应非波兰力量之间的均势中所不断发生的变化”（同上书，第 394 页）。“他的[贝克的]目的是在极其紧张的欧洲局势中保持波兰（表面的）行动自由，继续不断地表演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维持平衡的特技。”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 92 页；参阅第 42 页。

《概览，1935 年》，i.178—188；参阅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109—110。

见《概览，1937 年》，i.373—375，379—380；参阅《德国海军史，1919—1939 年》的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175（017—PS）]；《阴谋与侵略》，vi.824。

《概览，1936 年》，第 538 页。

大家看到了。在斯特雷扎阵线瓦解和德一意协议于 1936 年形成以后，奥地利就不能再依靠意大利的保护了；意大利则由于进行埃塞俄比亚战争而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再资助祖国保卫团了。1936 年 7 月，德国迫使奥地利接受一项条约，使奥地利从意大利的卫星国一变而为德国的卫星国，并且在许士尼格的内阁中安插两名亲纳粹分子。与此同时，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也充分施加压力。虽然德国尚未废止与洛迦诺公约同时签订的德一捷仲裁条约，但此项条约在情况发生变化后是否还有效显然是有疑问的；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区后提出的和平建议并未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在 1935 年 5 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大选中，亨莱因的苏台德德意志党得到令人注目的胜利，所得票数比其他任何一个党都多，得到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口三分之二的支持。因此，希特勒就掌握了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强大手段，而在 1936 年 6 月 21 日，亨莱因在赫布的演说中要求说，德意志少数民族需要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全体的民族权利，这时此种手段的性质也就很明白了。这样的要求是 1919 年的少数民族条约所未曾梦想到的——使少数民族成为民族中的民族；这样的要求使东欧诸国在以后的两年中陷于分裂和屈服。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马萨里克于 1935 年 12 月辞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职务。他也许是欧洲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比任何其他人更能体现和约解决方案的好的方面。贝奈斯继任总统，正值他一生的事业即将经受考验的时刻接受了全权。在欧洲，捷克斯洛伐克是孤立的。它和它的盟国法国之间被它所惧怕的广阔的德国隔开了：莱茵区的重新军事化意味着即使法国依然愿意援助它，法国也无法这样做，除非它和德国展开全面战争。它和它的盟国俄国之间隔着一块宽度不到一百英里的乌克兰领土，这块土地战后属于波兰和罗马尼亚管辖。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来说，它们是否允许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政治上的难题。波兰自身与俄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均无结盟关系，实际上与两国的关系是不友好的，所以它决定拒绝俄国军队过境；对波兰来说，捷一俄协议还形成了部分的包围形势，对东加里西亚是一种威胁。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则有着结盟关系，而且从 1934 年以后它自己也同俄国改善了关系；此外，它对苏一捷条约还曾表示赞同。罗马尼亚国内在政策上有着尖锐冲突（和法国的情况一样），一派主张加强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联系，另一派则害怕因此而得罪德国，这是害怕德国胜于害怕俄国和

《概览，1936 年》，第 413 页；《概览，1938 年》，i.184—185。

《概览，1936 年》，第 450—454 页，第 478—479 页；“本来这是一项意大利和德国关于奥地利的协定，所以奥地利只得同意”。格迪：《陷落的城堡》，第 193 页。

《概览，1936 年》，第 469—486 页。

《概览，1938 年》，ii.63 注。

三个最大的党是：苏台德德意志党，1,249,530 票；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1,176,593 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034,774 票。苏台德德意志国家社会党已于 1933 年 10 月 4 日解散；亨莱因在 1933 年 9 月 30 日建立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以后于 1935 年 5 月大选之前改名为苏台德德意志党。见《概览，1936 年》，第 491—493 页；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 14 章。

《概览，1936 年》，第 498—499 页；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 249—251 页。参阅同一作者的《不宣而战》，第 32—33 页，第 152 页。

《概览，1935 年》，i.280。

同上书，i.82 注；《概览，1936 年》，第 522—524 页。

害怕俄国胜于害怕德国的两派人之间的冲突。前一派的领袖是蒂图列斯库，他是一个看问题非常敏锐、非常坦率的人，多年来指导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是仅次于贝奈斯的小协约国的主要设计者，本人又是巴尔干协议的主要设计者。但是他也象威尔逊和维尼齐罗斯一样，只顾追求国外的胜利而忽视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1936年8月他的下台明白无误地标志着政治风向的变化，正如三年以后李维诺夫的下台一样。在他以后的政府继续建造布科维纳—特兰西瓦尼亚铁路，以便沟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往来，但又不愿承担义务使罗马尼亚成为外交合作的中间环节。

在1936年和1937年，德国的压力无情地迫使小协约国分裂。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强大压力；波兰摆脱罗马尼亚；意大利摆脱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日益仰赖于同俄国联盟；南斯拉夫是东欧唯一拒绝和俄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国家；罗马尼亚在俄国问题上和法国一样意见分歧。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既是一个战略堡垒，又是一个坚决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成为德国控制东欧的主要障碍。贝奈斯和他的人民愈顽强地拒绝为德国的利益效劳，他们受到的压力也就愈大。匈牙利和波兰都卷入了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中，都指望得到领土。在德国的鼓动下，匈牙利修改和约的要求暂时从南方和东方转向北部边界，解除了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压力，从而削弱了小协约国对它们的价值。这时匈牙利的外交目的是，放弃匈牙利对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以换取后者同意在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交战时保持中立，通过德国对匈南边界的保证以取得德国的合作，与德国参谋部会谈以便联合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仍然不好。这时波兰的外交目的是，恢复与法国和罗马尼亚的联盟（不开罪德国），它陷于幻想而妄图组成东欧的中立集团，重萌曾鼓舞罗马集团的反德联盟的动机。1936年9月，贝克谋求与立陶宛和解，但遭到拒绝。在蒂图列斯库的继任者安东尼斯库的领导下，罗马尼亚的政策也是旨在加强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关系，恢复1921年原有的“防疫线”，这为两国提供了妄图建立独立路线的幻想，又符合德国削弱现有东欧外交结构的意图。小国不可能在它们之间成功地推行再保险政策以对抗侵略性的大国，这必须与另一个大国合作。与此同时，南斯拉夫正在和德国结成前所未有的经济关系，和意大利结成前所未有的外交关系并恢复旧有的经济关系。

1934年亚历山大国王的被刺成为意南关系中的转折点；从那时起，随着德国的幽灵逐渐向亚得里亚海延伸，墨索里尼大力推行对南斯拉夫的再保险政策，此项政策虽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时期由于南斯拉夫参加了对意制裁而中断，但并未终止。斯托亚迪诺维奇就是墨索里尼的贝克上校，他们两人在1937年3月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此项条约在亚得里亚海就等于1934年的德一波条约。如果该条约是由亚历山大国王谈判签订的，那将成为他事业上的辉煌成就，因为条约使意大利承认南斯拉夫在亚得里亚海彼岸是有生存权的，但这时看来此项条约似乎只是为了轻率而失策地同轴心国拉上关系而削弱了小协约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是巴尔干公约的签署国，但它们向着轴心国的游离或摇摆政策成了巩固公约的阻力。希腊已为自己对巴尔干公约承担的义务规定了界限，以避免被拖进一场对非巴尔干国家作战的危险，

《概览，1936年》，第517—519页。

《概览，1934年》，第328页和注。

特别是对意大利。保加利亚最早最全面地陷于德国的经济控制之下，重新充当德国在巴尔干帮手的老角儿。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于1937年1月签订了一项单纯的永久友好条约，这本可以说是斯坦博利斯基、维尔切夫和亚历山大的伟大传统的成果，把拜占庭的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对抗西方长期来的剥削和侵略，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都是在不得人心的独裁者统治之下，两国的政策都已在遵循德国主子所规定的路线。唯一不受德国压力影响而由自己制定其政策的巴尔干协约国家是土耳其，这个东欧国家在东欧承担义务的领土最少，是唯一既与俄国也 266 也与西方大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这是个有利条件，也是一个危险。

1936年3月莱茵兰的重新武装在东欧到处都有反响，接着在四个月内便是黑海海峡的重整军备。这是土耳其自1933年来一直提出的要求，大国保证土耳其安全的洛桑条约到了1936年已完全失去价值。导致1936年6—7月举行蒙特勒会议的外交活动，只是使土耳其赢得以和平手段修改条约的道义声望。但原来为允许土耳其重新武装黑海海峡而召开的会议却讨论了怎样修改海峡通行的条件，俄国希望作有利于它的修改。跟1923年的洛桑会议一样，蒙特勒会议也发展成为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过这一次法国是站在俄国一边；土耳其再次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会议前它已在原则上达到了它的目的（这一次是重新武装海峡，1923年则是收复东色雷斯）。自洛桑会议以后，俄国的实力和威望都已大为增加，它这时希望取得海峡的出口以便与它的法国盟友保持联系。英国希望减少土耳其对俄国的依赖，也希望为允许俄国舰队进入地中海取得补偿，因为俄国舰队驶入地中海将影响那里的均势。但英国在蒙特勒会议上是孤立的，1936年7月的蒙特勒公约按下列条件确定了黑海海峡的新体制：（1）重申商船自由通过海峡的原则。（2）非黑海国家只限于派遣轻型水面舰只驶入黑海，总吨数也有限制；但黑海国家得派遣任何吨位的主力舰驶入地中海。（3）撤销国际海峡委员会，其职责交由土耳其行使。（4）土耳其在战时或战争迫在眉睫时得关闭海峡。（5）土耳其准予立即重新武装海峡。在洛桑会议上由俄国扮演的不满者的角色在蒙特勒会议上改由意大利扮演了，因为限制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势力是土耳其、俄国和英国政策的共同目标；所以意大利既不参加会议，也不签署公约。蒙特勒解决方案是在土耳其国家安全和俄国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俄国又一次被正式承认为黑海的主要大国。当年意大利纵谈它“在亚洲的历史性目标”，并梦寐以求在爱琴海的优势，蒙特勒公约便标志着这一时代的结束，所以它也预示着，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冲突，即将成为五年后破坏德苏协定的主要因素。 —

《概览，1936年》，第519—520页。

同上书，第531—532页。

《概览，1936年》，第512—516页；H·塞顿·沃森：《东欧》，第390页。

《概览，1936年》，第600—603页。

《概览，1936年》，第608—645页。

（九）德奥合并

自从罗马—柏林轴心于 1936 年形成以来，德奥合并实际上已不可避免。在两个敌对大国之间作为缓冲的一个小国还有可能保持它的独立，因为这也利于那个较弱的大国。但如果两个大国建立了协议，那个缓冲国就很可能被瓜分了。德国于 1938 年 3 月 11—12 日征服奥地利就属于这种情况。德奥合并是变相的瓜分；因为虽然最明显的现象是奥地利共和国并入第三帝国，但它也导致德国承认勃伦纳边界，还把奥地利民族的一部分放弃给意大利，这就是 1919 年被意大利兼并的南蒂罗尔居民，他们在那里生活、消失、受着迫害。__当纳粹党人在维也纳胜利地升起他们的旗帜时[纳米埃尔写道]，整个中欧和东南欧，从波希米亚山和喀尔巴阡山一直到亚得里亚海、希腊和黑海海峡，都将燃烧起来了，欧洲的政治均势将被破坏了。__德奥合并对于推翻均势所产生的影响好象 1796 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一样，扩张中的大国征服小国是逐步累积的，征服了一个，下一个便更容易更有把握了，如此一个又一个直到大国之间的真空地带全部填满为止，在十八个月内，苏联也签署了它的福米奥营条约。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后使自己循多瑙河而下，向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有了共同边界。捷克各省五分之四的边界已被包围。

与奥地利合并……不仅实现了一个长期以来的民族目标，而且肯定地改善了我们的战略地位，从而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直到现在为止，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插入德国境内，形成很大威胁（它是朝向法国的蜂腰，又是盟国特别是俄国的空军基地），现在捷克斯洛伐克自身也被钳住了。它自己的战略地位现在已经变得如此不利，以致在能得到西方的有效援助之前，它势必成为强有力攻势下的牺牲品。

希特勒并不是一直打算先征服奥地利然后再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五个月以煎他声称有必要同时征服这两个国家；在 4 月 21 日，维也纳失陷后五个星期，在这个被征服的首都自杀的浪潮尚未减退，恐怖统治才开始成为常规时，希特勒便开始详细考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三天以后，亨莱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举起了叛乱的旗帜，他在卡罗维发利发表了演说，这一回不象 1936 年在赫布的那次演说那样有保留了，他在取得胜利的德意志帝国全部威望的支持下，要求德意志民族集团的行政自治权和法律上的人格尊严，要求他们有权“宣布接受德国国籍和德国政治哲学”，即在德意志人地区建立纳粹极权主义政权来肢解这个民主共和国。他还要求“修改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曾经把国家引导到德意志民族的敌人的行列”。5 月 20 日深夜，贝奈斯鉴于德国军队集结的报道，下令实行部分动员。这就激怒了希特勒，促使他提前实施他的计划，5 月 30 日他写道：“在最近的将来以军事行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是我的决不更改的决定。”__力量均势的破坏不但改变了小国与德国的关系，也改变了小国之间的关系。“狗腿子”改善了它们的地位，指望分到一些赃物。波兰计划军事占领立陶宛，以抵销 269 德奥合并的影响；可是它却在 3 月 17 日送去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俄国警告波兰，如果波兰武装进攻立陶宛，俄国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

《概览，1938 年》，i.185—223。

见《概览，1998 年》，第 3 卷，第 2 编，第 2 节。

为德国胜利地摧毁的和约所规定的限制不能迫使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再遵守了。保加利亚于7月31日在萨洛尼卡与巴尔干协约集团签订了互不侵犯公约，公约承认保加利亚在军备方面的平等地位，承认它对自己境内的充分主权，但它并未加入巴尔干协约集团，也未放弃修改和约的主张。8月22日，匈牙利和小协约国也在布莱德签订了一项相似的协定。如果保加利亚不象十年前当意大利的附庸国那样当今天德国的附庸国，如果匈牙利不是被迫在政治上、经济上部分转变成为“同等地位的辅助力量”的话，这些协定本来是可以具有小国联合起来对抗德国威胁的性质的。德奥合并激励了匈牙利国内的德裔和匈牙利裔纳粹党人，增强了德国的压力和宣传；1938年5月霍尔蒂以伊姆雷迪替代达兰伊。以遏制匈牙利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象陶尔斐斯、卡罗尔和斯托亚迪诺维奇一样，伊姆雷迪所能执行的政策只能是效法形成威胁的病害，其效果并不是使人具有免疫力，而是为真正的病害铺平道路。当夏季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日益高涨时，小协约国生命力的唯一迹象是许多南斯拉夫青年到捷克使馆和领事馆去申请，愿意在发生战争时服役。他们是7月来到布拉格参加全国体育组织“索科尔”最后一次盛大联欢节日的最热烈的来宾，他们向马萨里克的国家提供援助，正如过去欧洲走向毁灭时，马萨里克在阿格拉姆审判中赞助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事业一样。但是最后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还是那些大国，而不是一些小国，所有这一类危机几乎都是如此。

见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Joseph E. Davies：Mission to Moscow），伦敦，高兰兹，1942年版，第191—192页；波将金：《外交史》，iii.643—644。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1节。

《概览，1938年》，ii.290—291。

布莱德协定引起德国不快，因为它意味着匈牙利和小协约国“和好”；坎姚尽力向里宾特洛甫保证，按协定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但匈牙利无意使协定生效。见里宾特洛甫、伊姆雷迪和坎姚三人间于1938年8月23日的谈话备忘录，以及里宾特洛甫和坎姚于1938年8月25日的谈话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35—139，（2796/7—PS）；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609—611，623—624；参阅《阴谋与侵略》，v.430—433]。又见《概览，1938年》，ii.295—298。

见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23页；H·塞顿-沃森：《东欧》，第394页；格迪：《陷落的城堡》，第428—429页。

（十）第一次瓜分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9月至11月第一次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次没有进行战斗的战争的结果，它推翻了凡尔赛解决方案并使德国成为无可争辩的东欧主宰。这次危机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对西方大国的政策也是这样）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一年后爆发真正战争的各种力量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模式。决定性因素是西方国家的政策，它们的决心可以使法—捷联盟不起作用，因此东欧的命运又一次要取决于东欧以外的力量；然而其次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在东欧内部，即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政策。

波兰的政策纯粹是机会主义的，贝克天真地称之为“独立的”政策。在表面上，波兰的政策是基于既怕德国又怕俄国，所以在1938年9月又妄想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玩弄中立集团的把戏，这一次还想扩大为“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轴心”，好象波兰站上一张椅子就能俨然成为大国似的。但随着战争的迫近，可以看得清的是，波兰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并不是保持平衡的，在两者之间德国对波兰虽然是更为直接的危险，但波兰却倾向于德国，它对俄国的敌对态度更露骨。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即波兰渴望马上获得领土利益。如果德国单独与捷克斯洛伐克作战，波兰会协同德国一起击败并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波兰的军事措施并不与德国怎样协调，而且它还可能认为自己是独立作战的。即便法国履行它与捷克斯洛伐克联盟的义务，波兰也不愿向法国驻波兰大使诺埃尔保证遵守中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法国联盟体系最后是要陷于自身内部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同法国订有主要是针对德国的同盟条约的波兰，竟会加入德国一起去进攻法国的另一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即使在法国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同德国交战时，它也会这样干。波兰人对此所阐明的论据是：捷克斯洛伐克反正免不了要瓦 271 解，波兰从中可以收复它被夺去的领土，这是波兰的利益所在；让波兰这样增强并扩大而成为介于德俄之间的东欧中立集团的领袖，这是法国的利益所在。此种需要、贪婪、误断加在一起的论据就成了不坚持原则的非常充分的理由了。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也许还是波兰不喜欢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苏联。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一边对德国作战几乎肯定地意味着站在俄国一边对德作战，这就带来了要让苏联陆军和空军过境的危险，而对此波兰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的。最后，波兰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决非不偏不倚，它可与德国合作共同反对

在1937年10月以前就已写出的对此种情况的准确预测，见《概览，1936年》，第479—481页。

“……两国政府代表的指导思想都是要寻求一种不致导致欧洲大战的解决方法，所以是一种不致无意识地迫使法国按照其承担的义务采取行动的解决方法”，张伯伦于1938年9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对1938年9月18日英法讨论情况的叙述（下院辩论，第5辑，第339卷，第16栏；《文件，1938年》，ii.281）。

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09页。

见《概览，1938年》，第8卷，第1编，第4节（c）。

诺埃尔，前引书，第217页。但是波兰的反对党相信，如果法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会被迫这样做；见纳米埃尔：《外文序曲》，第447页注。波兰白皮书关于慕尼黑危机的唯一内容就是希特勒在纽伦堡和体育宫演说的节录。参阅同上书，第33页。

博内：《出使华盛顿》，第256—257页。

见《概览，1938年》，ii.132—134；参阅诺埃尔：《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22页。

俄国，但决不与俄国合作去反对德国，这和捷克斯洛伐克同这两国的关系正好相反。

波兰本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只限于切欣。但是它支持南边的匈牙利，而匈牙利要想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欲望仅次于德国。波兰还支持罗马尼亚，因为罗马尼亚介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之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务关系重大。波兰与罗马尼亚有共同边界，与匈牙利的共同边界还有待产生。在波兰的中立集团计划中，争取波兰与匈牙利接壤是现实和成就的小核心，其部分目的是扩大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屏障。实现的办法便是匈牙利扩大其边界，恢复它昔日在喀尔巴阡山脊一度有过的边界，那就要把它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修改和约的要求全部实现，不仅要和同民族统一主义的马扎尔人再度合并，而且还要把卢西尼亚甚至连斯洛伐克也都包括在内。对波兰来说，它所注意的只是要消灭作为潜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中心的卢西尼亚，如果该省为匈牙利收复，就可以凭后者去根除隐患。但是这就意味着小协约国的瓦解，意味着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也就不会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曾谋求放弃它对南斯拉夫的要求以换取后者的保证中立，它也曾谋求墨索里尼保证进攻南斯拉夫，如果后者袭击匈牙利的话。看来，以上两项正式保证它一项也没有得到。斯托亚迪诺维奇是谨慎的，他在1938年1月访问柏林时对希特勒，以及后来对法国272人，他都重申南斯拉夫对小协约国承担的义务。德奥合并大概使南斯拉夫的政策有几分倾向轴心国。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整个夏季点燃并煽起时，南斯拉夫告诉意大利人说，南斯拉夫不干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冲突，如果匈牙利让德国率先去发动侵略，或者表面上好象是捷克斯洛伐克挑起的。意大利也不表态：如果南斯拉夫与轴心国关系良好，南斯拉夫不会去进攻匈牙利。因为意大利正想把南斯拉夫拉进罗马集团，甚至想悄悄把意大利的势力向北一直延伸到华沙。墨索里尼于1938年9月18日在的里雅斯特的演说第一次公开把苏台德区的争端扩大到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和波兰少数民族，并于危机高潮时在他巡视意大利北方所发表的演说中，大肆炫耀地支持这些附带要求。在小协约国之中，罗马尼亚是唯一同轴心国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也是唯一同俄国共同边界的国家，这就使它的政策在对待德国关系上有较大的独立性。而且它同小协约国的切身利益关系也超过捷克斯洛伐克，超过南斯拉夫，因为它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比那两个国家多。可是罗马尼亚既怕德国成为侵略国，又怕俄国成为盟

在慕尼黑会议后，波兰与德国合作的界限明确得多了。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1节（b）（5）。

1937年11月25日达兰伊和坎姚访问希特勒时，他是显然同意的。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12号。

见《概览，1938年》，ii.292—294。

《概览，1938年》，ii.293；参阅《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4号和第9号；《概览，1937年》，i.409，484—485。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1号；齐亚诺：《欧洲》，第328—329页，第359页；英译本，第213页，第233页。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2号。

同上。

见《概览，1938年》，ii.338和《文件，1938年》，ii.239—243。

国，此种双重恐惧使它的政策陷于瘫痪状态。同德国结成联盟的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不同于十七年前组成小协约国时所要对付的和约修正主义者的匈牙利了；现在的匈牙利可以领着德国军队穿过匈牙利国土直达罗马尼亚边界。俄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如果不用苏联陆军，则一定是由苏联的空军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那末罗马尼亚就会成为德国和俄国的战场，而且战争结束后苏军是否会再次退回到比萨拉比亚边界线后面去，这是没有把握的。所以，罗马尼亚对法—捷—苏联盟存在着缺口的战略链条上的这类重大问题只好支吾搪塞或到时再说了。1938年3月李维诺夫在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时说过这一类的话：“如果反侵略国家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有决心就会有办法’”；他的话被解释为俄国在必要时将侵犯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以便到达捷克斯洛伐克。但苏联的政策显然仍希273望采取集体行动。1938年9月2日，李维诺夫向法国驻莫斯科代办建议，迈斯基也向丘吉尔建议转达英国外交部，应该通过国联的行政院按照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克服罗马尼亚的犹豫不决。由于英国和法国对国际联盟和集体行动有反感，才没有让罗马尼亚蒙受不接受这个建议的坏名声。它现在可以躲在尚未完工的布科维纳—特兰西瓦尼亚铁路后面挖掘战略壕沟，这就使苏军不可能在三个星期之内赶到波希米亚前线；而在法律上，又可以凭波兰—罗马尼亚联盟的条款为依据，它必须与波兰协调其对俄国的政策。因此，波兰就用它的左手约束罗马尼亚，使它难以进行自卫，同时又用右手招呼匈牙利发动进攻。

捷克斯洛伐克的自卫抗德计划乃是假定在西方有与法国的结盟，在东方也可说有与俄国的结盟，如果同时遭到匈牙利的攻击，则也有与小协约国的更早的联盟关系。到六个月，必要时甚至还可以顶住匈牙利人，这样便能争得时间让俄国支援部队取道罗马尼亚及时到达，让法国进攻莱茵兰。法国背叛了自己承担的义务，这个计划的基础便被破坏了。希特勒于1938年6月写道：“可是，正如占领非武装区并进入奥地利一样，只有在我确信法国不会进军而英国也因此不会干预的时候，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然而以调解人自居的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法国，却不站在捷克斯洛伐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18号。

《概览，1938年》，ii.132，276—281。

1938年3月17日在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泰晤士报》，1938年3月18日）；参阅《概览，1938年》，ii.67—68；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第191页；贝洛夫，ii.122—123。李维诺夫后来明白否认有此意图（博内：《出使华盛顿》，第200页）。

《概览，1938年》，ii.278。

同上书，第279页。关于当时苏联政策的总估计，见贝洛夫，ii.163—166。

《概览，1938年》，ii.280。

博内：《出使华盛顿》，第201页，该处将第2条误引为第4年，见《概览，1920—1923年》，第504—505页所载的条约。

见格迪：《陷落的城堡》，第368页。英国军事当局的想法是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最多能支持一个月。匈牙利迫切要求在1938年4月举行德匈参谋会谈的理由之一是，匈牙利同时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会阻止俄国伞兵进入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14号。

1938年6月18日战略总指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46（388—PS，第14项）]；译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i.473，《文件，1939—1946年》，i.34，参阅《阻谋与侵略》，iii.324。

克一边去干预，反而站到德国那一边去了，它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最后通牒，从而在精神上破坏了后者抗敌的士气。9月21日发出的第一个最后通牒宣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英法的计划，即按张伯伦于9月15—16日访问贝希特斯加登的结果将苏台德区割让，英国和法国将不再过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贝奈斯接受了英法的计划，希望赢得时间收买正在沿捷克斯洛伐克边界集中军队的波兰和匈牙利。他说：“我已经作出应付各种事变的计划”。在9月21日同一天，波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波兰少数民族问题应立即按解决苏台德区德意志人的同样方式处理，同时宣布废除1925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的少数民族条约。9月22日，匈牙利为匈牙利少数民族提出了同样要求，在华沙举行了要求建立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的游行示威。

同一天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西方国家的态度因而在表面上强硬起来了，捷克斯洛伐克在9月23日宣布动员，这使捷克人暂时解除了四大国的压力，看来似乎最终有可能形成反对德国的联盟。

当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的李维诺夫在9月21日和23日两次重申苏联在国联盟约集体安全的体制内，以履行法捷条约条件，承担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9月23日，俄国警告波兰，如果波兰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它将废弃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种情况下，贝奈斯收买波兰的计划付诸实施。9月22日，他写给波兰总统莫希齐茨基一封私人信，原则上接受波兰的要求，同意立即开始进行谈判；这封信是在9月25日发出的。贝克拒绝了 this 建议，他想要使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公开的屈辱。贝奈斯后来说，这是他不顾俄国的支持而向德国投降的“最后的决定性原因”。

75 在波兰依旧采取粗暴和掠夺性的政策的同时，小协约国却在看风使舵。它们的目的是保持中立，很明显，在西方大国表态之前，也就是说在大战开始之前，它们也决不表态。9月23日，罗马尼亚驻罗马公使告知齐亚诺，罗马尼亚正在拒绝并将继续拒绝苏联关于苏军自由假道的要求；他说罗马尼亚赞成将捷克斯洛伐克纯马扎尔人的那部分归还给匈牙利，不过它反对匈牙利关于斯洛伐克的要求；如果俄国和波兰交战，它将支持波兰，它和波兰的联盟将被置于它对布拉格所承担的义务之上。9月24日，南斯拉夫政府禁止公众集会，企图取缔不仅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反对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群众游行。第二天，斯托亚迪诺维奇在原则上同意罗马尼亚提出的一项建议，由南罗两国向匈牙利政府发表口头联合声明，两国可以同意捷—匈边界线作有利于匈牙利的修改，但仅限于马扎尔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它们对匈牙利兼并斯洛伐克则不能置之不顾。在柏林要求下，这一步骤并未实行；这一步骤的

《概览，1938年》，ii.355—363。

1938年9月22日的广播。《文件，1938年》，ii.226。

《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4节(c)。波兰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照会载L.B.纳米埃尔：《衰落中的欧洲：对1936—1940年瓦解的研究》(European Decay: a Study in Disintegration, 1936—1940)，伦敦，麦克米伦，1950年版，第286—287页。

《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5节(b)。

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要求，见《概览，1938年》，ii.376—391。

《文件，1938年》，ii.224—225，233—234。关于苏联政府表示愿意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是否超出其条约义务的讨论，见《概览，1938年》，ii.369—

计划是小协约国的最后挣扎。

大国的专断决定是压倒一切的。9月29日，两个轴心国家和两个西方国家的首脑在慕尼黑会见，他们商定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瓜分的方案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相差无几。当天晚上通过第二次英法最后通牒，以不寻常的蛮横态度，将这个方案强加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如果波兰人处于这样的绝境，被所有的盟国所遗弃，面临边界各方面的敌人，他们可能还要战斗下去。捷克人则比较审慎小心，能够克制，他们屈服了。贝奈斯的决定是以冷静的估计为基础的，不但估计到捷克斯洛伐克敌人的实力，而且也估计到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因276为对陆军和农民党——主要的政党——的领导人说来，苏台德区的丧失同借盟军之名的红军干涉相比之下，前者还只是一个较小的祸害。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无视慕尼黑国家而进行武装抵抗，它势必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这样就会使它在这场布尔什维克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思想意识斗争中同苏联结合在一起，正好应验了以纳粹德国为首所宣传的那一套说法，也许就会断送西方国家最后的任何援助。尽管捷克人在传统上有着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然而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如普什米塞家族和卢森堡王朝的波希米亚一样）是一个西方式国家而不是拜占庭式国家，1918年它是在西方国家的赞助下重新建国的。西方国家已经背弃了它，俄国单独提供援助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却是危险的，全国一半人民拒绝这种援助；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只能被迫寄最后希望于小国，希望由于顺从它的邻国而赢得一个差可忍受的中立。但是人们总会去推测，如果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抵抗，是不是会加速大国之间的战争爆发，这些大国又是不是会采取不同的联合。——慕尼黑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它预示了这次大战的许多重要后果。慕尼黑会议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缺席者：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俄国，每一个国家的缺席都有其各不相同的重要意义。这个解决方案是由于一种倾向而产生，即在欧洲建立一个大国指导中心，任意处置小国的领土及其利益，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在1933年就曾共同制止的。这次会议标志着意大利要求成为一个大国的不真实的鼎盛时期，以墨索里尼为欧洲的调解人与和平缔造者；同时也标志着波兰妄想成为大国的告终，对贝克的仗势欺人的政策的初步评说便是没有请他参加慕尼黑会议。俄国也没有被邀请参加，² 它这一次又被排斥在东欧之外虽然只不过延续了十一个月，却大大加强了它对西方国家的敌视，而且还影响它以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慕尼黑协定不仅标志着法国联盟体系的解体，也标志着这种联盟体系作为其最近表现的法国在东欧的历史悠久的影响消失。法国在东欧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四个世纪以前法兰西斯一世和奥斯曼帝国在帕维亚之后建立的协议，甚至

“只靠俄国的支持作战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引起内战”（惠勒-贝内特：《慕尼黑》，第175页；参阅第81—82页，第127—128页）。总理、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都是农民党人。有证据说明总理霍扎是斯洛伐克人，他在危机中一直推行与贝奈斯有分歧的政策。见同上书，第55页注，第121—122页，以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3辑，i.519—520，524。

参考西罗维1938年9月30日的广播（《概览，1938年》，ii.446—447）；《文件，1938年》，ii.326—328。“意大利观察家特别喜欢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两个民主大国的领导人在最后时刻曾向墨索里尼先生呼吁，要求他挽救局势，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终于认识到意大利作为组织欧洲和平的基石的价值。”1938年9月30日《泰晤士报》罗马记者通讯。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3编，第3节（c）。

还可以追溯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安茹王朝和伯罗奔尼撒人，以及这个王朝对拜占庭的图谋，还可追溯到教皇的政策变革，在十三世纪使圣路易的兄弟登上西西里的王位。慕尼黑协定标志着英国在东欧的影响——除希腊和土耳其的半岛前哨基地外，也开始趋向结束；1939 年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提供的保证未能挽回英国的影响，最后于 1945 年在雅尔塔签订的并无成效的协定则使英国在东欧的影响完全消失。慕尼黑协定也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欧洲中心部分唯一的西方议会制国家的完蛋。它被西方国家背弃了，沦为纳粹德国的卫星国，以后成为它的保护国，十年以后又走上另一条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国家，此种依附地位正是它在 1938 年 9 月拒绝接受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进行得又顺利又迅速。德国占领苏台德区是在 10 月 1 日至 10 月之间进行的；设在柏林的由四个慕尼黑国家和名义上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国际委员会于 10 月 13 日决定在割让区不再举行公民投票，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不过是为这场交易蒙上一层遮羞布，它对德国的要求总是惟命是从的。11 月 20 日的德—捷议定书便划定了最后的边界线。边界线的划分大致上是按照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主要以民族考虑为依据，但也给德国以战略上的便利，使捷克的残余各州听凭德国摆布，波希米亚就这样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分割，就在亨莱因的追随者欢庆他们与一个他们及其祖先从未隶属过的帝国团聚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南北边界却都在向境内缩进。历史又倒退到 1919—1920 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领土又从它手中被夺走了。当波兰看清捷克斯洛伐克已被遗弃而屈服时，便立即于 9 月 30 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切欣区，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在 1920 年乘波兰无力兼顾时吞并切欣区的历史重演。捷克斯洛伐克于 10 月 1 日让步，在 10 月 2 日至 12 日之间波兰占领的那一块领土，据捷克估计，那儿的捷克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五，波兰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五。

匈牙利于 10 月 1 日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关于举行修改边界的谈判。自 10 月 9 日至 13 日由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举行的谈判是在科马尔诺（科马罗姆）进行的，因匈牙利人提出的要求过高而告破裂。匈牙利在 10 月 12 日便已采取军事行动，在东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小规模非正规

安茹的查理（1226—1285 年）于 1266 年经克力门四世授予西西里作为教廷的采邑。他统治这个统一的王国直到 1282 年；在西西里岛起义后，他和他的家族所统治的只限于那不勒斯一地，直至 1435 年，从 1267 至 1377 年，他们是阿黑亚公国的封建主或统治者，从 1313 到 1373 年是罗马尼亚名义上的皇帝。他的家族自 1308 至 1387 年统治匈牙利，1372 至 1398 年统治波兰。

“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德国一切当前的需要。协定付诸实施时，凡有争议的问题都取决于德国的利益”，哈利法克斯 1940 年 1 月在利兹的演说〔哈利法克斯子爵：《外交政策演说集》（Viscount Halifax: Speeches on Foreign Polic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0 年版，第 347 页〕。关于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见《概览，1938 年》，第 3 卷，第 1 编，第 2 节。

这一分界线把十分之一的捷克人（七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七人）及二百八十万六千六百三十八个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转归德国。

见《概览，1938 年》，第 3 卷，第 1 编，第 4 节（c）。最后通牒载纳米埃尔：《衰落中的欧洲》，第 297—300 页，

十二万三千捷克人，七万七千波兰人，两万德意志人，其他民族一万一千人，大部分具有波兰人国籍。《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3 辑，iii.225。

见《概览，1938 年》，第 3 卷，第 1 编，第 5 节（C）。

战争,这又是1919年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的重演。同1919年一样,冲突并不是由于两个小国之间的直接问题而要打出一个结果来,两个小国之一在军事上占优势,另一个则有大的支持,取得胜利的乃是后者。在经过进一步毫无结果的直接谈判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将争端提请德国和意大利仲裁,因此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于11月2日在维也纳的贝尔维德雷官划出了新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线,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为了矫正过去把百分之六的马扎尔民族并入捷克斯洛伐克的不公正行为,现在将百分之二十的斯洛伐克民族并入了匈牙利。在维也纳和在慕尼黑一样,都有重要的缺席者,最显著的缺席者是慕尼黑会议的两个西方国家,这和慕尼黑协定附件的规定是相违背的,附件规定由四国来解决波兰和匈牙利提出的要求。现在将英、法排除于东欧之外是在外交上第一次出现。匈牙利曾要求波兰和德国、意大利一同作为仲裁者,捷克斯洛伐克则提出,如果有波兰,也应有罗马尼亚作为仲裁者。因此小国又一次被排除在外,而波兰也又一次成为小国之一。维也纳议定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要建立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和1919年一样,这再一次意味着要处理卢西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目的是由匈牙利恢复昔日的喀尔巴阡山边界,并作有利于波兰的小小修正,它们两国得到意大利的支持,罗马集团的政策和波兰集团的政策携起手来了。波兰想拉罗马尼亚一起瓜分卢西尼亚,可是罗马尼亚却有顾虑,深怕匈牙利的修改和约的主张下一回便要轮到特兰西瓦尼亚了,这是当初建立小协约国的共同利益的最后一次消极表现。卫星国的加强联合又一次出现了相互矛盾:对德国说来,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可以加强一个从属于德国政策的反苏集团,但这一集团的主要动机或许也是反德的,因为它拦住了德国向东发展的道路。维也纳会议暴露了轴心国家内部的潜在矛盾,意大利支持匈牙利,德国则支持斯洛伐克,但德国具有更大的发言权。维也纳议定书对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宰割较之分割波希米亚更武断,但是还保存了一部分残余的卢西尼亚,正如它依然是其一部分的剩余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作为德国实现其目的的工具。

见A·亨德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击记》,第248—254页。非正规战争并不因维也纳议定书而结束,它一直进行到1939年1月,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同匈牙利的边界上,而且在它同波兰的边界上也在进行(里普卡:《慕尼黑》,第506—508页)。关于1919年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战争,见《和会史》,i.354—355; iv.160; F·J·冯德拉切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1918—1935年》(F·J·Vondracek: The Foreign Policy of Czechoslovakia, 1918—1935),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第94—40页。

关于此时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劣势,见关于希特勒和恰基于1939年1月16日在柏林会谈的报道,当时恰基承认,匈牙利如果没有德国的援助,在军事上是无能为力的。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5号。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5节(f)。

“慕尼黑在中欧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中欧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自那一回起便由罗马—柏林轴心国家掌握了,这一点连西方国家自己也承认”,恰基于1938年12月21日对《意大利人民报》驻布达佩斯记者的谈话。《文件,1938年》,i.252。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5节(d)。

见迈克尔·温奇:《一天的共和国》(Michael Winch: Republic for a Day),伦敦,黑尔,1939年版,第228页;里普卡:《慕尼黑》,第499页;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37页。

（十一）从慕尼黑和维也纳到布拉格

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开始就是德国的傀儡国。它的天然防线和建筑的防御工事都交出去了，在战略上和经济上它都无法维持，它的生存只能听命于德国，而德国从一开始就准备全部并吞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利用人民群众对西方国家的愤怒情绪同轴心国合作。10月5日，280贝奈斯辞去了总统职务并于10月22日离国出走。紧接着慕尼黑事件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出现了两种事态发展，都是在德国鼓励下促成的具有煽动性的急进主义。第一种是国家联邦化，第二种是部分建立了法西斯体制。在德国控制下，捷克斯洛伐克分解成为各该组成的民族，它们迄今潜在而受到抑制的自治倾向现在实现了。10月6日成立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10月11日成立了卢西尼亚的自治政府，后者的古老首府乌日戈罗德已割让给匈牙利，现在只好在穷村胡斯特建立新首府。11月17日通过了全国新宪法，国名由捷克斯洛伐克改为捷克—斯洛伐克，11月21日又正式制定了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自治法规。捷克各州的宪法也有了变革：各政党合并为两个集团，其余一律解散，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可是两个新的自治政府既无独立基础，又没有独立传统，所以德国对它们的影响远胜于布拉格。斯洛伐克一向有教权和专制的传统，所以在斯洛伐克民粹党及其按纳粹党党卫队模式组织的赫林卡卫队的控制下，建立了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斯洛伐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纳粹的模范卫星国，连匈牙利也黯然失色，德意志少数民族领袖卡马辛成为德意志事务部长，实际上监督政府的全部工作。卢西尼亚由于过分落后，无法实行有效的自治，担任总理的年长的东正教教士沃洛辛和继贝奈斯之后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年老的哈查法官一样，对于担任这样的重要职务都缺乏准备；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鼓舞下，建立了一个半法西斯主义的政权，采取反犹太人的措施，并成立了一个效法赫林卡卫队的冲锋队组织，名叫“西奇”；但是卢西尼亚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德国进一步扩张的前哨阵地。

库隆德在1938年12月写道：“由于命运的不可思议的颠倒，为了遏制德国的扩张所建立的堡垒捷克斯洛伐克，今天却成了德国用以突破东方大门的撞锤。”通过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征服，德国便从西面和北面包围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3节。希特勒1938年10月21日的秘密指示规定以“清除捷克国家的剩余部分”作为德国军队仅次于保卫德国边界的目标。“必须能够随时在捷克国家倾向于执行敌视德国的政策时粉碎它的剩余部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80(136—c)；《文件，1939—1946年》，i.38；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7—948。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6节(a)。

同上书，(b)。

同上书，(c)。

本书仍继续使用不带连字号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名。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6节(d)。

同上书，(b)。

同上书，(c)。

1938年12月15日致博内的电文[法国外交部：《法国黄皮书，1938—1939年外交文件》(Le Livre jaune françai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1938—1939)，以下简称《法国黄皮书》，巴黎，国家印刷局，1939年版，第33号]；参阅纳米埃尔：《外交序曲》，第37页。

了匈牙利，使它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并给德国了，此种屈从地位可不是在领土方面占一些小便宜所能补偿的。波兰所处的新地位更引人注意。波兰仅次于捷克斯洛伐克本身，是慕尼黑和贝尔维德雷议定书的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受害者，它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它被排除于上两次会议之外在威望上所受到的打击。德奥合并从三方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变成了德国卫星国的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同样又从三方面包围了波兰，使它也处于贝克所不曾预见到的战略上的不利地位。慕尼黑会议以后三个多星期，新主题的第一个调子奏起来了，10月24日里宾特洛甫召见波兰驻柏林大使利普斯基，向他提出要求，把但泽割让给德国，并要求一条通过波兰走廊而不受波兰管辖的公路和铁路。波兰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只能紧跟着德国的轨道走了；它的愚蠢就在于没有早在自己的领土完整尚未成为问题时就避免这一危险，这时它才感到与另一个被排除于慕尼黑和维也纳会议之外的主要大国有共同利益，因此也倾向东方了。为了驳斥波兰将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报道，波兰和俄国于1938年11月26日发表了联合公报，重申它们于1932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最明显的威胁并非来自西部边界的压力，而是来自自治的卢西尼亚，从慕尼黑会议到1939年3月，卢西尼亚已成为德国谋求破坏东欧残余结构的支点。德国在卢西尼亚策动了一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落后的小省本是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桥梁，又即将成为匈牙利和波兰之间的短时期内的桥梁，业已上升为民族统一主义的中心，一个乌克兰的皮埃蒙特，一心想把它的吸引力传播到远远超越于它自己的小小边境之外，传播到波兰东部的被压迫的乌克兰人中间去，传播到苏维埃乌克兰的大部分乌克兰民族中间去。从1938年10月起，德国报纸将这个地区称作喀尔巴阡-乌克兰，12月31日起又正式改用这一名称。在这里历史的车轮又后退了，但不是倒退到1919年的混战年代，而是倒退到前一年的德国势力短暂的鼎盛时代，就是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与德国西线崩溃之间的时期，那时一个自治的附庸乌克兰成了德军向东一直推进到顿河流域的康庄大道。十八年来波兰一直预料到并且害怕来自东方俄罗斯的民族统一主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1节(b)(5)。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德国选中的下一个受害者并不是波兰，而是立陶宛。1938年10月21日指示所规定的德国军队的任务是：保护德国边界并肃清捷克国家的剩余部分之后就夺取美美尔[《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77—478(136—C)；译载《文件，1939—1946年》i.38]；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7。一个月之后，即11月24日，凯特尔签署了一项补充指示，加上占领但泽作为另一项任务：“假定是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势，闪电式地占领但泽，而不是对波兰作战。”《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81—482(137—C)；译载《文件，1939—1946年》，i.97；参阅《阴谋与侵略》，vi.949。

关于1939年1月至3月喀尔巴阡-乌克兰的第一手报道，见温奇：《一天的共和国》（纳米埃尔：《历史的边缘》一书第181—185页中又作了评述）和A.亨德森：《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击记》，第274—287页。

里普卡：《慕尼黑》，第243页，显然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议会的一项法令。更改名称由卢西尼亚政府于1939年1月2日以法令确认或施行，虽然喀尔巴阡-俄罗斯仍是一个可以选用的名称。《泰晤士报》，1939年1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1938年11月19日。

里普卡：《慕尼黑》，第325页。同盟国于1918年2月1日承认乌克兰是独立的主权国家；2月8日，由于第一个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它成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保护国；3月1日，德国占领基辅，恢复了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乌克兰政府；5月中旬，德国和奥匈帝国完成了对乌克兰的占领，直到1918年11月11日西线停战后，德国才从乌克兰撤退。见艾伦：《乌克兰》，第286—306页。

义将影响它的乌克兰居民，现在看来这种影响却来自南方的德国。从这里它危及桑多米埃什周围的工业储备库，那是背靠喀尔巴阡山的安全中心区或三角区，当初所以选定并发展这一带地区正是因为那儿既远离德国的边界，同样也远离俄国的边界。1938年12月8日，波兰的乌克兰民族民主党要求取得当时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乌克兰所拥有的那种自治权，即要有独立的军队和参与外交关系的权力。曾经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外包围和国内分裂，这时也结合在一起同样威胁着波兰，而更为可怕的是国内分裂。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德国按照民族原则修改和约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那就是帝国主义了。不仅如此，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也煽动了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小国、少数民族和一些小民族。民族原则第一次被用之于瓦解继承国的新目的，而那些继承国当初也都是根据民族原则而缔造的。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象波兰的乌克兰人一样，也被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自治 283 美景所吸引。德国要求修改和约的主张第一次附带地使一个要求修改和约的小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由于匈牙利的领土扩张，保加利亚的欲望也更强烈了。这些运动为德国的政策提供了多种机会；可是正当德国集中力量最后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并开始对波兰施加压力时，它的目标却在于全面巩固它在东南欧的统治地位而不欲挑起新的分歧。正如在1936年那样，当德国首次使东欧与西方分离时，它对这一地区的开拓是以沙赫特作为经济部长出访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各国首都开始的，同样，在1938年的最后季度，沙赫特的继承者丰克也以同样的旅程庆祝并加强该地区的德国优势。1938年10月28日，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会见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时，在列举“要求和轴心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中，不仅是匈牙利，而且还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然而德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并不是毫无阻力的，在那年年终和1939年初，多瑙河流域到处出现了抗拒的微波波动。这些国家尽管在外交上仍屈从于德国，却企图在内部事务上取得更多的管理权和独立权。11月和12月，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德国贸易代表团未能得到它想谋求的长期贸易协定，从4月起就被监禁的铁卫团领袖科德里亚努于11月30日被一星期前才自贝希特斯加登访问归来的卡罗尔杀害了。希特勒大为震怒，加芬库则以他特有的自我表演方式，深信他之所以在12月23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是为了应付德国可能沿多瑙河发动一场“惩戒性征讨”的局势。在整个冬天，罗马尼亚是最积极主张联合的东欧国家，因为它尚未与德国接壤，尚未沦于附属地位，它也不象希腊和土耳其那样由于距离危险较远而宁愿让其他国家去采取主动。但是联合起来对抗德国可不象联合起来对抗保加利亚那么容易，加芬库频繁出访外国首都所取得的唯一具体结果，就是巴尔干 284 协约集团于1939年2月22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再一次肯定现有的边

1939年1月15日，克罗地亚反对派在萨格勒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按照自决原则解决克罗地亚问题。

《概览，1936年》，第529页注。

《概览，1938年》，i.50—55。

《概览，1938年》，第1卷，第55—56页。

见格里戈尔·加芬库：《欧洲的末日：1939年的一次外交访问》（Gri-goreGafencu：

Lesderniersjoursdel'Europe：unVoyagediplomati-queen1939），修订版[以下简称加芬库：《末日》]，巴黎，埃格洛夫，1947年版，第39页[英译本，弗莱彻·艾伦：《欧洲的末日》，伦敦，马勒，1947年版]；参阅《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3节。

境，反对任何修改边界的主张。___同南斯拉夫结盟对意大利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墨索里尼于1939年1月8日明确地把吞并阿尔巴尼亚列入了他的扩张计划，但是要依靠南斯拉夫的支持，而南斯拉夫在征服萨洛尼卡方面则要得到意大利的赞助。从1月18日至23日，齐亚诺访问了南斯拉夫，与斯托亚迪诺维奇举行会谈。应德国的要求，齐亚诺问南斯拉夫是否愿意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为了意大利自己的利益，他建议瓜分阿尔巴尼亚；斯托亚迪诺维奇对两个建议都作了积极的回答。但在1938年12月11日的大选中，斯托亚迪诺维奇实际上是被击败了：独裁制大有助于把克罗地亚的自治运动转变成连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支持的南斯拉夫全国反对派。1939年2月4日，斯托亚迪诺维奇被迫辞职，轴心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影响动摇了。齐亚诺写道：“在斯托亚迪诺维奇去职以后，南斯拉夫这张牌对我们已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价值。”墨索里尼这时决定，“如果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政策继续下去，就与南斯拉夫共同瓜分阿尔巴尼亚，否则就抛开南斯拉夫，必要时甚至反对南斯拉夫，以占领阿尔巴尼亚。”___与德国关系最不明确的卫星国是匈牙利。匈牙利为贝尔维德雷议定书没有使它得到卢西尼亚而感到强烈不满，它认为是德国的卑劣行动使它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它以不断地在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边界发动恐怖袭击来发泄它的不满情绪，并在政治演说中和报纸上批评德国。这样做必然也激怒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12月，被希特勒视为德国敌人的匈牙利外交部长坎姚由恰基取代：1939年1月13日，恰基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争论得很激烈的会晤，不过在告别时他得到了希特勒不再禁止匈牙利占领卢西尼亚的保证。___在他会见希特勒以前三天，恰基宣布匈牙利已接受285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的邀请；俄国便于2月2日与匈牙利断绝关系，理由是匈牙利这时实际上已丧失了独立性。罗马尼亚为此很高兴，因为对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的三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又进一步疏远了。2月14日，伊姆雷迪由于他对德国的卑躬屈膝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而被迫辞职；在这个反犹太的政治人物的世系上发现有犹太人血液的这一事件，说明了那种祸福无常但又难以避免的命运，而他的国家正在对它作战是徒劳的。

捷列基继他之后担任总理，不过恰基仍留任外长。匈牙利在2月24日正

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8日和15日。

同上书，1939年1月17日积19日；齐亚诺：《欧洲》，第407—412页；英译本第268—272页。又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4编，第8节。

见H·塞顿·沃森：《东欧》，第236—237页。“宣布的最后结果是政府得票一百六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三票，统一反对派得票一百三十六万四千五百二十四票，不要忘记这是政府估计的票数”（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125页）。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2月7日。可是里宾特洛甫满不在乎，他相信原南斯拉夫驻柏林公使这时被提升为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的青察尔·马尔科维奇是亲轴心国的[同上书，1939年2月6日：德国外交部：《关于同南斯拉夫与希腊冲突的文件》（DokumentezumKonfliktmitJugoaiawienandGriechenland），柏林，德意志出版社，1941年版，第34号]。

参阅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1月10日。

1938年12月19日至22日齐亚诺对布达佩斯的访问为此作了准备。

《曼彻斯特卫报》，1939年2月3日。俄国对缔约国中的大国和小国区别对待，日本恰当地受托代表匈牙利在苏联的利益，日本是邀请匈牙利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从而引起俄匈断交的三国之一（同上，1939年2月9日）。

式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公约，它是第四个签署国，是缔约国中的第一个小国。同一天捷列基解散了匈牙利纳粹党，他希望将内政和对外政策分别处理。当时看来，德国之所以决定在 3 月占领布拉格，部分原因似乎“是为了要摧毁当时德国东南方的大部分邻邦小国所表现的不驯服”。²⁸⁶ 罗马尼亚长期来希望对多瑙河口取得无限制的主权，就象土耳其于 1936 年取得对黑海海峡的无限制主权一样。早在 1925 年，罗马尼亚就谋求废除多瑙河欧洲委员会，而代之以国际委员会。由于土耳其的外交在蒙特勒会议上取得成功，罗马尼亚的不满更加深了。此外，俄国从 1925 年开始，德国从 1927 年开始，都一直要求派代表参加欧洲委员会。1936 年 11 月，德国废弃了几尔赛和约中有关国际水道的条款，并退出国际河流委员会，这对多瑙河的国际体制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罗马尼亚反对欧洲委员会的活动在 1939 年 8 月的锡纳亚会议上达到了目的，那时欧洲委员会放弃了与罗马尼亚主权不相容的一切权力。1939 年 3 月 1 日，德国终于被接纳参加欧洲委员会。²⁸⁶ 但是 1856 年的体制现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罗马尼亚一向致力于摧毁对它本身独立的欧洲保证：现在为德国和俄国之间进行控制多瑙河口的斗争已经铺平了道路。

《概览，1925 年》，ii.165—166，《概览，1937 年》，i.372 注；让·迪韦尔努瓦：《多瑙河的国际体制》（Jean Duvernoy：Leregime international du Danube），巴黎，佩东，1941 年版，第 130—136 页。

奥斯伯特·曼斯：《国际河流和运河运输》（Sir Osbert Mance：International River and Canal Transport），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4 年版，第 67 页。

《概览，1937 年》，i.368—380；曼斯，前引书，第 55 页。

迪韦尔努瓦，前引书，第 141—143 页。

（十二）第二次瓜分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后来说过：“对我说来，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不能满足于得到苏台德—德意志人领土。”慕尼黑会议划定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界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无法维持生存的，对德国来说，也不会是一直可以接受的。一个捷克的突出部仍在破坏它的东部边界线，在战略上还需要拉直从西里西亚的南端到厄斯特马克的东北端之间的那一条线。1939年1月16日，希特勒告诉恰基说，从10月到3月之间在欧洲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是指明德国准备最后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月，前几年德国就在那个时候重新实行征兵制，重新武装莱茵兰，又征服了奥地利。1938—1939年的冬天，德国一直在准备完成它在慕尼黑只实现了一半的目标。军事和经济计划均已完备，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德国第五纵队已高度组织起来，在外交上对布拉格政府又不断施加压力。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是计划通过国家的瓦解来实现的。到1939年初，这个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已经不再在一个共同的结构内活动，而是各自在国际上存在。卢西尼亚作为纳粹乌克兰的宣传鼓动基地，正在恶化布拉格同波兰和匈牙利的关系。纳粹对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利用正为德国进行干涉准备机会，斯洛伐克的极端分子即将在第二幕中扮演的角色正是亨莱因的党在第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1939年2月，他们为斯洛伐克独立而进行的鼓动达到了最高潮。布拉格政府必须作出决定，究287竟是默认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瓦解，还是采取可能突然引起危机的行动。3月6日，布拉格政府对卢西尼亚进行干预，3月9日对斯洛伐克进行干预，将最积极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部长解职。这些行动是布拉格的政府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境内确立其权威的最后尝试。

现在德国进行干涉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纳粹强大的压力下，在他们的国家可能被移交给匈牙利的威胁下，斯洛伐克的议会在3月14日投票决定斯洛伐克独立。布拉迪斯拉发的人民以冷漠和悲观的态度接受了独立宣告。斯洛伐克人同捷克人的分离就这样凭德国的暴力来贯彻，丝毫不能使他们表示自发的行为，这是他们对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共和国的最后敬意。同一天晚上，胡斯特的政府也采取同样行动，宣布喀尔巴阡—乌克兰独立。头一天午夜，卢西尼亚人给希特勒发了一个电报，要求他接受喀尔巴阡—乌克兰为德国的保护国，可是并未得到回电。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卢西尼亚省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即喀尔巴阡—乌克兰共和国。它

希特勒与其总司令们举行的会议，1939年11月23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29(789—PS)；译载《文件，1939—1946年》，i.529；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73。

“从地理上看情况已很清楚，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被德国包围的，德国绝不会容许在它本身的领土内有不稳定的温床”，希特勒和蒂索的会谈记录，1939年3月13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151(2802—PS)；详载《文件，1939—1946年》，i.48；参阅《阴谋与侵略》，v.444。

见《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2卷（匈牙利），第25号，第79页；《文件，1939—1946年》，i.194。

《法国黄皮书》，第65号。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1编，第10节(e)。

同上书，(b)。

摆脱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束缚，但尚未被匈牙利再吸收；然而它作为所希望的一个自由乌克兰民族的最后残余的化身，似乎也只是象远在喀尔巴阡山另一边的卢西尼亚人的加利西亚公国的依稀重现，那个公国在十三世纪下半叶的蒙古人入侵浪潮中，曾作为古老的基辅俄罗斯世界的最后代表。

3月14日晚上，希特勒把哈恰召到柏林并在次日清晨举行会晤，这是最粗暴、最臭名昭著而又最足以证明希特勒迫使一个外国政治家服从他的一次会晤。他以空军将立刻毁灭布拉格相恫吓，强迫哈恰签署一项“将捷克人民及其国家的命运置于德意志帝国元首之手”的协议。3月15日黎明，德军从各个方向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在大雪纷飞下迅速推进；希特勒在给德国人民的布告中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复存在。”当天晚上，在实行宵禁后街道上已寂无行人时他进入了布拉格，在赫拉德昌尼古堡睡了一晚。3月16日，他从那里发出兼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将它们作为保护国的法令。迄至那时为止，在欧洲除不时有过小型国家如安道尔和摩纳哥、圣马力诺和爱奥尼亚群岛、克拉科夫共和国以及但泽自由市以外，还从未有过保护制国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即便是在受哈布斯堡王朝奴役时，在法律上也还是一个王国，如此古老和大块的土地如今所处的地位却降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和原始民族进行扩张的主要法律工具，这表明西方社会的解体较之巴尔干化——它早已从东方基督教世界侵染着西方社会——又前进了一步，即殖民化。西方强国就不再垄断拥有帝国领地的威望了，因为德国已在欧洲取得了殖民地和保护国。

当斯洛伐克在3月14日宣告独立时，匈牙利立即向布拉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捷克军队撤出卢西尼亚。哈恰正在从柏林返回途中时，捷克政府实质上已接受了最后通牒，同一天晚上匈牙利军队小心翼翼地开始侵入卢西尼亚。以后的两天，匈军由于遭到乌克兰游击队的抵抗，只得在大风雪中沿着山谷缓慢地前进。沃洛辛将国家献给了罗马尼亚，本人也逃到那里去了。可是罗马尼亚却恐慌失措，它进行了动员，预期匈牙利在入侵卢西尼亚之后会入侵特兰西瓦尼亚，还害怕保加利亚在南线采取行动。它自己的国家结构看来正处于危险中，所以只占领了卢西尼亚边界上的几个村镇就感到满足了。3月16日，匈牙利人占领胡斯特并到达了波兰边界，捷列基便在布达佩斯宣布吞并卢西尼亚。占领于3月19日正式完成，不过战斗还继续进行了几天。匈牙利再一次伸展到喀尔巴阡山的山巅，实现了和波兰的共同边界。

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一样，完全的独立只有一天，但它的命运并不是被吞并。3月15日，希特勒离开柏林前往布拉格时，蒂索打电报乞求他将斯洛伐克置于他的保护之下；3月16日希特勒正式复电同意。从那天起，德军开进斯洛伐克，占领了全部战略要地。保护条约是于3月18日在维也纳和3月23日在柏林签字的，根据条约德国实际上已接管了斯洛伐克的国防和对外关系。在柏林又增加一项秘密议定书，使斯洛伐克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成为德国的保护国，在两国之间实际上建立了关税同盟。然而德国对斯洛伐克的保护是临时性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它并未制止匈牙利在3月23日侵入斯洛伐克的东南部，当时德国的注意力正集中于夺取美美尔并占领翁谷铁路线和一些城镇。匈牙利人争辩说，他们入侵是在德国和斯洛伐克的条约在柏林签字前几小时，不过此后的战斗却一直持续到那个月的月底。

希特勒为1939年3月的收获所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它的乌克兰计划。他在3月25日告诉勃劳希契，他不再抱短期内设立乌克兰国家的打算。这本是德

俄改善关系的必要条件，希特勒不可能看不到他在这方面的利益。乌克兰皮埃蒙特的消失去除了自慕尼黑事件以来东欧政治上最干扰人心和最无法估量的因素。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意味着放弃实际上曾是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共同边界，德国当时作出这一点让步是表示它尊重匈牙利和波兰的愿望。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平静下来的时候，权力的新模式已能看得清楚了，从个别到全体的小国都发现自己的地位大为削弱。匈牙利由于收获领土而使自己沦为奴隶，它的西部和北部同德国接壤的边界现在都已处于附庸地位。罗马尼亚受到德国和匈牙利联在一起的威胁，较之过去德国控制卢西尼亚走廊时更为严重。马扎尔帝国主义在北方一带抹马厉兵，接着也许就要受怂恿而转向东方了。因布拉格陷落而引起了情绪上的反应，罗马尼亚便于3月23日同德国签订了一项它在上年12月曾拒不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这就使罗马尼亚在经济上成为德国的附庸，但也可能暗示着德国对它边界的保证。南斯拉夫也感到了民族解体的预兆。塞尔维亚人的反应较之东欧任何其他民族更突出地积极；当时在贝尔格莱德要求建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民族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增强。但在克罗地亚，对于在德国操纵下的斯洛伐克自治模式还有不同的想法，而意大利人则忧心忡忡地看到德国的阴影逐渐向阜姆、的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迫近了。

波兰是最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自卢西尼亚的乌克兰危险的消失完全被德国在斯洛伐克的出现所抵销，后者是更为露骨、更为强大的威胁。

1938年秋季和1939年春季捷克冲突的不流血解决以及兼并斯洛伐克，使大德意志的领土得以圆满调整，因而此时有可能根据或多或少有利的战略前提来考虑波兰问题。

德国于3月23日夺取立陶宛的美美尔，这是1939年3月强暴事件的尾声，也可以从反面说明并强调波兰的被包围。“此后德国人对立陶宛十分‘宽宏大量’，希望立陶宛能由于维尔纳而成为它反对波兰的盟国，成为它北翼的另一个斯洛伐克。”——美国驻柏林的武官在一份报告中敏锐地描绘了新的形势：

德国由于占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和战略上所取得的利益是巨大的。从战略上看，德国已置身于波兰和匈牙利之间，明确而又永久地防止了波匈反对它的联合行动。而且，如果德国要对波兰采取行动，它现在已控制了通往克拉科夫、林堡和俄国乌克兰的大门。它现在所处的新地位可以把它的军队部署在波兰的三个方面，可以从容不迫地给予又迅速又有力的打击。至于对匈牙利，德国也从西北两个方面威胁布达佩斯，德军所处的地位可以长驱直捣匈牙利的肥沃大平原或通过匈牙利进入罗马尼亚。从德国据有的新的战略地位来看，匈牙利占领的卢西尼亚的崇山峻岭已无足轻重了。——从此以后，小国要么就加入德国的行列，要么就求助于反德各大国的从未履行的保证；可是在第一次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后残存的东欧中立集团的幻想这时终于破灭了。

因此，波兰和匈牙利的共同边界正由于其实现的具体情况而失去其主要目的了。希特勒把他对乌克兰的长期计划搁在一边，却挟得了当前如此巨大

见《概览，1938年》，第3卷，第2编，第3节(e)。

关于波匈共同边界对德再保险的价值仍在自欺的最后一些人之一就是墨索里尼。当罗马迟至3月14日才得知德国最后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时，“他还想从匈牙利因与波兰有了共同边界而获得的利益中取得

的利益，这正是希特勒策略天才的特征；或则也是形象他说明，当一个大国正处于扩张的春潮高涨时，小国的防御性策略只会倒戈反击自己，成为一股洪流中的支流；“因为在这一点上，权力的本质正如名望一样，总是日益增长，或是象重物体的运动，走得越远，速度越快”。波希米亚过去在欧洲危机中曾两度充当过主角。十五世纪的胡斯革命不仅是新生的捷克民族主义对德意志权势上升的反抗运动，而且也是在自由的精神道德或思想意识方面所设想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此种革命贯穿于全部西方历史，而以民族运动和 1918 年的威尔逊原则为最高潮，就它的宗教和社会方面的极端表现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来看，它对宗教会议运动所起的作用正如后来布尔什维主义对国际联盟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十七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期间，波希米亚又一次公然对抗德国的天主教，当时它取消了它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另外选举了一个信新教的亲王为国王，这便加速了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波希米亚人在胡斯战争中保持了他们的独立，他们对欧洲的军事优势确实也保持了十七年之久，最后以 1436 年的协议，与巴塞尔会议取得了妥协，根据协议他们的宗教自主获得了承认。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他们在对抗反宗教改革军队的战斗中，只保持了两年独立，其后自白山灾难性的战败后，他们的独立 293 丧失了整整三个世纪。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捷克人第三次成为欧洲危机的中心，这一次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主角，他们扮演的是一个默然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反抗者，他们在 1938 年 9 月对大国的意志只抵制了一个星期。1939 年 3 月，他们一枪不发地屈从了。自十五世纪以来，由于现代国家的实力和组织的增长，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明确，致使现在较小国家的人民要保持其独立是那么困难了。但是希特勒提倡的消灭小国的主张，却加深了大国之间角逐的尖锐化，其趋向是他所不能控制的。早在六十年前俾斯麦就说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俄国所要占有的就不仅是加里西亚，而是全部奥地利斯拉夫人。

至于波希米亚，欧洲永恒的战场，润泽我们的各条河流所发源的大高原，上帝竖在我们大陆中心的天然大要塞，如果落到俄国手中，那就意味着我们被奴役，如果波希米亚在我们手中，那就意味着对沙皇帝国进行毫不留情的和永无休止的战争。你们可以看到奥地利的继续存在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希特勒的治国谋略不懂得他前任的那种有限目标和适度节制，因为他的治国谋略确实实现了俾斯麦政策中的更为深刻的精神特质——暴

补偿，他指示我告诉布达佩斯要果敢地行动。但对我来说，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齐亚诺《日记（1939—1943 年）》，1939 年 8 月 14 日。

纳粹所喜爱的一个宣传题目便是把胡斯运动和布尔什维主义相提并论。“诚然，在胡斯战争中，捷克人曾一度获得短时期的独立。他们象布尔什维克一样，利用这一回独立进行焚掠，直至德国人起来打垮他们”，1938 年 9 月 17 日希特勒会见 G·沃德·普赖斯时的谈话[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503]。参阅赫尔曼·劳施宁：《希特勒谈话：希特勒关于真实目标的政治谈话集》（Hermann Bausehning: Hitler Speaks: a Series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s with Adolf Hitler on his Real Aims），伦敦，桑顿·巴特沃恩，1939 年版，第 46 页；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国人》，第 278 页。

关于希特勒对“这些无聊小国”的厌烦情绪，见《戈培尔日记》，路易斯·P·洛克纳编译（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 年版），第 279 页。参阅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46 页，第 128 页和同一作者的《德国的毁灭的革命》（Germany's Revolution of Destruction），E·w·迪克斯译，伦敦，海涅曼，1939 年版，第 208—210 页。

力、欺诈和骄横。正是 1939 年 3 月 15 日胜利自身带来了俾斯麦所预见到的各种后果。

第一编 政治概览（续）

第七节 德国

马丁·怀特

纳粹于 1939 年 3 月兼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加上前一年征服奥地利，可说是德国历史的恢复和完成。第三帝国是在第二帝国的基础上，但是在更为缩小的边界内建立起来的。新的帝国现在突然以古代帝国的面貌出现，扩展到它以前的东部边缘，并自称有权继承其遗产。如同拿破仑帝国曾经乞灵于加洛林王朝的传统一样，希特勒的大德国也求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并吞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重建起撒克逊和撒利历代帝王的东部边界，而且并吞是在明确提到“千年之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年夏天，在同奥地利合并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标志就从维也纳带回到纽伦堡，现在一年一度的党代会——德国人新的公共节日——就在这里举行。

〔希特勒说〕我已叫人把旧德意志帝国的王权标志送到纽伦堡，不仅让我们德意志人自己，也让整个世界都想到，在发现新大陆五百多年前，就存在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长期沉睡。德意志人现在醒来了，而且显得是自己千年王冠的所有者。

求助于奥斯曼传统是以一种的、更有力的方式，来坚持德国由来已久的在欧洲称霸尤其是在东欧各民族中称霸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对松冈说，“新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将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古老传统的基础上，当年它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统治力量。”匈牙利曾对前一年 11 月维也纳裁决书的不公正表示不满。希特勒在 1939 年 1 月对匈牙利外交部长恰基加以叱责时，他说匈牙利人只想到千年之久的圣斯蒂芬王国，但他自己要以古代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压倒这些妄想。不过，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是现在把过去塑造成为自己 295 的形象。因为从十世纪以来，波希米亚一直是承认帝国的宗主权的，而且在十一世纪帝国几乎把匈牙利降低到附属国，但这个帝国一直有别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直到十五世纪，与开始形成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相呼应，“德意志民族的”这个字样正式加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上。希特勒的早期征服比之中世纪的回忆具有更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些征服对非民族的过去，来了一个清算，过去德意志人曾被分隔为许多弱小国家或是被分开在俾斯麦帝国和奥匈帝国两个国家之中。这些征服是对哈布斯堡“这个衰微没落的王朝”的最终抛弃，它一直是德国统一的障碍。这些征服又实现了俾斯麦所尽力阻挠的大德国政策。乞灵于古帝国是德国同它过去的调和，所借助的一种虚妄的说法是，暂时破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希特勒和恰基的谈话记录，1939 年 1 月 16 日〔《秘密文件》（埃里斯托夫），第 2 卷（匈牙利），第 25 号，第 76 页〕。

由腓特烈三世所加。关于第一帝国的性质，见 G·巴勒克拉夫：《中世纪帝国：理想和现实》（队 Barra01ough：The Mediaeval Empire: Idea and Reality），伦敦，菲利普，历史协会出版物，丛书总集 G17，1950 年版。

《我的奋斗》，第 573 页；墨菲译本，第 421 页。

（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希特勒成功的要素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军国主义的传统和一位救世主般的领袖。这些因素以前也同时存在过，但在纳粹德国的条件下，它们却获得了特殊的力量。纳粹运动显著的和表面的方面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纳粹运动在征服德国的过程中最有力的两个神话就是：从背后插上匕首，即 11 月平民叛国者从背后刺杀了军队，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上并没有打败的虚构；以及凡尔赛强制令，亦即协约国靠武力和背信弃义把肢解、奴役和赔款强加于德国。关于把德国恢复到统治欧洲的地位，它的最有力的要求是平等权利，恢复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平等权利，终止凡尔赛的奴役。

但是传播和接受上述神话却引向德国和欧洲的一种动乱，其深度远远超过任何恢复民族尊严的冲动。纳粹 296 运动最自豪的夸示就是它在德国完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改造，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胜利；与之相比，1918 年的“革命”仅仅是一次政府的更迭。与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相类似的不是 1830 年的七月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本身；1939—1945 年的大战将是德国纳粹革命的战争，就好象 1792—1815 年的大战是法国革命的战争一样。

法国〔希特勒在 1934 年说〕以民族的概念把它的大革命进行到国界之外。国家社会主义以种族的概念要把革命推向国外并且重新铸造世界。……我们的这个革命是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真实副本。任何犹太人的上帝也不可能从这场革命中拯救民主国家。

1939 年是法国革命一百五十周年，法西斯哲学家早就在宣布法国革命开辟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法国革命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终点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恶兆。到那时为止，西方国家的各次大革命都造成或确认了向新阶级的权力转移，也相应地扩大了政治和社会的自由。这种情况在已成立的国家内的革命是这样，如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同民族独立战争结合的革命也是如此，如十七世纪末叶的荷兰革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美国革命。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西方国家以前发生的中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俄国同代人所宣称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就其基本方式而言，它的意大利法西斯先驱也是如此）是由一个在欧洲历史上 297 以前从未有过什么实力和声望的阶级指挥的。而且，这个阶级还得用一个否定通常的阶级概念的词来描述它。这是一场由潦倒失意的人进行的革命，由那些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忠贞的分子进行的革命。

德国是无可匹敌的向这种类型革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军队溃散为军事冒险者（他们凭恃暴力所犯下的罪行，成了共和国初期政治生活的特征），自由团和费梅法庭的兵勇，杀害库特·艾斯纳、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拉特瑙的凶手。这些复员而又无人雇用的士兵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来源，而希特勒本人，世界大战的一等兵，就是他们的典型。不过这一场群众运动的普通成员却是由被根除的中产阶级提供的，因

《我的奋斗》，第 1 卷，第 10 章和第 583—592 页；墨菲译本，第 428—435 页。关于从背后刺杀的传说无意中的英文起源见惠勒—贝内特：《兴登堡》，第 167 页，第 229 页，第 238 页。

《我的奋斗》，第 523—524 页；墨菲译本，第 889—390 页。

为 1923 年的通货膨胀最终毁了他们。这支为数可观的力量的增加，在 1929—1931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德国失业人数上升到五百万，并使国家社会党在议会赢得第一次大胜利时，就得到确认和成为压倒的多数。

但是尽管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造成的，不过它有深远得多的根源，一方面这场革命似乎颠倒了德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偿还了德国的历史宿愿。它以新的尖锐性提出了有没有任何办法对整个一个民族提起公诉的问题，如何叫一个现代国家对遭受极权主义政党的俘虏和败坏承担责任的问题，以及一次成功地反叛拥有民政、军事和宣传权力的极权主义政府在技术上是否可能的问题。纳粹宣传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责任扩散和普遍化，在精神上使整个国家卷入统治者的行动中去。确实，在最终的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反映在它所容忍的政府之中，而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内的反对派的性质只有在在大幕降下之前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活力中才能推断出来。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从未获得过多数，但在它执政的前一年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而议会中各 298 民主政党则未能联合起来反对它。第三帝国的反对派是英勇的，而且就个人而言有时是圣洁的，但是反对派最大的特性是政治上的虚弱和无用。在这一点上正同反对威廉二世及其各位首相，反对俾斯麦，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对派的性质一样。俾斯麦于 1866 年迫使自由党人投降和放弃权力，从而使普鲁士发展成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最后机会破灭了。希特勒接受了中央党的投降和放弃权力。这个党以其高尚的忏悔机会主义最先破坏了魏玛共和国，而且最终以赞成 1933 年 3 月 16 日授权法击破了国会反抗纳粹革命的最后机会，这一法令建立了独裁政体——中央党“曾经公开反抗和击败过俾斯麦，现在却匍匐在希特勒面前”。——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忠于他们未能保卫好的共和国，并且用最后一个姿态——无力然而崇高——一致对授权法案投反对票。但是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也继续表现出他们那种已经毁掉了德国的自由的致命弱点。在 1933 年 5 月，重新召开国会批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人并未再次表现他们的英勇行为：有些人投弃权票，大多数人则同国社党人一起投赞成票。过去，人们或许认为在第三帝国之内还有一点残存的传统的正派力量。但这些力量的软弱无能在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之前四个月，在 1938 年 11 月反犹屠杀事件中，全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这次屠杀是从 1934 年 6 月 30 日屠杀事件以来，德国国内野蛮行为的最厉害的爆发。

威廉·约尔丹在 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宣告德意志民族主义目的时，结尾中说“人人享有自由。但是，祖国的权力和利益高于一切”。自从那时以来，这一呼声一直成为德国历史的主题，而在纳粹的宣传中达到顶点。第三帝国是依靠恐怖手段的政府体制，然而它却深得民心。它为全体德意志人实现了他们最深切和最含混的愿望：恢复自信心。恢复自信心就是恢复民族骄傲，通过镇压少数民族完成国内统一，通过征服斯拉夫人实现德语民族在大帝国内的合一。纳粹革命，就象法国革命一样，在国家生活中继续进行主要航程的同时，扩大河岸 299 和加深航道。它集合起德国历史上的所有力量：普鲁士军队的军事狂热，容克的肆无忌惮的固执和他们对波兰人的仇恨，工

A·J·P·泰勒：《德国历史进程》（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5 年版，第 212—213 页。

见纳米尔：《1848 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第 88 页。

业家与其中资产阶级的支持者们关于经济帝国的要求，以及“奥地利使命”（哈布斯堡王朝曾以此证明它在东欧的支配地位是有理的）。纳粹革命给予所有这些力量一种恶魔似的干劲和激情，这是通过它们以前从未得到过的群众支持而造成的。这种强化使许多倾向在实践中过了头，以致走向反面。第三帝国完成了普鲁士对德国的统一，最终抹掉了古代帝国的各邦，就象法国革命最终抹掉了法国王朝的古代省份一样。但同时，它也毁掉了有历史意义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的堡垒，却毁于1932年7月巴本的政变之中，这是纳粹接管权力的序幕；旧普鲁士贵族也为德国南部和莱茵兰起家的纳粹新贵所取代，而它本身则在1944年7月提供了反对。那位奥地利的元首政权的几个最后的无效的对抗者。不过第三帝国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颠倒了俾斯麦的工作，一方面继承了他为了排除德籍奥地利人而建立起来的小德意志帝国，一方面又以1938年的征服和并吞所出现的大德意志帝国来取代它。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德国的现象，但是它同样地也是德国为其组成部分的文明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罪恶是非常令人不安和令人受到威胁的。这不在于那些也许是希特勒或条顿族思想所特有的特点中，而是在于那些容易在其他国土上和体制内发生的特点中，而且还在于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德国而在十九世纪就在预言的那些特点中。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的法西斯形式，而且是最恶毒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但是法西斯主义既不开始于，也不结束于德国。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它最先在一个比德国人更有教养、更有智力的民族，在一个拥有更为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而且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天主教教廷所在地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屈从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膜拜希特勒的德国之间具有若干相同之处。两国的国家统一都迟于西欧其他国家——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六十年才统一。两国都没有代议制政府的传统。两国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不满意：德国是作为战败国；而意大利成为大国的要求只是勉强地被接受，（虽然它是战胜国之一）其所获得的赔偿比所索取的要小得多。这些情况使得意大利和德国同样容易接受以新的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病害。不过，这种病害对于整个西方文明来说是地方性的。

吉本在思考野蛮人入侵造成罗马帝国的覆亡时，他得出的结论是：

大炮和堡垒现在组成不可攻破的防线来抵御鞑靼人的骑兵；欧洲现在对于未来任何野蛮人的入侵是安全的，因为，在他们能征服之前，必须先停止作野蛮人。如同我们可以从俄国的例子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他们在战争科学中逐步取得进展，总是伴随着和平及内政艺术方面的成比例的提高；而他们也必须在被征服的文明国家当中值得占有一席之地。

在吉本著书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象推翻罗马帝国那样的外来野蛮人入侵

“许多人询问为什么要取消德国各邦。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知道必须这样做。你失去了过去，得到的是未来。’”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德国学生的讲话，1936年1月26日（《泰晤士报》，1936年1月28日）。各邦的统一开始于1831年4月7日关于协调德国各邦的法律（《概览》，1933年），第147页），完成于1934年1月80日关于重建帝国的法律。实际上各邦由省或聚居地区、纳粹党组织的单位所取代〔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266—276；斯蒂芬·H·罗伯茨：《希特勒建设的大厦》（Stephen H., Roberte: 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伦敦，梅休因，1937年版，第67—70页，第91—97页；以及托因比：《研究》，vi.109〕。

欧洲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这是因为欧洲文明扩展到全世界，而使这种旧式野蛮人的半阴影荡然无存的缘故。但是未完全与欧洲文明同化的大众对这一文明的压力并没有消失。这是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人口极大增长所造成的。在吉本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四代人时间里，欧洲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北美洲的人口则增加了四十九倍。自由制度如何在群众起来的 301 情况下存在下去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所专心研究的问题，他们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有托克维尔和米尔，伯克哈特和阿克顿。他们一般地用恺撒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对立极端的词来表达这一危险性。但是拉特瑙在 1919 年把那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群众运动解释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十年以后，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一本著名的书中发展了这种思想，他把“大众的反叛”描述为时代的主要倾向。他的著作对那时已成为欧洲政治确立的特点的法西斯主义作了广义的解释，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他的许多预测。

在德国人之中存在一种自觉的野蛮传统，对欧洲文明持冷淡态度，不时回忆起正是一些日耳曼部落推翻了衰微中的罗马帝国，并开创了中世纪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一度被称为“哥特人的”，而且以后对它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个名称也仍然适用。在十六世纪，由于敌视罗马教皇，德意志民族意识变得明确和激奋起来。阿米纽已经象 302 赫尔曼那样被宣布为民族英雄；吉本记下了他同时代一位普鲁士伯爵的爱国主义言论，“〔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野蛮征服者来自仍在产生出普鲁士军队的那些相同国家”。但是自我意识到的野蛮传统，开始时不过是无害的文雅古风，以后不知不觉地退化为真正的，同样自觉的新野蛮主义，在抗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之后，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回复到古条顿族传统，他们相信这种传统包含有反闪族主义，放逐斯拉夫血统的人，用斧子斫头以代替法国发明的断头机。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前一百年，海涅在十九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政治预言中就预示将要发生一场德国革命。它会使得法国革命看起来象是一首天真的牧歌。那时，雷神和古老的石神将从无人记得的废墟中升起，擦掉他们眼里几百年的灰尘，会出现“康德主义者不仅对于理念的世界而且对实际的世界同样不表示虔敬，他们要用斧和剑把我们欧洲生命的土壤无情地翻起，以便根除以往的残迹”；会再次激起基督教没有完全熄灭掉的古代日耳曼人对战斗的渴望，“这种对战斗的渴望不是为了毁灭，甚至也不是为了胜利，而仅仅是为了战斗本身”。D·H·劳伦斯在 1924 年访问德国的时候，希特勒还是兰茨贝格的囚犯，他的运动已经垮台，劳伦斯把成帮结伙的德国学生、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他们背着帆布包，发表种种“非实利主义的言论，半神秘的主张”——看作是松散的种族同伙，而且凭直觉理解到，通货膨胀和占领鲁尔已经完成了那场战争所引起的事情，理解到原来对和平和生产所抱的希望已经破灭，理解到德国人已经下意识地脱离了欧洲。

海因里希·海涅：《德国的宗教和哲学》（Heinrich Heine：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约翰·斯
诺德格拉斯译（伦敦，特鲁伯纳，1882 年版），第 159—162 页。此书在 1834 年第一次出版。海涅感到“德
意志革命不会更温和与文雅，因为在此之前是康德的‘批判’，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甚至还有自然哲
学”（同上书，第 158 页）。乔治·桑塔亚纳在《德国哲学的自私性》〔（George Santayana：
Egotism in German Philosophy），第 2 版，（伦敦，登特，1939 年）〕中对这样一种认识作了独立而详尽的
论述。

旧的潮流，旧的皈依受到了破坏。而更旧的潮流却插进来了。回去，回到鞑靼人野蛮的一极，远离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那一极。这事对我来说似乎已经发生。而这比任何实际事件都更具有深远的重要性。正是它孕育了下一阶段的事件。——希特勒回来争取和组织了流浪汉。他的历史使命的 303 中心思想在于宣称，纳粹运动是一次新的野蛮人入侵，是来结束另一种陈旧的文明，并且用建立在种族原则上充满活力的文化来取代旧文明。

“他们认为我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他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要做野蛮人！这是光荣的称号。我们要使世界充满活力！这个世界快完蛋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搞得天下大乱。”他随之对他称之为“历史的必需”作了冗长的说明。他宣称野蛮力量应该闯入没落的文明里去，以便从正在熄灭的火焰中拯救生命的火炬。——

希特勒是欧洲霸主中第一个拒绝古代皇帝称号的人，这种称号体现了统治全世界的要求。查理五世被选来继承他的历代先王接受帝王的尊荣：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路易十四渴望得到这个称号，拿破仑僭取了它；俾斯麦的国王则把它民族化了。希特勒精心选择的德国人民的元首称号，表示出比罗马最高权力具有更原始的权威的源泉：种族的具有神授能力的领袖。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他写信给墨索里尼：

领袖，首先我时常认为，似乎人类的发展仅中断了一千五百年，而现在就要恢复它原有的性质。天数在这场斗争中竟赋予我们而人以如此显赫的地位，使我年复一年地愈加同你接近。——

在阿拉列和盖斯列劫掠罗马的时候，他们并未被二千年前掠夺迈诺斯都城的希腊野蛮人的行为所激励；希腊野蛮人也未曾有意识地模仿他们的前辈真正的雅利安人，那些人曾经侵略和毁灭了苏美尔人的文明。贯串一千五百年的野蛮人的历史回忆和历史意图在国家社会主义中 304 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最为卓越的证明之一。——但是，正象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形式，欧洲的一些法西斯革命不是二十世纪最早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建立起它的第一批极权主义政权。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它们的先驱和典型。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初看起来是辩证的：法西斯独裁者们宣称他们在把他们的国家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革命式夺取政权和极权主义式巩固政权的技巧都是仿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到 1939 年初，苏维埃政权已有二十多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已有十五年以上，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仅仅经过六年就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对于有辨别力的观察家来说，明显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还可以被描述为好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单一现象上的不同阶段。希特勒并未创造“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却是看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

希特勒也拒绝接受独裁者的名字，它的含义同领袖不同（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196—199 页，以及弗朗茨·纽曼：《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伦敦，高兰茨，1942 年版，第 73—75 页）。“我不是独裁者或君主那种意义的国家元首；我是德国人民的领袖！我本来可以授予我自己——人民也会信服——完全不同的称号。我一直保留我的旧称号，我活多久就保留多久，因为我不愿意当别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别的。旧的称号使我心满意足。”在慕尼黑的讲话，1938 年 11 月 8 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559）。1939 年 6 月 27 日，法令宣布，各项正式任命今后均只用元首的名义作出，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用元首和国务总理的名义。

大众叛乱的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并且把他的政策基础建于这个鉴别之上。

俄国共产主义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德国原来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早的群众性政党，而在1914年之前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后是除俄国以外的最大共产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获得最初的胜利以后，首先指望的就是德国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这就会把俄国革命转变为世界革命。但是德国共产主义后来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带步人。希特勒正是从共产主义那里才学到了他的大部分革命鼓动的技巧；共产党虽然在国内问题上同纳粹分子进行无尽无休的争吵，却同他们勾结，使得魏玛共和国不可能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使本国虚弱的民主分子采取中立态度。“西方文明的两个孪生敌人把工作做得很了不起：它们分裂了也许是唯一能够拯救西方文明的力量并使它不起作用。”从1931年以后，在魏玛共和国处于临危状态的时候，共产党人同纳粹分子的合作更为明确，好似一个可与后来的纳粹—苏维埃条约相比的战术联盟。由于按照斯大林的指令采取了最坏情况下的政策，共产党人为纳粹分子上台执政出了最后一把力，他们于1931年支持纳粹为了在普鲁士进行公民投票而进行的鼓动，1932年6月在普鲁士国会同纳粹分子联合投票对布劳恩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1932年11月参加纳粹组织的反对柏林运输部的罢工。正象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一样，希特勒宣称：“我不仅是征服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刑人。”

（二）希特勒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缔造者和化身就是希特勒本 306 人。对于那些基于性格和景况并未受到他的品格吸引的人来说，他这个人面目可憎，言谈粗俗，缺乏教养，思想低下，结果他的同代人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他的威力和能力。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个月里，与兴登堡忠于宪法的神话相对照的就是希特勒平凡庸碌的神话。许多德国政客认为让纳粹分子组阁也好，几个月内他们的无能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威信扫地，在哄笑声中下台。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表征，容易集中在社会现象上而不是在他个人身上。他的同事奥托·施特拉塞尔称他是“德国革命的软木塞”，而在国外最先出版的一本传记名为《无名小卒希特勒》。但是这个被贬低的对象，他自己早就写过：“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人物却成了天生的领袖。”

历史上很少有革命伟人象希特勒那样完全融合于他们的革命之中，人们还可发现他们与作为革命的喉舌和化身的角色是那样相称，简直是非此莫属。克伦威尔在许多方面是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的代表，但是除了成为将军和摄政以外，他扮演了一个地方议员的可敬角色，他的一生的核心是个人精神上的斗争。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巩固者，不过只是因为他先是雇佣军队长；他的天才即使没有给他带来最高权力的话，无论如何也会保证他一定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列宁是俄国革命的缔造者，但也只是因为他早就是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墨索里尼是小一点的人物，在进入政界之前过着记者生涯，在他下台之后曾希望为自己重建私人生活。希特勒是维也纳贫民区的无名之辈，后来成了大众革命的魔术师和巫师，此外他什么也不是。好象在二十世纪的德国，对革命领导的历史性要求都被削掉了，直到留下既无道德价值，又无社会地位，又无自主的职业和智力技能，而只剩下强烈集中于革命任务本身这一条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民众的战争，其特点是各国的战争英雄不是伟大的司令官而是无名小卒。希特勒反复宣称他是德国无名小卒——“只是一个无名的德国士兵，只有一个小小的镀锌的身份证明号码在胸前”——不是埋葬在国家圣地的花圈里，而是走遍全国要报仇雪耻。当人们半带蔑视地称他是“德意志国家的鼓手”，他却自豪地接受这一比喻。在这种自我承认与德国民众一致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力量和陶醉。此外，他的形象失去了轮廓而被涂抹黑了。新闻记者们竭力想找出他个人作为领袖吸引人民的各种特质，这种努力很少成功。当我们设法描绘一幅准确的画面，说明他的早年生活和抱负、艺术才能、娱乐、个人瓜葛和感情的各种联系，以及他同爱娃·布劳恩的畸形婚姻时，我们遇到的却是经过涂抹和捉摸不定的印象，好象是在对付芸芸众生的一般标志而不是特殊的人，或是在对付遥远年代的典型形象；与此相称的是，甚至经过十二年的峥嵘岁月，他死去的时候的情况仍然是同样晦涩。他的生活由于集中于权力而变得毫无意义了；他这位权倾一时的人物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猜测不透，带上了传奇色彩，这不是由于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几乎没有个人特质。尽管如此，虽然本来不论如何都会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复活，而这种复活会找到自己的领袖，并且所有这些 308 确实都被预见到了，但希特勒为德国革命送来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天才的才能，从而使他堪称不是从俾斯麦以来而是从拿破仑以来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使他堪称不是从俾斯麦以来而是从路德以

来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个人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决定意义的历史性力量。这种力量把他从平地拔到最高政治权威的地位，而当政治结构在灾难中分崩离析之后还继续能对人们实行控制。戈林在 1921 年同他第一次见面，他刚听见希特勒说了两句话便为之倾倒；若干年以后一位外国外交官问他：“你真的怕他吗？”他考虑以后说：“是的，我想是的。……你不了解他！”斯佩尔被他迷惑住了，而沙赫特则承认或是假装承认说，每当他同希特勒会面之后，总是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外国人也不能不受感染。劳埃德·乔治只是访问希特勒后受到引诱的英国政治家中最突出的一个，甚至墨索里尼开始虽带有拉丁式怀疑，随后是因忌妒而苦恼，并一再感到愤怒和怨恨，却一直是处在元首的心理统治之下。希特勒的独白式谈话把他同部长们和将军们的个别谈话和会议降低到群众会上讲演的水平，却没有损害他的权威：这类谈话反倒成了维护权势的手段。

在许多目击者之中，我只举一个例子——一位加拿大人的判断：“我能听希特勒就某个问题的一方面谈论一个小时，如果他再谈一个小时而所谈的同前一小时完全相反，我也听得下去并相信他。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希特勒的雄辩能力！如果他能使我那样，那他对德国听众的说服力又该有多大呢！”

当然也有不为希特勒魅力所动的人，特别是德国的将军和外国政治家中的齐亚诺；但关系重要的却是其他人。__希特勒的首要政治天赋就是雄辩术，用讲话掌握听众。这是他决定性的天赋，如同拿破仑掌握军队的天赋一样。“今天说话就是战斗，”鲁登道夫的一个参谋人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刻这样写道。“把话说对了就是打了一次胜仗，把话说错了就是打了一次败仗。”正是以这种精神和在同样的情况下，希特勒学会了宣传的艺术。

从他所能造成的动乱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是历史上最大的大众演说家。

设想一下当他象和平时那样惯于站在柏林滕佩尔霍夫广场检阅台上，在他面前的是一百万德国人，他的感觉是什么。这是任何人面前从未有过的最大的人群。在一个民主国家，你决不可能集中这样多的人，因为这要他们花费十二个小时集中，再花费十二个小时解散。__他对德国听众的讲话说明了他叙事简单、一再重复和唤起兽性的感情的原则。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翻来覆去，并且习以为常地控告他的敌人犯下了罪行——这些罪行正是他本人打算对他们去犯的——因而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不过他还有另一条同

冯·黑夫滕上校：“1918年德国政治攻势的两个方案”，柏林，1918年1月14日（“由我〔鲁登道夫〕竭尽推荐呈交给帝国首相”）〔埃里希·鲁登道夫：《高级军事领导在1916—1918年活动的证明》（Erich Ludendorff: Urkunden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 u.ber ihre Tatigkeit 1916—18），第2版（柏林，米特勒，1921年版），第477页；由F.A.霍尔特译作《总参谋部及其问题》（F.A. Holt: The General Staff and Its Problems），伦敦，哈钦森，1920年版，ii.557〕。

见《我的奋斗》，第1卷，第6章。

见1925年2月27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的讲话，在海登《元首》一书中转述，第205—207页〔未载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

参阅在威尔伯·科特兹·艾博特：《奥利弗·克伦威尔著作讲话集》

〔（Wilbur Cortez Abbott: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4卷，第463页中对克伦威尔讲演的模式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是一样的讲话，只是由于时间和环境不同才有所改变。一开始总是有段历史性引言。讲话指摘对手，为他和他的党的路线辩护，把事情说成是不管他们采取何种道路似乎都是自然的，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他强烈

样重要的原则，就是 310 讲话应当适应特定的听众。他讲话的成功不仅限于对那些偏爱听他讲话的德国人，因为那些偏爱他讲话的人不仅限于德国。甚至那些并不那么偏爱他的外国人，在他们从无线电里听 1938 年和 1939 年希特勒的讲话时，歇斯底里加上女声女气的刺耳声音也传来他的邪恶威力。__

希特勒正是靠他的口才在德国上台执政：那时候，他的演说就好象是当年年轻的拿破仑在意大利所获得的胜利。

1932 年 1 月，希特勒在迪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会见了德国西部重工业巨头们——他的听众是头脑冷静、不动感情的企业界人士，而在他讲话结束时却赢得他们热烈的赞同。这也许是他作为一个雄辩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这是一项极妙的论证。那篇讲话是国家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__另一项靠雄辩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更加阴沉的国内危机时刻，即 1934 年 7 月 13 日在国会的演说。在讲话前两个星期，他杀害了一千多人和许多纳粹党领导人；他现在要向国会内的幸存者说明这样做是对的，而大屠杀已经使国会的议席空出了二十个位子。也许在他一生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听众沉默地听他讲话达二十分钟之久，一直到“他举起右手，食指向上，蹄起脚尖，一面大喊：‘此时此刻我为德国的命运负责，因而在这二十四小时内我个人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法院’”，于是又响起了通常的欢呼声。__不过，希特勒一旦执政，他的讲话就影响到更广大的范围。这些讲话不仅面对德国听众，而且成为对英法舆论的心理上的胜利，从 1933 年 5 月 17 日的和平呼吁，他把 311 自己说成是世界需要和平的发言人起，到 1936 年 3 月 7 日在国会讲话，他引申格莱斯顿的一个老套活，以道义权利为由论证重新占领莱茵兰的正当为止，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的讲话转入德国在国外的重大利益，于是获得了新的威胁性的弦外之音，而且在保证立刻和平和坚持德国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不打仗的若干条件之间，极尽滑音变调之能事。他说，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现已完成；德国在欧洲已无领土要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

地、甚至粗暴地攻击对手的行动，特别是他们的动机，把那些事态发展证明正是他自己的党付诸实行的野心和活动归之于对手。……他描绘了一幅充满阴谋、叛乱和新的内战的黑暗图景，作为对照的是他的统治带给国家的和平，实际上向听众提出在这两者之中任择其一。”希特勒的讲话同样如此。在希特勒和克伦威尔之间作更为全面的比较，最权威的评论载于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奥利弗·克伦威尔》(Sir Ernest Barker : Oliver Cromwell)，剑桥大学出版社，1937 年版。

“至于我，我总是知道我面前是什么人，我就是对我面前的人讲话的。……归根结底，一个演说家只有一种价值，就是他的效能。……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巨大诸误在于他们顽固地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对老百姓说话。必须知道区分不同的公众”：希特勒的讲话，转引自菲利普·巴雷斯：“希特勒与奥地利”，《两个世界评论》(Philippe Barrès：“Hitler et l’Autriche”，Revue des Deux Mondes)，第 44 卷，第 8 期(1938 年)，第 546 页，重刊在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707。参阅雷德谈希特勒言论的性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iv.35)。

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41—1058，特别是第 1046—1047 页；海登：《元首》，第 485—490 页。

“象欧洲这样小的一个家庭里，居然能有永久性的国家联邦，联邦内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各自都要维护自己的法律和司法概念，这样设想是不明智的”[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273]。这句话引自 R·W·塞顿-沃森教授的《欧洲的英国，1789—1914 年》(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扉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 年版)。

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恢复民族尊严和自由所加于他的。他又一次提到，从纳粹革命以来三年内，德国人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其他民族的事，从来没有向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伸过手，而是一直在自己的边界之内活动；如果外国谣传明后天德国会侵略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末这些谣言不是源于爱好和平的千百万人民，而是来自一小撮国际煽动者——犹太人。一会儿以后又说：如果他每次都未同凡尔赛条约国家磋商就采取了实现平等权利的措施，甚至也未通知它们，这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使它们接受这些决定，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必须接受；既然这一切都已完成，所谓令人吃惊的时期就告结束。然后便是高潮，他宣布面临着必须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欧洲必须提出的最后的，但是他不会退让的一个领土要求。因为关于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他的耐心现在到了最后限度。一直到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为止，催眠的魔力才算破灭，他的外国听众们对催眠师暗示的感应性才化为乌有，他再也没有仅用言辞就取得胜利。

其次，希特勒还具有一种组织方面的天才。他完全没有拿破仑那种超人的智力条件和行政天赋，不间断地进行工作的才干，对细节的掌握，以及在广泛范围内同样有把握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希特勒是一个痉挛性的工作者，反复无常而又缺乏训练。他不喜欢阅读报告和备忘录，了解情况靠询问有关人员而不让他们提出建议。“斟酌和核对每一项可能的细节这样的繁重工作不合他的胃口。他对之失去耐心，表示厌倦。以天才的笔触来勾画出一幅素描——这使他感到最大的满足。”他研究得比较彻底的学科就是战略学，因为他尚未实现的野心就是要成为一个象他作为革命领袖一样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他具有详尽的知识的唯一领域（而这是显著的），就是关于堡垒和武器的领域，这把他对小玩意的迷恋和对巨大事物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了。他是登上宝座的半瓶子醋和咖啡馆政客。但是他还不仅是如此。他在组织方面的天才在于他的广泛的计划范围，坚定的目标，以及使人们成为他的工具的能力。

就象每一个成功的革命运动一样，国家社会主义拥有双重技术，这就是狂飙突进而辅之以慢性渗透和破坏的方法。希特勒正是由于擅长第二种技术

国会讲话，1936年3月7日 [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300]。

在柏林乐园广场的讲话，1936年5月1日（同上书，第1322页）。

国会讲话，1937年1月30日（同上书，第1336页）。

在体育宫的讲话，1938年9月26日（同上书，第1517页，第1526页）。参阅张伯伦1938年9月28日在下院的讲话：“他首先以极诚恳的态度向我反复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说过的话，也就是说，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野心，他无意把德意志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并入帝国” [下院辩论，第5辑，第389卷，第22栏；《文件，1938年》，ii.285]。

见海登：《元首》，第302页；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484—485。

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265—266页；参阅第183页，第254—255页。希特勒在兰茨贝格时期有次对狱中难友说：“刚才休息的最看半小时，我在头脑中发明了一种新式机枪和一种架桥设备，并作了一段曲子”（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第53页）。

关于希特勒的军事才能，见弗朗茨·哈尔德：《军阀希特勒》（Frantz Halder: Hitler as War Lord），由保罗·芬德利自德文转译（伦敦，普特南，1950年版）；B.H.利德尔·哈特：《山那边》（B.H. Liddell 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伦敦，卡斯尔，1948年版，第9—10页，第305—309页。关于希特勒的战略天才的极端说法，见于凯特尔的证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600。

而有别于那些革命的冒险者，例如拿破仑第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同时代的大多数独裁者，他们不过是利用了短暂的革命形势。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有一种节奏，就是前进和巩固，交替进行，1923年的慕尼黑起事的时机是不成熟的。接着就是十年的遵守“合法义务”，这意味着组织和渗透。

希特勒不能在一年之内推翻魏玛共和国，但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内部，他能造就一个微型国家，一旦胜利之日来到，就能准备好占领这个非国家——这个国家还够不上称为国家——的机构，继续进行德意志帝国的行政管理而不中断。这就是兰茨贝格以后几年的任务。在希特勒的一生中，也许没有比这种在党内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更卓越的了。……在党的命运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希特勒指定了由法律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拟订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形式。多年以后，人们问希特勒为什么能连续四个小时行纳粹的举手礼，他回答说：“意志力……戈林就干不了！”信仰！一种思想的胜利。这在无数次讲话中重复得庸俗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任命那个委员会这件事决不应该忘怀，如果你企图理解希特勒的话。外交部、宣传部、青年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国家社会主义妇女组织、摩托化部队、空军部队，更不用说党卫军和冲锋队了——党应该作好准备，如果接管这个非国家并将其体制纳入自己的国家形式的时候来到的话。

这种长期艰巨地从事于建设性的颠覆工作，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事业中是找不到类似情况的，列宁从1900年到1917年的流亡生活也不完全与之相象。这个工作在1933年大进展的时候终于开花结果，接管政权。但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一模式又重现了。新的“合法义务”时期开始了，亦即国际领域的合法义务。希特勒说，德意志人对本民族传统的无限热爱，使他们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要求，而且衷心希望同其他民族和平友好地相处；德国政府决不会主动撕毁协议，除非这项协议可以由一个更好的协议所取代；德国不愿采取除条约本身承认有理的途径以外的任何其他途径。1934年7月在维也纳发动政变未遂，当时陶尔斐斯遇害，此事被认为是接管政权对奥地利的扩大；此事的失败则说明时机还不成熟，它确实是慕尼黑政变的相似物。

7月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纳粹地方党部负责人赖纳后来写道〕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结果是314〔党〕组织的完全破坏，整批的战士遭到损失，不是被囚禁，就是逃往“旧帝国”，至于德国同奥地利的政治关系，则是德国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国家的存在。元首在给巴本的电报中指令他重新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从而清理了战斗的第一阶段，开始使用政治渗透的新方法。国际革命的准备和渗透工作，是在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声明背后不间断地进行着，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在德国国内加速和完成重整军备。希特勒一上台执政就“明确提出一项政治要求，要在五年内即到1938

其直接后果是希特勒被判处拘留，从1924年4月1日到12月20日关押在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城堡里。希特勒不亚于彼得大帝和列宁，是托因比“以退就进”原则的显著例子（见《研究》，iii.248以下）。

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161—162。

《和平呼吁》，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47, 1056；《文件，1933年》，第201页，第207页）。“按照事实的同样严酷的逻辑，我们将在外交政策中如同在国内政策中一样取得胜利。我将无须经过斗争，只用合法手段就可达到目的，就象我上台执政一样——这只是因为事态发展的内部逻辑要求这样”（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12页）。

年4月1日止为他建立起一支使他可以在紧要关头用作为政治力量的工具的武装部队。”1935年3月10日，戈林宣布已经有一支空军部队，1935年3月16日重新实行征兵制，1935年5月21日通过秘密的帝国防务法和任命沙赫特为负责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同一天在希特勒的国会讲话中正式单方面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备限制，于是德国重新武装的第一个和秘密的阶段就胜利完成了。

历史将展示〔十年以后德国的托马斯将军写道〕，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所做的那样，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已如此深思熟虑而系统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用于战争需要，这样的实例是为数不多的。另一个方面是组织国外的德意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总参谋部代表德意志帝国宣布了一条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大国也都有这个原则）：“德国的威信要求我们不仅应该对德国公民，而且要对所有的德意志人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这一点在国家社会主义下是实现了。国外组织（AO）及其附属的国外德意志人民联盟（VDA）对全世界来说，在较小程度上就象国社党在1923年至1933年对德国那样。1937年，AO成为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部分地同外交和领事业务融合在一起，其活动受到外交豁免权的庇护。这样它就成为通过宣传和谍报对外国实行革命渗透，并在全世界建立第五纵队和根据地网络的高度发展的工具。它的控制再加上盖世太保，使得它的组织和联系不仅包括全体党员，而且包括所有的德意志人的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并监督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它在有的地方建立起准军事组织，通常以纪律检查或治安勤务的形式，名义上是在党员中维持秩序，但是能用来作为一支打击力量。还有一种企图要把德国人移居到重要的战略地区去，如北石勒苏益格、南非和拉丁美洲，而在旅游者、技术人员、旅行推销员的伪装下，这个增援运动组织得很好。

外国和外国政治家〔戈林的官方喉舌在1937年说〕必须认识到，在未来，德国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只能建基于外国德意志人作为德国文化和商务天然代理人的有组织的活动之上。希特勒在国内夺取政权不到四个月，便向帝国边界以外的德意志人直接发出第一次呼吁。1936年内战爆发以后，西班牙政府搜查了AO设在巴塞罗那的办事处，没收和公布了办事处的文件，因而官方否认民族统一和帝国主义目的的声明业已信誉扫地。

“战争组织和动员计划的历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iv-473（135—C）；参阅同上书，xiv.16—18；《阴谋与侵略》，vi.947）。

《概览，1935年》，i.140—14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X，60—62（2261—PS）；《阴谋与侵略》，v.934—936。

《概览，1935年》，i.172。

冯·黑夫滕上校在鲁登道夫一章，前引书，第481页；霍尔特译本，前引书，ii.562。

AO建立于1931年；其长官是博勒。VDA即前国外德意志人民协会，建立于1881年，更名于1933年。见“关于国外德意志人的说明”，载于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63—1079；参阅《概览，1936年》，第41—48页。

参阅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260—261页。

1933年5月27日他对但泽的广播讲话，时当6月28日但泽选举之前（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060—1068）。

见《纳粹在西班牙的阴谋》（TheNaziConspiracyinSpain），由《希特勒恐怖的褐皮书》的编者所著，埃

许多国外德意志人的组织，就象许多形形色色的德国组织一样，都是多余的，无效的。拉丁美洲纳粹党的许多庞大的分支机构是如此，美国的德美人民同盟和加拿大的德意志同盟收效不大的活动也都是如此。但是它在欧洲却产生了结果，在德国夺取政权四个月之后但泽就已纳粹化，奥地利的纳粹化则为德奥合并作了准备，通过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东欧调动德意志少数民族 316 族，渗入挪减并使之瘫痪。这些不可能象党的建设和对魏玛共和国的侵蚀那样直接地归之于希特勒的成就，这些成就来源于他赋予德国人的自然趋势以动力，促进了德国人勤奋努力、盲目服从、扩张组织的天性。尽管如此，精神和目的都是他的。

不论是谁，要是他想象社会主义是叛乱和蛊惑群众，那他就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在 1934 年说〕。革命不是民众游戏。革命是艰苦的工作。群众只看到成果，却不知道，也应该不知道，在迈出新的一步之前需要作的无法计算的看不到的劳动。除了理论动力和宣传技术以外，纳粹政府制度的轮廓是扩大为全国范围的匪徒行径。它的主要刺激之一是有组织的贪污；在它最有力的压制手段中就是间谍活动和个人讹诈。这些都发展了，着眼于把它们用于国际政治中，但是它们的效力在德国以外就减少了，而希特勒对外的成功可归因于他的天才的其他方面，而不是归因于世界名人丑闻的全套卡片索引这个构想。国际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政府的特殊方法，促使别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以及造成下属之间互相敌对。象弗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大量设置相互矛盾的任务和相互冲突的机构；不过由于种种超出了希特勒的道义和政治哲学范畴的原因，结果在德国不是和谐协调而是离心离德，铁板一块的纳粹国家在战争的重压下分解了，如特雷弗-罗珀所描述的，成为“私人帝国、私人军队、私人情报机构的混乱状态”。1939 年，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但是从希特勒上台执政以来，外交政策一直是通过相互矛盾的机构在执行，而且涉及个人竞争。1933 年，纳粹扩张的思想家罗森贝格被任命为负责纳粹党的外事局，该局在对外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伪装下组织对国外进行渗透。正式的外交部从 1932 年到 1938 年仍属于牛赖特领导，维持外交门面。

但是牛赖特有一个妒忌的对手，就是里宾特洛甫，他作为希特勒的无所事事大使执行一条独立的路线，而且终于取代牛赖特担任外交部长。此外，戈林作为空军首脑和帝国国防会议主席，也是一个显著的外交人物，时而宴请访问柏林的贵客，时而在外国首都同统治者会谈。影响的多样性引起英国政客们的错觉，以为希特勒是个幻想家，听信了错主意，或者只听到极端主义的

米尔·伯恩斯自德文手稿转译（伦敦，高兰兹，1937 年）；《概览，1937 年》，ii.127 注。

通过 1933 年 5 月 28 日的选举（《概览，1933 年》，第 187 页）。

见下文，原著第 332 页。

参阅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i.478—479。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98—99 页，第 267—970 页。在重要政治活动中使用讹作最重要的一次是 1938 年 2 月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的去职。

见沙赫特：《帐已结清》，第 212—213 页；纳米尔：《衰退中的欧洲》，第 232 页。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 2 页。

“牛赖特缺乏想象力。象一个农民那样精明，但缺乏思想。在这种时候他的慈祥容貌对我最有用。你不能设想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会奉行革命的政策，他们英国人会这样说”（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268—269 页）。· 529·

下属的不完全的情报，以为里宾特洛甫是个有不良影响的人，或者戈林是个有温和影响的人。但是实际上，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一项不是希特勒的，他的政策鼓舞了并包括了他的部长们的阴谋；它也不需要外部的邪恶影响来加强，时机一到，他个人就单独作出决定。

第三，希特勒具有一种最高度的政治艺术：在权力斗争中的绝对驾驭能力。其主要的源泉是他那异乎寻常的意志力。此外，他在操纵驾驭中策略上的能屈能伸和圆滑灵活，觉察敌人弱点和他们很可能作出的反应，等待时机和在进行打击前迷惑敌人时的逢迎随顺，都有拿破仑的水平。虽然希特勒靠直觉行动，而且远远缺乏象拿破仑那样在广阔视野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但他把权力政治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他深知个中道理；他对权力政治留下了象马基雅弗利那样深入和持久的名言，例如以下的原则：谎言越大，群众越易受骗；一个精明的征服者将分阶段地进行勒索。

他在 1939 年获得威望的主要源泉是他的政治眼光，他对行动的时机的识别，这在德国称之为他的敏锐感觉。在 1933 年以来对外关系连续发生的危机中，他的意见经常是对的，而他的政治和军事顾问们却是错的。他预先通知帝国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是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说这一行动将导致占领莱茵兰 [即由法国人出兵] 的预言家很多，相信的人却很少。”他个人决定在 1936 年重新占领莱茵兰，是在占领前两三天内自动作出的，而且未同内阁磋商。——“那时这是又一个看来不可能的行动。相信我的人很少。”随着他冒险范围的扩大，总参谋部的反对情绪变得强烈些了。1937 年 11 月 5 日的会议，自始至终有一种怀疑和不赞成的暗潮来自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契。他们争辩说，法国在沿德国边界一带军事上将占优势，即使它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也仍然如此，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堡垒可同马奇诺防线的实力相当。1938 年 2 月，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因此免职，希特勒自己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冯克接替沙赫特在帝国银行的职务。这些是希特勒同军队发生冲突最早的外部迹象，希特勒靠占领奥地利提高了威信，从而解决了一次政府危机。1938 年 5 月 30 日，约德尔在签署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时，他写道：

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应该今年干，军队的意见是我们还不能干，因为极其肯定的是，西方大国会进行干涉，而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同它们匹敌，这两种意见的矛盾又一次尖锐化。

1938 年 7 月，总参谋部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是由总参谋长贝克起草的，其中论证德国在军事上居于劣势，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初期即使取得胜利，也会被法国击败，因此不应在苏台德问题上冒战争的风险。备忘录激怒了希特勒：他免去了贝克的职务，以哈尔德接替。2 月份将军们还没有作好行动的准备，9 月危机中，在哈尔德领导下，已商定如果战争爆发便

霍斯巴赫备忘录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 413 (386—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 辑，i.38；《文件，1939—1946 年》，i.24；参阅《阴谋与侵略》，iii.304]。

关于弗里契—布洛姆贝格危机，见 H·B·吉泽维乌斯：《至死方休》，(H.B.Gisevlus：To the Bitter End)，里查德·温斯顿和克拉拉·温斯顿译自德文版 (伦敦，开普，1948 年版) 第 6 章，特别是第 254—256 页。

对哈尔德的审讯，1946 年 2 月 25 日 (《阴谋与侵略》，补编 B，第 1548—1550 页)；龙德施泰特的证词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i.33)；利德尔·哈特：《山那边》，第 39—40 页。

立即推翻希特勒。但是张伯伦先生来了，弹指之间避免了战争的危險，319 希特勒从慕尼黑回来时，是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所推崇的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因而德国人民理所当然地欢迎和享受他的胜利。即使在希特勒的反对派——高级军官集团一群人之中，上述胜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慕尼黑以后的六年中，在德国国内再也没有对希特勒的有组织的反对。

曾有人说，希特勒政治和战略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在于不负责任的政权的腐败以及缺乏“对这样一个任性的天才进行必不可少的”批评。这是完全确实的。但是如要估价他的天赋的政治能力，就要涉及更深刻的问题。有一个分析的最终标准，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标准来考虑用以判断政治成就的各项标准。是否有道德，或仅仅是执行得出色，或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国家利益背后的价值准则服务？就最后一点而言，希特勒确实宣称他的政策不是纯粹的国家政策，而是以生物目标为宗旨。这是取代西方文明原则的伪科学。至于德国的利益，他已经使之成为普遍不稳、积极动荡和长期革命的工具；当他写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不应该看着一个国家英勇地倒下去，而应该以实际的方法生存下去”，他自己就在无意之中对此作了定论。还剩下技能问题。希特勒有时把这种品质解释得极其低下，说它简直就是圆滑。

“政治就是赌博，在一切赌博中什么诡计都是允许的”，他说“赌博的人经常变换规则以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不过这种水平的政治除了成功以外是没有标准的，而从长期来看，希特勒不是一个成功者。如果技能意味着更多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应当取决于能否正确衡量运用这种技术所处的形势，那末我们应当考虑到希特勒把现实主义同狂热主义两者可怕地结合起来的二重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看待某些事情异常清晰，同时他的眼睛晶体的边缘又总是可能被乱糟糟的东西所蒙蔽。他的洞察力可能被他的信条和脾性所影响，就象他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种族分离活动，在军事上会表现出软弱无力，320 或是认为世界上仅有的杰出人物就是他自己还有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而只有他们才具有唯一的那种政治家气质。1939年3月15日，他占领布拉格，就是认为“小蛆虫”张伯伦和达拉第，他在慕尼黑见过，他们个人不可能存有比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晤的水准更深入的目 的，而英国和法国除了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之外也不可能存有更深刻的道义力量。技术标准本身

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 254—259 页。

参阅 w.K.汉考克：《皮特凯恩的政治》（w, K.Hanasek : Po - liticsinPitcairn），伦敦，麦克米伦，1947 年版，第 26—27 页。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243 页。“国家至高无上的目标就是保存和改良种族”（《我的奋斗》，第 430 页；墨菲译本，第 328 页）。

参阅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175—176 页，第 186—188 页，第 248—249 页。

《我的奋斗》，第 693 页；墨菲译本，第 501 页。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273 页。

劳施宁：《德国的革命》，第 193—194 页。

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14 页，第 78—79 页。

参阅 1939 年 8 月 22 日希特勒对司令官们的讲话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i.339 (798—PS)；《文件，1939—1946 年》，i.448—444；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2；vii.753]。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1.349 (798—PS)；《文件，1939—1946 年》，i.446；参阅《阴谋与侵略》，iii.585，vii.753；

就提出了问题，是否希特勒政策的根本缺陷就是道义丧尽，从而使他错误估计他企图毁灭的文明的绝对本质。

在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冒险家中，希特勒在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切萨雷·博尔贾能把马基雅弗利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所想出来的治国大致的模式加以实现，这是他的幸运。但是，希特勒倒适合于普遍半知识化和新闻业发达时代里的博尔贾的身份，他把切萨雷同马基雅弗利合而为一；而且早在他发迹伊始，在独立不群的透明面纱的掩映下，他已表达了要成为实际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稀有结合物这个自我感觉。他最持久的纪念碑（这要比他打击西方文明的物质后果持久得多），很可能就是《我的奋斗》。在主张实力以取代对权威的维护这一点上，在用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来非难理性的统治这一点上，在用操纵群众实现破坏性革命的目的来代替有秩序的行政进程这一点上，《我的奋斗》是在政治哲学里的一个显著标志。《我的奋斗》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其中所包含有关革命策略的有实效的意见比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这本书作为文学作品是可鄙视的，然而由于受到野蛮力量的激励，却显得有活力，如同一条干旱的林荫大道吹过一股恶风，它也许是二十世纪政治书籍的代表作。

《我的奋斗》除了它的政治内容外，作为希特勒对其所处时代在心理上洞察世态的说明，也是值得加以分析的。他在书中不仅勾画了十年之后他担任德国国家元首所要奉行的政策路线，而且描绘了使他能够这样做的世界上的思想状况。他描述一般民众陷于“这里不会发生321那样的事”这种镇静而无力的态度，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闭眼不看政治前途，只拘泥于从不久前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一种消极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从未转化为积极的防御；又描绘了当资产阶级一旦不能否认邪恶的存在时，他们又如何不能组织力量与之斗争，却试图立足于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表明这种冒险的事情在理论上是不可可能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在写纳粹运动同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同时他也在预言德国同资产阶级世界后来的斗争以及绥靖政策的心理基础。当他在书中谈到他的党在魏玛共和国如何被剥夺了官方保护，因为警方不去逮捕扰乱和平的人，反而作为预防措施禁止无辜者的合法活动，他是在预示墨索里尼和他自己在西班牙内

H.巴特菲尔德：《马基雅弗利的治国之策》（The Statecraft of Xichiavelli），伦敦，贝尔，1940年版，第130页。

《我的奋斗》，第231—232页；墨菲译本，第183页。

F.A.福格特：《献给恺撒》（F.A.Voigt：Unto Caesar），伦敦，康斯特布尔，1938年版，第116页；参阅贝恩斯：“1933年以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1942年3月，第272—273页。对《我的奋斗》通常轻视的评价，见海登：《元首》，第226—227页。

“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奋斗》，第170页；墨菲译本，第140页。）辛克莱·刘易斯把这个流行的陈词滥调用于他的小说：《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Sinclair Lewis：It Can't Happen Here），伦敦，开普，1935年版，内容有关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被希特勒和路易斯安那的休伊·朗合而为一的独裁者赢得胜利。

《我的奋斗》，第736—737页；墨菲译本，第529页。

《我的奋斗》，第450页；墨菲译本，第840—341页。

参阅纳米尔：《外交序幕》第60页，第148页关于绥靖的尖刻句

《我的奋斗》，第545页；墨菲译本，第403—404页。

战中要使国际权威处于衰弱地位。他对 1939 年以前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了判断，他认为民族精神比武器军备更重要，而且认为在一个多数人至少是消极地反对任何坚决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无足轻重。

但是，《我的奋斗》的迷惑力比上述更为深刻之处倒不在于对希特勒的敌人描绘，而是在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描绘。《我的奋斗》很可能是反映一种心理现象，亦即把一个人自己无意识的态度转到一个替罪羊身上的政治著作中最持久的例子。正是在这种间接和反射的意义上，而不是直接的意义上，《我的奋斗》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经典。在希特勒描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威胁的时候，浮现出深仇大恨的图景是他本人、他自己的策略和他自己的运动的图景。人们一般都忘记了，在《我的奋斗》中有两段著名的描写宣传的威力的文字，都间接地提到了希特勒。“谎说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这条原理正是犹太人把 1918 年的崩溃归罪于鲁登道夫的 22 原理，而正是“只有犹太人”对·认识到有效而不间断的宣传能把天堂说成地狱，把最悲惨的生活说成是乐园。希特勒描绘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恐怖和肉体威胁的方法，描绘他们以对无产阶级的挑衅的罪名来破坏或阻挠资产阶级会议的技术，描绘社会民主党颠覆工会运动，描绘议会各政党的纲领对社会各阶层都答应他们的每一项要求的时候，他是在叙述纳粹分子赖以夺取政权的方法，他庆幸自己已从对手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他说犹太人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国界，而是分布在全世界，纯粹由单一种族的成员组成；结果犹太人已经形成了国中之国。对东欧人来说，这更象是在描写德国人，而不太象是说犹太人；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代表德意志人宣称，他们也应该拥有一个领土不受限制的国家——

德国的国界是机会的产物，而且仅仅是暂时的国界，是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斗争的结局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是由人类建立的，也可以由人类来改变。

他写到迫在眉睫的犹太人征服世界，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若不囊括全世界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只要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就可以动摇它，这个时候，他是在描绘纳粹帝国主义的逻辑，它为同一个命数所驱使而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经受了未能征服英国的惩罚。

“只有在妖怪的头脑里，”他写道，“而不是在人的思想里才能形成这个组织的计划，它的实施最后将使人类文明毁灭，世界化为荒漠废墟。”在这种疯狂地失掉道德平衡和辨别力的情况之下，仇恨者与被恨者难以区分了，而希特勒本人也为自己下了定论。

《我的奋斗》的实质就是仇恨，而仇恨的中心目标就是犹太人。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中欧长期传统的顶峰。希特勒仇恨犹太人是在舍纳勒和卢埃格尔那个时期里从维也纳得来的。但是，他之所以相信犹太人的世界性阴谋，其可能的来源是卹山长老文件，这是一份伪造文件，来自政治上无知和心怀恶意的与《我的奋斗》相同的土壤，来自与《我的奋斗》一样一知半解、识

关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等同的理论，见同上书，第 54 页，第 350—351 页；墨菲译本，第 55 页，第 268 页。

同上书，第 252 页；墨菲译本，第 198 页。

同上书，第 302 页；墨菲译本，第 231 页。

同上书，第 45—46 页，墨菲译本，第 48—49 页。

见肤浅地相信世界上有各种阴谋、有地下独裁者和秘密武器，相信犹太人、耶稣会士和共济会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在。《我的奋斗》是以该文件为前兆的现实。但是希特勒在他一见到一个犹太人时的激烈反映——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得最生动的各页中之一页——则是他自己所特有的，而随之而来的加深的仇恨就是他的思想的最邪恶的表现。他的反犹太主义超越了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解释，而最终必须用心理学和神学的词句来说明。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对新约的颠倒，是救世主故事的世俗翻版，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是对旧约的颠倒，是自命为新的上帝之选民，盗用了上帝的许诺而未接过上帝的判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其根源就在于这个宗教上的篡夺。纳粹的魔鬼学说确实是被利用于政治目的；如同大多数暴政统治一样，一个既可作替罪羊又可充当妖魔的 324 对手，正是法西斯宣传的一项需要；而犹太人威胁对于希特勒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是极端重要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他的党兽性大发，来威胁他的反对派，来把德国人民、整个东欧的统治阶级和所有在国外的那些受到反犹太运动病毒腐蚀的分子（反犹太运动标志着一个处于危机中的社会）都粘结在一起来拥护他。希特勒的天才把崇拜教义的狂热情绪同对权宜手段最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尽管如此，他的反犹太主义远非是单纯的策略问题；这是他的最终信仰。1945 年 4 月 29 日，他自杀前的那天，在柏林地下碉堡内他们的帝国废墟之中，其口授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责成他的继承者必须“在一切之上，最严厉地执行各项种族法令，无情地抗击全世界各国的放毒者，国际犹太人”。——

因而这两点就说明了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大致分歧（托因比：《研究》，v.383—385；vi，97—101；参阅《概览，1938 年》，第 121 页注；《概览，1934 年》，第 978 页）。

参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232 页。

同上书，第 233—234 页。

（三）希特勒对外政策的方向

贝尔福早在 1916 年就看到，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被击败，如果同时奥匈帝国瓦解的话，德国在中欧与东欧的统治地位仍然会加强。21919 年，德国虽然被暂时击败，但它在欧洲的潜在力量相对地大于 1914 年。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中，德国受到的损失最小。它完全在国境以外作战。实际上德国全靠自己 1917 年就已击败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军事对手。俄罗斯帝国被击败是由于 1918 年 3 月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强加于它的布尔什维克继承人而得到确认。法国在 1917 年兵变之后已经不再是西线协约国中最大的军事强国，而且把西线的主要部分拱手交给英国，就象贝当所说的，满足于“等待美国人和坦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反抗；但是它的情况还不同于俄国的痉挛惊厥和法国的精疲力竭。俄罗斯帝国的瓦解比德意志帝国更富有戏剧性：它失去的领土更多；它在内战中陷于分裂，最高权力为革命集团不稳定地掌握着，这个集团的成功是以被国际社会完全排除在外的代价换取的。法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文明，社会更复杂的国家，成了战争的主要牺牲者：它的最富饶的领土夷为 25 荒地，人口减少在加速。在德国，由帝国向共和国的过渡在没有任何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帝国的团结得到加强，1918 年的“革命”提供了不是革命的革命的范例；统治阶级、军队、政府机构都不受干扰地保持统治。

德国地位的主要变化是由东欧另外两个军事王国的消失造成的，一个是俄国，是由德国自己毁掉的，第三个是奥匈帝国，过去曾是它自己的伙伴。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就面向西方。它的注意力在莱茵河，有争议的边境省份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它的东邵边界一百年来没有出过问题。它同俄国隔着被瓜分的波兰国，并沿着波希米亚的山地边界转回到西方和南方。但是这个表面上已经解决了的边界隐藏着弱点和变态；因为普鲁士国家同德意志民族在范围上有区别，它们只是在俾斯麦的帝国中暂时地会聚在一起。1815 年的德意志联邦继承了古代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一方面包括了哈布斯堡皇帝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土，另一方面又放弃了普鲁士国王的波兰各省。1866 年德意志邦联解体，由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拥有波兰领土而放弃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德国。最后在第二帝国中屹立的普鲁士—德国，包含着五分之一的波兰民族，却排除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一千万德意志人。这是由于执行小德意志政策的结果，这是俾斯麦终身争取和维护的微妙平衡。这样就需要在普鲁士的波兰各省维持普鲁士贵族的统治，并在德意志居民和他们的马扎尔人同盟者的控制下维持哈布斯堡君主国作为一个独立而多民族的国家。

“欧洲的和平解决”，1916 年 10 月 4 日的备忘录，载于戴维·劳合·乔治的《战争回忆录》

(Davi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伦敦, 尼科尔森和沃森, 1933 年版, ii.877—888, 还载于布兰奇·达格代尔的《阿瑟·詹姆斯·贝尔相》(Blanche Dugdale: Arthur James Balfour), 伦敦, 哈钦森, 1986 年版, 第 2 卷, 附录 ii。

参阅《我的奋斗》，第 763—764 页；墨菲译本，第 547 页（引文见上文，原著第 322 页注(11)（即木书第 540 页注——译者）】。

克鲁特韦尔：《大战史》，第 416 页。

《概览，1920—1923 年》，第 69 页；并见上文，原著第 166—167 页。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东欧革命，把这两项目标都给毁了。俄罗斯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波兰的解放和失去普鲁士的波兰各省。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意味着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漂泊不定，并意味着实行大德意志政策，把所有的德意志人包括在一个国家之中终于有了可能。东欧一连串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从芬兰到阿尔 326 巴尼亚，都为德国在它的东部边界上提供了全新的势力安排。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直能够扩展它的东部边界，兼并由弱小公国组成的缓冲地区。现在为德国在东方开放了一个相似的缓冲地区。它首先是在 1918 年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建立的，这个条约把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俄属波兰、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高加索从俄国分开。“在二十世纪，在向东再去五百英里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拿破仑莱茵联盟计划的新翻版。”暂时，这个德国计划由于在西方被击败而受到挫折，但是德国东部边界的新情况仍旧存在；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德国朝着这一方向的扩张是肯定的。

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人可以默认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并接受同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西部新边界。他们却不能同意东部的让与——失掉但泽；把西普鲁士和波森割让给新的波兰国家，把东普鲁士从帝国身上割去，把上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从帝国分割出去。施特雷泽曼 1925 年在一封著名的致前王储的信中规定：

德国外交政策在近在眼前的将来百临的三大任务——

首先是在德国能够忍受的意义下解决赔偿问题，保证和平，这是恢复我们国力的保证 [？前提]。

第二，保护在国外的德意志人，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万我们的同族正在外国的土地上，生活在外国的枷锁之下。

第三项大任务是重新调整我们的东部边界；收复但泽、波兰走廊和修改上西里西亚的边界。

在背后还存在着同德意志的奥地利统一问题，虽然我很明白这样不仅不能给德国带来好处，而且会使德意志帝国的问题变得严重地复杂化。1925 年的洛迦诺条约展示了德国政策的这个总方针。上述条约通过对法德边界和比利时德国边界的相互保证，以及对非军事地区的共同保证，来稳定德国的西部边界。

但是，德国拒绝作出类似保证来接受东部边界，当时它希望通过和平改变来纠正。法国人认为它的东部盟国的 327 安全对法国安全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能象对法德边界作出保证那样也对波德和捷德边界作出保证。不过，英国拒绝把它承担的义务扩大到东欧，却支持德国的理由；结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洛迦诺条约所得到的，只是同德国的仲裁条约以及同法国的互助条约。因此，洛迦诺条约虽然为西欧的安全和信心开辟了新时期，也为德国参加国际联盟作了准备，但它也透露：德国有义务尊重西部边界，不是基于

丘吉尔：《后果》，第 97 页。

希特勒在政治上最先获得的成功就是预言：尽管德国在 1921 年的公民投票中取得胜利，但是会失去上西里西亚的谋田（见海登：《元首》，第 94 页）。关于公民投票本身，见《和会史》，iv，261—265。

《概览，1925 年》，ii,28。

同上书，第 30 页。

同上书，第 49—61 页。

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是基于后来在洛迦诺谈判期间它自愿作出的同意：既然它并没有自愿同意接受它的东部边界，它也就没有义务尊重它。这一美景暂时被各项仲裁条约、国联盟约的各种义务以及根据盟约第十九条关于和平改变的规定所织成的迷雾掩盖了。

但是，在法国同唯一能对德国东部边界单独施加压力的国家苏联签订法苏条约的时候，希特勒便以此为借口废除洛迦诺条约和重新武装莱茵兰，这正是洛迦诺符合逻辑的后果。洛迦诺的力量均势随之便从法律义务的语言转而变成堡垒和军备的语言：齐格菲防线巩固了法德边界，而德国安全地准备以武力来改变它的东部边界。德国在东欧的优势基于两个传统和两项具体资产。第一个传统是条顿骑士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优势，其中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德裔居民中失去产业的贵族便是这种遗迹。这一传统的社会动力是德国东部的普鲁士贵族。他们是东部殖民土地的农业大资本家，他们的祖先是条顿骑士，这些“生财有道的老手”征服和没收了斯拉夫民族的土地，使之成为无土地的劳动者。在德国人的思想中，斯拉夫人和奴隶仍是无甚差别；斯拉夫人是基督徒的世仇，就象热尔贝曾经称呼他们那样，尽管斯拉夫人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基督徒，德国政府倒恢复了异教徒的信仰；而对易北河那一边人民的剥削，照德国人看来从来是开化的使命。俾斯麦的 1886 年波兰没收法以及 328 在比洛的统治下对波兰人的加倍迫害，都被认为是德国文化对野蛮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东部铁路，即柏林以东的第一条铁路，被普鲁士贵族称为是“自从条顿骑士以来德国对东欧最大的挺进”。德国的边界传统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的一切野性和气势——回溯到立陶宛的追捕逃犯，那是没落中的条顿骑士冬季的消遣；到 1147 年文德人的十字军行动，口号是不接受洗礼便灭亡；到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向波罗的海地区的定居者发出谕旨，他在那里建立起吕贝克，回溯到十二世纪大德意志殖民运动初期宗教的和世俗的萨克森王公们早期发出的呼吁，那时易北河以外的肥沃和无垠的土地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北部各民族就象美国获得独立初期时对于俄亥俄河以外的土地一样；甚至或许可以溯源到八世纪后期的各次战役，那时查理曼蹂躏了撒克逊人，而且首先强迫他们信奉基督教，后来又强迫斯拉夫人信奉。在这种普鲁士和波罗的海传统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艾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是爱沙尼亚的德意志人，俄国革命时正在莫斯科学习，逃出来之后取得了德国国籍，在 1923 年促成了希特勒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会晤。

第二个传统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的。奥地利 329 一直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德意志文化的旗手，就好象普鲁士是山脉以北的旗手一样。从历史上看，奥地利的的作用比普鲁士更晚一些，然而更重要，而且是由哈布斯堡

王朝整个时代来正式代表的。它因土耳其的征服东南欧而发挥作用，使奥地利成为西方基督徒的堡垒。但是正如这一作用是强加于哈布斯堡王朝——它们的政策到那时为止一直是贪得无厌、优柔寡断和不光彩的，同样地，在土耳其的威胁已经衰退，因此其必要性也随之失去很久之后，他们仍然想

《热尔贝信件集（983—997 年）》[JettresdeGerbert（983—997）]由朱利安·阿韦写了前言和注释出版（巴黎，皮卡尔，1889 年版），第 92 页。参阅 1910 年 10 月 16 日威廉二世皇帝对爱德华·戈申爵士的谈话：“我完全支持白人反对黑人，不论他们是中国人、日本人、黑种人还是斯拉夫人”（古奇和坦普莱，vi.531）。

办法利用这个作用的好处。在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逐渐羸弱，秩序混乱，成为欧洲的中国；它的生命力已丧失殆尽，对帝国复兴中的各民族除了要求对一个顽固不化、昏庸不堪的王朝表示尽忠以外，已毫无裨益。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它仍自诩负有在东欧各民族中传播德意志和大主教文明的使命，作为毫无效率和高压统治的画皮。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所依仗的两项具体资本是人口众多而分布广，还有它的经济实力。十九世纪欧洲人口的主要变化就是德国人口的增长成为欧洲——除俄国人以外——最多的。强调这一数目优势是纳粹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正是德国人口的政治分布使得德国在一些大国中显得独特。1938年以前，德国从来不曾接近达到别的民族那样的民族与国家相互一致的性质。欧洲330的操德语人口同德国居民是两回事。直到1866年为止，帝国的疆界，随后是邦联的疆界之内，都拥有德意志人的大多数，尽管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从1866年到1938年，中心的德国排除了周边大约占潜在的全民族百分之十五的说德语的人民。一直到1938年德奥合并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主要德意志国家边界之内包括了欧洲十分之九以上的说德语人民，还不算相当数目的非德意志居民，大德国出现了。

但是，德意志民族的分布尤为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紧密地集合为一体。在整个东欧都有互不联系的德意志居民群，要把他们合并到德意志的中央国家，只有通过把非德意志民族也合并进来才有可能，而德意志人在他们之中又只是少数民族。除了芬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之外，每一个东欧国家都有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波罗的海贵族”，他们是最初征服波罗的海沿岸的十字军的后裔，以及开发这一地区的汉萨商人的后裔。在立陶宛，有一个由德意志新教徒居民构成的少数民族，他们于十九世纪初为逃避在德国受的压迫而跑到俄罗斯帝国的这个省份避难。梅梅尔原是一座德意志城市，在它的土地上将近一半人口是德意志人。波兰在波兹南和波莫瑞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当它们是波森和西普鲁士的时候，普鲁士努力实行德意志化的结果；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还有另一个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原俄属波兰有德意志移住民，他们是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罗兹；在波兰再往东部一些则有德意志农业移民的集团，他们是在十八世纪末定后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和海乌姆的。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人数比任何国家都多，他们在居民中历史悠久，以致人们争论他们究竟是移民还是本地居民。他们大多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他们大多在这几省的边缘集中居住，包括主要的矿区和工业区，不过别处也有大块德意志人的飞地，在主要城市中，特别是在布拉格，也有德意志居民区。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特尼亚，有不同祖先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古匈牙利移民的后裔。匈牙利本身的德意志人，

其古老程度仅次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人。中世纪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这些纯农业经济的落后国家的国王们都曾鼓励德意志人移民，尤其是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并且有好几百年之久由德意志人提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直到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匈牙利城镇都是德意志人占优势，尽管他们多半已被马扎尔人同化。此外，还有一些说德语的农业移民区；这些区有的起源于中世纪，但是大多数都建立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推行移民计划的时候，是从土耳其人手中重新夺回国土并将南方德意志人或“施瓦本人”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大部定居在布达佩斯周

围、巴拉顿湖以北和西南地区。根据特里亚农条约的规定，施瓦本人移民区从伏伊伏丁那改属继承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德意志人移民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有一些。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分布得最为广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从十三世纪以来的移民，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享有特权的民族之一，保持了高度文明的传统以及精心构成的民族组织；在巴 332 纳特是施瓦本人；在布科维纳，在比萨拉比亚，还有多布罗加，是人数较少的德意志居民群，主要溯源于十九世纪。在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无足轻重。但是在一千多英里以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另一个德意志人的社区，建立于凯瑟琳大帝之时，1923 年正式成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它只是在 1941 年秋天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才被苏维埃政府驱赶到西伯利亚。

德意志人是东欧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而由于他们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联系，变得极其危险。就象所自发源的那个民族一样，他们大部在传统上忠于居住国的政府，经济上先进繁荣，依恋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听话而有价值的移民。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那场革命先已落到帝国的德意志人身上了。在接管政权的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境以外的所有德国公民吸收入党，要唤起所有德意志少数民族觉悟到是同种的同志，德意志人的成员。一个同种的同志的定义就是德意志后裔和德意志血统的任何人；德意志民族有别于德国，据称有一亿人口；而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已转变成为有独特力量的国际第五纵队。

德国在东欧占有优势的第三项具体资本是基千它的雄厚经济实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一百年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霸主，随着德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就如影随形地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东欧和近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这个概念里，各种经济考虑总是从属于权力考虑。普鲁士各邦关税同盟的原意是促进德意志北部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但是后来就象利斯特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德国为了战争目的实行经济统一的工具，就体现了这种特色。因此，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以经济理由作为德国有权统治东欧的论据。确实，对于东欧国家来说，

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提供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德国作为它们的农产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东欧各国对德国并非十分重要。同德国总的贸易相比，德国同东欧的贸易是小额的。德国在东欧努力实施其经济霸权，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德国要求统治东欧，一百年来主要体现在关于中部欧洲的概念上。这是以奥地利帝国为一方同德意志联邦和帝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说需要在德国领导下统一中欧。利斯特——普鲁士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的倡导者，终于认为德国命定的目标不是向西跨越海洋，而是朝向多瑙河流域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他首先想出了柏林—巴格达铁道的办法。布鲁克是建设劳埃德·的里雅斯提诺

关于利斯特对军事思想的贡献方面的有益材料，见爱德华·米德·厄尔所撰“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军事国家的经济基础”，载于《现代战略拟订者：从马基雅弗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爱德华·米德·厄尔编（Edward Mead Earle,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公司和的里雅斯特繁荣商业的德国商人，在施瓦岑贝格下面任奥地利商业大臣，他希望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合并到德意志联邦之内，以便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中欧的主人。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按 1867 年的协议转变为奥匈二元帝国，以及在 1871 年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于是一个实验性的中部欧洲成为现实，而凭借的则是德国所获得的凌驾奥匈帝国及其皇帝之上的权力。奥匈协议使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奥地利处于最高地位，使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处于最高地位，同时又使两者最终仰赖于柏林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中欧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中部欧洲终于完全实现，此外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几年还产生了对它的经典性理论说明。__世界大战证明了奥匈对德国的价值。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眼光短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不是对俾斯麦）来说，好象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物，事实却证明是中部欧洲、德意志世界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连最极端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也转向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所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现在有了共同的政纲——要保留奥地利，在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并牢固地适应德国体制，它的政策要从属于中欧政策，哈布斯堡的全部遗产都要接管并由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力量来加以巩固。通过中部欧洲，奥地利德意志人既回到了泛德意志思想，又回到了大奥地利思想，此刻两者相互调和了。他们再次看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作为其一部分，他们重新开始了一种对于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他们来说是范围很大的“帝国主义”。__对于纳粹的外交政策，根据上述向东扩张的传统所作的推测很多。在希特勒同波兰签订惊人的协议来开始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很容易假定，他既然是奥地利人，他的政策一定是哈布斯堡传统，而不是普鲁士传统，又可假定在实现他的公开表明目标德奥合并之后，他就会恢复历史上向东推进的政策，推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确实，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影响应该是赞成向西北方面扩张，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直到 1939 年 3 月，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同波兰缔约，接着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证实了第一个假设。错误在于以为纳粹政策只把它自己限于上述政策中的一项，好象它们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似的。希特勒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十分轻视他们的反民族政策，就象居留在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对他们一直在深思熟虑的治国术的各种问题根本不了解一样。他的根源是大德意志，但他又成为小德意志的元首，大的包括小的。他的反俄政策直接来自哈布斯堡传统而非霍亨佐伦传统，但他自己用古德意志命运的措辞加以表述，却又

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4 年版，第 138—152 页。

《概览，1933 年》，第 184—186 页；《概览，1934 年》，第 386—387 页；《概览，1935 年》，i.60，204—210。当时还不知道，希特勒只是在 193a 年秋季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被贝奈斯拒绝之后，才同波兰谈判同样的条约的（见贝奈斯 1944 年 4 月 20 日致纳米尔的信，载于纳米尔：《衰退中的欧洲》，第 281—282 页）。

见《我的奋斗》，第 1 页。

关于“罗森贝格计划”，见《概览，1933 年》，第 176 页和注。

见《我的奋斗》，第 13—14 页，第 100—103 页，第 118—119 页，第 139—143 页；墨菲译本，第 26—27 页，第 88—91 页，第 102 页，第 118—120 页。参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46，55。

见泰勒：《德国史教程》，第 218—219 页。

先于哈布斯堡和霍亨佐伦。他的外交政策把哈布斯堡传统和普鲁士传统混在一起，同时他又超过了这两种传统，就好象拿破仑的政策超过了波旁王室的扩张传统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远远不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恢复第二帝国以前的边界；它的最终野心超过了普鲁士祖先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哈布斯堡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的主宰地位。旧的中部欧洲观念为生存空间的新理论所改变和吞没了。

这一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和骚乱之中发生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激变。六个世纪之中第一次，在帝国和欧亚大陆的无林大平原之间没有大国阻碍了，而在战争危机达于顶峰的六个月里，德国的统治从索姆河扩张到顿河。这才是希特勒想要恢复的帝国。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地越过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行动路线来制定一条路线。我们停止了德国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不断的进军，而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东方的国土。我们最后停止了战前时期的殖民和贸易政策，转而执行未来的领土政策。不过在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应当想到俄国和依附于它的周 336 边国家。……今天，在欧洲有八千万德意志人。在仅仅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大陆上将居住著二亿五千万德意志人，不是象在另一个大陆上挤在工厂里当苦力，而是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他们生存的共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执行的。——俄国和普鲁士由于征服波兰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了一百五十年。1914 年，俄德之间爆发了自七年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战争，波兰问题又一次摆在欧洲政治的最前线。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出现了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代人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利益所在，现已成为德国政策的必然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新权力体系确认：越过一条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带，德国人回到乌克兰的路是永远畅通的。原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居住在柏林附近的万湖，根据情况他有时是流亡者，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

《我的奋斗》，第 736 页，第 738—739 页；墨菲译本，第 529 页，第 530—531 页。

参阅上文，原著第 211 页注（即本书第 343 页注——译者），以及原著第 282 页注（即本书第 467 页注——译看）。

《我的奋斗》，第 752 页；墨菲译本，第 533 页；分别参阅第 154 页及墨菲译本，第 128 页。（在《我的奋斗》中，未指名提到乌克兰。）大约在希特勒写这段话的同时，丘吉尔正在阐述同样的德国政策的目标，这是在他批评法尔肯海因于 1916 年决定向西方而不是向东方进攻时谈到的。“看来，1916 年德国的真正战略目标是黑海和里海。这些都是举手可得之物，而并非力所不及之事。如果继续向俄国南部进军，进入乌克兰，直捣敖德萨，就会以较小代价得到条顿族足够的粮食。……用白白浪费在对凡尔登的进攻上的一半的力气，四分之一的牺牲，就可以克服‘在富饶的乌克兰土地上’交通不便的困难”，温斯顿·S·丘吉尔：《世界危机，1916—1918 年》（The World Crisis, 1916—1918），第 1 编（伦敦，巴特沃思，1927 年版），第 80—81 页，第 82 页。该卷序言的日期是 1927 年 1 月 1 日《我的奋斗》第 2 卷于 1926 年 12 月 10 日出版。

H·威克姆·斯蒂德：《哈布斯堡王朝》（H.W. Wickham Steed: The Hapsburg Monarchy），第 4 版（伦敦，康斯特布尔，1919 年版），第 289—293 页；艾伦：《乌克兰》，第 251 页；威斯克曼：《不宣而战》，第 196—197 页。

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 73 页，第 80 页，第 122 页；贝洛夫，I. 94。

的奋斗》中的广泛言论；而由于接管了政权，乌克兰计划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中公开承认的部分。__如果我们能随意处置〔1939年希特勒在一次著名的轻率讲话中说〕乌拉尔山脉的无尽宝藏和乌克兰平原的无垠沃土，而且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开采生产，那德国人民就会在财富之海中游泳。在希特勒的秘密建设中，需要生存空间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主题而始终强调的。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求把这些思想看成是他的临终遗嘱。一开始，他就陈述这个原则：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空间需要的解决”。他随后检查了扩张的需要能否用自给自足的办法或是用更多地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来抑制。德国在现存的边界以内在原料供应上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33%自给，而完全不能达到粮食自给。世界经济则由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帝国的形成而已经在瓦解。因此，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我们看来也许是空中楼阁，在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寻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形成和民族迁徙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粮食情况的安全是主要问题，那么，保证这一安全的必要空间就只能在欧洲去寻求，而不是象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去寻求。这不是增加人口的问题而是获得为农业用的空间。此外，出产原料的区域可以更实用地在欧洲毗邻于帝国的地方去找，而不是到海外去寻；这样获致的解决办法谅必足够一两代人之用。……德国的问题在于：从何处能以最低代价得到最大收获。__

他在会上对这问题未予解答，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本人十一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答案。__征服和肢解俄国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__在机会主义和策略变换的背后，这项目标保持不变。“但泽不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他在1939年5月说，当时但泽危机正在酿成。“这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粮食供给的问题。”__在1939年11月23日的会议上，他又一次说，我们愈益增加的人口要求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是在人民的数目和他们生存的空间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把德意志人的人数同可利用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必须得到必要的空间。任何聪明的算计都毫无帮助，只有用剑才能杀出一条血路。__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德国对外政策的前途》（Alfred Rosenberg：

Der Zukunftswege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慕尼黑，埃尔，1927年版，第97—98页。

在纽伦堡党代会对劳工阵线的讲话，1936年9月12日〔《概览，1936年》，第381—382页和注，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1.29〕。

霍斯巴赫备忘录，《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xxv.404（386—pS）；《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i.30；《文件，1939—1946年》，i.17；参阅《阴谋与侵略》，iii.296。

(四) 希特勒对外政策的特征

不侵犯他国的国家，倾向于从合作中寻求安全，以便维持均势。扩张中的国家则谋求分而治之。对敌人各个击破，对目前要搞的对手加以孤立，避免全面谈判：这些就是一切侵略治国术大师们的原则。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从其主要路线而言，是同俾斯麦、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路线一样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强调外交政策目标的简约性。他攻击议会空谈家，他们把愤慨花费在南蒂罗尔问题而不是放在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__“因为我们不停地对五国或十国吼叫，我们就不能集中民族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最凶恶敌人的心脏给予打击。”__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一旦纳粹执政，虽然保留了原则，但是其实践却是相反。打击的不是最凶恶的敌人，而是逐步升级，从最弱小和最无害者开始。__胖特烈大帝有一次赞同地引用一位萨瓦亲王的经典说法：“我的儿子，米兰人象是朝鲜蓟，必须一片一片地吃掉它。”__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__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简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了描写，而这一规则的关联性在西方各大国人民之中仅仅是很缓慢地才被认识到。

精明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勒索永远都是尽可能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就可以预期一个失去所有骨气的民族——自愿屈从于对手威胁的每个民族都是这种情况——在面临任何这些压迫行动时，如果这些行动又是分开实行的，就不会有充分理由重新拿起武器。消极地接受勒索的次数越多，在其他民族看来反抗就越没有道理，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在经受长期压迫之后最后想要通过反叛来结束压迫的话。而如果这个民族业已长期沉默地忍受苛刻得多的盘剥，那就尤其如此。

希特勒预测和利用的不仅是他的牺牲者的弱点，还有他们的长处；例如，英国政府坚持谋求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坚持到了极端的程度，以致容忍挑衅，实际上丧失立场，也不肯对加速另一次战争负责。1934年流产的奥地利暴动，是错误估计了力量，那是希特勒在1938年以前唯一的引起了对手调动军队来反对的政变。希特勒成就中并非最小的就是他成功地掩饰了这件事，还掩饰了一个月前德国国内的一场屠杀，这是就外国的舆论而言；除此之外，到1939年3月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一系列完善地逐步取得的胜利，而且每一项胜利都逐一得到西方大国舆论界主流的认可 and 喝彩——1933年10月14日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1934年1月26日签订波德条约，1935年1月13日举行萨尔公民投票；1935年3月10日宣布德国空军已经重新建成，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实行义务兵役制，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莱茵兰；1936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罗马—柏林轴心，1936年11月18日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1936年11月25日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1938年3月13日同奥地利合并，(11)以及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第一次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一个时期”，希特勒在1939年5月说，“已经很好地加以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在哪一点上是其他大国应当协同加以抗争的呢？每一事件如就其是非曲直来进行争论，全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的不公正部分予以纠正，或者看作是巩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回溯历史，显然重新武装莱茵兰是分水岭，在那以后事件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不可遏止了。但是在当时，鲍德温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我们只是要保持沉着，保持镇静和继续设法使法国和德国都同我们友好。”

希特勒政治手腕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巧妙地利用时机的艺术。他用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外交突然行动都照例选择在星期六，这时英国式周末意味着他主要潜在对手的政府机器要采取紧急行动是十分不便的。比起利用他的敌人的社会惯例更为重要的，则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见。1935年夏季，纳粹分子急切地等待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战争，盘算着这将为欧洲局势带来骚乱，他们可以从获利：使他们得以重新占领莱茵兰。西班牙内战则为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背景。

由于世界形势政治上的不稳定，发生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1）在任何时候可以应战，以及（2）能够在军事上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政治机会。

1937年秋季，德国人看出，法国内战或者法英意之间地中海战争的爆发，将造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机会。“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理想，”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会议上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的继续和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在慕尼黑之后，他已取得了欧洲的独霸权，上面的考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作出了方向的改变。不过希特勒选择时机不仅是灵巧的机会主义。这最终取决于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实力同变动着的欧洲力量均势的关系的判断。1933年2月20日，他在一次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如果我们想要把另一方彻底粉碎，首先必须把全部权力拿到手。只要一个人权力仍在增长，这个人就不应该发起打击对手的斗争。只有在一个人知道他已达到权力的顶峰，再也不向上发展了，他才应该进攻。这个原则是联系到德国的政治斗争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两件事制订的。这一选举是建立纳粹政权后的第一次。“我们在普鲁士必须再赢得十个席位，而在帝国要再赢得三十三个。如果我们全力以赴，这并非不可能做到。只有在那时，反共的第二次行动才能开始。”但是，等待相对的力量积聚到最大的时刻再进行打击，这条实力顶点原则构成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他把1943—1945年规定为标志德国权力的顶峰的年头。342“照我们看来，从此之后能预料的只是往坏的方面变化。”到了那个时候，同其他强国的反措施相比，德国的战备将已达到最高点，而德国武器装备可能过时的危险将会增长。“征募后备役军人只限于当时的那一档年龄的人；进一步从年龄大些，缺乏训练的那些人当中征兵不再有效了。”随后的任何一年都能给德国的食品供应带来危机。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造成的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危险，“〔纳粹〕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老化”，都意味着走下坡路的趋势那时就要开始。“今天，没有人知道1943—1945年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现在还活着，至迟在1943—1945年，他的无可改变的决心就是要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一年份限制之内，由于抓住有利的意外事件，诸如法国的内江或是法意之间的战争，军事行动的时间可以提前。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

他的司令官们说，欧洲局势中的一切因素目前都有利于进攻波兰。“对于我们来说，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只会有所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局限性，我们不能支持到几年以上。”随着波兰的倾覆，力量顶点看来是明显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手，”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说。“现在有一种力量关系，它对我们永远不能比现在更为有利，而只能恶化下去。……今天我们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势。”也许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缺陷，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在利用有利机会与等待德国力量的集聚超过其敌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他表现出愈来愈倾向于前者；长343期以来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使他的判断的敏锐性减弱，而赌注加倍的趋势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政策所固有。

一个侵略性国家往往独立行动；除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它对于同其他国家实行合作总是谨慎小心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就是双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为君之道，以不受制于人为上策。”象拿破仑一样，希特勒的目的是同每一个国家单独打交道，而且避免全面谈判。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谈的狂热敌人。他决不让自己被那些认为每三个月就该有次会谈的政治家们拉进这种程序中去。”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是他外交行动合乎逻辑的开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毁弃洛迪诺条约；除了他自己发起的以外，他拒绝参加任何别的多边协议。

但是，政策的独立性一旦获得成功立刻吸引了合伙人和清道夫，这就正面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这些关系。自1936年德国分别同意大利缔结轴心条约，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以来，这一问题就是德国政策所关心的一件事。意大利是最密切的合伙人，但是希特勒每当合适的时候，就不管它而独立行动起来。

1937年9月25日，齐亚诺在访问柏林期间提议，德日条约与意大利人正同东京谈判中的类似条约融合为一。牛赖特说，三边协议并不需要，同日本保持双边协议则是比344较可取的。一个月之后，德国已改变了政策，由它采取主动。里宾特洛甫鉴于他去伦敦的使命失败，不能把英国吸引到反共轨道上来，便到罗马去迫使意大利依附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是据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记载，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的侵略计划中并不存在同意大利合作的问题。

我们进攻捷克人和奥地利的的时间必须取决于英法意战争的进程。……元首的思想中也没有同意大利的军事协定，但是在保持独立行动的同时，想要利用这个时不再来的有利形势，开始对捷克的战役并将其进行到底。

德国将自行其是。这是第二年夏天计划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原则中的第一条德国没有承担义务参加任何会导致德国自动卷入好战的外国冲突之中的军事联盟。按照我自己的自由决定来解决捷克问题，这仍然是我政治意图中的当务之急。

轴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大伙伴的独立性，而在1939年3月危机中表现得最为蛮横。“轴心的作用只有利于轴心的一部分，这部分往往占优势，而且完全自主地行动，很少考虑到我们”。

同样的原则指导着希特勒对他的小走狗的指挥。对波兰甜言蜜语让它充当这一角色，直到时机来到把它转变成为牺牲品为止。对匈牙利的控制要比意大利来得巧妙。它作为东欧次要的主宰民族，是德国传统的盟国；它是比意大利弱小的国家，作为合伙人或是作为独立345的部分，对德国来说都不

太为难。希特勒始终可以告诉它，他不需要它的合作，但是除非它实行合作，否则就分不到残羹剩饭。1938年8月23日，伊姆雷迪访问希特勒的时候，讨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问题，他感到十分宽慰的是，元首对他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不需要匈牙利的任何协助。他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凡是想到餐桌上来的人至少要去帮厨。如果匈牙利希望同总参谋部对话，他没有异议。

五个月以后，希特勒同恰基谈话的时候，把德国及其伙伴比作足球队。关于慕尼黑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在那时希特勒放纵了它们的许多欲望，协调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受到那些不受他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损害。到1939年3月，这个体系有所变化；匈牙利被更紧密地纳入了德国的轨道，而波兰却已陷于合作与敌对之间的中立而软弱的境地。

希特勒外交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别国实行政治渗透和心理麻痹以及激起革命动乱。欧洲历史以前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分辨；在宗教战争中菲利普二世占优势的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另一个狂热和群众忿激的时期。希特勒的政策设想和利用了这种外交上的一片混沌。这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的另一份财产，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时期就宣布“不战不和”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宣而战，即“那种宣传同政治军事威胁缠绕在一起的卓越的极权主义德国式战役——战争仅仅是政策的继续——加上经济压力和最充分地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存在”，是从纳粹革命以来欧洲的实况，并终致取得1938—1939年的巨大成就。随着宣传战之后的军事战，也是不用宣战的形式加以宣布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纳粹政府执政伊始，我同戈培尔有过一次谈话〔乔治·S·梅塞史密斯在纽伦堡法庭的供词〕，我说由于他们在欧洲的作为，将不能逃脱惩罚。他回答说：“但是你不了解我们通过制造不和能做到什么——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做什么事，也不能把事情委过于我们，我们将使这些人自相残杀，使他们自我削弱到尔后很容易落入我手的程度。”我还能想起在他阴险狡猾的表情下，他提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痛处”，抓住这些痛处，通过阴险手段，德国代理人能挑起不和并且使所在国家的各民族自行分裂。

制造革命骚乱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是他引以自豪的“新式武器”。那是宣传、强盗行为和暴动对国际关系行为的适用。他在1932年说：“如何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精神上摧垮敌人——这是使我关心的问题。”由于存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德意志少数民族，在东欧这一任务便易于解决了。

宣传战必须一方面以威胁手段恐吓捷克人，销蚀其抵抗力；另一方面必须暗示少数民族如何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向中立者施加有利于我的影响。经济战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用经济资源加速捷克人的最后崩溃。在时间上，宣传和经济战的开始可先于军事行动。

然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不稳因并有德国第五纵队的347东欧各国，而是在西欧最大的国家法国，希特勒的制造精神崩溃先于军事交锋的技巧产生了最显著的成果。

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初稿中有一个说明，其中十分精练地概括了纳粹外交的主要因素：“基本原则：造成既成事实以便（1）援助来得太迟——其他国家不进行干预，（2）盟友参加（就象狼一样，也要抢到点儿肉），（3）国家从内部崩溃。宣传工作：对德意志人下达指示。对其他人进行威胁。”

希特勒的政策表明，他的个人哲学与大政治冒险家，如拿破仑、腓特烈、瓦伦斯坦和切萨雷·博尔贾，所特有的哲学是相同的。这是一种三重信仰，把各种极端融合在一起——宿命论，与命运合作的观念；极端坚持个人意志，作出蛮横决定的神秘性；迷信机会，迷信事情的突变，这些突变给予领袖以灵感的干预机会，克伦威尔称之为“天意”或“天命”。上述因素一再作为希特勒的政策基础出现。他说：“我象一个梦游者那样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着。”这也许是他所说过的话中最可怕的一句了，发出一种无可抗拒的革命进军的威胁。这种威胁本身就是对手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但是有些时候，他似乎又不体现或听从命运，而是同它搏斗，就象克伦威尔同上帝搏斗一样。“只有同命运搏斗的人才能有良好的直觉。过去几年中我经历了多次有赖直觉的事例。”他的直觉向他展现出那些可以抓住或转变命运进程的关键性时刻。“无意已定，助我成功。另外，我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大致进程，而且我还有坚强的意志作出严酷的 348 决定。”作出严酷的决定可以使人陶醉，几乎其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最后一次危机中，他对亨德森说，他是“一个作出各种重大决定的人。……”

元首重复说他是一个作出无限决定的人，他自己也受到这些决定的约束”：无穷的策略性决定，每次都伪装成有无限约束力，乃是机会主义的彻底表现。正是领袖的决定性角色才使得他的各项决定既令人满意又自认有理，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元首说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元首的一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项不可改变的决定，如 1939 年同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被另一项决定取消，如 1941 年入侵俄国，这并不使它们的不可改变性失效。每一项决定在当时都是策略上合理而在感情上令人满意。对于不可改变的决定，正如对永恒的友好条约，总附带有心照不宣的情势不变条款；希特勒政策与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太不老练，以致没有用辩证法的理论来证明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是合理的。

技术和命运是马基雅弗利钱币的两面。希特勒的政策除了扩大德国的权力以外没有其他原则，实际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海登把希特勒政治方法的秘密描绘为“政治家行动的范围愈大，他就可以愈多地期待一个困难由另一个困难所取代并从而得到解决。”一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这个秘密才失灵，行动范围的增加开始造成报酬递减，而困难则变得递增而不是一个接替一个和自相抵销的。

权力脱离道德越多，它就表现为机会主义。既然它除了自身的扩大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权力也必然按比例地变成破坏性的。因此，机会主义转成虚无主义。希特勒的机会主义推行到很可能是西方史无前例的程度。既然他的目标是无限的，他的方法是不受与任何外部标准一致的限制的，他的权力一旦受到阻遏，往往要既毁灭权力本身，还要毁灭权力所施行的范围。不论他对魏玛共和 349 国宣战或后来对西方社会宣战，都不可能有不分胜负的海登：《元首》，第 592 页；参阅第 293 页。

希特勒一生中等待机会最富戏剧性的例子也许是 1945 年 4 月，当时期待罗斯福的逝世能改变德国的命运，如同 1762 年伊丽莎白女皇的逝世改变了普鲁士的命运那样。在这里，破产的赌徒对运气的崇拜落到一无效果的境地，见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第 109—112 页。战斗或折衷的和平。“任何折衷的希望都是幼稚的：非胜即负！问题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命

运，而是谁在将来统治欧洲。”这一决心深藏在有关投降的神话中，按其定义而言，投降将永远不会重演，代替投降的另一条路就是超出目的范围之外的继续对抗冲突，走向自我毁灭和普遍毁灭。这就是真实可信的第三帝国的虚无主义。成为世界强国或衰微没落是它的基本问题，而它的最深刻的逻辑驱使它先经历第一个角色，然后再是第二个。

（五）希特勒对外政策中的各种联合

希特勒把国际社会分为三类——为了获得德国的生存空间而确定为征服对象的国家；敌视德国扩张而成为必然的敌人的国家；可以扮演暂时同盟者角色的国家。第一种类型是俄国；第二种，法国；彼此大不相同的第三种类型是意大利和英国。但是随着德国扩张的逐步实现，上述三类将减少为两类——需要彻底摧毁的国家和可以作为附庸国而被准许保持有限存在的国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或在私人谈话中谈到俄国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或则把俄国看成是一个拥有潜在生存空间的地理区域或则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国时的区别。他反复宣称必须征服前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对后者要宣战、入侵和战胜。也许他的基本态度是十二世纪德国边境王公的态度，那时对他们说来，东部无边无际的土地是无主人无国家的，居住着原始部落和异教徒，他们是在国际社会疆界之外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再一次 350 沿着原来条顿骑士踏过的原路启程进军。”但是加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的，是要暂时承认现存的国际社会以及作为其成员的苏联。而在这第二个标准上，有可能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权宜之计。

从表面来看，敌视苏联是第三帝国创始的德国新外交政策最显著的特点。它在十八个月内就发动了一场外交革命；1922 年在拉巴洛签订的德俄协约宣告废除：俄国被驱入西方国家阵营，被赶到德国自己退出的国联行政院的席位上去，并被驱使同法国结盟。1936 年 9 月 4 日举行了德国部长会议，讨论强化重整军备问题，主持会议的戈林宣布该次会议“比以前所有各次会议都更加重要”，他的权威是根据元首的一份备忘录，那个备忘录是“从同俄国摊牌不可避免这一基本思想出发的”。在纽伦堡的文件中提到对俄国的侵略的不多；这也许是最早的一份。但是江河的主流下面有旋涡和暗流，而不一会儿在 1939 年 8 月成为最主要的事情的那些旋涡和暗流已经出现。第三帝国反共的宣传和政策是个双重威吓，此时更多地是用来启发西方舆论而不是着眼于纳粹扩张的根本计划的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感情的炫示证明是在欧美民主国家消除反纳粹反应的最有力的工具。”随着德苏条约的缔结，希特勒登上单一的威吓的那一级，而到了 1941 年 6 月，一切威吓都抛弃掉了，他可以公开说话的时刻到了。

俄国是纳粹敌视的阳极，法国是阴极。

我们外交政策的未来目标不应该涉及面向东方或面向西方的问题；而是要有一项东方政策，这项政策将考虑到获得德国人民所必需的那些领土。为了执行这项政策，我们需要那种现在彼我们民族的死敌法国剥夺掉的力量；法国正把我们置于它的掌握之中，残酷地剥夺我们的 351 实力。因此我们应当不惜作出任何牺牲来努力摧毁法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图谋。

在法国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欧洲强国的时候，希特勒政治上成熟起来，并形成了他对德国对外关系的看法。1923 年 1 月，法国占领了鲁尔；同年 11 月，希特勒制造了慕尼黑暴动事件；1924 年 4 月至 12 月，他被拘禁在兰茨贝格的堡垒中，写了《我的奋斗》第一部分。那本书的两卷里都反映了法国占领鲁尔的情况。

在法国人将威胁付诸行动〔他写道〕，一开始小心翼翼地渗入下德国的煤矿盆地的时候，命运的时钟向德国敲响了。那是一个伟大而具有决定性的

时刻。如果在那时我国人民不仅改变了心境而且改变了行动，德国人的鲁尔区对于法国本来可以象莫斯科对于拿破仑一样。

希特勒对法国的态度正是法国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胜利与失败兼而有之的暧昧情绪的反面。它包含三种因素：（1）从德国在 1918 年战败直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德国重整军备，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它又一次成为伟大国家，而德国在它面前感到传统的自卑。（2）尽管如此，这种重新兴起是暂时的、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假的。它的人口和社会力量正在下降。它的军事人力依靠殖民地部队，“变得越 352 来越充满黑人思想”。（3）尽管如此，法国通过它的东方盟国体系业已包围着德国，而且为了自己的生存，对于德国在东欧的扩张将决不宽容。据说克雷孟梭有句名言，德国人的麻烦是因为他们有两千万人是多余的，这说明了法国人的焦虑；纳粹的宣传则以此话用于证明他们的残酷。法国的强大靠的是德国的弱小，因此使德国处于弱小状态是法国的政策目标。结果摧毁法国也同样是德国的政策目标。

只要法德之间的永恒的冲突所采取的形式只是德国防御法国的进攻，冲突就永远不能解决，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德国将不断地失去阵地。……只有在德国人充分考虑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才会停止让民族求生意志在消极的防御中消耗殆尽；他们将团结起来同法国最后决战。而在这场斗争中，将为德意志民族的基本目标而战。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结束法德之间这种永恒的，一直证明为毫无结果的冲突。

但是尽管这一目标在德国政策中是实质性的，它却仍属第二位。“当然，这里假设了德国在消灭了法国这一事情中，看出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这个手段使我国人民有最后可能在另一地区去进行扩张。”

随着德国的再起，法德关系中的第二个因素就使第一个和第三个黯然失色。希特勒在任何其他事物上都比不上对法国弱点的判断一针见血。早在 1932 年，他就说过，“正是由于马奇诺防线”，法国才会被摧毁。1936 年 10 月，他向齐亚诺谈到法国，“就象别的德国人所做的那样——只是粗枝大叶并略带轻视地谈及。某种程度地辱骂统治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仅此而已。按照他们的意见，法国已经停止——至少是暂时——在外交政策方面作为一个积极因素。”法国始终是危险和敌对的，或许这种旧观点最后一次的官方反映见于 1937 年 6 月 24 日布洛姆贝格训令中。作为首要的战争情况，这个训令考虑到了在两条战线作战而以西线为主：“敌对行动可能将从法 353 国陆军和空军对德国发动奇袭而由法国舰队协同作战开始。”但是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的会议上，希特勒说德国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偶发事件之一是，社会紧张气氛可能把法国带到内战的边缘，使它无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虽然他认为法国接近鲁尔对于德国来说是一个特别危险的问题，但是在 1938 年的会议上以及其后，希特勒不再把法国看做主要敌人，而把它看成是英国的帮手。

俄国和法国是希特勒最早和最久的敌视目标。英国和意大利是他最初合作的对象。《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关于外交政策的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同德国结盟的欧洲国家只有两个。这两个国家就是英国和意大利。”现在就象古代一样，世界统一的倒数第二个阶段是三头政治，不是现存世界大国中政治领袖的三头政治，而是革命国家的三头政治。

希特勒的对英政策同对意政策相互交织着，必须放在一起考虑。

他的对英政策的变化发生在 1937 年前后，那是国家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的转折点，比起他的对俄政策的曲折更加重要，因为在那里总的方向和最终目标始终一样，而对于英国，他被迫，也许多少有点勉强地，放弃了合作计划，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原来他赞赏英国是一个无情而成功的国家，表现出“行政的严酷和韧性”，建立了世界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证明了它要生存的意志。在东欧的扩张意味着同英国发生联系，正如在海上扩张意味着同英国发生冲突一样：“只有同英国结盟，才有可能保卫新德意志十字军东征的后方。”希特勒进入政界的时候，他对英国的态度受到国际局势的证实。他把英法两国对战败后德国的态度作了对比：“英国不希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法国则希望不存在叫做德国的强国。”英国为法国在欧洲的新的军事优势感到震惊，这种优势终致占领鲁尔，而英国的政策相应地倾向于德国。

意大利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希特勒选择意大利作为伙伴，比起对英政策还有更早和更为私人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意大利象他本人一样，一直是“亲德反奥”的。它是大德意志政策的天然盟友，这项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瓜分奥匈帝国。三国同盟所根据的谬论原本是意大利和奥地利这两个世仇能并肩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外交的失败肯定了希特勒的成见。他仇视哈布斯堡帝国，那里的德国人利益越来越附属于斯拉夫人的利益；德国在战争中同哈布斯堡王朝结盟，支持它们的利益；意大利则抛弃了同德国结盟而同哈布斯堡王朝作战；哈布斯堡帝国灭亡，德国战败。“正是尼伯龙根与哈布斯堡国家的僵尸联盟的荒谬想法才造成德国的毁灭。”意大利在战后象英国一样成为潜在的盟友，为法国的优势而震惊，对法国占领鲁尔怀有敌意。如果同英国和意大利结盟，德国就会摆脱法 355 国入侵的威胁，并且把法因手中的政治主动权转移出去。此外，意大利是第一个法西斯国家，是从共济会、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世界九头蛇那里赎回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希特勒在 1923 年想要模仿墨索里尼：慕尼黑暴动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向柏林进军的开始，而正是暴动的失败教育了他，每一个民族的革命运动必须采用自己的夺取政权的方法。

同意大利结盟一事是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中选择性的理论的最早实例，即牺牲较小的目标，以便为更大的目标赢得盟友。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意大利兼并南蒂罗尔问题和意大利禁止德奥合并问题。希特勒轻蔑地放弃了德国在南蒂罗尔的利益；当别处有七百万在外国统治下的德意志人时，二十万德意志人的解放并不重要。在他的政治生涯之初，这次放弃是他最显著的政治手腕的行动之一。奥地利问题花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解决；在错误地判断时机已至之后，他曾派人在 1934 年 7 月谋杀了陶尔斐斯，墨索里尼则集中了四个陆军师在布伦纳，这是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大国对希特勒侵略作出的唯一军事反应。1937 年 1 月，在会谈中谈到政治考察方面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奥地利问题时，戈林对墨索里尼说：“在德国有一种印象认为，奥地利正在被一些尚未明确的势力有意识地抓在手中作为后备，象手榴弹一样，在适当时机就会用来炸掉意德战线。”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相信意大利和德国的命运最终会汇聚在一起。他曾经赞扬墨索里尼是欧洲修正条约论的创始人；他已看出意大利和德国有着共同的敌人。1938 年，放弃南蒂罗尔得到了报答，希特勒于是确定布伦纳为意大利同大德国的确定边界。直到

1943年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占领了半个意大利半岛之后，德国最终才又兼并了南蒂罗尔：较诸希特勒绝大多数的背信弃义事件，此事更可以用“情势不变”为前提来辩护。

希特勒始终追求同意大利结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特点。对意大利作为盟友的军事价值，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尽管他的谈话中对意大利人的本领没有尖锐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在伸斯麦的谈话中却是津津乐道的；因为希特勒的谈话确实缺乏机智或任何辛辣的味道。他对墨索里尼的意见很难估价。他惯于描述意大利是“为需要所驱策和受一位天才的领导”，而他的态度似乎是把一般维护独裁地位同一定程度庇护个人结合起来。这是对成了附属和附庸的先行者的照顾，因此是不受到忌妒所危害的照顾，只有在最后几年这个照顾才变成幻想破灭，因为此人在一场殊死斗争中表现出缺乏“世界性革命者和起义者的宏伟气魄”。1934年6月，希特勒第一次越过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的边界到威尼斯会晤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领袖以有意的失礼来对待他。墨索里尼当时正在权力的顶峰，希特勒是一个陷入困境的新手，在那个月底他用流血办法解决了那些困难。

他从未回敬这一耻辱。德国一旦获得优势，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权威就是意大利忠于同盟的保证。但是在1934年他们第一次会晤之前，希特勒的革命已经踏出了破坏和虚无的道路，越出了墨索里尼的范围，在同年年年初希特勒谈到法西斯主义是以几乎是仇视轻蔑的口气说的，把它说成是一种权宜办法。“意大利人永远不能训练成为尚武的人民，法西斯主义也从不理解我们时代大动乱的真正意义。当然我们可以同意大利暂时结盟；但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最终将单独屹立，作为唯一理解这些巨大变化的秘密的人，因而也作为彼选择出来把他们的印记盖在未来时代的人。”

使纳粹德国最终同法西斯意大利搞在一起的既不是它们的共同渊源，也不是它们的共同信仰，却是意大利作为盟友的用处，它的弱小不足以限制希特勒的独立性，或是除第二把交椅以外不求其他。

希特勒对英国的政策则具有多得多的矛盾心理。也许在他的外交政策中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比这个更难以在目的和策略之间、在他的公开言论和私下谈话之间找到平衡。在这一点上，也更难容许有无限的伸缩性，使他可以随时把每一个联合都付诸实验，既看到想望的同盟者的弱点和潜在敌人的实力，也衡量一个今天作为伙伴而明天又成为攻击目标的国家的份量。劳施宁记录下来的1932—1934年的谈话中有很多内容表明，希特勒强调和指望的是英国的静寂无为、和平主义、傲慢和堕落，打算肢解它的帝国和侵犯它的海岸。但是纳粹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里宾特洛甫，为俘获他们的人所审讯，他们说，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始终希望最终能同英国和解。

看来希特勒永远不曾能够理解大象，就是德国，同鲸鱼，就是英国，为什么不能在相互谅解与和平中开发各自的王国。在最后的混乱中他又回到了这个想法。

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避免了象上一代人蒂尔皮茨和比洛那样制订庞大的海军计划，而，1935年6月英德海军协定标志着英德恢复和睦关系达到顶点。邓尼茨后来说，这表明希特勒的政策目标仅仅是“确保德国的陆地边界，防备敌对的邻国：他的主要潜在敌人是俄国，没有一个海军大国被认为是德

国未来的对手”。戈林的观点则不那么局限。

纳粹分子认为里宾特洛甫于 1935 年同英国签订的海军协定是一项辉煌成就，而里宾特洛甫的声望也达到高峰。戈林说，纳粹分子本来打算按照低于百分之三十五的条件就认帐了；重要的事情是凡尔赛条约的桎梏至此业已打破，而军备状况可能重新调整。

但是在 1935 年秋季爆发了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以后，希特勒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的两个预期的同盟者发生利害冲突。施佩尔的印象是他在犹豫

究竟是站在意大利人一边，还是站在英国人一边，他认为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决定。即使在那时，他仍然强调，就象他后来一再重申的，他准备把帝国和国防军听任英帝国支配作为一种“保证”，如果英国同意他在东方“自由行动”的话。当时他为这个问题费了很多心思，特别是因为他认识到意大利作为盟友是不够格的。他说这是兴登堡留给他的政治遗言的一部分……德国永远不可再同意大利通力合作。因此在发生阿比西尼亚冲突的日子里，按照他所认识到的形势必得同意大利合作来反对英国，他为此感到沮丧。

但是在那个时刻，确保德国地位的下一个步骤就是重新 359 武装莱茵兰，对英法利益的一次打击；而不是征服奥地利，对意大利利益的一次打击；所以希特勒在整个冬季进行等待而不明确表态之后，能够在他自己选择的时机内夺取莱茵兰，这也碰巧给了墨索里尼一个来得正好的转移其敌人注意力的机会。后来希特勒大大利用了意大利的感恩之情，因为“当它在阿比西尼亚为它的根本权利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他曾“站在意大利一边”。从此以后，德意两国的政策就齐头并进；德国此时期待于意大利的至少是亲善中立；而政治联系逐步发展为军事协定。最后一个障碍是意大利反对德奥合并。1938 年，当墨索里尼没有再向布伦纳派遣陆军师以保护奥地利的独立，从背后刺杀德国时，希特勒向他千恩万谢。“不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此事。如果他在任何时候需要有人帮助，或者处于任何危险之中，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坚持同他在一起，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他。”这是一句诺言。五年以后，他戏剧性地遵守了这个诺言，这对希特勒是很合适的。

1935 年以后〔戈林在押时说〕开始倾向战争。里宾特洛甫在伦敦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希特勒本人又不能理解英国人和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他对英国人关于占领莱茵兰的反应大为诧异；总的说来，反应是严峻的，即使英国有些人同意德国的所作所为。

里宾特洛甫于 1936 年 8 月 11 日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尽管他一直到了 10 月才赴任。汉斯·弗兰克 9 月访问罗马时对墨索里尼说，“派遣里宾特洛甫去伦敦意味着作出最后努力，使英国理解德国的需要和立场”。因为德国已在考虑日本作为革命和革新国家的三头政治的第三 360 个伙伴。希特勒本人于 1936 年 10 月 24 日同齐亚诺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次长谈中解释了他的政策。

他认为英国无疑会进攻意大利或德国，或对两国同时进攻，如果它感到这样做很容易或者可以平安无事。……但是——这是元首提出的政策的积极部分——如果英国看到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一个愿同德国和意大利组成共同阵线的国家集团，如果英国感到〔在欧洲〕在东方，在远东和南美，我们拥有一支共同的组织起来的力量，它将不仅避免同我们作战，而且会向这个新政治体系寻求达成协议和共同立场的手段。

但是如果英国继续同反共阵线疏远——1936年11月25日的德日条约即将宣告这一阵线的成立，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新武装的速度比英国快得多，并且能阻遏它的进攻计划。齐亚诺的结论是，希特勒仍然受到里宾特洛甫亲英乐观主义的影响，但是憎恶里宾特洛甫的牛赖特会千方百计破坏他去伦敦的使命。

1937年1月，戈林在罗马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他对同英国达成协议并不抱有希望：对典型的英国式的出价，以经济好处来交换政治让步，德国不感兴趣，而在英国，对德国的恐惧明显地愈来愈强烈，就象害怕布尔什维主义一样。5月，牛赖特对墨索里尼说，“英国的政策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一—先进攻意大利，然后进攻德国，甚至对两国同时进攻。英国坚持签订集体条约，其目的是捆住两个独裁国家的手脚。”1937年6月24日布洛姆贝格的训令规定了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

在这个训令中，英国的中立被认为是可能的，并且对德国是极端重要的。但是从6月以后，英德关系迅速恶化；

英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在加快；一方面英法，另一方面德意，对于不干涉西班牙的政策冲突是尖锐的。甚至抱乐观态度的里宾特洛甫现在也承认失败。10月21日，他抵达罗马敦促意大利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只是在四个星期以前德国刚刚拒绝了意大利方面的同样建议。他对墨索里尼说，他多么希望通过出使伦敦能了解到，英国究竟愿意满足德国的愿望到怎样的程度，以及承认德国的重大利益到怎样的程度。今天，他必须坦率承认他的使命失败了。英国最近几个姿态——其中有保守党投票反对把殖民地让与德国——已经证明两国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他一度甚至考虑过把英国拉到反共国家的圈子里来。由于英国既感觉不到，又不完全理解共产主义的严重危险，这一点就不可能做到。

一个月以后，德英两国利益的不可调和，为哈利法克斯对希特勒的访问所证实，当时哈利法克斯的态度坚定。希特勒说，“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很难找到，除非政党变得通情达理，或者政府所采取的方法不再给予那些政党对政府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哈利法克斯回答说，英国不打算改变它的政府形式。哈利法克斯说，殖民地问题只能作为总的解决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要包括其他有关国家；希特勒回答说，他是“会议的狂热反对者”。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1937年11月6日，即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和哈利法克斯访问德国之间，意大利签署了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议定书，享有创始签字国地位。这样轴心国与反共产国际公约便合为一体；三头政治至此正式完成，而以日本取代英国的地位：同时，反共产国际公约不仅是反对俄国而且是反对西方国家的联盟。

1937年6月，布洛姆贝格签署了他的关于国防军联合备战的指令；1937年11月，希特勒向他的总司令们详细说明了关于德国扩张的基本思想，如果他逝世的话，这些思想应视为他的遗嘱。

当我们问冯·牛赖特，希特勒在什么时候决定打仗的〔普尔说〕，他只回答“1937年”。我们对这个回答未能获得更真正的补充。这位老人那天看来有点衰老，回答却很肯定。他可能是在发表一个一般或直觉的印象。也许他记得希特勒在1937年对农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在此之前我们已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话），他将不得不“在西方打个小仗而在东方打场大仗”。1937年是希特勒战争计划的分水岭，也标志着他最终断定英国的敌意而把英法二

者放在一起的时刻。这一点已表现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的会议上：“德国的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充满仇恨的对手英国和法国，对于它们来说，德国巨人屹立在欧洲的中心就好象是肉中刺。”1938 年 1 月 2 日，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呈递一份高度机密的备忘录，他在其中提出了“关系重大的问题”——“德国和英国最终会被迫投向不同阵营，并且有朝一日将相互向对方进军吗？”里宾特洛甫这时倾向于这样想，并因此提议同意意大利和日本组成一个在军事上占优势的联盟。1938 年 3 月由亨德森提出的英国解决殖民地的计划，没有引起希特勒的反应，他说他只是要恢复德国原有的殖民地，363 他又说他并不着急，“可以安静地等上四年、六年、八年或十年”。英国的提议迟到了三年，是在希特勒放弃了同英国结盟的希望，并且将它移到战争潜在目标的名单上之后才开始提出的。它是对绥靖政策的一个嘲讽。

希特勒在 1938 年的各次征服特意安排在英法虚弱的间隙，那时英法干预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在慕尼黑之后，德国的计划才从在西方对抗干涉的防御战，转变为预防西方未来干涉的先发制人的进攻战。慕尼黑本身就是干涉的例子，希特勒对此很憎恶。他同捷克人的一场局部战争受到阻碍；甚至对德国人而言，他作为征服者的光荣反倒少于投降者张伯伦；几天以后，沙赫特偶然听到他对随从警卫说：“那个家伙坑了我，要不我就进了布拉格。”此外，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不是松弛了而是加剧了英国的战争准备，而希特勒对绥靖政策之不可靠所产生的怒气，表现在他对英国反对党的公开抨击上。

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雷德在他所写的德国海军政策史中说〕确实引起英国舆情的恶化，元首开始感到到处出现英国的政治对抗，他也相信从英国可以看到全世界对德反抗的幽灵。……从 1938 年冬季开始的半 364 年内，元首考虑了废除 1935 年的海军条约，英国在 1938 年秋季危机时的表现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坚信英国在当时不曾认真考虑战争问题，仅仅是因为它空军战备的软弱，结果不得不寻求一项协议。

当里宾特洛甫在 1938 年 10 月去罗马力求促成三国军事条约的时候，他告诉墨索里尼说，希特勒深信，他们必须预计到几年之内不可避免地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日本现已完全控制了中国，而“日本人紧接着的一个目标不是俄国而是英国”。德国的军事地位是极好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消灭；德国对波兰打算继续奉行友好政策；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希望同轴心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俄国虚弱而且还会虚弱许多年；“我们的全部精力都可用来对付西方民主国家”。12 月 16 日，魏茨泽克向他的朋友哈塞尔悲观地细讲了“里宾特洛甫或希特勒政策”，他说这项政策明显地在走向战争：

他们犹豫的只是是否要直接转向对英作战，而在同时保证波兰中立，或者首先对东方作战以便彻底解决德波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自然还有梅梅尔这件事，尽管希特勒认为此事不需要动用武装部队，只需要给考纳斯一封挂号信就行了。

因此早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以前，德国的政策就在变得专心注意东方或西方这个大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布拉格陷落以后的一个月内成为德国政策的中心内容：主动的选择取决于拥有国内运输线的国家，这是包围的另一种说法。

并吞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一次清扫行动，完成慕尼黑的工作，而使希

特勒高踞于欧洲之上，能够左右逢源。在德国有些人看到这最后一击与以前的性质不同，365 可能招致国外舆论反对帝国；3 月 28 日，魏茨泽克对哈塞尔说：“很清楚，伴随着捷克事件，卑劣之处已经开始。”不过，就象以往一样，这样的德国人既是分散的又是无力的。希特勒在胜利进入赫拉德昌尼古堡的时候，转过来问帝国新闻首脑狄特里希：“有没有关于法国和苏联的军事行动的消息，或是听到英国舰队在动员？”回答是没有。希特勒极其兴奋地对警卫说：“我就知道嘛！两个星期之后对于这件事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他预计到会有正式抗议，并打算置之不理。一两天以后，柏林宣传部的一名官员对一个法国人宣称：“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敞开的大门，这么多机会，我们都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哪条路了。”

第二编 强国的力量对比

H·C·希尔曼

第一章 导言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弥合世界的整体利益与个别国家的野心和利益之间的差距。国际合作的要求同各国有无满足这些要求的意愿的这个差距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在加大。在政治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国联为这种合作提供了组织结构。但国联本身缺乏许多强大国家的全心全意的支持。美国不肯参加。苏联被故意排除在外，而到了 1934 年它加入国联时，由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以及和约“修正论者”国社党人在德国上台，国际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1930 年的大萧条破坏了世界范围的货币和贸易合作的多边体系，这个体系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在这种政治的和经济的民族主义气氛下，各国政府都把目标放在加强——或至少保持——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中的相对力量和地位，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国际关系中的力量，说到底，就是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能力，所以这一节就着重谈谈作为国家力量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的经济实力。构成经济实力的成分是多种多样的，从一个国家内部的人力、粮食和原料资源的储备和工业生产能力，到这个国家确保能从分散在全世界的各种来源取得大量的货物和原料供应的能力，均包括在内。但犹如其他潜力一样，经济力量只有发挥出来，才能算数。一个国家可以处置的资源是否就是这个国家的实际力量，多半要看这些资源是否有效地动员起来以及这些资源是作何特定用途的。因此，设法维持一个朝气蓬勃的、充分就业的经济的国家，比之拥有潜在力量而未能加以利用的国家，往往在对外关系方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可用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总的经济力量，不一定就是那种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力量。的确，从短期看，总的经济力量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在外交中，关系重大的是能够立即到手的武器和弹药供应以及经过训练懂得使用这些武器弹药的人员的供应。然而从长远看，区分和平工业和战争工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要有时间调动资源，一切工业均可用来生产进行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那个认为总的经济力量从长远看等于战争潜力的见解，是如此之接近于全部真理，以致证明了我们理应对 1939 年 3 月德国强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前几年的强国经济实力作一广泛的对比分析。

第二章 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关于强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定义。但构成强国地位是有某些基本的必要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是，一个国家要拥有相当发达的制造业，有比较众多的、受过教育的和有技术的人口，有效率高的运输组织，和有着强烈的国家统一感并具有陆军或海军传统的人民。有七个国家符合这个定义。这便是美国、苏联、大德国（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区）、联合王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民族国家在 1939 年以前个个都比其他任何国家拥有更大的制造业能力。意大利是这七个强国中工业化程度最差的国家，而最接近意大利的是加拿大。根据较宽的标准——一个国家的货物（包括农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和劳务的总产量——来衡量，结果还是一样，这七个国家的任何一国的实际国民收入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为高，只有中国和英属印度是两个例外。但无论是中国或英属印度都没有能同日本或意大利比拟的制造业能力；它们的运输组织和教育系统也无法相比。然而，强国的这些特征却正在许多落后国家中形成。的确，日本侵略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阻挠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因为中国看来对日本的强权具有那样一种潜在的威胁。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摧毁中国新赢得的政治统一；简言之，旨在阻挠中国成为一个强国；或者，说得温和一点，旨在为日本本身能享有开发中国资源之利而创造条件。

第一节 地理基础及其资源

处在 1939 年那样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但决定了它宜于进行不同种类的经济活动的条件，而且也决定了该国靠近其他国家权力中心和国际交通线的程度。这是一个国家上升到强国地位的基础，它的对外政策永远要受这个基础的影响。其他影响对外政策的因素还有，政府和人民不断改变着的抱负、信念和恐惧。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利用真实的或虚构的布尔什维主义威胁来博取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制度的好感，同时以嘲笑“富豪民主国家腐朽的资本主义”来破坏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为的是进一步推行他们自己的侵略政策。另一方面，俄国人巧妙地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借助于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来加强他们基本上是防卫的战略。而且，这些意识形态的水龙头要关要开都能做到同样便捷。因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争着重说明了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但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为实现其抱负而冒战争风险的，则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实力基础上的纯属物质的力量。构成这七个国家的强国地位的条件是什么？这七国彼此之间的关系怎样？它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又怎样？

地球表面只有百分之二十九是陆地，三分之二的陆地在北半球：在北纬 60° 到 70° 之间，几乎全是陆地环绕着地球，而在南纬 40° 到 70° 之间，则几乎全是海洋。— 369 个国家所处的纬度位置大体上决定着该国的气候；但地球上陆地分布的不均匀和陆地的地形影响着风和洋流，因而在热带、温带和极地的大范围内使温度和季节有所变化。气候和土壤的情况给可种植范围设下了界限，而地质构造则有助于指明在什么样的地层里可以找到水、煤、石油和各种金属资源。

七大强国的本上全都分布在北半球的两大陆，六个在欧亚大陆，一个在北美。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面积百分之四十，居住着世界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欧亚大陆的面积比北美大陆大一倍半，其人口则比北美几乎多九倍。欧亚大陆的东前哨是日本列岛和不列颠群岛。该大陆的欧洲部分北接极冠，西临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和高加索山脉，占地球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八点五，居住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七个强国中有四个强国的领土在欧洲；第五个，也就是苏联，有部分领土在欧洲，而其人口则几乎全在欧洲。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就集中于欧洲，挤在这一小块地区内的国家比世界任何其他大陆上的国家都多，这些情况不断地促使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成了有案可查的冲突最经常发端的地区。欧洲国家异乎寻常之多，以及因而造成的每个国家的领土之不安全，形成了既刺激欧洲的经济又限制住了它作最大限度扩张的政治结构。

以往，联合王国由于它的岛国位置和它在世界海上力量方面的优势，所以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享有较大的领土安全，以及较多的在世界各大洋行动的自由。由于 370 享有这种安全，联合王国就能够鼓励商业、金融和制造业的发展，并把作为一个就业领域的农业的相对重要性降低到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程度。

法国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条件也同样很好，但与它东部接壤的是德国，那是一个有技术、有纪律的，人口多于法国的国家；西边是处于强有力竞争地位的联合王国。因而法国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到象联合王国那样广泛地依赖国外的食物供应来源。

大德国虽然在面积上只比法国大一点点，但它的人口却几乎两倍于法国。德国的四周都是些较小的大陆国家，它们没有一个能单独给德国造成实际威胁，但德国还是不愿意把工业化推进到如此地步，使它在自己领土之内丧失食品生产的可靠基地。德国较晚才成为强国，在进入世界的海道方面也不及联合王国方便。因此，它在力求建立海上力量均势而走向同联合王国发生冲突和加强它作为大陆强国的地位之间不得不权衡利弊。

同其余三个欧洲强国相比，意大利的弱点在于：一方面，它极端缺乏供工业体系顺利运转所必需的煤炭资源，另一方面，它在地中海的地位不佳，因为进入地中海的门户没有一个受它控制。

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土为整个欧洲（除苏联外）的面积的四倍，但它通往海洋的路线受到严重的限制。不过，在它的领土之内可以找到所有的气候区和地理构造，这表明它的粮食和矿物资源将足以支撑最迅速而广泛的工业化。

日本是新近取得强国地位的。它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制造业能力方面超过象比利时、加拿大，甚至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日本同联合王国一样处于岛国地位，在相对说来政治发展不受干扰方面有某些有利之处。但它远离欧洲的大权力中心这一点，对于它的工业发展来说甚至更为重要。由于欧美国家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范围扩大到了远东，日本固然有理由认为会和比较成熟的欧美强国发生冲突，但它在工业增长阶段会同象中国这样的潜在强国发生直接冲突却更是迫在眉睫。

日本除了巨大的木材资源与一些煤和铜外，基本的工业资源很少，但在东南亚，尤其在中国，却有着这类资源。姑不论正确与否，日本担心，如果亚洲大陆觉醒了民族运动（占有世界人口的半数以上）把这些民族造就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那时它们也许就会对它们边界以内发现的资源提出优先要求权，那末日本的加速工业扩张就可能受到损害。

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的优越不止是在一个方面。美国地处北美洲，横跨整个大陆，在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方面应有尽有。美国北边同加拿大接界，虽然加拿大的领土比美国大，但其人口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南边同墨西哥毗连，其人口大约是美国的七分之一。美国东西濒临大洋，比任何欧洲强国享有更大的领土安全，并能直接进入世界的贸易主航道。而且，同赤道把地球分为南半球和北半球相类似，一种任意的政治划分也已把世界垂直地分成不相等的两半。西半球在西经 180° 和 30° 之间，包括北美和南美两个大陆。南美洲国家很多，每一国——以及总合在一起——在人力和在物力上都弱于美国，因此，几乎不会有构成对“北方巨人”领土安全的威胁，除非也许它们成了该半球境外的某个其他国家的工具。此外，美国在默认欧洲国家（即英国、法国、荷兰和丹麦）已在新世界确立的政治利益范围的同时，早在 1823 年（制定门罗主义的那一年）就已经向这些国家表明，它不会容忍利用这些属地作为基地进一步在西半球进行领土扩张，1898 年它采取有力步骤摧毁了老西班牙帝国的残余。

其余的两个大陆——大洋洲（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诸岛）和非洲，面积大而人口少。大洋洲是最后发现的一块大陆，位于南半球，距离西欧比距离亚洲东部 372 或美洲西部要远一倍。从欧洲来看，大洋洲是座落在地球的最远边缘——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正好离开了主要的贸易航线；它的开发非常缓慢，直到它本身变得重要起来，堪充往返于新老世界之间的定

期贸易航线的终点站，情况才有所改变。同大洋洲潜在的自然资源相比，它的人口是非常稀少的。

非洲大陆大部分座落在热带，1938年时人口大致同美国相等，所占面积比美国大三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非洲是不那么适合白人定居的，因而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成长一直受到阻碍。在非洲的极南和东北地区，由于有水和矿物资源，土地还算丰饶，气候条件比较温和，因而有一些国家发展起来。但这些国家的成长，初始与其说是由于它们具备适合于发展的固有条件，不如说是由于它们在世界贸易主航道上所占的关键地位。但一般说来，这个大陆政治上的弱点，以及首先是它和人口稠密的欧洲国家靠得很近，使非洲成了欧洲扩张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一个殖民地区。

表 1 (对页) 以与人口相比较的方式展示了强国本土有可能得到的某些基本的工农业资源。该表 (第 8 栏到

表 1939年的人口和原料资源

国 家	人口数据					
	总数 (百万)	人 口			潜在的劳动 人口 15 至 59 / 64 岁 (百万)	军事人力 男性 20 至 34 岁 (百 万)
		1910/1940 年 年平均增长率 (百分比)	15 岁以下	59 / 64 岁 以上		
1	2	3	4	5		
苏 联	170	0.48	36.2	5.4	100.0	21.
美 国	132	1.18	25.0	8.6	87.4	16.
大 德 国	80	0.51	24.1	10.3	52.1	9.4
日 本	73	1.30	36.7	6.1	41.8	8.3
联合王国	47	0.43	22.4	10.8	31.6	5.7
意 大 利	44	0.71	30.0	9.2	26.7	5.2
法 国	42	0.04	23.7	12.5	26.8	4.3
国 家	人均自然资源					
	每平方 公里 人数	储 量		可耕地	牧 场	木材 生产面积
		煤 / 褐煤 (煤 当量)	铁矿石 (金 属含量)			
7	8	9	10	11	12	
苏 联	8	6,300	94	2.35	5.70	6.65
美 国	17	17,000.48	2.66	4.40	(3.98)	
大 德 国	136	3,810	14	0.68	0.30	0.44
日 本	191	227	0.4	0.23	0.11	(0.79)
联合王国	195	3,700	38	0.28	0.40	(0.07)
意 大 利	143	4	0.4	0.85	0.34	(0.33)
法 国	76	207	77	1.62	0.65	(0.63)

第 12 栏) 说明了 1939 年意大利和日本在可开采的天然资源方面与苏联和美国相比所处的相对软弱地位。此外，在近三十年中，日本和意大利迅猛增

加的人口（第2栏）对这些资源的压力大大增加了。这种压力对于人的生活水平必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除非能够通过无求于这些特定种类的基本资源的工业化，通过大规模向外移民，或通过获得外国领土上的资源来解除这些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上述的第二条出路多半已被堵死，日本和意大利这两个鼓励在向它们开放的范围内发展工业的国家，都同德国一唱一和，成了领土扩张的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

在这三十年中，美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仅次于日本，那是有好几个原因的。在所考查的七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不仅反映了自然生育率和移民入境增添的人口，而且反映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丧亡以及战后时期的饥谨造成的损失补偿情况。同苏联、德国和法国因战争和饥谨而遭受的生命损失相比，美国在这方面是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的，至少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由于大量接纳移民入境而保持了高出生率。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移民入境停止，出生减少，结果是，这三十年的平均年增长率趋于下降。另一方面，苏联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趋于上升，这是因为自然生育率一年高于一年，开始超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年代的饥谨造成的灾难性损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在人口增长比率方面出现的这种相反趋势，也反映在它们各自人口组成的相应变化上（表1，第3栏）。

1939年，美国和德国、法国以及联合王国一样，年轻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小，而苏联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则拥有年青的、精力旺盛的人民。马尔萨斯的幽灵，即关于人口的不断增长——象在日本和意大利那样——是对有限的潜在资源的压力的论断，对于苏联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的确，苏联尽管人口增长迅速，它的巨大的国内资源的开发（除其他困难外）还是因人力短缺而受到阻碍。

在法国，那个马尔萨斯幽灵是被紧紧锁住的。法国是三十年来人口几乎不变的唯一强国。它一直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巨大流血牺牲中恢复过来。

但是，法国虽然没有人口急剧增加的威胁——同法国的潜在资源相比，法国本来会比美国和苏联更早感到这种威胁，尽管比意大利和日本会迟一些感到——但它却面临在某些经济政策条件下，由于人口不变而将会出现的其他危险。人口不变的一个结果是，法国总人口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比当时的其他强国都大（表1，第4栏），而在所有的强国中，法国总人口最少（第1栏），潜在的劳动人口最少（第5栏），尤其是军事人力最少（第6栏）。

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后面将会谈到的其他因素，那末，实际情况大体上说来就是，这七个国家天然资源的不均确实给它们的工业化设置了不同的限度。由于最近几十年中人口增长的差异，1939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战后的异常情况下，远东的日本本土、欧洲的意大利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还有德国，它们的原料资源从长远观点看将支撑不住象美国或苏联那样的累进的发展。但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统治者蓄意增加的人口压力本是一笔负债，然而却以精力旺盛而又年轻的人口形式成了一笔资产，因为年轻的人口中储存着服兵役的适龄男子，这对于执行野心勃勃的领土侵略政策可能会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节 由世界贸易引起的经济改造

1939 年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及不同大陆各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世界贸易的发展形成的。正是对外贸易的作用支持了发轫于西欧及美洲东部那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由于私人企业的首创精神，资本主义制造业中心的兴起逐步改变了濒临北大西洋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农业作为就业的一个领域相对衰落，而在农业活动收缩的同时，对遥远地区的农产品及工业原料的需求增加了。西欧和美洲东部的制造业中心愈是工业化，它们在自己国土内的农业和矿业资源就愈来愈少，对更遥远地区的依赖就愈大。在这种内部发展以及随后的对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有愈来愈多的“开放边界”被越过，亚洲的人口稠密地区以及美洲大陆和大洋洲人口稀少的领土³⁷⁶被打开。世界经济的金字塔在高度增加的同时也拓宽了它的基础。但是贸易的这种从最早的制造业国家作离心方向的扩张，创造了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的外围建立新的工业中心的有利条件。因此，世界贸易的扩大和加强刺激了比较遥远的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结构改革。随着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实行了工业化，这些国家也就开始在它们相对来说占有成本上最有利条件的那些生产行业中实行专业化。大体说来，效率上相对差别的存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因而在这种自由国际交换制度下，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或是其中的个别国家，其经济利益往往是朝同一方向发展的。

但还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使得从世界贸易体系得到的好处分配不均。这里只能谈一谈几种这样的力量。在晚近阶段才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而且仅仅依靠私人企业积极性的国家发现，要建立那些它们似乎拥有某些“天然优势”的工业并非易事。较老的国家有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臻于完善的运输、信贷和销售组织，因而能吸引它们的“天然优势”根本不算最好的那些较新的工业。正如皮古所说，在自由贸易制度里，基础巩固的工业国家的有利条件要比新来的竞争者多千种，而如果听任事情“自然”发展，那末年轻国家的“潜在”力量的开发也许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民族³⁷⁷经济的利益而实行保护贸易制度便有了强有力的理由。

在某些年轻的国家里，私人企业由于缺乏资本，不能开发潜在的生产资源，国家就担负起企业家的职能，而不是仅仅为私人企业维持秩序了。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有人谈到十九世纪后期日本的纺纱工业时说，“政府是这一工业孜孜不倦的革新者。……在提供资本方面，国家占主要地位；实际上当时所有引人注目的扩张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国家提供资金的。”一般说来，如果由于国家的刺激，规模较大的生产最终提高了效率，那末对于国际专业化和合作是没有害处的。但是生产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生产率，抑或仅仅是为了威望和军事目的，则很难区分。许多欧洲国家的工业是在本来会经受不住公开的国际竞争考验的两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美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能够生产汽车、打字机和化学品，而且在较低的价格幅度上具有相当的质量。但是尽管日本工资标准低得多，还是要有高度的保护措施，才能防止同类的美国产品完全统治日本市场。

这是一个困境。新生工业有一个习性，即使它们的规模扩大了，也还是要依赖在它们诞生时援助过它们的都留重人：“1868—1893 年日本的经济波动”，《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1941 年 11 月，第 179 页。雅各布·瓦伊纳：“战后世界的外贸前景”(Jacob Viner：

TheProspectsforForeignTradeinthePost-warWorld), 1946年6月19日在曼彻斯特统计协会的讲话。《曼彻斯特统计协会会报, 1945—1946年会议》(Transactions of the 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 Session 1945—46)。支持者。但这种保护为什么要继续下去, 而且, 较老的国家既然维持低效率肯定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那为什么也采取保护措施呢?

解答必须从这些国家各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气候的变化方面去找。随着工业的发展, 组成这些工业的各家公司在竞争的角逐中便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拥有和经营一家工厂的人除非运用他的才智, 便无安全可言。为了在市场上立足而不至于被迫歇业, 他就得紧紧跟上最新的技术发展。他必须通过降低成本的办法保持住他的公司的效率。只有那些不断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人才能坚持下去; 那些落在后面的就被摧毁了。这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生意第一, 生意最重要, 乃是一种没有人能够躲避得开的教义。在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 软弱是不行的。对现实的清醒估计和为效率而奋斗——不论用什么方法, 亦不论付出多少的人所能及的努力来提高效率——便是求得生存的唯一道路。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 所有社会的内聚力破坏殆尽, 而那些确乎生存下来的人所得到的报偿便是财富的积聚。

随着市场的扩大, 商业的报偿和风险都增加了。随着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 老的工业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积累起巨额财富; 但是一旦“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在某些活动部门推进到足以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向较老的工业国家提出挑战的时候, 重点就从利润转到了风险。随着在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里竞争的加剧, 企业家在看到没有希望把他们的营业扩大到独家垄断的规模时, 就愈来愈热切地希望得到安全, 希望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导致在商人中间成立贸易联盟和卡特尔, 目的是要局部地, 即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调节和控制竞争。

在这种组织从一开始便不存在的地方, 既得利益者组织起来了。这些垄断联合体不必把行将过时的工厂设备无限期地保存下去, 就此而言他们也不冻结现状和阻挠进步; 他们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分别做到“有秩序的撤退”和“有秩序的前进”。在一国之内获得局部的社会内聚力是一回事, 要消灭所有导源于外部竞争而对内部稳定产生的不利反响, 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假定这些垄断联合体足够强大, 那末它们就不难使政府相信, 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 为了确保有秩序地进行调整 and 取得进展, 实行保护贸易制度是合乎社会需要的。

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社会气候的变化, 垄断组织的发展, 以及保护贸易制度, 各国均不相同。这个变化有代表性的一点是, 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世界贸易是同世界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同一步调增长的, 而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 贸易增长率却落后于生产的增长率, 第四个十年更是停滞, 乃至下降。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 虽然 1938 年世界贸易量超过 1913 年大约百分之十三, 成熟的工业国家的贸易却绝对下降。例如, 英国和德国的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二, 法国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一, 而美国的出口量则增加了五分之三。但甚至美国也在 1929 年至 1936—1938 年之间的这一时期出口量缩减过四分之一。更惊人的是, 英国出口量的下降全是因为它同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贸易减少了一半, 亦即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美

国、日本、苏联和印度的贸易锐减的缘故。它向三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即印度、日本和苏联的出口实际上减少了三分之二。另一个说明较老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变化的方法是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所占的份额已由1900年的百分之六十六下降为1937年的百分之五十二。

那末，较老的工业国家把机器出口给世界的其余部分就是在破坏出口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斯彭格勒指控西方人民把他们的技术传给亚洲人，说那是在背叛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为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落铺平道路，这种说法难道没有某些正当的理由吗？

总的说来，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是不足的；不过，从成熟的工业国家的经历来看，却也并不叫人宽心。它们是否会逆流而行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过去从国际专业化中得到过巨大的好处，而它们现在也没有保护它们原先的技术垄断的手段。

某些当代的观察家评论说，随着紧挨西方世界周围的开放边疆的消灭，随着开放空间的填补完毕，人同物质自然界的斗争必定要被竞争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政治斗争所代替。这个结论过分悲观。但变得明显的是，工业基础巩固的国家正象它们现在这样，面临的局面是从前不断打开新市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固定不变，以及外国在它们的国内外市场加强竞争的威胁，因而它们会被迫接受在其工业中作非常痛苦的调整。它们缓和这些调整的一个权宜之计便是采取保护措施。

可是结果是，旨在便于有秩序的调整而征收的失税，象那些旨在保护年轻工业而设立的关税一样，往往蜕变为保护低效率的工具。某些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是直率宣布的。早在1930年国际行为准则彻底崩溃很久以前，德国——以及其他某些工业国家——通过一些蓄意采取的措施，从关税到补助金都有，企图为它的经济保留一个广阔的农业基础。工业国家的这种政策在许多农产品生产领域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虽然在1927年和1933年之间贸易条件变得对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非常有利，但只有农业在其经济中是个最小部门的国家英国才充分得到了这个好处。在象德国那样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国家里，根本就不想以任何有秩序的方式去拆除支撑农业的人为支架。相反，出于政治原因，农业得到更多的援助，尽管这些工业国家里的贸易条件的有利趋势部分地一直维持到1937年。显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对世界贸易是具有抑制影响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贸易条件已经变得对包括苏联、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不利。所以这些国家现在用一切可能的刺激手段去促进它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在苏联——但日本不是这样——工业化的同时是伴随着进口量的下降的。加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业化是经过有意计划要实现自给自足的，所以世界生产和世界贸易之间的差距便不可避免要扩大了。

然而，经济民族主义除有政治根源外，也还有真正的技术方面的根源。这就是说，世界贸易的相对衰落虽然多半要归咎于垄断的“压力集团”对政治家们施加的影响，但把经济民族主义轻率地说成完全是根据荒谬的错觉提出来的，则过于简单了。主张世界范围的专业化和交换的论点所依据的是，物质资源、人类技术和资本储备向来分布得很不均匀这一事实。但是，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正是这些曾经造成了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条件在不断变化中。例如，在美国或德国获得的技术知识很快也就可以在俄国或

日本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工人技术的差异在工业化扩展和教育普及的同时趋于消除。而且，由于现代电力技术和化学方法的进步，某些或以活的有机生命为形式或以有机生命的化石产品为形式存在的自然原料资源，因其甚为稀少，或只有少数地方才有，或多或少被用比较丰富、比较易于得到的非有机物质制造的新的合成材料所代替，这也减少了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依赖。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我们便可看出一个总的趋势，即制品成本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从国际专业化和交换获得的经济收益在减少。

就经济民族主义中这个真正技术性因素所起作用而论，它确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贸易停滞的部分原因，但还有两个因素意义更重大。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苏联，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想实现高度的经济自给自足，另一方面，象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强国在这十年中确实不能使内部活动达到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这也是事实。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减少了它们传统的进口需求，结果对世界贸易量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

所以，要确切估计促成经济民族主义的各种推动力的相对力量究竟有多大，那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却很清楚，即 1930 年贸易和货币领域中的国际关系的破裂使传统的、通过关税进行的国家保护方法变本加厉，因为又对贸易设下了限制性更大得多的新障碍，例如配额和外汇管制，从此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利益同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之间，便不再有任何协调一致的表象了。

第三节 利益范围和交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边贸易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国家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的一个结果是，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其政治和商业利益范围的重要性增加了。由政治上同强国联系在一起或受其控制的领土所构成的政治范围，在强国之间的划分是很不均匀的。

的确，在七个强国中，无论是苏联或大德国——在其他国家事实上承认了强行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之后——都没有对它们自己国界以外的领土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美国实质上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因为它在亚洲和大洋洲的附属国的经济资源，比起在大陆美国所发现的资源来是很少的。

意大利的政治属地在有一点上和日本的政治属地相同，这便是那些属地同它们的基地——宗主国靠得很近。但是，相同之处也仅限于此。意大利的几大块非洲属地在资源方面都比较贫乏，人口只占意大利人口的五分之一。与此形成对照，日本在亚洲的大部分属地和占领领土——撇开大洋洲的几块在经济上无足轻重的日本托管地不谈——在资源方面非常丰富，人口同宗主国一样多。

法国则同英联邦和英帝国一样，领地遍布各大洲。法国属地的人口合计起来和日本属地的人口一样多，而在法国控制的非洲部分和亚洲部分，所发现的稀有资源都能补充法国本土资源的不足。但尽管法国的政治利益范围分散在全世界，法兰西帝国在地理上还是比英联邦要紧凑得多，因为法国最大的和经济上最重要的属地集中在非洲。

英联邦和英帝国几乎拥有地球上领土的四分之一和人口的四分之一，它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治单位。除开五个自治领和印度，英国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的人口比日即使把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意大利属地）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也算进去，情况也还是差不多。本属地的人口多，而其在各大陆之间的分布很象法国殖民地人口的分布。就原料资源的多样性而论，英国殖民地超过了法兰西帝国。如果再把印度计入英帝国，则原料资源就更多得多。然而，真正的实力既不在这些殖民地，也不在印度，而在五个自治领。这五个自治领的人口总和还不到联合王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但潜在的——而在许多方面是现实的——资源超过了不列颠群岛所已发现的资源。而且，这些自治领象印度一样，拥有相当多的制造业能力，只要这些在法律上独立的国家决定同母国一起行动，英联邦和英帝国手里可以自由支配的实际资源就比德国或苏联多。

与政治利益范围的不平衡情况形成对照，每一个强国都从事对外贸易，因而各有其商业利益范围。政治利益范围和商业利益范围不一定是恰好相符的，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忠顺往往会加强它们相互之间的商业交换；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商业渗透可能是朝向对后者实行政治征服迈出的第一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两个趋势都特别显著，因为国际贸易和货币关系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每个政府的行动自由。强国现在能够直接影响贸易的地理分布了，这是它们以往做不到的。结果是，意大利、日本、法国和联合王国加强了它们同政治上受它们直接控制的范围内的那些国家的商业关系，德国则加强了同它紧邻的那些小国的商品交换，因而也就加强了它对这些小国的直接政治影响。

在这种为使商业范围和政治范围具有共同疆域所作的广泛努力的背后，最大的强制力量也许是要提高迫切需要的外部供应的可靠性和交通路线的安全程度。谁也不能忽视交通的极端重要性，一个强国的外部利益范围对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大价值全看交通的安全程度如何。如果不是预期会有战争，关于可靠性和安全程度的考虑便毫无意义，因此，三十年代大多数国家奉行的商业和运输政策竟忠实地反映了战争在它们面前投下的阴影，这便是必然的了。

既然贸易和交通相互紧密依赖，那末，强国所面临的运输任务的规模和特点是什么呢？这两者都是由每个强国进入对外贸易的货品总重量、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货物的构成（即是否笨重等等）直接决定的。这可以拿 1938 年的状况来作说明。那一年世界贸易中从原产地国运往最终目的地国的货物重量据估计大约为四亿二千万公 384 吨。这七个强国进口供自己使用的货物（即除去仅仅是过境的货物）约为二亿五千万吨，即按重量计算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九，而按价值计算则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九。德国和联合王国共吸收了世界有形进口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联合王国对外部供应十分特殊的依赖性可以从这样一件事情上看起来，即它每一百个人进口了一百二十三吨，美国是二十八吨，而苏联还不到一吨。

然而，强国不仅是相对说来份量轻的制成品价值的出口国，而且也是大量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国。实际上，它们出口了二亿一千万吨，按重量计算占世界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价值计算占世界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八。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除了谷物、水果、蔬菜、棉花、烟草这些很占重量的全部货物外，更有两种工业原料即石油产品和煤共占去美国出口吨位的一半以 385 上。正如联合王国的出口品有五分之四是煤那样，德国和法国的出口重量中，煤和铁矿石分别占有最大比重。苏联在世界出口品重量中所占的比重——主要是木料和谷 1940），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1 年版，第 458 页和第 482 页；关于德国的数字，不包括奥地利和苏台德区，见《德国统计年鉴，1939/1940 年》，第 266 页；关于法国的数据，见法国统计研究所：《法国统计年鉴，1940—1945 年》（*Annuaire Statistique 1940—45*），巴黎，国家印刷局，1946 年版，第 215 页和第 224 页；关于意大利的数据，见意大利皇家中央统计研究所：《意大利统计年鉴，1938 年—XVI》（*Annuario statistico italiano, anno 1938—XVI*），罗马，国家印刷所，1938 年版，第 104 页和第 119 页；关于日本的数据，见横滨商工会：《1940 年年度统计报告》（*The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1940*），横滨，1940 年版，第 130 页以下，又见美国关税委员会：《日本贸易研究》（*Japanese Trade Studies*），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5 年 9 月。

美国的载货吨、日本的石、担等都已换算成公吨。因此，按重量计算的进口额是可比的；见下表（1）项。这些进口总额除以原著第 373 页表 I 所列的人口数，使得出每百人的进口吨数；见下表（2）项。这里有一个例外，表中的德国系仅指旧帝国，其人口为六千九百万：物——超过了意大利和日本两国的总和，虽然按价值计算苏联只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一，而意大利和日本加在一起占百分之八。

强国之间不但在对外贸易的份量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它们在外贸的地理分布上也显然殊异。除去联合王国是个例外，各强国的主要商业利益范围都在该国所在的大陆区域之内。因此，如将世界划分为三大地区组，即（1）

欧洲—非洲、(2)西半球、(3)亚洲—大洋洲,则对于政治和交通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38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各从欧—非组取得其有形供应品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同样地,美国从西半球国家取得其有形供应品的百分之七十。日本以重量计算有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供应品来自亚洲—大洋洲国家。独有联合王国的情况与此迥然不同,它从西半球国家进口的(占百分之四十六)比从欧—非组国家进口的(占百分之四十二)多。

这种与各强国地缘政治位置有关的贸易区域分布,对各个强国的运输任务的规模和特点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联合王国和日本,由于其岛国的地位,贸易全靠海运。其他强国的贸易则部分靠海运,部分靠陆运(即由铁路、公路、运河以及比重不大的空运来运输)。德国的陆路贸易比重最高,其次是法国和意大利。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苏联对外贸易中陆运部分的运 386 输任务是和国内运输任务直接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来自邻国的进口品通常是由在各国领土之内经营的各种运输机构在国境上接收的。这四个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苏联——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对于完善它们的铁路、公路和运河系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尽管有这些改善,以苏联为例,其铁路的超载情况在 1938 年比在 1928 年还要严重。铁路线的扩建以及机车和货车车辆的增添赶不上这十年中货运大量增加的速度。苏联的铁路系统仍然是世界上超载最甚的铁路系统。1938 年,苏联每公里铁路线货物运行的吨公里密度几乎比德国高出两倍,比法国和意大利高出三倍多。换句话说,一列和德国货车约莫同样长短的俄国货车,就得载着同量的货物比德国货车多跑大约三倍的距离。

各强国运输系统的效率固然有着上述差异,但陆运机动性的普遍改善为进行更多陆运商业交换展示了可能性,而从长远来看也展示了横贯欧亚大陆的空间统一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离实现还远。当时只有西欧有跨 387 越国境的紧密交织的运输网。东欧的运输网还处于初期状态,既有的交通也不那么衔接得上(就是因为西欧和俄国的铁路轨距宽度不同,等等)。东方的维斯杜拉河和奥得河作为国际运输线的水道在重要性方面亦不及西方的莱茵河。因此,正好位于欧洲中心并且——如希特勒所承认的——正在觊觎在东方赢得一个帝国的德国,在这种依靠陆运的冒险中便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限制。它不能正常地强行加快东方的运输发展步伐,它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在拥有主权的邻国的领土上经营它自己的铁路或公路车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在它 1933 年以来的军备竞赛中极为注意加强其国内超过眼下需要的运输系统,设计连接鲁尔和柏林以及德国东部省份的战略公路和运河,积聚适宜于支持在外国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的铁路和公路车辆。

海运贸易就不同了。在自由的世界海洋上,任何强国都可以在租用外国船队和建造自己的船队之间进行选择。影响此种抉择的有许多因素。但主张经营一支国家船队的一个最通常的论据是,运输任务乃是一个强国的海运贸易所产生的。基本上是两个因素决定着运输任务的规模。第一个决定因素是海运贸易的重量。就进口品的重量而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联合王国那样巨大的运载任务。1938 年,英国进口了六千一百万吨货物(包括过境运输的货物)。其次是美国、德国和法国,它们各由海路进口了大约三千三百万吨货物,尽管德国和法国经由陆路的进口量也十分可观。最后,意大利和日本各进口了大约二千万吨货物。第二个决定因素是拖运的距离。例如,

联合王国每吨进口品的平均拖运距离比 388 法国要多一倍多。因此，各大强国面临的实际运输问题反映在它们进口品的吨英里上；即海运进口品总重量乘以拖运距离。1938 年各强国的运载任务如下：

进口品运载任务（1938 年）

（单位：10 亿吨英里）

联合王国	美 国	德 国	日 本	法 国	意大利	六国合计
233	97	95	70	54	41	580

1938 年每个强国拥有的运载能力亦即商船队同各该国的运载任务相比，情况如何呢？世界商船队（即只计一百长吨和一百长吨以上的汽轮和内燃机轮）从 1913 年的四千三百三十万长吨增加到 1938 年的六千六百九十万长吨。世界商船吨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世界海运贸易量同期仅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左右，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航运设施超过了需要。考虑到 1938 年时船只的平均容量更大和平均速度更快，则超过需要的程度就更大了。

世界航运共增二千三百六十万长吨，其中多半是由 389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1922 年，世界运载能力已达六千一百五十万长吨。战时的五个协约国英、美、法、意、日领先增加。它们在 1913 年拥有二千七百三十万吨。其中最重要的航运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盟国由于在战争中失去了它们在战前一直非常依赖的英国航运，便采取步骤来大大增加自己的运载能力。确实，1922 年这五个战时的协约国共拥有航运总吨位大约四千五百六十万长吨。另一方面，德国和俄国的商船航运吨位则从 1913 年拥有的五百四十万吨下降到 1922 年的二百万吨。

强国的相对航运实力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造成的这种结构变化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原样。很自然地，德国和俄国作出了果敢的努力来补偿战时的损失，但意大利和日本也不放弃其战时的收获；相反，它们继续扩大自己的运载能力。因此，在 1922 年至 1938 年之间，这四个国家——即意大利、日本、德国和苏联——的运载能力共增加了五百五十万吨；而在同期，联合王国、法国和美国的运载能力却降低了七百二十万吨。列强中商船吨数的增长和分布情况如下：

运载能力（百万长吨）

年份	联合王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法国	意大利	苏联	七强共计	世界总计
1913	18.3	4.4	4.7	1.5	1.8	1.3	0.7	32.7	43.3
1922	19.1	16.5	1.7	3.6	3.7	2.7	0.3	47.6	61.5
1938	17.7	11.5	4.2	5.0	2.9	3.3	1.3	45.9	66.9

1938 年，美国商船队是世界上第二支最大的商船队，占世界船舶总吨位的百分之十七点二。这一年它的进口品按重量计算仅占世界海运进口品总量的大约百分之十。显然，美国的航运能力用来应付它自己的贸易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美国关税委员会指出，美国进口品总货量中由美国船只运输的约占三分之一，其出口品总货量中由美国船只运输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不

论美国在战时多么有效地使用它的商船，要是外国拥有的船只严重 390 短缺，那就不可避免地不仅要影响到美国出口品的运输能力，而且要影响到它的进口品的运输能力。”那末，是否可能是，美国比其他强国有更大一部分船只不能横渡大洋的吗？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地，以三千长吨以上的船只而论，美国仍然拥有一千多万吨，而它在世界这一级的船舶中的相对地位甚至更强大，造成这一出入的原因是，美国有两条大洋海岸线，美国商船队有近百分之七十从事沿海运输。把港口船舶、渔船和近海船只从每个强国的商船队中除去，列强可用于对外贸易的绝对和相对运载能力便根本改变。撇开苏联不谈，其他六个强国的运载能力可以估计为大约三千一百万长吨，其中单是联合王国便拥有大约一千五百万吨。其次是日本，有四百一十万吨；再次是美国，有三百六十万吨；德国，三百三十万吨；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为二百六十万吨和二百四十万吨。把各强国所拥有的“外贸商船”的份额（即 3100 万长吨 = 100）同它们的运输任务所占的份额（即 5800 亿吨英里的进口品 = 100）加以比较，我们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便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因为这些数字说明了 1938 年列强本国拥有的运输能力和它的海运任务之间的关系。状况如下：

运载能力和运载任务的比较（1938 年）391（百分比分布）从上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是，1938 年德国、法国和美国所面临的海运情势要比联合王国、意大利和日本困难得多。确实，看来在强国之中德国是最完成不了它自己的贸易货运任务的。但德国的船舶吨数的短缺情况被夸大了，而法国和美国的短缺情况则被低估了，因为在 1938 年法国和美国的运载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它们的进口处于相对萧条状态，而与此相反，德国的国内活动和进口正兴旺发展。此外，德国需要远洋运输从南美输入的进口品数量特别大，这使人们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它的吨英里运载任务以及它的航运地位的明显困难处境。然而，除了这些差别之外，1938 年情况的真正显著特征，以及同 1913 年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有强国在运载本国的贸易货物方面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装备得更好。

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毋宁说是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因素。根据纯经济的理由，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自己运输它的贸易货物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曾经是世界上的主要货物承运者。由于它的地缘政治地位、它的悠久的海运传统和它的不乏熟练的航海技术，它或许比别的国家更适合于担当这一任务。相对说来，它占有成本方面的优势，这部分地是因为它过去还一向是世界上煤的主要供应国。用英国船从世界各地运载大宗货物到欧洲的费用要比用外国船便宜，因为装载从英国出口的煤，就可作为英国船只出航的压舱物。这些有利条件并不持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煤的出口量急剧下降，而运费中的重要一项——英国海员的工资则开始高于其他许多国家。这些变化缩小了英国在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就此 392 而言，世界运输业从英国船只转向外国船只是有其经济上的原因的。但是，比这更重要并且可能更起作用的还有两个原因。

首先，需要进口品的国家必须依靠直接的货物销售（即有形出口）、过去的海外投资的收入或提供劳务等（即无形出口）来支付它们的进口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当时关税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的配额安排限制了货物的销售。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急于通过提供劳务来为自己取得一笔收入，以填补直接出口的收入同所需进口品的费用之间的差额。虽然

以量计算的出口品总额，尤其是以价值计算的出口品总额，是有波动的，但有一部分骨干商品的销路是多少有保证的。这些货物的运输可由卖方进行，也可以由买方进行。某些国家的政府往往劝说其本国的出口商让他们的货物由本国船队来运输，以便获得从航运服务形式赚取无形出口收入的好处。这种考虑在德国和日本船队的成长过程中是起过作用的，它们不顾国家资源受制于航运这一点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经济的使用办法。

其次，国家威望问题起过极大作用。“德国在世界上的荣誉有赖于它是一个强大的航运国家，”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卡尔·林德曼写道，“非此，德国的外交政策便软弱无力。”

各国船队的发展，不论其属何缘由，自然都被老早确立了地位的传统海上强国视为对它们商业地位和利益的威胁。在这方面，“对英国航运的最严重威胁来自日本”。日本船主协会代表T·斋藤对英国提出日本到了1937年已有能力运载其贸易量的两倍的指控加以反驳：

“认为各国只能拥有够其贸易量所需的远洋航行吨位，这393种看法在英国倒是异乎寻常的。”但劳埃德勋爵说，虽然对于一个国家拥有多于其本身贸易所需的吨位这一原则是不可能例外的，但“在这一原则的应用必须有限制”，而“当它终于威胁到英帝国的交通时，那我们就得说清楚：维持英帝国的航运对整个英帝国具有无比巨大的战略和商业利益”。问题的核心是，日本象德国一样决心扩张，而因为这两个强国的帝国主义目的——国家主办的和国家补贴的航运扩张，只是这种帝国主义目的的一个表征——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侵犯到那些基本上想保持现状的国家的政治和商业范围。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各国普遍都不愿意本国的贸易在运输上受制于外国吨位。但拥有本国的商船队并不一定意味着供应安全便有了保证，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安全便有了保障。此外还需要陆海军实力。

海军实力不仅仅是军舰数量的问题。军舰的装甲、速度、火炮射程等等，以及舰队的构成都非常重要。舰队的构成这个因素视其所执行的任务为防卫性抑或为进攻性而定，而一个强国的舰队任务的性质又取决于既涉及其自身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范围，又涉及它同其他（潜在的敌对）强国利益范围的交叉点的地缘政治位置。在现在所谈的问题上，我们只需将各强国的相对海军实力（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等以千吨计的总排水量为尺度）同它们的相对商船实力（以千长吨计的外贸船舶吨位来衡量）作一比较。下表大体上表明了1938—1939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军舰和商船吨位

	联合王国	美国	日本	法国	意大利	苏联	德国
海军实力(千排水吨)	1,280	1,277	906	547	481	287	197
商船实力(千长吨)	15,000	3,600	4,100	2,400	2,600	(999)	3,300

就海军实力而论，英国大于德国，单凭这一点英国就有足够的力量保住它的主要交通线，但来往于英国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间的交通线除外。另一方面，德国除了它同北欧国家的极为重要的贸易外，它对于保卫它的海运

贸易不能有任何指望。北欧是德国主要商业利益范围，这是从重量来说，而不是从价值来说的。

意大利海军力量足以威胁英国通过东地中海的交通，并迫使英国商船远航，绕道好望角，尤其是考虑到意大利的潜艇和驱逐舰分遣队，情况更是如此。但意大利海军力量固然可以迫使英国商船改变航路，英国海军力量也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船只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而且，只要英国在亚历山大和海法拥有基地，甚至可以阻止意大利船只进入苏伊士运河。因此，封锁地中海出口，英国海军就不仅会迫使意大利船只改道，而且会完国联发表了以这种形式所作的一个对比，见《军备年鉴，1939—1940年》（ArmamentsYearBook1939/40），日内瓦，1940年6月。全切断意大利同它在地中海以外的主要海运贸易中心的交通。

强国在太平洋的相对海军实力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日本海军有足够力量保护其通往远东大陆和西半球国家的主要供应来源的航线，以防英国的干涉；但英国海军能否防止日本对英国同大洋洲贸易的袭击，却至少是个疑问。能否保卫英国同大洋洲的贸易，首先取决于英国在大洋洲、香港、尤其是新加坡的军港的安全。如果英国所要对付的日本是一个单独的敌手，那末英国还有一线希望，能把日本对英国商业的袭击可能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样地，如果英国所要对付的只是德国和意大利，英国海军也可能足以保护英国商船对付德国和（或）意大利的干涉。但英国的海军实力敌不过德、意、日加在一起的海军实力。即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它们的联合海军力量也只比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德、意、日的海军实力稍强一点。因此，如果美国的巨大海军力量不投入英法一边，英法联合海军实力有限，就得让1938—1939年的外交去担负起这样的任务，以制止反共产国际国家公然结成反对它们的海军同盟。³⁹⁵ 考虑到强国在军用飞机方面的实力对比，外交手腕就更有迫切的需要了。空中机动性的臻于完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技术和工业进步的最大成就之一。不过，飞机的作战范围并不是无限的。飞机固然几乎不能用来保卫从一个大陆的某个终点基地到另一个大陆的某个终点基地间的海洋通道，但用之于在欧洲打击这些基地本身却是足够完善的。轰炸机的攻击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由于大小、速度、装备的差异），其效能取决于它们可能遇到的战斗机，高射炮火等的防卫力量。

1939年初，单是德国拥有的可以作战的第一线军用飞机就比英法加在一起的还多。在德国的总共大约二千四百架第一线飞机中，轰炸机差不多和战斗机同样多，而英法合计约二千架飞机中，轰炸机航空分队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我们再把意大利为数不足一千架的第一线飞机同德国的第一线飞机加在一起，那末轴心国的空中联合优势就超过了英法的联合力量，比率大约是二比一不到一点。如果把拥有一千多架飞机的日本也计入轴心国阵营，轴心国的空中优势就比英法的联合力量相应地又大了一些，因此，象计算相对海军力量一样，通过对相对空军力量的计算，就看出英法联盟较之德意日联盟是处于劣势，除非即刻能使苏联或美国站到英法这一边。1939年初，消息灵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从军用飞机数目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胜过苏联。苏联在飞机数目上的绝对比重（三千到四千架）和英法的空中力量加在³⁹⁶一起，会同反共产国际国家的联合空中力量恢复均势。另一方面，拥有一千五百架战斗机的美国，不论它作为英法的一个亲密军事盟国可能会多么有用，但除非它本身遭到挑衅，它是不可能被拉进这样一个同盟的。

既然反共产国际国家到了 1939 年已积聚起数量上几可与英法相匹敌的强大海军，又有一支占优势的空军——更不用说地面部队的悬殊了——英法这两个西欧国家就必定要考虑通过谈判同苏联结成联盟来改变这种危险的不利处境的可能性。苏联同西欧国家一样而不同于美国，早就很清楚它已处在受轴心国进攻的危险之中。

英法政府对苏联政府作出建议的犹豫不决，以及它们后来为时已晚而又不热情的尝试的失败等，将另外记叙。

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考虑之中，三个起了阻碍作用的主要问题似乎是：（1）尤其是 1937 年大规模清洗武装部队以来，苏联在军事上的价值值得怀疑，（2）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同苏联交往不足取，（3）苏联本身就有“领土野心，去鼓励它的野心是不明智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这个赞成或反对同苏联达成谅解的关键问题上，英法政府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曾对各强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作过任何对比考察而受其影响，虽然对于国际形势要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和处理本应当考虑到这些问题。

事实上，苏联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六个强国。那六个强国的工业实力有赖于它们的供应线以及其帝国各部分之间交通的安全，而唯有苏联对外部交通线安全的依赖程度不及对本国领土安全的依赖程度。可以表明这一点的是——虽然不能就此作出结论——它的进口额无论从总计数来看或以每百人计算都比较低。在 1938—1939 年，不仅苏联对外部世界的实际依赖程度很低，而且外部世界也不能把苏联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贸易范围。苏联既无强大的朋友，又成了反共产国际集团扩张主义国家敌视的焦点，看来最有可能成为这些国家的侵略的牺牲品。因为，正如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使日本占有更广阔的某地可以从那里出兵进犯苏联领土，同样地德国在慕尼黑的不流血胜利也打开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大门，因为德国占有慕尼黑打断了把这两个旧世界最大的大陆强国分隔开来的缓冲国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

另一方面，对英法说来，如何保住它们的供应线和帝国交通使之不受任何干扰，乃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它们按每百人计算的进口品超过了其他任何强国，尤其是英国的贸易分布十分独特，遍布世界各大陆。确实，英法拥有高效率的海军，而且——由于它们在世界范围占有领土——它们占有海军基地的优势，可以利用这些基地保护许多大洋航线。但在 1939 年，在大西洋上拥有制海权已不象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意味着在远东海域拥有实际控制权。鉴于日本有强大的海军，在作战范围上又得到它的南太平洋基地（即它的委任统治地）的加强，英国通往大洋洲的贸易航路就特别易受攻击。因此，如果西欧国家遭到日本的攻击，它们就会发现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没有迹象表明，惧怕挑起日本的攻击是英法政府对于寻求同日本深恶痛绝的苏联结成联盟一事踌躇不决的原因之一；因为——除了苏联也是英法的保守政治家们所猜疑的对象外——看来英国参谋长们正在对这样一个假设进行仔细的分析，即不但有德国和意大利的进攻，而且有日本的进攻，这无论如何都是意料之中的。

慕尼黑以后人们最担心的不是日本，也不是意大利，而是德国。但所有这三个强国都在三十年代的不同阶段采取了步骤，单方面改变了它们领土的政治疆界，而且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效的抵抗。确实，正如戈林向一个外国外交家夸口时说的：“你只要砰地在桌上捶一拳。接着各个民主国家在国会里发表几次演说，就什么事都没有啦。”胜利是累积起来的，随着一个接一个

的胜利，也就愈益得寸进尺地提出更多生存空间的新要求。第一次世界 398 大战以后过了二十年，这个从前的战败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不只是准备提出修改条约和帝国主义的要求，而且准备并乐于付诸实施，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考察德国新近获得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并与其他强国相比较。首先必须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去寻找，即德国在三十年代便把它的广泛的工业潜力日益转向生产作战武器。有两个问题需要阐明：第一，在 1938—1939 年前生死攸关的二十年中改变了强国相对工业实力的变化是什么；第二，这些变化如何才能解释？

第三章 强国的工业力量对比、

第一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重建和工业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若干年，当工业的严重失调得到调整、大陆欧洲摆脱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混乱而出现了比较有秩序的金融局面、战败国的工业和战胜国的工业都和新的领土解决结果相适应时，一些强国——虽然不是全部——很快恢复了它们战前的工业产量。以一国的工业有形生产量的指数作为衡量该国工业实力的主要尺度，全世界 1923 年生产的工业品超过了 1913 年，各强国工业品产量超过 1913 年的年份是：意大利和美国，1922 年，法国，1924 年；苏联，1926 年，德国，1927 年。唯有日本的产量从未降低到战前水平以下。而英国则是强国中最后一个于 1929 年达到——而且还不是完全达到——它的战前产量的国家。各国以及全世界的有形工业产量指数在 1913 年以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的变动情况见下表：

表 工业产量*（1928 年=100）

年份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法国	苏联	德国	英国	世界
1913	37	63	63	79	70	89	107	73
1921	65	61	61	43	13	65	73	60
1922	68	77	67	61	17	70	87	73
1923	71	92	72	69	26	46	95	79
1924	76	86	82	85	30	69	98	82
1925	82	95	92	84	50	81	93	88
1926	92	98	102	98	70	78	72	90
1927	93	96	95	86	82	98	103	96
1929	110	107	111	109	118+	101	106	106+

注：*瓦根菲尔：《工业经济》，第 38 页和第 64—67 页。

+官方指数苏联原为 124，世界原为 107，考虑到苏联数字中因通货膨胀存在的偏差，故向下调整。关于估算的依据，见下文，原著第 432 页表 3 注（即本书第 719 页表 注——译者）。

（一）意大利和日本

在截至 1929 年的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业进步最大，其产量几乎比 1913 年增加两倍，意大利和美国的工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产量各比 1913 年增加了近一倍。战争本身对日本就是一个最大的恩惠。日本在战争中被剥夺了许多它原先可以进口的工业品，加以外国对它的商品的 399 需求很旺，它就发现了迅速推动自己工业发展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在采矿、冶金和造船方面更是如此。由于战争而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生产能力后来也只是一部分成为多余。因此，日本从战争结束时大大改善了了的处境起步，其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类似于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增长速度。

影响工业发展速度的因素是什么呢？产量至少是由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决定的：（1）工业生产能力，即工厂，尤其是资本设备；（2）一国之内，或其贸易范围内的原料供应；以及（3）可资利用的人力（包括工时）的数量及其劳动生产率。

在日本和意大利，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和比较成熟的工业强国相比，总人口的实际收入很低，因此几乎全部收入都用于购买供直接消费的商品，于是购买以及从而生产投资货物或资本货物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但是要增加整个工业生产，包括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在内，就绝对有必要在机器方面和建立工业生产能力方面进行投资。这就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业，总产量和实际收入很低，另一方面，由于普遍贫困，要人民少消费多储蓄也就日益困难，因而工业只能慢慢地建立。而日本和意大利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很高，普遍贫困更有日益严重之势。

但与意大利形成对照的是，日本有记录的储蓄显然 40 达到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这个特别高的比例更突出了另一个特点的意义。因为储蓄不只取决于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收入的分配；而在所有强国之中，日本的收入分配是最不均的。日本在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受国家控制的银行奉行扩张主义货币政策，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商人，都能得到用于开发国内资源的低息贷款。这笔支出创造了新的收入，在收入不均等的条件下，结果是创造出储蓄，取代了原初国内投资项目借以获得资金的贷款。

然而，国内产量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要看能否获得外国的机器和设备。虽然出口有所增长，可由其收入支付一部分必要进口品的费用，但外汇拮据的情况却不能完全避免。日本和意大利不同，它幸运的是在战后初期还有战时积累起来的黄金和外汇结余可花。当这些结余花完时，它就和意大利一样不得不利用外资，即借助外国人的存款了。截至 1929 年，美国在意大利的私人投资已达到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一半投资于公用事业。美国在日本的私人投资达六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五分之四是美国公民在日本制造业中拥有的投资。美国除了在有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外，还为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在美国出售公债券，为日本出售的债券总额是美国在日本的私人直接投资的八到十倍。外国贷款对日本经济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这样一点看出来，即在 1923—1929 年这一时期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和日本债券债息以及外国在日本的企业的净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些贷款有一部分浪费在进口额外的消费品上了，这部分无助于提高生产能力；但其他部分确实用来进口投资货物，尤其是用来进口工作母机，即用在进口制造机器的机器上的。日本战后时期的工业化虽然不是全部，但却主要靠的是私营工商业家的主动性。人们曾经

看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给几乎所有惹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是政府。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办纱厂并把铁路收归国有，其明显的目的是鼓励日本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国家在八幡拥有最大的钢铁厂；国家拥有军火工厂、制造军舰的船坞、纺织和成衣设施、一支吨位很大的商船队；国家并同私营工商业集团合办电力公司、无线电公司、殖民地开发公司和银行。在这方面，当时存在着许多政府直接投资的机会；政府可以用借来的外国资本安装机器和设备，并通过“政府开支超过税收”的手段从就业不足的大批大批农业过剩人口中吸收“额外的”人就业。这种扩张政策的真正危险在于，吸收到就业行列中来的额外的人的收入总要同用于购买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现有收入相竞争，因为食物和各种消费品的供应从短期来说是不会随着一个新钢厂的建立、一条新铁路的修建等等而以同等步伐增加的。

由于工业生产能力有限而在扩大生产方面出现的暂时性障碍同原料匮乏引起的障碍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日本和意大利许多工业原料都极为短缺。因此，在工业扩张时期（1922—1929年），意大利的进口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日本进口额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出口额——其中日本约百分之六十是丝织品和棉织品，意大利百分之二十五是丝织品和棉织品——增加的百分比略高一点。但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赤字仍然相当大，用无形出口的收入抵补不了。日本企图制止外汇收支的恶化，因而强行增加出口并通过关税以及更直接地通过限制对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生活所不需要的交易提供进口信贷以限制进口。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完全奏效的。在整个二十年代，意大利和日本的外汇收支都有逆差，它们的外汇率始终存在着压力。之所以没有由此而导致崩溃，没有危及国内的工业扩张，乃是由于外部世界准备把存款转移到这两个国家去。

只要外部世界准备为意大利和日本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资金，真正限制工业扩张的因素就既不是工业生产能力，也不是原料，而是人力了。人力绝对缺乏的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恰好需要的那种劳力，即有知识、有干劲、有技术的劳力却严重短缺。工业就业的先决条件是那些将要被吸收进工业的人应当具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水平，而且，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围绕着工业活动的各种服务要顺利进行。运输组织工作效率之低，治安机关及地方和国家行政方面的松懈状态和腐败现象——这一切都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设备和原料——都必须予以克服，才能取得工业的真正进步。在这方面，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是在向前迈进的；但它们的人民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是，组织能力、技能和适应性不及西欧那些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和美国的人民中普遍。这个缺点也抑制了意大利和日本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 美国

美国同日本一样，也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美国二十年代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虽然是下降的，但仍旧很高。不过相似之处仅止于此。美国在过去就建立了巨大的工业，它有天赋的丰富自然资源，它有高度熟练的工人阶级和朝气蓬勃、富于进取心的实业界和管理人员，他们准备冒险并在技术上应用科学知识和新发现来进行实验。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产量的增长也受到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原料和合适的劳力的制约；不过在短时期内，这些限制远不象发达国家那样严重。战后初年的繁荣有助于把它的工业从战时体制调整到平时轨道上来。继繁荣而来的是1920—1921年的萧条，这次萧条虽然严重，但为时不久，因为一旦紧缩通货降低了价格水平，美国企业家对生意有利可图的信心很快就恢复了。无论在国内国外，仍然有待于完成的任务是太多了。工业家开始用更好的机器更换过时的机器，并提出扩大现有工厂的订单，尤其是在电机技术、汽车及化学工业方面，看来所有这些工业都提供了特别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由于人口增长和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高速率迁移而使建筑物和住房建造方面有了投资出路，这就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加之，欧洲遭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巨大重建任务和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的巨大任务给国外投资提供了机会。美国的私人国外投资支持了外国对美国机器的需要，这种需求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加美国的工业产量。

然而——而这一点是美国和正在工业化的较穷国家之间的巨大悬殊——在产品和就业的各个等级上，美国的储蓄都自然增长，不但足以支付国内机器的更新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且还能支付国外的重建和工业发展。美国非同寻常的生产力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按平均数计算，从1925到1930年，美国在全世界自然增长的储蓄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占世界储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五。美国制造业工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从二十年代投资景气过程中每个人工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衡量。即使在1929年，当美国工业产量达到最高峰时，既不能说在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方面的障碍使得进一步扩大产量一般说来已不可能，也不能说，劳力供应方面的障碍广泛地存在着。

(三) 法 国

法国同意大利一样，其某些地区已被堑壕战彻底破坏，战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工厂和设备、穷屋、铁路等等。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法国的人力资源已严重耗竭。为了克服人手的短缺，二十年代法国成了移民的主要接受国，尤其是接受来自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到了1929年，战争所引起的这一可怕差距已经得到弥补，这是多亏移民中年轻男子占着绝大多数。但是，尽管有移民，还是劳力的短缺而不是原料的短缺限制了重建的速度；由于归还了洛林德语区，法国得到了几乎和洛林法语区一样多的铁矿储量；由于暂时获得了萨尔区，以及在洛林德语区发现的一个重要煤田，法国战前对煤的进口需求现在减少了；由于合并了阿尔萨斯，法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钾碱矿区。新归并的领土除扩大了法国经济的原料基础外，还提供了钢铁厂、纺织厂一等等，所有这些工厂尽管已部分地受到破坏，但增加了法国的潜在工业实力。法国在私营工商业家的发动下作出了坚定而成功的努力来解决它的重建任务。法国的劳动力从一开始便得405到充分就业，在整个这十年中除1921年的短暂衰退外，实际上是不知失业为何物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制度下，加速重建的工作就要依靠：（1）进口超过出口，（2）减少国内消费，或（3）提高劳动生产率。法国只是在头三年中确实依靠过外部世界的帮助；1921年以后，法国的国际收支就年年有盈余了。因此，重建和工业扩张主要是靠减少国内消费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通过自愿储蓄以及对收入和大众消费品大幅度提高税率，把劳力、原料和生产能力从消费品工业节省出来用于重建目的。至少在1924年以前，储蓄不仅足以为私人投资提供资金，而且还能为政府巨大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1924年，普恩加费政府在选举中一败涂地，部分地是因为人民对税收负担不公平心怀不满，部分地是因为对占领鲁尔感到失望，当初占领鲁尔的意图是强迫德国缴付赔款，但结果是鲁尔的全部生产陷于停顿，因而引起德国货币的全面崩溃。新政府动起对资本课税和对最高收入增加税收的念头，致使“富人”不买政府债券而将资本转移到国外，而政府债券在那以前一直是为弥补预算赤字而筹措资金的手段。这种可悲的抽逃资本引起了两个后果：第一，迫使政府——它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大幅度降低支出——靠向银行借款（即实际上靠制造额外货币）来为其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第二，商品外流（即抽逃资本采取的形式）减少了国内可以得到的商品数量。两项措施都导致价格上涨。1924年到1926年时期的物价飞涨起到了同自愿406储蓄和税收同样的作用，因为物价飞涨也降低了消费，并把生产要素节省下来用之于重建目的。不过，借通货膨胀降低消费是以杂乱无章的、不公正的方式发生的。1926年，“右翼”政府上台执政；一切向富人课征重税的计划均被放弃；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又从国外回来，货币事实上稳定在其战前黄金比价的五分之一水平上。与此同时，重建业已完成。重建给法国每仍种主要的工业（除丝织工业外）提供了最现代化的工厂。“北部的毛纺和棉纺厂、洛林的钢铁厂以及主要的煤矿现在同世界上的任何工业处于同一技术水平。”

法国工业生产继续扩大，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加之，由于法国出口盈余相当多，不会有原料和设备短缺的事来牵制工业的发展。唯一的限制是人力短缺造成的，而这一限制可以通过进一步移民入境，或甚至通过更有魄力地把人口从农业转移出去来消除。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国工业的

恢复搞得十分出色。确实，“在 1919 年时要是有人预见到，不到十年之后，法国竟会从它的苦难中如此彻底地恢复过来，而且是几乎全靠它自己的努力恢复过来，那是过分乐观的”。象美国一样，法国 1929 年在工业上比 1913 年强大得多。

(四) 英 国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联合王国的工业产量从未超过其战前水平，这和所有其他强国的经历形成惊人的对照。其所以惊人，是因为骤然一看，经济恢复的条件似乎对英国非常有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力损失虽然严重，但仍较法国为小；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大而且没有受到破坏；它通过出口换回原料的前景比以前 407 任何时候都要光明，因为它的主要出口竞争者即德国和比利时已被暂时消灭。

同几乎所有交战国一样，英国在重置存货和修理工厂和设备方面也要花许多力量才能恢复旧观。此外，英国重建工作的需要主要还靠把它的商船队恢复到战前规模。它在这方面的任务同国上受到军事行动影响而整个整个区域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英国干劲十足地投入重建工作，三年之内，医治创伤的工作获得成功，英国商船队业已恢复，而且 1922 年的世界航运吨位确实比 1913 年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这种为重建目的而提出的直接需求达到饱和，战后的繁荣遂告中断，而作为一个起因，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七便宣告了 1920—1921 年萧条时期的到来。

在萧条后的缓慢恢复期间，英国商人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刺激因素要比美国商人遇到的更为有限。如果私人投资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和人力受到妨碍，政府就可能进行干预，创造有效需求。但事实上，财政政策减损了而不是增添了有效需求。在整个二十年代，中央、地方和社会保险机关的统一预算表明略有盈余。

在这种情况下，便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国外需求的恢复上。但是在 1922 年以后，世界其余地方的产量和就业增加了，英国的出口却没有恢复到预期的水平。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工业现在不得不适应的世界格局已经根本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了。出口不能充分恢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内燃机的发明缩小了煤的需求，因为内燃机意味着石油代替了煤被用于公路车辆（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公路车辆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铁路），世界 408 上的船舰也愈来愈多地用石油而不用煤。依靠褐煤和水的落差的电力得到发展又进一步降低了对煤的需求。第二，在那些英国从前在其销售中占有支配性份额的制造行业中，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工业化。新的工业——往往受到人为的保护——迫使较老的工业国家接受调整负担，第三，当欧洲受到战争蹂躏的农业地区完全恢复生产而又没有引起曾在战争期间扩大了生产的地区的相应收缩时，农业价格下降了。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是从这一价格的下降中得到好处的。但是，外国人从他们的产品中得到的收入少了，他们可以花费的也少了，所以，外国对英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从未完全恢复。而且，英国海外投资下降到战前水平以下，因此不象过去那样去支持外国对英国产品的需求。就英国出口工业面临的困难是由于技术的变化和外国工业化所致而论，除非根据新的情况作出重新调整，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这种困境的。就上述困难是由于英国成本昂贵所致而言，振兴出口工业的唯一办法——在成本没有很大降低的情况下——是叫英镑贬值；但是由于在 1919 年已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政府坚决打算重新建立，而且事实上确实在 1925 年按旧平价用金本位重新建立通货。

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动机无疑是想恢复外国对英镑的信

心，在纽约日益加剧的竞争面前再次坚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界中心的地位。事实仍然是，在确立旧的平价以后，以及鉴于英国的价格和成本同国外的价格和成本相比的变动，英镑还是定价过高。加之，英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显然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而 409 且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工业中效率的迅速恢复比起原初的过高估值使英国的平价更加难以维持了。

由于英国的工农业总产量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要出口的，并由于出口部门雇佣的人数在就业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日益提高，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量的孱弱对国内便有严重的后果。它使英国的失业现象长期存在。到 1929 年，英国的出口量比 1913 年低百分之二十，而进口量则高了大约百分之二十。然而，从无形出口中的收入抵销了贸易平衡中这一巨大差额而有余，所以至少从 1924 年起国际收支年年盈余，这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精确的指南，但却能够说明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外投资额有多大了。

因此，虽然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稳固，英国的债权国地位仍然无比坚固，但它的工业活动在整个二十年代或多或少是停滞不前的。工业生产总的说来不稳定，在 1929 年才达到战前产量，但失业人数的幅度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中仍然很高。作为失业者记录下来的有保险的工人人数在 1923 年以后的任何一年都没有下降到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下。人力情况如此，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确实，英国同意大利、日本、美国或法国不一样，它从未达到过接近于把它的潜在生产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的地步。

（五）德 国

德国和俄国的重建工作比上述五个国家都着手得迟一些，这两个国家进行重建的环境也比较复杂。

德国是战败国，不得不付出战争的代价。根据凡尔赛和约，它丧失了约百分之十的战前人口，约百分之十四点六的可耕地区和百分之十的工业生产能力。它丧失了国外的全部资本投资、大部分商船队和大量的铁路车 410 辆、渔船等。但在魏玛共和国这个新的帝国里却既不缺人力，也不缺工业生产能力。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异常惨重的伤亡，由于从割让的领土转移过来一些人口以及由于自然增长而得到弥补；而且德国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它的工业生产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政治单位，它的人口和工业实力被某些战胜国尤其是法国视为必须予以遏制的潜在威胁。

德国人口和工业实力这一基本事实（1925 年为六千三百二十万居民，而法国是四千万）自停战之日起就支配着法国的对德政策。

负责法国政策的那些人所考虑的德国威胁不在于它当前的长处，而在于它未来的潜力。……德国的野心将来可能被安抚下去。但法国的命运却不能信赖这样一个臆测的方法。确凿无疑的是，就算其他方面都是旗鼓相当，一个不到四千万居民的国家按对等条件是打不过一个工业产量比它自己占有极大优势而且拥有近七千万居民的国家的。法国在上次战争结束时的政策所依据的就是这一条根本真理。

法国人不要含糊的保证，他们要的是有绝对的把握。克雷孟梭想要的“迎太基和平”是一种通过破坏德国业已取得的经济力量来实现法国安全的和平；“通过割去领土及其他措施削减其人口；但主要的是它的经济体制必须摧毁，因为它就是依靠这一体制取得新的实力的，那是一个建立在铁、煤和交通运输上的巨大结构”。暂且引用劳合·乔治过时的见解：法国的政治家们，

一心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制订条约中〕削弱德国的潜在力量。任何可以想象的和平都会让那个可怕的敌人拥有大大超过法国的人口。……在我所见过的法国政治家中，从没有一个考虑过德国和法国可能成为朋友。

决心抑制德国工业实力，是法国奉行的一项政策，它是由于法国遭受了特别巨大的流血牺牲和破坏而产生的，而在和约的赔偿条款中也有所体现。然而见识广博 411 的对这些条款的批评者当时认为，（1）交纳这样巨额的赔款是行不通的，（2）负担过重，会妨碍德国的恢复，从而也会妨碍欧洲的繁荣，这些观点后来促使对赔偿义务作了相当大的修改。但是，在作出这些改变以前，无论是已缴付的实际数额，抑或是收取赔款的方法，都促使德国货币彻底崩溃，造成持久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只是根据道威斯解决办法——即，正是“因为缺乏迎太基式的和平”——对德国的债务作了修改，德国的工业实力到了 1929 年才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大大地超过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是如何使自己适应于战后的条件的呢？概括他说，德国的重建任务同其他交战国面临的重建任务相似，它得补偿设备的损耗，库存的亏空和根据停战协定所承受的船只和车辆等等的损失。这些重建方面的要求不仅同消费者的需求发生矛盾，而且同外国的赔偿要求发生矛盾。但要在没有以外国贷款为形式的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满足赔偿要求，就有必要通过税收和储蓄的有秩序的方式，或者通过通货膨胀的无秩序的方式，削减或推迟物质重建和消费。

但是只要价格继续上升得比收入快，通货膨胀就只能削减消费。一旦人们开始害怕并预料会发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抑制消费的手段，其作用会愈来愈小。这种局面实际上在 1922 年秋和 1923 年底之间便在德国出现了。

在极度通货膨胀到来之前，德国工业恢复得十分出色。到了 1922 年底，它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以魏玛共和国区域作为这两个时期局势对比的基础）。资本货物的生产量自 1919 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钢铁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水泥生产和房屋建筑几乎增加了两倍，而船舶建造增加了两倍以上。专家们提交给道威斯赔偿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德国的港口和运河自 1919 年以来已大大扩展，铁路网扩大了，电话和电报系统装备了最现代的设备，工业的许多部门由于建立了新的工厂和安装了最新的设备，能够比战前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重建和投资的鼎盛期首先是由政府的花费开始的。到了 1921 年年中，政府支出确实很高，单是预算赤字就超过了全部岁入。赤字开支导致在一些工程中重新雇佣复员军人，这些工程一部分旨在缓和各种原料的奇缺（如开采新的褐煤、煤和劣质矿藏），一部分为了改善运输和交通系统的混乱状态。许多原料货源不畅，尤其是粮食和消费品的绝对短缺导致了国内价格上涨，价格虽然还算公道，但刺激了生产；不过与此同时，由于这对收入的再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利润的影响，实际消费被保持在低水平，而重建的速度则加快了。在这第一阶段，赔款主要以实物支付，尤其是以煤支付，虽然德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但马克的对外价格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下跌。

第二阶段逐渐引入极度通货膨胀时期，那是由于要求在 1921 年 8 月以前缴付第一批巨额现金赔款一事开始的。即使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德国在第二阶段的头几个月里外汇结存也已出现赤字，其速度超过了每年十亿金马克。由于交割了又一笔十亿金马克的赔款，马克的交换价值的贬值在没有相应地增加出口或削减进口的情况下必定是相当大的。除了需要履行这个赔偿责任外，几个月以后，国联行政院又作出瓜分西里西亚的决定，结果是，“在柏林的外汇市场上便出现了其猛烈程度势不可当的一场大恐慌”。在第二阶段中，政府把预算赤字缩小了相当多，以致在通货膨胀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已不是 413 赤字开支，而是马克交换价值的下跌。这就提高了生活费用，同时出现了要求增加工资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并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确实，自 1922 年年中以后，政府赤字开支的削减被私人开支的大量增加抵销了。虽然这一年 7 月暂时停止了用现金支付赔款，但对货币的信用已经严重动摇，普遍抽逃资金投入所谓“实际价值”（Sachwerte）。对于大工业家和投机商来说，“尽可能多借债成了善于经营的准则之一：因为以后是用贬了值的货币去还债的。”受完全反常的刺激支配的大规模的滥用乱花表明了这种将资金抽逃到投入“实际价值”中去的现象。1922 年下半年在发生这种抽逃资金的同时，出口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这部分地是因为外国的抵制。外贸额的这种变动直接造成了外汇收支的恶化和马克的继续贬值。

德国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不履行它应以实物交付的赔款，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便占领了鲁尔。这一占领引起了消极抵抗并产生两个后果：由于第一，鲁尔停止了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帝国其余部分的生产的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即因为鲁尔不再交出煤、钢和化学品以及帝国产品不能再在鲁尔销售而减少了活动力）；第二，帝国政府对消极抵抗的资助使预算赤字大大增加，致使“德国货物和劳务总生产”灾难性地下降。极度通货膨胀和马克的全面

崩溃就不可避免了。一旦对通货的信心丧失殆尽，外汇市场上的极度膨胀就象国内市场的情况一样，再也限制不了消费，而是实际上刺激了消费。1923年，工业总产量降回到了1919年底的水平，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普遍存在。

1923年11月的两项决定性措施结束了极度通货膨胀并成为新通货稳定化的先导：第一项是稳定税收，第二项是停止消极抵抗。但财政改革和初步的稳定化是伴随着外援而来的，这种外援使德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受到某种外部控制，但它保证了最终的、持久的稳定。如果早一点提供这种援助并且也许还辅之以某种形式的控制——就象根据道威斯解决方案所采取的那样——大概就可以使这个新共和国避免出现一个陷入贫困的、怀有敌意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后果。

道威斯计划作为一个解决赔款问题的临时办法，削减了德国每年的赔偿债务，给了它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真正恢复过来。正是在1924年至1928年这一时期，私人投资活动——只是在最后三年才有政府投资来补充——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在大约四百亿帝国马克的私人和国家投资总额中，三分之一用于增加被战争和通货膨胀耗尽了库存，三分之二用于扩大工厂、运输、住房和公用事业，以及用于德国工业生产工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业是根据美国模式制订它的技术政策的，这种模式通过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总量并部分地减少雇佣人数。

真正阻碍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既不是人力的短缺，也不是缺少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而是缺乏原料。德国在整个这一时期都赚不到所需外汇来支付进口品并用这些钱转而满足赔款要求，当时德国在交割赔款方面是分毫不差的。德国从未达到过它的战前出口量，外汇收支长期存在赤字，所以只能靠向外国借债来维持它内部活动的现有水平。事实上正是靠了净增它的对外债务，德国才为偿还赔款和部分地为扩大工业生产能力并使之现代化筹得资金。颇费揣测的是，德国能否依靠直接限制进口和削减消费以大大减少它的外汇收支赤字。这类措施肯定会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比民主国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到的外贸更大程度上的控制，而协约国是没有手段强制推行旨在削减消费的财政政策的，除非由一个协约国军政府对这个主权共和国实行绝对控制。象法国人那样说德国在道威斯计划时期净投资额为实际缴付的赔款额的三到五倍，因此有相当大的余地可以叫它负担更多得多的赔款，这样论证是不够的，应当表明的是，没有外国对德国经济生活极其严格的控制如何能把德国的投资或消费削减下去。通过榨取赔款，直到德国的资本不可能有任何增长的地步，这样实现迎太基式的和平，也许“在经济上是可能的”，但要假定：第一，已施行了外国控制，第二，世界的其余部分愿意接受巨额的出口盈余和对它们自己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结构作必要的调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短期内可供德国选择的替代办法将是借助于外国援助把本国的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效能很高的程度，使它最后能够实现真正的出口盈余，从而可以偿还赔款、外债以及外债利息。这便是那些虽然不是全心全意，但却也诚实地支持一项履行条约政策的政府所抱的意图。但在这一点能在实际上得到检验之前，纸糊的房子早就倒塌了。德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到1928年至1929年的时候已比战前强大——是建立在不稳定的金融基础上的。最终破坏了德国金融基础并瓦解了国际支付体系的，不在于赔款方面，不在于协约国之间的债务，而主要是由于某些原因制止了迄今一直资助了它们自己的出口盈余的国家的资本继续外流。

（六）苏 联

416 在 1920 年 10 月内战结束以前，苏联是不能认真进行重建工作的。战前的苏联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它是强国之中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而且，它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外国进口原料、依靠外国技术人员，而尤其是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的。苏联过分孱弱，是经受不住现代战争的严峻考验的。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匮乏和苦难——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人力损失比美国、联合王国、意大利和法国加在一起的人力损失还大一——彻底搞垮了的俄国农业和工业工人接受市尔什维克对政权的篡夺，把它作为向和平迈出的第一步。共产党人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把大地分给了比较贫苦的农民，平均了农民占有的土地。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内战；而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把全部工业收归国有时，俄国的前统治阶级在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便接受了外国人的积极援助。这些外国人的物质利益直接受到了威胁，而且从意识形态出发也有理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深恶痛绝。

大战和内战给俄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外部供应完全断绝，在外国干涉战争的过程中又丧失了对于该国基本的煤、钢和工业生产中心所在地区的控制，苏维埃政府只能靠通货膨胀性的赤字开支来取得对实际资源的控制。但是到了 1918—1919 年，极度通货膨胀已把货币的购买力降低到几等于零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只好实行强迫征集。以一个把基础建立在对农产品实行征集和由中央对国有化工业、消费者以及武装部队一律实行配给的制度来代替自由市场，这种做法使俄国的经济更加恶化。政府人员里没有经验的人太多、办事效率很低；中央控制紊乱；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整个制度本身就 417 包藏着最终崩溃的胚芽。在这个混乱的内战时期，当对财产的破坏、运输失调和行政混乱成为普遍现象时，人口中恰恰是布尔什维克靠它们支持的那些阶层——工人和小农都日益敌视“新的共产主义奴隶制度”。工业中，每个工人的生产率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农业中，农民反对强迫征集，他们不只是不拿出农产品，而且更糟的是削减了种植面积。最后结果是，当内战结束，苏维埃政府再度控制了他们的领土时，工业总产量只有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农业土地耕种的只有战前面积的一半，而卢布的价值只有 1917 年 10 月时候的百分之一。

重建的任务是巨大的。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取得工人和农民的信任。为此目的，列宁在同波兰缔结了和约之后不久便制订了新经济政策。这便是放弃许多内战时期的紧急措施。以向农民的剩余产品课取实物税代替强迫征集。放弃了由中央分配物资的做法——除给重工业分配物资外——而代之以一种社会化企业可以自行签订获取和处置货物和劳务的合同制度。加之，在贸易和手工业中部分地恢复非国有化的私营部门作为社会化工业和私有农民的农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大大地加速了城乡之间正常市场联系的恢复。虽然苏联政府把新经济政策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不过是一种过渡性制度，但它还是一直延续到 1928—1929 年。

毫无疑问，新经济政策刺激了经济的恢复。但由于缺乏某些原料以及存在其他因素，恢复的速度受到了限制。起初，从农业税所得的收获不及原先实行强迫征集取得的收获。由于借不到外国长期贷款，而税入和自愿储蓄又远远不足以用来购买为重建运输和重工业主要部分所需要的实物资源，苏联

政府继续靠印发新货币来为重建工作筹资。的确，直到 1924 年采用新的稳定的货币为止，货币和物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但和内战时期相比，货币的增加却是超过了物价的上涨，以致 418 货币的实际价值逐渐提高了。随着货币改革的完成，预算中的赤字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用发行新货币弥补赤字的筹资办法遂告停止；实物税改变为可以用货币缴付的收入—财产累进税；税收和来自国家财产和企业的利润——而不是自愿储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经费来源。到了 1926—1927 年时，重建工作已经完成，而到 1928 年，工业产量和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已比战前高出三分之一，而农业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但经济情势决不是令人满意的。首先，在整个二十年代，人口一直增长到超过战前水平，而农业总产量则仅仅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据估计人均粮食消费已达到战前水平，结果是可以用来出口的粮食数量下降，又因没有外国援助，出口情况就决定着苏联能够获得的进口量。因此，1928 年的出口额只达到战前的大约百分之四十，这便引起了很大的忧虑。所以，尽管政府通过全面的对外贸易垄断，确实控制了出口品的构成，他们也知道，进口品的短缺对国内工业的进一步迅速发展是一大障碍。但是，如果他们鉴于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而想防止人民依然很低的生活水平逐渐恶化，就需要迅速发展国内工业。其次，除了存在农业人口过剩和人口还要进一步增加的威胁外，由于工业设备不足，工业的失业人数也在增加。虽然在 1926 年和 1928 年之间缩短了工时，采取了两班制，工业工厂和设备仍不足以防止苏联工业失业高出于其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强国。1928 年年中工会会员中的失业人数增加到大约二百万人。靠工资和薪水为生的总人数从 1924 年的八百万增加到 1928 年的将近九百万，其中四百万不到一点受雇于大型工业和建筑业。失业者有百分之十二以上失业达一年以 419 上，其所得救济金为正常工资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呢？要在人口增加的同时吸收失业群众并对付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就得全面大大地提高生产率。直接妨碍生产进行的环节是钢、工业设备和农具的短缺，以及农业组织效率差。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低的情况下，要把生产消费品的资源重新转移到生产工农业设备上去，可能性是极有限的，而由于难以获得外国贷款，创造实际盈余就全靠改善农业组织了。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革命时期将大地产加以分割的结果，进入市场的农产品从未超过战前年代可供销售的农产品剩余额的一半。增加这个剩余额是一个主要目标；而用大型集体农业去代替小型私有农业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一党专政的政府手里有的是冷酷无情的手段，这场一切社会革命中最大的社会革命便从 1928 年起实行下去了。这个主张集体化的决定也是苏联从新经济政策过渡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转折点。在贯彻这场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确实实现了可销售的剩余；这一剩余的增加也还用了其他限制消费的办法。一部分从消费中转移出来的资源被投资于制造投资货物，一部分剩余被出口去为进口更大量的工业设备换取外汇。这些革命措施创造了这个国家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 年）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条件。这个五年计划是打算解决农业人口过剩和贫困的问题的。

（七）小 结

七大强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工业发展有五个主要特征。

第一，每个强国所面临的重建任务是轻重不等的：因为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破坏和减少投资的程度大不相同。对可以动用的资源的需求——不论是用于重建或是用于赔款——超过了从消费中节约下来（通过自愿储蓄或税收）的资源时，就在特定的设备、原料和劳力的供应方面遇到了绝对的短缺和阻塞，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然而，通货膨胀本身只要还没有从和 420 缓阶段进入失去控制阶段，却是有利于扩大生产的，并且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变，解脱出用于重建所需要的资源。

第二，当战时的破坏和减少投资得到了弥补，以及暂时经受了通货膨胀的这些强国的货币稳定下来时，新的投资就被引导到生产的扩大或合理化。新投资成了生产率或每人工时的产量赖以得到改进和增加的基础。到 1929 年，生产率和效率，即一切进步的真正源泉，在所有这七个国家里都超过了以前达到过的任何水平。

第三，充分就业和随之而来的每人工时工业产量的提高，使法国和美国达到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而在联合王国，则由于国外需求的根本改变，由于奉行了使得英国停留在资源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毫无生气状态的金融和财政政策，致使它在生产率方面的改善未能导致生产扩大到超过战前水平。然而，在它们相互歧异的活动和就业水平上，这三个国家由于通行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的缘故，都能够在国外放款，并且凭借国际收支顺差维持各自的生产量。

第四，日本和意大利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投资额，超过了它们准备通过降低已经很低的消费水平所能节约下来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便向国外举债。只要这些借款不浪费在提高当前的国内消费水平上，用这些贷款进口的原料和设备就可以使本国经济的工业部门得到扩大，并把一部分愈来愈过剩的人口吸收到工业部门去。而且，只要进口的机器补充了国内供应不足的资源，每人工时的工业生产率便提高了，这与高度的、日益增加的就业相结合，在战后十年使战时显而易见的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得以推进。德国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也广泛利用外国贷款来履行其赔款义务，并使它的工业现代化和合理化。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德国每人工时生产率所得到的改善，从 1927 年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人数的增加。

第五，苏联国内的长期动乱对它战后初期的工业生产水平产生了有害影响。然而，经济恢复开始以后，速度很快。每人工时的生产率有了提高，但当现有工业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时，引起了工业失业的增加。由于丝毫不能依靠外国援助，苏联主要依靠刺激本国的出口来支付迫切需要的设备和原料。这就首先需要使农业生产有可销售的剩余。可是，作为那场从下面发动的革命（1917 年）的结果的小型农业，使生产出这样的剩余受到了限制。从上面发动的那场革命（1928 年）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加这样的剩余，从而为加速工业化创造必要条件。农业集体化就是那场第二次革命的实质所在。

正如业已表明的那样，如果每一个强国都在二十年代达到或超过了它的战前工业产量，那么，当从战争时期转变到和平时期的恢复和重建完成时，它们的相对实力如何呢？

第二节 相对的工业实力和大萧条

1928年是比较繁荣的一年，据估计，这一年世界工业产值约为一百八十亿英镑。七个强国这一年所生产的工业品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四，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它们合在一起在工业世界所占有的霸权。但它们各自在这个总数中所占的份额却是极不相等的，各强国在世界工业品和制成品总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或即它们的相对实力如下：

1928年的相对实力（世界产量=100）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意大利	日本	七国
工业产出	44.8	11.6	9.3	7.0	4.6	3.2	2.4	82.9
制造业产出	40.8	12.4	9.3	6.6	4.8	3.3	2.6	79.8

这一对比中最引人注目的数字是，美国无论在工业 422 实力方面或在制造业实力方面都占世界的领先地位。在二十年代后期，美国占有无敌的地位，它一国的产量比其他六大强国的产量加在一起还多。它占压倒优势的生产实力还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有力的说明，这便是，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所生产的制成品的毛值几乎比英国或德国高一倍，比苏联或意大利高九倍到十倍。而就是这样高的产出水平，美国的现有工业能力和可动用的人力资源也都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但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同它非凡的工业实力毫不相称。至少在欧洲，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是英国，尤其是法国，而不是美国。不过，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并没有紧密的关连。大体上说，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世界是吃不开的。那时是国联的全盛期。由于美国和苏联不是国联的成员国，由于英美两国抛弃了原来答应保护法国的保证，法国被迫运用它在国联的影响玩弄强权政治以对付德国；不过法国政策的基础是它的军事实力，而不是它那广泛的工业实力。各强国虽然潜在地拥有工业手段来强调它们的意志——如果它们想这么干的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两个考虑严格限制了它们的政治野心。第一，鉴于工业地区和初级产品（即食物和原料）生产地区之间、工业伙伴国家之间以及各种初级产品生产国家之间互相紧密依赖，每个强国都需要有某些国外的主要供应品来源。要是它得不到这些来源，它的工业实力便会受到破坏。因此，任何想搞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国家都被迫在它的领土以内发展有效的代用品（哪怕得付出代价），转向从比较靠近本国的国家进口，和储存无法代替的进口品。第二，这类措施必须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即政府能够控制国内的经济活动并能凭借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运用自如的商业政策去改变其进口品的地理分布。七大强国事实上已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国内外的经济事务，但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是直接听命于中央 423 指示的，也许苏联是个例外。

大多数国家在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中的确是遵循国际上议定的法规的。根据金本位制的货币规则，不同国家的货币可以按固定比率进行交换，这就使得任何一国因其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并非同一而产生的许多支付差额可以进行多边结算。但由于黄金又是各中央银行信贷业务的基础，因而各个国家的经济又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世界范围的互相依赖好处极大，因

为它使每个国家能够通过贸易收到最适宜于该国的产品生产专业化和劳务专业化的好处。其不利之处是，世界任何部分一有相当大的干扰总要波及广大地区。只要这个制度还起作用，那末至少可以说，任何国家都难以奉行广泛的独立的强权政策。如果哪个国家同世界的其余部分步调不相一致，如果——例如鉴于世界需求下降——该国试图维持它自己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它的对外收支平衡就会受到有害的影响。除非它拥有大量国际黄金和外汇储备，否则就支持不住长期的贸易赤字，会被迫通过限制国内信贷、削减产量和失业来恢复其对外收支的平衡。除苏联外，一切国家的对外贸易都主要是由许许多多个体商人进行的，因而就整个国家而言，一切现行的交易（例如，商品、贸易、航运、保险服务、旅游交通、对外投资等的支付和收入）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更有可能的是，一些国家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则有盈余。然而，必要的国内调整过程通常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是由于有盈余的国家准备把资本借给有赤字的国家。因此，国际的借进借出正如货币的统一定值和一个所有国家都按同等条件进入的世界市场的存在一样，是多边体制顺利运转的重要条件。

导致 1931 年放弃金本位制的一场潜在危机萌发于二十年代的世界经济情势。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技术及经济的进步，世界工业之间的彼此关系出现了结构调整极为不当的情况。水力发电和石油的开发、印度和日本棉纺厂的扩大，以及许多非交战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工业保护在战后的继续存在，给较老的国家造成了它们不愿意正视的调整问题。加之，农业生产率大有提高，而在战争中扩大了农业的国家拒绝在战后降低产量，于是导致生产过剩。同样，由于二十年代工业产量增加，原料的出口也增加了相当多；但世界原料的生产增加得更快，以致 1929 年的“出口限额”只有 1914 年以前的百分之八十八。对生产初级产品的所有国家在价格方面的压力造成了它们对外结存的紧张局面。甚至某些较大的国家也在国际收支方面遇到了困难，它们因战争期间美国向它们提供了商品和劳务而欠了美国的债，情况同德国因为赔偿责任欠了协约国的债十分相似。但是，因为握有盈余的国家愿意借出资本而背着赤字苦苦挣扎的国家也愿意举债，调整的必要性被推迟了。

所有这些国际合作方面的潜在危险，还不及某些受国内经济活动的猛烈波动所造成的危险大，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巨大份额而且是很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这方面，七大强国，尤其是美国，正如同它们能够把世界推入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一样，也能够把世界拖入萧条。它们加在一起不仅在世界收入总额和工业总产量中拥有最大份额，而且还占有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世界商船队的约近三分之二和世界流动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七国中的三国——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是世界上放债的主要债权国。很清楚，这三国中的某一个国家的商业活动发生大规模的衰退，而在此之前或同时停止在国际上发放贷款，就不可避免地要波及世界的其余地方。

鉴于国际上借进借出对于多边体制顺利运转的重要性，有必要谈一谈债权国和债务国这两个集团组成情况的变化。1914 年时，强国中的主要债权国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其对外投资分别为：英国约达二百亿美元，法 425 国九十亿美元，德国六十二亿美元。美国和日本都从战前的纯债务国变成战后的债权国，德国则由于战败而变成债务国。日本在战后时期为保持其债权国地位和维持其黄金和外汇储备进行的斗争失败了。另一方面，被战争耗尽了

国外资产的联合王国和法国同美国一样，在二十年代做到了有形和无形出口超过进口而有盈余，并把这笔盈余增加到它们的国外投资上去。1923 年到 1929 年这一时期，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长期和短期净资本输出分别达到大约三十亿美元和五十亿美元，远远超过象法国、加拿大或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借出额。在债权国地位加强的同时，借款国家的负债额增加了。尤其是德国成了这个时期资本净输入最多的国家，约达四十二亿美元，其次是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日本。1928 年，美国的国外净投资总额约为八十五亿美元。英国的国外资产要高得多，可能接近于战前水平，而法国的国外资产据估计为战前数字的百分之六十。

战后时期美国取代德国而列入债权国集团，这一点并不重要。但既然国际体制的运转有赖于借出和借进的安排，那末极其重要的是，债权国不可突然不愿借出。确实，这种国际支付体制的破坏，主要不是由于“不健康的”举债，或赔款以及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安排，而是由于在这七国的每国内部起作用的、削弱了它们愿意出借程度的种种复杂原因。既然美国贷款对于支援世界的许多地方二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和扩张是一个那么强有力的手段，那末，美国国内的事态发展，就其对美国向外购买 426 和对外放债的影响而言，就对整个世界有重要意义了。

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大繁荣，其基础首先是国内热火朝天的投资活动。在考虑导致投资景气结束的因素时，从工厂、商业设备等最紧迫需要的足量供应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原因是同金融和财政原因密切联系的。1927 年便有发生一次真正衰退的迹象，但到了 1929 年，投资货物的总需求才开始呆滞。1929 年以前的五年中，新的投资总额规模如此巨大，以致进一步追加投资的预期收益——冷静地考虑一下——正在急剧下降。除非长期利率很低，经济繁荣就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继续下去。“事实上，除那些处于投机刺激影响下因而有过分利用的特别危险的个别方面外，利率已高到妨碍新投资的程度”。的确，尽管 1928 年再贴现率已经提高，并以出售政府证券来制止投机性股票价值上升，美国的投机性股票价值还是继续上升。但投资商并不泄气，因为从投机性证券销售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借款的费用。

然而，这种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股票市场繁荣具有抑制从美国输出资本的作用。美国的长期放款在 1928 年和 1929 年之间减少了一半，净资本输出比美国往来帐户上的盈余低许多。法国的短期资本出于不同的原因在这些年里也收回了，不过对于国际支付体制的有害影响是一样的。结果是，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发生困难，而当 1929 年 9 月美国投机性繁荣崩溃，以及当接踵而来的萧条中美国骤然完全停止放债时，困难就更大了。

证券交易崩溃的原因是复杂的。伦敦哈特里骗局的揭发导致从美国抽回基金。预见到会出现麻烦的大投机商开始将他们持有的证券变成现金。还有可能的是，利率的进一步提高使这种投机热情冷却下来。就金融政策 427 具有抑制这种热情的作用而论，它属于以杀死病人来治病一类的补救办法。在一般地谈到萧条的时候，R·G·霍特里教授写道：

即使 1929 年和 1930 年有非货币的原因在起作用，致使消费者的收入猛烈压缩和需求暴跌，情况仍然是，大的中央银行当时的行动所单独产生的也恰恰是那样的结果。中央银行作为货币的唯一来源必须对减少货币的流通负责。

在证券交换发生崩溃以前，实际投资活动便已经减少了，不仅在美国，

德国也是如此，德国自 1927 年以来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一直在下降。德国并非不同于英国，有一个短时期从原料和食物价格的灾难性下跌中获得对外帐目上的好处。德国对外结存的这种暂时增加在 1930 年由于抽回短期基金而告消失。甚至在联合王国，对外帐目上以前的盈余在 1931 年也第一次变成了亏空。一旦衰退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开始，收缩的过程便累进加剧了。这些国家进口需求的缩减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而，象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有其自身的巨大农业利益，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诱惑，要用提高关税来保护这些利益。1930 年美国由于把关税提高到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它当年的交易盈余同 1927 年或 1929 年一样高，没有被借出所抵销。因此，有赤字的国家——1931 年联合王国也成了其中之一——的流动国际资金便流进了法国，特别是流到美国去了，可是美国不把流入的黄金用于扩大信贷，却“封存”在诺克斯堡的保管库里。由于对外赤字，或象德国那样，由于抽回短期资本而造成的变换现金能力的丧失，必定引起国内紧缩通货，限制产量和失业的增加。

在一个生产能力闲置、失业严重而陷入萧条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排斥进口而鼓励出口。进口被认为是对国内就业的威胁，出口被认为是增加国内就业的手段，这不仅是因为从事纯出口品生产的工人人数增加，还因为实际需要生产出超货物的工人而创造出额外的就业。但如果其他国家不肯多买，则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促进出口。所能做的倒是通过关税、特许证、进口配额、货币贬值等来削减进口。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防御的武器；但就它们造成出超而论，这些措施又成了最好的进攻武器。因为有盈余的国家的萧条程度减轻了多少，有赤字的国家的萧条程度便增加多少。的确，在一个陷入萧条的世界里，出超意味着输出失业；那是一场以邻为壑的游戏，不妨公正地称之为经济侵略政策。正如科德尔·赫尔后来谈到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时说的：“我们的人民是大概不会忘记 1931 年关税率的颁布对加强各国间的经济战的贡献的。”

这场争取出超的疯狂斗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多边贸易的渠道缩小了。而当 1931 年联合王国为了制止变换现金能力的丧失而放弃金本位制并将它的货币贬值时，全世界各国采取单方面的金融和商业措施的倾向便占了压倒优势。国际贸易和货币规则的放弃，打开了个别国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可能减轻它们各自的萧条程度，但也可能有助于推动国家实行强权政治。当时克服萧条的挑战首先就是对把世界拖入萧条的这些强国的挑战。但是，它们甚至不去设法寻找采取联合行动的共同基础，这就让危机造成的畸形状态由每个国家孤立地采取经济恢复措施去矫正。经济民族主义便是对这种挑战的一个回答；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便崭露头角了。

强国的相对工业实力在大萧条过程中有什么变化呢？萧条对某些国家工业产量的影响要比对其他一些国家严重。事实上，萧条对苏联和日本的工业产量几乎毫无影响。在别的地方产量渐次缩小的时候，苏联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32 年的工业产量比 1928 年高出大约百分之八十五。日本开始时产量下跌的压力也迅被克服，它用于对华战争的原料需要促使其工业产量在 1932 年比 1928 年水平高出约百分之十四。其他五个强国的产量继续下降。英国减少了百分之十一，意大利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二，法国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德国和美国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三。

由于生产扩大和收缩的比率如此不同，所以七强的相对工业实力完全改变。在处于萧条最低点的 1932 年，各强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同 1928 年相比的情况如下：

1928 年和 1932 年的相对实力（世界产量 = 100）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意大利	日本	七国
1928 年工业产量	44.8	11.6	9.3	7.0	4.6	3.2	2.4	82.9
1932 年工业产量	35.1	8.9	11.3	7.0	12.4	3.4	3.7	81.8

萧条最惊人的后果是苏联的相对实力上升，以及在 430 较小程度上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相对地位的提高。美国虽然在经济力量方面仍占首位，然而相对地位已大为削弱。从前占第二位的德国则退居第四位。

但是，这种强国之间的相对实力的变化是伴随着萧条发生的，因此比较直接的后果是闲置生产能力和失业者人力的巨大而且是本可避免的浪费。据估计，在萧条时期原可以生产或提供而没有生产或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损失至少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交战国付出的代价一样高。在所有国家中，政治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都陷入极度的紧张状态。在德国，这些内部的痉挛导致一切反革命力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它们把可悲的事态，包括六百万人失业和中产阶级大部分阶层的破产，归因于软弱无能的政府，归因于赔款，归因为领土和生存空间的丧失；而它们提出的口号，即欲救危难于当前，对内对外都需要采取彻底解决办法，这一口号证明是有效的。1933 年 1 月胡根堡—希特勒联盟上台执政四个月内，德国出现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这首先意味着德国修正和约论者的要求从此以后将以钢铁般的决心贯彻下去。

但对于德国说来，实现这样的对外野心似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虽然它有着巨大的潜在实力，但事实上是软弱的。它的相对工业实力不仅比之苏联已严重削弱，而且比之法国和意大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也是几乎毫不间断地在恶化。法国和意大利加在一起 1913 年的产量约占德国产量的四分之三，在繁荣达到顶点时几乎同德国相等，而 1932 年年中超过德国约五分之一。此外，英国的工业产量在 1932 年超过了德国，而如 431 果把英帝国的各自治领和印度的工业产量都算进去的话，则单是英联邦的工业产量就比德国多一倍。把产量作了这样一些对比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德国在军事准备方面的实际力量了，但谨慎的观察家确信，至少在 1932 年以前，德国还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武装。

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即 1919—1932 年，丘吉尔写道），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至少到 1934 年，我们还可以不损失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

第四章 战争的经济准备

第一节 三十年代的生产率与制造业力量对比的变化

在从 1932 年开始的整个六年的过程中,德国成为欧洲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这是国社党人上台之后的直接结果,该党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决心是无止境的。国际上各种条件对他们有利,因为随着在萧条期间国际行为准则的彻底垮台,自己要生存下去就要求各国把自己的解决办法用到经济恢复问题上去。在德国和日本,恢复所呈现的特殊性质已为其他大国的政府所清楚地看到,但是它们过于埋首于各自的国内问题中,以致不愿意干预,或有效地阻止,这类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侵犯国际法和违反条约义务的事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并且由于国内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够跟上德国的军备支出。结果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大国关系的整个格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相对军事力量的巨大增长,主持其事的政治领导准备迟早要将这一力量用于战争。

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不是同义词,虽然后者是获致前者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经济力量反映在制造业产品的数量上,无论它是否充分利用了国家可用的资源,而 432 军事力量同消费货物与资本货物产量之间的分配具有更

表 制造业生产*

	苏联	日本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美国	法国	世界
(1) 1932 年=100								
1929	62	104	122	166	145	195	135	142
193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3	110	117	108	112	108	121	113	113
1934	130	134	122	145	109	131	105	126
1935	159	148	131	165	131	152	104	143
1936	206	156	144	180	136	184	110	165
1937	230	171	156	195	157	200	117	181
1938	258	179	143	211	158	153	108	169
(2) 1929 年=100								
192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2	162	96	82	60	69	51	74	71
1937	373	164	127	118	107	103	87	128
1938	417	171	117	127	108	79	80	119

密切得多的关系。关于 1938 年经济力量的状态,提出以下问题是适当的:各国和全世界从萧条中恢复得如何?这种复苏是否恢复了 1929 年大国的相对地位,还是使 1932 年的相对地位固定化了?

制造业产量从萧条水平恢复过来并未显示出一致性,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恢复的特点迥然不同。在恢复的时日和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悬殊,而且 1937 年艰难地达到萧条后新的生产高水平之后,由于美国十分严重的不景气和联合王国及法国产量的严重缩减,世界已陷入 1938 年新的衰退之中。1932 年和 1929 年以后上述生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力量异乎寻常地增进和法国力量的绝对损失。从二十年代 433 繁荣的顶点(1929 年)到三十年代繁荣的顶点(1937 年),苏联和日本的生产突飞猛

进，而在联合王国、德国和意大利，生产只有中等幅度的增长。至于美国的发展情况，当生产刚刚超过上一次繁荣水平时，1938年的暴跌就产生了经济虚弱的情况，只有持续整个三十年代的法国的虚弱情况才能与之相比。

从国际生产总的趋势的广阔背景来看，德国的成就毫不惊人。同1929年生产的繁荣水平相比，联合王国产量的增长在1937年就比德国更为明显，更不用说日本或苏联了；至于用生产的萧条水平相比，美国的恢复比率至少同德国的一样快。不过，赋予德国经济力量以巨大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它同法国相比的相对的增进。因为在德国扩大生产的时候，法国的生产实际上是滞留在略高于萧条时的水平；当德国在1938年保持扩大产量的高比率时，在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却发生了生产的绝对收缩。

上述生产发展与七个国家中每一国的就业水平和每人工时生产率密切相关。除了下文提到的几项保留外，后一概念粗略地衡量了每一国就业人口效率的提高情况。大致说来，1937年每人工时生产率与1929年相比，在意大利和德国约提高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在美国和联合王国提高百分之二十，在日本提高百分之二十一，在法国提高百分之三十三，而在苏联提高约百分之七十。同样，没有迹象表明德国的真正生产力或劳动效率要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看来情况恰巧相反，民主国家或共产主义苏联的劳动效率的增加要比纳粹政权统治下的434德国为高。

在许多影响效率的因素中，只需提到少许就够了。最重要的是现有工业能力的利用程度，就生产设备利用不足可能使生产活动集中于最有效的工厂而言，每人工时的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似乎高于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情况。据估计1935年工业能力利用率，法国为百分之六十，美国为百分之六十六，德国为百分之七十六，联合王国为百分之八十，意大利约为百分之八十，日本和苏联为百分之九十五至一百，除了生产能力的利用问题外，缩短工作时间可能增加了个人劳动强度因而增加了每人工时的产量。由于进行教育和技术培训而提高了劳动技术，同样可能提高每人工时的产量；由于通过净投资而增加工具和设备，或是由于只靠折旧费的积累转化来的投资而向工人提供较好的工具，每人工时的产量也会提高。至于上述各不相同的因素哪一种对提高生产率的影响有多大，那就很难确定。因此，在解释七国中每一国增长的意义和原因中，我们只能考虑最主要的因素。

苏联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这段时期内收获了积极投资的成果。人们指出，以工业部门雇用的工人人数进行比较，1928年以前苏联的失业状况高于七国中的任何其他一国。因为没有足够的工厂和设备，所以不能吸收失业工人。但是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的费用创立了工业生产能力，所以大约从1930年以来，阻碍产量增长的主要环节是缺乏适当的劳动力而不是缺乏生产能力。工业劳动力日益增加，其专门技术随教育的同时扩展而提高，而且正在最新式设备的工厂中被雇用，这个情况经济调查研究所（柏林）：《工业动员：统计调查》，汉堡，汉萨出版社，1936年版，第76页。就是俄国劳动生产率巨大增长的原因。俄国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增长成为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来源。因为1937-1935年整个工业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是由新建或由彻底改建的工厂所生产，或许可以假定，劳动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建立在更多更好的工具和设备的净投资的基础之上的。日本也是直到1935年由于工厂的最后的扩大和现代化才造成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在那一年之后，新的投资没有跟上农村剩余人口继续进入工业的步伐，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充分利用现

有的工厂生产能力。由于工厂连续满负荷运转，机器难于保养，同时，又因为遇到了供应合适的劳动力的困难（必须略微增加劳动时间），1935年以后每人工时生产率开始下降。尽管如此，日本生产率的提高就象苏联一样，是1929年到1937年生产大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两国已在竭尽其可用的生产资源这一点，就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它们已获得的经济力量不可能有巨大增长。

法国和美国每人工时的高生产率，则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情况造成的，其意义也与日本和苏联的迥然不同。法国人口增长停滞，生产能力利用率低，这就使增加现有工厂的刺激因素限于狭小的范围。在没有新的投资436的情况下，劳动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耗尽工业劳动力得来的。1937年工业部门雇用的人力比1929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二十年代来到法国的许多移民在三十年代返回自己的出生国，而许多法国人又离开城市到乡村去，所以留在工业部门的很可能是技术较好和效率较高的工人。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其他因素包括整顿某些工厂，生产集中于最有效的工厂。尽管每一正常工作周减少百国际联盟：《1937—1938年统计年鉴》，第61页。分之十六的工时很可能加强每人的劳动强度，但是这种以减少工时来提高生产率的有利影响似乎被相对于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而言的就业脱节所抵消。法国每人工时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依然是潜在的，这个意思是说它不反映为总产量的增长，而是被并入法国就业工人闲暇时间的增加之中了。按照总产量来看，法国在三十年代从来没有接近过它在1929年实现的经济力量。因而不象日本和苏联，它拥有本应能够使它在短期内相当大地增加产量的潜力。

美国每人工时生产率增加百分之二不是由于对每一就业工人提供更多资本，因为直到1937年为止的八年中，对商业性工厂和设备的净投资只增加了大约十亿美元，而截至1929年为止的八年中却增加了二百五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偿还和折旧基金的再投资，三十年代工业生产能力的质量构成有了很大的提高。用上述手段在美国的大型工厂中引进了传送带，最重要的是安装了高效的原动机，如用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都是这一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正如一位对美国情况有识见的观察家所指出的，“[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437素，无疑是由于增加使用机械能……机器的改善和使用它们的技术的提高。”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仍然是潜在的；它没有反映在更高的总产量上，而完全转化为劳动“人时”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结果在三十年代位于繁荣顶峰的美国象法国一样，拥有更多的生产储备，既有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又有未充分雇用的人力，这都比二十年代繁荣顶峰时要多。

联合王国生产率的高度增长，主要是由于工厂的内部调整和净投资的增加。到1937年，就业水平已经超过了1929年；但是劳动时间既没有象日本那样增加，也没有象法国、美国和苏联那样减少，所以生产率的提高完全反映在总产量的大量增加上面。

在所有的大国中，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率的提高最少。两国的就业状况超过了二十年代的巅峰，结果是，合适的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原料供应的不足都使劳动效率受到不利影响。意大利从1935年起劳动效率开始下降，但是由于减少劳动时间（这很明显地增加了意大利工人的个人劳动强度）使它未曾下降到1929年的水准以下。不过，用这种办法扩大就业的结果是，由于更充分地利用工厂而发生专门设备短缺，从而加剧了现有技术工人和材料的匱

乏。另一方面，德国的劳动时间仍没有改变，而新的投资直接受到控制。确实——而这是解释纳粹德国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的一点——直到 1937 年年初，对工厂和设备的总投资还不足以维持工业生产能力，所以 1929 年以后每人工时生产率的较小提高，主要靠折旧费的再投资。虽然 1937—1939 年的三年中工业净投资达二十二亿马克，但是这不足以使 1929—1936 年的八年间工业投资减少达二十六亿马克的情况得到弥补，而后来的投资肯定不能立刻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新投资的迟误就意味着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超过了通常的工作水平。“过去的机器通常只工作一个或两个班次，而《德国统计年鉴，1941/1942 年》，第 610—612 页。德国的资料，经科林·克拉克作过调整，表明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状况，1928 年下半年为百分之七十七，1929 年为百分之七十五，1937 年 11 月为百分之八十五（《经济进展的条件》，第 65 页）。现在 [1938 年] 却常常实行三班作业；如果停顿的话，也只是短暂的间歇，用作现场维修和必要的零配件保养。”

不论有些统计数据多么可疑，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的主要结论还是有效，即使后来试图作了还要精确些的统计。大体说来，与 1929 年相比较，三十年代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英国略有增加，而在日本和苏联大有增长。在其余四个国家中则没有增加。在就业状况即将达到生产潜力的限度，即现有生产能力所限定的程度之时，每人工时生产率的提高在那些工厂和设备净投资相当多的国家（苏联和日本），要比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更为明显。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加上每人工时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苏联、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 1929 年到 1937 年间制造业产量的提高。在上述四国中，为生产能力所制约的“潜在”经济力量，多多少少地得到“实现”。这就同法国和美国的情况形成尖锐对比，这两国生产率的提高完全表现在两国人民闲暇时间的增加，而在 1937 年两国的“潜在”力量同“实现”的力量之间还存在差距，由于产量重新收缩，这一差距在 1938 年又进一步扩大了。

上述生产的不同发展完全改变了大国制造业力量对比的模式。1937—1938 年与 1929 年相比，或与萧条的 1932 年相比，各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份额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如表 IV 所示。

表 相对的制造业力量
(世界产量=100)

年份	美国	苏联	德国	联合王国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七国共计
1929	43.3	5.0	11.1	9.4	6.6	2.5	3.3	81.2
1932	31.8	11.5	10.6	10.9	6.9	3.5	3.1	78.3
1937	35.1	14.1	11.4	9.4	4.5	3.5	2.7	80.7
1938	28.7	17.6	13.2	9.2	4.5	3.8	2.9	79.9

德国的相对实力从 1932 年以来已有巨大增长，由于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帝国又进一步得到增强，所以在 1938 年大德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它的生产超过法国和联合王国生产总和。这两个国家在二十年代后期所共同享有的对德国的力量优势已经失去了。

更富有意义的是苏联在大萧条时期在大国制造业中的级别跃进到第二位，因为它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一旦取得这样的地位，它就不可能回复

到萧条以前的状况了。虽然它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1937年）只生产了美国产量的五分之二，却超过了德国产量的四分之一。有许多具体迹象可以证明它的伟大的成就。例如在1937年，苏联制造的汽车同德国相等，棉纱是德国的两倍，皮鞋和卷烟也是两倍，而拖拉机六倍于德国。或许在它的进展中最令人惊讶的特点是，就已查明者而言，是每一个就业的俄国工人生产率相当于，甚至高于一个英国工人或德国工人的生产率。

440 但是德国人和任何别人都没有过分担心俄国的力量。他们同意斯大林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俄国人自己对自身的力量不抱幻想）。这个看法是：一个国家的工业的经济力量表现形式，不是不顾及人口多少的一般工业产量，而是工业产量同每一人口的消费量直接关联。

关于总人口中每人生产的制造单位，苏联远远落后于更为成熟的工业国家。

按人口平均每人制造品的比较产量

	美国	联合王国	德国	法国	苏联	意大利	日本
1937年	286	198	165	108	83	63	48
1938年	219	194	180	108	104	67	52

上述比率说明，对于苏联、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来说，将省下来的工业资源用于建立军事力量，要比美国、联合王国和德国困难得多。确实，因为在1938年，仅次于美国的大德国实际生产的制成品按人口平均计算要比联合王国及其四个自治领的总和还要多，或是比联合王国与法国的总和还要多，它有资格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工业国，是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国家。

第二节 重工业和战争潜力

在评估战争潜力的时候，将制造业产出分为资本货物和消费品，要比只看产量更能说明问题。因为生产工业、农业、贸易和运输设备的资本货物工业，只要稍加调整，便可照样顺利地生产军事装备和车辆。因此，每一个强国经济中的资本货物部门的规模便反映出该国的战争潜力，这比制造业总产量所反映的准确。因此，恰当的做法是首先调查一下相当发达的资本货物部门赖以生存的 441 条件和基础是什么，其次，该部门在每一个国家里以及同全世界总产出相比而言究竟有多大。

在自发的工业化条件下，如同较老的工业国成长的特点那样，资本货物工业是在消费品工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建立的。在消费品工业对机器的需求足够大的时候，生产机器才有利可图。但这不是唯一的发展模式。例如在国家指导下经过审慎计划进行工业化的条件下，就象苏联在三十年代独具一格的情况，资本货物工业的发展先于而不是后于消费品工业的发展。

形成相当发达的资本货物部门的核心，是钢和生铁工业，这两者又主要依靠煤和铁矿石。生铁工业多半设在煤和铁矿石最便于调集的地点，或是靠近煤田，或是靠近铁矿，或是在这两种原料中心中间的水路和铁路交通线上。一般他说，有效需求的结合——不论是自发的还是国家指导的，以及可以得到的煤和矿石资源的结合是世界铁工业集中的原因：（1）以煤为基础：鲁尔、比利时南部盆地、英格兰中部、顿涅茨和库兹涅茨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西部（匹茨堡周围地区）；（2）以铁矿石为基础：法国洛林、亚拉巴马（伯明翰周围地区）以及俄国的克里沃罗格和乌拉尔地区；（3）以煤和铁矿石中心之间的水路和铁路为基础：莱茵兰、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芝加哥周围地区），在俄国的亚速海上（靠近马里奥波尔）以及横滨-东京、八幡和神户-大阪地区。

美国和苏联是面积广袤的大陆国家，煤铁矿藏丰富。德国和联合王国也恰好拥有巨大的煤矿储量，而法国则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因此，生铁工业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上述五国都已具备。但是即使在既极缺煤又极缺铁矿石的意大利和在有一些煤但几乎没有铁矿石（在获得满洲以前）的日本，生铁生产也在小规模地进行。

虽然德国和英国的生铁工业依靠进口矿石，法国的生铁工业依靠进口煤，德国和英国的矿石需要却不是从法国那里得到满足的。在三十年代后期，德国一半以上的铁矿石是从瑞典进口的，从法国和卢森堡进口的不到三分之一；英国进口的铁矿石几近一半是来自西班牙，还有从斯堪的那维亚和北非的进口各占五分之一。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德国从法国进口的矿石主要运往萨尔地区的铁厂，该地区于 1935 年重新并入帝国，而瑞典矿石供应鲁尔、莱茵和西里西亚地区的铁厂，从军事观点来看，有一点很重要，即德国在鲁尔的巨大铁工业对法国矿石的依赖程度要低于法国工业对鲁尔煤和焦炭的依赖程度。

钢生产的地理位置大体上取决于生铁工业的位置，除非钢厂是以熔炼废金属为主。这种例外对日本和意大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国的钢产大部分基于利用进口的废金属。虽然德国（英国也是如此，但法国不是）炼钢的标准原料成分是百分之六十五的生铁和百分之三十五的废金属，废金属对选择炼钢厂的地理位置的吸引力不大；首先，因为生铁仍然是钢生产的决定因素；

其次，因为废金属在德国钢生产中心自然增多；第三，因为废金属进口的范围，一般来自美国、比利时和荷兰，经过江河和运河到达德国生铁中心。由于水路运输的费用比铁路便宜，进口废金属不会明显影响钢厂的位置，钢厂大都设在距离生铁中心最近的地方。

鉴于这些包括煤、铁矿石、生铁和钢的重工业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中对于基础牢固的资本货物部门来说所具的重要性，所以所有强国除美国和法国外都在三十年代提高了它们在世界重工业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这一点便意义深长了（见下页表V）。

显然，正是苏联表现出在重工业原材料的生产方面增长最为显著。二十年代末期，它在重工业原材料生产国中名列第四或第五位，而在三十年代已在铁矿开采方 443 面占第二位，在生铁和粗钢生产方面占第三位。在它的重

表 V：重工业原材料方面的相对实力

	煤		铁矿石		生铁		粗钢		
	1929	1938	1929	1938	1929	1938	1929	1937	1938
	(百分比分布)								
苏联	2.8	9.3	4.5	18.5	4.4	17.7	4.1	13.1	16.5
大德国	13.4	15.5	3.0	6.0	16.0	22.6	15.4	14.9	20.7
意大利	0.0	0.1	0.4	0.7	0.7	1.0	1.8	1.5	2.1
大日本	2.6	4.2	0.3	1.4	1.4	4.3	1.9	4.4	6.0
英国	19.8	19.1	4.5	5.0	7.8	8.3	8.3	10.0	9.8
法国	4.1	3.9	20.6	14.2	10.5	7.4	8.0	5.8	5.6
美国	41.6	29.6	42.4	20.0	43.7	23.7	47.0	38.0	26.4
七国 共计	84.3	81.7	75.7	65.8	84.5	85.0	86.5	87.7	87.1

注：1938年，以及1929年和1937年，大德国包括萨尔、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大日本包括满洲。

工业巨大增长的同时，它的生产中心向东移了。显然是军事上的考虑起了几分作用，才有意鼓励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建立生产中心。这两个地区在1938年占俄国钢产量的近三分之一，而传统的乌克兰生产中心约占一半。钢产量增长极快，速度仅次于苏联的是大日本，这多半是由于开发了满洲。

大德国在1938年的钢产量为二千二百万吨，超过了英法两国钢产量总和的四分之一；而以钢的实际产出计算，虽然不是以其生产能力计算，大德国已接近于美国的产出。德国按人口平均产量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德国钢的实力还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钢产出上升时出444口却下降，所以可供国内之用的钢由1929年的一千零二十万吨引人注目地增加到1938年的一千八百八十万吨。因此，在纳粹统治下国内用钢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其次，德国象苏联一样，目的在于将它的工业在地理上进行重新布局。它计划疏散位于帝国西部和东部边境的鲁尔和西里西亚的两个重工业中心，而在德国中部的汉诺威—不伦瑞克地区以低品位矿石资源为基础建立战略上更为安全的中心：1937年在该地区建设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的工程开工了。预期“新的高炉生产的生铁将占到目前产量的33%或未来产量的25%由于德国的铁工业作了这一地理上的重新布局，重大的军事—政治需要便会得到满足了”。

因此苏联和德国重工业有计划的重新布局反映了这两国重视资本货物工业原料基地的安全。但是七国中每一国工业结构中资本货物部门究竟有多大？一切证据都使人想到德国的最大。将金属物资、光学、工程、造船、车辆和化学工业部列为资本货物工业，加上部分重工业（即生铁和粗钢），1937年整个制造业产量中资本货物部分所占份额，大体上是德国百分之五十一，美国百分之四十八，联合王国百分之四十四，日本百分之四十，苏联百分之三十九，法国和意大利各为百分之三十七。

德国以其制造业结构中最大的资本货物部门占显著领先地位，这说明在三十年代末期，它已比其他强国更多地使自己的工业经济适合最大限度的战争潜力。因为正是这些工业的产品最容易转变成武器。不过，用这个比较作基础，美国并不落后于德国多少。而且，考虑到美国利用生产能力还没有达到德国利用的程度，它的制造业产量三倍于德国，美国军事潜力的绝对和相对优势都毋庸置疑。但是以美国和联合王国为一方，以苏联和德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对于德国的地位 445 赋予特殊意义。从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末期，在美国和联合王国累积制成品的流量中资本货物所占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而苏联和德国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苏联的军事潜力在 1928 年构成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到 1937 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九，而德国在同期却从百分之四十一左右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一。正是象在 1928 年德国经济那样完全成熟的状况下，这一向资本货物转移的做法明显反映了国家社会党政策对德国工业的冲击。

通常资本货物，尤其是机械产品的流量的大部分，是用来更换工厂和设备，或是扩大生产能力的；这不仅对于有军事潜力工业是如此，而且对于消费品工业亦然。因此，象苏联这样正在工业化的国家里，需要增加资本货物的流量以便创造更大的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的扩大又是增加资本货物流量的必要前提。纳粹德国的情况则十分不同。那里，业已大大增加的资本货物流量不是用来建立和扩大现有的生产能力，而更确切的说——其中之一——是用于积聚军备。这一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德国领导人所希望发动的那种战争的性质，这可以大体阐明如下。

资本货物流量增加了六十亿马克，从 1928 年的一百一十七亿马克增加到 1937 年的一百七十六亿马克。同期德国工业投资总额只增加二亿马克达到 1937 年的二十八亿马克。由于资本货物工业的投资总额增加五亿马克达到二十二亿马克，足见军事潜力工业生产能力的微小发展，也主要靠撤掉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大约为三亿马克）的资助。用德国工业重新武装的最高负责人托马斯将军的话来说：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直到 1937 年还几乎没有从创造军备“能力”意义上讲的“深度军备”，而毋宁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在立即可用的已造好的武器上面，也就是“广度军备”。

不过，德国认识到：武器的流量，尤其是武器的最终使用，也许会由于国内缺少铁矿石、石油、橡胶和有色金属而受到阻碍。这个认识导致某种“深度重新武装”。这最早在 1936 年德国的四年计划中提出，1937 年积极推行；那一年就加速研制使用轻金属及其合金来取代铜及其合金，研制煤的氢化以取代矿物油，研制丁钠橡胶的合成生产以取代橡胶。军事潜力工业的投资总额由 1937 年的二十二亿马克逐步上升到 1938 年的二十九亿马克和 1939 年的三十六亿马克，表明开始脱离德国重新武装运动集中于军备本身而不是军备的生产能力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 1937 年德国的军事潜力同其他大国的军事潜力相比，情况如何呢？在大国之间资本货物生产分布中，它的相对实力又是如何？在世界资本货物产量中七国的共同份额约百分之九十点五，而每一国的相对份额如下：

相对军事潜力（百分比分布）

	美国	德国	苏联	联合王国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七国合计
1937 年	41.7	14.4	14.0	10.2	4.2	3.5	2.5	90.5

在 1937 年德国的产量不仅与法国和英国的总和相等，而且超过了苏联的产量。确实，在 1938 年当上述两个西欧国家的总产量略有下降的时候，大德国对它们的优势又进一步扩大了，而按照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产量来衡量，它在军事潜力方面居于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仅次于美国。

第三节 机床，重新武装的关键

现有的军事潜力已经转变和能够转变为武器的程度，取决于当时弹药和枪炮工厂的规模，甚至更多地取决于汽车、缝纫机和拖拉机制造厂等得以改装成生产坦克和军用载重汽车的速度。改装速度取决于资本货物部门本身的平衡程度；也就是取决于精密仪器和机床工业的规模。确实，后者是一切工业生产结构的关键，因为它保证了加工器械的制造，加工器械又制造出设备，而有了设备才能使工厂生产机械、装备，等等。

447 因为机床在任何国家的工业体系中都占有战略地资本货物在各国制造业生产总额中所占份额在这里被用之于 1937 年的制造业相对产量（见上文，第 439 页，表 IV），而七大强国的总额假定等于 1937 年世界资本货物生产的百分之九十点五。位，对一切强国来说，易于获得加工器械的供应或者拥有机床工业都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对机械产品的需求改变了——比如说，从一种类型的汽车改变为另一种类型，从汽车引擎改为飞机引擎，从拖拉机改变为坦克——机械工厂能够满足改变要求的速度取决于它们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同样地，由于立即的或强迫性工业化，或是由于在和平时期的生产之外加上了重新武装，对机械产品的要求增加了，那么满足这一要求的快慢又主要取决于加工器械的供应。各强国充分认识到车床、钻床、磨床、刨床、铣床、镗床和其它金属切削机械不仅对工业化而且对重新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这反映在三十年代各强国几乎都竭力增加本国机床工业的生产能力上。

从传统上说，世界最大的生产国是美国和德国。它们进口加工器械的需求是微不足道的，而上述两国即占世界加工器械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仅次于它们的三个主要出口国是联合王国、法国和瑞士；但是它们的进口需求与德国或美国相比则是相当大的。1938 年与 1928 年相比，上述五国作为世界机床供应国的相对地位变化极少；但是世界机床“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以适应俄国和日本的工业化，日本的战争需求，和德国的，随后是法国和英国的重整军备。

建立机床工业（如日本与苏联）或是扩大已有的机床工业（如德国与联合王国）所带来的困难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机械部门对于熟练技术工人的需要是如此之高。但尽管由于缺乏技术构成了发展加工器械生产能力的主要障碍，然而正是加工器械供应的不足制约了工业化的速度，制约了工业为军备目的的再转变。拥有加工器械工业的另一固有的困难是，在正常时期它对商业盛 448 衰的周期性的波动极为敏感。它是机械部门最捉弄人和最倒霉的分支之一；美国人称之为“宴会或灾荒”工业，因为对加工器械的需求取决于对资本货物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商业盛衰的周期性中其波动要比对消费品的需求更为剧烈。但是三十年代不是正常时期，对商业周期的考虑可以被那些早已从事对它们经济生活的计划工作的国家和那些意识到军事方面的需求的国家置于不顾。在大萧条时期，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加工器械生产严重下降。如果不是苏联大量购买机床，产量下降的幅度本来可能更大。结果，与其他一切经济指数的发展相反，德国和联合王国的加工器械出口指数在萧条期间实际上是增加了。只是由于这些重要供应，尤其是德国的供应的援助，作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象征的“从上面的革命”才得以切实进行。但是，在得到最先进的机械设备供应以后，俄国人不失时机地分析了西

方技术创造的奇迹，并为他们自己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加速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得不进口的机器、加工器械等项产品”，并将机床工业的地位提高到“可能获得最大的发展，以便满足国民经济对机床的需求，并使苏联在这个领域里获得技术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俄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目标是减少加工器械的进口，1933年以后这一目标即已达到，另一目标是在1937年生产四万台金属切削机床。不过，尽管成就巨大，俄国总的生产仍旧远449远落在德国的后面，德国在1938年生产了约十八万台加工器械。

与苏联机床生产能力的增长相匹敌的是日本类似的增长。到1932年为止，日本大部分的需求靠从美国和德国进口。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加工器械工业的雇工人数估计由1929年的七千五百人增加到1938年的约三万人。1938年机床产值约四百七十万英镑，而1935年联合王国的产值为八百二十万英镑——不过这仅是二万一千人的劳动力生产的。由于加工器械生产能力的扩大，日本生产与加工器械需求的比率也随之增大，但是不象苏联的情况，日本的加工器械进口额继续上升。这一点就意味着基于工业化和战争需要的需求速率，比国内加工器械生产增加的速率更高。

在1938年的前十年期间，机床生产能力不仅在苏联和日本得到了扩大，而且在德国和英国那些更加成熟的工业国也得到了扩大。从1928年到1936年，德国的总产值翻了一番；在联合王国，已制成的加工器械出售值在1935年至少比以前的任何一年要高百分之三十；上述两国的机床生产能力在1935—1936年以后都有相当45大的扩大。这种扩大主要由于缺乏技术工人而受到限制。但是，虽然德国的加工器械生产能力提高，产量增加一倍多，而它的加工器械出口额从1932年到1939年却大约与1929年相同，它的加工器械生产的巨大增长完全被德国自身的机械工业所吸收了。这种在帝国内“可供使用的加工器械”数量增加，就象钢产量增加一样，促进了迅速重新武装，而这在德国当时正在进行，而且这样做也提高了它把资本货物工业的大部份和迅速实现战争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如果一旦有此需要的话。

同德国形成强烈对比的另一个加工器械净出口大国，即美国，供应世界的加工器械数量越来越多，至少部分原因是国内市场不能吸收现有产量。美国加工器械生产工业的雇工人数和总产值在1937年和1929年差不多。如果加上机床附件，总产量的增加至多约百分之十。但是美国的出口额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确实，它在1939年的加工器械出口额几乎比1929年高二倍，这就意味着在加工器械的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美国正在装备联合王国和法国的机械工业（两国占美国出口额的一半以451上），以及日本工业，而不是装备它自己的。

机床工业在联合王国工业结构中所占的地位不如在德国和美国的那么重要；英国加工器械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也不如英国其他机械产品。因此在1935—1936年，以雇工人数和产量而言，英国加工器械工业的规模只有德国的四分之一，而在总的经济活动迅速增进时，英国某些特殊机械部门感到严重缺乏加工器械。英国许多加工器械工厂甚至不能在一年之内交货；作为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于1936年5月向下院作第一次工作报告时承认，他着急的是，计量工业和加工器械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方能着手大量生产武器弹药。与此同时，英国机床的出口量下降而进口量增加得相当多。确实，英国于1938年仅从德国进口的加工器械就比前几年从所有国外供应者那里进口的还要多。联合王国的机械类贸易就象日本

和苏联一样，在所有比较先进类型机床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德国和美国，正如英国贸易统计资料所清楚地表明的，进口加工器械的平均值每吨要高于出口的加工器械平均值。德国加工器械工业对英国的总的异常优势，可以从一件事上概括出来，1938年以前十年的每一年，德国出口的机床数量就超过了英国加工器械的产量。

此外，德国在1938—1939年不仅生产了比联合王国多一倍以上的类似机床，而且在它经济部门中还拥有一百三十万加工器械的库存，这个数目至少是英国工业可用库存的两倍。美国经济部门的加工器械库存量略低于德国的库存量，而苏联只有德国库存的三分之一。但是德国除了加工器械库存和现行生产的数量优势以外，还拥有最大份额的多用途机床，因而德国在重新武装的势头中改装和平时期的工业方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装备都要好，由于缺乏加工器械而形成生产上的障碍的可能性较少。

第四节 为军事目的所作努力的比较

到 1932 年为止，德国的重整军备一直受到充分的遏制；但是到 1938 年它已拥有一支庞大而装备精良的军队，它在第一线的飞机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这一成就是将那些自二十年代末期以来其生产能力没有很大变化的工厂的资本货物流动量加以扩大的报偿。这也意味着国家社会党人正在获得大萧条以前在德国开展的工业现代化和合理化运动的好处。因此基本的军备潜力早在 1929 年即已存在。那个时候未能生产大量武器：首先是因为条约义务限制生产某些类别的武器；其次，在魏玛政权下，连续几届德国政府都真诚地相信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现存的冲突；第三，因为赔偿的“沉重负担”阻止了任何以重整军备形态给人民加上额外负担的漫不经心的企图。对于这种企图，德国有些政党倒总是乐于支持的。

在国社党人上台的时候，上述限制性的三条都消失了。他们立即开始了冲突的准备，包括武器、建立兵工厂、要塞、兵营、士兵津贴和口粮等在内的军事支出由 1932 年的七万二千万马克提高到 1933 年的十九亿马克和 1934 年的三十亿马克。1934 年的数额几乎相等于 1929 年军费和赔偿费的总和。但是 1929 年的这项支出相当于德国国民生产或收入净额的百分之三点五，而 1934 年则相当于大约百分之五。相比之下，法国于 1934 年用于军费上的款项约占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之四，而英国在那一年不到百分之三。

德国的军费支出继续猛增；同意大利和日本一样，从 1934 年到 1935 年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苏联以外的其他强国，在加紧军事方面的努力上步伐缓慢。日本在中国的屡次成功，德国和日本退出国联，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德军于 1936 年 3 月占领莱茵兰以及后来该地区的重新军事化，日本于 1937 年军费支出的巨大增长，甚至 1937 年 11 月关于远东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的解散——所有这些都未曾使英国和法国受到剧烈的震惊，从而迫使它们把军费支出增加到德国从 1935 年到 1936 年，又从 1936 年到 1937 年所达到的水平。只是 1938 年 3 月奥地利被兼并和 1938 年 9 月苏台德区投降德国，才使英法两国的军费支出在 1937 年到 1938 年增加的比率高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美国制造业的产量和军事 454 潜力三倍于德国，却在整个三十年代对这种不均衡的军备竞赛置身事外。确实，美国的孤立主义，无论在精神上和事实上，使德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可以实际上排除美国参与欧洲大陆上任何一场冲突的可能性。

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粗略地了解军费支出的进程，上述累积支出只是不完全地关涉到对真正战备的估计。因为没有关于马奇诺和齐格飞防线、机场、轰炸机和战斗机、军服、口粮、军饷等在累积支出中所占比率的具体情报，对一个国家同另一国家真正军事实力加以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上述障碍之外，同样困难的是得出用一种货币在每一具体的支出项目中反映不同货币的真正购买力的兑换比率。正是出于这一理由，下列的表 VI 中关于 1938 年军事支出总额以及 1933 年到 1938 年的军事支出总额都已换算成英镑，该表仅能大致地、试验性地回答这个问题：“哪一个强国在 1938 年军备竞赛的数量

表 军费支出*

(按市场价格计算)

年份	日本	意大利	德国	苏联	英国	法国	美国
1. (以本国货币百万为单位)							
	日元	里拉	马克	卢布	英镑	法郎	美元
1933	873	4,824	1,900	1,547	108	12,324	792
1934	942	5,590	2,800	5,000	114	11,200	708
1935	2,206	12,624	6,200	8,200	137	13,000	933
1936	1,078	16,357	10,000	14,816	186	15,000	1,119
1937	3,972	13,270	14,600	17,500	262	19,000	1,079
1938	6,097	15,030	16,000	23,100	391	29,000	1,130
1933—1938	15,200	67,700	51,600	70,200	1,200	100,000	5,761
2. (购买力以百万英镑为单位)+							
	(1)	(2)	(3)	(4)	(5)	(6)	(7)
1938	508	167	1,170	924	391	207	231
1933—1938	1,266	930	3,540	2,808	1,200	1,088	1,175

注释：*关于德国的数据，见附录；关于其他国家的数据，见国际联盟：有关批发价发的《军备军鉴》，还有的资料摘自附录“军用开支”项目。优势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人们将会看到，德国在1939年以前六年的军事支出几乎高达英国军事支出的3倍。1937年，英国内阁“不得不训令陆海军大臣将意大利与德国和日本一起列入可能是侵略国的名单上，并相应地制订防御准备的计划”，这时联合王国的实际准备情况就显得更不充分了。因为就军事准备的数量而言，这三个准备侵略的国家即使对英法两国加在一起所占的优势也约为二与一之比。这一差距大于两个强国集团在制造业产量或军事潜力方面的实力差距。除了德国以外，最大规模的武装是在苏联进行着。由于苏联必须建立军火和武器工厂，而在更为成熟的工业国家主要只需要改换一下装备就行了，所以似乎很可能德国的有效军事力量远远超过苏联的有效军事力量三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只是就累积军事支出进行比较而得出来的。

但是上述七国中每一国的军备努力究竟有多大？各国国内的总的可用的经济资源在1938年为了防御或侵略调动到何种程度？明显的是，军事目的支出必须作为全部现有的物资和服务的支出的一部分表示出来。“国民生产净值”的概念表示一年内制造业和建筑业生产的物资总量，和运输、行政管理等提供的服务总量，这总是假定在上述物资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国内资本储存，如工厂和设备仍原封未动。就一个国家内可动用的物资和劳务比一年内本国生产的要多而言，在国民生产净值方面就必须加上进口多于出口那一部分（即撤回国外投资或国外贷款）以及耗尽国内资本（即取消国内投资），以便得出国内可动用产品净值。此外，为了便于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也必须考虑到可动用净产品的估价。由于在有些国家价值是按物资和劳务的市场价格计算，也456由于这类市场价格过高估价了一个国家的真正可动用产品净值——尤其是象苏联，间接税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进行国际间比较的时候有必要排除一切间接税，按生产要素费用来估价可动用产品净值，间接税只是提高了产品的价格，实际上的价值没有提高。

下列表 VII 是打算仔细地对比一下 1938 年可动用产品净值的构成。因为这一年同 1937 年相比较，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制造业产量已经下降，显然短期的潜在储备要大于另外四个充分就业的国家的储备，另一点明显的是，仅仅重新利用未被利用或闲置的资源，它们的产品净值就能大量增长。要记住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为一方，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另一方，在人力和工业生产能力可利用的储备方面的显著差别，这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 1938 年七国中每一国实际可动用的产品净值的构成：

表 1938 年按生产要素费用计算可动用产品净值的结构

支出项目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苏联	英国	法国	美国
1. 以本国货币 10 亿为单位							
1. 军事目的	5.8	14.5	14.0	20.0	0.380	28.0	1.03
2. 政府机构的物资和劳务	1.1	16.1	15.0	31.0	0.328	27.0	8.67
3. 投资 (1) 政府			38.0	0.312	16.2	1.72	
净额 (2) 私人	1.7	1.7	1.0		0.176	2.8	-1.36
4. 个人消费	14.1	55.1	8.0	127.0	3.725	282.0	55.03
可动用产品净值	22.8	87.4	110.0	216.0	4.741	356.0	65.09
2. 支出占可动用产品净值的百分比							
1. 军事目的	25.4	16.6	12.7	9.3	7.9	7.9	1.5
2. 政府机构的物资和劳务	4.8	18.4	13.7	14.6	7.0	7.6	13.3
3. 投资 (1) 政府				17.1	2.8	4.6	2.7
净额 (2) 私人	7.9	2.0	0.9		3.7	0.7	-2.1
4. 个人消费	61.9	63.0	72.7	59.0	78.6	79.2	84.6
可动用产品净值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VII2 清楚地表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记录在案的军事支出占可动用产品净值中最大的比例。因而，它们在 1938 年的经济状况比起其他四个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与侵略联系在一起。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努力的领先地位是无可争议的。由于它正在进行同中国的战争，它在 1938 年已为此动用了全部资源的四分之一。不过，那时世关于计算的详细情况，见下文原著第 493 页附录 III。界的注意力从远东转移到欧洲，那里的进展速度完全由 457 德国决定。它同意大利一样，用于军事的资源占可动用资源的六分之一。

至少从形式上看，苏联用于军事的支出不超过它可动用资源的十一分之一。但是，那六个国家投资花费用于建设兵工厂和要塞就作为军事开支，却不能断定苏联是否也这样做。鉴于苏联用于投资的支出水平高得反常，至少有一种可能性是，其中有些是潜在的军事支出。例如，建设中的拖拉机制造厂可能设计为稍作调整便可生产坦克的工厂。

不过，苏联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相同之处是，在可动用的产品净值中公民个人消费所占份额要比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同类份额低得多。这种消费的低水平与军事支出和投资支出的高水平是完全一致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政府机构收购的物资和劳务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都高，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最初在美国也是如此。不过在美国这反映了为克服 1938 年的不景气所作的努力，而在德国则主要反映了以政府基金来维持和供应庞大政党和半军事组织所付出的代价。确实，德国用在这一项目上的高份额暴露出它的特有的军事努力还没有达到最适合的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当局在 1938

年仍旧对实际资源提出过高的要求，因而不能达到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军事成就。

此外，在苏联集体主义社会里公共支出之所以高，简单的原因是大量劳务是由国家直接提供给公民消费者的。德国部分地也是如此，有些公民能够从国家发起的“欢乐产生力量”组织直接受益。可以假定，上述国家提供的对公民消费的补充，将能大量地提高苏联的和稍微提高德国的那种极其低下的消费水平；但是看来不太可能的是，这两个国家会提高到稍稍接近西方三个民主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普遍水平。

德国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将它可动用的资源投入加强战备工作要比民主国家多，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怀疑。不过，说由于德国在 1938 年的军事努力巨大，留给消费用的资源就小，这是一回事；说在一个时期内不断增加军事方面的努力，只有通过逐渐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才 458 能实现，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仔细的调查表明，虽然军事支出占可动用产品净值由 1929 年的不到百分之二上升到 1938 年的百分之十六以上，但是在此期间德国的累积实际消费略有增加，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消费水平在 1938 年只是略低于 1929 年。实际投资净额也没有改变。因此，德国军事力量有了巨大增长的同时，政府当局收购物资和劳务也同样增长，这不是公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的结果；相反，这是德国从 1929 年到 1938 年实际国民生产或实际国民收入净值增长了约百分之二十的结果。德国实际国民生产的增长，同它制造业产量的增长是十分一致的（参阅第 432 页表），首先是它执行各项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保证在三十年代后期达到和保持充分利用它的各项资源。

第五节 经济和商业政策

（一）国内地位

很明显，经济实力同军事实力之间有些联系。从 1929 年以来产量一直上升的，并在 1938 年还保持着高水平产量的四个国家，也就是把它们可利用资源中几乎是最大部分用于战争或备战的国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并由于大萧条的缘故，这四个国家都采取极权主义的政府形式，它们一直能使它们的经济稳定程度保持比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要高，这一点已经变得可痛地明显起来。确实，萧条以后法国从来没有、美国只有一次达到过两国在 1929 年曾经达到过的生产水平和繁荣程度，而两国象联合王国一样，1938 年又一次陷入新的衰退之中。

如果经济成绩是实力的检验，那末怎样才能解释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民主国家的明显虚弱呢？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意味着把一个政党的意志和目标强加于整个社会。不论鼓舞着苏联共产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们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的信仰的优点如何，上述集团决不会容忍对它们政权的目标的公开反对。这种不容忍，这种镇压或者迫害违反执政党的各种意见，正是“民主制度确立于世以便防止的罪恶”。

因此，极权主义政府比之民主政府所享有的巨大好处就在于，它们能够把国家政策的明确目标强加给本国人民，而民主政府在拟订这类目标的时候，不得不经常考虑到反对党的意见。极权主义政府能够把现有的机构和社会力量与实现它们的既定计划这唯一的目的联在一起，而在它们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它们又有权力施行极权主义的纪律。民主政府却要先得得到同意才能依靠纪律执行其政策。虽然得到这样的同意是可能的，但却是从无保证的。

然而，极权主义强国所共同具有的许多政治特点，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它们在其他领域中广泛的差别。一方面是苏联，另一方面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很深的鸿沟。苏联在连续几个阶段中，废除了土地和一切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从而取消了人类社会中的主要的不平等的形式之一。而在其它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的确，这一不平等在日本要比美国或者联合王国更甚。此外，虽然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家受到控制，却仍然行使在他们的企业中的管理权。在这方面，与俄国标记的极权集体主义相比，极权资本主义同民主资本主义有多得多的共同之处。这意味着，不是它们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相似，而是它们政府能够行使的政治权力相似，才造成极权主义国家工业较大的稳定。

460 但是在三十年代，所有这些大国的经济和商业政策与它们相对的实力地位或者相对的虚弱地位有什么关系呢？

苏联的情况十分独特。政府服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承担苏联经济命运的全部责任。政府把原来的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作为主要目标，通过各种机构，逐个工业部门地安排生产计划，按照可利用的资源情况事先决定用于消费和用于建立它的工业设备的数量。计划一旦决定，一切手段都用来保证计划的执行。如同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

固然，它们（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对谁也没有约束力，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指导全国经济的。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管理部门必须

执行，这种计划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进程。你看这里是含有原则性的差别的。

这样一种计划经济能够消除剧烈的起伏不定，而迄今为止，这在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即使在苏联，有些因素也难以预见到（例如，气候、收获、人的愚蠢），因而必然会使考虑得最周到的计划也出现脱节现象。的确，苏联计划工作人员——计划应当生产的品种及其规模——在判断中的任何错误，都可能造成福利方面的损失；这样的损失比之私人企业中进行反复试验的代价要大得多。实际上，在计划工业化过程中究竟犯下了什么代价高昂的错误，将永无人知。不过无法说明，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为什么却出于缺乏有效需引自贝科夫：《苏联经济制度的发展》，第424页。求而存在不景气和失业现象。

国外需求的起伏也不能大幅度地影响苏联的内部稳定，因为在1937年出口货物还不到国民生产净值的百分之一。在执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制造业生产增加了两倍以上（见上文，原著第432页表），直到1931年止，这一增长伴随着进口物品的显著增长。其后，由于在这个大陆规模的国家可找到的多种潜在资源的情况有了进展，进口货品下降了。苏联政府积极奉行代替进口品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这表现在从1929年到1937年之间461种进口货物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七，还表现在苏联自称是解决制造合成橡胶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第一个国家。这一十分显著的朝向自给自足趋势，部分地是为政治权力和战略的考虑所激励的（因为决不能让俄国公众忘记他们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这一趋势意味着靠出口来支付进口的迫切需要已经结束。而且由于苏联政府完全垄断了对外贸易，苏联的商业政策（通过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进出口特许制度）保证国内生产计划不会遭受外部影响的危害。

通过定价，生产计划便转化为财政计划。国营贸易公司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与国营工厂或托拉斯签订交货合同，商品的价格不由工厂而由计划当局决定。由于计划价格的确定是根据包括工资在内的估算的生产成本，金融当局必须把资助生产计划所需的全部贷款交付托拉斯支配。因此，上述贷款安排原则上完全依生产计划而定，而国家银行不可能通过它们的信贷政策造成实际需求、产量或就业方面的变化。

苏联财政或预算政策的职能是当心财务交易不致打乱经济计划。为了获得对巨大投资和工业化计划提供资金的手段，苏联当局几乎完全依靠单一的间接税，即营业税。这种税是这样设计的，它要在对消费品的需求（决定于工资收入）同消费品的供应（由生产计划安排）之间建立平衡。商品出售的零售价格超过出厂价格的部分就是这部分计划当局决定加速工业化的程度（即决定投资率的增加幅度），也就是财政政策必须照办的程度和营业税必须增加的程度。

明显的是，工业化速度本身最初必须以俄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推行了强迫的集体化；农业总产量下降了，牲畜被屠宰了，当然这些462种产品没有进入城镇市场。在这减少了的农产品总量中，还必须增加出口量，以支付更多的进口的设备和机床以及补偿在世界其他国家处于大萧条时期对苏贸易的不利条件造成的损失。但是同时，当国内现有的可作消费用的农产品下降时，工业劳动力成倍增加后可供花费的收入却随之增加。在此严重的“商品荒”情况下，价格提高了，基本商品大部分实行配

给，只有一小部分容许在合法的黑市上自行定价。官方的配给优待产业工人，虽然到黑市上去补充他的配给品的诱惑经常刺激他们去挣得货币收入，但是昂贵几情的价格却剥夺了这个货币工资级差的普遍意义。这一级差本来是用来奖赏熟练工人，并导致流动性的。无疑地，这一情况以及在分配紧缺商品中有意区别对待，包含着可能导致一切有效规划垮台的危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供应状况得到改善，在 1935 年高价和配给可以取消了，人的痛苦至少能不更甚，于是上述对于计划工作的明显的危险减小了。根据说明计划完成的数字来判断，不能说不同经济部门的成就是不相关连的或混乱的。

在这个集体主义社会里，发展经济的决策牢因地集中在政府手中。这个社会要把经济计划、金融管理、财政和商业政策都密切协调起来。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保持经济稳定和获得国民生产的巨大增长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工业成长已经达到先进阶段的个人主义的国家中，要维持一个高水平或上升水平的生产就困难得多。由一个当局拟订一项总计划，然后把它强加于所有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容许的。准备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都取决于按当时市场价格对各种商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与苏联有计划地分配资源形成对照，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依靠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来确定把资源投向需求最大的那些部门。

但是为什么自 1932 年以来，有效需求的恢复在法国 463 完全没有，在美国很不完全，而为什么在英国不能维持下去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作出对三个国家都有效的简单答复。它们所需要的是四大作用集团之一（或是四者的总和）增加支出，这四个团体是：消费者、商人、政府或外国人。普通的民众，尤其是失业者想要多买一些，但是他们连买基本必需品的钱都拿不出来。没有资产可以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抵押，人口中的这个大多数增加其有效需求的可能就被排除了。虽然国外需求对刺激生产极有帮助，但是这种需求在三十年代受到直接管制和货币限制的阻碍。结果，需求、就业和生产的增加都仰赖政府和商人开支的增加。

只要公共开支（即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开支）是靠税收提供资金，只要一——税率结构没有任何显著变化——预算平衡的，政府就既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总的需求量。它们只能通过造成预算上的赤字来增加需求量，其途径是减少税收或是增加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但是赤字支出（以借款来提供资金）由于多种原因，却受到商人的反对。1931 年在联合王国，这一社会成份导致了工党政府的倒台，因为当时关于国家支出的美伊委员会报告说，预算表明下一个财政年度里赤字达一亿二千万英镑。要求预算平衡同样是法国勃鲁姆政府最终受到挫败的诱因。而要向由罗斯福新政造成的相当数量的“联邦”赤字提供资金，肯定地使美国企业界与政府之间早就存在的敌对情绪更为加剧。企业界巨头认为，把最广泛意义上的国民账目的平衡作为目标，不是政府的职能；而如果以“健全的财政”为名义，政府根据这种理论行事，并把它自己限于平衡预算账目，那么，能够增加有效需求的唯一渠道就是私人企业。

在作出是否增加支出的决定，以便扩大生产和就业，464 企业界巨头的动机——虽然并不是全部的动机——是获取利润。对取得利润的前景又受到下列事物的影响：成本变化、技术发明、税收结构的多样性等等，而最重要

的是银行业系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最终发生影响的是半自主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在所有成熟的经济中，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的供应。只要公众宁愿把货币存在手头而不愿把它（按一定利率）存放出去，中央银行就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的办法来降大不列颠：《国家支出委员会：1931年7月的报告》，敕令第3920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1年版）。低利率。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公众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中央银行也能通过货币供应中的变换来满足他们，从而把利率维持在所期望的水平。银行活动首先影响短期利率，但是，中央银行通过对短期利率施加影响，可以间接影响长期利率。它们还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开市场活动”来直接影响后者，也就是通过买卖公债和长期债券。如果中央银行买进债券，它们就抬高了债券的价格，从而降低了长期利率。长期利率愈低，企业家们投资赢利机会的幅度也愈大。因此，如果有效需求又恢复到仅靠私人企业的投资政策（如同有的国家由于政治原因而禁止政府造成预算赤字就会有这种情况），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创造适当的投资条件中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

在生产能力闲置和工人失业的情况下，平衡的预算、低利率、原料普遍实行国际价格（原料的国际价格低于制造品价格）等，都是易于恢复企业家们对于在联合王国投资获利的信心的主要因素。当1931年工党分裂时，新的联合政府提高税额，降低救济金，通过把巨额国债转换为低利息而大量节约，并从1932年增加进口货物的关税中获得较高的税收。通过上述各种手段，直到1936年为止，国民账目逐年都充分实现平衡，只有1931年例外。

新政府已经许愿要“挽救英镑”之后在上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放弃了金本位制。通过这一行动，它切断了英国同世界价格水准的联系——这种割断联系是必要的，如果英国要制止通货紧缩和失业增长的话。此外，英镑贬值是计划用来刺激出口的，只要竞争对手如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继续实行金本位制，而英国的主要供应者和顾客，也就是大英帝国和有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样地贬值并把它们的货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比率。在这一方面，英国的幸运是十分独特的。她继续获得廉价的食物和原料，而又比她的竞争对手占有出口方面的优势。金银两项姑且不算，英国国际收支收入项目下的差额在1933年和1934年达到平衡，而在1935年出现顺差。

货币贬值的另一结果是利率的放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的市场活动而增进整个银行系统的现金基础。但是，尽管利率较低，三十年代“工业贷款”从来没有达到二十年代的数量。结果是各银行拥有更多的现金而又不能找到“贷款”的顾客，于是它们就去购买证券和债券，从而帮助企业周转灵活，并使它们不必仰赖银行而能有钱扩大企业。

这些金融、财政和商业措施在雇主中产生了乐观情绪。不过，仅靠这种乐观情绪本身难以促进恢复。在整个465二十年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所有大国之中只有英国仍然没有生气。它一直苦于没有投资；它的工业也没有经历过象德国或者美国那样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此外，还积压下来大量未满足的住房需求。因此，在一定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的有利条件下，投资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一上来，出口额的增长大于工业生产的增长。货币贬值和关税刺激了在受保护的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里的投资（见上文，第443页表v），在这

个部门投资所表现的形式是节省劳动力的设施；它也有助于提高每人工时的生产率。此外，贸易条件转为对英国十分有利后，它在整个三十年代继续为全国提供了廉价食品与原料。这些基本原材料的价格继续保持低水准，部分原因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保护措施。由于生活费用下降的程度超过固定收入减少的程度或职工工资比率减少的程度，便出现了住房和对其他耐用消费品（例如汽车）新的需求。因此，在国内的恢复进行顺利的时候，英国却丧失了 466 出口优势，原因是金本位集团国家的货币随后贬值，特别是国外加强对进口品数量上的限制。

同制成品产量的增长（见上文，原著第 432 页表 III）相一致，英国的进口货物也大量增加，1937 年比 1929 年大约高百分之四。另一方面，出口货物却继续保持低百分之二十的水平。金银在外，对外收益帐差额显示赤字由 1936 年的二千万英镑增加到 1938 年的六千六百万英镑。上述对外赤字通过兑换率的波动也许能得到改正，但是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当时要这样做会有明显的不利。通过汇兑平衡基金的建立，对外赤字，特别是短期的资本活动，对兑换率的影响是被阻了。但是这种外汇管制与极权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是有根本区别的。既然不准国外的逆差制止国内的恢复，英国就出售国外资产来弥补小额的，但是持续不断的赤字。

显然，在三十年代，有若干有利条件联在一起来复苏英国的活动。政府为复苏准备了条件，但是它没有通过任何赤字支出来开始。一旦有效需求增长，就会变成累积的，在 1937 年年中就业和生产都高于 1929 年。若干因素促成了 1937 年长期利率的提高，这种提高是紧接着政府 2 月份的宣告而来的。这份宣告说它们要在五年期间花费十五亿英镑用于重新武装，这笔金额中的九亿要通过贷款获得。其余的将来自对公司利润增长的特别税。利率的提高和预期的利润税都对私人投资起到了反作用。总需求和就业都下降了，而这一下降并未因 1937 年和 1938 年预算赤字的剧增而受到多大遏制。因此，在联合王国，复苏（显著，虽然仅仅是短期的）是由企业家们造成的。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他们铺平道路，恢复他们的信心，等待他们作出反应。467 在美国，国内的恢复略差一些，尽管它与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大国不同，从 1932 年到 1937 年制造品的产量翻了一番（见上文，原著第 432 页表 111）。但它的情况是大萧条更为严重。国民收入从 1929 年到 1932 年，英国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五，而美国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在随后的复苏中，制造品产量和实际国民收入仅恢复到萧条以前的水平；而这就意味着从 1929 年到 1938 年期间，美国经济是停滞的。不过，适当地考虑到不同的经济部门的经历迥然不同，这一概括不说明什么问题。这里只能着重强调几个具有十分显著意义的特点。

在罗斯福的新政派上台的时候，金融当局，也就是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降低了利率，而且力图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扩大美国的信贷基础。但是这些打算因黄金的流失而完全被抵销了。由于英国汇兑平衡基金一直在吸收黄金，以便有意降低英镑集团货币的价值，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担心的，于是禁止美国黄金出口，并于 1933 年将美元贬值。黄金禁令使国内的信贷活动有力地开展起来，1934 年的出口货物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但是，除了国外需求出现了短时间的恢复以外，美国的廉价货币本身没有自动地产生有效的国内的需求。考虑到二十年代美国的投资热的气氛，那

里的萧条未必能够轻易摆脱，这种萧条主要地反映了对工厂、设备和住房的要求达到饱和状态。确实，新政派认为阻碍复苏的是（1）私人投资机会暂时减少，（2）经济权力极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所集中注意的，不论正确与否，正是在后一方面。

不过，经济权力的集中起初没有受到实施当时的反 468 托拉斯法的直接攻击，而是受到旨在对劳工和农民给予保护和增强实力等项措施的间接攻击。政府通过维持提价的方法来帮助农民，政府也支持组织工会，承认劳资谈判，改革职业介绍所制度等。大企业对各项革新措施不满。如果职业介绍所能够拒不让工人调往正在进行罢工的工厂或是拒不同意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是他们能拒不向申请人按照低于标准的条件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工厂纪律’怎么样维持？‘老板’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就会被削弱，如果他不能解雇一个讨厌的工会会员，或是“捆行李”即失业的威胁不再能用来厉行纪律的话。美国新劳工法的政治及社会含义，远不是恢复了雇主们对企业赢利的信心，而毋宁说是动摇了这种信心。

由于国内私人投资总额 1925 年到 1929 年平均每年为一百四十亿美元，1929 年为一百六十亿美元，到 1932 年却下降为十亿美元，所以新政派不愿仰仗企业家们的有效需求的恢复来把经济活动恢复到萧条以前的水平。因为统一的联邦、各州和地方的预算从 1925 年到 1929 年拥有小额结余，新政派想要通过扩大在 1930 年亦已出现的预算赤字的办法来增加有效总需求。

从 1931 年到 1938 年的八年期间，每年平均预算赤字为十七亿美元，1936 年达到最高数二十九亿美元。同一期间，‘国内私人总投资额平均每年为五十三亿美元，1937 年达到新的高水平为一百一十四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私人投资加上政府赤字仅相当于二十年代后期私人投资额的一半。如果没有别的解释，仅此一事就足以说明美国的停滞。但是为什么私人投资恢复得如此之慢呢？

无疑，突出特点是，由于二十年代的大量投资，三十年代初期需要异乎寻常的刺激来促进私人投资。当时缺乏这种刺激。已经受到劳工法震动的企业家们的信心 469 绝没有因为官方的赤字支出而加强。由于上述赤字是靠借贷获得资助的，短期或长期利率都未提高，人们本来预料企业家们会欢迎赤字支出。因为赤字支出几乎全都是救济性支出，既不向企业家的地位提出挑战，也不使政府卷入任何一种“企业”。不过，由于救济可能动摇工作的意愿，也可能侵害雇主向工人开价的力量，它遭到企业家的敌视，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新政的劳工和社会法所引起的后果。

最后，大企业对于政府直接干预就业问题（即通过公共工程的开支来干预）的反对是十分坦率的。因为一旦政府懂得了如何影响就业，企业领导人就担心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力会受到威胁，担心扩大公共事业部门就意味着私人企业的结束。事实上，用于公共工程的政府支出总额（联邦、州、地方）从 1931 年到 1938 年期间每年平均约比 1930 年少五亿美元，所以与救济支出相比，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对恢复所作的净贡献等于零。但是，1930 年在所有的公共工程建设中，联邦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仅占百分之十，而 1931 年到 1938 年它每年约占百分之五十八。正是由联邦专款资助的联邦支出戏剧性地增加，引起了注意。确实，“某些类似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关的单项工程，规模如此巨大，种类如此异乎寻常，以至于造成普遍的夸大的看法：认为正在实施的整个公共工程计划是野心勃勃的”。联邦用于公共工程的支

出，由于同私人企业竞争以及削弱企业家的信心而受到严峻的批评。人们认为，在美国类型的个人主义社会里，只有政府留在幕后，导向积极投资、雇工人和经济繁荣的企业家们的信任状态才能出现。

新政派的种种措施继续使赤字维持下去。这些措施忽视了下列理论，即依靠私人投资解决就业是“健全财政”和预算平衡的社会职能。然而，根据二十年代支出的 470 惯例来判断，所需要的预算赤字至少要三倍于当时实际的赤字——在没有大规模的私人投资的情况下——才能把经济活动恢复到繁荣的水平。不论美国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在若干年内是否抵制了大量的，尽管是不足的，赤字开支的影响，就象有些评论家所暗示的那样，显而易见的是，政府扮演了新的角色，政府同大企业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又因政府提出劳工、成本和价格法律更为剧烈，而这种敌对情绪反过来破坏了私人投资所依赖的信心本身。从 1937 年 8 月起，在六个月内，美国已跌入一场萧条时期，其严重程度如同 1929 年 9 月开始的那次一样，虽则持续时间不是那么长。

新的衰退有许多原因。在 1937 年上半年计时工资提高了并稳定在比 1929 年高百分之二十的水平上。成本的这一提高并没有从较高的价格中得到补偿，因此利润幅度受到压缩。同时，雇主们又面临社会保险法规定的新税则。此外，1937 年 3 月和 5 月，联邦储备委员会要求所属各银行冻结黄金进口和增加储备金，这两项措施导致长期利率可观的提高。上述各因素和扬言要实施的反托拉斯法一起，相当大地减少了私人投资进一步恢复的一切希望。但是，实际衰退的最重要原因是 1936 年 6 月及其后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后者打击了私人消费和投资，而前者减少了总需求净额，把它减少到以前由预算赤字所产生的那个限度。

进口数量 1937 年比 1929 年高百分之二（出口数量则低百分之二十一），在新的衰退时期则灾难性地下降了。进口的下跌造成对外收支的巨大余额，从而清除了前三年往来账户上的对外赤字而有余。总的说来，美国在三十年代仍然拥有一笔小的外贸顺差，而由于 1934 年的约翰逊法，美国资本借贷实质上被禁止，世界上其他国家必须以黄金支付欠款。但是流入美国的黄金十倍于它的对外顺差，反映了（1）偿还美国在国外的贷款（2）由于政治动荡和战争的阴影，资本从欧洲外逃。到 1938 年底，美国“纯”持有的外国资产加上黄金几乎达到一百八十亿美元，对比之下，联合王国“总”持有的国际储备为二百亿美元。美国在国际储备方面的实力地位仍是不次于任何国家的，但是美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仍象罗斯福就职时一样处于严重的萧条状态。

在整个三十年代，法国经济虚弱的突出特点是对外逆差、长期利率高、工资率不变三者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到 1936 年为止物价却一直在下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没有赢利的希望，因而人们不能期待通过私人投资增加有效需求。但是另一个可能摆脱萧条的方法，即通过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方法，在法国同样也是不现实的——只要利率居高不下和外贸没有恢复平衡的诸。因此，打开法国通向复苏道路的关隘的钥匙首先是掌握在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手中，他们控制着利率，也能够通过他们对货币的黄金值采取的态度来影响外汇结算的平衡。

法国陷入萧条的时期，正是它财政上处于强有力地位的时候。它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但是，由于国际上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也由于其他国家货币贬值，法郎变成估值过高，此时，外汇账目的平衡就恶

化了，黄金外流。法兰西银行，最终是法国政府面临着两种政策之间的抉择。他们可以迫使国内价格下降来证明目前的汇率是合适的（即通过紧缩通货）或是变更货币汇率（即通过贬值）这样两种方法来恢复外贸收支的平衡。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决定不贬值的方法而采用迫使国内通货紧缩的方法；他们使整个社会结构在释放出来的痛苦的阶级斗争震动下瓦解了。

472 对于法国这次极为悲惨的社会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根源，任何简单的分析都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不过，社会力量的联合看来是如下的情况，一直到 1936 年在勃鲁姆主持下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上台之前，法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是农场主、企业家、金融家，即人口中代表着大多数所谓“靠投资生活者”的那些阶层。降低价格的政策直同时实行不完善的进口许可证和限额制度〔国际联盟经济、财政和运输部：《贸易数量管制》（日内瓦，国际联盟，在美国普林斯顿印刷，1943 年），第 11 页〕。接有利于靠投资生活者，但不利于个别企业主，特别是如果事实证明不那么容易降低工资的话。但是，虽然作为企业主，他们可能希望改变紧缩通货的政策，然而作为靠投资生活者，他们又不愿如此，他们在靠投资生活者的许多集团中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想要防止一个左翼政府上台执政的话，上述集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要反抗这些集团吗？

由于另外一些理由，答案也是否定的。法国工人正在争取承认集体劳资谈判的原则和增加工资。法国雇主对于不准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规定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意图表示不满。他们和工人们都各执己见，工人们以罢工来反对削减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增加了；而雇主们无疑地希望贫困和匮乏会给工人们一个教训，使得他们比较听话一些。当劳资之间的剧烈斗争在工厂中进行时，法国政府受到直接的压力，叫他们不要实施那些违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利益的政策（例如，提出种种公共工程计划从而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在法国，对于正式选出的政府所施加的或许是最大的压力来自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他们鼓动靠投资生活者抗拒每一个贬值的建议，从而迫使政府继续退居幕后，纵然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全国的社会安宁已经岌岌可危。

这场斗争一直斗到最后。金融家们希望他们会有更持久的力量，但是，随着斗争的加剧，国内的信心动摇了，以致投机商们将黄金携往国外。上述投机性黄金外流，473 比之逆差造成的外流更甚，极大地破坏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们能够施加影响的基础。在 1936 年最初几个月，左翼势力积聚力量，投机性黄金外流由于预料会引起贬值而日益增加，法国此时的对外财政地位危若累卵，经济萧条也达于极点。

在希特勒进军莱茵兰两个月以后，勃鲁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开始执政。勃鲁姆象罗斯福一样，推行旨在把复苏措施同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的长远政策。法兰西银行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但是同时工资率提高了，并开始实行带薪休假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由于对外收支的继续恶化，银行要求中止出售黄金。这时，勃鲁姆将法郎贬值百分之二十五，并与联合王国和美国缔结三国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在未经相互磋商（并非相互同意）之前，禁止继续贬值。1937 年，就业略有增加，但是工时总数下降了。进口额低于 1929 年百分之二十，出口额低于同一年百分之三十以上。工资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完全被物价的成比例的增加所抵消，从而引起对外收支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如果不是由于政府在公共工程和重整军备方面实行赤字支出，就会使国内就业水平受到的影响达到悲惨的程度。

勃鲁姆短命的联合政府使得阶级冲突严重化了，完全扼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只要对外收支继续 474 不受控制——而这件事转过来又是信贷相对紧迫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通过赤字支出来实现经济恢复在法国也只能永远是当时情况下的偶然性产物了。在那里通行的成本和价格条件下，复苏的真正基础，即外汇管制，却是没有的。一直到 1938 年年底，成本和价格的上涨才被制止，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才被宣布废除，货币才稳定在把所有估值过高的偏差都纠正过来的水平上，以及暂时地把有些外流的法国资本实际上收了回来。

这样，法国连一点真正经济恢复的火花都没有迸发出来，它在整个三十年代仍然是虚弱的，而在此时期，德国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却正在增添力量。毫无疑问，在这十年中，经济力量在欧洲领导权的生死攸关的重新定向中，以及在全世界势力均衡的转移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在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和维持经济实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象民主国家一样，主要依靠对外贸易。但是，它们的政府确保把因外汇收支波动而引起的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日本象联合王国和（为了不同的理由）美国一样，业已选择贬值作为改善对外收支的手段。但是，它在萧条期间也对资本移动实行外汇管制，并在第二次对中国的征战开始的时候把此项管制保留和扩大到商品支付上。德国和（初始的）意大利，象法国一样，拒绝了货币统一贬值。意大利于 1934 年代之以外汇管制，而德国在希特勒上台的两年内把 1931 年以来管理资本移动的外汇管制扩大到一切现行的交易。德国政府用这个方法确实能够防止外贸总支出超过总收入。

不过，这种对外贸易手法能给扩大的经济带来什么宽慰呢？如果世界需求恢复缓慢，外汇管制保证德国会得到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物吗？当然不是。如果出口收入不扩大，进口就必须加以限制，而这一点反过来就会对任何国内复苏计划设置障碍。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德国人又向前进了两步：（1）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还实行进口许可证和限额制度，这使得他们对必不可少的和非必不可少的进口货物加以区别；（2）如他们所做到的，德国政府掌握了德国对外贸易状况和结构的全部情报，鼓励发展本国资源和代用品来取代原有的进口货物。这 4 样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如果不准许国外影响来危害国内的恢复，那么复兴就只是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来刺激国内需求的问题了。

在所有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金融当局都同本国政府合作。这三国的长期利率都维持在远远低于萧条以前的水平上。虽然在德国，其稳定在百分之四点五至百分之五的利率仅仅在 1935 年才开始，但在 1933 年就已采取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短期利率，恢复企业、银行和整个经济的周转。一是制止通货紧缩，一是发行免税证和特别的可以再贴现的职业证券使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原来紧张的财政处境放松下来，正是这两项强有力地促使企业界的成员恢复了乐观。

对于恢复企业界人士信任感来说，较之有利的币制或许更有意义的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既然强有力的财界和工业界巨头在帮助纳粹登台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希特勒就履行对他们的诺言。德国就象意大利一样，上述问题是用政治力量解决的。所有自由工会完全遭到禁止，还有集中营的威胁，是保证“工厂纪律”的比较有力和比较直接的武器；相形之下，民主国

家的雇主必要时执行纪律所能使用的解雇和失业两项武器就间接得多。鲁尔的钢铁大王克虏伯提到，“通过合法手续任命雇主为职工的领导人，对于雇主来说，是赋予他比以往更加开阔、更加愉快、更有希望的活动领域”，有如他另一次把“我们企业中的劳工平静”说成是新政权伟大成绩中的一 476 项那样。在这方面（一如其他许多方面），日本的情况同极权类型就不同。在日本工会组织还存在，甚至直到 1937 年还有罢工发生。不过，这些工会要比较为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的弱小些。日本那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的雇主能从剩余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吸收工人，而从农村吸收到工业中的工人，其收入要比从事农业所得为高，这种工人刚刚开始有政治觉悟，他还没有严重危及“社会政治安定”。

除了“企业中劳工平静”得到了保证之外，大企业的巨头们对新政权的信任其次还因为它的立法而加强了。1931 年在日本，1932 年在意大利，1933 年在德国，为许多工业制订了“强制卡特化”的法律。显然，强制卡特化的措施为企业提供了免受“毁灭性”竞争的保护，而这种竞争在萧条时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这一法令成为企业家恢复投资积极性的重要条件。

上述金融和组织措施，加上旨在鼓励私人投资的财政政策，在德国的雇主中造成彻底的心理变化。但是，有效需求的增加主要不是由企业家那里开始的。因为政府决定货币不再贬值，于是必须防止由于进口超过出口而造成对外收支的紧张状态。固然，外汇管制使当局能形式上保持对外收支的平衡，但是德国的物价高于外国的物价。如要降低物价，就会消灭萌芽状态的复苏信心，在这些情况下，保持当时的出口水平的先决条件就是德国的物价不能再涨。规定工资和物价的终点，就德国的行动而言，将使德国的出口额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上。不过，出口额的水平也限制了进口的规模。必须谨慎小心的是，公私投资要集中在国内能解决原料需求的工业部门，而不能依赖于外来供应。很明显，对建筑业和某些重工业可以给予最大限度地发展。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必须进行选择。分配原料的有关当局间接行使的选择权，又为在资本市场上对私人投资的严格管制以致几乎近于禁止的做法所加强。在上述情况下，通过对建筑业和类似 477 工业的信贷投资造成的需求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官方当局而不是依靠企业家的行动。

纳粹政权一开始，中央、州、地方当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从 1932 年的一百四十亿马克增加到 1938 年的约四百亿马克，1938 年几乎高达 1929 年的两倍。公共支出的赤字从 1933 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 1935 年的约百分之二十二，以后两年有所下降，在 1938 年超过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贷资助的限度内，有效需求继续增长。由于这笔支出而刺激起来的经济复苏，以投资景气的形式出现，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截至 1938 年底的六年间，累计公私投资总额（折算成货币相当于七百三十二亿马克）超过截至 1929 年底的详见下文，第 504 页附录 IV，A。六年间（折算成货币为六百七十七亿马克）近六十亿：但是，考虑到价格变化，实际增长约为百分之二十九。此外，虽然政府投资（此项投资决定复苏的速度）1938 年与 1929 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资也达到了 1928 年的水平，超过 1929 年百分之十。更有启发性的是，投资景气首先是和建设及建筑业的巨大扩展有关的。公共建设（即建筑党部大楼、体育场、道路、运河、机场和要塞），从 1929 年到 1938 年实际上几乎增加了三倍，而私人建设，住宅和工业建筑都计入，1938 年达到了同 1929 年一样的高度。

极权国家的试验真正令人震惊的特点在于企业能够对政府的巨大支出加以配合。极权国家是怎样搞掉健全财政这个神话呢？这个神话是在民主国家里企业主用来阻止政府，使它不能用公共支出来抵销信任危机的。因为在美国，从 1933 年到 1938 年的政府支出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德国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上述六年间在美国百为之十一的支出是靠赤字资助，在德国约为百分之十九。如果说美国和法国的政府开支动摇了企业家的信任，为什么极权国家政府的赤字开支没有在国内企业界引起同样的敌视态度呢？这有许多原因。

首先，企业界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都被压倒了，因为政府机器，包括各“自治集团”（农业、工业、劳工和文化的），是在工业巨头和极权政党的头子们的伙伴关系的直 478 详见下文第 506 页附录 IV, B. 接控制下的。这些头头之间是存在着摩擦和猜忌的，但是任何一方如果不与另一方勾结，都不能行动起来。工商界团体及其地区和职能性组织得到有意识的发展，以便在工业领域中能够保证政治优于经济，保证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过事实上，由拥有最高产量或销售量的公司所领导的各卡特尔，比工商界团体及其附属各组织要重要得多，尽管在公众的眼里并非如此。确实，就象德国报界消息最灵通的机构在过去所经常抱怨的，“实际上，各个集团和卡特尔人员的公开身份导致了使用工商界团体的影响和权力（这不应该控制市场），有便于加强各卡特尔的私下的权力”。因而极权组织的机构模式恰巧是这样安排的，它使得大企业在国内起到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有助于减少企业界对政府开支的反对。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个政府拥有工业界的支持而执政，企业家仍然保持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下届政府会怎么样。而在极权主义下，不会有什么下届政府。

此外，在政府支出的目的不损害私营经济部门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家就不反对政府支出。诸如道路、党部大楼、体育场等规模宏伟、崭新的投资项目，都是从一开始就由政府支出，完全是私营企业“通常”投资计划的范围之外的。因此德国的工业家为自身利益欢迎上述公共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又衍生出对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好处。日本工业家对公用事业的发展感到高兴，这是成功地促进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意大利的工业家也欢迎政府当局执行的土地开垦方案。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他们都赞成军费开支。民主国家也是一样，企业家对上述非竞争性的政府投资不可能持反对态度。479 尽管如此，在美国，他们反对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他们所不信任的罗斯福政府可能用这种手段更有效地强制执行反托拉斯法。此外，民主国家中的企业家还担心，政府对公共工程计划开支的范围狭窄，而导致左翼政府实行工业国有化以便创造政府投资范围的诱惑力却是巨大的。他们从法国和联合王国工人运动的党纲上发现他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要是象德国和意大利那样没有自由的工运，企业家就有理由相信私营经济会受到尊重。

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企业家就不反对日益增加的政府开支。既然政府开支不象美国那样主要用于救济，而是用于公共工程和军备，减少失业的效果立竿见影，由于有了工资限额，充分地利用工厂设备便降低了生产成本，结果工业利润比其他收入增加得都要多。因为股息是有限的，又因为与法国的地位不同，资金外流是不可能的，周转（尽管有高额捐税）是如此之灵活，以致企业家能在货币市场购买政府短期债券（全属勘探 GmbH 债券，通

称“梅福”债券)，并用这种方法来秘密地资助政府的赤字支出。

沙赫特和施威林·冯·克罗格负责货币和财政政策，最能正确评价从1935年以来由于加速增加军备支出可能引起的经济效果，他们开始要求政府注意除了军备以外的国家和党的其他方面支出。从广义上说，他们的态度是，政府在促成充分就业方面应该仅仅是一个接生婆，在达到这一阶段以后，靠信贷资助的办法应立即停止，政府支出应该通过捐税和长期贷款来充分相抵。

1937年秋季，经济活动中的充分就业的水准从所有的实际意义上讲已经超过，但是政府支出在1938年全480年有增无已，一直继续到战争爆发。通过“梅福”债券秘密地用贷款资助军备支出于1938年3月停止，但是施威林·冯·克罗格发现，尽管已有较高的税率，用增加税收和长期贷款的办法使收支相抵还是不可能的，因而被迫公开从短期货币市场上贷款来弥补差额。

但与此同时，政府支出集中于军备生产已经导致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军备和重工业——达到最高生产能力。为了交付上述军备定货，必须增加工厂和设备。因此，上述工业中的私人投资总额已于1936年达到1929年的水平，1936年到1938年几乎又翻了一番。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私人投资的兴旺意味着企业主互相竞争以吸收工人和争取稀缺原料。结果是由于明显的不顾工资限额，成本增加到对企业界不利的程度，而由于上述增加的成本只能部分地从较高的价格中得到补偿，工业利润趋于下降。然而，上述利润须交纳高税率，这就意味着减少资金周转，不仅阻止了企业家向货币市场贷出现金，而且实际上迫使他们把存在帝国银行的“梅福”债券贴现来补充现款。

债券贴现在1938年的后十个月中使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三十亿马克，也就是说，远远超过了前五年货币增加十六亿马克的数字。急剧的增长引起了不安。通货膨胀不是临近了吗？诚然，“当沙赫特看到他所搞出来的〔通过先前的“梅福”资助方法〕危险局面已变得不可收拾时，他越来越急于寻求出路。这……是沙赫特同银行董事们长时期谈话的主题。”不过，他有胆量，把当时面临的危险和造成的原因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并建议采取所需的补救办法来防止一场灾难。根本原因在于靠货币资助的政府赤字支出使有效需求增加，却没有使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实际国民产值得到相应的增加。更糟糕的是，本来应该防备额外购买力浪潮的堤坝，以及各项精心筹划的控481制办法，似乎完全失效。因为“订货的各方迫使制造商囤积原料和劳力”，而这样反过来造成“物价和工资的过分上涨”。过去十个月奉行的政策所遗留下的影响仍可补救，只要通过税收和“不影响长期投资市场的贷款”能弥补政府支出，只要各种控制办法“变得有效”。沙赫特被撤职，但是——因为他的建议大概受到了注意——接替他的职务的冯克得以在1939年8月25日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已拟订了具体建议，坚决削减非急需消费和任何与战争无关的政府支出，通过这样办法我们将能处于满足各项对财政经济的需求而不受严重震动的地位。”

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连续推行靠多发货币资助的赤字支出，其直接后果是国内的紧张和疲敝，这无疑地造成了浪费和资源的无效使用。但是这种浪费属于一种不同的性质，较之与失业和真正资源闲置相连的浪费，其严重性要小些。因此，极权国家的相对工业力量在三十年代的生长是必然的，因为它们达到和保持了充分就业，而在民主国家中从来没有达到过充分就业，并且肯定地未能挡开1938年的又一次不景气。不过，发展军备成为极权国家

经济政策的支柱这件事，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的性质和结构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规模备战离不开扩大武装力量和计划进行一次征服战争的准备。同时，也引起其他国家的重整军备竞赛。这就使支出的主要目的从充分就业逐步转向取得重新武装的最大效果。

(二) 国外地位

各强国在国内执行的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方法对于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民主国家中，进口货物随着工业生产的波动而波动。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只有日本是例外。从1929年到1937年苏联的进口额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德国下降百分之二十，意大利下降百分之三十一，而日本却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日本工业化的比率和战备的比率如此之高，国内可开发的资源比之苏联和德国又要少，因而自给自足规划的规模受到限制。

在德国，随着国内原料和代用品生产的增长，进口额减少了。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象苏联那样减少对外国经济的依赖。从军事强国的观点看，这是最为可取的，而德国人认为，即使从经济观点来说在一定限度内也是有利的。他们承认国内矿石、合成汽油和合成橡胶（丁钠）比进口的原料昂贵。不过，他们争辩说，天然橡胶的成本为四英镑，而在国内生产合成橡胶的成本为十英镑，如果不能增加出口来获得购买进口的天然橡胶的四英镑，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这老一套的论点一有机会就向德国人硬灌。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三十年代和平的基础就是关闭边界。他们断言，美国关税、英国关税（加上英联邦范围内的优惠安排）和法国对进口的数量限制，都使得德国不可能获得购买外国货物的支付手段。有鉴于国外需求的伸缩性——如外国人所说的那样——通过出口货物减价（贬值）的办法，出口额可以有相当大的增长这一点真的可以肯定吗？如果真的贬值百分之十，出口额就要增加百分之二十——这里引用凯恩斯关于二十年代赔偿转让问题的著名例子——那么，整个国家的边际生产率每增加二十个出口实际单位就意味着最后只能增加八个进口实际单位（即 $1.2 \times 0.9 = 1.08$ ）。根据上述假设，停止进口某些商品肯定对整个经济有利，如果这些商品在国内生产的实际成本比两倍半后的世界市场价483格要低的话。因此，从纯经济的原因而言，——只要存在着失业问题——把实际资源向国内自给性项目投资而不是向增加出口方面投资，并把马克的外汇比价保持在萧条前的水平上，是有利于德国的。不过，当德国接近实现充分就业，而军事和政治目的愈来愈刺激它坚持高度的自给自足性的时候，经济论点就不再重要了。1937年7月，戈林在对柏林国际商会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如果长期依赖外国的或多或少的善意来生活，这对于一个自觉的民族是不可容忍的。

在三十年代，德国与意大利或苏联一样，都尽一切可能使这种依赖程度变得比较“可以容忍”一些。即使如此，1937年德国对外依赖的程度（按进口商品价值计算作为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表示），以及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分量 and 意义（按上述进口货物价值计算作为世界进口货物的百分比表示），与其他大国相比仍是高的：

表 VIII 1937 年各大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依赖性和重要性

上述比率的关联是两重性的。广义地说，为了维持高额国民生产或国民收入，德国对进口货物的依赖比美国和苏联更明显。另一方面，既成事实是德国在世界贸易中仅次于联合王国和美国之后占第三位。它在世界贸易上的份量和重要性，使之能够运用本国的商业政策，把它在战时可能是一个严重弱点的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变为和平时期力量的源泉。只要德国继续保持世

界最重要的贸易国之一的地位，它就有机会在它主要商业伙伴的国界内影响它们的经济活动的水平和性质。在极权主义 484 的德国，对外贸易本身成为准备侵略的一种手段。与之相比，苏联由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低，在世界贸易中不重要，因而它奉行侵略性贸易政策的余地甚小。

从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德国成功地努力通过贸易对毗邻国家施加象联合王国和法国在它们附属领土上所施加的那种政治影响。德国在 1934 年将外汇管制扩大到所有的“现行”交易后，能够调整其进口以适应其出口的波动，但是它不能决定出口量。它的出口依赖于它所不能控制的国外需求的波动。因此，尽管有外汇管制和自给性项目来供应急需，德国出口量的波动在其保持充分就业的努力中仍是一个问题。为了逃避这种困境，德国规定同拥有对德国有补充性的自然资源的各国签订长期的补偿性合同，从而获得必不可少的供应。

不过，邻近德国的大部分国土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与之相似，结果只能提供相似的而不是相辅相成的生产机会。热带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对于德国制造商的辅助作用远远超过大部分欧洲的资源。但是同非洲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以获得大量供应的可能性很有限，因为非洲大陆五分之四以上的贸易都是同德国在欧洲的对手的帝国所属领土进行的。

在三十年代，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从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和自治领以及亚洲属地增加进口。南美的情况则不同。那里和非洲不一样，都是由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因为随着美国的不完全复苏，它从拉丁美洲的进口削减了，也因为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把采购的地点集中在飘扬着它们旗帜的自治领和附属领土，拉丁美洲便能同德国和日本自由缔结补偿贸易协议。这类协议能使德国在和平时期从一些互补性的南美国家获得“保证”供应，但在战时却不能保证这类供应。正是出于这种 485 政治理由，德国也把它的贸易精力集中在经济上不那么相辅相成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国家。不过，把几个国家组成一个军事安全联合地理单位的政治概念，同辅助资源国家联合的经济概念是不一致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德国设法使东南欧国家集中生产它所需要的原料，并取得了某些成功。

在过去，各国政府对于贸易的地理模式所施加的影响很小，因为贸易的进行所根据的原则是最惠国条款、非歧视性和货币的可兑换性，而且几乎完全受关税的调节。但是所有这些随着国际商定的货币和贸易守则的解体改变了。世界分裂成多少是长期性地区货币集团——中欧和东南欧的“外汇管制”集团，西欧的“金本位”集团，北欧和英联邦的“英镑集团”，日本的东亚“日元集团”——于是倾向于鼓励在各自的货币集团中进行贸易，因为每一集团内部都有汇率稳定。三十年代的歧视性贸易政策改变了世界贸易的地理模式。作为贸易政策手段的双边清算，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歧视其他国家，但基于限额和关税特惠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在联合王国于 1931 年废除了自由贸易原则之际，它于 1932 年的握太华协定中规定了英联邦内部特惠的原则，从而对世界其他地区实行歧视性政策。法国主要依靠限额和特惠协定作为调节进口货物的手段，而美国总的说来采用直接的关税的作法，避免贸易上的歧视，对于从菲律宾进口的糖等给予优惠则是例外。联合王国也小规模地利用限额和双边清算。确实，不是德国最先把双边手段带到西半球的，而是联合王国，先是在握太华成功地把它用到自治领上，而后又于 1932 年同阿根廷签订的支付协定中使用了这一手段，这使得美国很不高兴。尽管如此，纳粹

所运用的双边原则在他们有意安排的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武器库中成了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认识到，“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不仅必须在本质上就存在于国家对外贸易的大小幅度中，而且必须存在于国家进出口货物在其贸易伙伴中的分配之 486 中。”

通过对 1929 年和 1938 年每个强国与其经济集团成员进行贸易的情况进行比较，能够看到世界贸易分崩离析的大致迹象：

虽然德国在东南欧的毗邻各国已成为它的经济伙伴，但它们提供给德国所需货物的份额要小于围绕其他大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所能提供的份额。然而出于政治和战略的原因，德国急于发展它在东南欧商业利益范围。因为是同独立国家打交道，它就不能把东南欧国家直截了当地变成自己的辅助国，就象日本和意大利在自己帝国范围内所做的那样。德国采用的办法比较精巧。首先是，大采购量；其次，对于德国希望这些国家增加产量的原料，支付的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普遍价格，由当事国资助这类交易直到德国用出口货物来付清欠款！第三，向这些国家提供它们从别的国家不容易得到的货物。德国成功地使这些东南欧国家贸易额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转向了自己。它用这种办法扶植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它们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发表意见，影响视听。鉴于它们在若干原料的生产上已经专业化，而这些原料在世界市场上是可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的，因此它们对德国依赖程度见《概览，1938 年》，i. 43—62。度增加，它们对德国的出口如要转移到其他地区也随之变得愈来愈困难了。而在双边主义的情况下，确实不可能转换出口货物；这就导致了转换进口货物技术上也成为不可能了。这样，双边主义的方法被看成是政策的重要纽带，执行这种政策能通过外贸达到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

由于德国关心供应的“确保”和连续性，德国极高水平的经济活动等于是为东南欧国家保证了一个市场。德国用这个政策使得上述独立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难以独立自主。而且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德国作为一个大国与若干小国打交道，很可能利用其优越的讨价还价地位使贸易条件对自己有利。但没有证据说明它在 1939 年 3 月以前就这样做了。

经济集团的组成，或是以严格的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德国的情况即是如此；或是基于增加双边的转让，如“帝国”集团的情况。这些集团的组成意味着运输路线的缩短。这样就减少了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可用的手段，本来它们可以资助购买它不能不买的原料。因为它既不能在国内生产，也不能从本集团内得到这些原料。止因为这个理由。“商业途径获取原料”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从国家社会党执政之初起，他们就强烈要求归还前殖民地。但是，如 1937 年以来德国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运转时，原料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了。德国武装部队对资本货物工业产品的强烈要求，减少了此类商品可供出口的余地。

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愈加紧迫。1937 年国际联盟建立了特别委员会，来调查以商业途径获取原料的问题。对此，德国财政部长冯·克罗格坚持说，德国的殖民问题不能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可以使德国得到充分的原料供应这一论点来摆脱掉。只有能用我们自己的货币购买到足够数量的时候，德国的外汇管理才能得到适当的平衡。

德国人认为，世界其余各地区应该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或是给德国殖民地，或是接受马克以便在物资交流中当德国不能供应其他国家所需之资本

货物时用以支付。在 88 国联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草案后，苏联委员在明确提到德国的同时，坚持加上附文说明“某些工业国家抱怨在获取原料过程中的障碍，特别是财政性质的障碍，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军备政策、它们的野心和侵略行为”。

第五章 结 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地震撼了各国国内和国家之间通常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甚至拥有很多殖民地和丰富原料的战胜国也存在严重的社会紧张状态，这种状态至少部分地是导源于经济危难。而在战败国中，以及在资源贫乏和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国家中，这一危难更为严重。这就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促成了政府的革命性改变；在苏联，这场革命开创了社会和经济上的社会改造，这比俄国政府在形式上的变动还更有意义。在战后的动荡不安的气氛中，调整国际关系的新体制出现得很慢，即使出现了，也是短命的；因为随着大萧条的出现，表面井然有序的国际关系就完全垮台了。

陷入经济萧条中的各国的经济困难又一次使现存的社会政治紧张情况更加恶化。在对凡尔赛和约不满的国家里，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直率批评上述条约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击败了比较温和的社会政治力量。最灾难性的结果就是德国也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集团的一员。

由于各国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化，又无国际行为准则可循，不可能在大国之间找到采取联合行动的基础来克服大萧条。结果各国只能孤立地采取经济复苏的措施。经济国家主义是它们对当时挑战的答复：但有了这种主义，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便占据显著地位。

三十年代后期，与民主国家适成对比，极权主义国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在 1938 年保持下来。结果，“相对的”制造能力从西欧和北美的三个民主国家占优势，明显地转移到有利于旧世界中部和东部的四个极权主义国家。通过对军备和非军事货物的政府支出，德国获得充分就业的成就（它的工业经济是上述四国中最成熟的）之后，它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一种物品匮乏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武器装备的积聚只能以减少公私对非军事性投资和减少消费的办法维持下来。作这样的削减倒是有相当大的余地。另一办法则是获取从国外寻求到的潜在资源。无论在什么地方，比如在德国，其经济政策的政治目的若是军事力量，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首先，因为其生产和积聚武器不是单纯为了创造就业的机会，而是别有用心；第二，由于继续进行武器生产（而没有相应地削减非军事投资和消费）造成了经济的紧张状态；这就更促使人们通过侵略手段获取外国领上来寻求解脱。

但是从哪里可以找到辅助资源呢？参与制订德国扩张计划的人证明说，德国

主要战略目标……是得到俄国南方。乌克兰的麦田，顿涅茨的煤矿和铁矿，巴库的油井……都是德国“生命线”梦寐以求的组成部分，对德国的进一步支展不可或缺。

1938 年，仅大德国本身，还不算它反共联盟伙伴的资源，在军事力量上就超过了苏联。它的军事支出（资本货物和钢）仍高于苏联的军事支出，比英法加在一起的军事支出还高出一倍。因此，对于德国希望在东方进行的那种战争，它的军事准备看来已经相当充分。但是它军备生产的数量还没有充分到足以打一场涉及苏、法、英加在一起的战争——更不用说美国也可能参加它们一边。

德国军备的不足，直接来源于希特勒的战略，因为希特勒从未预期同大国集团作战，他同样没有预期打一场持久战。他所预料的是短期内通过外交威胁或闪电战来实现他的有限目标。正因为这个理由，德国军备生产 490 的

数量不是决定于可用的资源，而是基于这种战略估计的需要而定的低得多的水平。此外，集中生产立即使用的武器，即“广度军备”，正是适应这种闪电战略的策略。

但是，掌管德国战争动员的托马斯将军以及他在德国总参谋部的许多同事，都从未赞同过希特勒的战略。他们要的是“深度军备”，即扎实地准备，精心地组织，谨慎地指挥的一场战争；“他们要的是能打一场对大同联合的持久战”。除了手头已有的武器以外，他们还要大量储备的装备和总体上是用来替换这些储备的重工业。虽然德国的煤、铁矿石、生铁和粗钢的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虽然生产的大部分在三十年代已用于战争工业，从“现存”的工厂中增加煤和钢的生产并不等于深度军备，分配给战争工业的资源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最大限度的配额。资源作民用消费与用作军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用于非军事物资的政府支出，如党部大楼、体育场的设备等，就部分地构成了这种差距，直接耗去了实际上并未用于广度军备的资源。未能以更大规模创建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厂，其根源完全在于希特勒战略的根本弱点。虽然负责供应的将军们的战略概念不同于希特勒，但是也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托马斯总是过高估计德国对原料和工人的需求。在他看来，在得到充分发展的战争经济中，其基本资源对于任何可设想的军事需求都是丰富到如此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出现匮乏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希特勒指挥将军们，而不是将军们指挥他。同样，在战争的经济动员这方面本来还可以做多得多的工作，如果德国的计划人员当时少依靠一点闪电战略的话。若是要这一战略成功，就不能让苏联得到英法联盟立即的军事支持，这一点至关重要。

鉴于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危急时期，英法政府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苏联，德国期望在东方的冒险能自由行动这一点就显得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英法对与苏联结盟表 491 现得极端犹豫不决，不论其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无疑地它们需要时间，因为它们已一度让德国在军事力量上超过自己。此外，英国的战略所基于的假设是，它可能同时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作战。要进行这种规模的战备，时间就极端重要，而拖延时间则是绥靖政策的主要目的。

1938 年，英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紧了军备的努力。德国在军备上的优势必然要受到抑制，如果英法加紧军工生产，使这两个西欧帝国本来大得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话。但是，随着 1939 年 3 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地区，随着世界上最大兵工厂之一的斯柯达工厂合并到帝国之内，德国——如它的报纸所吹嘘的——宣称“伦敦和巴黎所希望的，它们获得军备均势或优势的日子已被推迟到不知何时了”。尽管出现了这一新的侵略行为，当英法保证支持波兰保卫本国权利时，苏联却不信任它们的诚意，并开始摸索中立的道路，而德国，在它那方面不得不尽全力确保俄国中立，以便使希特勒的闪电战略有成功的机会。

第三编 力量均势

马丁·怀特

1939年3月15日晚，希特勒进军布拉格，这是德国在表面和平时期领土侵略的高潮。连续五年之久，德国并未开战，就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控制了欧洲并使欧洲陷于恐怖之中。在过去的一年，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成了欧洲外交的中心，如同埃斯库里尔修道院和凡尔赛宫一度曾是欧洲的外交中心一样。也如同菲立普二世于1580年占领葡萄牙和路易十四于1681年夺取斯特拉斯堡一样，德国于1939年3月并吞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一个极度强大的国家兵不血刃便取得的最后一次扩张主义的胜利。当时，对保持力量均势的关心恢复缓慢，尚未产生一个足以抗衡的巨大联盟与之大动干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根据民族原则建立了许多小国，并通过国际联盟促成国际政治的法制化，可以认为列强在国际体制中已经多少失去了原先的优势地位。在三十年代，大国重新宣称它们应有主宰地位，到了1939年3月15日时，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决定权看来再次由它们，而不是由大多数国家所掌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土问题最终地重新解决以来，小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冲突，但是只有两次达到战争的规模。即1932至1935年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冲突和1934年的沙特与也门战争，而上述两次战事恰巧远离大国争夺的地区。但是国际暴力行为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因果连锁，势头有增无减，直到希特勒夺取布拉格。这些暴力行为都是大国干的。日本于1931—1932年征服满洲，意大利于1935—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日本于1937年侵略中国，以及德国本身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其顶点是1939年3月15日征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正是由于列强的干涉，西班牙内战（于同月才结束）曾扩大为一场国际性危险。一场地方性冲突是否会发展为全面战争总是取决于列强的态度，因为全面战争的定义是所有强国都参加的战争。到1939年为止，强国心理上的优越地位是如此显著，以致是否该有地方性冲突都取决于它们。

1919年曾经试图在国际联盟行政院常任委员的形式下限制大国的集体权威。大国很快就扔掉了这种法制的束缚。有的强国没有参加国联，有些退出国联，而那些保留会籍的却发现它同国联以外的强国的共同利益，超过了它们同国联内部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早在1923年发生科孚争端的时候，列强作为最高政务会的趋势又重新出现。它们如有必要就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操纵国际局势，就象十九世纪的欧洲协约那样子。这一习惯性趋势体现为1933年的四国公约，1935年赖伐尔—霍尔计划，和英国的绥靖政策，而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达到顶点。但是强国之间的团结一致从来都不比炸弹上的薄薄的外壳更牢固些。作为各自的私利冲突高涨的一个症状，作为脱离团结一致之前一阵痉挛，在国际危机中它们对共同利益的意识变得极其敏锐。1939年3月15日标志着一个顶点，当此之际，强国的两个联盟间共同利益的伪装终于放弃，而承认了它们自身利益的相互冲突是不可克服的。

510 此时大国分为三类：西方国家，反共产国际国家，苏维埃俄国。西方国家这一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的盟国的余党；这一措词主要指的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资历较高的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敌视曾在很长时间内左右欧洲的政局，直到十九世纪双方都受到跻身于西方大国体制的新兴的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威胁时为止。俄、普是缺乏或者不接受

西方文明的传统的。美利坚合众国由于一种微妙的历史联系和政治思想上的一致而同它们组合在一起。但是它们共同的理想并没有排除过去的敌对，而且不能说如果当初世界上只有这三个大国，那么战争的危险就可以消除。1939年使西方国家意识到它们的共同理想的是它们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胜利者，不论彼此之间各怀异志，而且不负责任，却支持由于战争而形成的国际权力的划分和据此而建立的国际体制。归根到底，这样就使它们同反对上述国际协定的国家分离开来。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都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论它们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相同。三国之间的力量分布得很不平衡，而那个时期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力量与所承担的维护所有三国从中得到好处的国际在美国历史上，英国是宿敌。在1775至1783年的战争中，美国各州为争取独立而同英国作战；1812年，它作为合众国又同英国作战：以后至少有三次在两国之间都有开战的可能——1845至1846年俄勒冈争端，美国内战期间1861年的梅森和斯莱德冲突以及1863年菜尔德军舰纠纷，1895年委内瑞拉纠纷期间。英国同美国之间外交合作的连续传统只是从1898年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中英国默契地支持了美国的利益时开始的，不过，美国在1778年同法国结成了它们历史上的唯一的“纠缠联盟”；虽然从1798年到1800年，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破裂，存在言事实上的战争状态；虽然法国在1823至1825年干预墨西哥从而破坏了门罗主义，尽管如此，美国同法国还是继续认为彼此是传统的老朋友。这种感情的标志就是纽约港的自由神像，这是法国人民于1884年赠给美国的，神像的泛光照明系统有几十六盏一千瓦的灯泡由下往上照射，还有十四盏一千瓦的灯在神像的火炬之中，1951年10月26日由若斯·赖伐尔小姐揭幕，她是法国总统的女儿，陪同其父访问胡佛总统（《概览，1931年》，第124—125页），揭幕时按功帝国大厦上的电钮。

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也改变了它们的共同理想，如在十九世纪，英国根据美国革命的经验建立了第二帝国，并且将它的政治制度改变得适合于法国革命的民主形式。体制的责任适成反比。法国对于对外关系中明智的自我利益或许有最为清楚的了解。但是，它在三国中资源最缺乏，地理位置最易受到攻击，成为盟主的机会最少。英国处于中间状态。它比法国在实力上要强些，虽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世界霸主地位现已让给美国；它象法国一样是国联的成员，但是尽可能只承担在欧洲大陆的义务。

但是自从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以来，法国和英国开始步调一致；1936年3月9日英国保证援助法国，终于明确承认了两国在欧洲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可比拟地最强大的和坚不可摧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不与西方国家往来而退居孤立地位，拒绝承担美洲大陆和及其太平洋岛屿以外的政治义务。这样英国和法国就不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它们的缺乏洞察力的敌人，也就容易认为它们不会享有美国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政治家们设想，此后英国政策取决于美国政策，至少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这样，但是他们不能断言，在美国政治家那一边是512否也这样想。一个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它的政策取决于另一个和它并不结盟的友好国家的政策，但是它不能由此推断那个国家的政策也基于相应的原则，当另一国更强大并有更明显的行动自由时就更是如此。1939年春，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当中，或许只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莱茵边境的安全不仅是英、法而且也是美国的根本利益，那个人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他也肯定是

唯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尽管他受到国内公众舆论对他施加的限制。

与西方国家对立的是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三国。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意大利和日本是战胜国中最弱的和最不满的，投入了反叛者阵营。这三个国家都因不满和贪欲而联合在一起，在西方的眼光中，它们也许象是侵略国家的偶然性凑合。但是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就象西方国家一样，是历史力量的表现。德国和意大利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是欧洲大国中最新型的国家，也是政治上最受到妨碍的国家。此外，它们新近的民族主义以及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相互憎恶和轻蔑，可能使古代德 意 513 意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了，那可以追溯到十二个世纪之前英法两国都不存在的时期。纳粹向鄂图帝国的传统呼吁，应当同时又出现德国同那一个最先给予德国国王以皇帝尊号的国家的联盟，这是很恰当的。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欧洲最新的强国，日本是所有列强中最新的强国，而且是唯一业已取得这一外交地位的非西方国家（俄国除外）。德国和意大利羡慕和忌妒其他西方文明伙伴的成熟、财富、成就和文明，日本也同样羡慕和忌妒整个年它被邀请参加卢森堡问题的伦敦会议时被正式承认为一个大国的。

意大利在政治上依靠阿尔卑斯山北面的日耳曼力量，开始于 755 年承认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为伦巴第王国的君主。774 年，他的儿子查理曼兼并了伦巴第王国，夺取了王位，以后证明这是他称帝的序幕；780 年，他为他的一个儿子建立了意大利国，这要比原来的伦巴第王国幅员辽阔。日耳曼国王鄂图大帝于 951 年征服意大利，接受了意大利国王的尊号，作为恢复帝号的第一步。他的继位者统治德国、勃艮第、意大利直到十三世纪，而“帝国”成了这几块领土的正式名称 [见 G·巴勒克拉夫：《中世纪帝国：理想和现实》（G. Barraclough, The Mediaeval Empire: Idea and Reality），伦敦，菲利浦，历史协会出版物，综合丛书 G17，1950 年，第 16 页]；意大利的王位就合并到帝国的尊号之中。能在这两个领域里有效地行使职权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而意大利同德国分离是在 1346 年，查理四世同意在意大利实际放弃帝位，作为罗马教皇支持他当选的代价。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走运（除拿破仑之外，他是接受伦巴第人铁制王冠的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说明德国的而是说明了西班牙的力量。但是随着西班牙王朝于 1713 年在乌得勒支和约问题上被分割，意大利便转而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而民族统一的共同利益使普鲁士与统一的意大利于 1866 年结成同盟，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意大利经常反抗德国的统治；而德国也经常对意大利文化上的领先表示不满。长期以来，哈布斯堡王朝使两看联系起来；从历史观点来看，轴心国好象是 1848 年两个革命的国家把哈布斯堡王朝分割开来”（A·J·P·泰勒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文章，1949 年 5 月 3 日）。

纳粹政治拟古主义用的是早期西方文明的措词，法西斯政治拟古主义用的是死去的文明的词语，是遥远而不可恢复的历史上的力量均势的词语。这反映了两种政权在实力和气势上的差别。墨索里尼的罗马帝国主义是政治幽灵中最枯燥无味和自命不凡的。这些幽灵出没于中世纪和现代的罗马历史之中，继承了布雷西亚的阿诺尔德罗马参议院和里恩齐的护民官职位。它如要求占领莱茵河和多瑙河作为边界，就不能自圆其说。但是 1943—1944 年德国在意大利的边界，则是中古意大利国的动荡和收缩的边界的瞬息重现。

经过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之后被承认为列强之一。西方世界。德国和意大利作为落后而不幸的子孙在这个 514 集团内表示

不满，而日本作为早慧的学徒在这个集团外表示不满。因此这三个国家在否定西方传统上，在奉行狂热独裁的民族主义上，思想是接近的。

但是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之间，如同在西方国家之间一样，正是共同的国际利益提供了基本的链条。它们是无产阶级国家。它们昭示的目标是革新世界：“建立和维护事物的新秩序”。这就意味着领土的再分配。“我们不可结成单纯防御性的联盟。没有必要组织这样一个联盟，因为没有人想要进攻极权主义国家。相反，我们愿意缔结一个改变世界地图的联盟。”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间的伙伴关系先天地就限定为侵略集团。它们的共同利益就是单纯地掠夺，它们的共同思想就是彼此不能相容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主张。它们并不忠于一个共同的传统，拒绝接受政治道德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西方国家之间则用来缓和实力分配的不平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绝对的赤裸裸的势力关系。德意之间结盟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谁在谁是狮子，谁是豺狼这个问题上不存在问题，而德国同日本的合作关系虽然有时看起来受到地理位置的妨碍，但实际上它们受到整个苏联和英国在印度洋势力范围的分隔却是它们盟友关系的有利条件。

第七个大国苏联站在上述各集团之外。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牺牲者。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强加于它的和平条件，比起西方国家后来加诸德国的和平条件无可比拟地要严酷得多，而且在战后的最后解 515 决中，俄国失去的领土要比除匈牙利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大。俄国是第一个革命国家，废除了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一切西方传统；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受到其他国家的畏惧、掠夺和隔绝。因此，俄国同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具有类似之处，所以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签订了 1940 年的三国公约之后，立刻进行关于苏联加入该公约的谈判，这并非先后不一致。俄国同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一样，对待西方文明持矛盾的态度。它接受西方文明，成为最早的皈依者。它进入文明大国的行列比日本约早两个世纪，比普鲁士早一代。俄国象意大利一样，也有政治上、文化上依赖德国的传统：俄德联盟一直是不融洽的，但是自从奥托曼王朝在十七世纪末叶衰败之后，俄德联盟一直是东欧历史的主题。俄国作为拜占庭的传统的继承人，怀有救世主的使命感，自认是世界领袖和衰退中的西方的取代者。而正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鼓舞它进行了政治和经济革命。这个理论就在表明把它牵入西方的同时，却又自相矛盾地割断了它同西方的联系。

尽管如此，俄国同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它们由国际无产阶级感和所采用的极权政府的形式联合在一起，宣称信奉敌对的意识形态。俄国 516 所期望的世界革新比起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所期望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深刻。反对共产国际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横向征服，重新瓜分以前经常被瓜分的领土，而俄国的主要目标是纵向征服，经过彻底的社会改造来扩大它的力量。此外，它们在领土问题上是有矛盾的。要俄国加入三国公约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它们的侵略范围互相冲突重叠时，力量相等的扩张主义国家不可能实行合作。而且，纳粹的征服计划最终指向俄国。在现代的力量均势中，俄国同英国尚有某种反对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合作传统：而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俄国、法国和英国都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德国。

列强的三个集团间在报刊上，广播中和讲台上的公开论战，对于把它们牵连在内的各次危机都作了矛盾的解释。这些论战自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1918 年德国战败以来，并以日益加剧的程度自 1933 年以来一直进行着。确

认这种争辩的根本办法可以用传统的三角对话的形式表达出来：西方国家设法证明维持现在的国际体制是必要的，轴心国断言重新瓜分世界是必需的，苏联对上述两点都反对，宣布世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可取的。

西方国家。“确实，世界的现状带有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民族称霸的一些特点。另一点也是确实的，就是在欧洲以外建立大帝国和利益范围大部分是通过侵略实现的，总的说来，现在很少有人从道义上为之辩解。不过，我们现已开始努力将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转变成法律和秩序的统治以及在一种合理程度上正义的统治，就象 517 今天世界上一些较为先进的国家在国家生活中总的说来早已达到的程度。国际联盟为接近文明的更高概念和世界合作的史无前例程度提供了基础。”

轴心国。“对我们来讲，国际联盟只不过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是世界大战结束后你们获得的优势的表现，难道你们对这一点难以理解吗？我们从一开始就怀疑，国联将只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富裕国家的联合。通过国联盟约有关修订条约的部分一贯受到忽视，而维持现有秩序那些部分却得到引用，如企图以制裁来扼杀意大利，我们对上述怀疑已经得到证实。”

西方国家。“国联确实是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认为凡尔赛和约远不是不公正的。你们自己口头赞成民族自决原则。凡尔赛和约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本着远远超过预期的诚实、合理、大公无私和圆满程度重新组建了欧洲，在某种意义上，肯定是任何一般性的欧洲条约所未实现的。”

轴心国。“这是粗暴地迫使战败国接受的一项条约；它把一千多万德国人从他们的祖国分割开或排除掉；它瓜分了匈牙利，使得匈牙利民族的三分之一遭受异族统治。这个条约忽视和违背了战时对意大利的诺言。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陈旧过时的条约。你们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当中有两国在战争中是你们的盟国，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就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辖制这一事实吗？从 1919 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你们求助于陈年发黄的档案，企图遏制前进的步伐，遏制年轻而有生气的国家茁壮 18 成长。对于下列实际而迫切的问题——八千万德国人重新团聚的愿望，归还他们被窃去的殖民地的要求，随着意大利和日本出生率的增长和资源不足因而需要的扩张，——你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解决办法？”

苏联。“既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你们自己能够回答上述问题，也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些都是经济问题，在你们都要维护的生产体制之内是得不到解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事物，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世界新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正如你们的论点所表明的）天然地不稳定，而且正受到法西斯国家的挑战，说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以求比较稳定。这就是掠夺成性，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外壳的最薄弱之点被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突破了，在俄国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从那时起世界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原来由英国和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一个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似乎混淆了这种结盟关系，这正好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说明资本主义到了极度衰亡时期所产生的冲突和敌对。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由金融资本主义中最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所建立的公开实行恐怖的独裁统治，以反对工人阶级的日益反抗；与此同时，这也是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划分世界的集中表现。因此，全体进步人类都寄希望于苏联，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力量掌握了政权，而造成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混乱状态的经济制度在世界六分之一的

土地上永远被战胜了。”

轴心国。“我们具有在国内的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519革命、骚乱和流血暴动的实际经验，我们已经成功地承担起来扑灭布尔什维主义的责任。因此我们最懂得如何回答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托辞。不管它在哲学上说些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总是滋生无政府状态。苏俄是一个以宣布世界革命的目标来煽动各国的动乱的国际政治制度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试图以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来取代民族和国家的天然和充满生气的团结，而且通过鼓吹冲突、流血和暴力来达到上述目的。对于精神和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于英雄主义和领导，对于伟人和优秀种族的创造性工作，它提出了否定而违反人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只能成为经济力量的副产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为最神圣的信仰和纽带的消蚀剂，是我们国家和社会中整个人类秩序的销蚀剂。共产主义远不是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它只是一个起点，是最原始的生存形式：它意味着文化的全面倒退，我们信仰，道德和全部文明观念的颠覆。我们懂得这些事情的人是反对人类敌人的欧洲纪律和文明的堡垒。通过我们主动承担起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我们在承担一项真正的欧洲使命，西方国家迟早会被迫承认这一点。”

西方国家。“我们应该说，你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和你们充当反共十字军的谈论听起来不真诚。我们本来是相信共产主义危险的，但是你们无节制的坚持的主张（加上你们的其他行动）反倒使我们开始考虑我们也许面临更为迫近的危险。我们疑心反共公约是一纸聪明的宣传，用来掩盖你们反对我们的各种计划。照我们看来，你们同俄国之间的类似点和差别点同样显著。你们同它都是极权主义国家，彼此抄袭对方的作法，并从相互依存的对立辩证法中得到好处。你们同我们所理解所尊重的民主原则部同样相距甚远；确实，这也是我们总的对同俄国实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的基本原因。但是520不管怎么样，对于介入国际紧张局势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我们确实认为是无益的。我们的做法是经验主义的，我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遵守法律的社会，在其中我们可以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眼前和你们轴心国冲突的原因。我们承认你们所谈的经济问题确有相当道理，特别是近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作了不少事情来满足你们。我们准斋同你们讨论修订条约，重新分配地球上的资源——或者至少是使你们能较容易地取得这些资源的问题。但是除非你们真诚地接受谈判原则，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开始讨论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生活在等待着你们的侵略行为和你们造成的既成事实的环境中，我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信任可言，正常的外交交往的手段也就不可能起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的根据凡尔赛和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律和秩序的体制，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备，因而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我们还认为尊重它，并逐步使它完善，这比之靠暴力行动来危及我们共同利益，并破坏正义赖以建立的秩序基础，是走向正义的更为稳妥得多的道路。”

轴心国。“但我们的经验说明，我们从来没有通过如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通过各种会议，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通过等待你们来获得我们认为的正义。我们倒是通过强大到足以自行取得而得到了正义。（有些时候，你们召集会议对我们的行为作口头谴责，这样满足了你们而无损于我们；不过近几年来由于我们更加强大，你们表现出更加愿意原谅和宽恕我们的行为——这是我们欢迎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这种依靠自己力量保护自 521

己利益的程序，实际上要比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要正常得多。确实，我们感到这场辩论，我们自始至终谈的是事实，谈的是主宰历史和创造政治实质的力量；而你们谈的是理论，谈的是法律抽象概念和道德的乌托邦。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也许我们比你们对国际关系的性质了解得更清楚。人类的生存取决于外部斗争的法则；根据自然法则人类总是强者统治。我们没有制订这条法则，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按照这条法则行事的；我们看到它的存在，而正是你们自己提供了先例。你们不能指望在恰好占上风时阻碍历史的进程；至少你们不能期待不那么幸运的国家也赞同你们的希望。很明显，自由民主已经精疲力竭，并在衰退，本世纪一切至关重要的运动都是反自由主义的。我们认为，你们——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也一样——建立帝国的过程是牺牲了西班牙的世界帝国，或是牺牲了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看来在本世纪要以有利于象我们这样新兴而有活力的国家来重演这段历史进程了。现在留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你们是否准备随着历史潮流前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准备考虑你们的合法利益，或者是你们以自私而无益的阻挠导致我们之间迎头碰撞，对此我们当然乐于避免。”

苏联。“当你们‘把历史进程’和毫无结果的帝国主义斗争混为一谈时，这就又一次有必要强调对这种进程作稳妥而科学的解释。确实，西方国家的霸权不是历史的顶点；它只代表了资产阶级秩序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这种秩序的分崩离析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正是其自身的矛盾造成分崩离析，还因为正是那些矛盾之中产生了逐渐壮大的、代表未来的力量。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侵略性的，它企图削弱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俄国的，要再一次地奴役他们，它奉行一种以巨大破坏和人类受难的时代来改变世界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它在工人阶级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它的最早行动就是著名的不兼并，不赔款，立即实现和平的法令）一直坚持斗争，以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置身于帝国主义中那些反对立即打仗的分子的前头，因而在积极领导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历史性的作用。”

西方国家。“虽则我们自然不同意你们在陈述你们的理由中所用的术语，我们还是承认你们的话里有某种程度的力量。我们确实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近年来历史的分析，在某种语气上对我们似乎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使我们愿意相信，把我们同你们分开的只是方法上的分歧，而不是目的不相容。但是对于我们近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高兴地认识到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极其迫切地争取和平。这样促使我们希望，如果轴心国坚持用非和平手段来实现它们的目的，有可能在维护我们的共同安全中同你们合作。我们应该对轴心国立即说清楚：如果它们最终诉诸武力，我们将以武力来对付它们。的确，从1914年以来，反对把战争作为政策手段已经成为我们既定的方针之一；我们对战争的反感如此之大，以致有些时候乐观情绪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反而鼓励我们去发表言论，好象我们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错觉的话（这还要看你们轴心国决定做什么），那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头脑相信或许如此，但是我们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尽管如此，不要误会。归根到底你们会看到，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同你们一样坚决。我们认为有必要说这番话，以便你们不致弄错。”

轴心国。“我们很高兴，你们亲口承认自己有马克思主义的癖好。我们

经常想到自由民主制的衰微，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这种民主天然地要倾向共产主义。至于你们偶尔表示蔑视的宣言，则是民主的通常形式，而我们懂得应该作何评价。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你们的决心显得动摇了，而我们很自然地持有这种意见，你们终究准备默认在世界上建立一个较为公正的秩序了。”

西方国家。“你们又在犯另一个错误，比第一个错误更为严重，如果你们断定我们近年来如此委曲求全地寻求同你们和解完全是由于力量薄弱的话。多亏你们讲得坦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了。刚才你们说到你们自称所代表的力量好象是历史上仅存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道德和人类的良心也是应该同样予以考虑的事实。我们认为文明不在于仅仅对活力、推动力和意愿的大肆宣扬，而是在于对其控制；不在展示和积聚武力，而在于使之服务于说理和法律的习俗，从而尽可能减少使用力量。因此我们近二十年内同你们打交道所根据的前提就是：另一次大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文明的考验就是能否避免这场灾难。”

苏联。“在你们提到‘你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 525 了’的这一点上，从客观的观点来看，似乎正是你们和法西斯国家的基本相似点表现出来了。你们的感情从形式上看无可指摘；而同你们的实践相比较时，这种感情的价值就变得昭然若揭了。你们准备同法西斯国家进行和解，你们为避免另一次大战所作的努力，完全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而不是牺牲你们自身的利益。你们的不干涉政策是向侵略者连续牺牲了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而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它才尽力推行你们为之自庆的集体安全政策。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只有苏联采取了坚定而真诚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自那时以来只有苏联还在尽力争取反对德国侵略的集体行动。你们用不干涉政策而废弃了集体安全政策，你们借助不干涉政策只求保卫自己，而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加区分。关于这个，用不着苏联从道义上分析，因为不干涉政策明确地显示资产阶级政客在实际上根本不承认人类的道德。只是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一切为己只顾私利的政策，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国家不能抱任何其他指望，却是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并将必不可免地加速它声称要防止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轴心国。“我们同这场日内瓦机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并无关系，除却这场争论证实了我们认为日内瓦机构无用的看法而外。但是我们断然否定作为两方国家的论点基础的那些假定——西方国家还象过去一样仍然是文明的保卫者和解释人。这种有意识的，不费力气而又优越的假定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已经变得陈腐而虚伪了。你们这些提醒我们尊重国际义务的不可侵犯性的人，却在 1918 年停战以后不履行对德国的保证。你们这些告诫我们要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人，却从未通过国际联盟以这种方式解决过重大国际问题，而你们中最大的国家还拒绝参加国联。你们这些谴责我们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欧洲的范围内没有诉诸武力就已顺利实现）的人，却拥有辽阔的空旷领土。这些领土土质 126 肥沃，矿产丰富；其人口密度，同我们相比不足挂齿。你们这些把世界上的一切动乱都归罪于我们的人，却无视自己在爱尔兰、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印度和拉丁美洲接连不断的暴行、流血和压迫的记录。”

西方国家。“公开外交的缺陷（我们创造了这种外交形式，而你们却加以歪曲滥用），是把外交来往降低到不同语言的留声机节目的同声竞赛。我们已经真诚地想重视你们的观点，并设法满足你们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走了多远的分心考虑，最终有可能因认识到你们无意体谅我们而激愤得置诸脑后。”

苏联。“你们错了：公开外交不是威尔逊而是苏联政府倡导的，它在十月革命之后随即公开了帝国主义的秘密条约。但是外交形式没有政治力量重要，而了解是从事实而不是从争论中推导出来的。为什么西方国家放弃集体安全的声明而采取不干涉政策呢？因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侵略的还是非侵略的，作为最后一着，都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怀有恐惧，对苏联怀有敌意。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时起，西方国家政府就不断地向法西斯主义讨好，因为西方各国政府代表了产生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同样社会势力。因此德国的纳粹革命后第一个外交反响就是意、德、法、英四国公约计划，通过排斥苏联该公约无疑是针对苏联的。从那时以来，西方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侵略。527 在西方大国准备牺牲小国和弱国来满足法西斯国家的贪欲后面，隐藏着把法西斯国家引向苏联的希望。四国公约的政策和不干涉政策一起在慕尼黑会议上达到了顶点，当时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在会上安排瓜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再一次有意排斥苏联。上述事实的教训是无可逃避的。苏联完全能够吸取教训和保卫自身的利益，那也是整个人类的利益。苏联要通过当前外交和政治形势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 1939 年 3 月 15 日大国之间争论的情况。那时由于西方政策的愚蠢，德国政策的专横无理和反复无常，俄国政策的不可测知，力量均势显得是极不固定的。大国 528 关系陷入等边三角形之中；而且不同的观察家可以使他们各自相信，通过西方国家同俄国结盟来包围德国，或是由俄国同德国结盟来压倒西方国家，或是由西方国家同法西斯国家结盟来反对俄国的利益，都是天命所归。上述联合中的每一种在历史上都有先例，所以德国人能指出法苏条约和作为国际联盟成员的俄国政策；西方国家能指出德苏联盟源于拉巴洛条约；俄国人能指出《我的奋斗》的纲领，慕尼黑会议，四国公约，1918 至 1920 年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以及协约国根据 1918 年停战条约利用德国军队防止布尔什维克入侵波罗的海国家。上述的每一个联合都各有其从利害关系出发的论据。其中的两个联合不出三年就戏剧性地实现了。

第三个联合——西方国家可能牺牲俄国来同轴心国结盟——从来不曾象另两个联合那样真实，因为这个联合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对力量均势的任何计算中，都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轴心国正在领先。只有轴心国是扩张主义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国家和俄国一样都采取守势。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目的，连最极端的苏联说法也承认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区别。以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和以迈斯基在伦敦为代表的苏联官方政策，五年来所根据的正是假定苏联和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具有共同利益。相反地，对俄国政策最具敌意的西方解释是看到了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和鼓动国外的骚乱，而不是俄国 529 的领土扩张。确实，当时那些最害怕作为革命国家的俄国的人几乎有意夸大它的军事弱点。这在当时是他们特有的错误。

其次，1939 年 3 月 15 日大国之间的主要利害冲突是西方国家和轴心国

之间的冲突。德国夺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国的一大失败，因为从 1919 年以来正是法国而不是俄国在东欧占有优势。这种情况使得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俄国的大国地位立即处于危险状态。西方国家或轴心国为一方，同俄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潜在的。德国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就现有形势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国家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则还差好几步。如果轴心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是主要冲突，那么俄国作为第三方就掌握了势力的均衡。从 1938 年 9 月到 1939 年 8 月，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俄国将走哪条路，因此在德国夺取布拉格之后的六个月里英俄谈判成为阅贝洛夫，ii.304—305)。西方各国政府比它们本国人民更清楚地置到俄国潜在的扩张倾向，正是因此才导致 1939 年夏季西方国家同俄国未能就一旦发生德国侵略对俄国毗邻国家进行援助事达成协议。

见上文，原著第 276—277 页。丘吉尔以他关于力量均势的的见认识到，慕尼黑以后英国也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依我之见，我们必须表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作出进一步的最大努力来保持大国的地位呢，还是我们往下滑到一个似乎比较容易、舒适、不太费力、少受干扰的道路上去，同时承受这一决定所包含的各种巨大牺牲呢？”在下院的讲话，1938 年 11 月 17 日（下院辩论，第 5 辑，第 341 卷，第 1145 栏）。参阅 1938 年 10 月 5 日他在慕尼黑辩论中的讲话：“……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论谁当大臣，只有联合努力才能使我们安全。此际，如果本国在这个外交政策的致命问题上竟然分裂为二，那么，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强国而生存下来的最后机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致命的了。”

“外交史上的悲剧核心”。因为德国的侵略的直接方向是对着西方的利益而不是俄国的利益，德国可以向俄国提供西方国家不具备的直接好处——把它从即将来到的战争中排除在外。西方国家在请求组织一个防御联盟，而德国只要求中立。“英国能向俄国提供什么呢？”德国外交部官员施努雷 1939 年 7 月在柏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这样说。

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大战，受到德国的敌视，但是连一个对俄国有好处的结果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提 530 供什么呢？中立，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的话，德俄可就彼此的利益取得谅解，就象以前一样。这种谅解会对两国都有好处。

这里总结了各种因素：德国正在领先，它的直接利害冲突是同西方国家，俄国把握着平衡，德国可以向它提供从迫在眉睫的战争中排除在外的最大好处。两方国家不能比德国出价更高，除非它们能说服俄国同它们结成防御联盟将彻底防止战争。这是集体安全的老话了，西方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的记录使得俄国不大可能会再接受它。

俄国脱离西方国家，退居外交上行动自由的地位，这在慕尼黑以后立即开始了。1939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他宣称慕尼黑的绥靖时期已经结束。（这一天是捷克内阁撤销梯索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职务之后的第二天，是布克尔和赛斯—英夸特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干预，命令西多尔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前一天。）他把法西斯国家描绘成侵略者的军事集团，但他把德国对乌克兰的计划解释为“英法美新闻界煽起的一阵喧嚣，而且表示苏联要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关系，（这可能是对德国做出的一种姿态。）他把西方国家说成是非侵略性和民主的，但是谴责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表示苏联不会被战争贩子卷入冲突中去，他们惯于让别

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这可能是对西方国家的警告。）这篇讲话当时在德国经过仔细研究而且被认为是令人鼓舞的；五个月以后在德苏条约签订完毕，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要人们饮酒庆祝之时，莫洛托夫“向斯大林举杯，说到正是斯大林——通过他今年3月531的讲话，为德国所充分理解——才造成政治关系的转折’。这就成为苏联政治家赞扬德苏条约和声名狼藉的德国政治家试图诿罪俄国来开脱他们自己的那个演说的官方传说。这种马后炮式的解释夸大了斯大林对德国作出的姿态，因为那篇讲话也同样可用来证明他的政治家风度，如果事态向另一面发展而俄国同西方国家结盟的话。事实上那篇讲话是小心谨慎的，并没有承担义务；讲话强调了俄国的超然态度，而且表示它准备同任何一方进行谈判。1939年3月15日，还不能说对德国的正面活动已经开始；就所能估计的事情而言，成败利钝犹属未定；正如德国那时作为侵略者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俄国作为力量均势的掌握者或许也同样地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

这种不固定的三边力量安排，不仅使未来战争中的阵线分野难以肯定，而且还表明这种结盟既是暂时的又是不可靠的，尽管当时只有很少人看到这一点。不论谁是战争中的胜利者，都只会是不和谐的，专为打仗而建立的国家联合。如果在俄国的合作下或善心中立的情况下，轴心国击败了西方国家，那么轴心国和俄国也不太可能在战后为世界和谐有序的未来而建立起国际组织。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德国在西方国家的暗中鼓励下征服了俄国，那下面就该轮到西方国家了。即或轴心国不靠援助全靠自己力量先后击败西方国家和俄国，并在它们之间瓜分世界，那么很快就会真相大白，轴心国是以掠夺为目的的偶然性联盟，德国和日本很可能为独霸问题进一步争斗。而如果西方国家联合俄国打败了轴心国，这种不相配的又各怀疑忌的伙伴的未来合作关系，只有那些不顾苏联的拜占庭—马克思意识形态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鸿沟的人才能设想。

